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主编：朱 浒

民

国

卷

17

中国风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主编：朱 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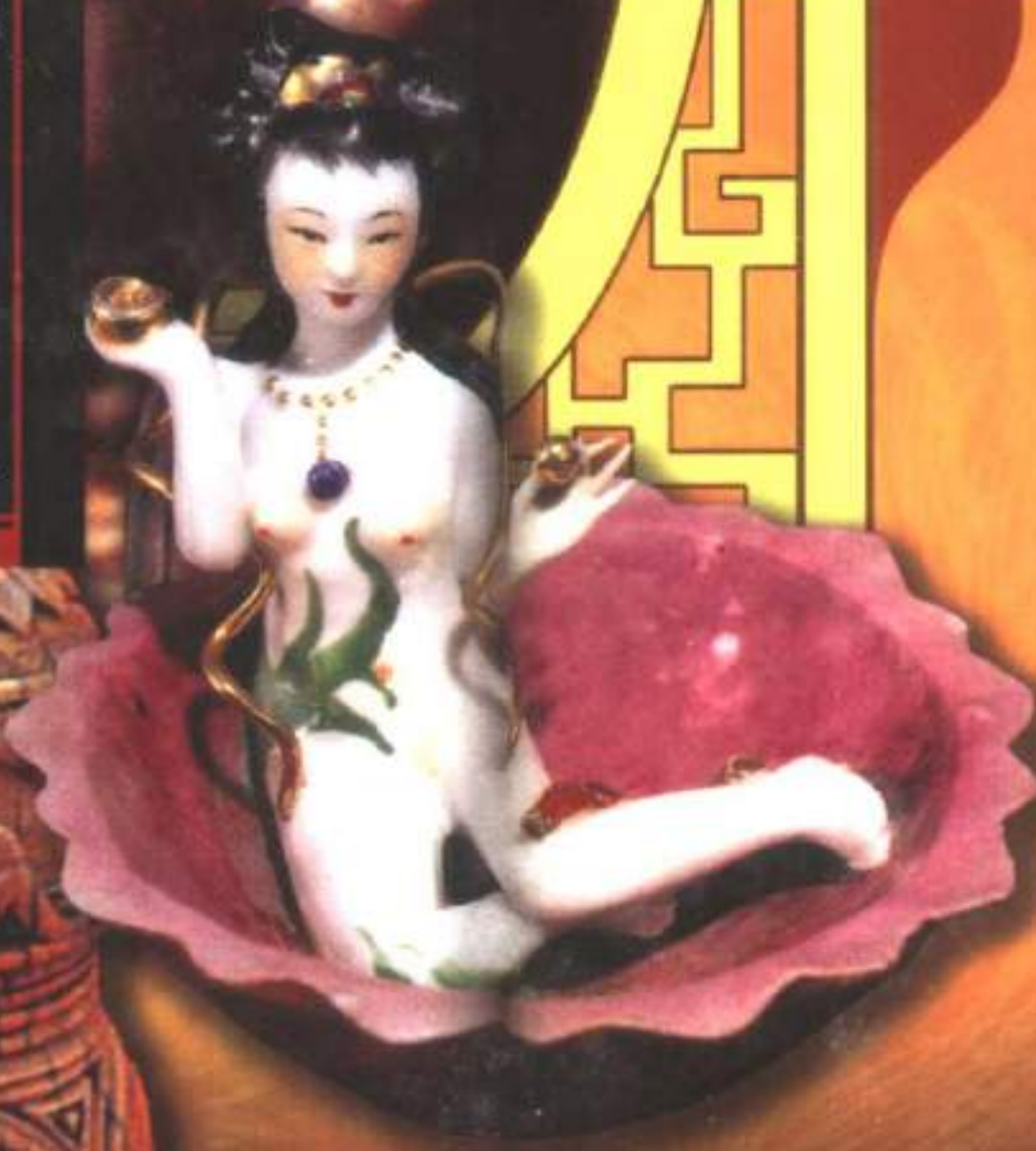
民

国

卷

18

中国风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主编：朱 浒

民

国

卷

19

中国风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ZHONG GUO FENG HUA TU SHI

主编：朱 浒

民

国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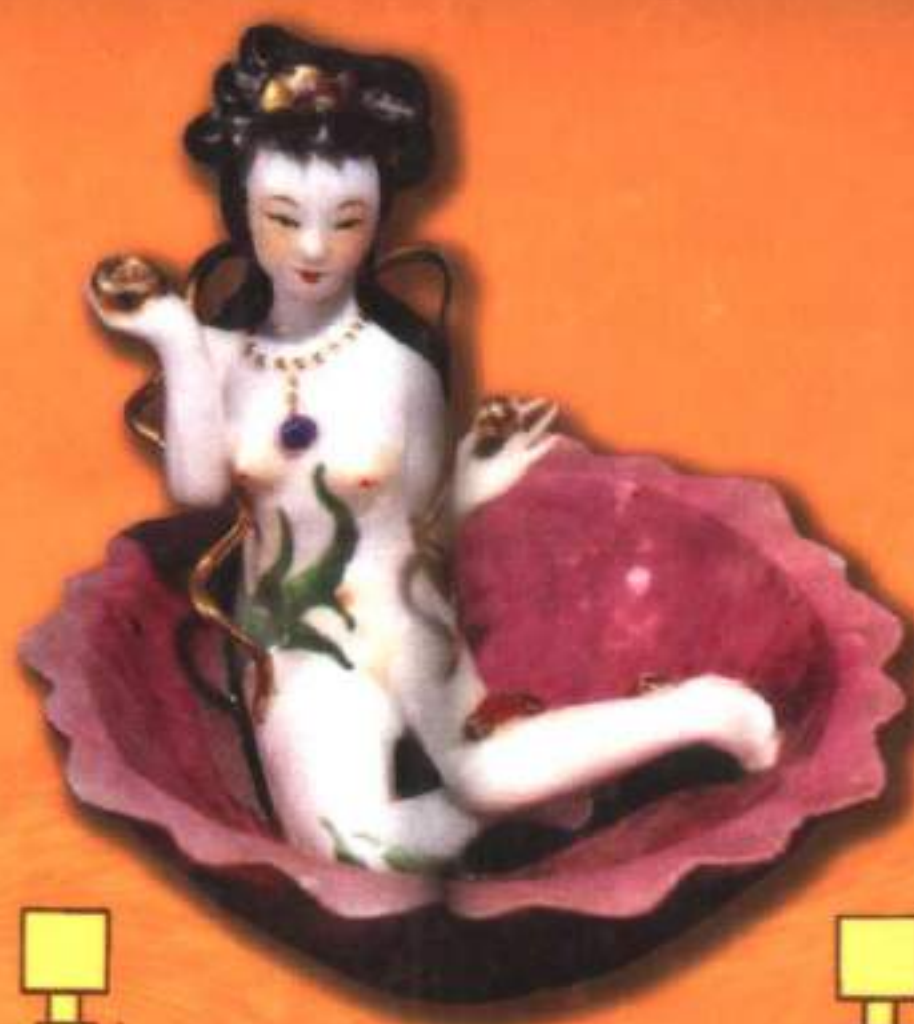
20

中国风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保华



ISBN 7-80606-405-2



9 787806 064054 >

ISBN 7-80606-405-2/Z · 50 (全 20 卷)

C913
31:17

87482



中国

民国卷 17 主编：朱 浒

风物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C913
31:18

87484



中国

民国卷 18 主编：朱 浒

文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ABW47/02

C913
31219

87476

中国



民国卷 19 主编：朱 浒

风物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HBW47/02

C913
31:20

87473

中国



民国卷 20 主编：朱 浒

文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国风化图史》编委会

主 编：朱 浒

副主编：仲伟周

编 委：王 军 吴 平 陈雪莲 张东之
冯 静 吕 东 成 敏 滕 威
王树江 程 静 张健英 徐 飞
吴友仁 丁 梦 东 平 柯 婴
王宏闻 闻 达 朝 东 王 平
臧长风

书 名：中国风化图史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王明贵

出 版：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印 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250mm×166mm 大 32 开 印张 194
国际书号：ISBN 7-80606-405-2/Z·50
定 价：1680.00 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觉醒 / 001
	“性博士”张竞生 / 018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性 / 040
第二章	民国新女性与妇女问题 / 069
	民国新女性 / 071
	民国初年的妇女运动 / 093
	辛亥革命的妇女运动 / 099
	五四运动后的女权运动 / 104
	《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大讨论 / 106
	新文化运动与女子贞操 / 112
	大革命时期 / 12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成果 / 128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婚俗与婚礼 / 133
	20 世纪初婚姻关系的变化 / 135
	民国初年婚爱状况 / 145
	近代的收继婚 / 160
	民国时期若干婚姻习俗 / 170
	男家方面 / 170
	女家方面 / 174

- 178/男女婚姻关系上平等地位的确立
- 181/民国婚礼大观
- 200/民初之袁克文妻妾成群
- 205/民初女权参政运动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
- 207/刊物著述对封建伦理、封建婚姻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 213/婚姻管理
- 213/妇女解放和婚姻的早期规定
- 215/民国期间妇女、婚姻的立法
- 222/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 253/国民党统治区婚爱状况
- 280/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婚爱状况
- 291/民国时期的选美与花榜
- 293/民国选美透视
- 311/卖笑业的特殊广告：花榜
- 323/民国电影的发端
- 325/新奇的玩意儿：西洋电影
- 332/走向繁荣的 20 年代电影界
- 343/风靡一时的古装片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武侠神怪片盛极而衰 / 350

争奇斗艳的女影星 / 357

璀璨的明星阮玲玉 / 371

光彩夺目的女影星 / 377

民国时中国娼妓业的畸形繁荣 / 395

繁荣的时代背景 / 397

北京的八大胡同 / 401

民国时期妓院的例规 / 406

民国妓女的生活境遇 / 413

嫖客对妓女的摧残蹂躏 / 423

社会恶势力对妓女的欺压 / 430

近现代中国娼妓业的特点 / 437

娼妓制度的消亡与旧上海的禁娼废娼 / 452

民国以后“禁”与“弛”的特点 / 456

第七章

妓女文学 / 487

20 世纪 20 年代的妓女文学 / 489

吴虞“艳体诗”的风波及文学家的性感受 / 508

同光时代上海首屈一指的胡宝玉 / 517

清末民初四大金刚之一：林黛玉 / 524

- 533/清末民初四大金刚之二:陆兰芬
- 535/名噪吴中身巧俊秀的金小宝
- 538/貌属中姿但善修饰的张书玉
- 539/清末民初的传奇名妓:赛金花
- 548/一个永远不会圆满的女人月牙儿
- 556/在黎明前逝去的女人:陈白露
- 567/被物欲吞噬了灵魂的女人:阿英
- 575/民国时期青楼女子的觉醒
- 577/辛亥革命后的青楼进化团
- 581/风尘弱女的爱国行动
- 583/侠女助志士的佳话
- 591/近代的狭邪小说
- 593/狭邪小说的产生
- 597/狭邪小说向社会小说的演变
- 601/真实地再现妓院生活的《风月梦》
- 606/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
- 638/揭露流氓妓寨害人的《海上繁华梦》
- 646/作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和《留东外史》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主张婚姻自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 661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产生与特点 / 663

早期的“鸳蝴派”小说《碎琴楼》 / 674

主张婚姻自主的《孽冤镜》和《贾玉怨》 / 685

“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玉梨魂》 / 695

《玉梨魂》对寡妇恋情的描写 / 698

《玉梨魂》的艺术特色 / 707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 711

哀情小说——苏曼殊深层心理图像的
显影 / 714

苏曼殊小说的艺术特色 / 730

第十一章 西方人体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

中国人体艺术发展 / 737

中国裸体艺术的启蒙 / 739

民国时期裸体艺术的厄运 / 754

刘海粟的人体模特观 / 764

鲁迅与人体美术 / 799

第十二章 民国时期三教九流 / 809

民国澡堂揭秘 / 811

823/清末民初彩票风云
 835/民初江湖骗术
 849/狂赌方城大战
 860/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跑马厅
 881/上海跑狗场黑幕
 894/远东的大赌窟——回力球场
 909/依靠回力球场进行残酷榨取的花招
 916/步维贤其人
 923/换汤不换药的“中华运动场”
 928/旧上海的打花会
 942/西园赌场记实
 950/吃角子老虎
 951/赌台
 958/总会
 959/“丐帮”闯江湖
 975/芙蓉君子与鸦片烟毒
 988/鸦片流入中国和上海受害情况
 998/民国泛滥的吸毒与贩毒
 1014/专为毒品保险的“三鑫公司”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留头不留发的辫子革命 / 1027

第十五章 旧社会的乞丐之家：花子院 / 1045

“范门家” / 1049

“康家门” / 1049

“李家门” / 1050

“高家门” / 1051

七支八姓 / 1051

民国时代的穷家行 / 1058

拜杆、春典 / 1068

拜杆 / 1068

春典 / 1068

化相(下街讨要数来宝) / 1069

开始进街 / 1069

向卖肉的讨要 / 1069

向卖罐子(指农村提水用的器皿)的

讨要 / 1070

第十六章 上海大流氓黄金荣的发家史 / 1071

第十七章 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出身与发迹 / 1085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的性觉醒



风

化

图

史




1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性压抑的清除和健康意义上的性解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忙于战争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的觉醒。这时，一个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后又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逐渐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提出了“人权”与“科学”的口号，提倡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五四”以后许多新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是由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圣陶）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在1921年7月成立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例如沈雁冰指出：“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字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他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创造社则主张“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也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文学家要把握住时代，以文艺来表现时代，认为打破虚伪的、罪孽与丑恶充斥的、使生命窒息的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

这一时期新文学的发展使性这一重大的生活主题就必然会涉及到，既然要反对旧道德，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打破虚伪的、罪孽与丑恶充斥的、使生命窒息的现状，就不能不反对性禁锢，提倡性解放。新文化运动





双美人图

和“五四”运动的先行者们几乎无不表现出这种思想，并不断地为之呐喊、斗争，尽管他们还没有像张竞生那样公开地举起“性学”的大旗，也没有十分系统地表达性学观点。



鲁迅是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对旧社会的丑恶、虚伪和吃人的旧礼教深恶痛绝，包括性压抑、性虚伪和对女子的性压迫，在他的许多散文中都可见到这方面的论述。

鲁迅首先揭露出中国男女的性禁锢与性苦闷，例如在《随感录·四十一》中说：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性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是不能压制的，压制的结果往往是强化，甚至是病态的强化。在性压抑状况下的中国人心理上是变态的，行动既受压抑，于是常常意淫，鲁迅在《小杂感》中对此作了嘲讽与描述：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鲁迅一直在揭露和讽刺当局以及一些道





学家实行的禁欲主义和性压制。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旗袍美女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家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

他还在《马上支日记》中对当局采取种种设男女之大防的愚蠢措施加以嘲笑说：

“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当时的政府当局常把一些涉及性的书刊扣上“淫书”的帽子而加以查禁，对此鲁迅是十分反对的。他尖锐地说：

“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他对性学书籍的作用评价很高，认为如果焚烧或禁止“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女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

鲁迅同情妇女，极力地反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妇女实行性压迫的畸形现象，多次尖锐地批判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不平等的





男女两性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性道德观念，他的《男人的进化》、《我之节烈观》等都是对这些腐朽的封建道德进行致命打击的战斗檄文。例如，他在《男人的进化》一文中，就针对女子“守节”、“从一而终”等问题说：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种制度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急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的文章、极富于战斗性，而周作人在性学方面的论述则更富于理论性。周作人可以说是“五四”文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影响着当时的文坛上，只是后来供职日伪，才声誉日下。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类的性生





活有一种较为宏观的看法，既反对性放纵，也反对性禁锢，而认为“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这是很正确的观点，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性文明建设的根本就是在禁锢与放纵这两“极”的中间寻找一个适合于人们幸福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点。他说：

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两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因此，他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性观念，即在性生活上的“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他说：

“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清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



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几时才能浸入青年的心里，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呢？”



游园



直到现代我们还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

周作人也多次尖锐地揭露道学家们在性问题上的虚伪。他在《“重来”》中指出：“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洁的。”在《“净观”》中又说：“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此外，他在《风纪之柔脆》、《萨满教的礼教思想》等散文中，也尖刻、辛辣地嘲笑和讽刺了一些名为维护社会风化、实则男盗女娼的假道学们。

周作人对禁书极为反感。他说：“禁书，无论禁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在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青年作家所写的性文学作品，如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受到社会的攻击，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的周作人都著文而为之辩护。他还说过：“社会喜欢多管闲事，而于两性关系尤为严厉。”

对于禁娼，他也很有一番见地。当他在《社会咫闻》里谈到有人认为目前禁娼不止的





障碍在于“此等无耻妇女”本身时，他很抱不平，认为这个罪过与妇女无关，而完全是由资本家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说：“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当然不在那些无耻的妇女，而在于有耻的资本家们了；或者我们不归罪于个人，可以说在于现在的经济制度。”他非常同情妇女因贫穷所迫而去卖身的悲惨命运，他认为实际上妇女问题最重要的是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

胡适是中国性文化的倡导者，他在美国留学，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所以他强烈地反对封建性观念，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提倡男女同校。他说，像美国那样的男女同校学习可以“养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国过去则“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

他痛恨中国男女在性问题上的两种道德标准。他曾愤然地说：

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





时装扮相的杨贵妃出浴图

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



交 的 资 格；再 娶 的 男 子，多 妻 的 男 子，却 一 毫 不 损 失 他 们 的 身 份，这 不 是 最 不 平 等 的 事 吗？”

因此，他断言：

“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胡适认为，构成夫妇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性关系，他说：

“夫妇的关系所以和别的关系（如兄弟姊妹朋友）不同，正为有这一点异性的恋爱在内。若没有一种真挚专一的异性恋爱，那么共同生活便成了不可终日的痛苦，名分观念便成了虚伪的招牌。”

由此，他又对正当的夫妻关系作了一个概括与总结，他说：

夫妇之间的正当关系应该以异性的恋爱为主要元素；异性的恋爱专注在一个目的，情愿自己制裁性欲的自由，情愿永久和他所专注的目的共同生活，这便是正当的夫妇关系。人格的爱，不是别的，就是这种正当的异性恋爱加上一种自觉心。





在中国 20 世纪的前期，提倡对性持开明态度的有许多都是像胡适这样受过西方近代文化洗礼的学者，其中林语堂也是杰出的一个。他学贯中西，精通东西方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才华，进步的性文明思想体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当中。

林语堂反对那种抽象的、空洞的和纯粹精神的恋爱观，认为男女的爱情是和肉欲分不开的。他在《生活的艺术》中说：

“我也完全不能把心灵与肉体的欢乐分别开来。世上可有什么人对于女人只在精神上爱她，而不在肉体上爱她。”

他又写道：

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

林语堂一方面承认满足肉欲的必要，并把性欲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但是另一方面又反对纵欲，认为：“好色的天性对于增进人生的生趣，有相当助力，但行之过分，则反而不利于女人。”他又认为人在“好色的本



能”之外，也有做父母的本能，但“在艺术、电影和戏剧中不断的性欲刺激之下，好色的本能颇有征服家庭本能的危险”。



裘领美女



以上这些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综观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风云人物，都倡导对性采取自然的、健康的态度，反对性虚伪，反对性压迫。这些论述不仅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风貌，而且对今日的性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性博士”张竞生

20世纪中国性科学和性教育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他是中国现代性科学和性教育最杰出的先驱。他是一个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性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怀着美好的理想，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提出了研究性科学、实施性教育以及改革社会的其他一系列主张，并身体力行。但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主要是20世纪前半期，传统思想的阻力实在太大了，他的不少思想又太超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义，人必非之”，他历经艰难与曲折、非议与打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悒悒以终。

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一户农家的张





竞生，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代表国民党担任南北议和的代表，当汪精卫因行刺摄政王而被捕时，他积极地进行营救工作。他为寻求科学救国，1912年公费赴法留学，先后取得巴黎大学文学院文学士、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创办“美的书店”，出版“美的丛书”，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近20部颇具影响的作品，但因编《性史》一书，触犯了封建势力而受到舆论的严厉指责，后又有书商冒他的名大编淫秽书刊而败坏了他的名声。30年代后，他返回家乡，进行一系列乡村建设实验，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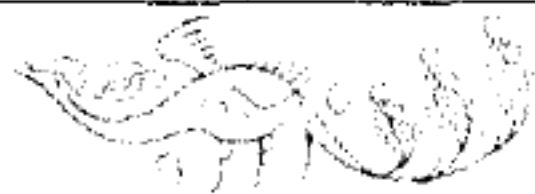
张竞生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早在清朝末年，他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时，就提倡剪辫子，并改革校方编组吃饭的办法，而被校方开除。去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金山中学校长，力排众议，破天荒地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组织女学生游泳；又提倡避孕节育，被军阀陈炯明斥为“神经病”，被人扣上“卖春博士”的帽子，以致被





游园

迫去职。他为年老色衰、贫困潦倒而又素不相识的一代名妓赛金花组织募捐演出，而造成了“性博士怜惜臭妓女”的围攻。回家乡



负责修建钱饶公路时又因为毅然地毁坟修路，占用了一些稻田而得罪了地方恶势力，所以被缉捕。第二次回家乡后又倡办果园，建立学校，并提倡女子入学。直到全国解放后，他还上书党中央，提出不能盲目追随苏联“老大哥”、不能建都北京、人口不是多多益善等意见……。他总是想改革、改革、走向美好、美好。

张竞生的一生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提倡性科学与性教育了。1921年，年仅33岁的张竞生受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在任教的几年间，他目睹了并思考着中国社会的许多怪现象：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男女双方常像牲口一样，被人机械地捆绑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公开探讨这导致男女之间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产生倾慕的复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编撰了《美的生活》、《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爱情》等稿，印成讲义，给学生传授性的知识，以后这些讲稿获公开出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张竞生在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期间，拟收集出版一套“中国民俗丛书”。他召集会员研究编列了一个调查表，其中就有性的调查内容，后来又将“性史”调查作专项列出。他认为，科学要有大量资料做证据，性科学也不能例外，“性史”就是性的材料，愈多愈好，不论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都应搜集起来加以整理，作为科学的证据，从而探索它的发展规律。

以下就是载于1923年北京《京报副刊》：张竞生进行“性史”调查的一个公开号召：

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

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

阴惨惨的天气，呼呼的北风，刮得人心冷胆寒；校课不用上，闲来愈觉无聊赖。市场戏园跑一遭儿，情绪更纷乱，常常因此触景而悲伤。青年的悲哀！悲哀的青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悲哀！无伴侣的悲哀，有伴侣也多不得意而起了悲哀！

劝君莫悲哀，诸君采用下列的消遣法，即把笔提起来，详详细细地写你个人的《性史》，做起了一个有系统的记述，包管你打破





紫藤美女

这个烦闷的年关。

你竭力记起几岁时头一次知道两性的分



别。其时情况如何？仅仅觉得一个虚泛的念头？或感到一个需要的安慰？只凭妄想就算了？抑且有种种把戏的接洽？

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初次的情况如何？久后是怎样？那时对异性有什么心情？含羞吗？外拒而内迎吗？喜欢人谈婚姻与交媾等事吗？

你会手淫或别种“自淫”否？如用器具摩擦或有阴阳具摩擦外物。何时起始？次数几多？怎么使你生了这个动作？（或听别人说过，或看书画引起，或不知不觉中发现，或因生殖器痛痒而按擦等等。）结果与身体发生什么妨碍？头痛、眼昏、神情、意怠、背脊发软、神经刺激、交媾力不振作、阳痿、阴衰，诸如此类，以及记忆力减失、聪明与毅力日衰等等，至少有无一件感觉到否？每当手淫时的前后，有无愧悔这件东西不应该做？

你会梦遗否？怎样梦遗法？似与人交，抑无因而至？遗精多少？每日次数多少？有定期否？梦遗与手淫有无关系？（如无手淫就不免梦遗？梦遗就不想手淫？或一经手淫就无梦遗？或手淫后更多梦遗之类。）





你曾嫖妓否？如你是女人，曾否做过浪漫的性生活？曾受过何种生殖器病？治疗状况如何？现在愈否？

你现在娶未？几岁婚娶？有子女无也？曾有过何种手续避孕否？未婚前及到现在曾否知道些“性教育”？看何种书？有什么实行？初婚或与人初次交媾时的情况如何？

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无论和谁，详详细细写出来。

以上所举，不过略示其大概而已。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但事情当求真实，不可杜撰。

至少这个征求的本意，不是与人开玩笑，也不是使人白献魂，更不是“诲淫”与什么什么伤什么风，败什么俗。不！不不不！这个征求有三个大好结果的希望：

第一“为学问而学问”，性的学问比什么学问都重要。这个学问弄好了，人类所得到它的利益当然不可胜计。我们这个征求，即有供给这个“性学问”的材料，以便达到这个学问的成立。大家对于学问的贡献，都有





一份义务，自然说不上白献魂、开玩笑那些事了。

第二，我们希望，各人的“性史”聚一块，使各人一看，当然龙颜不免大惊，或者凤脸更加大喜，以为自己改良及警策的张本。故我们这样征求，不是诲淫，乃是引导人入于“性的正轨”。

第三，各人对于性有何缺憾处，如心理方面或习惯方面的种种变态。我们希望通过“心理分析法”的解释，及卫生学与医学的救治，以及各种“好习惯”的养成，务使失恋者，性病态者，要得一个好伴侣者，对于性不满足的夫妻者，要避孕者，或要生子者，……诸种人皆得了一个满足的效果。这是移风易俗者最大的关键，与人类得到好行为最重要的方法。

来！来！来！给我们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你给我们材料，我们给你方法。两相益，两勿相忘！

（注一）该征求的发念已在数年前，那时恐怕假道学家的势力太大了，所以得今日才





全家福

发表，或者尚不免开罪许多人。

(注二) 应征求者切要写明男女，年龄，籍贯，职业，通讯处，姓名真假听便，如写



真如，我们决定代为秘密当用假名传出。

(注三) 我们谨问有哪些人能同我们合译
蔼理斯所著的“性心理”六大部书否？

暂时通讯处：北京——北京大学，收发
课转张竞生。

张竞生的理论与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影响
是很大的，由于他的主张，导致了中国现代
史上一场最闻名的关于爱情的大辩论，这件
事发生在1923年4、5月间。

1923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谭熙鸿的
妻子去世，当时谭只有33岁。妻子去世两个
月后，他和妻妹陈淑君相恋，进而同居。陈
淑君本来和广东的沈厚培有口头婚约，沈知
道此事后，就赶到北京，痛斥谭熙鸿和陈淑
君，北京的舆论界也斥责陈淑君的变心，声
讨谭熙鸿利用教授地位夺人所爱。

对此，张竞生于1923年4月29日在《晨
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
的研究》一文，明确地指出：

陈女士是一个新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士，
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女。她
的爱所以变迁，全受条件的支配，据她所说，





见了谭宅之姊的幼孩弱息，不忍忘情于抚养。据我所知，谭的性情温和也是使她好似向火消化的雪狮子的一个理由。他如谭的学问、才能、地位也只不是沈先生所及，这些条件均左右陈女士对于沈谭的爱情。可是她虽改旧择新，究竟并非薄幸忘旧，她虽则与谭偶，终视沈为朋友，贻书劝勉，足见她是一个有情谊的人。

就理而论，陈女士年已二十余，已有自由择人的权力。无论她所改选的或好或歹，他人原无置喙的余地。只缘处在这个新旧观念互相冲突的社会，批评的人，一眼看她新式上的好处，一眼又看她不守旧式规矩的不好处。以致误会丛生，指摘频至。遂使可怜弱女，心迹难明。或者她竟为这个无情的社会牺牲品也未可知。凡人具有同情心，我不忍见陈女士的受屈太深。我更不愿爱情定则永久遭殃，我尤不愿意沈君及一般人的终久误会不解。所以郑重写出此篇，使人知道爱情的变迁，自有变迁的理由。使人知道夫妻是朋友的一种，可离可合，可亲可疏，不是一人的专利永久可占有的。希望此后用爱或





是被爱的人，时时把造成爱情的条件力求改善，力求进化。那么，用爱的不怕被爱的有变迁，被爱的也不怕用爱的有改志了。

张竞生在文章中说道：

“现实的青年男女讲爱情。究竟，实在知道爱情的人甚少；知道能去实行主义的更少。所以我先从爱情的理论方面说一说，然后再取陈女士一事实做为证助的材料。或者于爱情知与行二面上均有些少的贡献也未可知。”

张竞生的文章于当时，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文章在《晨报》副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以至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甚至于全国。

当时，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恋爱，爱情的成分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加上性的感觉或更加人性的行为，而不容渗入其他条件，否则就不是纯正的恋爱。也有人觉得，恋爱应重在精神，所以，感情、才华、性情、知识、人格等不稳定的因素不能作为条件。古人云：“以金交人者，金尽则交绝；以色交人者，色弛则爱衰。”讲的就是此理。

有人说：爱情条件的比较，应仅限于爱





骏马美女

情未确定时。如果婚后还存在比较爱情条件的念头，无异于“吃着碗里瞧着锅里”，逃脱不了贪食二字的饥渴。婚后的比较，将会导致爱情的递变而至无穷。



有一种观点认为，爱情创造了人类感情并创造世界，须特别加以保障，才能完全行使它的职务。说什么爱情固然可以变迁，但更具有永续性，不易变迁性。容易变迁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爱情，夫妻双方在婚前应严格择人，而订婚或结婚之后，则需要接受法律束缚和道德制裁。离异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也是人生极其痛苦的事情，甚至可能因骨肉分离演出许多惨剧。所以，如果对方没有疯狂、死亡或人格堕落，爱情则不应变迁。如果因第三者的财产、地位等胜于已爱之人而发生感情变迁，那只能证明所爱的只是附属于迁变之人的物资，并非其人。这种“估价式的卖身主义”，是使爱情破裂的洪水猛兽，应全力加以排斥。

对于“夫妻是朋友的一种”说法。参加讨论的人大多认为难于成立，因为夫妻之间在社会、家庭、子女及经济等各方面有种种密切联系，且相互受生理驱动的作用，因而无法变成与朋友一样。

当时，很多人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例如，年仅25岁和鲁迅还不相识的许广平就以





“维心投稿”之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近一版的文章。

许广平在她的文章中，首先强调爱情的高尚性，所以爱情要受理智的支配。她说：一般动物的情，多半为生理的冲动。人是进化的动物。人的情有时虽不能抛弃生理上的冲动，但终久有优于动物的高尚爱情。因此，人们在恋爱过程中就需要进行理智判断。爱情刚萌生的时候，虽然往往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但发生恋爱或离异恋爱，经过理智的判断才能比较妥善一点。

当这场“爱情定则的讨论”进入尾声时，张竞生进行了公开答辩。1923年6月20日和6月23日，《晨报》副刊分上、下两篇刊登了张竞生的《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他在文章中反驳了“爱情是神秘的，无条件的”观点。他认为爱情并不神秘，而是有些人把它视为神秘。爱情与条件不能分离，无条件即无爱情，有些当事人为情欲所迷惑，自以为进入了爱情的神秘领域，但旁观者都明白，确确实实地了解，他们之所以相爱，大体上有三个原因：或因为情欲冲动，或因感情作





用，或因社会制约。那些反对“爱情是有条件”定则的人，却承认“爱情是各种感情结合而成”，这就无异于肯定了感情是构成爱情的第一个条件。

爱情比较和变迁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婚后呢？张竞生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那些认为比较与变迁定则仅适用于婚前的人，是把爱情与婚姻制度混为一谈了。爱情是一回事，婚姻制度又是一回事，道德与否又是一回事，不可混杂起来辩论。离婚案的增多，事实昭然，原因固然复杂，究其根本点乃是夫妻双方对于爱情的条件不能达到希望，所以才产生变迁的想法，作出离异的决定。不过，所谓比较和变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夫妻之外再去寻第三者。已成夫妻的人，了解了爱情变迁的定则，应该竭力向上，使爱情日日进化，这对于世道人心与移风易俗有极大的裨益，决不是诱人为恶。

“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一定则所说的朋友，是泛指，是广义的朋友，但夫妻不是普通朋友，正如同说马是兽类的一种，而跟同是兽类的“牛”并不相同。用夫妻有性生





活来证明不是朋友之一种，张竞生不能同意，他认为性交与爱情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先有爱情，而后才有性交，不是先有性交，而后才有爱情。虽不是夫妻，也可发生性交；若有美满的条件后或有性交，或无性交，爱情都是一样的。

“名誉、状貌、财产”能不能作为爱情的条件？张竞生说，他的“名誉”，即是功业、道德、文章的总名。“名誉”与地位不同，与“势利”则完全相反，当然是组合美满无缺爱情的不可少的条件。状貌一项，与爱情的关系也大。美貌，即是美的一种。单以状貌取人，固然有“色衰则离”的弊病；倘若别的条件都具备，能再加上状貌的条件，爱情当然更美满。至于财产，不独与爱情关系，而且从广义说，它是“生命之源，一切之始”。有人格的人，能用财产去发展他的最广大的人格；有感情的人，能用财产去扩张他的无限的感情；有才能的人，能用财产去增进它的更高深的才能。若单以财爱人，或以财被爱，势必财尽爱也尽；若所爱的人，除财之外，若有感情、人格、才能、名誉、状貌诸





条件，难道可以说是利欲所动吗？

张竞生答辩完之后，三封有关来信又刊登在《晨报副刊》上，呼应了张竞生的观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张竞生的工作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受到了许多社会人士，尤其是青年人的欢迎。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性博士”。

《性史》征稿的号召刚发出不久，就收到了十几篇来稿，这使张竞生兴奋不已。于是他从大量来稿中选出7篇，于1926年编成了《性史》第一集。这7篇全是在北京求学的大学生的性体验，原文刊登，张竞生加上按语加以评析。

《性史》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1926年8月，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首先在南开大学查禁此书，不久他又说服了警察局在天津查禁《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妻之性生活》和《淅明篇》等五种“淫书”。这种做法激起了大学生和一些社会人士的反对，骂张伯苓是“秦始皇”。

1927年，张竞生与人合资，在上海福州路51号开了一家“美的书店”，主要出售性





学书籍，宣传性的科学知识。这个书店不仅以售书内容令人瞩目，也以聘用了女营业员而令人感到十分新奇，因为当时中国人开的店是一概不用女营业员的。于是张竞生又开始挑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了。

“美的书店”生意十分兴隆，盖过了许多大书店，招来了嫉恨，广泛宣传性知识更为一些道学家所不容，于是，这些传统的恶势力勾结警察当局多次控告“美的书店”出售“淫书”，多次查封，多次罚款，导致书店无法继续营业。

如果说张竞生对这种打击还能忍受的话，使他不能忍受的是社会上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真正的淫书，而作者都是“张竞生”。这是因为一些不法书商看到张竞生的性学书籍大受社会欢迎，于是就冒其名而出版低级下流的黄色书刊以牟暴利。张竞生一下子被弄得声名狼藉了，他被称为“淫虫”，连他的一些朋友也不理解他了：“张竞生为什么会堕落成这样？”

他愤怒，他痛苦，他声明，他告状，可是都无济于事，从而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悲惨





境地。打击接踵而来，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了。一切都使他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无情。为摆脱困境，他再次去了法国，归来后在性学方面已是壮志消磨，可是还是致力于“实业救国”。他毕生劳碌，毕生“不安分”，毕生不幸。他不断地呼喊，挣扎着，奋斗着，最后以82岁的高龄痛苦地死在红卫兵对“淫虫”的批判声中。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张竞生是一个奇人、怪人、狂人，有些人认为他只是孜孜于性的“性博士”，其实，他是一个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只是主要以性作为突破口而已。性学方面许多重要思想都是由他提出的。诸如：性是自然的、合理的；男女平等，也应该表现在性上；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也提倡性交自由；可以有“情人制”、“试婚制”；两性关系应以爱情为基础，而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女子应该从贞操观、处女膜和“从一而终”中解放出来等等。他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进步意义。

性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将愈来愈深地被人们所理解，可是在很长时期内





这还是个禁区。在 20 世纪的中国，张竞生是第一个端起长矛向这个禁区突破的勇士。先驱者往往是牺牲的，因为他不容于世，是“邪端异说”。张竞生也倒下了，但是他留给后人以宝贵的思想财富，这不仅在于他的一些性学观点，而且在于他不灭的理想主义的光芒。

张竞生是有缺点的。他太激进，太孤军深入，如果多一些灵活性，多一些藏拙和含蓄，也许能少经受一些打击，多实现一些理想。可是，人们又怎能以此苛求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呢！

张竞生经受了两种打击，一是传统的保守势力，一是借性学之名行淫秽之实的书商，而后者的打击是致命的。在性学繁荣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性学仍要警惕这“假冒伪劣”式的破坏。

我国的老教育家杜国庠先生感叹地说过：“中国不是张竞生太多，而是太少。可恨时势没有给他造英雄！”





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性

当革命运动波涛汹涌时，其中革命的文学运动也构成了这个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现代文学革命运动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也包括“五四”前几年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有许多目标、许多内容，它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反映社会现实，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例如茅盾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并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郑振铎等人则主张“文艺的对象，应该是被侮辱与被践踏者的血和泪”。文学作品既然要反映现实，反映人生，反映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血和泪，那就不可能不接触性，因为性是人性、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性被压制、被扭曲的一个重要方面。20 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性文学家、性艺术家，但是可以说，一切有造诣的、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生活现实的作家，都不能对人的性的问题视而不见，在作品中





浴后

都要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反映、描述这一生活的重要课题。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形式上是以提倡白话文开始的。这是因为，文言文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是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要摧毁封建思想、封建文学



以致封建统治，首先必须摧毁它的重要的工具，而摧毁这个工具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白话文。

在“五四”前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充满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此后如郭沫若的一些诗歌，叶绍钧的一些小说，也都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茅盾、丁玲、张天翼、叶紫、萧红、沙汀、艾芜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夏衍的戏剧，殷夫、艾青、柯仲平、田间的诗歌，以及许多救亡小说、戏剧和诗歌，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反帝与反封建意识。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1921年12月写成的《阿Q正传》，更借一个流浪的雇农阿Q，来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病态，并“暴露国民的弱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阿Q正传》中，就明显地有性心理、性行为的描述了。例如，作者在描写了阿Q摸了小尼姑的头加以调戏





以后的心理变化以及向吴妈“求爱”：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零零，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

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然而这一次的胜利，却又使他有些异样。他飘飘然的飞了大半天，飘进土谷祠，照例应该躺下便打鼾。谁知道这一晚，他很不易合眼，他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的脸上磨得滑腻了？……

“断子绝孙的阿Q！”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





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教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尚动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们不能知道这晚上阿Q在什么时候才打鼾。但大约他从此总觉得指头有些滑腻，所以他从此总有些飘飘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经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他的





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便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

“女……”阿Q想。

他对于以为“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时当留心看，然而伊并不对他笑。他对于和他讲话的女人，也时当留心听，然而伊又并不提起关于什么勾当的话来。哦，这也是女人可恶之一节：伊们全都要装“假正经”的。





这一天，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吃过晚饭，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倘在别家，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也偶然有些例外：其一，是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我和你睡觉，我和你睡觉！”阿Q忽然





抢上去，对伊跪下了。一霎时很寂然。

“阿呀！”吴妈楞了一下，突然发抖，大



湖亭美女



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要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这……”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门，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王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

《阿Q正传》流传甚广，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从性学的角度去看待鲁迅以上这一段不短的描述。鲁迅实际上是从性的本能、原始的性冲动来刻画阿Q这类人物的性愚昧。

在这个时期，不少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揭露与鞭挞封建地主与官僚买办阶级的丑恶、虚伪与黑暗。例如巴金的《家》、《春》、《秋》所刻画的那个冯乐山，满嘴仁义道德，道貌岸然，却逼那年龄不比他孙女大的丫环鸣凤为妾，最后把鸣凤逼死。曹禺《雷雨》则描





述了某煤矿公司董事长周朴园这个封建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种种罪恶包括乱伦的悲剧。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里的长太爷、《笑》里的九太爷、《万仞约》里的闵贵林等，都是压迫、榨取农民血汗甚至强奸农民妻子的一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这些作品都体现了经济剥削与性剥削是并存于剥削阶级社会里。

在“五四”时代，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反抗旧礼教，主要体现在争取婚姻自由，所以在初期新文学创作中，以男女恋爱关系为题材的几乎占了绝大多数，有许多作品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这种对个人恋爱和性的追求和赞美并不一定很健康，但从反对封建礼教方面来看，也有其积极的意义。

例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充满了“五四”以来的新女性要求解放的精神。小说中的主角“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和灰色的求爱者……莎





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小说描写了莎菲是怎样迷于一个男人的仪表，一见钟情的：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到。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是在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就够了。今天我看了这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我看出那衬在他面前的云霖显得多么委琐，多么呆拙，……我真要可怜云霖，假使 he 知道了他在这个人前所衬出的不幸时，他将怎样伤心他那些所有的粗丑的眼神、举止。我更不知当毓芳拿着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时，是会起一种什么情感！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如同，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是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





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小说又描写了莎菲十分鄙视这个男子的人品：

我到底又为了什么呢，这真好难说！自然我是未曾有过一刻私自承认我是爱恋上那高个儿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虽说他那颇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诱惑许多爱美的女子，并以他那娇贵的态度倾倒那些还有情爱的。但我岂肯为了这些无意识的引诱而迷恋到一个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谈话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





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满于他父亲未曾给他过多的钱以外，便什么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会做梦的睡觉；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让他有时也会厌烦起游艺园，戏场，电影院，公园来……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这亲密自然是还值不了在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岂不是把我献给他任他来玩弄我来比拟到卖笑的姊妹中去！然而这又都只能把责备来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难受的，因为假设只要我自己肯，肯把严厉的拒绝放到我眸子中去，





我敢相信他不会那样大胆，并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会那样大胆，是由于他还未曾有过那恋爱的火焰燃炽，……唉！我应该怎样来诅咒我自己了！

可是，她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迷恋与性冲动，这的确是当时一些追求个性解放的性心理矛盾：

一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目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唉！我竟爱他了，我要他给我一个好好的死就够了……





在这个时期，有些文学作品中的性内容比较突出与暴露，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的风》，还有叶灵风、施蛰存等人的一些作品等等。

在当时，郁达夫是个很出名，但又颇有争议的人，郁达夫具有传统文人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特点：嫉恶如仇，爱发牢骚，酗酒，写旧体诗，狎妓，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对山水充满仁爱之心，当然还有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他把自慰、窥淫、恋物这些性心理和性行为都引入小说这一启蒙者视为神圣的领地，而且把嫖妓堂而皇之地作为主人公的日常生活。许多人都反对郁达夫。

但是，不论人们怎样攻击郁达夫，都无法否认他的先锋意义，这就是由他的小说、日记、旧体诗词乃至游记所构成的独特的自我话语体系。不满于祖国的衰弱、社会的黑暗从而感伤颓废，是郁达夫小说的一个主调，他写出了许多自叙式的作品，描写个人悲苦的经历、性的苦闷、变态的性心理，描写妓女、肉欲和色情，如《沉沦》、《茑萝行》、《茫茫夜》、《过去》、《迷羊》等等。与其他



“五四”新文学作家不同，郁达夫不仅描写了自我，而且揭示了中国文学传统乃至“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某些隐蔽的、被压抑、被忽视或是被歪曲的东西。



冷艳



汪静之在诗歌《蕙的风》中也大胆、坦率地描写青年恋爱心理。这些作品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又引起了许多非议。在如何评价这些作品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观点对怎样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有所启示。

郁达夫曾在《文艺与道德》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

至于诗、小说、剧本里的肉体上的描写，以及犯罪，性事描写等要指其为不道德之先，我们还须看作者的主意如何而否定。有些事实，平常每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事实却依然存在在那里，作者为忠于写实起见，当然画人不能只画一个头来了事。在这些地方，批评家的话就很难说，但有眼光的批评家，则对于作家的根本主意之所在，自然能一目了然的。

周作人则评论《沉沦》说：

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计划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存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





.....

他在强调了“《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之后，又写道：

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

对于诗，周作人则认为“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他为《蕙的风》辩护说：

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褻；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简单的举一个例，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私情的俗歌是情诗，而咏“金莲”的词曲是淫诗。在艺术上，同是情诗也可以分出优劣，





在别一方面淫诗中也未尝没有以技工胜者，这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不想把他邀到艺术之宫里去……《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

这些评论，也涉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性内容。当时，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已传入中国，但被视为淫书。林语堂在引了其中的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性描写之后说：

这种文字，可谓淫辞了。但是我已说过淫字别有意义，用在劳伦斯总觉不大相宜。这其间的不同，只在毫发之差。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可羞惭，是成年人人人所常举行的。羞耻才是罪恶。

郁达夫在《读劳伦斯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爱人〉》一文中谈到了其中的性描写，评论说：

……描写性交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





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理描写，能够连结得起来。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我们试把中国的《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出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查泰来夫人的爱人》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性交，都觉得是自然得很。

朱生豪是中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他将莎士比亚剧作中一些与性有关的双关语都删掉了。梁实秋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他曾以毕生精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并改变了朱生豪的做法，将莎士比亚剧作中这方面的文字全部保存，并如实翻译出来。他在《莎士比亚与性》一文中对自己的这种做法作了说明：

莎氏剧中淫秽之词，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尤其是所谓双关语。朱生豪先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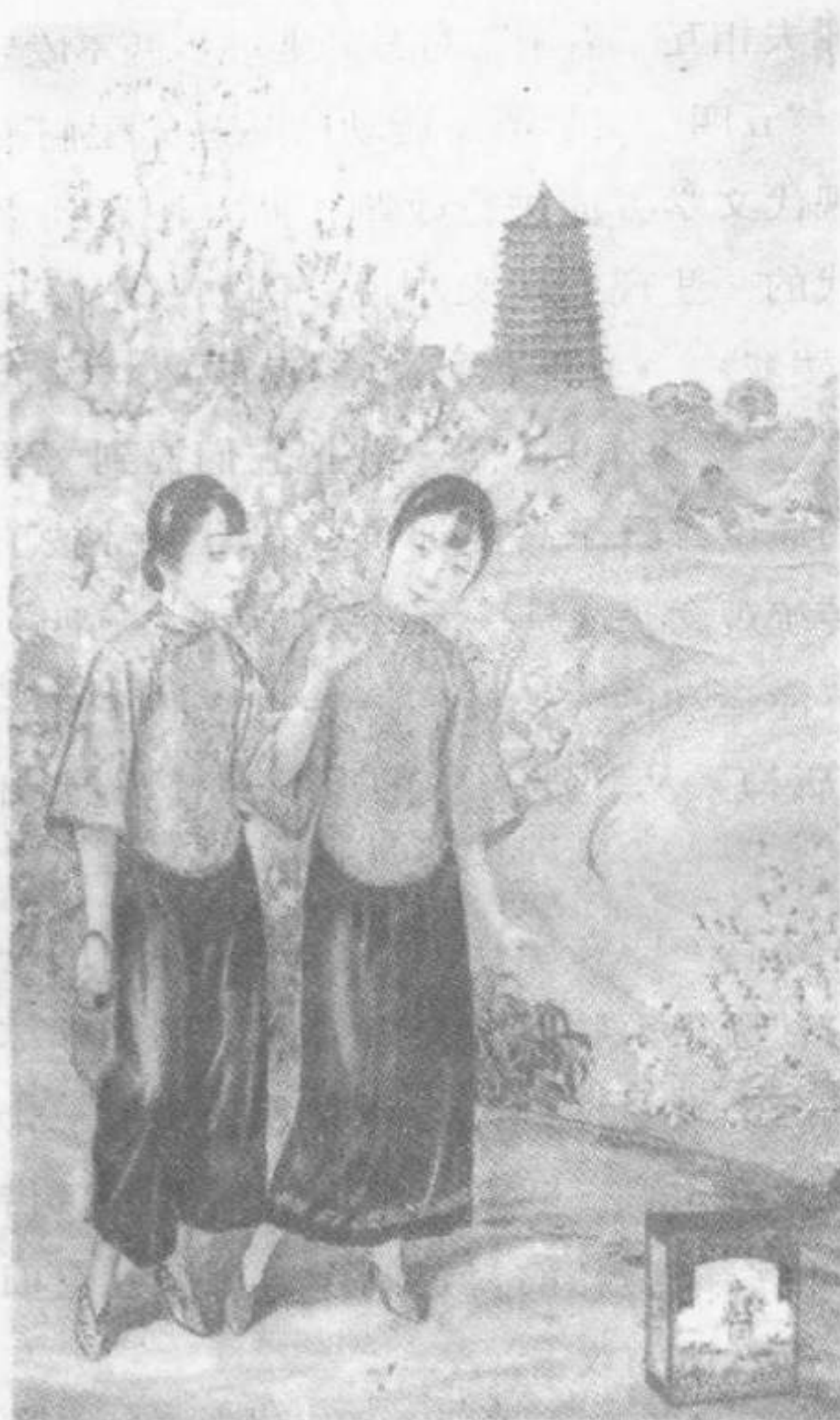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全集》把这些部分几完全删去。他所删的部分，连同其他较为费解的所在，据我约略估计，每剧在二百行以上，我觉得很可惜。我认为莎氏原作猥亵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在另一方面亦无需加以渲染，大惊小怪。

毫无疑问，梁实秋所抱的这种态度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在“五四”时期还有一种乡土文学，它以中国广袤的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和当时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歌颂他们的勤劳、质朴，惋惜于他们的愚昧、落后，鞭挞对他们的剥削、压迫，这些文学作品富有浓郁的泥土气息，为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其中有不少内容也与性有关，例如沈从文的湘西乡土文学，描写湖南沅江上下游的船夫在中游相遇，互相调侃对方说：“我睡了你的老婆！”然后哈哈大笑。这种话，有时是开玩笑，性常常是聊天、开玩笑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实际情况：因为水运落后，上下游运货往返一趟须经年累月，不得不把老婆





花前双美

留在家中。年轻力壮的船夫耐不住长期的性饥渴，就以别人的老婆来解决，家居上下游



的船夫相互“借用”对方的老婆，两不吃亏。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些先驱们不仅在现代文学方面进行改革，而且注意到中国古代的一些现实主义小说，例如《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并把它们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有力地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这是一大历史功劳。“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把《红楼梦》和《金瓶梅》从“淫书”的斥骂声中解放出来了。

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对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人物和历史人物赋予新的含义。例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就是用历史上三个著名的女性——王昭君、卓文君、聂荈，借以反抗因袭的腐朽的封建制度，对旧社会旧道德予以无情的攻击。

在《水浒传》中，潘金莲是个著名的人物，书中描写她淫荡、狠毒、泼辣，正是所谓“天下最毒妇人心”。《水浒传》是一部男权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作品，所谓“三大淫妇”（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实际上是





知识分子家庭

“万恶淫为首”这种男权意识的载体。《水浒传》又体现了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英雄都



是灭绝情欲、对女人毫无兴趣的；女人都是淫荡下流的。读了《水浒传》，人们常会惊讶：书中怎么会有那么多坏女人，不论是市井老妇人（王婆、阎婆、东平府妓院的老虔婆），还是年轻的媳妇（除“三大淫妇”外，还有卢俊义之妻贾氏、白秀英、刘知寨的婆娘等），个个都是那么恶毒。“红颜祸水”，凡是和女人沾过边的男人几乎没有不倒霉的。

可是，以上这种性观念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变化，一些进步的文学家开始为潘金莲翻案了，1927年欧阳予倩发表了剧本《潘金莲》（一名《武松与潘金莲》），评剧、话剧都上演过。在这个剧本里，潘金莲是一个颇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当初她拒绝张大户（她的主人）的性骚扰，不甘心被玩弄、被蹂躏，表现了一个女人对于人格尊严的强烈渴求。而她得到的惩罚是：将她配给一个丑八怪武大郎。男权社会对于一个女人的尊严和人格的践踏，可以说达到相当残酷的程度。她后来遇到年貌相当的武松，对他产生爱恋之情，最后武松杀嫂的一幕，潘金莲面对武松寒光森森的利刃有大段精彩的自白：“二郎！你拿





性命来和我拼，我拿性命来和你讲话，还有什么假的吗？”她坦然表白了对武松的深挚的爱，问：“二郎！你要我的头，还是要我的心？”武松答：“要心！”他要取出潘金莲的心肝来，祭奠亡兄武大。潘金莲说：“二郎！你要我的心么？我的心早就给了你了！”她解开领扣，露出一截雪白的胸脯，说：“这里有一颗滚烫的、灼热的心，你拿去吧！”大有为爱而死，纵然死在爱人的刀下也心甘情愿的样子。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的形象，她与“五四”以来人性复苏、冲决封建罗网、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时代潮流息息相通。

对于古典小说，特别是古典性小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观点。茅盾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他如下评述古代的性小说：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明显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

一是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





年轻时的女作家白薇

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



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子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妖言，一半固在炫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半世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俗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入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





的性欲小说，其原因亦不外乎：

（一）禁欲主义的反动。

（二）性教育的不发达。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茅盾以上这番论述无疑地是“左”了一些，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性小说，认为“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是太偏颇了。对于古代性小说，也应该像对待一切文化遗产一样，作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五四”文学当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对之采取这个态度。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二章

民国新女性与妇女问题



风

化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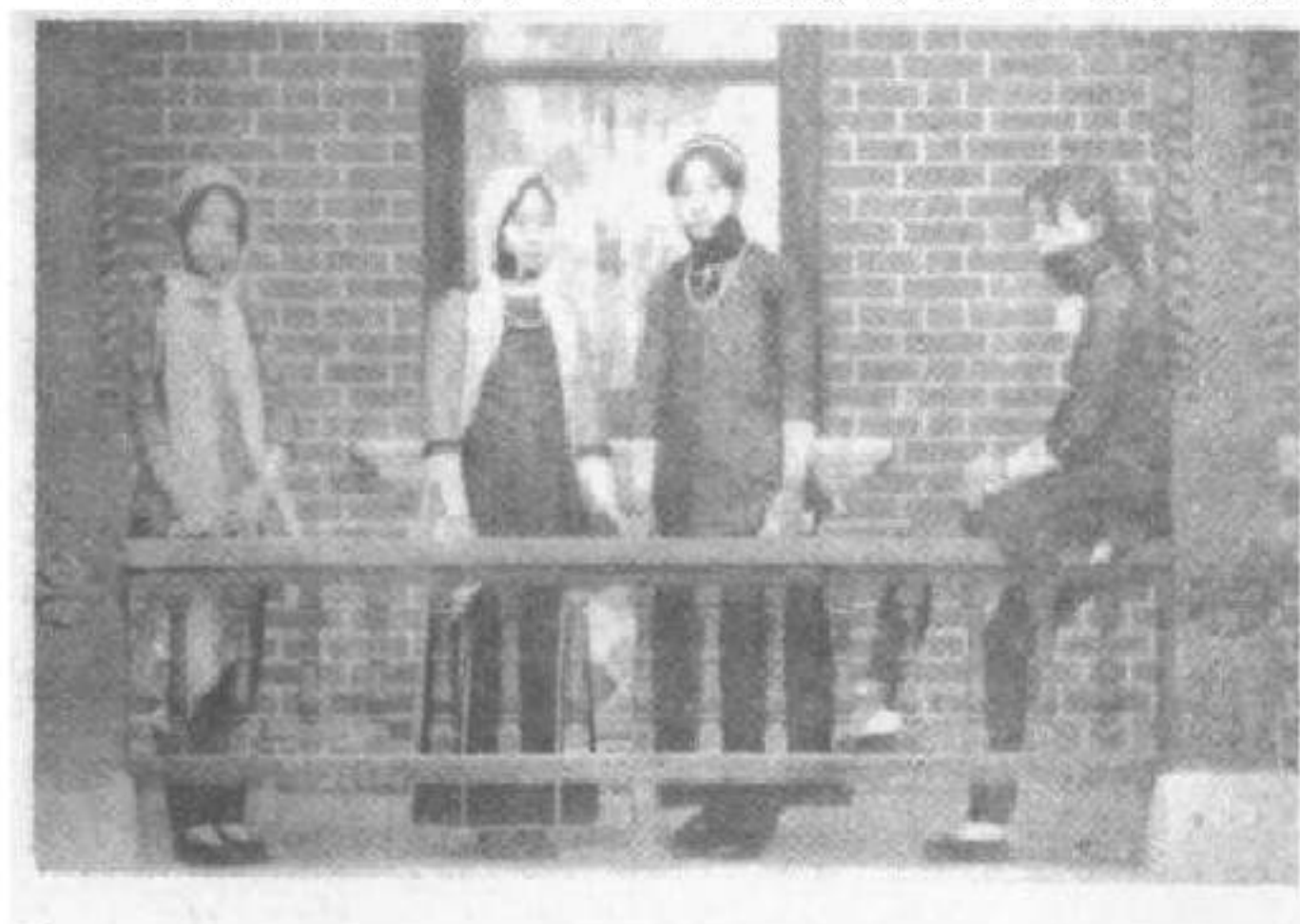
史

2



一、民国新女性

在中国社会最底层里生活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妇女。她们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之下，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



民初年轻女子着时装照



选择职业的机会，只能在屈辱和挣扎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一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之后，她们的这种悲惨的境况才稍有改观。

进入民国以后，妇女生活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善。尽管，民国社会的妇女生活中依然有着很多旧时的遗留物，但是，二者毕竟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在中国古代，妇女往往是把做贤妻良母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的。这样一来，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都被服侍好丈夫，教育好儿女所占领了。这种情形，当然与近代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于是，在社会客观要求的作用下，妇女走出家门，求取职业，成为她们摆脱苦海、走向新生的一大追求。

落后的近代中国其产业工人的总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据统计，1933年，全国的工人总数为717万人，仅占总人口44450万人的1.61%。但是，其中的女工，倒是占了一定的比例。有统计资料显示，1933年上海的金属机器工业中，女工占了4.4%；建筑材料工业中，女工占了3.5%；化学工业中，女工占了49.2%；食品





民初缠足女子

工业中，女工占了42.7%；纺织工业中，女工占了60.9%；其他行业中，女工占了27.7%。各行各业平均起来，女工将近要占到全上海工人总数的一半（48.7%）。这种情况充分显现，在上海这个近代大都市中，妇女已经有相当强烈的求职欲望了。



当然，上海是一个特例。除此以外，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不可能有这么多妇女在为谋求工作而奔波忙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城市，广大的妇女继续维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浙江杭州，妇女除充当喜娘、佣工、洗衣妇、乳娘外，还从事着缫丝、缝袜底、糊火柴匣、做女成衣、织袜、纺纱、拣茶叶等项工作。在广东潮州，妇女们先以织苧麻作为生活之资；后来，因潮州富户都集资创设纺织厂，广大妇女便纷纷奔向工厂。

至于在广大的农村，除了极少一部敢于闯荡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的妇女，则依然固着于土地上，过着耕织的生活。在山东惠民，妇女主要从事纺织劳动。除了农忙之外，她们的机杼总在不停的运转。在贵阳，广大的妇女，要做煮饭、烧茶、带小孩、喂猪等家务；要帮助丈夫种植好农作物；有时，还要赶会赶集，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或以此换取城市商贾的布疋、油、盐等物品。她们就这样过着比较传统的生活。

城市中的女工、佣妇，以及乡村中亦耕





1935 年时的女画家郁风

亦织的妇女，基本上是为了生计而在忙碌的。她们的就职，有一种被动的、无奈的倾向。与此相比，在上海等大都市中出现的职业妇女，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求职。

民国初年上海的职业妇女大约已经出现



了，到 30、40 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妇女阶层。当时，众多的职业妇女，大致可以分为公职妇女、一般职业妇女和自由职业妇女三类。

公职妇女，主要指担任政府部门、各文化、企业、教育等领域要职的女性。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在本专业领域中有出色的成就，又有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名望较高，是妇女中的佼佼者。她们中，有担任过区长之职的邱希圣，有身兼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新夜报》社社长、国民出版社总经理、诚明文学院教授等多种职务的金振玉，有曾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的郑毓秀，有曾获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的钱剑秋，还有惨死于日本宪兵手下的上海市参议员陆惠民和上海妇女工作促进会理事长陈韶型等。

一般职业妇女，分布在上海的各行各业，数量甚多。有的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13 年春，俞殖权在上海四马路东首创办了女子兴业公司，其宗旨是要维持国货、提倡女子实业，专售国货丝绸布匹，以及各种家庭日用器物。这家完全由女子经营的公司的开张，





民初上海青年女子着时装照，高衣领、半臂袖、短衣。

开了上海妇女从事商业之先河，开辟了广大妇女就业的道路。

1916年7月，上海市爱国女校组织了一



支女子篮球队去扬州参加江苏省体育运动会的篮球表演。由于这次表演是我国女子篮球首次在国内大型体育运动会上出现，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兴趣。上海也由此较为热烈地开展起了女子体育运动。1924年，上海市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在上海创建。它是国内第一支女子足球队；1936年，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组成两江女子划船队，参加上海市划船总会举办的青阳港划船比赛，获得冠军；1934年，钱璇考取上海裁判会篮球裁判员，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取得篮球裁判员资格的女子。以上都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的择业范围在不断地扩大。

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出于治安上的考虑，特设女检查员，协同男警共同执行检查任务。这一举措，十分有效，因而内政部于1931年首先指令首都警察厅试办女警，设班训练，分配服务。其后，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推行女子警察的提案，男警一统的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在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人，集中在文化艺术界、新闻





30年代的女友。这张照片中的人物的发型、化妆和穿着，甚至倚靠的姿态看似随意，实则刻意考究，十分优雅。

出版界、电影戏曲界，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画家吴青霞、周鍊霞，舞蹈家戴爱莲、王渊，越剧名



角筱丹桂、尹桂芬、徐玉兰、袁雪芬，京剧名伶言慧珠、童芷苓、孟小冬，影星胡蝶、贾景琳、阮玲玉、玉莹、舒绣文、陈波儿，歌星白云、张伊雯，以及最早的电影女编剧濮舜卿，最早的电影女导演谢采真等。她们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创造，不仅充分展示了妇女的才能，而且以事实证明，女性同男性一样，完全可以胜任各项工作。

上海社会上妇女求职的情形，就全国范围而言，也是相当突出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在北京等大城市，有的妇女已不满足于向别人求取职务，而是自己要办公

1919年7月，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一座庙里，一家名为森仁医院的妇幼医院开张了。杨步伟、李韵娴两位女性共同创办了这家医院，并担任正副院长。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由女性开办私人医院的先例，因而一开张便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不少男人听说医院是两位年轻小姐开的，便没病找病、想方设法钻到医院里，一睹女医生的风采。因此，来医院求诊者络绎不绝。





民国时期，妇女对于职业的态度和求职的热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妇女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开始改变了。这种改变，无论对于妇女，还是社会的进步来说，都是很可取的。但是，妇女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就职方面并不是其唯一体现，它也反映在妇女接受了多少教育上。



30年代一个中国家庭中祖孙两代的合影，中西合璧，古今对照，反映时代的交汇和变迁。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条封建准则对女性的戕害，绝不亚于其他约束妇女的条条框框。因而，在中国最初提倡女权运动之时，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兴女学和让妇女接受

学校教育。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

最初的女子教育，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的教育。这种教育，对于传统的妇女生活，不可能有很大的冲击，因而充其量只能看作是妇女从得不到教育到开始接受教育的一种过渡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就职要求的提高，妇女仅受家政、育儿教育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为妇女提供专门训练的学校的建立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1904年，史量才以“注重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等实验，并改良旧法，兼授普及专门学理，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在上海桂墅里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国人自办女子职业学校之风气。自此以后，仅上海一地，就先后成立了中西医学堂、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上海红十字会高级护士学校等职业学校，为一些行业培养了不少有用之材。1912年，浙江湖州籍民族工商业家凌祖寿在上海南市区方斜路三多里独资创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以振兴女子教育，培养女学教师。学校以“庄敬”为校训，以“同是圆颅方趾，知识完全，道德完全，蛾眉岂让人先”为校歌，敦促女子自强、自立。它最初开设预科、本科、文学专修科及数理化专修科各一班，不久又添设唱歌、体操专修科一班，确是造就了一批人才。1915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师范学校，附设在上海女青年会内。该校通过严格的教育，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女子体育人才。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张汇兰就是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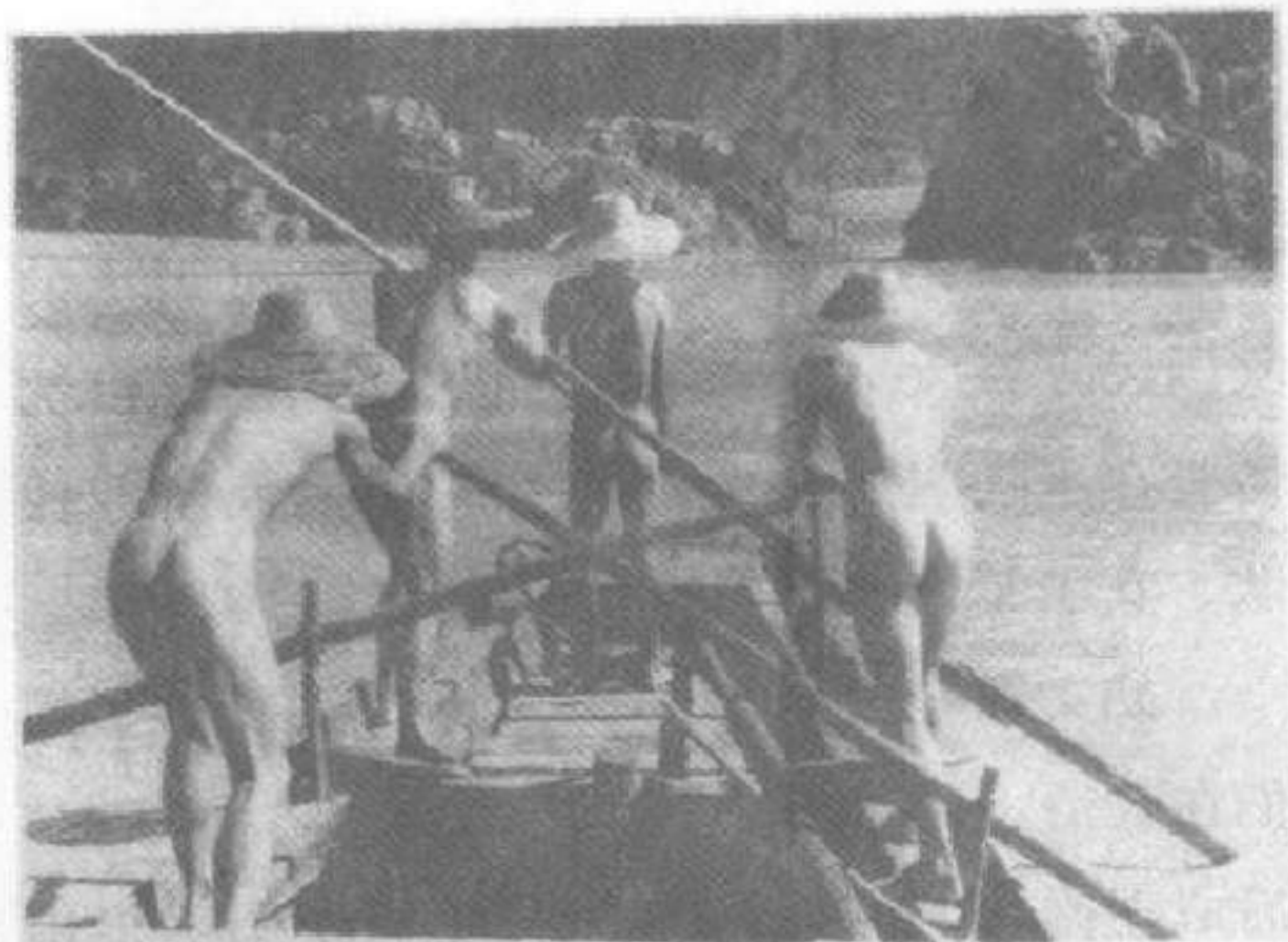
第一位留美取得体育博士的女性。

民国时期，不少的妇女除出于就职的考虑进入职业学校读书外，还接受了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在中国，妇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要比她们接受初等、中等教育的时间来得晚，而且范围也相对狭小得多。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假如教会学校的女生不算在内，1922年度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仅有665人。这些女生，分布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女子高师、南京东南大学、天津河北大学、上海南方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30多所国立、省立、私立的院校中，所学的课程与男生所学的几乎一样。

妇女教育权利的获得，对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职业的取得，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而，它可以视为妇女走向近代生活的一种表证。但是，她们走向近代生活的过程是很缓慢的，而且各地还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这一点，同妇女在职业选择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妇女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取得的职业很大





长江上赤身裸体的纤夫

程度上改变了近代妇女的生活。同时，当她们在取得了足够的教育权、就职权后，她们就必然要把谋得政治上的权利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的更高的要求。

武昌起义刚爆发不久，吴淑卿就上书黎元洪，表示愿意从军效力，以补军力之不足。起初，黎元洪以女子在军队中难以安排为由，婉言拒绝。后在吴淑卿竭力辩解之下，下令另招女军一队，队长就是吴淑卿。文告一出，前去参加者有数百人之众。



当时，纯由妇女组成的队伍，还有许多。据记载，影响较大的尚有以秋谨的学生尹锐志为首组成的浙江女子军，由辛素贞组织的女国民军及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由沈警音在上海募集的女子军团，以及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

妇女在辛亥革命中小试锋芒，显示了她们在政治上的才干。因而，当辛亥革命胜利后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之时，她们便明确提出来了要参政的要求。为了达到男女平等，共同参政的目的，她们组织了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共和会、女子后援会、男女平权维持会、女国民会等团体。

1912年3月11日，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参议院正式公布。由于该法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一般女权运动者非常气愤。19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等上书孙中山，严责约法上未规定男女平等的不是，要求总统依据规定提议修正。由于她们的要求没有达到，当天她们就和参议院议员发生了剧烈的争执。第二天，她们纠集了许多女子，闯入参议院，



不仅打碎了议院的玻璃窗，而且打倒了守护的卫兵。后经孙中山的调停，渐渐平息了这场混乱。

与唐群英等激烈的一派不同，当时还有缓进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为女界共和协进会，以伍廷芳夫人、张静江夫人等为领袖，主张首先创办女子法政学校及发刊女子共和日报为参政的预备，等到政治知识及资格完全具备之后，再实行参政。



1937年。长江三峡的纤夫牵着绳索在江边岩石上伏行，显示着力与美的结合。

无论是激烈派还是缓进派，其政治实力都很弱。因而，在热闹过一阵后，民初的女子参政运动便沉寂下去了。五四以后，中国

的政治局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于是女子参政又起高潮。1922年暑假，北京中国大学学生万璞及法政专门学生周桓、石淑卿等，联络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共同发起女子参政运动。她们成立女子参政协进会、女权运动同盟会，高高举起“要求女子的参政权”的旗帜。她们的这种追求，也曾吸引不少追随者，并取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从全国范围看，这毕竟有点曲高和寡的意味。所以，它也像以前的参政运动一样，在历史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爱国女校



尽管女子参政运动屡遭败绩，妇女的政治欲求很难达到，但是妇女们对政治的热情并没有丧失。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们挺身而出，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热潮中。

1936年夏，在抗战尚未全面爆发之时，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就相继成立了各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促成了中国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七七事变以后，广大女工、农妇、村姑、女知识分子、女教员、家庭妇女等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女性，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反侵略、救危亡的行列中。这些妇女，或做好宣传鼓动，或参与救济难民，或上战场慰问抗战将士，或从事战地服务。她们爱国的热忱和行动，使妇女已经成为新生活的主人这一点得到充分显示。

民国时期妇女生活的状况，可从她们的职业、教育和对政治的态度等方面概见。然而，更为具体、真切的，恐怕只有从她们的婚姻生活中才能窥见。

民国时期，由于思想观念的改变，不少的妇女已不再恪守旧有的传统做法了，因而





自主婚姻，女性提出的离婚，出于真情的再嫁等等都出现了。这种对旧的婚姻观念的反叛，使不少女性免受了她们先辈所受的苦难。不过，这种反叛并不彻底，因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气候对女性依然有着很严格的约束，人们对离婚、再嫁的女性依然抱着传统的偏见。当时，寡妇改嫁的习俗虽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但很不普遍，因而依然在民间流行着“一女不吃二家饭”、“烈女不嫁二夫”的旧俗。同时，社会把不改嫁的寡妇作为风世的典范加以褒扬。1918年，17岁的女青年陈宛珍因未婚夫王菁士病死而服药自杀。临终前，她凄楚地对父母表示：“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殆或相从地下。”由于陈宛珍殉夫之举很“壮烈”，上海县知事得悉后，立即呈文江苏省长请予褒扬：“吴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对于寡妇再嫁抱着极端歧视的态度。在泉州，寡妇再嫁的结婚排场，都没有初次结婚时那么大。而且，她们坐的是黑轿而不是花轿；上轿的





地方，既不能是娘家又不许是原夫家，而是在路上或媒婆家里。在上轿前和到夫家后，再嫁妇要做不少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以求得以后生活的安定。

至于自由择夫，也为很多因循守旧者不容。海伦·斯诺在《中国新女性》中曾记录过这样一段真实的事：湖南临湘妇女会主席王淑春“自选那里的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为未婚夫，而使城镇大为震惊。……士兵们向她大骂了许多难听的话，然后，他们剁掉她的手臂；他们把她剁成了许多块。不久之后。他们向未剁掉的部分开了 17 枪……以显示他们对她的仇恨”。

1931 年，末代皇帝溥仪的妃子文绣因不堪忍受逊帝、逊后的虐待和牢笼般的生活，断然运用中华民国的法律，宣布与溥仪离婚。之后，她返回北平，过起了平民的生活。然而，没过多久，平静生活就被打破了。她到北平后，每天在家闭门静居，读书习字。后来，经亲属介绍，化名傅玉芳到一所私立小学任教。谁知工作了一年多，便被迫辞职。原来，有人得知傅玉芳就是离了婚的皇妃文





绣，就做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校门上。此后，每到上下班时间，总有许多人守在校门口争睹“皇妃”风采。不久，报纸上披露了此事，于是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有的还与文绣搭讪，有几个小流氓甚至天天跟踪她。文绣极为气愤，便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并搬了家打算重新过隐居的贵妇生活。不过，当时像她这样年轻美貌又有名声的女子很难过上真正的隐居生活。

一次，有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的局长派人去向文绣求亲。这位“局座”性情粗野，一贯仗势欺人，而且他已有老婆，只是带着要“尝尝皇妃的味道”之心娶文绣。文绣当即断然表示：我现在不做皇上的妃子，难道来当你那局长的小老婆？！尽管文绣以后与刘振东结了婚，生活尚算美满，但她在离婚后较长一段时间里的处境就已充分说明，当时离婚女人的生活是何等艰难！

民国时期，妇女在婚姻生活方面的困境，比她们在就职、接受教育，以及争取选举权方面遇到的麻烦要大得多。因而，当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之时，并不会





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抱有多大的期望。

二、民国初年的妇女运动

在民国以前数年，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对欧美文化的了解加深，相应的对女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地位也酿成了改革运动。正是为了呼吁妇女解放，康有为率先发起成立了一个叫做“不缠足会”的组织，他的弟子梁启超立刻响应，高唱“缠足亡国论”，把缠足与否提到关系到国家存亡这一高度去认识。又大声疾呼说：“天下所以积弱到如此地步，其原因乃是从妇人不学开始。”他在自己所著的《变法通义》一书中首先倡导：“中国人应该着手振兴自己的女子教育”，“妇女要开创经济上的自立之路，才能最终摆脱奴隶的地位。如果大家承认对幼儿的教育是母亲在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对女子的教育是何等重要不是也很清楚的吗？所以，女子教育的好坏实为国家强弱的基础。”这些激烈观点，给予了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以极大的震动。光绪二十七年，康广仁办起了女子学校，谭复生





的妻子李闰也在这时组织“中国女学会”并展开了活动。义和团事件以后，朝廷迫不得已顺应潮流，作出了一点革新的姿态，这一点已如前述。因此当时出版了许多宣传革命的书籍。

这些书中，关于民间妇女革新运动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一的《女界钟》提出的种种主张，给时人以强烈的震撼。在《女界钟》中，作者倡导男女人格上的平等，女性目前应该迅速摆脱其隶属地位；又将妇女所处的地位说成是“自古以来都是畸形的，究其原因是没有让她们享有受教育、读书、社交和正当娱乐的机会和权利。缠足不可取姑且不论，化妆的装饰品布满全身，结发空费时间（宜断发），虚有其外表，实际却是愚昧透顶。正是因为这些打扮将女性外部拘束起来，在生活上又完全与外界隔绝，她们怎会不愚昧无知呢？女子教育即便是从人格教育的向上、社会的改革、健全育儿的立场上来考虑也是完全必要的。既然女性也应有入学、交友（包括男性）、财产所有、出入自由、结婚自由的权利，那么，当然也就应该认可一







民国缠足女子

夫一妻制的确立和妇女参政权。”


关于参政权问题，在当时即便一些有识的男子也未认识到，尽管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这种思想的倡导，有助于活跃当时的思想



界。与之同时，相反方面的却是保守、反动的思想不但不退让，反而积极采取对策。虽说女子教育连政府都认可，并专门设置了管理的官员，设立新的学部，创办女子学校，并将其纳入管理范围，政府关于女子学校的教育方针、在光绪二十三年制定的“女子师范教育章程”共 36 条中详细地反映了出来，但其修身教科书却仍规定应以《列女传》以及自古以来的女子教训书作为精华。和政府的保守政策相呼应的民间解放论反对者，对金一等的提倡也持有异议，陈曾寿的《方言学堂伦理讲义》中首先开始痛骂女权提倡者；额振寰的《劝女学集证》和《女学四五言合编》、益森公司的《女子家庭模范》等书也紧步后尘，虽然他们在书中反对缠足，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总体上说占支配地位的还是旧思想意识。



金一的《女界钟》曾提出过为提高女性的觉悟，让女性留学海外是非常必要的。光绪二十七年，国家派出了三名官费女留学生；同时，在民间，女子参加留学行列的也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地理和经济上的原因，她们





瓷塑：缠足的改良脚

大多数选择了留学日本，留学时间一般不长就回国来，立刻投身革命运动。这当中有许多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不幸牺牲，例如秋瑾、周福贞、毛芷香、刘惠芳等人。由于革命运



动的蓬勃发展，宣统三年阴历8月19日，在武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清朝政府土崩瓦解了。其后3年，虽然革命政府业已成立，但因革命军军力不足，原来为秋瑾创建的学生军，尹志锐率领的浙江女子军，辛素贞等的女子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沈警音的女子军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张竹君率领的上海十字会等组织也纷纷加入到革命军中来，立下了汗马功劳。

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女子军队虽然解散了，但这一系列女子参加的革命斗争，竟然发展成了女子参政运动。女子北伐队改名为神州女子参政同盟，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改成了女子同盟会。其他还有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男女平等维持会、女子共和会、女子国民会等好些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在这样的声势推动下，当南京参议院制定宪法时，发展到了唐群英等20名妇女打着应在宪法里规定男女平等的旗号请愿，向参议院提出必须在宪法里明确写进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文，并公开宣称，不答应要求决不罢休。3月19日，参议院不得不审议请愿案，





正式交付国全。但是她们的有些过激行动，被当作是对参议院的不满，比如她们发表过激的言论，强行闯入参议院并打倒了卫兵，酿成了大骚乱。而伍廷芳、张静江指导的女界共和协进会，则是采取温和作法，首先设立女子法政学校，然后再施行政治教育，最后才搞所谓参政运动。由于革命，建立了民国，在改革了教育制度后，设立了女子中学、女子学校等，但妇女解放也仅仅走到了这一步而已。当然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一步的影响，由于越来越多的女子学生受到了教育，民主主义思想在她们中间普及开来，最后终于彻底废除了像缠足这样有近千年历史的陈规陋习。

三、辛亥革命的妇女运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推翻清朝统治者的革命，这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这时起，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便真正展开，社会婚姻生活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千百年来，旧的政治、伦理说教和陋俗使妇女身心遭到了极大的摧



残。她们带着切身的伤痛和争取自由的热情，干出了许多永载史册的光辉业绩。



民国时期“淫妇”在地狱受苦图，宣扬女子守节的观念。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在思想上提倡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以也很自然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就提出了国人应该一律平等，他说：

“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

邹容则进一步主张：



“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并以此为“革命独立之大义”。

著名的女同盟会会员秋瑾，曾与女同志们组织“共爱会”，后来又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这时，参加革命的妇女，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多出身于名门显宦。在当时国内旧的政权的高压下，她们的个性、尊严受到了无理的损伤，三从四德和包办婚姻把她们推向了屈辱的境地。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和旧政权的冲突，融合了本来对立阶级妇女的思想行为。所以像秋瑾、张竹君、徐宗汉、何香凝等妇女运动的代表人物出身都是富商或显贵。他们有着不同的阶级、家庭背景，但就本人成份而言，绝大多数是学生。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得更多的出身寒微的妇女也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如秋瑾的学生、著名的少年女革命党人尹竞志和尹维俊姐妹等。初期妇女活动，主要是办报，也有从事运送武器，图谋起义的。

1907年，秋瑾在绍兴组织光复军，并自任协领，图谋起义未成，被清政府逮捕后英





民国青年女子上衣下裙服装。

勇不屈，于轩亭口从容就义。也有直接参与研制炸弹，谋刺清廷要员的暗杀活动，1905年，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在同盟会内主持暗



杀部门，吴玉章、喻云纪等人都是其成员。1909年，尹竞志姐妹赴京图谋炸毙清朝权要。1910年，徐宗汉、宋铭黄、丁湘田等加入支那暗杀团，徐宗汉还参与谋杀广州将军凤山。1910年，陈璧君与其夫汪精卫刺杀重臣载澧。

武昌起义的胜利，更加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许多妇女纷纷从军。陈也月等人发起成立了女子北伐队，她们在宣言中宣称：

“枕戈待旦，健男儿既奏宏猷；市鞍从军，众姊妹宣申义愤。……从可知奋身不顾，小娘子无让须眉；乘盾为荣，大国民休轻脂粉。于是倾奩倒匣，大集军资；扫穴犁庭，共除虏虐。”

妇女要求和男子并肩战斗的英勇气概在宣言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特别是武昌吴淑卿所招募的女子军，当民军与清军激战之际，从背后予清军以重大打击；后又参加攻打南京之役。同时，各地妇女还成立了许多救护和募捐团体。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妇女团体在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也提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口号，以谋求妇女地位的改善。具体说来，妇





女的交友权和婚姻的自主权、受教育权和参政权，是她们所争取的目标，辛亥革命后，已经有女子中学的设立，据 1915 年统计，全国共有女生 180949 人，但这时尚无女子高校，北京大学在 1919 年秋才开始招女子旁听生。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发展成为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运动。“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得到传播，家庭婚姻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在中国婚姻史和妇女生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五四运动后的女权运动

辛亥革命成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约法时，女子参政会曾上书请愿，要求在约法上规定男女平等。当时代表是女子参政会同盟会会长唐群英等 20 人，那篇请愿文的原文是：

“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起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于宪法正



义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即请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以正式公文宣布，以为女子有参政权之证据。”



民国时期“淫妇”在地狱受苦图，宣扬女子贞节观

可是中华民国临时法约公布时，并未把男女平等列入条文。唐群英等又上书给孙中



山，孙中山允许提议增修。可不久，袁世凯篡权，这件事就没有下文了。

五四运动以后，女子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22年，北京中国大学的女生联合其它专门学校的女生，发起了第二次女子参政的运动。他们要求女子和男子一样，应该平等享有宪法上人民应享有的权利；依男女平等的原则，修正民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继承权等；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龄”和男子“纳妾以重婚罪论”的条文；制定保护女工法。当然当时并没有实际解决这些要求。

倡导早期女权运动的知识分子，有知识，对旧的婚姻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即有亲身体会，也能从理论上理解，阐述和批判。早期女权运动在革命运动初期，由于世事复杂，旧思想根深蒂固，所以其影响范围有限。

五、《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大讨论

陈独秀于1919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叫《青年杂志》。杂志从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



移至北京。《新青年》先后联系了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周作人、刘半农等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抨击反动派提倡的国粹。由于《新青年》提倡解放妇女，尊重人性，反对旧的贞节观念，否定传统婚姻道德对近代人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青年妇女俱乐部

《新青年》的前四号，对婚姻道德问题没有太多专论。在一卷五号中，陈独秀发表了题为《一九一六年》的论文。这篇文章开了对传统旧道德抨击的先声。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号召妇女不要甘心委身于人，受别人



支配和摆布，应该把自己也看作一个人。他说：

“……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泱泱沦肌之奇耻大辱”。

这篇文章无疑是《新青年》向旧婚姻道德、旧文化开战的宣战书。可是当时社会现实极其糟糕，帝制的风波才息，尊孔的云雾又起。国会议制宪法时，准备把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三号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的文章，二卷四号上又载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痛斥了现代生活不宜推行孔之道。他在后篇文章中谈到妇人寡居时说：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





“淫妇”在地狱受苦图

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轻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在《新青年》全盛时期对妇女问题和婚



姻道德问题讨论更多。陶孟和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了一篇“女子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妇女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礼教压抑了女子的才能，使女子无奋发策励的机会。又过了4个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一篇日本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贞操不是道德。这一新的声音俨然是一声霹雷，振聋发聩，与谢野晶子说：

“我对于贞操，不当它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

当时这篇译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2000年的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改变了人们的贞节观。胡适在五卷一号上发表一篇《贞操问题》，后又发表了《我之贞节观》，也是谈贞节问题的。十分开明地论说了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等问题。胡适的文章不是十分激烈的，而是用一种合乎情理的态度和论证促使人们接受。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烈妇殉夫问题时说：

“寡妇守节最正当的理由是夫妇间的爱情，妇人殉夫最正当的理由也是夫妇间的爱





情。爱情深了，生离尚且不能堪，何况死别？再加以宗教迷信，以为死后可以夫妇团圆，因此，有许多妇人，情愿杀身从夫于地下。这个不属于贞操问题。但我们以为无论如何，这也是个人恩爱问题，应由个人自由意志去决定。无论如何，法律总不该正式褒扬人自杀殉夫的举动。一来呢，殉夫既由于个人的恩爱，何须用法律来褒扬鼓励？二来呢，殉夫若由于死后团圆的迷信，更不该有法律的褒扬了；三来呢，若用法律来褒扬殉夫的烈妇，有一些好名的妇人，便要借此博一个‘青史留名’，是法律的褒扬，反发生一种沽名钓誉，作伪不诚的行为了！”

在五四运动以前，倡导妇女解放的还有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半农的《南归杂感》。这篇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五卷号上。文中借助和他夫人闲谈的口气，数说中国妇女的痛苦。

“世界上已苦的人类，就是这班中国女子。

“那一班穷苦人家的妇女，吃朝饮，愁晚饭，他的苦恼，我不忍说。

“那一班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短裤，穿丝





袜，天天上杨庆和老宝成办金饰，上大纶天成剪衣料，他们自以为极乐，其实比街头的老乞妇还苦……”。

这篇文章精彩地分析了妇女在生活 and 劳作中的痛苦心理。《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希望建立合乎人性的社会伦理秩序，因而强烈抨击旧的婚姻道德，在中国婚姻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六、新文化运动与女子贞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袁世凯很快就抢夺了革命的果实，有限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效亦消失殆尽。孙中山等人曾极力要求男女平等，倡导女界革命，但由于旧势力的阻挠和干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并未反映出男女平等的内容。而袁世凯篡权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骤然掀起一股复辟的逆流，已经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贞节铁幕再次合围。

1914年3月11日，热心于复辟的袁世凯





颁布了《褒扬条例》，沿袭了明清时期旌表贞节的内容，将贞节铁幕又罩向广大女性。《褒扬条例》第1条列举了9种可供褒扬的名目，其中的第2款规定：凡“孝行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按照等级由大总统袁世凯颁赐“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后来，副总统冯国璋又颁布了《修正褒扬条例》作为《施行细则》，对褒扬贞节妇女的内容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其中明确罗列了褒扬贞节的范围：

第二条：《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二款所称之“节”妇，其守节年限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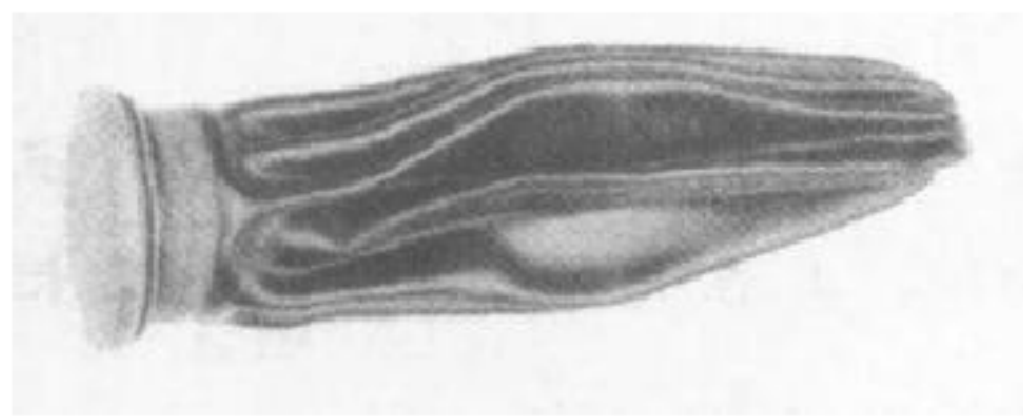
第三条：同条款所称之“烈”妇“烈”女，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属之。

第四条：同条款所称之“贞”女，守贞年限与节妇同。其在夫家守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属之。

可以看出，《褒扬条例》对妇女的“褒扬”完全是清代旌表贞节制度的翻版。此后，封建势力的代表们粉墨登场，一时间，沉渣

泛起，恶臭熏天。

少数人的意志并不能左右历史的进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冲击，封建制度的罪恶显露无遗，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追求男女平等、挣脱贞节桎梏成为包括男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在复辟逆流涌动之时，勃然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运动的参加者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追求个性解放，彻底、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孽毒，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文化、道德、习俗等进行了更为猛烈的冲击，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更是勇敢地冲锋陷阵，功勋卓著。



橡胶制性工具（民国前期）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便是妇女解放，



《新青年》创刊号将“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看作与社会的政治、宗教、经济解放同等重要。《新青年》创刊后，更是成为鼓吹妇女解放、倡导女权运动、清算贞节的阵地。从1916年的第一卷第五号开始，《新青年》将妇女解放问题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用大量的篇幅专论妇女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算贞节。

《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九一六年》，号召妇女自强自力，不要甘心委身他人，“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浹髓沦肌之奇耻大辱。”这篇文章开新文化运动中清算封建道德、倡导妇女解放的先声，是《新青年》向旧道德和旧文化的宣战书。紧接着，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和《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二文分别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和第四号上。讨伐当时逐渐泛起的礼教沉渣。在后一篇文章中，陈独秀痛斥礼教对寡妇的残害：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从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





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的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轻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1918年，讨论妇女问题的热潮被《新青年》掀起了。是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刊载了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妇女问题，指责封建礼教压抑了女子的才能，使女子无法奋发向上。5月的第四卷第五号上，刊发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学者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文中，与谢野晶子认为，如果只是女子守贞，那就是人生的一大破绽，而这种失调的旧道德是不足为信的。她说，“在男子一方面既没有贞操道德自发的要求，也没有社会的强制，”夫妻之间即使没有任何感情，也必须守着丈夫，做个贞妇。因此，贞操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这篇译文是中国出现的第一篇以贞操（贞节）为题的论文，虽然与谢野晶子的思想认识还不深刻，论析也不详备，



但她对贞操观的大胆否定，在倡行贞节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恰似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从此，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集中力量猛攻杀人不见血的贞节观念，准备要全面彻底地清算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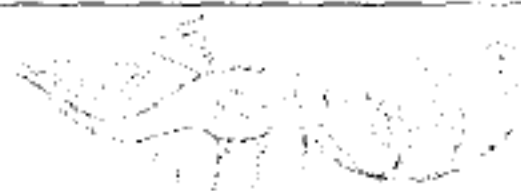
依佛门的女弟子，多为贫家女子或守节女子。

1918年7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猛烈抨击“全无心肝的贞操论”和“野蛮残忍的法律”，



提出了新的贞操伦理观念。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首先痛斥“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认为“要做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接着，他条分缕析，逐步抨击罪恶的封建贞操。他说：“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胡适认为，贞操可以存在，但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和前提，而且男女双方都同样适用于这点。他反复强烈：“贞操乃是夫妇相待的一种态度。夫妇之间爱情深了，恩谊厚了，无论谁生谁死，无论生时死后，都不忍把这爱情移于别人，这便是贞操，夫妻之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说。若不问永不变的爱情是否存在于夫妇之间，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





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胡适一一分析了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女等问题，坚决反对盲从、愚贞，反对法律对贞操别有用心的褒扬，要求彻底抛弃封建贞操这种“男子专制的风俗”。最后，他明确阐述了对于贞操问题的基本态度：第一，旧的贞操“可以彻底研究，可以反复讨论”。第二，合理的贞操，“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由这个前提，便生出几条引申的意见：（一）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二）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三）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四）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第三，“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这种“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的《贞操问题》击中了封建贞操的要害，虽然全文语气平和，激烈的用语较少，但理性审视中的合情合理的论证更加能够使人信服。





女子佛学院

1918年8月，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文中，鲁迅以其犀利之笔为“匕首和投枪”，勇敢地刺向封建礼教，对二千多年来残害女性的贞节作了无情、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他首先阐述了封建礼教下“节烈”的内容：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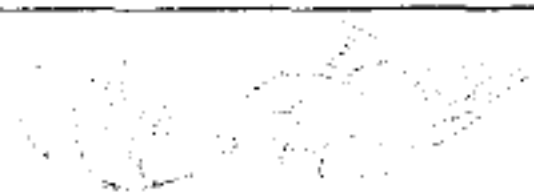


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她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她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她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到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鲁迅看穿了封建贞操节烈的实质，平实明确地阐述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们不愿也不敢明言的贞节内涵。接着，他发出一连串厉声质问：“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表彰之后，有何





效果？”“节烈是否道德？”“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同时，鲁迅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他严辞斥责倡行贞节的统治者的虚伪奸诈和残忍刻毒，“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鲁迅深切同情女性所遭到的贞节摧残，他饱含痛楚和愤慨地分析道，首先，在残酷、阴冷的社会里，“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部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所以，女子的节烈很难。其次，“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有钱尚可，贫人只能饿死。”所以，节烈很苦。再次，不节烈也很苦。因为“社会公意，不节



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节烈的女子死在“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不节烈的女子即便在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鲁迅最后断定：节烈之事“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鲁迅的论述，不仅对贞节的实质作了揭露，而且对它进行了非常有力的鞭挞，对唤醒民众、解放思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更加深刻地论析了妇女问题，将妇女解放理论上升到了崭新的高度。在1919年和1920年的二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批判了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罪恶，同时又指出了资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李大钊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一切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



因素，道德的产生和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而属于道德范畴的贞操问题同样受物质关系变化发展的支配。他论述道：

女子的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在男子狩猎女子耕作的时代，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女子生理上的性欲的要求强于男子，所以贞操问题绝不会发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风俗。到了畜牧、农业为男子独占职业的时期，女子的地位降下去，女子靠男子生活，男子就由弱者地位转到强者地位，女子的贞操问题从而发生，且是绝对的、强制的、片面的。又因农业经济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风盛行。到了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分配的方法极不平均，造成了很多的无产阶级。贫困迫人日益加甚，女子非出来工作不可。男子若不解放女子，使她们出来在社会上和男子一样工作，就不能养贍她们。女子的贞操，就由绝对的变为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

李大钊以物质关系为基点，考察了贞操





问题历史变迁的一般规律，第一次科学地解剖了贞节产生及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新文化运动中其他人的思想相比，由于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李大钊的论述显然更加充满了思辩色彩和理性精神。同时，李大钊对广大女性充满了希望，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热情地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只有“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以及“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才能求得妇女的根本解放。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而贯穿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尤为深远。它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化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且巩固了五四运动的成果，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表现在妇女解放特别是贞节问题上，冲决了封建礼教的堤防，荡涤了历史积秽，全面彻底清算了残害女性的贞节，最





终砸烂了禁锢中国妇女二千多年的贞节樊篱。而且，妇女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成效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展现出来。五四运动中，许多妇女勇敢地冲破礼教的桎梏，接受先进思想，投身革命运动，焕发青春后的女性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活力、生机与价值。

七、大革命时期

妇女解放运动和争取女子继承权运动是大革命前期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用文字形式对男女平等做出的纲领性宣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要组织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注意妇女的自身解放。此外还特别提出在法律与行政两方面实行以下基本原则：

①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②规定女子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③严禁买卖人口，保护女性和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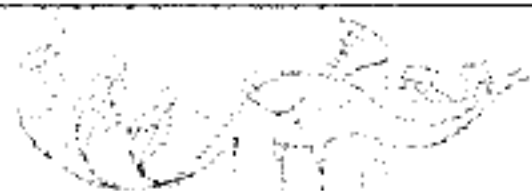
④反对多妻制和童养媳。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保证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对再婚的妇女不得蔑视，反对司法机关对男女不平等的判决。

⑤根据同工同酬，保护女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

这次大会以后，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专门向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高等审检厅发布命令，指示在未制定颁布男女平等的法律以前，关于妇女问题的规定，应根据上项决议案“法律方面”之原则进行裁判。

有关妇女继承权问题，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第16次会议决议，在1927年2月，专门发布如下文告：

“财产继承权应以亲生子女及夫妇为限。如无应继之人，及生前所立合法之遗嘱，所有财产收归国有，为普遍教育之用。但在死者生前确系直接受其抚养者，得按其生计状况，酌给财产”。



这些原则在当时社会形势下有重要意义，是在法律上男女地位平等精神的第一次体现。

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成果

在法律上也确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妇女解放的成果。1930年12月2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民法》，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调节婚姻关系的《民法·亲属编》。它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婚姻关系的建立及解除等，其基本精神是婚姻自由等，反映了婚姻关系上的时代要求。《民法·亲属编》吸收了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中的有关内容，完成了由封建婚姻向现代婚姻的法律转变，终结了封建贞节制度，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自1931年5月15日开始实行后，《民法·亲属编》成为调节国民党统治区内婚姻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但是它也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如承认一夫多妻的合法化、保留男尊女卑的部分内容等，表明这部法律还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正





北平妇女慰劳队


式颁布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内实施。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调节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妇女权益的专门法。其中有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的确立，结婚和离婚的法律程序的规定，男女平等、夫妻平权等的实行，它彻底扫荡了封建婚姻制度和贞节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婚姻制度的精神，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婚姻法律的蓝本。

自封建礼教肆虐、贞节枷锁套上女性脖颈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冲破樊篱、




30年代的女子健美运动

反抗贞节的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贞节残害女性达二千多年，无数的妇女成了贞节的牺牲品。清算贞节、实现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形的贞节制度可以很快摧毁、废除，而无形的贞节观念和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贞节习俗，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涤荡。毕竟，贞节的发展史延续了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以为常的陈规陋俗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才能清除干净。历史的惯性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贞节制度被彻底否定；另一边却是贞节沉渣时时泛起。即使是



在妇女成为社会主人的新中国，仍可看到贞节观念在作祟，男尊女卑、夫主妻从，歧视、压制女性的死灰不时地复燃。一切都在表明，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中还存在着封建思想的余毒，还被旧道德伦理的阴魂环绕着。



历史的潮流不容逆转，男女完全平等、女性彻底解放终将实现。同时，女性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妇女解放的步伐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进程。所以，妇女的解放需要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婚俗与婚礼



中

国

风

化

图

史



3



一、20 世纪初婚姻关系的变化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性行为就最普遍、最大量地在婚姻关系的范围内发生，其他性行为也都直接间接地和婚姻关系有关。因而婚姻关系与婚姻制度的演变是这部风化史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

20 世纪是中国经历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新中国的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婚姻制度从旧到新的一个变革的时代，整个 20 世纪，中国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婚姻的真正自由，排除杂交对一夫一妻制的干扰、推进婚姻与家庭的幸福和完善。

婚姻途径是缔结婚姻的开始，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婚姻的基础，它对夫妻关系能否正常维系起着开端的和相当重要的作用。婚姻途径归结起来可分为自主婚姻和非自主婚姻两大类。自主婚姻包括自己认识，也包括他人介绍、本人同意；非自主婚姻主要是包办婚姻，也有买卖婚姻、屈服于某种暴力的婚姻等。社会走向开明、进步以及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提倡自主婚姻，反对非自主婚姻。

20 世纪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自主婚姻取代非自主婚姻的过程，这种取代实际上是一种斗争，而且往往是很残酷的斗争，有时当事人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站在非自主婚姻一边的有习俗的力量、贫穷、家族势力、政权以及一些落后、保守的社会舆论，在 20 世纪以前，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自主婚姻根本抬不起头来；20 世纪前期，自主婚姻和非自主婚姻展开殊死的搏斗，而且自主婚姻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 世纪初期的婚姻史是一部争取自主婚姻的血泪斗争史。

1928 年 11 月起，上海各大剧场争相上演一出同一题材的新戏，街头、报章上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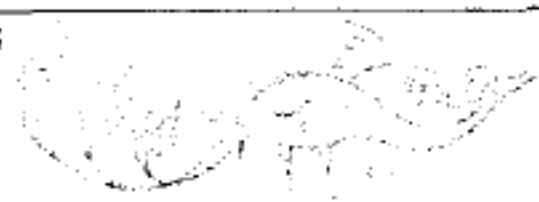
民初婚嫁仪式

广告比比皆是：

《黄慧如和陆根荣》轰动苏沪之时事新戏
择吉开演；

上演妇孺欢迎之时事写实著名杰作新戏
《黄慧如和陆根荣》；

《黄陆之爱》是明星影片公司应合社会心
理之写实新戏；等等。



这出新戏，是按发生在当年夏天的主仆情奔案编演，“主”，是大家闺秀黄慧如；“仆”，则为黄家的佣人陆根荣。

黄慧如和男仆陆根荣真诚相爱，但受到当家的兄长黄澄沧的坚决反对。可是黄慧如已经怀孕，实在拖不下去了，于是只好和陆从上海逃到苏州。其时，上海黄家已向巡捕房报案，称陆根荣诱拐小姐、盗窃金银财宝逃跑。巡捕房派捕探四处侦查，并行文各处协助查拿。

结果，陆根荣因意图奸淫而拐诱一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又因盗窃一罪，处有期徒刑两年；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剥夺公权三年。黄慧如则被族人辱骂、歧视，因受刺激过深，分娩后病逝。

社会上两种力量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种力量是黄氏家族对黄、陆二人的迫害与“万恶淫为首”的舆论攻击；另一种力量是社会进步舆论的支持，如黄慧如住院时，各色人等纷纷向黄慧如伸出了援助之手，来医院赠钱赠物；信件、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医院，表示理解、鼓励、敬佩。吴



县妇女协会推派代表，携带礼物到医院看望慧如，询问起居寒暖，安慰再三，又与上海妇女协会联名，向社会发出呼吁：救此茫茫人海中弱女子。黄慧如病逝后，各界人士痛悼这位牺牲了的女子，称赞她的行动是新女性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对世俗偏见的挑战，对封建家庭的反抗。



祈雨的老人与她的孙女

在 20 世纪前期，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情。1931 年 4 月 11 日上海《生活周刊》的一



则报道则反映出社会保守势力对婚姻自由的压迫，以及舆论对婚姻自由的支持：

嘉兴第二女子中学女生张锦芳，家住北门外坛弄内；父早故，尚有祖母及亲母暨弟妹等数人，家中薄有田产。锦芳在女中颇勤读，天资亦聪颖，考试必列前茅。最近因反对专制婚姻，家庭间遂不和谐，缘锦芳于前年由祖母作主，招本城塘渭镇某南华号伙友邱某为赘婿（未过门），锦芳当时曾表示反对，因其祖母顽固异常，力争不能解，自后锦芳常快快不乐，口吻间常表示反对意。最近又与祖母齟齬，祖母逼令其应允，否则不令读书，锦芳始终不允，致本学期遂告辍读。自后锦芳常背人饮泣，虽有同学辈劝慰，亦难解锦芳心中之苦，突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将已有之饰物典质后，留书出走。书凡三，一致其祖母，一致其母，一致其寄父，内谓系受专制家庭压迫辍学，并受婚姻不自由之痛苦，不得已而出走，拟赴澈浦投江，脱离万恶世界云云。家属发觉后，虽派人驰赴车站轮埠寻觅，然已不及。其母爱女心切，寝食俱废，现正四出托人寻觅，未知可能珠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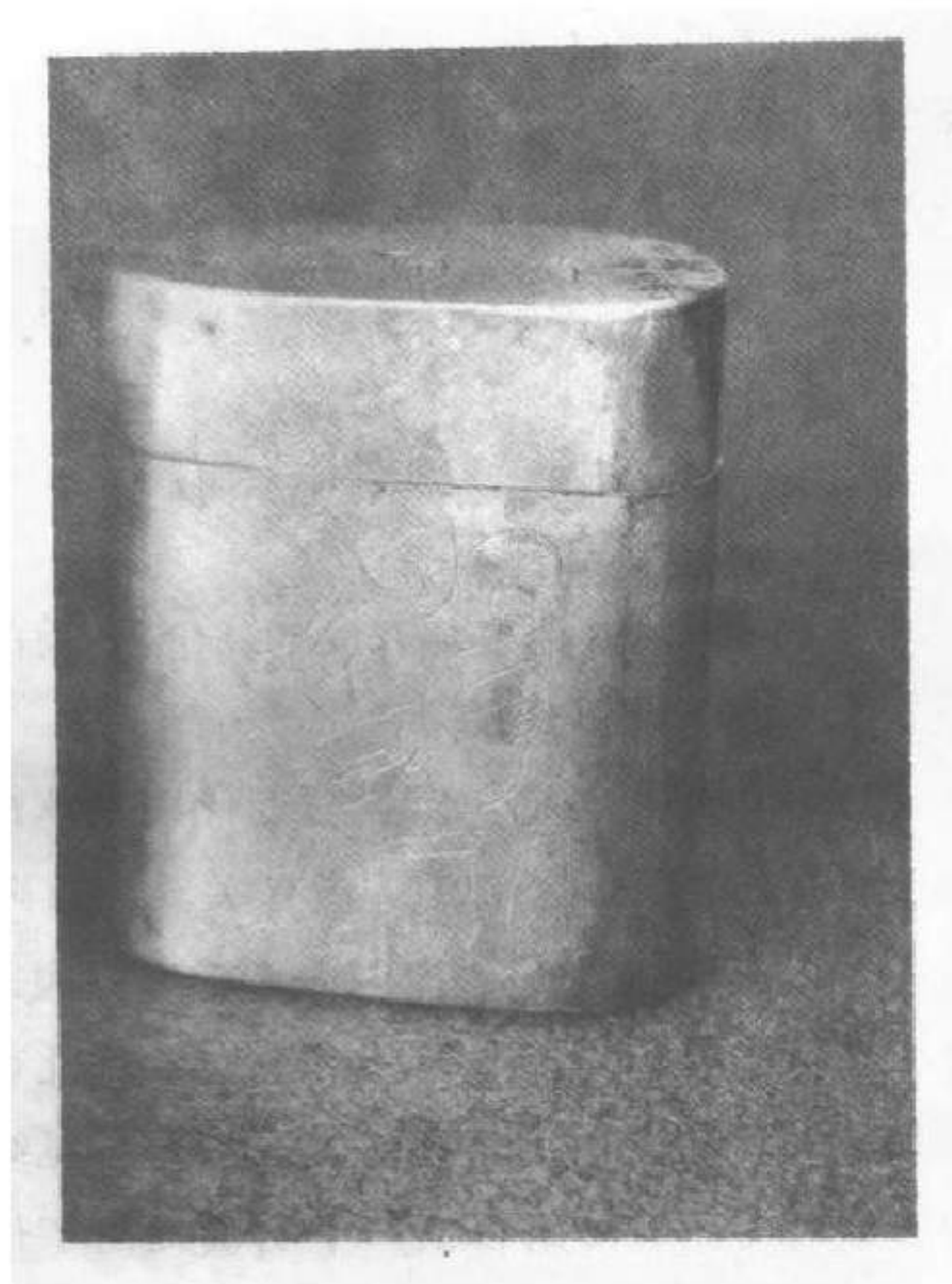
合浦否。按婚姻非得本人同意，无论依新旧法律，均不能成立，新民法且明白规定“婚约应由当事人自行订定”，又规定“婚约不得强迫履行”，何物墓木已拱之老嫗，胆敢目无法律，横暴致此！

在当时封闭与保守的旧社会里出现了一大新鲜事即广告征婚。

征婚广告和其他一切开放的新事物一样，免不了遭到阻碍和误解。

报纸征婚的创始者居然与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炳麟）有关。1902年（清光绪28年），太炎的原配夫人王氏染病去世，当时他34岁。1903年，章太炎便在北京《顺天时报》上赫然刊登《征婚告白》寻觅续偶。章太炎在《征婚告白》中明确提出了他续娶的五条标准：女方是鄂籍（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放；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平等；夫死可嫁，亦可离婚。章太炎的这一壮举开创了中国近代文人公开征婚的先例，在当时无异于振聋发聩，充分反映出他痛恨封建礼教，提倡女权的战斗精神。在晚清的遗老遗少眼中，章太炎的《征





绘有春宫图放置性药的钢盒

婚告白》是“越轨”行为，从而引起了许多人讥笑。很多名门闺秀都望而却步没有应征的勇气，以致拖延了 10 年之久，直到 1913 年，经友人介绍，太炎先生才结识了条件均合《征婚告白》的汤国梨女士，两人结为美



满的伉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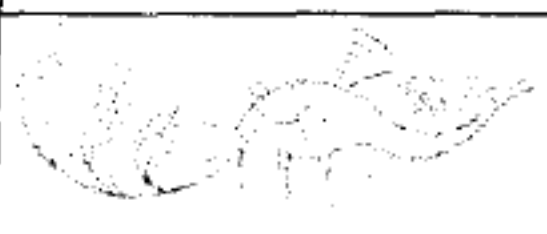
关于民国时期的征婚状况，从 1931 年 2 月 16 日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报道可见一斑：

“征求女友”或“征求男友”或“求婚”或“觅侣”等等小广告，近数年来常见于报纸，大抵征女者多，征男者少。征女之条件约为“二十上下”“中学程度”“品貌端正”“性格温柔”，而以自身之外国（或国内）大学毕业，现职现俸（或家计优裕），体格健全等语先之（对女之品貌要求亦有甚露骨者但不多）。征男之条件约不外供给力优裕，留学，有职等，而以己之品端貌秀某学程度先之。此大致之程式也。

既已社交公开，婚姻自主，为男女间关系之一种进步，则此类征求，亦属寻常，与聘师、觅馆之性质无甚悬殊。或因素性不工交际，或因职务无暇做爱，而为此直接了当之办法，省去许多麻烦。其条件亦尚不外人情，若本于正当观念，不诡不欺，未始非救济怨旷之一法。此就常理言之也。


不过在此半生不熟之社会中人情既不可





测，流弊自所难免，亦不止此事为然。两个面生人忽然接洽，自以多加小心为是。飞霞君“征求女友”一文原是滑稽小品，所写情形，当亦不在少数。偕文本以讽刺为立场，所谓言者无心，闻者足戒耳。


在该报 1931 年 9 月 16 日刊载的一则征婚广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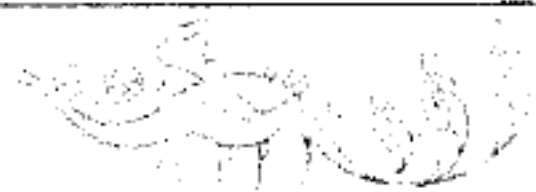


余二十七岁，现中校职，世界主义之泛东方者。欲聘精通英文，具有姿色，富革命思想，长政治、外交，不尚虚荣，年在十七上、二十五下者为内助。有意者请函济南按察司街马子贞转刘海涛。

至于 1922 年 2 月 19 日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一则妓女登报征夫，应该是十分奇特的了。但是如果细看这则征夫启事，却是字字血泪，妓女的痛苦和怨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香港水坑口东乐园一楼妓女黄雪花，二十一岁，籍隶琼州，雪肤花貌，颇通词翰，亦其中之翘楚也。迨以情厌烟花，蓄愿从良，只以走马章台者，大都无惜玉怜香之真心，乃登报招夫，冀于人海茫茫中，得一知音，





该妓存心亦良苦矣。至被招之年龄，以二十二至四十三岁为合格，身价二百二十元，条件面订。其招夫文云：自维陋质，少堕烟花。柳絮萍轻，长途浪逐。茫茫恨海，谁是知音？黯黯情天，未逢侠士。孽缘已满，夙债堪偿。无奈未遇知音，难奏求凤之曲。每念红粉飘零之苦，同抱天涯落拓之悲。好景无多，名花易谢。雅不欲托报章而择配，登告白以求凤。翻考红粉颇羞，难免文人讥讽，奈何东皇力薄，护花无方。章台作客，大半征逐风尘。惜玉怜香，花丛稀见。叹年华之逝水，付夙恨以何如。若蒙君子如司马之多情，小妹具文君之慧眼，不弃花丛贱质，请速惠临。

二、民国初年婚爱状况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封建礼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妇女开始扬眉吐气，特别是一些先进妇女，勇敢地战斗在争取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中华女子竞进会宣言》云：

设中华女子竞进会，以研究政治军事二大端，借以启迪智能，磨练体魄。战争未息



则进而荷戈于军队之间，共和告成则退而效力于政客之列。生命何足惜，要当为国捐躯。权利所应争，自是当仁不让。将见女权日广，女智日昌，扬平等之体风，享共和之幸福。

民国初年，唐群英等 20 多名女子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上书请愿：“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利不可。”请愿书还要求将她们的请愿在宪法内“正式公文宣布”。但 1912 年 3 月 11 日临时政府参议院公布的《临时约法》并没有男女平等的条文。3 月 19 日，唐群英等人又上书孙中山。当天即召开参议院会议，会议将此请愿推到国会。20 日，请愿妇女们干脆闯入参议院，和卫兵发生冲突，并捣毁了玻璃门窗。孙中山表示愿意接受要求，向参议院提议增修《临时约法》有关条文。后因袁世凯篡权，遂罢此事。

南京临时政府 1912 年 3 月 17 日颁布《大总统通令开放胥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宣布废除清朝法律中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限制，规定胥户（即水上居民）、堕民、丐户、义民（即奴隶）、优娼、隶卒等均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



版、集会、信教等公民权利和自由。3月2日，3月19日，相继颁布《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明令禁止贩卖华工到国外、买卖人口，保护华侨，废除奴婢卖身契约、主奴名分以及人身奴役等。强调“拥护人权为第一要义”，并明令取消“大人”、“老爷”等称呼，废除跪拜之礼，禁止缠足等。

在一系列教育文件中，宣布废止读经，奖励女学，提倡男女同校。据1915年统计，全国共有女学生180949人。下面是1912年至1916年临时政府教育部的统计数字：

民国一年（1912年） 男生 2 792 257
女生 141 130 女生占总数的 4.8%

民国二年（1913年） 男生 3 476 242
女生 166 964 女生占总数的 4.6%

民国三年（1914年） 男生 3 898 065
女生 177 273 女生占总数的 4.3%

民国四年（1915年） 男生 4 113 302
女生 180 949 女生占总数的 4.4%

民国五年（1916年） 男生 3 801 730

女生 172 724 女生占总数的 4. 5%

何香凝、宋庆龄等人，是这一时期同丈夫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参预政治斗争的著名妇女人物。

何香凝（1878年—1972年），从小接受反清救国思想，1897年与廖仲恺结婚，是辛亥革命骨干。辛亥革命以后，继续从事民主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她参加讨袁运动，后同丈夫一起流亡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的工作。

宋庆龄（1893年—1981年），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赴美国，在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学习，后加入国民党，曾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同孙中山结婚，辅助孙中山进行反对帝制、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亦有相当的局限性，仅仅是上层一部分知识分子妇女中的极个别的人有些觉悟，参预了政治斗争。广大的中国妇女仍然被封建礼教、传统恶势力压在社会的底层。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只能带来不彻底的妇女解放。随着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黎元洪和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统治，封建礼教



仍以深厚、顽固的根基，影响着社会的婚姻性爱习俗。

袁世凯在清末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渐升至直隶按察使，后投机维新运动，接着又靠出卖维新派而受慈禧太后宠信，先后当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时，他凭借实力迫使孙中山让位，挟制宣统皇帝退位，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最终导致封建势力的复辟和猖狂反扑。袁世凯公开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5年，授意其党羽鼓吹帝制，甚至不惜让乞丐和妓女也出面为他复辟帝制而呼吁。当时就有所谓“妓女请愿团”参预此类丑剧。当年12月，宣布成立中华帝国，由他当皇帝。1916年元旦称帝，改元洪宪。

与此相应，封建礼教又重新大张旗鼓地宣扬起来。1915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四书》、《五经》、《经训教科书》、《经训教授法》等20多种宣扬封建文化的书籍。

袁世凯、张勋、北洋政府，把封建礼教的旗帜举得比他们的前辈更高。





1912年，由一批封建遗老遗少先后发起“宗圣会”、“孔教会”、“孔道会”等。鼓吹要“树尼山（指孔丘）教义作民族精神”（《孔教论》），“陶淑人民道德”（《孔教十年大事纪》）。袁世凯发布《尊崇伦常令》，公然声称，“政体虽更，民彝无改”（《袁世凯大总统文牍类编》）。

陈焕章，清末进士，孔教会会长。民国后曾任总统府顾问、国会议员，孔教大学校长。1913年，他编撰《孔教论》一书，该书《孔教会序》：

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借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所望鸿儒硕学、志士仁人，效宗素王，报恩教祖，同声响应，大力提倡。

《孔教论》一书在卷首刊登了中华民国教育部和内务部对孔教会立案的批文。教育部





的批文说：“当慈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内务部批文曰：“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尽纳其事。……准予立案。”

1913年，从前的维新志士，那时已变为保皇党的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鼓吹礼教。为什么叫“不忍”呢？他说：“庸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腐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他还说：“有意保中国，则不可不保中国魂也。”（《中国学报题词》）

1913年，孔教会会长陈焕章等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把孔教作为国教，并要求写入宪法。得到副总统黎元洪等人的大力支持。袁世凯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当年还两次发布尊孔告令。教育部规定旧历的8月27日孔丘生日为“圣诞





节”。

1914年，袁世凯通令全国祭孔，规定：“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发布《崇圣典例》，颁发“衍圣公印”。接着，又发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由大总统按等级分别授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力图恢复封建伦理纲常名教。9月，正式发布祭孔告令，把封建伦理道德称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告令规定旧历9月28日，中央和全国各地一律举行“祀孔典礼”。到了那天，袁世凯亲自率令各部总长并文武官员，穿着离奇古怪的祭服，戴上特制的古帽，在北京孔庙行祀孔典礼。就在那一年，他还带领官员们到天坛祭天，完全接过封建帝王那一套。

1916年，袁世凯垮台以后，封建遗孽们仍不甘心于帝制和封建纲常名教退出历史舞台。张勋多次电请总统、议院速定孔教为国教，说什么“若弃孔教，是弃国魂”，应将孔教“编入宪法，永不得再议”。康有为致电政





府，“立飭各省祀孔，仍行跪拜礼”，甚至还说出遗臭千古的惊人之语：“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见《孔教十年大事纪》）

1917年，张勋再次致电总统和各省省长、督军，“举礼义廉耻之大防扫地以尽”，则“何以固国体、定民志、服民心？”7月1日，张勋发动复辟政变，“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戴清废帝、前宣统皇帝溥仪重登龙位。在所谓“上谕”中称：“而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

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封建礼教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的黑暗时期。中国广大妇女在被冲击了一下又卷土重来的封建伦常的压迫之下，比前代更加痛苦。由于封建礼教的抬头，婚爱状况又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婚礼仍用旧礼，典妻、童养媳、纳妾、缠足等恶风亦未受到禁止。中国处在黑暗之中，中国的婚爱状况也只能处在黑暗之中。

据民国初年成书的《江津县志》记载，婚礼仍是古代“六礼”那种模式，“邑又有童婚之俗，……谓之‘小抱’，亦曰‘凭长’，媳妇成人之后行结婚礼，俗谓之‘团房’。



……而纳妾之俗未废……夫死招夫之俗邑中尚少见。兄死，以嫂就叔虽间有其事，一般舆论亦知其非礼而鄙之。……”

北京《中华新报》载海宁朱尔迈《合葬唐烈妇记》：

唐烈妇之死，所阅灰水，钱，卤，投河，雉经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云以砒霜。则其亲试乎杀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又历九十八日之长，非所称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乎？

唐烈妇在丈夫死后的 98 天之中，自杀 9 次才成功，最后得以殉葬其夫，这种妇女作为烈妇典型，受到表彰。

同上：

有俞氏女年十九，受海盐张氏聘，未于归，夫夭。女即绝食七日。家人劝之力，始进糜，曰：“吾即生，必至张氏，宁服丧三年，然后归报地下。”

19 岁的未婚姑娘，居然为未婚夫死去而绝食 7 天，然后准备到男家服丧 3 年再以死殉夫。





《新青年》五卷一号披露了上海某报登出的一件事：

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死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

这位烈女年仅 17 岁，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就为夫殉死，当然受到官方褒扬，上海县知事送了“贞烈可风”的匾额，又呈文让江苏省长“按例褒扬”。

《新青年》五卷一号披露了此事，还附上了官方的《褒扬条例》和实施细则。该条例第一条第二款便是“妇女烈妇贞操可以风世者”应该褒扬，其《实施细则》是：

第二条：《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二款所称之节妇，其守节年限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同。

第三条：同条款所称之烈妇烈女，凡遇





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属之。

第四条：同条款所称之贞女，守贞年限与节妇同。其在夫家守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属之。

以上几例节妇烈女，就是同宋元明清之《列女传》所载烈女节妇相比，其“节”、“烈”之程度，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证明，清除封建思想，荡涤纲常名教，比赶下来一个皇帝要艰巨得多，也重要得多，封建政治制度的命运，同封建纲常名教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鲁迅在其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得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的确如此，什么时候，孔孟程朱被抬到高位，社会就一定黑暗、倒退；什么时候，孔孟程朱被批判贬斥，社会就进步、光明、充满希望。

民国初年，不但正统礼教伦常甚嚣尘上，传统文化中为正统礼教所不容的淫秽之风，





也重新沉渣泛起。

民国初年，有岭南民歌曰：“家葱没有野葱香，家郎没有野郎强。家郎说话像棒打，野郎说话像蜂糖。”这种婚外偷情，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同时，正统礼教也是加以反对的。

在姚灵犀的《采菲录》里，有一篇民国初年人藏钩写的《云中睡鞋》：

山西大同古称云中，为北方重镇，浑河毓流，代产娇娃。……至今该处女性，犹有三种特长，一为白腻皮肤，一为重门叠户，一即纤小钩莲也。在昔每年四月八日，为赛脚大会之节，家家妇女骈坐门前，翘道旁，恣人品论，以博得好评为荣；游人可驻足俯首观玩，唯弗得捏弄耳。其好尚有如此者，无怪其所缠之小足之无美不备也。民元春季，余旅行是地，租寓民家，因与房东之女通。女年十九，已嫁而孀，乃归依其母。平素淡妆素服，风致娇然，但眉目间隐含荡意。余女口操晋音，不无怯态，而其肤理之光润，实较南方女子为胜，不能无动于中。遂于一夕潜入其室，俟女母已寝，家中更无他人，余遂得肆其所欲。女先布枕于砖炕上，嘱余





先眠，已则对镜梳洗，余拥被坐待，作水晶
缣下之旁观。见女傅粉点脂，如叱地浓艳之
妆，……妆竟，复濯其足，然后束以绸条，
套以绫罗，又自炕箱中取大红睡鞋出著之，
始登床。……执其足而谛视之，鞋为红缎所
制，尖秀无匹，比日间所著鞋更窄小，帮绣
细花，中嵌春宫图，亦极工致，下视软底，
人握如棉，诚为妙物。女斯时冶状毕露，戏
伸红菱以逗余势，立即供兴，且兴炽倍于平
常。信乎戔戔莲焉，为助淫具也……

这种描写，这种对小脚的癖好，丝毫不
亚于元明时代的没落士大夫的淫褻。

民国初年林庚白有《醉春风》词一首，
其词前段云：“浅酒人前共，软玉灯边拥；回
眸人抱总含情，痛痛痛。轻把郎推，渐闻声
颤，微惊红涌。”这样淫褻露骨的描写，即使
是以淫词闻名的晚唐五代，也赶不上。

民国初年的早婚成风，更有小丈夫大媳
妇的恶习。胡朴安先生《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篇卷一就谈到过这种婚俗：“满洲之早婚，
在全国可居第一，男子生十三四岁即结婚，
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俱为贫人……。加





之民间惯以年长之女子配少年之男子，十三四岁之男子，必娶十七八岁之女子……。”“河北省东光县……婚俗尚早婚，女长于男。”当时各地的民谣里，也有很多地方反映出这种长女少男的风俗。四川山歌：“十八女儿怪媒人，说得丈夫一叮叮。睡在半夜屙泡尿，打湿奴家半边身。”北京儿歌：“有个大姐正十七，过了四年二十一，寻个丈夫才十岁，她比丈夫大十一。一天井台去打水，一头高来一头低。不看公婆待我好，把你推到井里去。”陈独秀曾以“三爱”的笔名，在《安徽白话报》1904年第三期第四期上发表《恶俗篇》，其中，就谈到这种婚姻恶俗。他说：

我们安徽有几处，还有一种最可恨、可杀、可怜、可哭的坏风俗，就叫做什么“等儿媳”。这等儿媳的规矩，是因为没有儿子，就娶下一位媳妇，等着儿子，若是等到二十多岁儿子还不来，那媳妇才可以择配他人，算是开笼放雀了。最可惨的是那媳妇一直等到十八九岁，那儿子到来了，只是“十八岁大姐周岁郎”，那媳妇少不得守十几年青春活寡，才能够成亲婚配，你道这是天地间何等





不合情理的惨事哩！

当时，贵州、湖南等地，妇女受苦极深，对不守贞节、追求婚爱自由的妇女，多由族长、祠堂处理，用残酷的私刑解决，诸如活埋、坠河、沉塘、令其自尽等。活埋是在夜晚将犯禁女子投入土坑，往坑内洒石灰，直到女子眼耳口鼻都冒出阵阵白烟，旁人才往坑中填土活埋。坠河、沉塘是用石磨或大石块缚在女子身上，抛入河中或池塘里。令其自尽是将女子关在暗室中，给她一块生鸦片、一根绳子、一把利刃，任她自择死法。

总之，民国之初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军阀们的黑暗统治，给广大妇女们带来的礼教束缚和残酷压迫，都不亚于前代的任何封建统治者。

三、近代的收继婚

近代我国的一些地区，尚甚流行平辈的收继婚，兹分别简述如下：

蒙古 据近人记述，可知近代蒙古仍保存了一部分旧俗。《外蒙地志》页二二二云：“寡嫠之妇，叔可使嫂治床，伯可使娣当夕，





此俗近已渐减少矣。”《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记蒙人的家庭时，亦有类似的记载。

绥远 “绥省婚嫁的形式……哥哥死后，留下孀嫂一女，孀嫂遂和小叔成为夫妇关系。当他们由叔嫂变成夫妇的时候……邻里不讥，戚友不问。”

满洲 凌纯声氏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页二〇〇上说：“有时夫死，弟妻兄嫂，兄妻弟妇，甚至翁媳相配，他们叫做‘西勒弥’俗。寡妇有因生男女多而不改嫁者，亦有才色出众的寡妇，改嫁至四五次者。”

陕西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页四二〇说：“汉中风俗往往有指媳以继子，招夫以养夫，甚且胞弟妻其孀嫂，谓之‘转房。’”《民商事习惯法调查录》页一七一五云：“镇巴、合阳、汉阴等县习惯，转房又名剝裁，即兄弟间有死亡时，所遗寡妻，即以转配其鳏居兄或弟之谓也。”页一七四四云：“定邑（定边县）有兄弟二人，家素寒微，兄娶妻身死，遗留孀妇，不欲出嫁；弟又无力婚娶，为嗣续起见，遂央宗族长乡招纳孀妇为妻。亲族亦相庆贺，俨与正式婚姻同。”页





一七四五云：“平利（县）有孀妇转房之恶习，其夫故后，对于夫兄弟暨嫡堂兄弟或族兄弟均得配为夫妇。其转房之主张有为翁姑之胁迫者，有出于本人之愿意者，有为族兄弟之强求者，情不一致。但须前夫无子，并经娘家父母之同意，始得进行。”

甘肃 “泾原道属习惯，有法律所不许可之婚姻，而民间视为通者，即兄纳弟妻，弟招兄嫂也。例如甲乙丙丁弟四人，甲死而乙无妻，即以甲妻妻之。往往出于父母之命，而甲妻之母亦无异言。乙死而甲无妻时亦同，若丙丁有夭亡或断统时，亦可类推。此项事情多在下等社会之中。”

山西 闻喜县习惯，兄故嫂寡，其弟无妻者，得经人说合与孀嫂配为夫妇，俗名“续婚”。沁水县亦有此种习惯。夏县亦然，且名曰“特别续亲”。

湖北 1916年7月10日，湖北高等审判厅转宜城县知事呈称：“社会上于兄亡以嫂为妻，弟亡以弟妇为妻者。”民国6年（1917年）蕲水县又称：“兹有某甲子故，遗媳某乙，意欲立子承嗣，择定族侄某丙为子，并





将媳某乙再醮某丙缔婚。”据调查的记录，亦云：襄阳县属在北乡及谷城县属张家集地方，“伦婚”之习惯最为盛行。或兄故弟娶嫂为婚，或弟故兄娶弟妇为婚。均无婚书或媒妁，或系男合意自由成婚，或系强迫妇女敬神成婚。又云：汉阳、兴山、郧县、竹山、恩施均有此习惯，俗称“转房”。竹溪县则仅有兄死弟娶嫂为妻之事实，俗亦名“转房”；若系弟死不得纳弟妇为妻。五峰县同胞兄弟死后之孀妇或弟妇，不得纳之为妇；若系族房兄嫂、弟妇，即得与之成婚。

湖南 1928年，湖南衡阳附近，尚行此类婚俗，兹抄最高法院的释例如下：“男女婚姻，依现行亲属上之限制，与结婚、离婚自由之原则，并不抵触，如甲娶总服内之孀妇为妻，自属无效。如无直系亲属告诉，应由代表公益之检察官，请求撤销。”至于长沙、沅陵、宝庆等县，已查出亦有收寡嫂娶弟妇的习俗；而石门、慈利、澧县、桃源、临澧等县，则称此俗为因变续婚。其内容除行平辈收继婚外，尚有：“如甲乙各有子女数人，乙以长女与甲年龄相等之子丙结婚姻，（甲之



子皆已订婚)迨后乙之长女夭亡,甲仍请次女与甲之子丙续为婚姻,凡此皆因变故而续为婚姻者也。各该县民俗又称之曰‘挽亲’。据作者调查,石门县寡妇再嫁有四种方式:(1)由夫家把她出嫁;(2)由娘家把她出嫁;(3)把她嫁与夫族的兄弟;(4)由夫家父母继一嗣子,与她结婚。夫家把她出嫁,社会上多认为不好,顶好有适当的夫兄弟和她相配,俗称“转房”。《湖南通志》卷四十页一三二云:“(苗人)翁有悦子妇者,则收为己妻,而为其子另娶,兄弟故,则收其妻。”

安徽 “贵池及和县平民习惯,有同胞兄弟间,若有身故,兄无妻子者,即以弟转配其兄为妻;兄故弟无妻子者,亦如之。亲族多成无异议,习俗不良,无逾于此。”

江苏 淮安的习俗,所谓叔接嫂,是兄死后,妻归弟有(弟未娶),并不举行什么样式,可省却一笔婚嫁费,这是只通行于乡间的一种婚制。

江西 司法行政部的调查录云:“南昌乡间每有从幼抱养媳妇,订定与某为婚姻。后因某未成婚,遽尔物故,则将抱养媳妇转与





其弟或兄为婚姻，谓之‘转书’。若某已成婚，或非抱养媳妇，则不能有此行为。”又云：“赣南风俗有升房之说。例如家有兄弟数人，其弟已娶妻而病故，其弟妇可配其兄，即谓之‘升房’。惟此等恶俗，亦仅贫家有之。”又云：“民间转婚风俗，赣县最盛。例如，兄弟数人只有一人娶妇，而此一人死亡，其妇即由他兄转娶者，死又可递娶。经某前知事严禁后，风已稍杀，而僻远之乡，仍复不少，此亦财礼过重，有以迫之使然也。”据作者调查，上犹县亦有此种习俗。该县东山镇李君及广田乡孔君称：“已分居各爨之堂兄弟而非过继为人嗣子者，无论已否结婚，皆不得收寡嫂为妻；但尚在同居共爨之胞兄弟或亲兄弟，可以转婚。不必另备婚仪，至于收娶之日仅以香烛告祖，或延请族戚宴饮而已。”

浙江 义乌、浦江、东阳等县习惯：“婚姻插花——例如，甲有子乙丙二人，于乙幼时曾抱养媳丁，当其抱养之际，原议俟丁长成后配与乙为妻，即丁之父母亦与乙以岳婿称呼，并甲族人等亦各认丁为乙未婚妻。倘





在未婚期内遇修族谱，且有将丁载明为乙之妻。乃乙未与丁成婚之前，中道殁亡，此后甲得丁之父母同意，即将丁改配与丙为妻。而成婚不复另立婚帖，以从简便，俗名插花（即含有移花接木意味）。此种插花婚姻，当时乡党宗族既无闲言，嗣后重修族谱，亦均听从其便。”又：“临海县每有家贫之人，娶妻维难，若兄已成婚而亡，由父母做主，将寡嫂与叔为妻，名为接面。”又：“平湖县习惯，夫故叔已成年，家境困难，或由其翁姑作主，或两相允洽结为夫妇。然此皆下流社会始为之。”又：“泰邑‘下等’社会转亲者甚多。例如，甲有三人，为乙丙丁，乙丙已娶，惟丁未婚，丙中道死亡，其妻不愿守节，而翁姑妯娌极为相得，不忍令去，乃互相转配于丁（俗名转亲），遂乃团聚。有因家贫无力婚娶而为之者，亦有因嫂叔苟合而成者。”

福建 福建连江县的乡间，亦有叔娶嫂的习尚，俗名“接书”，它与各地的“转书”一词颇相似。又永安本叶村刘氏族谱，有家训一则，专禁族人行此婚姻，可知福建的内地，亦有此俗。





四川 四川黑水区麻窝等地行此俗。如“苏永和在其兄永清死后，到麻窝上门娶嫂。她名昂吉尔卓冯，汉名苏高丽华，年三十八，较苏长五岁。”

云南 大理峨昌人，“一名阿昌听土司役属，旧俗，兄死则妻其嫂。役罗板寨百夫长早正死，其妻方艾，自矢不失节，饿死，其俗乃革。”维西县亦有此俗。作者在潞江时，附近一村，名松子园，村中亦有娶嫂习惯。一家李姓，娶一妻，死后妻孀居，乃由小叔收继。当时其嫂年30余岁，仍健在。又云南黑罗罗亦有此俗。《滇海虞衡志》卷十三页五云：“其婚姻犹诸夷，兄死妻嫂。尝有一妇而递兄弟四五人。妇拥夫资，不欲他嫁，则招夫谓之上门，即能专制，所有亲族不得过问。”

广西 刘锡蕃撰《岭表记蛮》页七七云：“同姓结婚，苗、瑶、僮、侗各族，皆所不禁。……又兄死而弟以嫂为妻，弟死而兄以弟妇为室者，亦恬不为怪。”又，“广西天莪县属，民智锢陋，染习恶风，迄今未替……各乡有兄死弟娶其嫂之风。行此恶习，迹近



‘野蛮民族’之所为，于血统上言，固有所关碍于人伦上言，尤为悖逆不伦。”

广东 作者闻友人言，南雄及翁源的乡村，亦有此俗，惟托填调查表，迄未寄回，未敢断为确实。至琼州岛黎人，则确行此俗。陈铭枢编之《海南岛志》第三章页九七至九八云：“黎俗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制裁极严厉，女子既嫁，不喜落家，此殆一因也。黎人亦有‘转婚’之习，兄死弟未娶，则以嫂配弟，弟不愿，乃再嫁；间亦有可嫁同宗夫之兄弟，而不得嫁夫之胞弟者，临儋属内之黎族，即如此。”宣统时刊行的《崖州志》卷十三亦云：“（黎俗）兄死弟得妻其嫂，而弟妻之分独严。”

上面仅是平辈收继婚的汇总，现在概括说明如下：

第一，从名称上说，我国平辈收继婚名称凡 14 种。一曰转房，流行于陕西的汉中、镇巴、合阳、汉阴、平利，以及湖北的汉阳、兴山、郧县、竹山、恩施等地。二曰续婚，流行于山西的闻喜，以及湖南的石门、澧县、桃源、临澧等地。三曰挽亲，亦流行于湖南





的石门、慈利、澧县、桃源、临澧等地。四曰伦婚，流行于湖北的襄阳、谷城等地。五曰转婚，流行于江西的上犹、广东的琼州等地。六曰升房，流行于江西的赣南等地。七曰续亲，流行于浙江的泰邑等地。八曰转亲，流行于浙江的平湖等地。九曰转书，流行于江西的南昌等地。十曰接书，流行于福建的连江等地。十一曰插花，流行于浙江的义乌、浦江、东阳等地。十二曰接面，流行于浙江的临县等地。十三曰剉栽，流行于陕西的镇巴、合阳、汉阴等地。十四曰特别续亲，流行于浙江的泰邑等地。以上俗称，当然不是在每个城镇里都极流行，有的只流行于城镇以外的乡村。这是应特别留意的。

第二，从地域上说，极北的蒙古和极南的海南岛，都存留此俗。派克氏只知道中国的北平、江苏、广东，有兄弟妇婚的习俗，但我们知道有此俗的地方，共有 50 余处。地名如下：

镇巴、合阳、汉阴、定邑、平利、泾原、沁水、闻喜、复县、宜城、蕲水、襄阳、谷城、汉阳、兴山、郧县、竹溪、五峰、竹山、





潜江、恩施、长沙、沅陵、宝庆、石门、慈利、澧县、桃源、临澧、衡阳、石门、贵池、和县、淮安、南昌、赣县、上犹、义乌、浦江、东阳、临海、平湖、泰邑、连江、永安、麻窝、大理、维西、澄江、天莪、琼州。

如果，从民族方面说，世界各地采行收继婚的初民相当普遍，“泰娄在其时所知晓的蛮族部落中，竟发见有三分之二行此俗。”我国汉、满、蒙、回、藏、苗、僮等族，在落后的地区里，多行过此俗，可见此俗分布的宽广性。

四、民国时期若干婚姻习俗

民国时期，各地婚姻习俗虽说有所不同，但结婚成亲程序都较繁复。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民国成立前后，以南京为例，结婚就要经过许多步骤。

1. 男家方面

发草八字：男女两家愿结朱陈者，先将女宅年庚用粗纸书就，由冰人（即媒人）成双交男宅压灶前香炉下，三日内家中平安，





然后持就星家（星相占卜的人）合婚，三日
内倘有碎碗破甑之举，谓之不祥，即托言不
合将草八字退还。

传红：俗谓之下定，男宅婚既合，由双
冰人转致女宅，择日传红，女家用泥金全红
柬，书年庚八字交冰人，送男宅，男宅报以
金银茶果等物，普通为银一锭，金如意一支
（俗称一定如意），果品四色或八色，如龙眼
荔枝栗子蜜枣之类，茶叶数十瓶百瓶不等。

送日子：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
星家谳吉（音邹，在一起商量，谳吉即商订
好日子），必使无冲犯，无刑尅之良辰，以红
全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人
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
子。

行礼：迎娶有期，约早十余日先为行礼，
将所索之衣饰聘金鹅酒靴敬筵席，并有泥金
郡名贴二幅，又有泥金贴二幅，上有红条，
不写只字，同送至女家，请其书允吉登嘉四
字携回，即无改易。

铺嫁妆：喜期前一日，女家将应有之奁
具，丰简视家之有无，使挑夫送之男宅，由





伴娘为之铺设。

求亲：迎娶日午刻，新郎乘舆至岳家，谓之求亲。舆马至岳家门时，必久久于门外，谓之捺性子，门既开，有长班高声赞礼，过一重门，作一长揖，至厅堂，新郎南面，主人北面，两大宾东西面，饮茶三次（三道茶），次至岳母房中小憩，岳母必嘱咐数语，然后以红封藏之胸际，次则至堂行礼，无论长幼平辈均须拜见，临行时平辈又敬以酒（上马杯）始令乘舆。

发轿：约申酉之时发轿，鼓乐齐奏，择年轻四人，手执一灯，随彩舆至女家，谓之迎亲，轿到门时，先放花爆，然后奔至厅堂，予请二妇人为搀亲，手持红烛将新娘扶出，置一鞍子于前使新娘跨之，新人头搭方巾，搀亲者扶新人立正中偏右，新娘立正中偏左，先拜天地，次拜祖先，再次交拜，地下铺红毡，不足则用梢袋，新人步于其上，使二童子执花烛，引新娘入房，若无搀亲者，即用红绿布二方，约长尺许，男女各引一端相牵入房，谓之红绿牵巾。

作富贵：两新人入房由伴娘扶之，盘膝





坐于床头，男东女西，任人调笑不言语约半小时。

合卺：坐床既毕，由厨室开小宴入房，仅设四座，正面两新人，旁坐两搀亲，必以新娘新郎杯中之酒互相倾注，各饮二人以少许。

开脸：次日黎明，两新人即起，伴娘以一瓯莲子羹进，使二人分食之，然后为新娘梳妆绞脸，谓之开脸，妆毕，伴娘引入舅姑及诸长房中请安，新娘不语一言，一切由伴娘代达，谓之闷声大发。

请会亲：第三日谓之三朝，男宅有于此日请会亲，如岳翁妻弟诸人，每有一男丁，必有贴一幅，不计能来不能来也，然岳家辞谢居多，迟日登门视女，使男家出其不意，免厚款待，谓之会亲。

煎豆腐：此即古人三日入厨下之意，先置豆腐厨刀于灶上，新妇至，捲袖露手，一手持刀，一手执豆腐，划开置之釜中，伴娘连作吉语曰：豆腐煎得黄，来年生个状元郎，豆腐煎得跳，新郎坐入轿。

分大小：入厨后，复登堂行家庭礼，俗





谓之分大小，自尊卑以至亲朋，皆受两新人参拜，受参拜毕，各有所赠，谓之见面礼。

2. 女家方面

说媒：俗云一家有女百家求，然必年貌相当，门户相对，方能结婚。说媒者多以妇人说合居多，必先言定聘礼聘金若干，合婚后男女家另择媒人，谓之大宾。

拜主亲：王亲即大宾也，传红有日，女宅先拜主亲，属期盛筵款待，俗云作媒作媒三十六回，一著有不到，嘴巴子垒垒。

回盘：男宅行礼，衣饰聘金到门后，必筹所以回盘者，除翁姑新郎针线外，另回三代：腰带钞带袜带，近今三代，只行三代，谓女家自留一代。

大开门小开门：大开门者舅子之靴帽也，小开门者彩舆至女宅所索之开门钱也。

上头：喜日新娘必镇日眠，及彩轿到门催请，然后新娘起身，沐浴更衣桌上燃大烛一对，梳妆穿带，则请年轻有全福之妇人为之，谓之曰上头。妆毕由厨房送饭一碗，就妆台上使新娘食之，极口中之所容，不啖不





咽，复吐出，以红纸包之，一半置于母亲米柜，一半交伴娘带去，置男家米柜。

代嫁饭：出阁有日，诸亲朋争制净洁肴馔，以相馈送，谓之代嫁饭。

三请三邀：男家彩舆来，另有三请三邀帖六付，次第投进，新人上头毕，由父兄抱之上轿，另请少年四人，随轿走送，谓之送亲，半途即回，新人临行时，必纵声大哭，俗谓不哭即不发，彩轿至男宅，入门时，新娘必力仰其首者三，俗云以后可以抬头。

煖位：新人既行，此位必有人严守，不使人坐，谓恐夺秀气，更奇怪的是淋浴上头时要求燃烛不息，位旁并置一脚炉，上烘新人脱下之鞋，谓新人至男家，脚气方好。

元饭：女出阁之第三日，母亲即备糯米饭一磁瓯，鲢鱼两尾，肉饼一盘，送至男家，外具各色针黹多种，分献翁姑尊长，以为赞见之礼，谓之三朝盒。

送夏送冬送灯：此系富而好礼者有之，女出阁后，逢第一夏日，即送婿与女各纱罗之衣，第一冬日即送炭基火盆、手炉等，逢灯节送各式新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上虽说提倡新式婚姻，但是婚姻手续仍得繁杂，一般尚有八项：

请庚

男家向女家介绍，女家如同意，则送庚帖至男家。

探问

探问两家境况及人品，探问不足则继之以卜筮。

定亲

择吉日，男家以首饰、茶叶、果子、礼帖送女家，女家并还由帖及喜糕。

报期

报知结婚时日。

行盘

婚前数十日或一二日，男宅送礼至女宅，女方说定首饰、衣服、礼服及银币等，男方送去后，女方还以新郎礼帽、礼鞋及喜糕。

收奁

结婚前一日，女宅所办的妆奁必须送到男家。

迎娶





新婚夫妇

结婚之日，男用执事花轿或马车等迎新妇。新郎至女宅揖岳，轿至女宅，女宅必索银若干，名曰门包，否则花轿不得入门。轿入门后，新妇服礼服披红纱，阿弟扶上轿，



女哭。

结婚

轿回宅，新郎衣礼服，喜娘引新妇出轿与新郎并立，连新丝长巾，点花烛、奏乐、唱礼，向南北四拜，……最后入洞房。

五、男女婚姻关系上平等地位的确立

1939年，正式实行《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这应该看作在全国范围里男女在法律上第一次实现婚姻生活上地位的基本平等。这部民法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促进了中国历史上旧的婚姻关系的结束。

民法亲属编第972条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这排除了他人干涉，肯定了女子在决定自己婚姻方面的地位。

民法亲属编在第980条中确定了男女的婚龄。“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都不得结婚。”

民法亲属编在985条规定了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否定了传统的媵妾制。

这部民法从根本上肯定了一夫一妻制；由夫妻关系再产生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以及





家属关系。所以在民法亲属编中，妻子有法定的平等地位，夫妻关系也是平等的。

古代的礼法重男轻女，直到清代，关于亲属的立法都本于礼法观念，明代以前法律上的亲属分内亲和外亲。明代以后的法律在内亲和外亲以外增加妻亲。民法亲属编第967、969等条，改为血统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才把古代以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打破。依据民法亲属编第970条规定的计算姻亲等的方法，说明夫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但由于这部法律属于草创，加之制法者本身的限制，这部法律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例如离婚。民法规定，一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重婚者；与人通奸者；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妻虐待公婆或公婆虐待妻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恶意遗弃他方者；有精神病者；生死不明已逾3年者或被判处徒刑），另一方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从条文上看，男女是平等的，可是判例和释例却公然歧视妇女，对妇女离婚的自由进行限制。

此外在有关男女家庭生活的方面也有维护夫权的趋向。妻子和丈夫相较丧失六种权





力。

1. 姓名权。“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

2. 居住权。“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

3. 财产权。婚后应将自己原有的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丈夫对这部分财产有使用，收益权和事实上的处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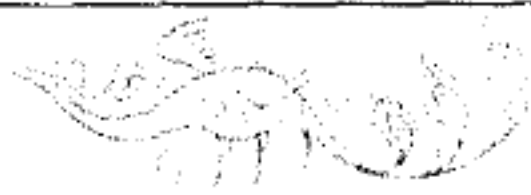
4. 教养子女权。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力和义务，名义上由父母共同行使和负担，但父母意见不一时，由父决定。

5. 女子继承权。民法规定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直系血亲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防止财产权分散、削弱、转移、规定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夫死，由其子继承翁姑遗产，守节妇可代应继承人承受财产，进行管理，但不是继承人，也没有所有权。改嫁妇女更无继承权。

6. 家庭管理权。民法保留了许多旧时代的东西，维护家长制统治。民法规定家设家长，家务由家长管理，子女从父姓。未成年子女，父为法定代理人，子女的特有财产，由父管理。

总之这部民法亲属编是时代的产物，也





是时代思想的反映。它既明确地承认男女平等，又在判例和解释例及其它条款上保留了宗法时代的残余。因此对这部法律应具体分析。

六、民国婚礼大观

嫁娶仪式在民国时期真是丰富多采。其时，除了在城乡各地依然盛行传统的结婚礼仪外，文明婚礼、集团结婚等新式婚礼也在不少城市中出现了。这些婚礼，揉新旧、中西于一体，形成了民国时颇富情趣的婚礼景象。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盛典，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民国时期自然也不例外。当时，虽然中国传统的嫁娶程式，已有不合于社会发展需要之迹象，但是对于习俗的认同，使得城乡各地的不少人，依然运用“六礼”完成结婚这一人生大典。

在水乡城市苏州，民国时仍然沿用传统的婚姻仪式举行婚礼。迎娶之前，首先要进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6道求亲手续，然后才能举行结婚仪式。成婚





民国婚礼摄影

典礼十分热闹。新郎新娘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各个规定动作后，方算完成了使命。由于这种婚礼仪节相当繁琐，两位新人在结婚之日不是在享受人生的快乐，简直是在受罪。然



大婚之后的婉容

而，其时不少婚姻，因为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起作用，子女只是父母所定的婚姻的执行者，所以结婚者也无可奈何。不仅苏州而且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种现象。据《中



溥仪之妾文秀

《华全国风俗志》载，当时的南京、营口、云南等地，结婚都要经过多道程序，有的甚至要历经 23 道手续。



民国期间传统婚礼的新娘装束



民国时的传统婚礼，不仅仪式繁琐，而且嫁奁相当丰富，有的简直达到了奢侈的地步。据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份“奁仪录”载，一个富豪之家为嫁女儿所准备的嫁妆竟达 93 种之多。其中，有时钟、床、桶、盆等日常生活用品，有花瓶、座镜、火水灯、玻璃时花等装饰品，有花软枕、洋毡、锦被、金漆攒合等高档消费品，最后竟然还有两名侍婢。当然，这么多嫁妆，一般小康之家是无力置办的。但即便如此，不少家庭仍要罄家之所有，把婚礼举行得热烈、铺张。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实在无力举行婚礼的人，便通过抢亲免却成婚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在宜兴，因为婚礼“最为繁琐，费亦甚巨”，于是便有了一些无力应付的小户寒家，不得已而采取抢亲这种“野蛮手段”的。

总之，传统婚礼的繁文缛节、迷信以及不切实际的排场，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一致的谴责。文明婚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上了中国婚姻历史的舞台。

民国的文明婚礼，大多在礼堂或大旅社举行。每届婚礼开始，司仪、男女来宾、双





民国时期文明结婚的新娘着婚纱照

方主婚人及亲属、证婚人、介绍人等在乐曲声中依次入席；接着，男女傣相引新郎新娘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证婚人、介绍人、



民国时期新娘夫妇，男子十字披红，胸佩红花；女子身着花衣，头戴凤冠。

新郎新娘依次用印。新郎新娘交换戒指，行礼，相对双双鞠躬。然后，主婚人、证婚人、来宾代表或致词，或赠花，新人则以鞠躬谢证婚人、介绍人及来宾，并致答词。最后，举行新人谒见双方主婚人及全体亲属仪式，并用茶点或筵席款待宾客。由于这种婚礼改

变了一些传统陋习，给举办婚事的人们带来了不少方便，推行不久就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之后，这种婚礼便在各地渐渐流行起来。



民初新婚夫妇，新娘头戴精致漂亮的花冠。

陈望道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1932年10月，他与蔡慕晖在家乡举行的一次破俗的婚



礼曾轰动过整个乡里。这次婚礼，是在蔡慕晖家宽敞的堂屋里进行的。婚礼当天，堂屋布置一新，正中挂着孙中山遗像，两边贴着红纸对联，案上摆着红烛鲜花，衬托出结婚的喜庆气氛。男女双方的贺客都不多，倒是同村闻讯前去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挤满了两厢和天井，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婚礼开始，新郎新娘先对着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接着由证婚人卜文居中宣读结婚证书，并讲了些祝贺的吉利话。之后，学生代表上前献鲜花，并合着风琴唱起了《春天的快乐》。最后，在亲友道贺和蔡慕晖之父蔡济川的答谢声中婚礼结束。

1936年夏，在新疆迪化的西公园里隆重举行着一对青年男女的婚礼。新郎是到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俞秀松，新娘则是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他们两人的婚姻颇有传奇色彩，婚礼也相当新颖别致。在婚礼上，俞秀松先用俄语介绍与盛世同的恋爱经过，并对各方面来祝贺的宾客表示感谢。由于这桩婚事是经斯大林同意的，所以，当时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婚礼。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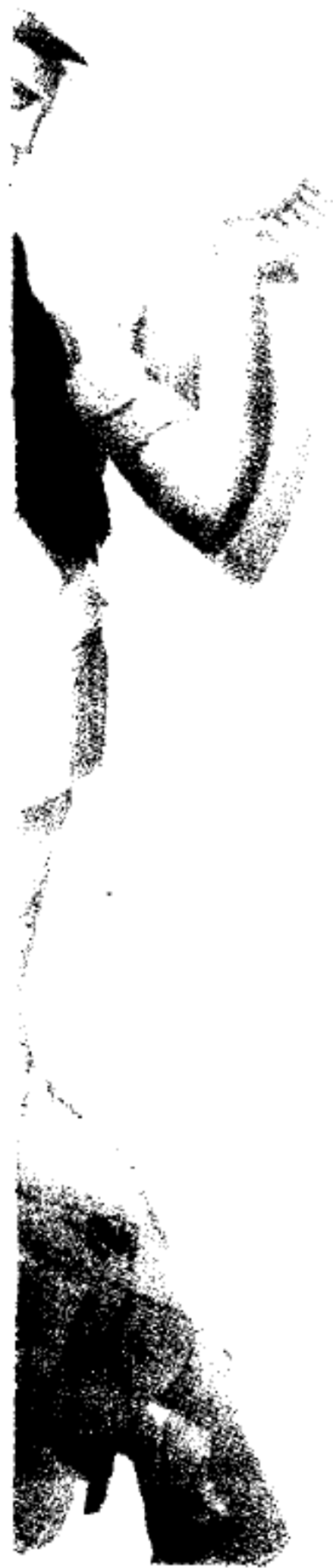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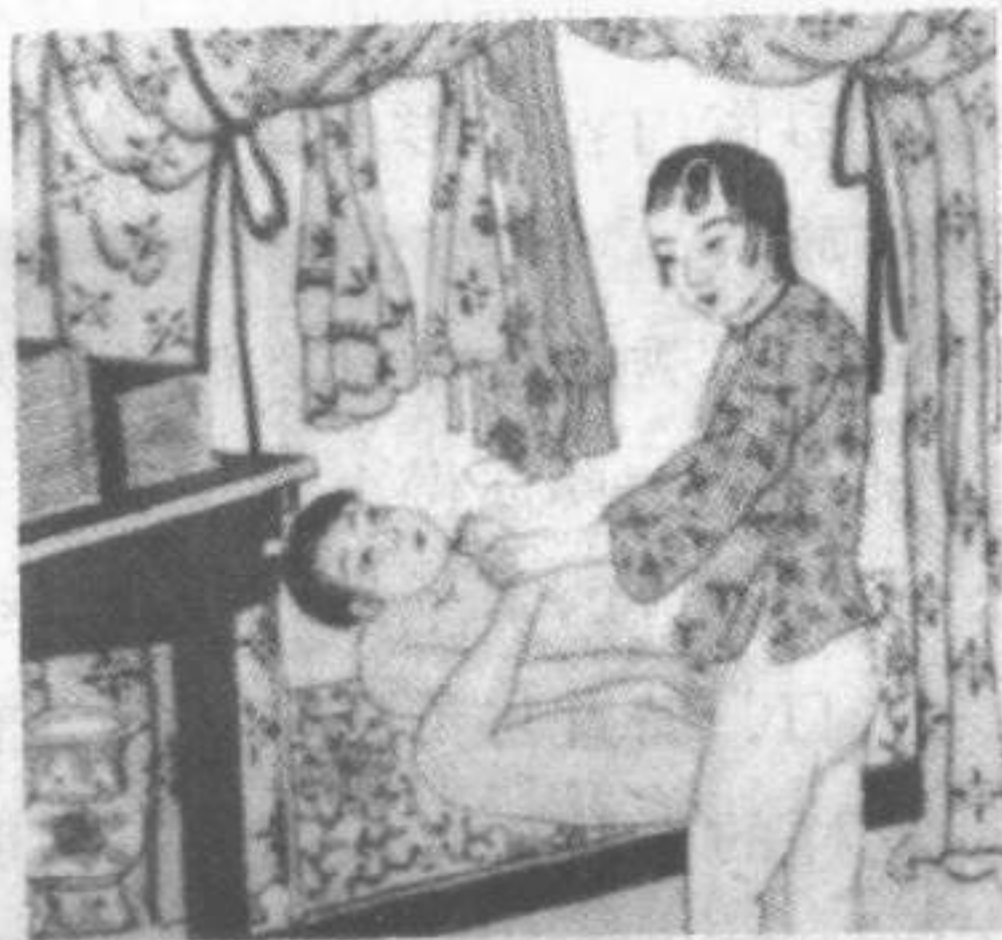


联方面还把结婚场面拍成电影，与其他有关新疆建设、习俗内容的影片辑成一组，在迪化、莫斯科放映。

陈望道、俞秀松的婚礼，淳朴清新，不追求奢华的排场，真称得上是文明婚礼。与此相比，当时各地的不少结婚仪式，徒有文明婚礼之名目，简直与传统的婚礼没有多大的差别。这样的婚礼，竟然也冠以文明婚礼之名，实在是对此的亵渎和玷污。

当时，婚礼的铺张，不仅体现在嫁奁过于考究上，更反映在婚宴的大操大办方面。抗战前的一年深秋，常熟县警察局的侦缉队长为女儿出嫁举办了盛大的婚筵。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在嫁女之前，他就发了不少请贴，邀请亲朋好友捧场。由于宾客甚多，因而包下了城内所有的大旅馆。其时，适逢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来常熟，想开房间，不意旅馆到处挂着“客满”的牌子，便很为纳闷。当他得悉这是由侦缉队长嫁女所引起的时，大为光火。他把县长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还撤掉了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的职务。这样的下场大概是侦缉队长做梦也想不





“嫁妆画”。（民初）古代的一种性教育工具。女儿出嫁前夕，父母以此画置嫁妆中，使女儿带至夫家，于新婚之夜放在床上，模仿而行。





到的吧。

侦缉队长嫁女遭贬，这在民国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为嫁女而大摆酒席，大宴宾客，则绝非个案。正因为这样，早在30年代初，罗敦伟就在《中国之婚姻》一书中指出：“文明结婚的仪式，现在流行很广，似乎得到了社会的赞同。可是被赞同的理由，即是因为它比较旧式婚礼好一点，简单一点。其实也是一样没有意思的，不仅在消极方面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有极大的害处”。

在半新不旧的文明结婚礼仪日渐暴露其弱点之时，一种名为集团结婚的新的婚姻仪式在各地创行起来。

集团结婚最初出现于上海等大都市，以后逐渐推展到桂林、常熟等中小城市。在上海，这种婚礼于20-30年代之交就由商界团体创办了。到1935年为响应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由社会局加以提倡后，它便大规模地在上海推行起来。

1935年4月2日，上海举行了首届集团结婚的新人演习仪式，市长吴铁城亲临并作





新式婚仪

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了”，人们因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甚至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本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翌日，首届集团结婚按时在江湾市府大礼堂正式举行。下午3时，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身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的新娘，随着引导步入礼堂，分成两行。接着，由司仪报



告双方姓名，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新人相对二鞠躬，向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证婚人发给结婚证书，赠授纪念品，并致证婚辞。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在广场上摄影留念。这次婚礼，十分隆重。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不仅出席了婚礼，而且分别担任了证婚人和仪式主持人。至于围观的市民，更是人山人海。他们争着观看的，不光是新郎新娘，更主要的是集体结婚这一中国婚姻史上的创举。当时，中央宣传会电影股，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等影片公司都派员赴沪竞相拍摄婚礼的新闻影片，并以最快速度传递到各大都市放映，使外人一睹这世上少见的婚礼。

在上海首先推出集团结婚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组织了5届这种类型的婚礼，参加者达399对。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内政部于1942年11月1日公布施行《集团结婚办法》，飭属省市政府遵办后，集团结婚的影响更趋扩大。

民国时出现的集团结婚，大多数是由政





府或社会局出面主办的，当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商办形式。在汪伪统治时期，上海就出现过一些商办的集团结婚，主办者往往邀请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作证婚人。及至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成立，商办的集团结婚便趋于完善。1947年11月成立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它由朱彪等发起，吴国桢、吴开先、王晓籁、徐寄庾、潘公展、颜惠庆、杨虎等头面人物赞助。其宗旨称：“本社以最新姿态为国民服务，每月举办联合婚礼若干次，以节省结婚之时间费用，并得在最高尚之礼堂举行最隆重之结婚仪式”，俨然以婚礼改进派自任。但是，他们主办之集团结婚，与民政局等官办的集团结婚一样，确为民国婚姻礼俗的改进开辟了新路。

在结婚仪式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婚礼之前，蒋宋从双方联姻的社会影响考虑，决定举行两种类型的仪式。成婚之日，蒋宋先在西藏路慕尔堂举行基督教式婚礼。本来，宋子文是打算请江长川牧师证婚的。因蒋弃妻再娶，有违基督教义，故为江长川





所拒绝。于是转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兼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证婚。基督教婚仪结束后，双方随即赴富丽堂皇的大华饭店，在这里举行中国式的婚礼。蔡元培主持了这次婚礼，何香凝、谭延闿、吴稚晖等一道作为蒋宋婚姻的介绍人。事后，当时任上海《时报》采访主任的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着这样一段追述：

“蒋宋结婚的……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藏路慕尔堂由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5位之多，记得有谭延闿、吴稚晖、蔡元培、何香凝等人。记得那天，蒋氏穿的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戒指……”





蒋宋的两种婚仪同时举行的做法，在中外历史上也可说是罕有其例。不过，这仅是民国时五彩斑斓的婚礼的一个侧面。当时，还有些有趣的婚礼，与之一道构成了一首婚礼交响乐。

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他非常敬佩、爱慕的女医生杨步伟终成眷属。他们不拘古守旧，结婚仪式既简单而别致。成婚之日，他们只请了胡适和朱徵共进喜庆晚餐。席间，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上名，再请胡、朱两位证婚人也签上名，就算完成了婚礼。据杨步伟介绍，他们本来连这种最简单的手续都不想举行，但后来任叔永提醒他们：出于简朴考虑不办手续，固是好事，但谁能保证不懂事的年轻人不跟着乱学胡闹？为慎重起见，还是请两个证婚人，办一些必不可少的手续吧。于是，他们才找了胡适、朱徵，稍稍从一下俗。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结婚消息与结婚仪式，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他们成婚的次日，《晨报》就用特大标题刊登出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题的文章，介绍他们的婚礼。





一时传为美谈。

民国时有特色的婚礼，为数在所不少，但其中最为奇特的，大概要数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佛式婚礼。

据钱化佛口述、郑逸梅撰写的《三十年来之上海》一书记载，这次佛式婚礼是在上海静安寺太虚法师所设的法苑里进行的。新郎是王明福，安徽太平人，是个经常在上海、汉口间奔走的商人。新娘是祖籍江西的刘德超。王刘两人由于性善好佛，志趣相投，一经旁人撮合，便投缘地共结百年之好。大概是平时好佛的习惯使然，这对善男信女在结合之时，犹不忘菩萨的恩德，因而要别出心裁地举行佛教仪式的婚礼。

婚礼是在木鱼声声、香烟氤氲的佛教氛围中举行的。礼堂里，除了铺着绣有金佛字毯子的供桌和供奉的玉观音像外，还有分别写着“信士王明福”、“信女刘德超”字样的两幅黄缎领帔。在颇为肃穆的鼓磬声中，为王刘证婚的太虚法师宣布婚礼开始。之后，身穿玄色哗叽西装大礼服，左手套着一串念珠的新郎与穿着传统服饰的新娘，在6名身





御浅色袈裟的僧人宣诵的佛号声中行礼如仪，世俗婚礼中的种种仪节被逐一完成。

本来，佛教是把出家修行、摆脱人世的磨难作为到达幸福彼岸的手段的一种宗教。它不像基督教那样介入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不要说为结婚这种在佛教看来是“肉欲”的代名词的举动提供证明了。因而，不管以何种形式为何人举行婚礼，要采用佛教仪式总是令人惊讶万分。但是，太虚法师不是个墨守成规的高僧，他曾积极提倡“新僧运动”。他在自己所开办的法苑中为佛教信徒举行佛式婚礼，正是他所倡导的新僧运动的一次积极实践。

七、民初之袁克文妻妾成群

清朝灭亡之后，做过一段洪宪皇帝的袁世凯，也“多妻妾之奉，生子几十人”。民国初年名噪一时的文人袁克文，就是袁世凯的二公子。据郑逸梅《袁寒云的一生》载：袁克文的生母为韩国贵族。当袁世凯出使韩国，韩王选择贵族之女4人赠予袁世凯，袁克文的生母金氏，即其一。金氏跟随袁世凯30余





年，出了袁克文、袁克良兄弟及叔桢、环桢、琮桢三姊妹。袁世凯有爱妾沈氏，未生子，曾以袁克文为嗣。

袁克文生于朝鲜汉城，5岁时随其母返回中国，6岁开始识字，7岁读经史，10岁习文章，15岁学诗歌，18岁以荫生授清朝法部员外郎。袁世凯自立为洪宪皇帝时，据说袁克文持异议，曾作诗讽阻之，诗云：

乍看微绵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淹孤月，
东去骄风暗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
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尤其诗中最后二句，广为传诵，被视为“反对洪宪帝制而作”，所以在“历史中有位置”。

袁世凯称帝时，传闻将立袁克文为皇储（太子）。袁世凯死后，袁克文橐笔南下，鬻文于海上，与当时的南方文人过从甚密，被





奉为曹子建，时人有诗“风流不作帝王子，更比陈思胜一筹”云云。

袁克文亦如其父多妻妾。他的妻名叫刘姊，字梅真，安徽贵池人，是天津候补道员刘尚文之女。刘姊善于小楷，又工于诗词，著有《倦绣词》行于世。至于侍妾，多得数不清。

当代著名学者袁家骅，即为袁克文之第三子，是其外室花元春所生。外室，是未娶入门的小妾。据说花元春比袁克文年长六七岁，“夫人梅真知道了，大不以为然，所以未能进门，不久病卒。”郑逸梅写道：

克文喜冶游，当初次来沪，彼时袁世凯尚在，他以贵公子身份，遍征北里名花，大事挥霍。乃归，送行的粉黛成群，罗绮夹道。他非常得意，认为胜于潘郎掷果。

此后，又在津沽上海一带，娶了许多侍姬，如无尘、温雪、栖霞、眉云、小桃红、雪里青、苏台春、琴韵楼、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唐志君、于佩文等都是。但这批侍妾不是同时娶的，往往此去彼来，所以克文自己说：“或不甘居妾媵，或不甘处淡泊，或





过纵而不羁，或过骄而无礼，故皆不能永以为好焉。”

姬人中之栖琼，梅真夫人极喜欢她，斥私蓄三千金代为脱籍，常和栖琼出观电影，《寒云日记》中一再提到。另一姬人眉云，于是国十八年冬在天津逝世，克文哭之以联，为侍姬入庙之一人。相处最久的则为唐志君，乃浙江平湖人。克文有《平湖好》、《平湖灯影》、《平湖琐唱》等作，即纪与志君同赴平湖事。志君能文，曾在上海《晶报》上写《陶疯子》、《白骨黄金》、《永寿室笔记》等，由克文润饰，更觉斐然成章。克文和她同居上海若干年。

克文疏懒异常，朝夕偃卧衾中，吞云吐雾，与阿芙蓉结不解缘……见客谈话或撰文，仅欠身欹坐，饮食都由志君悉心侍奉。后志君离去，意为人批命以自贍。有人劝她以袁皇帝之媳妇登报号召，一定生涯鼎盛，可是志君不愿意这样做。后来克文逝世，噩耗传沪，志君听到，亲到《晶报》馆详询情况，且谓将为克文写一小传。

民国十三年（1924年），克文邂逅小莺莺





(真姓名为朱月真)，克文甚为风魔，为撰《莺征记》、《怜渠记》，步林屋为作序。又作《春痕》十首，且以清宫归制玉版笺四楨，画朱丝栏，精楷写赠小莺莺。不久，娶之于北京饭店，辟金屋于鲜鱼口十间屋。某记者有《寒莺佳话》，载于报上。过了若干时期，忽然发生政变，京津间的火车阻阂不通，彼此成为牛郎织女。既而克文别有所欢，与小莺莺无形疏断。这时小莺莺已怀孕数月，旋诞一女，名曰三毛，貌酷似其父，极聪慧。后来，克文颇思小莺莺复还故巢，屡遣人到沪，与小莺莺相商，欲一见三毛，小莺莺应允，正拟携赴天津，与克文重晤，初不料约定日期，而克文遽尔病逝，小莺莺很为伤悼。

于佩文，嘉兴人，最端庄。始终如一。克文初遇时，为撰《携李西施记》，又集句为嵌字联云：“佩玉鸣鸾罢歌舞，文章彪炳光陆离。”佩文能画兰，克文曾题一楨云：“清兮芳兮，纫以为佩；妙手得之，萧然坐对。”





八、民初女权参政运动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兴起了女子参政运动，各地参政组织如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共和会、男女平权维持会、女国民会等也纷纷成立起来。

1912年2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参议院组织编辑委员会拟具草案，2月7日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经过两次起草和三十二天的讨论，至3月8日通过，3月11日由孙中山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参政议院制定约法时，女子参政会曾上书请愿，要求在约法上规定男女平等的条文，当时代表，有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唐群英等20人，《请愿书》说：“……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起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求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





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请于本国人民一语，申明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宣布，以为女子有参政权之证据……”

然而，1912年3月11日参议院公布的临时约法中却没有男女平等的规定，因而引起了女权运动者的不满。3月19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等遂上书孙中山，要求总统依据约法第五十五条提议修正：将第二章“人民”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下“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一语删去，或于“种族、阶级、宗教”之间添入“男女”二字。她们的正当要求，引起了全国的普遍重视，影响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女子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22年，北京中国大学的女生联合其他专门学校的女生，发起了第二次参政运动。她们要求同男子一样平等地享受宪法上规定的权利；依照男女平等的原则修正民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继承权等；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刑法中加入“同意年龄”和男子“纳妾以重婚罪论”的条文；制定保





护女工法等，也有相当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的婚姻制度，概以男尊女卑为基础，要求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清规戒律。民初女权参政运动争取男女平等，虽然并非针对社会婚姻制度，然而男女平等的观念一经成立，就将要求改进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从而构成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

九、刊物著述对封建伦理、封建婚姻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民国期间，尤其“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学术著作和期刊杂志对于中国的封建伦理、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开展了有力的批判。

《新青年》是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起来的著名刊物。原名《青年杂志》，从第二年起更名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编辑部移至北京。《新青年》先后联系了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周作人、刘半农等许多进步、著名的知识分子，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对传统的





婚姻观念持否定的态度，在近代婚姻生活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新青年》一卷五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九一六年》的论文，号召妇女不要甘心委身于人，受别人的支配和摆布，应该尊重自己把自己也看作一个人。他说：“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他说：要“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自负为1916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浹髓沦肌之奇耻大辱。”要“尊重个人独立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916年在《新青年》二卷三号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二卷四号中又刊载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进一步向封建伦理开战，他说：“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





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阊’，‘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耻。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为之妇女，身体精神具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新青年》四卷五号刊登了周作人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贞操论》，认为贞操不是道德。与谢野晶子说道：“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因为它是趣味、信仰或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人之能绝对爱他的贞操，并不是受什么道德制裁的，乃完全出于其自发，和他爱艺术爱学问一样。她又把贞操比之于财富，在自己有它时，原是极好，但是别人，或有或无都没关系。”这篇译文，冲击





了两千年来封建伦理的旧观念，影响很大。

1919年5月2日，《新青年》六卷五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他认为封建婚姻陋习的革除和妇女的彻底解放，只有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才能解决。他无情地揭露“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借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等背理的情况以后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

1917年吴虞（以妻子吴曾兰的名义）著文“女权手议”，批判了夫为天，妻为地的不





合理性，他说：“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同年严恩椿（家庭进化论）说，中国家庭的缺点有：祭祖、同居、早婚、婚姻不自主、立长与重后系、守节。这些缺点“一旦不适于今日之时势也，二曰束缚家人之自由也，三曰阻止社会之进步也。”

胡适在《论贞操问题》一文中说道：封建的贞操论是“一偏的贞操论”，是“男子专制的贞操论”，因而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他认为“自觉的真一的异性恋爱”应是婚姻的基础，只有“以异性的恋爱为主要元素”的夫妇关系，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

1919年10月李达发表了《女子解放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男尊女卑的由来，他说：“我敢武断说，中国数千年只有买卖婚姻，掠夺婚姻，惨无人道的东西。若是明买明卖，或是强奸抢掠人家的女子为妻的，表





面上还可说他不合圣人之道，加他种种罪名，其实什么纳采问名，三茶六礼，也是一种彰明较著的买卖结婚”，“婚姻的结合，由两边父母主持，一个是买主，一个是卖主，彼此交换条件议好的时候，这桩就算成了。好像买牛买马似的，……买到手，卖脱手，就算了却心愿。那一时当事的主人喜恶爱憎与否，只当作马耳东风，还勉强地下命道：这是你的夫，那是你的妻，生生死死，是不问好了。若有自鸣不平的，父母便骂他忤逆不孝，紊乱纲常”。他说：封建家庭“简直是牢狱，是桎梏。家庭的悲剧，罄竹难书”。他认为“恋爱是男女结婚的中心要素，夫妇间若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爱尽交疏，理之当然”。

1918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者在社会学调查中，普遍把婚姻家庭调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发表了数十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有关婚姻家庭的专著也屡屡问世，都对封建主义不合理的道德伦理和婚姻家庭制度作了揭露和批判。





十、婚姻管理

1. 妇女解放和婚姻的早期规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用文字形式对男女平等原则做出的纲领性宣言。接着，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重视妇女的自身解放，宣布要组织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对上述决议案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在法律与行政两方面实行以下一些事项：

1. 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2. 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
3. 严禁买卖人口，保护女性和儿童；
4. 反对多妻制和童养媳制；
5. 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对再婚的妇女不得蔑视；
6. 反对司法机关对男女的不平等判决；
7. 根据同工同酬，保护女性及童工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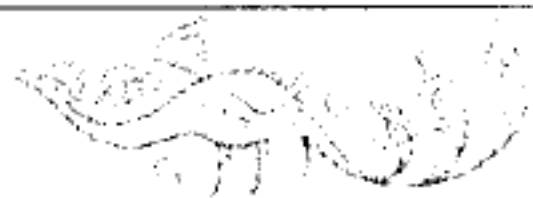
则，制定妇女劳动法。

大会以后，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专门向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高等审检厅发布命令，指示在未制定颁布男女平等法律以前，有关妇女问题，应根据上述决议案法律方面的原则进行裁判。

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决议，1927年2月并专门发布了有关妇女继承权问题的文告，指出：“财产继承权应以亲生子女及夫妇为限。如无应继之人，及生前所立合法之遗嘱，所有财产收归国有，为普遍教育之用。但在死者生前确系直接受其抚养者，得按其生计状况酌给财产。”

上述各项原则，体现了男女在法律上地位平等的精神。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动荡和当权者也不认真贯彻执行，以致没有起到解放妇女的应有作用。





2. 民国期间妇女、婚姻的立法

(1)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令示》

1912年3月11日《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饰各省劝禁缠足文》如下：

缠足之俗，由来殆不可考。起于一二好尚之偏，终致滔滔莫易之烈，恶习流传，万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踟蹰，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仆难数。曩者仁人志士尝有天足会之设，开通者已见解除，固陋者尤执成见，当时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饰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同年3月22日《内务部咨各省都督禁止缠足文》谓：“查缠足之风，前清亦有禁令，惟奉行不力，徒具虚文，或立法太严，难收





实效。今民国成立，此等恶俗，断难容其再存。然积习已深，革除非易，操之太促，既恐难于推行，持之不严，又恐流于玩忽。劝谕之方法，惩罚之重轻，必使闾阎无骚动之忧，草野有风行之象。或加入演说团，剴切开导，或另设天足会，实力引放。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除分咨外，合先咨贵部督，遵照大总统令文，迅即按照地方情形，妥拟劝禁方法，剋日施行，毋稍延缓，以收速效而换恶风。”

(2) 北洋政府的婚姻立法

北洋军阀时期婚姻立法仍沿用清代现行律，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律》是在修改原有的大清律例的基础上制定的，封建性十分浓厚，从婚姻家庭的规定来看，许多条款无异是唐、宋、明、清各律的翻版。这一法律中的婚姻家庭部分和其他有关民事部分，在清朝覆灭后一个很长时期内仍被援用，称为民事有效部分。

①男女婚姻





“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并行禁止。”

“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并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

②居丧嫁娶

“孀居自愿改嫁由夫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夫家无祖父母、父母但有余亲即由母家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母家亦无祖父母、父母，仍由夫家余亲主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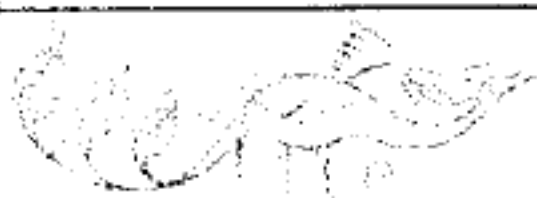
③立嫡子违法

“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若立嗣之后，却生子，其家产与原立子均分。”

“妇人亡夫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凡乞养异姓子有情愿归宗者，不许将分得财产携回本宗。其收养三岁以下遗弃之小儿，仍依律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





嗣。仍酌分给财产，俱不必勒令归宗。”

④卑幼私擅用财

“嫡庶子男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所生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作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继全分。”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友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

⑤出妻

“妻犯七出之状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辄绝。犯奸者不在此限。”

“约期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3)《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

国民政府法制局曾于1928年起草过《亲属法草案》82条，但并未公布。立法院成立后，开始进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其中以亲属为民法的第四编。国民党政府于1930年12月6日公布，自1931年5月5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





民法的亲属编计有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扶养、家、亲属会议等7章，共171条。这部民法亲属编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对结束中国历史上旧的婚姻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婚姻家庭中的重要事项都作了规定，如：

(1) 关于婚约：第972条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

(2) 关于婚龄：第980条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

(3) 关于重婚：第985条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在肯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的媵妾制。

(4) 关于近亲结婚：第983条规定“与下列亲属不得结婚：直系亲血及直系姻亲；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亲在八亲等之外，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外者不在此限；旁系血亲之辈分相同而在八亲等以内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

(5) 改变了与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有关亲属的立法，历史上一向本于礼法观念，明代以前法律上的亲属分内亲和外亲，清以





后又增加了妻亲，民法亲属编第 967、969 等条，改作以血统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打破了传统上的宗法体系。依据第 970 条规定，“血亲之配偶从其配偶之亲系及亲等”，“配偶之血亲从其与配偶之亲系及亲等”，“配偶之血亲之配偶从其与配偶之亲系及亲等”，则夫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6) 关于离婚问题，除了“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外，第 1052 条还规定：“夫妻之一方以他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限得向法院请求离婚。”即“重婚者”；“与人通奸者”；“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者”；“妻对于夫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有不治之恶疾者”；“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然而，民法亲属编具的严重的缺欠，主要是它继续肯定和保护封建包办婚姻。亲属编的许多规定，是在过去民律草案的基础上





修订的，如：第 981 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同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子女的婚事“同意权”来代替旧法律中父母家长对子女的“主婚权”，这就在流行着早婚习俗的旧中国承袭和肯定了包办婚姻的合法性；第 982 条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证人实际上多是媒人，可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是绝对必须遵从的。

民法亲属编极力保护男尊女卑的夫权缺席和以父权为中心的家长统治。在姓名权方面规定“妻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在居住权方面规定“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在财产权方面规定“共同财产由夫管理”，“由妻之原有财产所产生之孳息，其所有权归属于夫”，“夫对于妻之原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在家庭管理权方面规定，“家务由家长管理”，“子女之特有财产，由父管理”，“未成年子女，父为法定代理人”；在女子继承权方面规定，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直系血亲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夫死，由其子继承翁姑遗产，守节妇可代应继承人





承受财产，进行管理，但不是继承人，也没有所有权。改嫁妇女更无继承权。

民法亲属编还用一些空洞的词句掩饰现实，使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继续存在。它高唱男女平等，但对已婚妇女的权利却加以限制；在一夫一妻的规定下，却又说什么“妾之问题，无庸规定”，“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其存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国民党政府司法院第647号解释竟公然胡说：“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

十一、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鉴于当时婚爱状况的落后、反动和腐朽，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对婚姻、家庭和妇女等问题进行讨论。这类讨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人物首推陈独秀和李大钊，其次有鲁迅、周作人、胡适、毛泽东等人。

陈独秀（1880年—1942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早年曾留学日本，





1915年，主编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化，倡导民主和科学。他早期是反封建、反军阀、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急进民主主义者。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社会主义。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在文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被选为共产党总书记。他在《新青年》创办之日，便将妇女解放的问题提出来。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说：“夫人妻纲，则妻子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在尊孔的高峰中，他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批





判孔孟之道、封建伦常。

《新青年》二卷四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李大钊（1889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成立以后，负责北方党的工作。国共合作期间，他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他是首先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国际妇女解放运动及工人运动联系起来的人，他说：“俄国……由极端之专制主义，





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本国内之工人与子女，其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亦日益加高。”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他还认为，妇女不解放是“半身不遂”，他说：“我很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他还认真分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原因，并同西方观念作了对比。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女子恒视男子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风，而成贱女尊男之习”，而西方社会“女子恒视男子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制，而严尊重女性之德”，并把“对妇人之轻侮”看成东洋文明的弊端之一，给予贬斥。

鲁迅（1881年—1936年），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平生最痛恨吃人的礼教。他的杂文集《坟》中就有《我之节烈





观》、《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等文章，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如，《热风·四十》：“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起痛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一问节烈是否道德？”“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经过论证，他认为，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造成的“畸形道德”，这种畸形道德在当时还“日见精密苛酷”。

周作人（1885年—1968年），中国现代学者，散文家，鲁迅之弟。他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期发表《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反对旧礼教。特别是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一篇他的译作，日本妇女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文章认为贞操不是道德，“我对于贞操，不当它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这篇译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对2000年来形成的旧贞操观是一





次冲击和震荡。

胡适（1891年—1962年），中国现代学者，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先后发表《贞操问题》、《我之贞节观》、《易卜生主义》等文章，对寡妇再嫁、烈妇殉夫、贞女烈妇、男女平等、争取女权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看法。他的文章不十分激烈，注重情和理的分析，以利读者平和地接受他的观点。1919年，他写了《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主张教育改革，招女大学生，提出了三个办法：1. 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2. 先收女子旁听；3. 应研究现行女子学制。胡适在婚爱问题上同他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胡适对自己的婚姻采取保守而重情的态度，十分严肃。他在1917年底同农村小脚妇女江冬秀结婚，婚礼是现代文明结婚的形式。胡适是奉母命而同江冬秀完婚的。江氏在过门之前，就常





到胡家，照顾胡母如亲母一样。结婚仪式上，胡适发表改革旧礼教的演讲，语惊四座，这在当时的安徽农村来说，称得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个洋博士，一个农村旧式妇女，居然始终相爱，至死不渝。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早在五四时期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婚姻家庭、妇女解放等问题方面，发表了10多篇文章。1919年10月，周南女校学生主办了周刊《女界钟》，毛泽东积极支持，并写文章在上面发表。湖南长沙“赵五贞事件”（见下文）发生后，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上接连发表10余篇文章，专论妇女解放问题。他说：“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的。”他还说：“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的，但是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第二年，毛泽东在《婚姻上的迷信





问题》一文中，提出要根绝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婚仪，并说：“最要紧的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有关婚姻、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大宣传，虽然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但由于读者面，读者对象的限制，在社会上影响还不广泛。广大的中国妇女，甚至包括在校的女学生，仍然在受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束缚。许多女校在《修身》课中，大放封建毒素，如“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整个看来，中国社会上，妇女依然处于受压迫的悲惨地位。

1919年11月14日，湖南省会长沙的大街上，一乘迎亲花轿引起了路人的注目，花轿快到男家时，轿内渗出一滴滴鲜血来。轿到男家，女宾迎妇出轿时，新娘“血满衣襟，昏倚轿侧。轿底有新剃刀一柄，侵血泊中”。





新娘“喉管有一伤口，宽寸余，血流不止。”送至医院，抢救已来不及，“随即丧命”。这就是赵五贞自杀惨案。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湖南全省和全国。关于赵五贞自杀原因，其说不一：1. 新郎貌丑，而为赵五贞所闻；2. 先前曾许配了人家，赵家父母嫌女婿贫穷而悔婚，改配吴家，赵五贞不愿；3. 新娘年龄20岁，新郎已40余，新娘不愿，而父母听说男方聘礼多，强迫女儿出嫁。新娘一再表示不愿，未引起两家重视。当天新娘早起不肯化妆，父亲还打了她两个耳光，新娘不得不上轿；4. 新郎年大貌丑，又因骗人财物而关在监狱里，不知何时出狱；5. 婆婆太凶恶，上一年曾将二儿媳折磨凌辱至死。

此事过后不久，长沙《大公报》又报道了一位因婚姻不满而出走的名叫李欣淑的女子。李幼年时，父亲就为她定了亲，后来未婚夫去世，父母准备叫她遵照封建礼教，守“望门寡”，后又从经济问题考虑，让她改配有钱人家彭氏。李欣淑曾经在女校念过书，不满这种包办婚姻，因而反抗出走，到北京工读。她写下慷慨激昂的启事，说：“我于今





决计尊重我个人的性格，积极的和环境奋斗，向光明的人生大路前进。”

当时，北京也发生了一件女高师学生死亡的事件，被看作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李超，女，广西人，父母双亡，家中除了三姐妹以外，还有一个父妾。李家有一堂兄招来继承遗产，视为亲兄，这是当时风俗规定的，因女子无法继承家产。堂兄堂嫂继承了叔父的家产以后，视李超为眼中钉，不愿让她继续念书，想尽快将她嫁出去。李超先在梧州、广州的女子师范读书，后入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因病住院，其兄嫂又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还写信令她姐夫也不许给他接济。李超因而贫病交加，于那年8月死亡。李超的死亡引起社会震惊，人们开始思考女子的财产继承权和受教育权等问题。同年11月30日下午，在女子高师召开李超追悼会，到会男女1000余人，会场坐得满满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学者名流都亲自到会，并送了挽联，发表了演讲，胡适还写了《李超传》在会上散发。邓中夏专门报道了追悼会的情况。





五四运动中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明当时礼教猖狂到什么程度。许德珩当时在北京大学当学生，他被派到北京女子高师串联，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联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学生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我们坐在这一头，女同学都坐在那一头，中间坐着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这就是当时男女学生间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北京女子高师的学生没能参加五月四日当天的游行。

五四前后，既是封建礼教猖獗一时的时期，也是中国妇女勇敢斗争的时期。

“五四那天晚上，当女高师学生得知男学生被捕，也不顾学校的禁止，一齐冲出学校，到监狱外边示威，要同男同学一起坐牢并参加斗争活动，这是破天荒的大事”。5月7日，协和女医校、协和女子大学等10多所女校代表，在哈德门（即今崇文门）杨玉涛女士家开会，发出通电、通告。通告说：“呜呼！我





中国女子，遂无生气乎？何数日之吞声缄口寂然无闻也。……则我辈女子，实属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所冀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惠然肯来，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向政府陈告力争，保我领土。勿甘雌伏之机，共奋雄飞之志。我二万万女同胞，果尚有心肝血气乎，吾辈将于此觐之！北京女校全体学生涕泣谨告。”6月3日，北洋政府逮捕学生1000余人，女高师学生联合了15所女校，于第二天结集600人，在天安门聚集，整队到总统府，求见徐世昌，徐派秘书二人接见，女生代表5人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男学生，不准干涉学生的演讲，等等。女高师学生在那天冲出校门的时候，校方还软硬兼施，并把校门锁上，要学生们不要“伤风败俗”、“不守本分”。学生们抛砖投石，连门带锁一起推倒，飞快跑向天安门，学校赶紧派学监追赶，但没追上。这次游行，除一个学监的女儿没参加外，全体同学都参加了。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首先响应，在郭隆真等同学呼吁下，5月5日、6日先后开会，筹备成立天津女界爱国





同志会，5月25日该会正式成立。女学生、女教师乃至家庭妇女均可参加，会员达600多人，上有60多岁的老太太，下有十三四岁的小学生。选举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邓颖超、郭隆真、张若名等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演讲队长。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征招会员启事中指出：“盖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际兹危亟之秋，焉有袖手之举？我女界亦国民分子，岂能不尽其卫国责任？纵使起舞无剑，何难味旦司鸡？此爱国同志会所以思唤醒我无量数无知识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国家责任也。直以自励其身，兼以教其子女，苟能普及全国，人人数是，则异日者或不致再蒙今日之强权欺凌，不致再现今日之卖国孽种，而爱国同志之天职于以尽矣！”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长沙，5月7日，在毛泽东倡议下，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南女校周敦祥、劳君展、魏璧（当时称为“周南三杰”），还有蚕桑学校的李思安等女学生，积极参加运动。向警予当时在偏僻的家乡湖南溆浦当教师，她冒着烈日带领学生在街头





向群众作宣传。

上海女学生也行动起来，并迅速影响到上海各界妇女。女工们亦不甘落后，多次粉碎资本家分化男女工人的阴谋。爱国之风，甚至波及到社会最下层的妇女，连歌女、妓女亦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上海西福致里妓女妙莲，以 50 元捐助国民大会，会后又登出《警告曹、章、陆三卖国贼》，印发《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到上海各大小妓院，号召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她们还成立了“青楼救国团”，发出传单：“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不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下署名为“青楼救国团泣书”。妓女们还自动设学生休息处、学生饮茶处，在这些处所贴上告白：“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备簞食壶浆，为君充饥解热。并非沽誉钓名，不过稍尽棉力。妓界泣告。”当时，上海各妓院门前均贴有长约八九寸、宽两寸的小标语，上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不





管是否嫖客，看到这种小标语的人，无不触目惊心。

上述情况，在中国娼妓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甚至在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四川省，也引起震动。巴金在《觉醒与活动》一文中谈到：“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受五四风潮影响，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去辫子，引起社会轰动。当时，在四川省会成都，《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加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等，进步书籍相当多，很受群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五四运动，对中国婚爱状况影响很大，当时，在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男女爱情方面，出现了一些动人的事迹。

向警予（1895年—1928年），当时在溆浦县立女校当校长，五四运动后不久，驻扎在溆浦县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要娶她为妻，向警予的后母也逼她去作“将





军夫人”。向警予只身闯入周公馆，当面向周则范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令周无计可施。后来，向警予随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二人在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由恋爱，在法国成婚。结婚那天，二人坐在一起，面前摆了一本《资本论》，二人合照一张结婚相作为纪念，一时传为佳话。

天津学生运动女领袖之一郭隆真，反对包办婚姻十分著名。幼年时，家里将她许给一家财主，她坚决反对，为躲婚，长期住校，连假期也不回家。1917年暑假，家里以“母病危”骗她回家完婚，“她以崭新的姿态进行斗争。出嫁那天，她穿了一套学生装，坐花轿时，一路上卷起轿帘，到了男家，下轿不用人扶，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向新郎和客人们发表演讲，揭露封建婚姻葬送青年幸福的罪恶，宣传自由婚姻的好处，然后理直气壮离开男家，坐船到天津上学去了”。

五四前后的各种妇女解放思潮，大致不外三种：1.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即争取参政权，教育权等等以达到男女平等，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在妇女、婚爱问





题上的具体体现；2.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女权运动，主张废除婚姻、消灭家庭，是一种个人的绝对自由主义在妇女婚爱问题上的反映；3. 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妇女解放同共产主义运动、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以上三个方面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影响不大，体现在婚爱问题上，只是个别的一些过激、过头的作法，武汉昙花一现的妇女裸体游行，当属此类，故不必多论及。

陶行知先生 1922 年发表《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占领地位之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上面提供了一些数据。

山西省 1920 年 8 月统计，学生总数 645148 人，女生为 80583 人，占总数的 12.5%，这比民国初年女子所占仅百分之四点几，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南京市 1920 年统计：

私塾：学生总数 12556；女生 1651，占 13%

幼稚园：总数 77，女童 39，占 51%

初小：学生总数 7413，女生 2398，占





32%

高小：学生总数 3796，女生 710，占 19%

中学：学生总数 4268，女生 652，占 15%

大学：学生总数 1121，女生 97，占 9%

陶行知说：“中国受过教育和现受教育的
女子，总不下五十万人。”中国女子教育的进
步，不能算不快。”

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1922 年，全国
高等学校女生总数（教会学校未计）为 665
人。具体分析如下：

北 京 大 学	11 人
北京师范大学	15 人
北京政法大学	7 人
北京农业大学	4 人
北京女子高师	236 人
北京工业专门	8 人
北京医学专门	14 人
北京美术专门	30 人
南京东南大学	44 人
上海商科大学	13 人
武昌高等师范	19 人
广东高等师范	13 人





(以上为国立大学)

天津河北大学	13 人
福建厦门大学	4 人
武昌外国语专	7 人
广东法政专门	13 人
云南东陆大学	8 人

(以上为省立大学)

北京中国大学	14 人
北京平民大学	12 人
北京新华大学	4 人
北京新华商专	9 人
天津南开大学	23 人
上海南方大学	4 人
上海美术专门	52 人
上海中国公学	3 人
江西豫章法专	6 人
武昌中华大学	34 人
长沙自修大学	3 人
长沙达才法专	3 人
长沙群治法专	12 人
广州岭南大学	27 人

(以上为私立大学)





这些教育上些许的进步都是五四运动带来的。历史上大学开女禁，最先就出现在五四运动的当年，即 1919 年暑假。蔡元培《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说》：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

那年，有王兰、奚贞、邓春兰三位女子，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既然校长蔡元培说不存在开不开禁的问题，她们当然可以入学。但当时考期已过，只能允许她们旁听，那一年一年就收了 9 位女生。一般人认为这就是我国大学教育第一次开女禁。但陈独秀认为是上海大同学院首先实行的，只不过北京大学收女生是经教育部许可的。他在《男女同校与议员》一文中说：“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





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上海大同学院是首先实行的了，北京大学收容女生，就是腐败的教育部也居然许可了。”

五四运动，还导致了职业妇女的产生。女工在工厂做工，在中国早就有了，但男子学校容纳女教师，则是五四以后才开始的，不久，教师章成为女子最普遍的职业。当时这种情况对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一定的好处。但这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即妇女们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家庭的痛苦枷锁，一方面又成了工资的奴隶。在那种情况下，不少女性为了职业和事业终身不嫁，或者退回家庭去当贤妻良母，舍弃职业。她们处于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之中。

妇女从事工作，妇女受教育，妇女运动的开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提出了一定的任务。

1921年1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发表讲演《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他说：“女子们除了政府、资本家压迫之外，更要受男子压迫。”他说他的讲演不单是讲男女问题，而是讲人类问题，“人类是不





应压迫人家和受人家压迫的”。将妇女解放问题与中国革命、人类革命问题结合起来。当月29日，他又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发表题为《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的讲演。他说：“女子问题，近来研究的人很多，但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所以我今日提出来讲讲，想于没有系统之中，找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呢？他说：“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讨论女子问题，首先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因社会制度造成了许多不平等的制度，因社会造成个人不平等、不独立，然后才有社会主义发生。讨论这点，妇女问题，自然是连带发生了。”最后，他“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同年的3月8日，为纪念国际妇女节，他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观》一文，他说：“我并且相信中国的革命胜利，妇女解放运动必能得着很快的发展；可是一向被轻视的妇女们，切不可一刻忘了自身的妇女运动。……更进一步说，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这篇文章最后，他号召道：“被轻视的





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参加革命，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

1922年1月，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指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年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从那以后，就开始领导着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解放运动同中国的革命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当年，中国共产党就帮助在上海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实行改组，公布《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运动。”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底群众运动。”“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

1922年7月，在杭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专门的《关





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跳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担任中央妇女工作。“三大”、“四大”均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主编《妇女周报》。她发表多篇文章，起草许多文件，为妇女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她认为，中国妇女“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一法”。“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新局面正式形成。随后，全国许多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斗争矛头一致





对准北洋军阀。这一大好革命形势有益于妇女解放运动。

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规定要组织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注意妇女的自身解放。此外，还特别提出在法律与行政两方面实行以下基本原则：

- 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 二、规定女子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 三、严禁买卖人口，保护女性和儿童。

四、反对多妻制和童养媳。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对再婚的妇女不得蔑视，反对司法机关对男女不平等的判决。

五、根据同工同酬、保护女性及儿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

这以后，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专门向当时广州政府能控制的广东、广西、





湖南各省高等审检厅发布命令，要求各省在未制定并颁布男女平等的法律以前，关于妇女问题的纠纷和案件，应根据《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法律方面的原则进行裁决和审判。所以，它已具有法律性质了。

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第16次会议决议，专门发布了有关继承权的文告：“财产继承权应以亲生子女及夫妇为限。”子女中，女子的地位同男子相同。

这些原则，在当时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但是，五四运动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没有广大的其他行业的人民参加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没有参加进来；它的影响只限于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偏僻地区、中小城市，影响则小得多，广大农村则几乎毫无动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谈到五四运动的弱点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





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①。

五四运动的局限性，国共合作当中一些消极因素，亦影响到五四以后婚爱状况。

首先是女子参政运动的鼓吹及消亡。1922年暑假中，北京中国大学女生万璞，法政专门学校的女生周桓、石淑卿等，联合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发起参政运动。7月25日在法政专门学校开筹备会，意见不合，分流为两个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的主张是：1. 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2. 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3. 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女权运动同盟会的主张是：1. 全国教育机关一概为妇女开放；2. 女子与男子平等的享有宪法上人民应享的权利；3. 司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财产权、行为权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4. 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5. 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龄”及“纳妾者以重婚罪论”的规定；6. 禁止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娼，禁止买卖婢女，禁止妇女缠足；7. 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①这次女子参政运动同辛亥革命后的女子参政运动一样，以失败而告终。的确，妇女解放运动如果不同民族的解放斗争、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是不会获得胜利的。

尽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两次冲击，但封建礼教根基已深，袁世凯等人复辟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总要祭起封建礼教、孔孟之道的大旗，中国广大妇女，特别是交通闭塞地区的妇女，仍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深渊之中。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明德讲义》中说：“孔子圣德，师表万世，昭垂千古。”

皖系军阀首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在《二感篇·内感集》中说：“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圣王圣人仁爱渊博，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大凡治国之道，纲纪为先。”

封建礼教甚嚣尘上，广大妇女并没有在

^① 见王世杰：《女子参政之研究》，北大出版部。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得到解放。

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7日，《民国日报》曾载有如下一则新闻：

九江日前江水激流中，突由上流漂来一方木板，上面有人。义渡局急放救生船上前捞救，近视之，则板上仰卧一活着的少年妇人。上半截裸体，下半截仅穿一单裤，手足被人用铁钉钉住，不能伸缩。两腿间放一男子之头，鲜血模糊，并树一木标，上书“救者男盗妇娼”字样。救生船见其情形奇怪，遂置不理。该妇人叫曰：“请你们将我之板翻转，俾得速死。”驾救生船者亦不加询问，遂将船驶回，而以所见情形告人。众谓此必奸杀案，但也应捞起以告官厅，从严追究。后以该木板顺流而下，救之不及，不知到底流于何处。

类似这样野蛮残忍的事当时不知有多少，只不过见诸报端的不一定太多，即以此例，如果不用漂流的办法，又有谁能知道呢？

陈独秀在1921年《我的妇女解放观》一文中说：“……以至到现今二十多年，缠足恶俗还未大改，不但乡村中仍然是很普遍的，





即大都市还未绝迹。听说甘肃、陕西缠足恶俗更是厉害，脚小的妇女竟至终日膝行，并且市上竟有出卖膝行器具的店铺，因脚小而膝行者之多，于此可见了。江浙妇女好着紧身小马甲，为害肺部也非浅鲜。”

现代文学作品，对封建礼教“吃人”、残害妇女的情况揭露得十分形象和深刻。鲁迅的《祝福》写了一个朴质、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祥林嫂被封建迷信、封建礼教、自然灾害多重折磨致死的过程，而这三者中，封建礼教对她的精神折磨最大。鲁迅的《伤逝》则反映出，青年男女反叛封建社会是值得歌颂的，但这样单独地冲出家庭牢笼，也不可能打碎整个封建统治思想，只有“在无爱的人间死灭”。《离婚》中的爱姑是以反叛精神著称的农村妇女，但在当时的黑暗礼教的氛围之中，她只能失败。祥林嫂、子君、爱姑的死亡和失败，正是中国广大妇女在那一时代悲惨境地的缩影。

当时，有些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思想、西方文化中积极进步的一些东西，有的外国人也到中国宣传进步、科学的思想，但这些





东西在同顽固的中国封建势力的较量中，往往失败，或者起不到多少作用。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刘海粟校长在中国第一次用人体模特儿，这本是美术教学方面正常而又必须的事，却遭到社会上下攻击，上海县知事斥之为“不良科学”，要予以禁止。军阀孙传芳直斥刘海粟“不顾清议、罔失礼教”。弄得大美术家刘海粟心力交瘁，无法说清。

美国提倡计划生育的女专家山额（今译作“桑格”）夫人于1922年7月到北京，应北京大学请求，作《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讲演（产儿制限，即计划生育），胡适作为翻译。听讲者十分拥挤，讲稿传出后，影响更大，北京、上海先后成立了研究计划生育的团体。但在“无后为大”的宗法观念下，在“谈性色变”的道学势力下，在污秽淫邪的胡乱套用下，没过多久，就都销声匿迹了。

五四运动那种革命形势之下的婚姻状况尚且如此，可见中国的封建礼教之强大。不将政治制度作根本变革，中国的妇女是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的。





十二、国民党统治区婚爱状况

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再分为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三个阶段。从区域来看，国民党的统治从来没有完全控制全国。所以，这一时期的婚爱状况又分成两个部分来论述，先谈国民党统治区的婚爱状况。

国民党政府在 1930 年公布了《民法》，在《民法》的《亲属编》中，规定男女平等。这对结束中国历史上旧的婚姻关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法·亲属编》972 条曰：“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这一条规定从法律上肯定了男女双方在决定自己的婚姻方面地位是平等的，并排除了他人干涉，对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是一个打击。

980 条：“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都不得结婚。”这里，从下限规定了结婚年龄，虽然限制得较低，但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早婚是有抑制作用的，也从法律上禁止了娃娃亲、童养媳等婚姻恶俗。





985条：“有配偶者不得重婚。”这里，肯定了一夫一妻制，禁止了纳妾恶习。

这部《民法》还规定，由夫妻关系再产生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以及家属关系。妻子有法定的平等地位，夫妻双方关系大体上是平等的。该法967、969等条文，把古代以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改为血统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封建礼法观念被破除一些。从970条规定的计算姻亲亲等的办法看，夫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民法》还比较公正地对待男女离婚的问题。《民法》规定，“一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重婚；与人通奸；受他方不堪同居之虐待；妻虐待公婆或公婆虐待妻致不堪为共同生活；恶意遗弃他方；有精神病；生死不明已逾三年或被判处徒刑），另一方可向法院请求离婚”。

但是，《民法》中亦还有维护夫权、歧视妇女的情况。在以下6种权利中，将妇女置于次要地位：

- (1) 姓名权：“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
- (2) 居住权：“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





(3) 财产权：妻子应将自己原有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丈夫对这部分财产有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4) 继承权：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直系血亲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夫死，由其子继承翁姑遗产，守节妇可代理应继承人承受财产，进行管理，但不是继承人，对财产没有所有权。改嫁妇女更无继承权。

(5) 家庭管理权：家设家长，家务由家长管理。子女从父姓。未成年子女，以父亲为法定代理人。子女的特有财产，由父亲管理。

(6) 教养子女权：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名义上由父母共同行使和负担，但父母意见不一时，由父亲决定。

《民法》还把父母亲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作为未成年人订婚、结婚的必要条件，否则婚约即属无效，婚姻也可以依有同意权人的请求而撤销。由于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同订婚年龄、结婚年龄之间有差距，在当时就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早婚。这些相关条款，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父母、家长包办和干涉未成年人的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

总的看来,《民法·亲属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反映。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利益必然要反映在法律上,当然有关家庭、婚姻的法律也不例外。所以,它既承认男女平等,又在不少条款上保留着封建宗法制的残余。

纵观国统区的婚姻性爱状况,正是封建礼教伦常与西方观念的大杂烩。

1927年,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后不久,蒋介石于8月回到奉化溪口镇老家。9月,去日本拜见宋美龄的母亲,请求与宋美龄结婚。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14岁就成了卫理公会教徒,更名为理查·宋,后又进万德毕尔特大学修神学专业。1886年,他被派回国,在上海当牧师,是中国第一代买办。其三子三女均在美国读书受教育。宋美龄是三女儿,在美国读书达8年之久,三个女儿中,她是最美国化的,连她自己也说,“除了鼻子以外,我哪一点都不像





东方人。”而蒋介石则一直是对孔孟之道、封建礼教感兴趣的人。他向宋美龄求婚，自有他的政治目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地主同大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互相容忍和结合。宋母对婚事提出了条件，要求蒋必须信奉基督教。蒋家世代信佛，但为了谋取婚事成功，他居然答应了信奉基督教。1927年12月1日，蒋、宋婚礼在上海举行，先在宋宅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一次婚礼，接着又在豪华的大华饭店按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又一次婚礼。婚礼花费浩繁，以百万元计。当天，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声称：“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中国传统礼教同西方资产阶级观念居然可以以这种形式反映出来，这也是很奇特很典型的。

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是宋氏三姐妹中大姐宋霭龄的丈夫。他也是奇特的集中西文化为一身的重要人物。封建王朝尊孔，合





全国孔姓为一家，孔祥熙是孔子的 75 代孙，这也是他经常炫耀的本钱。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1934 年，蒋介石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同时又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围剿”，发动“精神方面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理论文化界竭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礼教。把《四书》、《五经》编成教科书，又开始强迫中小学生学习读经。国民党中央会议甚至还通过了祀孔尊圣的决议，通令每年 8 月 27 日为“孔诞纪念大典”，严令全国学校举行盛大纪念。

1934 年，在“剿共”高潮中，2 月 19 日，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首先以江西省为重点地区开展“新生活运动”。3 月 17 日，南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汪精卫出席大会，各省各县随即成立分会。于是，历时四年多的“新生活运动”拉开了序幕。蒋介石在 2 月 19 日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他说：“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之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提高





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

孔祥熙为“新生活运动”作注解，认为它应以“孔子日常生活”为标准。1935年8月27日，《大公报》上发表他的文章《孔子日常生活与礼义廉耻之诠释》，他说：

中国自汉以来尊崇孔子。举凡国家政治经济之设施，人民思想生活之轨范，无一不以孔子之道为标准，民族生命继续延长，东方文化发扬光大，二千余年，莫敢或废。概自海禁大开，欧风东渐，国人突失自信，安危之见解殊途，取舍之观念不一，醉心近代学说者，每多好奇立异，甚至倡为推翻孔孟之论。根本既摇，世风渐下，忧时先觉，蠹焉伤之。祥熙恭为先圣子孙，又习闻总理恢复固有道德以救中国之说。当此民族衰微，亟图振救之时，原欲退食余闲，就管见所及，将先圣之思想言行发为论著，而以论语为中心。





宋美龄极力帮助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她重点是在妇女中进行组织活动。她还将礼、义、廉、耻译为英文，力图让外国人了解并支持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在这一运动中，多次发表讲话，鼓吹礼教、纲常。“中国固有政治哲学的典籍是什么呢？就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的政治学，其中所讲的三纲、八目、九经，可说是为政的基本要道。这些道理，都是永久不变的原则”。

“新生活运动”开展以后，每年2月19日都要开会纪念。1935年4月，又成立“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下分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部门。热闹非凡，上下动员。在这一运动中，蒋介石大力推崇效忠清廷、重振名教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竭力推荐曾的著作，提倡对长上“忠信笃敬”，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以礼教之实质，冠之以“新”的招牌，这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封建政治制度的真面目。“新生活运动”的结果如何呢？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文中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蒋介石左右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无论哪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的。”

宋庆龄说：“‘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新生活运动”是失败的。他说：“过去三年，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作工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的上层，而未及下层，只注意到通衢大道，而未及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解放前，四川成都有《“新生活”竹枝词》一首曰：“罪有重婚载律条，伟人尽可贮多娇。多妻也是新生活，总说一人兼几桃。”





揭露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中，达官贵人仍盛行多妻多妾的现实。四川省有民谚云：“新生活，各顾各。”也是对“新生活运动”的绝妙讽刺。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沦陷区同国民党统治区在对待礼教的问题上，竟存在着惊人的一致。

汪精卫 1940 年 8 月 27 日在《纪念孔子的意义》一文中说：“任意诬蔑儒教，诋毁先师，这种思想荒谬绝伦。世界上无论何种文化，皆是随时代以进步的，不责后人不肖，却责先民没有好好的留贻，真是荒谬绝伦，……我们知道中国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我们于先师孔子诞辰举行纪念，一方面在道德上发生猛省，一方面在智慧上发生勇猛精进的决心。”

江亢虎甚至直接将孔子的学说拿来做日本“大东亚”的理论。他说：“我们站在大东亚的立场，尤其中国人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孔子的学说，便是中国人的中心思想，也可以做大东亚的中心思想，拿孔子做中心，





很容易形成一个新国际，大东亚的国际，也许是全世界的国际。”他这一思想直接源于日本反动汉学权威、日本法西斯文化侵略的策划者和鼓吹者盐谷温。盐谷温说：“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

国民党政府亦同汪伪汉奸政权一样竭力鼓吹礼教，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陈立夫在《孔子与总理》中，都大肆褒扬孔学，妄图重振礼教伦常。

1943年10月3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主持了一次“礼制讨论会”，讨论会在陪都重庆北碚北温泉举行。参加者有内政部、教育部、铨叙部、外交部、礼乐馆、文官处、典礼局等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名流学者等。会议时间长达半个月。会后刊行了《北泉礼仪录》一书。全书一共规定了五种礼仪：

- (1) 吉礼：祭祀、纪念之礼；
- (2) 嘉礼：敬国旗、崇元首、庆祝就职、觐谒荣典、宴享、敬老抚幼、婚礼、学礼、考试、集会等；





(3) 军礼：陆、海、空三军之礼；

(4) 宾礼：国际仪节、官吏仪节、学校仪节等；

(5) 凶礼：丧礼、卹荒之礼等。

其中，嘉礼类中的婚礼规定如下：

①订婚：

凡男女已届法定订婚年龄，同意缔婚时，得择期订定婚约。订婚之约，应附男女双方世系表。男女订婚，须向父母预告，请求指导。婚约载三代之名氏。古者问名，但问女所出而已。此之不同，盖优先之意寓焉。

②请期：

婚约既订，如一方拟定期结婚时，应以书帖商请对方同意。对方同意时，应具书答复。请期时应附体格检查证书。

③结婚：

婚期既定，应先期柬请证婚人、介绍人、司仪及傧相，并得柬请近亲至友观礼。结婚礼应从检约，凡不得要之费用，概宜节省。婚姻以敬爱为本，不得议及财物。迎亲之礼从地方习惯者，听。

《北泉礼仪录》中规定的婚礼仪节繁琐，





共有 25 项之多。规定结婚应有证书。从这些仪节看来，大体上是古代“六礼”同西方文明婚仪的掺和。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妇女，大体上还是处于低下的地位。这在不少现代文学作品中能反映出来。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在 1930 年发表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就反映了国统区农村妇女苦难、屈辱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妇人”，这个农村妇女的丈夫是一个皮贩，有时也兼做点农作，本是劳动的好手，但由于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压迫，他们一家生活悲惨，债务年积，使她丈夫变成吸烟、嗜酒、赌钱、性情凶狠暴躁的男子。这个男子自己害着黄疸病，还常打骂老婆和 5 岁的儿子春宝，甚至还用沸水烫死了刚生下地的女儿。因为要还债，要活命，他竟把他那诚朴、忠厚的老婆出典给 30 里以外的一个地主。女主人公怀着似刀割苦痛的心肠，做了地主家临时妻子，实际上是作为生育机器出卖了，典期为三——五年。她为地主生了个儿子，三年后又被赶回老家，丈夫、儿子，





疾病和贫穷，依然包围着她。这真是那个时代农村妇女的血泪生活记录。在典妻以前，有一段话，是媒人沈家婆对这个女人的丈夫说的，兹抄录如下，能让我们看清当时农村封建势力的凶残和黑暗：

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又因他底大妻不允许，只准他典一个，典三年或五年，叫我物色相当的女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说的，假如条件合，肯出八十元或一百元的身价。我代她寻了好几天，总没有相当的女人。

可惜，当时直接描写农村婚爱状况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多。许多作家，限于自己生活的圈子，也写出不少揭露封建礼教黑暗残暴的作品，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就反映了封建宗法家庭的缓慢解体，认识价值相当高，特别是其中的《家》，将旧家庭、旧礼教的强大、顽固表





现得很成功，揭露很深刻，也写出了封建礼教、宗法家族必然崩溃的命运。

女作家丁玲写了《莎菲女士日记》、《自杀日记》等作品，描写了一系列在新思潮影响下冲出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也揭露出封建礼教的黑暗。

1935年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四幕剧《雷雨》，是曹禺揭露封建家庭中礼教虚伪残酷的力作。作品除了一般的揭露抨击封建礼教以外，还将背景放在整个社会大舞台中，放在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背景下，使它的批判性、战斗性更强。正因为如此，《雷雨》在国统区多次遭到禁演。曹禺的剧本《日出》展现了那个时代大都市中的黑暗角落中的生活，作品人物众多，有漂泊人海，堕落、麻木而又怀着深深精神痛苦的妓女陈白露；有专门投机，在糜烂生活中鬼混的银行经理；也有满脑子金钱女子的外国留学生张乔治；有沉落苦海、挣扎无力而死去的“小东西”，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英国作家韩素音女士的自传体小说《无





鸟的夏天》则更多地从国民党上层暴露出封建礼教、归教观念的顽固，以及武汉、重庆等地抗战之初的一些婚爱状况：

1938年10月，韩素音同爱人唐保黄到了武汉，她惊讶，“这座英雄城市竟是如此腐化堕落，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在武汉的饭馆里，随着菜单而来的是另一张单子，上面印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照片，照片上是姑娘的面孔。你选中哪一个就把号码告诉堂倌，过一会儿那位姑娘就会过来坐在你的身边。后来在重庆，也见到过这样的单子，上面印得更详细，有每个姑娘的特征、姓名和价格……”

韩素音同唐保黄结婚以后，马上就受到中国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丈夫不许她争辩，说她欧洲味太浓了，要变得中国化一些，还用蒋介石的看法来开导她，说蒋介石说要遵行古代的美德才能救国，用“贤妻良母”、“女子无才便是德”来要求她。当韩素音谈到国民党某少校带了一个16岁的第四个小老婆时，丈夫甚至将手伸过来打了她的耳光。当她斥指丈夫伤害她时，丈夫竟然说：“你也伤





害了我，你以为我娶的老婆不是处女会高兴吗？”当韩素音看见抬伤兵想去帮忙抬一下时，引起丈夫的极大愤慨，他骂道：“你发疯啦……正经女人哪有这样的？……你这么喜欢男人吗？……你不去摸摸他们就忍不住吗？……你的本份是跟着我，给你丈夫做饭！……”到重庆后，丈夫也多次打她，强迫她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领袖训谕，《曾文正公家训》、《列女传》等。而这个叫唐保黄的丈夫，是蒋介石身边极受宠的高级军人。

这本书中还谈到抗战大后方的一些污秽之处。如：衡山的妓院里，8岁的女孩子就得接客，伺候参谋总部的将军们。重庆妓女成批光临旅馆，由于“道德”之风盛行，梅毒和淋病也大大流行。书中还谈到外交部长郭泰祺被指控同某女士有不检行为。军统特务戴笠把被他强奸的一位姑娘毒打一顿后，送进一所“学校”。揭露当时重庆的社交界、上层人物都以谈桃色事件为主要黑幕。

韩素音没有听从丈夫的吩咐采访宋美龄，但通过丈夫的口中，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德典范，“她和众人讲话时目光只对着妇女，从来





不扫男人一眼”。

该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可以用来总结当时国统区的婚爱状况：“在专制主义的各方面都实行双重标准——女人必须贞洁，男人可以滥嫖——这就是祖传的美德！”

1933年的广州，还公然有买卖妇女的情况。巴金在他的《旅游随笔》中记载过这样的事，有三位姑娘，分别标价1300元、1500元、1800元，视年龄，样子而定。巴金写道：“我的祖父买过姨太太，我的叔父买过姨太太，我的舅父也买过姨太太，我的一些同辈还准备学他们长辈的‘榜样’。关于这件事我知道得很多，很多。但是公开地在茶馆酒楼把女人当一件商品来招揽主顾，当面讲价钱（而且据说在讲定身价付了定钱以后，还得由主顾把她的全身仔细检验一遍），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对这样的事我不能没有愤怒！”

在广州，巴金的一位姓朱的朋友，家里有一个女佣，因不堪受土豪之气，在顺德家乡用手枪将那土豪打死，只身逃到广州。

巴金《生之忏悔·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中，谈到外国水手嫖中国雏妓的事。





他是这样描写的：“在那个为白皮肤的人开设的下等酒吧间里面，一个中国小姑娘在膀子上生满了毛的外国水手的怀中哭了。……她今年才十四岁呢，然而父母却把她的不曾发育完全的身体卖到这里来，给那些可以做他父亲的人蹂躏了。……她像痴呆一般地坐在高大的白皮肤的人的怀里，让他们玩弄……”

语言学家陈原在他 1946 年发表的《文化的“禁城”》一文中，谈到广州在抗战以前的情况是：

女人的旗袍，身长必须过膝，袖长应当过肘，当局还特地派出检查员，专门检查女性的衣服合不合尺寸，检查女性的臂膊是不是裸露。而在此旁，聚集了全市娼妓“精英”的陈塘地区，灯火通夜不灭，花捐天天增加。

这正是礼教之严厉与性关系之滥劣这二者之间那种奇异的、畸形的统一。那么，抗战之后的情况如何呢？陈原说：

现在呢？果然娼妓集中的地区没有了。可是晚上你出去哪，出去走走哪。甚至不必在夜里，只消傍晚，在唯一的公园里面，前面走着一个年轻的强作笑容的女郎，后面跟





着一个年老的婆娘：一对一对的，不，一串一串的，多到使你吃惊；后来连马路上也常常看见这样的“两人小组”了。官方的统计说，沦陷期间广州只有一万七千几百个“导游女”兼作“副业”；现在呢，没有了。一家半官方的报纸发表了自己的访员的数字，一万五千起码，时间是指收复以后。一个“广州通”告诉我：五万到十万。说广州的人口是一百万，似乎已经嫌多了。这比例却是惊人的。

陈原在这篇文章中接着说：

随之而来的是娼妓文化。《巧女十八嫁》——这是上流的书名了，还有更肉麻，更可怕的名字。粤剧：《迷魂陈》；影戏：《香艳肉感言情……巨片》；出版：一大堆《十八嫁》之外，是《人头奇案》。

国民党政府同历代帝王一样，也是娼妓制度的保护者；“花捐”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一项财政收入，他们更是成千成万被蹂躏妇女的剥削者。殖民地化的上海，在解放前登记在册的妓院有 800 多家，妓女 9 000 余人。但据国民党有关部门估计，娼妓的实际数目





在10万以上。其他都市娼妓之多，亦非常惊人。国民党统治的结果，由于弄得国民经济大破产，全国娼妓数目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

有一篇《北平娼妓调查》，描写国民党时期妓院拷打妓女的情形，十分残酷，“用火烧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裤裆中，然后打”，至于不许吃饭、罚跪、关黑房子等，更是司空见惯的刑罚。对于很红的妓女，老板们则视之为摇钱树，一旦油水吸干，也就弃之如泥沙了。在一个中等以上的妓院里，平均一个妓女，就有三个以上的人直接靠妓女从嫖客身上用肉体换取来的钱财吃饭。

国统区的婚爱状况，比较复杂，并不是单一的封建礼教之压抑和淫邪之风的泛滥。毕竟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前，婚爱状况较之清末民初，亦有些许进步的苗头和趋向。

30年代，社会学家潘光旦曾组织过一次关于“婚姻之目的”的社会学调查。征求案中提出了十条标准：

- (1) 相貌与体态；
- (2) 教育造诣；





(3) 办事能力（女期男者），或治家能力（男期女者）；

(4) 母性或父性；

(5) 经济能力；

(6) 清白家世；

(7) 家产（女期男者），或妆奁（男期女者）；

(8) 性情；

(9) 健康；

(10) 性道德。

征求案中结果大都以性情为第一。当然征求案由于征求对象不同，有一定局限性，但是男女双方都以性情为第一却不能说是一个纯偶然的现象，这反映了人们对婚姻问题的态度变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于无奈，答应同共产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共赴国难。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中间的15个月期间，由于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时期是全国军民抗日的高潮时期。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积极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支前。其中就有





不少妇女团体，领导妇女们组成抗日演剧队、担架队等等，十分活跃，战斗在抗日的战场上。

1938年5月，邹韬奋先生收到湖北读者刘万里来信，谈到他三个妹妹参加抗日战争的事迹，大妹二妹参加了陕北公学，三妹才16岁，先参加武汉的救亡团体，后又到山西临汾受训，最后她参加了山西抗敌决死队，实现了杀敌报国的志愿。随信还附上了刘万里三妹刘汉生给母亲的一封信，以及刘汉生的一篇短文。邹韬奋加上编者按语后全部发在《生活周刊》上，引起很大反响。邹韬奋说：“刘汉生女士值得我们最崇高的敬礼，因为她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大时代的优秀儿女的代表型，她是整千整万为国英勇斗争的女同胞的象征。”

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史良等妇女名人，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

宋庆龄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人民以后，发表声明谴责他们的叛变行动，然后去苏联、欧洲访问，被推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





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持团结抗日，批评国民党政府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1932年底，她联合中外进步人士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者。1933年，当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抗战爆发以后，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募物支援中国抗战，影响很大。

宋美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也十分活跃。“八·一三”日寇侵略上海，宋美龄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用英语向美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给予援助。保卫武汉期间，她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自任指导长，在武汉还举办了一期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参加该训练班的妇女干部，在抗战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妇女儿童工作。当时还有邓颖超、吴贻芳、刘清扬、李德全等女界名人参与了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工作。

何香凝，1931年回国，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1月30日上午，与宋庆龄





一起在真如慰劳抗日军队，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之内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天正下雪，她见士兵们衣单受寒，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五天就制成全新棉衣 3 万多套，运发给广大抗日官兵。1937 年，她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任主席。1938 年，与宋庆龄在香港筹成保卫中国同盟。

史良，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1927 年被捕，经蔡元培等营救出狱。后曾担任共产党员邓中夏的辩护律师。1935 年发动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当选为理事。嗣后，又当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她同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作为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呼吁抗日救亡，因“七君子”事件被捕。抗战爆发后经营救出狱，任“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委，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理事等职，在抗战中作出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妇女培训工作和女子的教育问题。

在中央和各省、县，均专门设有妇运委





员会，负责妇女工作。在各种训练团中，都有女生参加，故专门设女生大队。还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吴香兰，原名伊西娜珍·扎西也萨，生于木里土司家庭，从小习汉文，毕业于西康省立师范。1941年入国民党，1943年，年仅19岁，就任国民党康定市议员，西康省妇运委员。

在抗战期间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在大后方重庆附近的江津县白沙镇，还新建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校开始筹备于1940年4月，经教育部呈准，8月1日购土兴工，赶建校舍，9月20日正式成立。12月25日，举行成立纪念及院舍落成典礼。该校虽然历史短，规模小，设备差，地方偏，但校行政和教师队伍却十分出色。院长是谢循初，教育系主任是罗季林，英语系主任李霁野，历史系主任张维华，音乐系主任张洪岛，数学系主任萧文灿，国文系主任先后是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国文专修科主任魏建功。1946年时，院长为“周南三杰”之一的劳君展（许德珩夫人）。建院一周年时，有教职员75人，到五周年时，已达128人。该校十分注意社会





教育和辅导工作，承办了家庭教育实验区，开办妇女补习学校，辅导白沙镇的中、小学教育，在运动会、书画展览等方面，给白沙民众开了眼界。该校还开放理化实验室让民众免费参观，利用一切机会在社会上扩大影响，普及文化。

国统区亦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妇女人物。

秋瑾烈士的女儿王桂芳，曾拜名师习拳脚刀剑功夫，自称“小侠”。1926年赴美留学，攻读于纽约大学航空系，专攻飞行技术和理论，被美国航空界人士誉为“东方女飞将”。

雷洁琼，1924年赴美留学，攻读社会学专业，1931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与郑振铎组织抗日救国会，捐款为前线抗日将士做棉衣。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妇女指导处督导主任，先后在中正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在知识界是比较有影响的女学者。

不过，总的看来，因国民党右派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因国民党中间派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摇摆性，国统区整个婚爱状况注定只能是保守的、落后的。有时，即使在其上层出现了一些妇女参政、妇女解放的积极因素和可喜迹象，但从其实质上、广泛性上来说，整个社会的婚爱状况，与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相比，可以说并没有什么根据变化，大体上仍以封建礼教、旧的习俗为其主流，西方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足与正统的礼教分庭抗礼。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曾经这样批评过宋美龄：“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区内，传统礼教同西方思想比，传统礼教仍占主要地位。

十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婚爱状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迫使共产党人拿起武器，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叫红色苏维埃，简称“红区”，抗日战争时期叫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叫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在它领导的地区内，倡导社会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并着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婚姻性爱中写下了新的篇章。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第一个法律性文件。条例共分7章，共23条。1934年4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此条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补充，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其主要内容是：

(1) 男女婚姻自由：

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四条：“男女结婚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

婚姻自由还包括了离婚自由。第十条：





“确定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

(2) 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

(3) 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当时，在红区内，妇女经济地位尚未完全获得独立，所以在离婚问题上，偏重于保护妇女，考虑妇女的经济、生活等问题，第十三条：“男女同居时所负的公共债务，则归男子负责清偿。”

(4) 男妇平等。

(5) 保护红军战士的婚姻。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同情况，分别颁布了一系列婚姻法令，如：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1年7月《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月《晋察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4月《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等，以上婚姻条例，基本原则大体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相同。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





会第一次大会于1946年4月23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了“妇女与男子权利平等”的原则。同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其内容同抗战时期的规定基本相同，略有增加、润色，比如，增加了有关少数民族婚姻的特殊规定。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妇女当中的先进分子一直战斗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前沿，涌现出无数女英雄、女革命家。

“刑场上的婚礼”是婚爱方面的突出事迹。

陈铁军，广东佛山人，出生在华侨商人家庭，冲破家庭封建婚姻束缚，离家前往广州求学。1925年“五卅惨案”后，参加示威游行。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广州处于反革命白色恐怖中，陈铁军坚持地下斗争，同中共广东区工委书记周文雍建立起恋爱关系。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积极参加暴动的领导工作和联络工作。起义失败以后，她和周文雍同时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和欺骗引诱下，毫不





屈服，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1928年3月，陈铁军和周文雍一路高呼口号走向刑场。刑场上，她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发表演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民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牺牲。同胞们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我们工作合作得很好，俩人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还顾不上来谈私人的爱情，因此，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没有结婚。……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于是，她和周文雍一起高呼：“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工农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卖国的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这是古今中外最震撼人心、最催人泪下的革命婚礼。

向警予，1927年4月从法国回国，参加党的“五大”。不久，大革命失败，她仍坚持





在武汉斗争。1928年，因叛徒出卖，在汉品法租界被法国巡捕房逮捕。法庭上，她用流利的法语慷慨陈辞：“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中国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而此种斗争目标，正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旨相符合，你们为什么要来反对我们呢？”使法官无言以对。随后，她被引渡到国民党反动派手中，1928年5月1日被杀害。临刑前，她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光荣牺牲的中国妇女不计其数，其中，有毛泽东之妻杨开慧，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刘少奇之妻何宝珍，以及郭隆真（事迹见前）、李洁等人。

土地革命解放了工农群众，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真正翻了身。她们为保卫红色政权而起来战斗。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说：“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为聚敛财富、扩充





实力，强令广大农村种植鸦片，大部分男子吸毒成瘾，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家务劳动都落在妇女身上。川陕边区的妇女受苦之深，为全国之冠。许多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就当了童养媳。红军闹革命，最令广大劳动妇女扬眉吐气，她们纷纷参加工作，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劳动妇女，作战英勇，吃苦耐劳。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西进，行至阆中县王昌坝时，领导决定将随军的约2000名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红军妇女团。妇女团成立以后，领范、束缚的办法，要正视两性问题，适当地进行两性的教育。第二，男女社交要公开，这是使恋爱与婚姻能得到较美满的解决的必要前提，只有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自然纯洁的社交中，才能使友情发展到真挚的爱情和巩固的婚姻。第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杯水主义。

邓颖超还谈到婚后生活，“如果夫妇二人，整日过着极狭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厌腻、淡薄，爱情非但不能巩固，而且反会恶化。”文章还谈到择偶标准问题，谈到结婚年龄，





倡导晚婚等问题。

这篇讲话发表出来时，共 4000 多字，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专门开办了八路军妇女学校，李贞曾任该校校长。当时，除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中有不少女学员以外，还有专门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该校由毛泽东建议发起，建立于 1939 年，党中央对这个学校相当重视。第一任校长是王明，以后，李富春为校长，柯庆施为副校长。周恩来、张闻天、康生、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朱德、邓颖超、彭德怀、叶挺、项英、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先后关心过该校，出席典礼、大会，乃至授课。毛泽东、邓颖超、周恩来、博古，就曾为女子大学讲中共党史课。张鼎丞、叶剑英、李克农为该校募过捐。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生来源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开学时，近 500 名学员，分为普通班 6 个班，高级研究班和特别班各一个班。学员平均年龄为 20 岁，最大的 41 岁，最小的 14 岁。女子大学先后向部队和根据地输送了





1 000 多名妇女干部。中国女子大学宗旨：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教育方针：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习制度：集体互助与个人专修并重。校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医药卫生常识、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智学、妇女问题、世界革命史略等；选修课：会计簿记、速记、缝纫、新闻记者、音乐、图画、戏剧、外国语（英、日、俄，必选其二）。

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只要是在革命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婚爱观念新，不保守，妇女们多大方、爽朗，心情舒畅，学文化、受教育。生活艰苦，工作繁忙，但人们充实，干劲大，热情高，都有一种为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感。革命根据地的妇女，总是伴随着歌声和笑声。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





在她的《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成长过程。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受苦最深，对革命最拥护，革命斗争中最坚强。当时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流行着这么一首民歌：“要脑袋，你就取，姑娘怎能对你把头低？！山前山后去打听，谁不知姑娘我是红军妻！”革命根据地许多妇女都鼓励当红军的丈夫不要贪恋私情，要勇敢打仗，争取革命成功。陕北《信天游·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军号吹的嘀嘀哒，哥吹妹妹一句话：‘红豆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陕北民歌：“北瓜蔓长紧连根，哥闹革命参了军。你当红军天下走，妹打游击进山林。虽然没有同凳坐，两颗红心心挨心。”抗日战争期间陕北民歌《十绣金匾》：“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金线。金匾上绣的是，妇女闹生产。七绣女生产，开荒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革命根据地婚爱状况、婚爱风气，相比起国统区来，要革命、进步得多。这同政治制度有关。开明、民主、自由、向上，这种精神代表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主





流。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许多热血青年涌向延安，也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的吸引力。从婚爱状况来看，既努力横扫封建礼教，又严禁娼妓等社会污秽，亦很少受到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不负责任的性自由、性解放的影响。而这三个方面，正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现实存在。所以，民国时期，自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新民主主义婚爱观、社会主义婚爱观的提倡和推行。



中

国

风

化

图

史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选美与花榜





4



一、民国选美透视

选美活动在中国有较长的历史。倘若不拘于“选美”两字的涵义，可以发现，这项活动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宋代开始出现的花榜。所谓花榜，就是由作为高级嫖客的士大夫对于妓女进行品评，从而确定其等第品级的一种活动。最初，这些经常出入妓院征歌选胜的风流才子不过是一时兴致所至，而对自己所熟悉的、所赏识的妓女加以比较品评，或以名花名草比拟妓女，或以科举功名桂冠分列妓女等次，并逐一题写诗词或评语来概括妓女的特征，然后公诸于众，以为风流快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在某个社区评选和品题妓女明星的形式。品花列榜之前，



民初坤伶九月菊小照

主持者首先选好花场，立好章程，之后召集全市名妓赴会，一边觥筹交错行令竞饮，一边题写评语品定高下，并当场唱名，公之于众。围观群众往往成千上万。一经品题的妓女往往身价倍增。而那些没有列于榜首的，

往往感到非常遗憾和难过。



民初坤伶鲜灵芝着时装照

自宋代开始出现的花榜，并未一下走红。直至明中叶以后，才得以盛行。当时，一些老于花榜之道者所著的《莲台仙会品》、《燕都妓品》、《金陵妓品》等书的出现，表明人



民初坤伶富竹友着戏装剧照





们很热衷此事。到清朝末年，花榜盛极而衰，然它的余响，依然不绝于耳。

近代，上海是花榜开设最为频繁、竞争最为激烈的。其时，上海的花榜不仅有艳榜、艺榜之分，而且一年之内竟要开两次榜。由于花榜泛滥，妓女说情行贿走后门以求榜上有名之事屡有发生，因而花榜状元大大贬值了。

花榜的日益没落，实是主持花榜的报社所不甘心的。于是，一些报社在花榜之外，又创行花选。花选，由《游戏报》首创，“最脍炙人口者，为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俞小宝、张书玉），次则为五经魁、登瀛图等，其后相继踵行，五省六燕，争相夸耀”。

花选出现以后，与花榜同时并存了几年时间。到1909年最后一次花榜由《采风报》开出以后，在上海花选就成为唯一的一个品种了。

从1917年至1920年，由新世界游艺场和《新世界报》主持，在上海举行了几次由嫖客投票选举妓女担任“花园”各级政府职务的花国选举。其选举方法完全仿效民国选举制





民初第一坤伶刘喜奎身着时装照片

度、所选各级“职官”中，有花国正副总统，花务总理，才、貌、品、艺各部总次长，参政院正副院长、参政，以及基层所设的都督、花政长等。不管任何职官，每届任期均为一

年，至年底改选。1917年冬，举行第一次花园选举，入选任职者210余人，“一时北里诸姬，及走马章台者，咸奔走相告语，目为旷代未有之盛典，冠裳群姬，随粉白黛绿连翩而至，极一时之盛”。之后，新世界又举办了两届花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末三名青年川剧旦角戏装照片

不管是花选，还是花榜，都是嫖客依据自己的标准，品评、吹捧妓女的色、艺、才、韵，从而为妓女提供一种出风头的机会的活动。由于它与近代的选美存在某些共同之处，故可视之为选美的一种类型。

除了由花榜衍化而来的花选之外，民国



清末北京戏剧演员着装照。照片左为“小金玉”、中“双摇会”、右“郝月梅”。

时期无选美之名而有选美之实的还有北京天桥地区的鼓姬选活动。鼓姬是天桥地区演唱“莲花落”这种民间曲艺的坤角的统称。一般，她们都是丰姿艳丽，衣履入时的女性。其中最早出名的是振华园的冯风喜。有一次，喜好舞弄文墨的易实甫到天桥度曲，留下了“自见天桥冯风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



使得冯的声名流播开来。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专程去天桥振华园，以一睹冯风喜的芳颜为快。后来，北京《燕风报》索性以相貌、表演技巧等为标准，发展鼓姬选活动，以满足无所事事的有闲阶层填补心灵空虚的需要。最初，鼓姬选较为简单，只是根据既定标准品评一下她们的高下而已，当选的有邓银桂、陶彩云、于瑞云等。以后，这项评选渐趋复杂，不仅要选鼓界公主，而且还选出了鼓姬内阁。鼓姬内阁仿效民国政制，设有总理、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伊惜兰、高玉兰、龚惜荣等以色艺分别担当上列“要职”。

鼓姬评选，是主持该项事务的小报主迎合人们的心理而举行的一项活动。由于它对被吹捧的鼓姬和愿意捧场的小报双方都有利，直到1935年，诸如北平的《箴报》等还在举办这种评选。

花选、鼓姬选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选美，40年代中期开展的上海小姐的评选，则是由全社会参与的、热热闹闹的选美活动了。

1946年夏，苏北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致使300万民众丧失家园，流离失所。





为了赈济灾民，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救济苏北难民捐款组织。在上海，杜月笙组织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积极发起捐款救灾活动。

6月26日，知名人士杜月笙、吴开先、章士钊、范绍增等，邀请香港星东足球队和上海市冠军队青白足球队在上海逸园进行足球义赛，将门票和义球拍卖的收入捐赠给苏北灾区。观看这场义赛的有万余人，杜月笙为球赛开了球。在球场休息时，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主持义球拍卖。一个名叫王韵梅的女子以500万元的高价买走了义球。

足球义赛和义球拍卖，为赈灾筹集了一些款项，但远没有达到预计数目。为此，杜月笙、吴开先等人决定以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的名义出面，采取选美的形式来筹集救灾款。

7月份正式作出举行选美活动的决定后，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即开展各项具体工作，以为选美的准备。然而，由于市民大多认为这是一些人的噱头之举，最初根本就没有起而响应者。直到8月2日，民





民初第一坤伶刘喜奎身着时装照片

产中学的女生高清漪报名参加竞选，才打破了选美初期沉闷的气氛。

最初，救灾筹募委员会的选美活动是按闺阁名媛、影星、歌星、舞星四类分组，各



组分别选举的。其中，名媛组由妇女会会同各界闻人共同发动，舞星组由舞厅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洪元发动，影星组由凤昔醉发动，歌星组由陆锦荣发动。后来，四组之外增加了坤伶组、越剧组，分别由汪其俊和陆锦荣、严孝方发动。

8月7日，救灾筹募委员会假红棉酒家举行新闻记者及各组候选人招待会，协会总干事王先青、副会长吴开先出席了茶会，并分别作了发言。王先青首先报告选举上海小姐的意义，指出：“选举并非闲情逸致之举，其动机唯在本人类互相帮助救助灾黎”。吴开先对此作了补充：此次救济苏北难民的“募捐为20亿元，实业界、金融界已认购了15亿元。其余之款，募集尽费心力，故发动此项选举，以冀动员市民，群策群力，救助三百万难胞”。接着，越剧名伶袁雪芬发言，表示愿意尽心尽力去救助处于水害之中的百万灾民，但不愿参加这项活动，原因是“人言可畏”。

尽管袁雪芬等越剧名伶打起了退堂鼓，但招待会后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8日，欧阳雪梅、黄君晴、陆宗笸、谢家骅等8人报名参加名媛组竞选；9日又有多名小姐参选；10日当协会在红棉酒家招待平剧组候选人时，言慧珠、童芷苓等报名竞选；此后，上海市民政局的16名女公务员也报名参加角逐。13日，38名上海小姐应选人发表联合宣言，声称“我们的目的是救灾。我们希望社会人士多出些捐款，去救济苏北难民。至于我们谁来当选，这倒不是我们渴望的事”。

当时，报名参加竞选的不少人是坚持了初衷，一直坚持选举结束的。但是，也有人因为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退出了竞选。8月14日，原报名参选的电影明星周璇、王丹凤、李芳菲等发表谈话，宣布退出影星皇后的竞选。在选举当日，已购得200万元捐票的童芷苓也放弃了竞选。

按规定，须在评选稽核组审定之后，才给参加竞选者发登记表。供她们填写姓名、年龄、籍贯、身长、体重、特长等内容。据登记表上所记录的情况显示，在48名上海小姐和各组皇后的候选人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岁，体重均在百磅左右，特长





坤伶小香水

大多为唱歌和游泳。在填好登记表后，各候选人即向救灾筹募委员会领取选举票，然后



施展自己的才能推销。选举票共分3种，售价分别为红色选票每张10万元，绿色选票每张5万元，黄色选票每张1万元。不管是哪种选票，谁推销得多，谁就最有可能当选。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指出，此次选美是“钱的竞赛”，“目的为捐款，选举自不以容貌、身段等为标准，因此各候选人都竭力地推销选举票”。

8月20日，选举会在上海新仙林舞厅正式举行，各界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整个选举由救灾筹募会主委杜月笙和副主委吴开先主持，社会知名人士徐寄廌、钱新之、金润庠、杨啸天、范绍增、顾嘉棠、陆京士等到会监督了选举事务，梅兰芳为获选者颁了奖。

当晚11时10分，选举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揭晓：当选为上海小姐的是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民；当选为歌唱皇后的是韩菁清，张伊雯为亚后；当选为舞国皇后的是管敏莉，李珍珍为亚后；当选为平剧皇后的是言慧珠，曹慧麟为亚后。

时年23岁的王韵梅是浙江绍兴人，曾获选上海小姐第一名，她得到了65500张选举





1928 年的“上海小姐”

票。王韵梅爱好旅游，早年到过青岛、北平。到上海后曾当过半年舞女，与上海工商界闻人王晓籁甚为熟稔。在青白对东华足球义赛时，她以 500 万元购买了义球。谢家骅为商人谢小初之女，广东梅县人，时年 19 岁，以前是复旦商科的学生。她取得 25430 张选举



票，获第2名。刘德民为刘道魁律师的女儿，上海人，19岁，是时为上海市新成区区公所的公务员。由于新成区区长王剑锷的鼓励，她也加入了竞选。最后她以8500张选举票获第3名。

当选歌唱皇后的韩菁清时年20岁，湖北汉口人，其父为汉口市盐业公会理事长，汉口市参议员。1943年秋天，17岁的韩菁清因为婚姻上的纠葛，从家中出走，到上海自谋生路。她曾在百乐门舞厅招考歌手时，以一曲《卖糖歌》、《萝蔓那》而考取第一名。此后她成为赖歌唱为生的职业歌手。在参加竞选的4个月前，她对大都会的浮华生活感到了厌倦，便回到在上海的瑜珈精舍过起了退隐生活。后来救济苏北难胞，在救济筹募会主持人的劝说下，再度出来歌唱，并参加歌后的竞争。选举结果，她以得票2万张如愿以偿。

时年25岁的舞国皇后管敏莉，乃江苏无锡人。她已久息舞坛，此次为救济难民参加竞选，才从香港回到上海伴舞。她的父亲在20年代就去世，一家4口均要她抚养，能够





坤伶刘凤仙

比较深刻地体会到贫民生活之苦。她说：帮助人是件最快乐的事，帮助无力生活的人更是件痛快的事。至于我参加候选，并不希望中选。亦许不久我仍要脱离舞场生涯。我只



希望让人们知道舞女中并不全是浪漫与自私的人。她们之中，亦有愿意以她们的汗和泪换来的代价去救济贫苦的人们……她以 23150 张选举票当选。

平剧皇后言慧珠，27 岁，北平市人。她是参选者中年龄较大的一个，在童芷苓退出竞选后，她获得后冠，得票数是 37700 票。

救灾筹募会在选出上海小姐，以及歌唱、舞国、平剧皇后以后，于 9 月 4 日假大光明戏院举行了小姐、皇后的加冕典礼。至此，热闹了一个多月的选美活动正式告一段落。

二、卖笑业的特殊广告：花榜

出入妓院命酒征花的嫖客，很大一部分是名士才子等士大夫，他们在征歌选胜、品花赏花之际，往往将毕生醉心的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桂冠冠与所赏识的妓女，名之曰花榜。

近代上海卖笑业日盛一日，士林捧妓之风也极兴盛。上海花榜最早为同治中叶即 60 年代，名妓李巧玲为刚斋主人初订花榜举为状头。70 年代后花榜频开，1877 年有公子放





所定上海书仙花榜，1880 年有庚辰春季花榜、庚辰花榜特科。1881 年辛巳春季花榜、秋季花榜。1883 年癸未秋季春江 24 环花榜、癸未冬季花榜。1888 年戊子夏季花榜。1889 年书寓花榜、曲中花榜。这一系列花榜的主持人是当时上海报馆、书社舞文弄墨的文人二爱仙人李芋仙、柘湖渔郎、痴情醉眼生等。这批美其名曰海上名士的洋场才子，平时以妓院作消遣地，以品花狎妓作娱乐，以作诗填词为风流。书寓、长三中凡有新妓出张，这批人便结伴寻访，若为中意者，或赠诗词，或折简邀友摆酒宴请，大加推崇、提倡，妓女依靠他们的标榜吹捧得享盛名，可谓才子佳人相辅相成。

80 年代名妓李三三，得到仓山旧主钱塘人袁祖志的赏识，作诗吹捧：

此邦风月冠江南，万紫千红任客探。行过章台三十里，无人不道李三三。

寻春心事十分酣，醉入花间比蝶憨。阅遍环肥兼燕瘦，风情都逊李三三。

容光四射暗香含，压倒群芳定不惭。愿把金铃营十万，深深重护李三三。





经袁祖志首为提倡，申报总编辑雾里看花客钱征、二爱仙人李芋仙、高昌寒食生等人均作三三词，使李三三名播士林，得三三词60首，60首三三词使李三三身价倍增，名满上海，1882年壬午花朝艳榜得第二名。

自称“身历花丛凡四十年”的王韬，出入书寓、长三，前后所狎之妓“合之凡十有九人”，这些妓女经他在不同场合里加以鼓吹，名声大噪，其中朱素贞、朱月琴、孙文玉、姚蓉初、陆月舫、王雪香等都是几次花榜有名的人物。

花榜对每个妓女都有评语，着墨都在音容、笑貌、身姿、脾性、应酬等女性的魅力方面。因此说，花榜是渲染妓女色相的广告，榜头夺魁者，如同获得金质奖、银质奖的优质商品，吸引嫖客争相购买。如1880年春季花榜状元吴蕤香，色艺兼胜，名声四播。有一个广东巨商，因吴蕤香为花榜状元，不惜巨款想娶为妾，借以向人炫耀。自古重农抑商的观念，使妓女以作商人妇为耻，吴蕤香也不例外。便对巨商说，你要娶我，必须以凤冠霞帔彩舆来迎娶。不料粤商竟满口答应。





可见花榜状元身价之高。

90年代前的这些花榜，都是由个别文人主持的，宣传面还比较狭窄，与后来的小报相比，真是差远了。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办起了各种报刊，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后，上海兴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各种消遣性小报也于此时诞生了。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翌年吴趼人创办《笑报》。李、吴都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他们不满现状，倾向维新变法。但是摆脱不了旧式知识分子的习气，都沉溺于“文酒伎乐之事”，常常发表一些说勾栏、谈风月等色情文字，并开创了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

1897年袁祖志制订《游戏报花榜凡例六条》戏开花榜。当时上海有“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以歌胜者为艺榜，以色美，性格温柔者为艳榜。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竞相投函推荐，《游戏报》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开榜。1897年夏，花榜揭晓：艳榜状元王秀兰，





榜眼金小宝，探花祝如椿，传胪王者花；艺榜状元张四宝。

揭晓那天，上海街头巷尾争购游戏报，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好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开榜入选的，报馆用鼓乐送匾以助兴，榜上有名之妓声名鹊起，生意兴隆。

《游戏报》花榜之举使报纸销路大开，于是，专登妓院消息的小报相继出现。1898年《笑笑报》，1901年《春江花月》，1902年《飞报》、《花天日报》，1903年《花世界报》，1905年《娱闲日报》，还有《闲情报》、《写言报》、《乘风报》、《国魂报》等等。这些报纸仿效《游戏报》开花榜，借机向妓女勒索贿金、犒赏。花榜泛滥，状元、进士贬值。《游戏报》自1897年起连续3年开了6次花榜后，李伯元又别出心裁搞花榜外之花选，其中“四大金刚”是最脍炙人口的。

19世纪末的上海，娱乐场所较少，游玩休息之地就数张园、愚园。愚园地处僻远，从租界繁华区到愚园有相当路程。张园不仅处于闹市区，况且楼阁玲珑，花木荫翳，招





得游客如云，车马如织。上海时髦倌人都云集张园这个猎艳的好场所。名妓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4人每日必到，并且必迟到，一到必坐安恺第门首，凭几啜茗、从不更易。引得满场四座尽倾，众目灼灼，如同迎接贵宾。李伯元顾影风流，无日不游张园，便称四人“为高坐山门之四大金刚”。又因这时上海社会经济畸形繁荣，社会风气也日趋奢侈，林、陆、金、张在提倡青楼新风气中颇为特出，李伯元正式把四大金刚之美名冠于四人，在《游戏报》上发表，从此“四大金刚”之名传播十里洋场。在清末的报刊小说及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有关作品，如《孽海花》、《金陵春梦》等都提到过四大金刚的芳名。

林、陆、金、张四人各有特点。林黛玉善于谈论，妙语诙谐，能使举座为之神怡。擅长唱青衫，平时衣食住行极为豪奢。陆兰芬美而艳，擅长唱昆曲，善于应酬。金小宝容貌俏丽，通翰墨，善画兰，为人豪爽慷慨，有女侠风。张书玉善于修饰、打扮。她们各张艳帜，但经常同来同往，招摇过市，行人





无不注目。

继四大金刚之后有四小金刚张宝宝、左二宝、花紫云、林月英；新四金刚缥缈楼、蟾月阁、谢情香、程静兰；小四金刚秦寓、张颺、王宝宝、潘凤春。都以浓妆艳抹，衣饰豪华招群而夺魁。

可以说，花园总统选举在花榜之举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便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这年秋季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选票每人一张，一张百权票售价1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

1918年底新世界又举行第二届花园选举，仍由奚燕子为花选主任，徐第由刘、奚两人投票37000张得大总统，王宝玉由姓叶的嫖客投票2万张得副总统，宝琴也为副总统，笑意为花务总理，同样是由嫖客大量购买选票





而得中。由此可见，花国选举和政界竞争总统，赂买选票并没有什么差别。不可点只是花国选举仅仅是为嫖客捧妓提供机会，主办单位得以牟利，妓女也可以此来把自己的身价提高。

1920年，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为做广告，也举行花选，只是为区别新世界花选，改花国为香国。3月16日借永安公司天韵楼开票，大总统琴寓、副总统乐情、陈第、国务总理琴楼等。大总统琴寓得到全套西式家具的奖赠。

新世界看到企妹牛奶公司改名香国选举总统，便认为专利权被人所夺，便急忙举行第三届花国选举，距香国选举不到一月。

1920年4月5日起上海资格最老、影响最大的《申报》上也登载了显赫醒目的“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广告，5日下午6点起在新世界北部自由厅内举行第三次选举大会，买门票一张送选票20张，把2,400余名书寓、长三花国群芳陆续请到，轮流到场歌唱戏曲，男女游客都可入座。最后选出大总统好第，副总统曼君、琴楼，国务总理金湘娥





等。琴楼既是香国总理，又是第三届花国副总统，一身而二任。

一年之中花界竟选举出两个大总统，可谓盛况空前。不久，工部局摇珠禁娼，花界也就此偃旗息鼓。

花榜初创时，只是文人科场失意，精神空虚，借戏弄妓女以自慰的一种形式。随着中国殖民地程度的加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场的腐朽黑暗，官吏营私舞弊，文人们屡开花榜的举动又渗透了对现实不满的因素。试看上海几次花榜高潮；都是民族危机临头之际，这是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1880—1883年，上海连续4年，甚至一年二次开花榜。这时正值法国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邻邦越南，以越南为侵略中国的据点，发动中法战争的年代。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镇压了这次运动。国家的情况越来越坏，每天报纸上登载的不是英国租借威海卫，就是德





国租借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俄国强租旅大、日本窥伺福建等等，连篇累牍都是反映中国当时屈辱地位和险恶形势的消息。

面对这种局势、凡有血气的中国男儿无不义愤填膺，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逐步集结到孙中山举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旗帜下，并开始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批旧知识分子既为国家的兴亡安危担忧，又为自身的茫茫前途叹息，于是终日沉溺于醉生梦死之中。就是李伯元、吴趼人这类对现实痛感愤懑，以谴责小说为武器，揭露抨击社会黑暗的文化人，也免不了从吟风弄月、频开花榜中去寻求慰藉。加上上海娼妓业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大做广告。这样自1897年至1909年间，以李伯元的《游戏报》为先声，掀起了第二次上海花榜高潮，制造出一派热热闹闹、莺歌燕舞的太平景象，作为调剂人们神经的一服兴奋剂，其实这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消极发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人们对此寄予了厚望，然而，人民并没有自





由，更没有民主，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好起来。代之而起的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人民感到失望。于是乎停止了几年的上海花榜，以更新颖的形式，更大的规模活跃起来。1917至1920年连续四届花国总统选举，其中寓意，在第一届新世界花国开选后《中化新报》沪乘栏所登的一则评论，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评论说：

“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褻，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





借花国选举之名，意为推翻不代表民意的民国总统，同时以总统之名冠于妓女，企求打破剥夺民众民主的名分之说，这便是上海大肆进行花选的深层原因，本意是以捧高妓女来贬低否定挂着民国招牌的独裁政府。

由此可见，上海接连不断的花榜闹剧，即是逢场作戏，为妓女做广告，同时也是人们用消极的手段嘲讽时局，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形式。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五章

民国电影的发端



风

化

图

史



5



一、新奇的玩意儿：西洋电影

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慈禧太后70寿辰，轰然爆炸之声响起在紫禁城内一片祝寿声中，此非爆竹，亦非革命党人投掷的炸弹，而是英国公使为表祝寿之意进献的电影放映机在映片时发生了爆炸。其时，电影是十分时髦、神秘而技术尚不成熟的东西，发生故障自是平常之事，然而慈禧认为在其寿诞之日发出如此不祥之音不是好兆头，于是降下旨意，自此之后，在宫中禁止放映电影。这一年，上距电影传入中国，下距清朝覆灭，民国建国恰好都是8年。

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在中国电影首次上映。此时，距举世



公认的世界电影时代到来的标志日——1895年12月28日，仅7个半月。7个半月前的这一天，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和《水浇园丁》等几部影片。这些影片除了记录日常生活场景外，还特意安排了一些惹人发笑的噱头，引起轰动。当时，任何一个首次观看电影的人，当看到白色银幕上出现活动的人，自然的景，无不为之惊叹，甚至当银幕上出现迎面驶来奔驰的列车时，观众不由自主地起身躲避，银幕上下起倾盆大雨时，观众情不自禁地撑开雨伞遮挡。因此，电影在诞生之时得以征服观众的首先靠的是被人们看作一种逗人开心的新奇玩意儿。

传入中国后的这个新奇的玩意儿被人们称为“西洋影戏”，以别于中国古时即有的同样是借助于光和影而表演的皮影戏。而今在法国的一家电影资料馆内，也的确陈列了一套中国皮影戏的表演器具。当然，从中国影戏到西洋影戏之间确实有某种因缘关系，但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那就是对近代科技的





运用。

由外商传入中国的电影，首先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站稳了脚跟。作为时髦的新奇玩意，最初多在娱乐、消遣场所放映。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上海后，即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携带一架半新的放映机和日本残旧的短片，来到上海，想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发一笔横财，但由于不谙中国国情，不了解上海人的兴趣，加之放映地点比较偏僻，影片又旧，映出效果不好，苦心经营4年，仍未遂愿，只得转手给了其朋友西班牙商人雷玛斯。

久居上海的雷玛斯，对上海民情心理非常熟悉，深知小市民喜欢噱头和花样翻新，1903年接手加伦白克业务后，即弃其旧片，而向设在上海的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分公司租购了数套新片，试图以新奇取胜。翌年，他租下四马路青莲阁楼下一室专作放映室，青莲阁是地处公共租界闹市区的一座茶楼，内设小型游乐场，是个热闹非凡的处所。雷玛斯又雇人掬着写有简单文句和绘有醒目图画





30年代的女演员蓝萍

的广告牌穿行于附近的大街小巷，在放映室门口，则有身着洋装的吹鼓手击鼓奏乐，招徕了很多观众，生意极为兴隆。雷玛斯没过几年就挣了很多的钱，可称得上是腰缠万贯。

1908年，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甫



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这个以铅铁皮修建的影院可容纳250名观众。此后数年内，他又在上海租界内选择人口稠密、交通便利之处建成多家电影院，如云南路六马路口的中央大戏院、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维多利亚、霞飞路八仙桥的恩派亚等等。雷玛斯成了上海的第一位电影院商人，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其操纵的电影放映网，有各种不同规格的影院以适应各阶层观众的需要。其中最富丽的要数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爱普庐和静安寺路卡德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戏园。比上海略晚，电影也在沿海，继而在内地各城市上映，渐成中国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中国放映的影片中，以法国片和美国片居多，间或也有英国片和德国片上映。影片的内容也逐步由最初的纪录外国舞蹈、风光、魔术的短片以及一些玩弄噱头逗人发笑的影片过渡到有一定情节的滑稽片、歌舞片、爱情片、侦探片等等。当然，所有的影片都是默片，有影而无声。

电影之引人入胜，使中国人萌动了自己





动手拍摄电影的念头。但拍电影毕竟要掌握很复杂的技术及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一般人只能望而却步。因此，第一位主持拍电影的中国人是从事照相这个与电影颇为相近的行业的任景丰，他青年时代即在日本学过照相技术，于1892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1905年，他自德商经营的祁罗孚洋行购得法国造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14卷，开始了中国人拍电影的最初尝试。

1905年秋，任景丰请来了谭鑫培，是著名京剧演员，“谭派”的创始人，在丰泰照相馆内院子里，表演了京剧《定军山》中以做功为主的“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由丰泰照相馆的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利用日光拍摄，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此后该照相馆又拍摄了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生、朱文英、许德义、俞振庭等人表演的戏剧片断。这些中国最早的影片皆是戏曲片，中国电影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舞台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

第一批戏曲影片在北京大栅栏影戏园和





梅兰芳饰演虞姬

吉祥戏院以及其他城市先后上映，备受欢迎，大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然而 1909 年的一场



大火，使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机器设备毁于一旦，中国电影的最初萌芽竟夭折于摇篮之中。

人们如此欢迎反映中国特色艺术的影片，也使外国人更多地注意在中国拍片。早在 19 世纪末，法国和美国的摄影师就曾在中国拍摄过风光片及记录义和团运动的影片素材，至辛亥革命前后，外国制片商在中国拍摄的影片，大多是猎奇性的风光纪录短片。中国人自己拍的纪录片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由中国人朱连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合拍的纪录片《武汉战争》，摄下了武昌起义时的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从 1896 年电影传入中国至 1911 年辛亥革命这 15 年中，电影逐步为中国观众熟悉、接受。尽管电影是由西方商人以赢利为目的带入中国的，而且当时的西方电影也处于萌芽状态，艺术、技术上都很不成熟，但西方电影在华放映，毕竟开了中国电影文化之先河。

二、走向繁荣的 20 年代电影界

在 1922 年前后，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兴





旺和繁荣的时期。至 20 年代末期时，中国电影在电影机构的组织、电影制作的实践和电影理论的创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联华篮球队来南京比赛，由影帝金焰领军（右），他的长袍下面穿着篮球鞋，明星王人美（左）则特别来南京助兴。两人在一辆老爷车前留影，金焰正襟危坐，惹得王人美展露笑颜。

电影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涌现了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和电影人材的成长。20 年代初，电影尚被看作是一项要冒极大风险的事业，因为每拍一片，必先投下巨资，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元，能否赚钱却无准数，蚀尽资本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当时的电影公司少之又少。然而，《阎瑞生》等片引起的轰动效





影星胡蝶

应，更改了人们对电影业看法，尤其在一些投机商人眼中，电影业一夜之间成了摇钱树。当时，一大批从事交易所失败的投机商人，转而开始在电影业进行新的投机。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一片的成功，更加激起



影星杨耐梅

人们对电影业的兴趣。到 1925 年，在上海、北京、天津、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广州、香港等地，已有电影公司 175 家，其中，140 余家在上海。可见电影业的空前繁荣和投机风的盛行不衰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些电影公司中，不乏空挂其名而始终未拍出影片来者，在 54 家曾有影片出品的公司中，

拍完一部，赔尽资本而关门大吉的“一片公司”也不在少数。因此，从众多的电影公司如过眼烟云般此起彼伏的表面现象来看，20年代电影的繁荣是畸形的，尽管畸形但是中国电影在20年代可观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万家灯火》剧照（蓝马饰胡智清 上官云珠饰又兰）

在实际上并非轻而易举即能大赚其钱的电影行业里，在旧公司不断倒台，新公司层出不穷的过程中，出现了几家引人注目的公司，如“明星”、“民新”、“长城”、“神州”、“大中华百合”、“天一”等，它们或依靠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或凭借确有专长的艺术和



技术人材，或发掘到了吸引观众的电影题材，甚或上述几方面兼具，从而构成了 20 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并且使得电影除了作为招财进宝的摇钱树而存在的同时，有了作为一个新兴的艺术种类而成长的可能。对于作为艺术的电影的求索，正是这些公司区别于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公司的显著特点。在这些公司中，容纳了 20 年代中国最杰出的电影人材，公司老板赚钱的愿望与电影艺术家艺术上的追求基本上并行不悖，甚至互相促进；更有像张石川、郑正秋、黎民伟、但杜宇、邵醉翁等兼公司老板与电影艺术家于一身者。20 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已经出现了一支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专业人材组成的初具规模、大致整齐的电影工作者队伍。由于他们共同的孜孜探求和不断实践，终于使电影开始独立于中国艺术之林。

活跃于 20 年代的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们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第一是始创了一套在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电影理论；第二是拍片经验的积累和对青年后学的培养。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陶金饰张中心良 舒绣文饰王丽珍）

中国于20年代初开始产生了最初的电影理论。其时，中国电影尚处于模仿西方影片的阶段，但中国电影理论的形成，走的却是一条“土生土长”的路。决定中国电影拓荒者及其后继者们电影观念形成的因素，不是来自西方的电影理论（其时西方经典电影理论尚未问世），而是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当人们一旦发现电影并不仅仅是消遣的游戏时，即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戏剧，于是，顺理成章地引入了戏剧和文学理论来阐述电影，又经过早期电影艺术家的拍片实践的反复论证，

约略在 20 年代中期，一种以“影戏”概念为核心的电影理论——影戏理论已具雏形。

侯曜在完稿于 1925 年的《影戏剧本作法》一书第一章绪论中指出：

“影戏是戏剧之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他都具备。他不但具有表现、批评、调和、美化人生的四种功用，而且比其他各种戏剧之影响，来得更大。”




《十字街头》剧照（白杨饰杨之瑛）



这段话可谓对影戏理论电影观念的概括。该理论首先以电影就是戏剧之一种为前提，认为电影与戏剧、文学在对人生的态度和社会功能方面是共同的，这是影戏理论的核心之所在，即必须从艺术表现的整体功能出发来把握电影，执着于电影的戏剧性与文学性，强调其寓教于乐、教化社会的功能。因而必然充分重视，电影要表现的内容及其作用。同时，也初步认识了电影的特性和特殊表现手段，形成了最初的关于电影技巧的理论，对于电影的时空构成、导演技巧、演员表演等方面都有论及，但这些往往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且与戏剧理论混杂在一起。由于电影的本质是戏剧的观点根深蒂固，“电影性”未能被视为电影的根本，也就鲜受重视。在电影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往往大量地借用戏剧理论。

20年代电影很显然受到了影戏理论的影响。活跃于20年代影坛的许多电影艺术家评论家如侯曜、郑正秋、徐卓呆、洪深等人就是影戏理论的创始人。洪深在1920年为中国影片制造公司所拟《征求影戏剧本》启事中





提出的“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能表示国风，沟通国际感情”的主张，以及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创办时提出的拍摄影戏“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的“长片正剧”的制片方针，无不与影戏理论相吻合。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他们的拍片实践中，电影题材和电影剧本备受重视，剧本被视为电影的灵魂。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更使他们将电影视角对准贫富、家庭、伦理、妇女等问题，于是，“伦理片”、“社会片”、“问题剧”等一一登上银幕。在这几类影片中，表达对穷人的同情，对恶势力、封建礼教的憎恶，以及改造社会的迫切愿望。这几类影片中的成功之作无疑是20年代电影中的佼佼者。影戏理论疏于探索电影特性的局限，则使20年代电影较多地借用和融合了传统戏剧的手法与技巧，从电影的剧作、结构以及导、演、摄、美各方面都表露出明显的受戏剧影响的痕迹。

影戏理论的初创，使中国电影的传统可以溯源至20年代初。

在拍片实践方面，20年代电影所积累下



《乌鸦与麻雀》剧照（赵丹饰肖老板吴茵饰肖妻）

来的经验是丰富的。尽管在当时，在更多地注重影片社会功能的影戏理论影响下，还没有完备的电影技巧理论，但在那些不善抽象思辨而注重实干的电影艺术家如郑正秋、张石川、史东山、洪深等人那里，他们所实际掌握和运用的电影技巧远比他们用文字表述出来的要灵活、实际和高明得多。因此，他们拍出了值得称道的影片。在拍片过程中，他们不断成熟，又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新的电影人材，一批在 30 年代大放异彩的电影艺术家。其实就是 20 年代电影界



孕育着的。

三、风靡一时的古装片

1926年末和1927年，一股“古装片热”在影坛上掀起，各家电影公司，纷纷从中国古典小说、民间传说中寻找题材，古装片占据这个时期电影出品的大多数。其实天一影片公司乃是这股“古装片热”的始作俑者。

浙江宁波人邵醉翁于1925年6月创办“天一”。他曾经过商，后又搞了数年的文明戏，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营业上的成功，促使他萌动了拍电影的念头，于是联络其三个弟弟，以文明戏演员作为演员班底，创办了“天一”。排行居长的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任会计，三弟邵山客（仁枚）任发行，六弟邵逸夫任外埠发行，公司设在上海闸北横滨桥。

“天一”成立的那个一年就完成了《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和《忠孝节义》三部影片。三片皆由参与创办“天一”，亦是公司重要成员之一的高梨痕编剧（后两部影片的编剧还挂上了邵邨人的名），邵醉翁导演，徐





绍宇摄影。《立地成佛》讲述了一个军阀在爱子战死后，经一高僧点化，放下屠刀，尽悔前非，转而主张“废督裁兵”，“移兵筑路”，最后，不仅“通电下野”，而且深感一生罪孽深重，乃“遣其妻妾，散尽财帛”，“削发入山”。该片虽然表现了人民普遍厌恶军阀战争的心理，但却一厢情愿地幻想嗜血如命的军阀会“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描写了李飞飞如何营救被诬失贞的少女，使其与未婚夫“亦绳重续，终成眷属”的故事。《忠孝节义》（又名《四贤士》）则叙述了在忠仆、孝子、义士的帮助下，一位被恶叔逐出家门的孤女最终得全名节并成为县长夫人的故事。以“天一”最初的三部影片即可看出，带有严重封建伦理色彩的传统道德是该公司所宣扬的。“天一”也颇以此为自豪，在其宣传广告中，大肆张扬这一点，说《女侠李飞飞》“发聩振聋，有功世道人心”；说《忠孝节义》“集中国数千年来遗传之美德”，“可钦可敬，可歌可泣，足以劝世人而励末俗，诚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所有这些，也都印证了“天一”所标榜的制片方针：“注重旧道德、旧伦





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一尊佛像被选作“天一”影片的片头标志。

“天一”热衷于传统道德伦理，是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理的。20年代，西方文化已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国各阶层人民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电影更使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故而出现了像上海影戏公司、大中华公司这些专拍欧化片的公司。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使很多旧知识分子深感不安，面对旧道德旧价值观的沦丧他们有一种失落感；更广大的市民阶层一方面羡慕西方的生活，一方面又喜闻乐见那些在旧伦理框框中演绎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而在文学、戏剧等领域突飞猛进的新文化运动对电影界几乎没有触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天一”揭出的“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旗帜才如此吸引观众。“天一”最初三影片虽然宣传的是过时的东西，演员表演也很一般，但照样卖座叫好，从而使其继续沿着这一制片方针走了下去。

既然要注重旧道德伦理，又要力避欧化，





那么，最好的题材莫过于那些在中国人尚不知欧洲为何物的遥远的过去发生的故事。因此，根据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改编拍摄的影片在“天一”大量登台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天一公司于 1926 年迁往华德路，是年，“天一”一气拍出了《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上、下集）、《珍珠塔》（上、下集）、《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唐伯虎点秋香》等 6 部根据古典小说和民间故事改编的影片（这一年“天一”一共拍了 8 部影片），大多由胡蝶主演。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是这些影片的原型，其本身就是瑕瑜互现、精华和糟粕的杂糅物，由于改编者出于维护旧道德伦理的立场和出于渲染哀艳情节以及利用电影大摆噱头的需要，所取的恰恰是这些故事中的糟粕，津津乐道于“韵事”、“艳迹”、“玄机”、“贞烈”等等，加之拍摄者的投机作风，为省钱和赶时间不惜粗制滥造，因而这些影片，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民间故事毕竟以文学、戏剧、说唱等形式流传了相当长时期，已深入人心，且百听百看不厌。“天一”以电影的形式，将





其在银幕上演映出来，还是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人们尤其是市民阶层争相观看。

1927年，“天一”继续大肆拍摄古装片。由于古装片在南洋大受欢迎，遂与南洋影片商人陈毕霖投资开设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在“天一青年”名下，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铁扇公主》等片，大多由胡蝶或陈玉梅主演。直到1928年下半年，“天一”才与“青年”拆档，恢复以“天一”名义拍片，胡蝶于此时转入明星公司，此后陈玉梅便是“天一”的台柱。

“天一”古装片的成功，引起电影界群起效尤，特别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投资开办的电影公司，更是竞相拍摄古装片。于是，自1926年岁末1927年初开始，影坛出现了“古装片热”，各家影片公司，不分大小，几乎尽数卷入。改编的热点，大多集中在《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等数部知名度极高的古典小说和话本故事。如“大中华百合”拍摄的《大破高唐州》；“长城”拍摄的《石秀杀嫂》、《武松血溅鸳鸯





楼》、《火焰山》和《真假孙行者》；“神州”拍摄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民新”拍摄的《西厢记》和《观音得道》；“上海影戏”拍摄的《盘丝洞》和《杨贵妃》；“大中国”拍摄的《猪八戒招亲》、《孙悟空大闹天宫》、《曹操逼宫》、《哪吒闹海》等等。这些故事既曲折精彩，又脍炙人口，改编者大多只图赚钱，根本无心再创作，仅求将故事敷衍而成；观众出于好奇心理，主要想一睹他们已熟知的剧中人物的风采以及满足于一些电影特技镜头。因此，“天一”首开其先的粗制滥造古装片之风，竟愈演愈烈。

当然，也有少数公司拍摄的部分古装片的制作是比较精心和负责的。如民新公司拍摄的《木兰从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大中华百合”拍摄的《美人计》和“上海影戏”拍摄的《杨贵妃》。前者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刘备渡江赴甘露寺相亲的故事，由朱瘦菊编剧，陆洁、朱瘦菊、王元龙、史东山联合导演，周诗穆、余省三摄影，黎明晖、王元龙等主演，阵容整齐。在摄影棚内搭建的宫廷布景，画栋雕梁，雄伟富丽；





外景地选在苏州西园和城外宝带桥，与剧情比较相符。公司不惜投下巨资，历时一年方告完成。该片是这一时期古装片中制作最为认真，艺术质量也最好的一部，然而上座却很一般，致使公司亏蚀。《杨贵妃》由姚苏凤编剧，但杜宇为导演兼摄影。时殷明珠正怀孕在身，故由贺蓉珠主演，并排出了公司最强阵容。在置景上也下了大本钱，所搭瑶华宫、长生殿、华清池皆瑰丽雄伟。但杜宇有心使该片能与“大中华百合”的《美人计》一争高下，但《杨贵妃》最终也未能避免重蹈《美人计》的覆辙，拷贝所卖无几，公司亏蚀甚巨，但杜宇几乎倾家荡产。危难之际，殷明珠献出了全部私蓄，但杜宇方得重整旗鼓。

古装片的兴起，犹如一股怪潮，席卷了影坛。最可惜的是，20年代影坛上仅有的几家出品格调比较高雅、艺术上有所追求而自成一派的公司，如“长城”、“神州”、“民新”也被这股怪潮冲得稀哩哗啦，不得不舍弃自己的追求而随波逐流，也大拍起所谓古装片来。另一家更为著名的公司——明星影片公





司则很快使古装片走到了其极端——武侠神怪片的路上去了。

四、武侠神怪片盛极而衰

当人们不再热衷于“古装片”时，明星公司出人意料地燃放了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烧红莲寺》，“火烧片”从此登场。《火烧红莲寺》这把火一烧，竟使武侠神怪片在影坛称霸长达4年之久。

1927年，随着上海四·一二事变的枪声，大革命激起的热情渐趋冷淡，政治空气变得沉闷。在文坛上，武侠小说开始泛滥起来，各报刊每天千儿八百字的连载小说，十之八九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将读者带到了远离现实的幻想世界，在那里，善者成正果，恶人遭报应，书中描绘的种种令人牵肠挂肚的离奇情节，使读者欲罢不能。

一个偶然的机会，“明星”的老板张石川读到了一本当时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曾东渡日本，写过描绘清末留日学生生活的《留东外史》，对中国武术历史掌故





也知之甚多，一本《江湖奇侠传》凝聚了他不少心血。张石川以其老到的生意眼，一下就相中此书，料定据此改拍电影，必能抓住观众的心。随即与郑正秋、周剑云商定拍摄计划，由郑正秋主要根据原小说第八十一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等章节改写出剧本，定片名为《火烧红莲寺》。导演是张石川。

《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是：湖南浏阳和平江交界处的两县农民为争夺码头而发生械斗，双方均邀武林高手相助，浏阳县民被平江县民阵中一华服少年用梅花针击败。为了复仇，浏阳县绅陆凤阳之子小青投昆仑派大师金罗汉门下，练成武艺，返家途中，投宿红莲寺，无意中发现寺中机关重重，有美女出入，顿生疑窦，正欲继续窥探，却被知客僧发现，被关入斗室。此时，昆仑派的甘联珠、飞剑小侠陈继志和总督保镖柳迟适来寺中探访亦被困在寺中的总督卜文正，小青于是得救。四侠攻破红莲寺，救出总督，放出良家妇女，火烧红莲寺，但淫僧知圆和尚乘乱逃遁。

剧本写出来了，要将其搬上银幕却非易事。因为剧中人物皆有凡人不能企及的武功，





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架着剑光御风而行，电影界尚未有成功地制作这样特技的先例。担任摄影的董克毅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查阅了能见到的外国资料，又借鉴了传统戏法和魔术手法，加上动画技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张石川虽料定该片定会大受欢迎，但为求保险，并未标出是第一集，只是在片尾放跑了知圆和尚，埋下续集的伏笔，后有人戏称张石川放了个大和尚去打探行情。

1928年，《火烧红莲寺》片成上映，果不出张石川所料，上海滩为之轰动，在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同样是观者如潮，“明星”大赚其钱。《火烧红莲寺》也就欲罢不能，一集接一集地续拍下去，至1930年，一气拍了18集。郑正秋终觉这种影片与他一贯主张的教化社会的电影方针有悖，故自第二集起，不愿再任编剧。于是，张石川一手包办了编剧和导演，他利用第一集中留下的线索，在以后的诸集中，描写了知圆和尚投奔甘瘤子，商量复仇大计，再引出女侠红姑和金罗汉，昆仑派和崆峒派高手大斗法，直至第18集，浏阳请出哭道人，平江请出笑道





人，进行哭与笑的比赛，结果笑道人战胜哭道人，平江终于获得码头。在自第二集以后各集的演员阵容中，增加了刚从“天一”转入“明星”的胡蝶饰演女侠红姑，颇为观众喜爱，因该片而出名的演员还有夏佩珍等人。

《火烧红莲寺》的成功，为在古装片的怪圈里打转转的电影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各家公司纷起效法，大拍起武侠神怪片来，一时里，“到处起火，有寺必烧”，如《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白莲庵》、《火烧剑峰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灵隐寺》、《火烧平阳城》等等，不一而足。除所谓“火烧片”外，其他的武侠神怪片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关东大侠》、《乱世英雄》、《江湖二十四侠》、《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影片，不少以片集方式出现，多者达十余集，少的也有三、四集。上海各家电影制片公司，包括较有名气的“天一”、“上海影戏”等公司，都卷入了武侠神怪片的热潮，还出现了“月明”、“友联”、“华剧”等数家以专拍武侠神怪片而闻名的公司。





武侠神怪片是续古装片之后又一个电影题材的大热门，据估计，1928年—1931年间，上海全部约50家电影公司，共出品影片近400部，其中竟有250部左右是武侠神怪片，占了全部影片的十分之六七。这在电影业尚被当作投机者一显身手的好场所的20年代后期出现是不足为怪的。银元吞没了艺术家的良心。武侠神怪片的大流行，在“电影化”方面和电影技术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但思想上、艺术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公司在拍摄武侠神怪片时的粗制滥造作风较之古装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起初，根据小说改编的武侠片尚基本忠实于原著，到后来，则由编导任意编造了，怎样能吸引观众就怎样编。“明星”所拍《火烧红莲寺》的后数集，完全由张石川“凭着自己的胡思乱想，留下前集里的几个主角，随心所欲地搞下去了，拍了上半截，下半截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友联”的《儿女英雄》拍到后来，竟让十三妹生下个小十三妹。“天一”的连集长片《乾隆游江南》中，乾隆这位正当盛世的大清皇帝居然割去长辫，留起了小分头。



在“大中华百合”的武侠片中，中国的侠客却是一副美国西部片中英雄的打扮：大呢帽、小管裤、宽腰带。“上海影戏”的武侠片则一味追求所谓感观的享受，大拍美人图。



“孤岛”影星陈云裳

武侠神怪片中也有制作和表演都比较认真的，其中情节比较曲折合理，人物塑造较



有个性，但就影片表现的思想意识来说，却是陈旧和苍白的，摆脱不了因果报应、惩恶劝善的说教，甚至显露出封建迷信色彩。

武侠神怪片的大流行，除了它与古装片一样，由于长期延续而形成的市民文化传统使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天生就受广大市民阶层欢迎以外，还由于刚刚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大革命的失败给整个社会蒙上了厚厚的阴影，而武侠神怪片借用新奇的电影特技摄影所展示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武打场面，恶人终遭报应的千篇一律的套路，正好使人们求得精神上的暂时解脱。

但随着这类影片的大量涌现，人们渐渐失去了新奇感，那些粗制滥造的武侠片更使观众倒了胃口，正直舆论也对银幕上的一团乌烟瘴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到30年代初，武侠神怪片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加上南京国民党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乃由“电影检查会”明令禁止“提倡迷信邪说”之影片，又于1934年7月会同警方查抄了“暨南”等6家公司，没收神怪影片。此后，武侠神怪片渐趋销声匿迹。但由于这类影片在海外，





尤其在南洋及一些城市末流影院仍受欢迎，暗中偷偷制作这类影片的作坊式的公司仍未绝迹。作为一种电影现象，武侠片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地道的中国特色。20年代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片对其后上海“孤岛”影坛的同类影片乃至60年代以后兴起的香港武侠片的影响不应忽视。

五、争奇斗艳的女影星

默片时代的女影星较之男影星更为引人注目，她们的知名度也更高，但电影女演员的历史却比男演员短。如果说，谭鑫培于1905年成为第一个走上银幕的男演员的话，那么，第一位走上银幕的女演员则是在8年后才出现的。1913年，黎民伟拍摄《庄子试妻》，大胆地起用了他的夫人严珊珊饰演片中使女一角，严珊珊遂成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演员。

严珊珊是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懿德师范。辛亥革命时，她曾参加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队。她之上银幕，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当时，不用说是电影，





影星王丹凤

即使在文明戏舞台上，也没有女演员，舞台上的女角，皆由男演员反串，女人演戏，抛头露面，为众人观看，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更何况电影，其特写镜头可将人的面容放大几倍乃至几十倍。严珊珊这位首开女人拍电影风气的女演员于 1928 年退出影坛，1952 年病逝。



在严珊珊走上银幕之前及以后的七、八年内，银幕上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扮演，即使在《庄子试妻》一片中，严珊珊所饰的使女，也仅是偶而露面的配角，主角庄子之妻仍由黎民伟反串。直至1921年拍竣的《阎瑞生》中，王彩云扮演妓女王莲英一角，才首次由女性担任女主角，她也就成为上海影坛第一位女演员。而真正成为女明星的，殷明珠当属第一人。

殷明珠江苏吴江县人，生于书香人家，其父是一位画师，在苏浙一带略有名气，但去世较早。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举家迁



影星殷明珠



往嘉兴，不久再迁上海。殷明珠就学于上海中西女塾，在这所由洋人办的学堂中，她受到西方文化的薰染，学会了跳舞、唱歌、游泳、骑马、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又生得美丽动人。她喜着洋装，又常摹仿外国影星装束，因而人们呼之 F. F. (Foreign Fashion) 女士，意为“洋派”人物。殷明珠在交际场中结识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但杜宇，两人志趣相投，殷明珠很羡慕西方影星生活，但杜宇却想尝试拍电影，因此，“上海影戏”的开山之作《海誓》的女主角就非殷明珠莫属了。拍片前即已在交际场中出名的殷明珠初登银幕更招徕大量观众，她成了名符其实的明星。此后，她又主演了《重返故乡》、《传家宝》、《盘丝洞》等近 20 部影片。她以其美丽的风姿，时髦的衣着一直吸引着大量的电影观众。在拍片生涯中，殷明珠与但杜宇产生了诚挚的爱情，1926 年春节，他俩结为夫妇。

中国第一位悲剧女演员是王汉伦，因扮演 1923 年明星公司创作的《孤儿救祖记》一片的女主角而一举成名。王汉伦（1903—1978 年），江苏苏州人，原名彭剑青，其父曾历任





影星王汉伦

安徽招商局、制造局督办，在王汉伦 16 岁时去世。王汉伦于此时中断了在上海圣玛丽女校读书的学生生活。不久即由兄嫂作主，远嫁东北，后又随夫到上海。由于夫妻感情不合，她毅然离家出走，自谋生路，曾先后当



过小学教员和洋行的英文打字员。1923年，明星公司到处寻觅具有大家闺秀风范的女性来饰演《孤儿救祖记》中贤媳余蔚如，经人介绍，找到了王汉伦，张石川见她气质不俗，且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试镜头，活脱脱一位贤慧的少奶奶形象，余蔚如一角就此敲定。王汉伦在该片中，果然将惨遭丧失横祸，又受谗言诬蔑，仍忍辱负重，育子成人的余蔚如的悲痛、愤懑和坚忍不拔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打动了观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悲剧形象。在接下来主演的《玉梨魂》中，她饰演的梨娘是早期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1924年，王汉伦进入“长城”，作为该公司的主要演员，主演了《弃妇》、《摘星之女》和《春闺梦里人》。她还为“天一”和“新人”拍过影片，曾以汉伦影片公司的名义拍摄过《盲目的爱情》。此后脱离影界，在上海开设汉伦美容院。

默片时代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宣景琳，曾在30余部影片中扮演过各种角色，“从小姑娘、童养媳、少奶奶、老太婆到妓女、舞女、泼妇、交际花乃至女流氓、女侠





客等，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均演过。宣景琳，苏州人，生于1907年，在上海长大。落地仅4个月就死了父亲，童年在贫苦中度过，只念过几个月的书。自幼即喜爱戏剧。正当青春年华时，却不幸堕入青楼。1925年，张石川导演《最后之良心》，经“明星”演员王吉亭介绍，宣景琳首次走上银幕，饰演刁钻放荡的秦女一角，得到一致好评，遂由张石川为其赎身，正式成为明星公司的演员。同年，主演了《小朋友》、《上海一妇人》和《盲孤女》，都是悲剧角色，宣景琳对她扮演的角色——寡妇、妓女、女工的悲惨境遇有深切体会，演得自如、感人。成名以后，她又为“明星”主演了《早生贵子》、《多情的女伶》、《少奶奶的扇子》等数部影片。1931年，她在“天一”首部片上发音有声片《歌场春色》中担任主角，为拍好此片，曾拼命练习国语和歌唱。30年代，宣景琳在“明星”所拍《前程》、《母与子》、《女儿经》、《姊妹花》、《大家庭》等多部影片中扮演了多种角色，而其最为成功的就是扮演的老妇的角色。在《姊妹花》中，她饰演的母亲年龄跨度从





30多岁一直到60岁，她循序渐进，真实、细致地塑造了这一形象。1936年她与医生沈鸿来结婚后退出影坛。

成名于王汉伦之后的张织云，广东人。3岁时丧父，跟随养母在上海长大。1923年，筹备中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招聘演员，时年18岁的张织云前去应试，为公司创办人之一的顾肯夫赏识，遂被录取，并担任了“大中华”首部影片《人心》的女主角，张织云因该片而成名。接着又主演了“大中华”的第二部影片《战功》。此后入“明星”，主演了《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空谷兰》等片，张织云端庄而不失妩媚的形象令影迷为之倾倒，一时声名大振。1925年，上海新世界游艺场主持选举“电影皇后”，张织云压倒群芳中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在银海生涯中，张织云与曾给她很多帮助的摄影师、导演卜万苍相恋而同居，在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后，双双转入“民新”，由卜导演、张主演拍摄欧阳予倩编剧的《玉洁冰清》。自此，张织云常被“民新”老板之一的李应生的夫人周淑芬相邀出入于社交场所，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的生活渐渐腐蚀了她的灵魂。《玉洁冰清》使张织云名声大振，获得了“悲剧圣手”的称号，但拍完该片后，张织云与卜万苍宣告离异，投入了茶商唐季珊的怀抱。在拍了一部《未婚妻》后即息影影坛。1934年曾一度复出，然因国语不佳，不受欢迎，从此不复上银幕。

继张织云之后，荣登影后宝座的是陈玉梅。陈玉梅原名费梦敏，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摄制的《松柏缘》中作为配角初上银幕。1927年进入“天一”，主演了《三笑》、《夜光珠》、《双珠凤》等片。不久，嫁与“天一”老板邵醉翁。邵曾不惜花费金钱，购买刊有选举电影皇后选票的杂志，为陈玉梅争来了电影皇后的冠冕，尽管她的演技并不十分出众。

上海影坛另一位擅演悲剧的女影星丁子明，原籍浙江吴兴县，生于1907年。毕业于苏州蚕桑学校，后随父母迁居上海。自幼性格内向，喜静思、读书，沉默寡言。故当家人得知她已报考电影演员的消息时大吃一惊，料她未必能被录取，然而她竟然考中，家人





虽有微词，怎奈丁子明其意已决。她作为神州公司的首席女明星，曾主演了《不堪回首》、《花好月圆》、《难为了妹妹》等片，所饰角色，大多带有悲剧色彩，故拥有“悲旦”之称。“神州”结束后，她转入“明星”，主演了《同学之爱》、《黑衣女侠》等片后，退出影坛。数年的银海生涯，还使她获得了“最规矩的演员”之誉。

自殷明珠以其青春美丽的风姿展现于银幕，观众一直喜爱这类形象。继殷明珠成名之后，黎明晖又以青春影星的形象与观众见面。黎明晖是“明月歌舞团”创始人黎锦晖的女儿，从影前即以演出歌舞而成名。在风气尚很保守的20年代，妇女总是梳长辫，着长旗袍，而黎明晖“短发赤脚，短衣短裙，像无拘无束的小鸟一样在台上又唱又跳”。随着社会风气的开化，“明晖的名声也一日高似一日”。她于1925年涉足影坛，首次在“大中华”的《战功》一片中饰妹妹一角。“大中华百合”成立后，她成为公司的主要女演员之一，主演了《小厂主》、《透明的上海》、《殖边外史》等多部影片，并曾参与“明星”《新





人的家庭》的拍摄。她以活泼爽朗的本来面貌出现于影片中，深得青年学生的赞赏。30年代，她加入“艺华”，主演了《女人》、《生之哀歌》等片，又为“明星”拍摄了《清明时节》等片。1934年与上海东华足球队守门员陆忠恩结婚，从此退出影坛。

“民新”老板李应生之女李旦旦也是一位青春影星，她外貌漂亮，游泳、骑马、开汽车样样都会。1927年她初上银幕，即主演欧阳予倩编导的《天涯歌女》，尽管她难以体会片中女主角饱受磨难流落天涯的心情，但仍引人注目。此后又主演了《西厢记》、《木兰从军》等较对她戏路的片子。后退出影坛，随丈夫前往欧洲，并进航空学校，学会了开飞机。30年代，改名为李霞卿的李旦旦，曾回国做过飞行表演，轰动一时。

20年代末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武侠神怪片造就了一批武侠女星，夏佩珍、范雪朋、邬丽珠和徐琴芳4位是最为著名的。

夏佩珍（1911—1975年），明星公司捧起的武侠红星，原籍山东历城，其叔父夏天忍是上海文明戏舞台上的著名悲旦，经他推荐，





武侠红影星夏佩珍

入明星影戏学校。1928年，“明星”开拍前文曾提过的《火烧红莲寺》，她被选为女主角昆仑派女侠甘联珠的饰演者。尽管她并不很漂亮，但眉宇间有股勃勃英气，又很刻苦，女侠正对她的戏路。该片拍成上映，一鸣惊人，





跻身于一流明星的行列。她一气主演了 18 集《火烧红莲寺》，成为最走红的武侠女星。武侠片衰落以后，她在“明星”仍居主要演员的地位，在《狂流》、《落霞孤鹜》等片中，有较出色的表演。可惜染上鸦片毒瘾，不能自拔，终被影片公司抛弃不用。

范雪朋和徐琴芳均是“友联”的武侠红星。范雪朋（1908—1974 年），原名姚雄飞，江苏宜兴人。4 岁丧父。曾在常州读书，14 岁时辍学在常州当上了摇袜女工。后经同学、陈铿然夫人徐琴芳介绍，进入了友联影片公司。1927 年因饰演《儿女英雄》女主角十三妹而走红，为拍此片，她苦练骑马、射箭、使刀、舞枪、弄棍，加上电影特技，银幕上，她的武功和俏丽的外貌令观众叹服。她还为“友联”拍了《红侠》、《江湖情侠》等多部武侠片，但“对于武侠片，后来感到又腻又怕”。“友联”于 1932 年毁于“一二八”战火后，范雪朋与丈夫文逸民创办了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 4 部影片，因暴露社会阴暗面的影片《铁链》被禁而关门。此后，她又转入“天一”和“艺华”，拍摄了数部影片。





徐琴芳是“友联”的老板娘和台柱。她是江苏常州人，随家迁居上海，入中华电影学校。不久，结识陈铿然并与之成婚。1928年陈铿然创办“友联”，她主演了最初几部影片，但反应平平。后经她推荐的范雪朋主演《儿女英雄》引起轰动，使她为之心动，便于1930年主演《荒江女侠》，果然因此走红，两年间，连拍13集，备受武侠片迷的青睐。30年代曾应邀担任“新华”首部影片《红羊豪侠传》的女主角，此后退出影坛。

“月明”的武侠明星邬丽珠，早年曾在“精武体育会”受过严格训练。1928年她与查瑞龙主演的《关东大侠》使她跻身武侠红星行列。银幕上的邬丽珠英姿飒爽、身手矫健，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舞枪弄棍灵巧异常，深受观众的欢迎。《关东大侠》连拍了13集，“月明”因此在南洋拥有很高声望。1931年，邬丽珠在其姐姐任（邬）爱珠去世后，嫁与姐夫、“月明”老板任彭年，继续拍摄《女镖师》等武侠片。月明公司关门后，她又随夫赴南洋各地登台演出，并在香港为“南洋”、“大中华”等公司拍摄了《怪侠一枝梅》、《剑





光血影》等武侠片。直至 40 年代末，她仍有武侠片问世。邬丽珠拍摄武侠片的生涯长达 20 余年。

六、璀璨的明星阮玲玉

阮玲玉（1910—1935 年）原名阮玉英，原籍广东中山县，生于上海一机器工人之家，取名凤根，乳名叫作阿根。童年在贫穷中度过，6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只得外出帮佣，才勉强维持生计。阮玲玉 7 岁时就伴随在做佣人的母亲身旁，帮助母亲替主人料理杂务，形同丫环，母亲为了让心爱的女儿长大后能有出息，省吃俭用，在她 9 岁时送她进了上海崇德女子学校读书。在学校，她能歌善舞，是学校游艺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并由此产生献身艺术的朦胧憧憬。16 岁时，她的天生丽质为一富家少爷张达民看中，她带着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和改变母亲帮佣生活的拳拳之心，自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辍学，开始了与张达民的同居生活。然而，极重门第的张家却不肯接纳婢女出身的阮玲玉为媳妇，张、阮一直未能正式缔结婚姻，而张达





民也渐渐失去了追求阮玲玉时的那一份温柔与体贴。不久，张父去世，张家分了家，张达民无正式职业，只是挥霍，眼见坐吃山空，夫妻二人时有口角。阮玲玉决定要自谋职业，自己来养活自己。

1926年，明星公司为拍《挂名的夫妻》招考演员。阮玲玉毅然前去应考，由于心情紧张，试镜头并不成功，但导演卜万苍独具慧眼，极为欣赏她的艺术天分，因此她被“明星”录取，改名阮玲玉，主演了《挂名的夫妻》，一举成名。不久，古装片、武侠神怪片在影坛泛滥，阮玲玉为“明星”拍摄的《血泪碑》、《杨小真》等4部影片皆属此列。1929年，阮玲玉转入“大中华百合”，又拍了《情欲宝鉴》、《劫后孤鸿》等片，艺术上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但却使阮玲玉积累了拍片经验，谋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1930年，“大中华百合”并入“联华”，阮玲玉得以在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中担任主要角色，孙瑜对程式化的表演方法的摒弃和对演员体验角色心理的启示，使阮玲玉领略到了电影表演艺术的另





一番天地，此后她又一连主演了《恋爱与义务》、《一剪梅》等“联华”早期影片，还利用余暇手不释卷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以及艺术书籍。艺术天才、名导演的指点和刻苦学习这三者在阮玲玉身上的叠加，终于使她于30年代初跻身一流演员的行列。

左翼电影运动兴起以后，阮玲玉主演了“联华”的第一部左翼影片《三个摩登女性》，选择饰演女接线员周淑贞，她将这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女青年塑造得既感人，更鼓舞人。从此，她潜心于进步影片的拍摄，在《城市之夜》、《小玩意》、《香雪海》、《神女》、《新女性》等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被迫害的女性形象。

阮玲玉在不到10年的电影演员生涯中，尤其是在“联华”的6年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形象，有小家碧玉、村姑。丫环、妓女、卖花女、姨太太、交际花、女学生、歌女、女工、教师、女艺人等等，这些人物生活道路虽然各异，但受压迫被迫害遭凌辱却是她们共同的逃脱不了的命运。

阮玲玉的表演真实、细腻、朴素、自然，





没有过火的表演，没有斧凿的痕迹，没有程式化的套路，她饰演的角色不仅形似，更求神似，从她的表情体形动作上，将角色的心理活动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她的表演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为同时代演员所难以企及。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师的指点和刻苦学习以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在浦东工人住宅区度过的艰辛的童年使她饱览了工人生活的苦难，跟随母亲做佣人的少年时代使她亲身体会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了一层理解，使她更迫切地寻求解放的道路。所有这些，她通过在银幕上创造的角色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使得她的表演是那样的坦然和真挚。

当阮玲玉的名气一天大似一天的同时，她与张达民的隔阂也一天天加深。1933年，阮玲玉终于与张达民办理了分离手续。不幸的是，刚摆脱了张达民的阮玲玉却轻率地与情场老手的茶商唐季珊同居了。然而同居并未带来幸福，她只能将精神寄托于神佛，曾利用拍外景机会，先后赴普陀和苏州西园罗





汉堂进香。1934年，阮玲玉在主演蔡楚生执导的《新女性》时，蔡楚生对进步的追求，对黑暗社会的痛恨，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他的艺术才华使阮玲玉深为折服，而蔡楚生也从阮玲玉深沉的表演中深深体会到了她的追求与向往，两位艺术家的心灵沟通了，但是，“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许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了空。”

1935年，《新女性》公映后，黄色记者见骂不倒孙师毅和蔡楚生，便将对象转向阮玲玉。黄色记者们利用张达民耍无赖手段，在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伪造文书罪”，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妨害家庭罪”和“通奸罪”之机，在黄色报刊大肆渲染，形成“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势，铺天盖地地向阮玲玉压来。一向十分爱惜名声的阮玲玉无力与之抗争，她虽在银幕上有千千万万个知音和崇拜者，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一个能倾诉衷肠之人。因此，最终选择了死亡以表明自己的清白。193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清晨，阮玲玉留下了遗书，服安眠药自尽。





了，时年仅 26 岁。她在遗书中写道：“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位艺术天才被黑暗社会给扼杀了。

阮玲玉死讯传出，影坛内外无不震惊，数万人前往殡仪馆凭吊阮玲玉，安放阮玲玉遗体的殡仪馆内，“红烛摇曳，万众同哀，花圈满地，一片丧色”。然而，那些在阮玲玉生前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的黄色记者们，在她死后竟然把她的死说成是受《新女性》的教唆，或说她“殉讼”。对此，《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克制不住自己的悲愤之情，在悼阮挽联中予以驳斥：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有亏，廉耻丧尽，良心抹煞，正义偷藏，反自鸣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罗罗皂皂，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孙师毅夫人蓝馥清的挽联则更是言简意





赅：

“韦明之前，尚存万难。

艾霞而后，此又一人。”

激于义愤，病中的鲁迅先生亦写下《论人言可畏》的杂文，怒斥黄色记者及报刊。著名影评家尘无也在悲愤中挥笔写下《悼阮舆论》杂文，指出阮玲玉的死是黄色记者、张达民、唐季珊等封建残余代表造成的。

阮玲玉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很辉煌。

七、光彩夺目的女影星

30年代影坛上，还活跃着一大批艺术上有突出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就影星的来源和成长道路来划分这众多的女影星，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由左翼戏剧界转入电影界的话剧演员；其二是由各电影公司自己培养和发掘的演员。两者各有特色。

进军电影界的左翼话剧女演员，有着共同的特点，其一，她们倾向进步，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使她们所拍摄的影片几乎是清一色的左翼影片和进步影片；其二，





她们在戏剧艺术上已有较深的造诣，大多已在剧坛成名，进入影坛后，她们对电影艺术更是孜孜以求；第三，她们具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像王莹、胡萍、艾霞和陈波儿皆有“作家明星”之称，这使得她们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以上这几方面的条件是同时代的电影女演员所无法同时具备的，这就使得她们在进入影坛之时，已具备了自身条件上的优势，因此，她们很快跻身于电影明星的行列而蜚声影坛。

王莹（1913—1974年），原名喻志华，安徽芜湖人。自幼在曾受过新式教育的母亲的影响下，爱好文艺，尤喜歌唱。7岁时，举家迁往南京。3年后，母亲病故，其父生活不免有欠检点，不久，父亲再婚，后母对她很是冷淡，父亲遂将她送往老家，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当王莹读至高小毕业时，她的父亲和后母竟把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童养媳的生活使她不堪忍受，于是，她逃了出来，在舅母的帮助下，改名为王克勤，来到长沙，成为护士学校的学生。当时正值大革命高潮，王莹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刊，并参加了宣传





革命的歌咏和话剧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王莹因为中共传递情报而遭通缉，被迫逃亡上海，她于此时改名王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并活跃于话剧舞台，是复旦剧社的主要演员。1930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左翼戏剧活动兴起后，她是积极的参加者之一。1932年秋，王莹作为进军电影界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一员，参加了明星公司。

1933年王莹初登银幕，主演了《女性的呐喊》，并不成功，为此，王莹发表《自我批判》，为片中她带有舞台味的过火表演深深责备自己。接着，她主演了《铁板红泪录》和《同仇》，于表演已有很大进步。1934年王莹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回国，为“电通”主演了《自由神》，1936年，又主演了著名的国防戏剧《赛金花》。抗战期间，王莹主要从事戏剧活动，曾于1942年应邀访美，在白宫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战后，王莹旅居美国，1955年回国。

艾霞（1912—1934年），原名严以南，祖籍福建厦门。幼时即随经商的父亲居于北平，就读于圣心女校。曾与表兄相恋，但受到家





庭的坚决反对，为寻求自由，毅然离家南下，改名艾霞，只身闯入上海戏剧界，并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1931年进入天一影片公司。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后，她被介绍进入明星公司，在《旧恨新仇》一片中崭露头角，此后两年中，她在《春蚕》、《现代一女性》、《时代的儿女》、《丰年》等七、八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其成就引人注目，尤其在1933年，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了她的文学才华，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明星可谓凤毛麟角，该片亦隐约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与苦闷。然而，这样一位影坛才女不满黑暗的现实和个人爱情生活的不幸，终于在1934年2月12日吞服烟土而自杀了。她的同事以及影迷们为她的死而深深惋惜，孙师毅以她的死为素材，创作了《新女性》。

胡萍，湖南长沙人。毕业于省立长沙女中，中学时代即对话剧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只身赴沪，曾参加过





南国社和左翼剧联，是一位蜚声剧坛的名演员。1932年，作为左翼文艺工作者加入了明星公司，《恋爱与生命》是她首次主演的影片，接着在《战地历险记》、《脂粉市场》、《前程》等片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引起观众注目。1933年，胡萍编剧，并主演了《姊姊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农村少女的悲剧人生，直接涉及到了农村和城市存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艺华”成立后，胡萍由“明星”转入“艺华”，开始了她从影8年中辉煌的时期，在“艺华”，胡萍主演了《烈焰》、《黄金时代》、《生之哀歌》、《人之初》、《飞花村》等“艺华”这个时期最成功的几部影片。接着，胡萍又进了“新华”，主演了《新桃花扇》、《狂欢之夜》和《夜半歌声》，《夜半歌声》使她进入了从影生涯的巅峰阶段。胡萍端庄秀丽，表演风格清新纯柔，深得观众喜爱。抗战爆发后，她返回了家乡湖南，从此退出影坛。

陈波儿（1910—1951年），广东汕头人。童年丧父，生活清贫，自幼即爱好戏剧。1929年，就学于上海艺术大学时，加入了上





海艺术剧社，投身于左翼戏剧运动，主演过多部话剧，引起观众注目。1931年为躲避当局迫害而赴香港，1934年返回，开始涉足影坛，加入了明星公司，曾主演《青春线》。随后，陈波儿加入“电通”，主演《桃李劫》，以她真挚细腻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从此成为著名电影明星。“电通”结束后，陈波儿再入“明星”，主演了《生死同心》。1937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她既从事话剧活动，又活跃于影坛，参加了《八百壮士》的拍摄，并对延安电影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赵慧深（1914—1967年），四川宜宾人。生于书香门第，幼时酷爱读书，后全家迁往天津，她受到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堂兄赵景深影响，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不久全家又迁往南京，赵慧深就读于一教会中学。20年代中期，她离家赴上海，入南方大学攻读文科，对戏剧深感兴趣。1934年，她在北平参加了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中旅”公演的《雷雨》一剧中饰繁漪，虽然此时她尚年轻，但却准确地把握了繁漪这个被封建礼





教压迫得快要窒息的女性的苦闷与叛逆心理，以深沉含蓄充满内在激情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繁漪的形象，引起了强烈反响。出身话剧界的袁牧之在编导《马路天使》时，一下就选中了赵慧深来扮演妓女小芸，而这也是赵慧深创造的唯一一个银幕形象，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难令人忘怀的形象之一。此后，她仍然从事戏剧活动。

上述几位演员是由左翼戏剧界进入电影界后最负盛名的，她们于影坛皆成名于明星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明星”率先向左翼文艺工作者敞开了大门，但她们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对“明星”一家，她们中的王莹、胡萍、陈波儿也分别是30年代中期成立的“艺华”、“电通”、“新华”的主要演员，她们的表演艺术则对同时代的演员发生了重大影响。

王人美（1914—1987年），原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生于长沙。5岁丧母，11岁时父亲又离开了人世，但王人美自幼即健康活泼，喜爱运动，最爱读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1927年后，王人美随二哥王人路居无锡，不久进入上海黎锦晖主持的美美女校





(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团的前身)学习歌舞,黎锦晖亲自为她更名为王人美。她“在明月社不仅学到了歌舞艺术,而且懂得了做人的道理”。1928年,王人美随团赴南洋演出,虽饰配角,却大长了见识。1930年她即成为团里的主要演员。

明月歌舞团改组为联华歌舞班的当年,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开拍,孙瑜邀王人美饰主角,王人美一反充斥银幕的西施式的悲旦的所谓病态美,将渔家姑娘小凤演得健康活泼,青春焕发。次年该片公映后,王人美一举成为电影明星。这一年,她还为“天一”拍摄了歌舞长片《芭蕉叶上的诗》。1933年,王人美又主演了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和由蔡楚生编剧亨生公司拍摄的《春潮》,她的演技和银幕形象为蔡楚生所欣赏,而蔡楚生的工作热情和导演艺术也深为王人美钦佩。接着,王人美和蔡楚生完成了他们合作的杰作《渔光曲》,王人美塑造的小猫是她继《野玫瑰》中小凤之后第二个渔家女的形象。演小凤时,王人美只是凭自己的感觉,是在演自己,而演小猫时,她与摄制组曾去渔村体





验生活，了解了渔民，因此，小猫的形象不仅有小凤的粗犷与健美，更有了一份深沉和含蓄，由她唱的主题歌《渔光曲》也传达出了凄惋、悲愤的情调。影片公映后，王人美有了个“野猫”的外号。

1934年元旦，王人美与金焰结为伉俪，婚后，她中断了与“联华”的合约，不久“电通”成立，应邀出演《风云儿女》的主角，1936年，王人美入“新华”，参加了国防影片《壮志凌云》的拍摄。

抗战爆发后，王人美于“孤岛”拍摄了《离恨天》，后辗转于香港、桂林、昆明，最后抵重庆。主要从事话剧活动，其间，也参加了《长空万里》的拍摄。1945年夏，她与金焰离异。抗战胜利后，她为“昆仑”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

黎莉莉（1915—？），原名钱蓁蓁，安徽桐城县人。其父是中共早期著名党员钱壮飞。她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艰难的童年，由于父母从事革命活动，无暇顾及子女，黎莉莉自幼就蹲过孤儿院，做过人家的养女，也曾在京戏班子里学过戏。1926年，其父作为工作





掩护，入北平光华影片公司，参加《燕山侠隐》的拍摄，黎莉莉也在片中担任了角色。大革命失败后，她随家人迁居上海。1928年，加入了明月歌舞团。她自幼在北方长大，第一次登台，即以一口纯正的国语朗诵博得满堂喝采。是年她随团赴南洋演出，演出结束后，与黎锦晖一家暂留新加坡，为安全起见，她认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1932年随团加入“联华”后，很快名扬影坛。入“联华”后，她先后主演了《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这几部孙瑜编导的影片，以天真、活泼的形象出现于银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此后，她又在《国风》、《到自然去》、《狼山喋血记》、《如此繁华》等多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塑造了身份各异、性格不同的多个妇女形象。抗战期间，她参加了《热血忠魂》的拍摄，并主演了轰动一时的《孤岛天堂》和《塞上风云》。

徐来（1909—1973年），原名徐洁凤，浙江绍兴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之家，幼年即失学居家料理店务，后来考入中华歌舞专修





学校，又加入明月歌舞团，14岁开始随团旅行演出，表演儿童歌舞。1928年明月歌舞团的南洋之行，更使她誉满海外。由于长相出众，舞姿优美而成为“明月”首屈一指的名演员。约在1929年正式与黎锦晖结婚，并生有一女，但不幸幼年夭折。她继黎明晖、王人美等人之后步入影坛，加盟于“明星”，1932年主演了她的处女作《残春》，接着又主演了《泰山鸿毛》、《华山艳史》、《到西北去》、《路柳墙花》、《落花时节》等多部影片。“明星”的老板为了让在人影界之前就已有相当名气的徐来招徕更多观众，对徐来及其所拍影片大肆宣传，并给徐来冠以“标准美人”的称号；而徐来的风姿也的确使许多影迷为之倾倒，因此，在30年代早中期，徐来名声大震，大可与阮玲玉、胡蝶并驾齐趋。1935年，徐来主演沈西苓编导的《船家女》，其演技得到充分展现，所饰演的流落风尘的船家女阿玲，纯朴、自然而感人。然而随着声名日振，徐来的虚荣心也日益增强，在国民党要人唐生智之弟唐生明的追求下，她与黎锦晖分手，在拍完《船家女》后，嫁给了唐生



明，从此徐来退出了影坛。40年代，迁居香港，1956年与丈夫唐生明及子女返回大陆。

周璇（1920？—1957年），她的身世是苦难的，至今对她的出生年月、生父母尚不能确定。据周璇之子周伟所搜集的材料可知，周璇原名苏璞，江苏常州人，3岁时被拐骗至金坛县，为王荣春、欧阳玉珍夫妇收养，取名王小红。后因王荣春纳妾，欧阳氏携小红赴上海，不久改嫁张家时，将小红送与周家，改名周小红，时约1923年，这段经历似应可信。



三十年代电影市场逐渐为左翼艺术家所占领，图为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出品的电影《马路天使》的剧照（编导袁牧之，主要演员赵丹、周璇等）。



周小红长至7、8岁时，周家家境日益贫困，她被送进了一个姓孙的开办的歌舞班。1932年，她进了明月歌舞团。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她在一场歌舞晚会上，登台演唱了黎锦晖创作的爱国歌曲《民族之光》，其中有“与敌周旋于沙场之上”一句歌词，她唱得慷慨激昂，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黎锦晖遂乘兴建议她改名为周璇，涉足影坛后，她又在璇字前加了一个“王”字偏旁，成为周璇。1933年明月歌舞团解散，周璇转入了严华等组织的新月歌剧社（后更名为新华歌剧社）。翌年在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一举成名，被誉为“金嗓子”。

1936年，周璇被“艺华”聘为演员，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她在《花烛之夜》、《喜盈门》、《百宝图》等片中仅饰演了一些次要角色。1937年，“明星”开拍《马路天使》，导演袁牧之特邀她饰演主角，袁牧之的悉心指导使她成功地塑造了歌女小红的形象，由她本人演唱的插曲《四季歌》、《天涯歌女》也风靡一时，周璇终于跻身电影明星的行列。

当“明星”以“标准美人”的称号大肆





胡蝶新作上映之时

宣传新星徐来的时候，“天一”的老板邵醉翁受到启发，于是，对“天一”正在走红的女演员叶秋心冠以“模范美人”的头衔，大加宣传，以与“明星”的徐来相抗衡。叶秋心（1913—？）原名叶素莲，湖北汉中人。中学时代即喜爱文艺，尤迷电影，只要是汉口电影院放映的影片，几乎每片必看。曾经加入过汉口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影片公司，因不能发挥才能，很快退出，又出现在话剧舞台上。1932年，她来到上海，毛遂自荐于天一公司，“天一”在胡蝶被“明星”挖去以后，挑大梁



的就是老板娘陈玉梅，邵醉翁有心扶植新人以加强公司的号召力，见叶秋心外貌俊俏，气质良好，是可造之材，遂留下了她。叶秋心在“天一”的演员训练班学习一段时间后即登上银幕。1933年，她参加了《孽海双鸳》、《青春之火》的拍摄，第二年又拍了《似水流年》，虽都不是饰第一主角，但受欢迎的程度却超过了陈玉梅，是年拍摄的《春宵曲》即成第一主角。这一年她还为“天一”主演了《百花洲》、《纫珠》等片。“模范美人”的名气也越叫越响了。当“天一”开始实施南迁计划而紧缩人员时，叶秋心退出“天一”，转入了“明星”，曾参加《大家庭》和《桃李争艳》的拍摄。抗战爆发后，她退出影坛。

成名于“天一”的著名女影星还有袁美云。袁美云，原名侯桂凤，浙江杭州人。9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艰难，母亲将她送给了人家，养父袁树德为她改名为袁美云，并为她聘请教师教习平（京）剧。11岁时随养父赴上海，献艺于更新舞台。她的俊俏的扮相和甜美的嗓音引起了“天一”老板邵醉翁的注





意，1932年“天一”拍《游艺大会》时，即邀袁美云在片中表演了京剧片断《游龙戏凤》，她的表演得到观众好评，于是“天一”又邀她主演了《小女伶》，该片描写一位少女备尝痛苦，学戏成名而苦尽甘来的故事，袁美云演来得心应手，一举成名，但她仍未放弃舞台表演。1933年，她又为“天一”主演了《生机》和《飞絮》等片，成绩斐然。“艺华”成立后，袁美云被罗致为主要演员，1934年主演了但杜宇导演的《人间仙子》，1935年在《逃亡》、《人之初》、《凯歌》等“艺华”这一年中拍摄的几部进步影片中饰女主角，终于成为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后，袁美云又主演了“艺华”的《化身姑娘》等多部“软性影片”，红极一时。

在30年代女影星中，还有陈燕燕、谈瑛颇值一提，她们均成名于“联华”但都不是联华歌舞班出身。陈燕燕（1916—？），原名陈茜茜，宁波旗人之后，为独生女，幼时随父迁居北平，曾是北平一家照相馆的职员，“联华”拍《故都春梦》在北平拍外景时，她





向“联华”自荐当演员，被接纳为公司的暗房工作人员兼演员，乃不顾守旧的父亲的反对，与母亲一起南下上海，她由此而走上银幕，参加了“联华”早期影片的拍摄。起初仅饰配角，1932年，在蔡楚生编导的《南国之夜》中首次饰主角，一举成名。她外形娇小温柔，具有悲剧演员的气质，被誉为继丁子明之后“最有前途的悲旦”。自此直至抗战爆发，她主演或参加演出了《共赴国难》、《续故都春梦》、《奋斗》、《母性之光》、《暴雨梨花》、《大路》、《寒江落雁》、《春到人间》等20余部影片，尤其是《寒江落雁》，这是马徐维邦专门为她编导的，她的演剧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使她走上了电影演员生涯的顶点，从而成为“联华”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女影星之一。

谈瑛（1915—？），原名谈素珍，上海人。就学于上海民立女中，中学时代即喜爱运动，打扮入时，形象摩登，很为影坛的老资格的唯美主义导演但杜宇欣赏。但杜宇携夫人殷明珠多次登门谈家，终于征得很重名声的谈母的首肯，谈瑛遂走上了银幕。1932年，谈





瑛在但杜宇导演的“联华”新片《失足恨》中担任主角，获得了成功。迄 1934 年，她又在《火山情血》、《母性之光》、《出路》、《暴雨梨花》、《良宵》、《青春》等片中担任了主要角色。1935 年，她参加了“电通”《风云儿女》的拍摄，第二年转入“明星”，主演了《小玲子》和《夜奔》。抗战期间及此后，她也一直活跃于影坛。

在 30 年代影坛上，还有白杨、舒绣文等女影星开始崭露头角，她们在 40 年代后期曾有更为突出的贡献。此外，貂斑华、朱秋痕、顾兰君、胡姍以及梁氏姐妹（梁赛珍、梁赛珠、梁赛珊）等人也都是为观众所熟悉的女影星；在 20 年代即已走红的陈玉梅、林楚楚、殷明珠、宣景琳等也在新片中继续露面。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六章

民国时中国娼妓业的
畸形繁荣



风

化

图

史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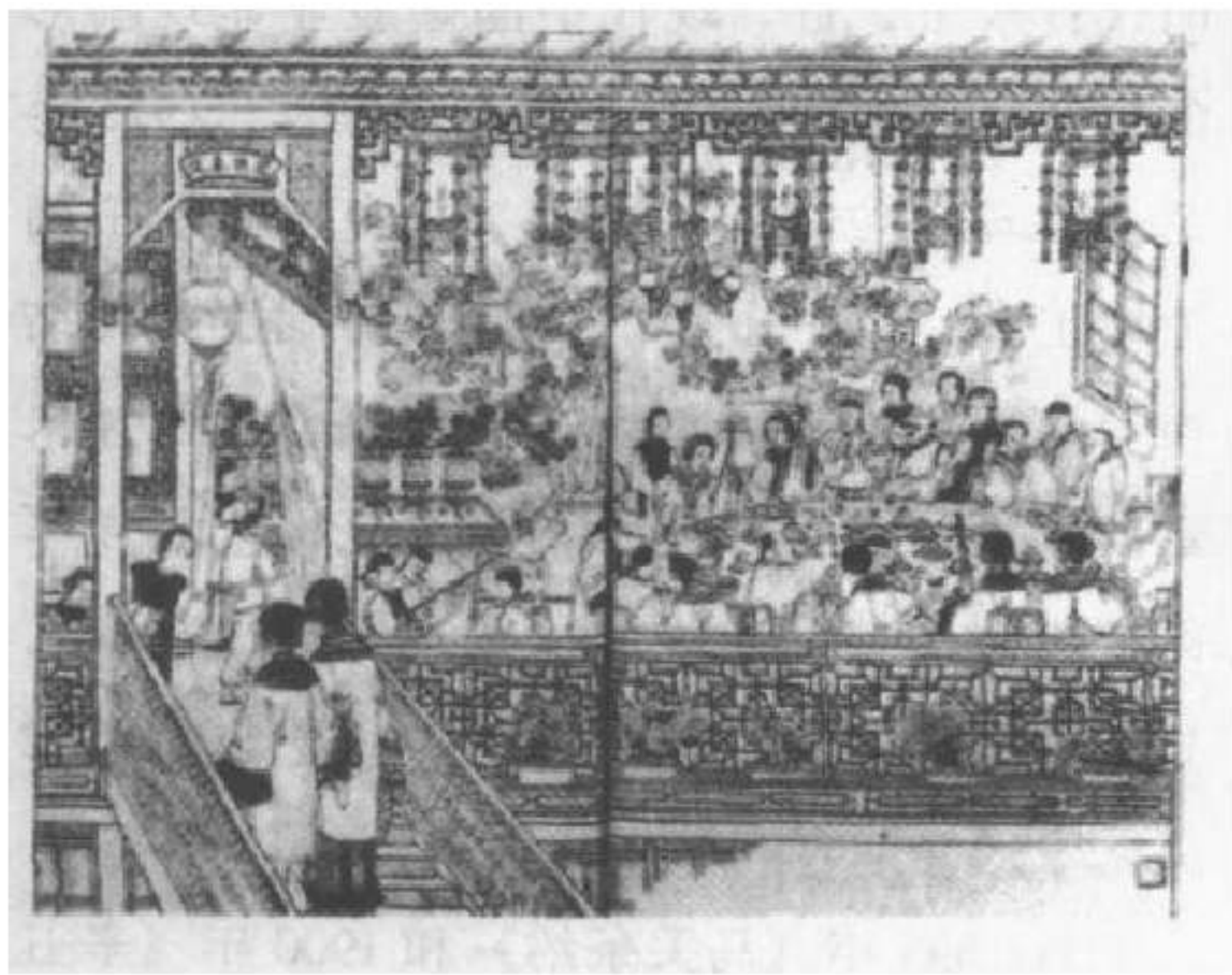
一、繁荣的时代背景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和社会环境恶化的时代背景下，近、现代中国娼妓业显现畸形的繁荣。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宣统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随之结束。但是“共和”、“民国”以来，中国并未走向强盛。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直奉军阀大战，蒋介石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战争频仍，财产毁灭，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自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西方帝国主义在中

国领土上建立起“租借地”、“租界”、“通商口岸”、“租借港口”等一片片“飞地”，清政府以及其后的国民政府的法律约束和行政管理在这些地方大多不起作用。在这些地区里，西方资本主义对娼妓业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因而社会控制减弱，疏于管理。

“夷夏糅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



菊花山下扶妓吟酒



这是近现代中国娼妓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一。

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一方面破坏了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促使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大批破产的农民和逃荒灾民进入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而沦落的妇女，则成为娼妓的最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又刺激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为其服务的一系列服务业，如钱庄、当铺、珠宝店、茶馆、酒楼、书场、戏园等业的兴盛，娼妓业的兴盛当然也在其中。这是近现代中国娼妓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之二。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涌进，西菜馆以及幻灯、魔术等西洋娱乐形式不断被引进到中国来，赛马、马戏等西方资本主义消闲方式，也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各地的官僚、商人和市民由开始的单纯、好奇演变为有意追求虚荣、排场的心态环境和令人目眩的洋场风气。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肉欲娼妓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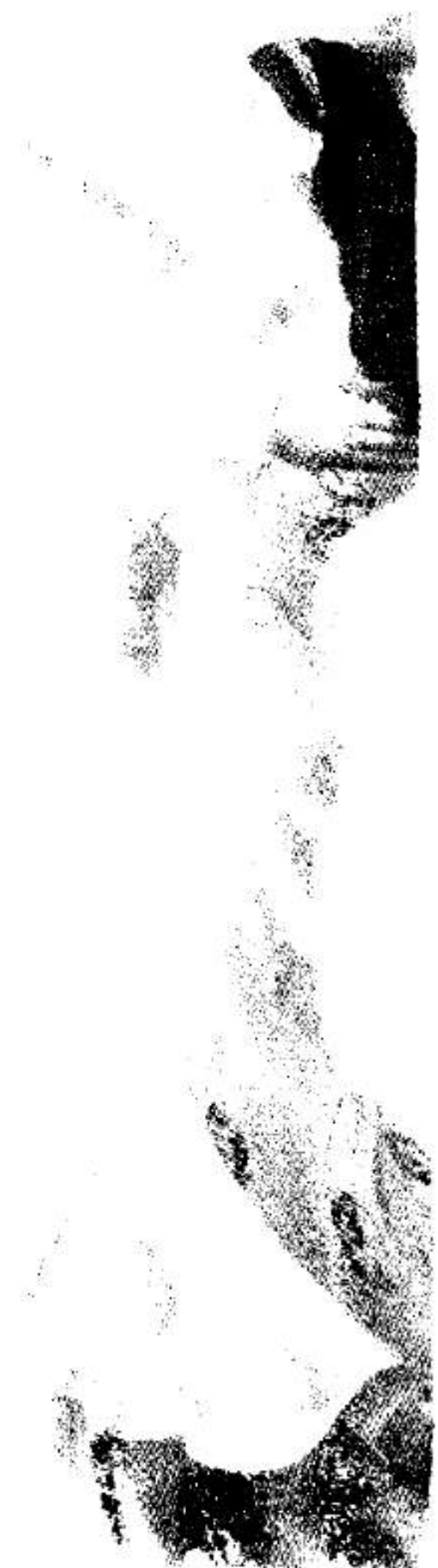




清末北京名妓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更叠频繁，不断有新的权贵把持政权。他们恣意享乐，许多政治头面人物和军政要员，往往都是妓院的常客，甚至派系斗争、幕僚活动和军政大事等往往都在妓院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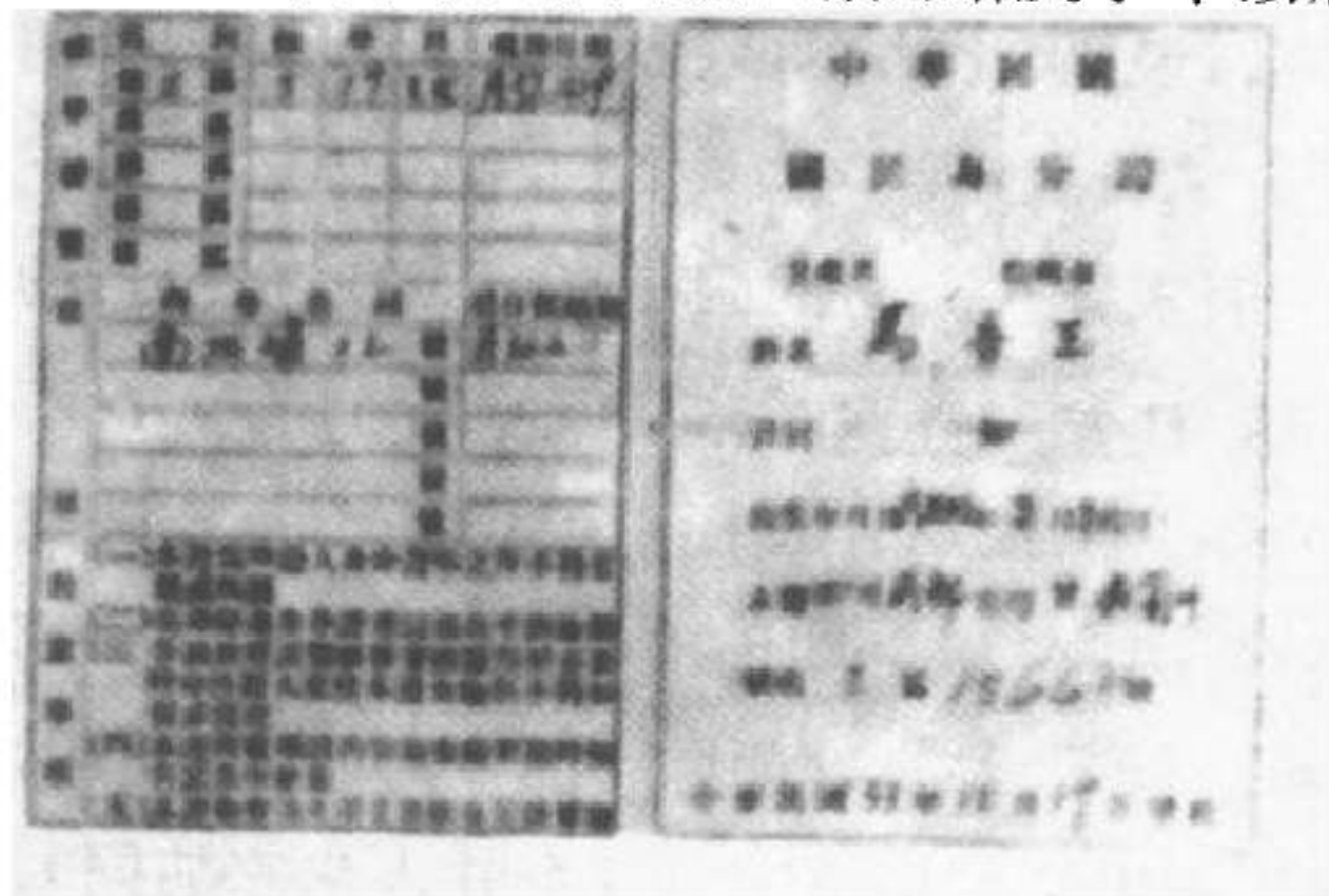
“政界风气起了深刻变化。前清时期，官



吏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花街柳巷’，官吏不敢问津。官吏宿娼被认为‘有玷官箴’，可以被参奏革职……辛亥后，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因此，……娼妓的人数和营业也大大发展了。”

二、北京的八大胡同

摧残人性的娼妓制度，是生长在旧中国肌体上的一个毒瘤。自明清以来，北京的妓院明暗杂陈，延绵不断。清光绪庚子年以后，



民国时期的一张妓女身份证。



京师警察厅将内城妓院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准其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的妓院共有373家。

北京妓院在民国之初参众两院开会之时兴盛了一阵子。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一批新上台的权贵们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八大胡同的妓院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同时，参众两院不公开的派系斗争、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活动，也多在妓院进行。当时，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头面人物以及各省督军等军政人员，都是八大胡同妓院的常客。当时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说明当时许多社会名流都涉足“花界”。

后来，八大胡同附近的妓院又有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王蔡朱百柳，石广火燕纱”的说法，总括了前门外十条妓院集中的胡同。“王”即王皮胡同，“蔡”指蔡家胡同，“朱”是朱家胡同，“百”是百顺胡同，“柳”系谐音，指留守卫（今并入朱家胡同），“石”是石头胡同，“广”指王广福斜街，“火”指火神庙夹道（今青风夹道），“燕”是





民国初年名妓二桔子身着时装照片。



燕家胡同，“纱”指纱帽胡同。这个所谓的“十条”，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却也成了妓院的代称。20年代到40年代，在北京各路口雇人力车的，只要一说“拉我到十条”，车夫就知道是去前门外八大胡同妓院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迁都南京，北京娼妓业很萧条。据1935年的统计，一等小班由78家减为19家，二等茶室由100家减至24家，二者均减少了 $\frac{3}{4}$ 。三等下处由172家减为119家，减少了 $\frac{3}{10}$ 。唯有四等由23家增至48家，增加了一倍多。

日军侵华时期，全国广大地区沦陷。在战乱和灾荒的重压下，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骗，沦为娼妓，北京的妓院户数略有增加。至1942年，全市共有一、二、三等妓院263家，妓女2597人。当时的嫖客除了汉奸权贵以外，还有相当数量发国难财的投机倒把商人，妓院成了他们交际应酬的场所。

截至1949年北平解放时，全市尚有一、二、三等妓院237家，妓女1268人。





民国初年京城名妓小凤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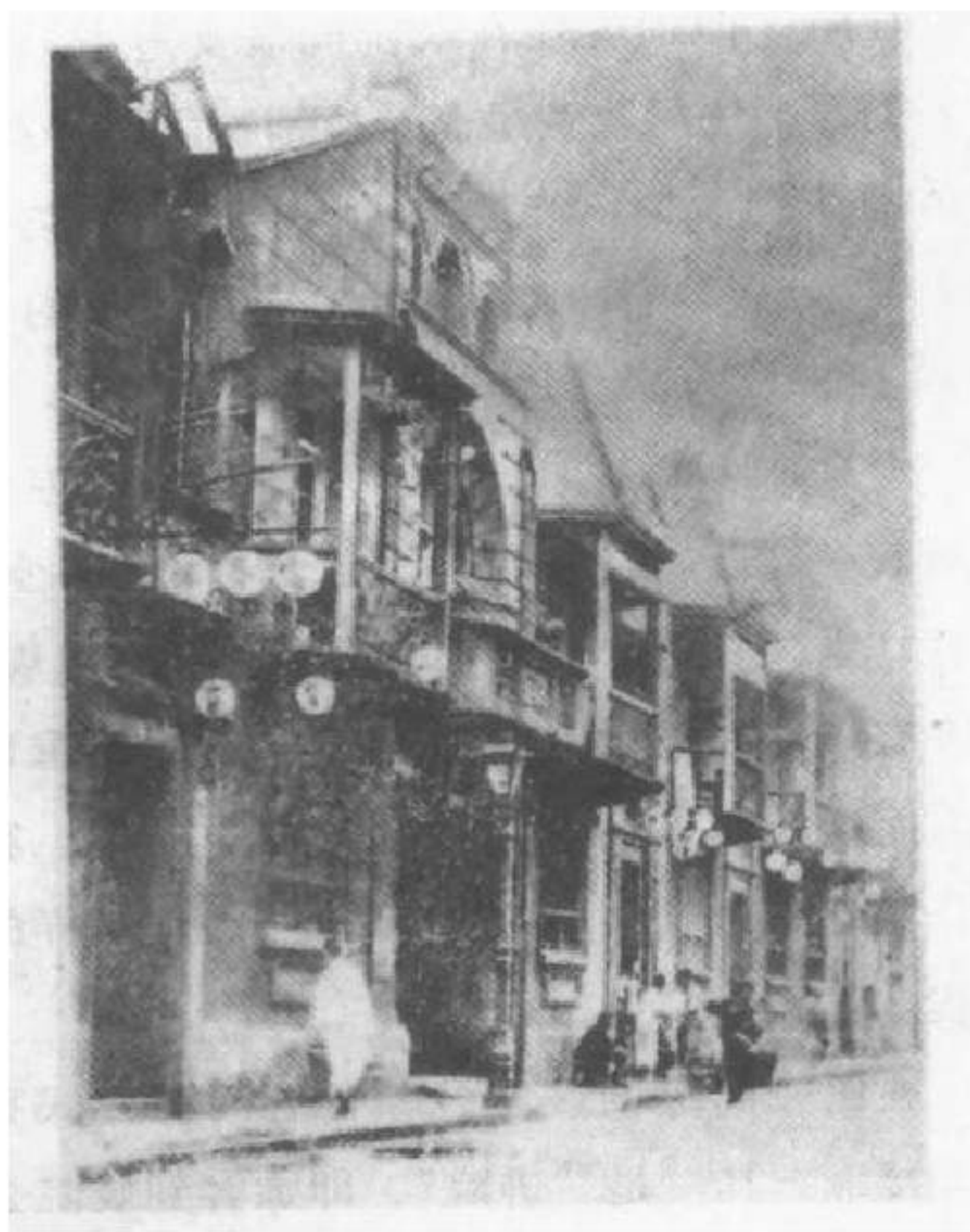
三、民国时期妓院的例规

中国娼妓制度自封建等级社会形成衍变至近、现代，已是规制繁多。无论是妓院内各色人等的称谓，还是妓女的身份、等级、奖惩办法以及妓院的组织、管理均已由习惯成为定规，嫖妓次第、过程也颇多繁费。当然，在低等级的妓院，程式较简单。那仅仅是一种简洁明快的纯肉欲交易：进院、打茶围、拉铺、住局，无一不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没有什么承上启下，铺陈转合的繁琐例规。

进院 嫖客一踏进妓院，就有人吆喝、通报。上海妓院吆喝“移茶”，北京妓院吆喝“看厅”。妓女们闻声迅即从各自的房间跑出来站在客人面前，任其挑选。然后把茶移到被选中的妓女房间去。

打茶围 又称“装干湿”。这是继“进院”后的又一程式，即妓女用香烟、水果、瓜子、茶水招待嫖客。有些地方的妓院称此为“开盘”。嫖客和妓女边吃、边谈、边调情寻乐。这时“拉铺”、“住局”的序曲。一般





长三妓院佼佼者——富春楼

按小时计时收费。

拉铺 望文生意就是同妓女上床性交。在低等级的妓院，“拉铺”一般不需过多的逗乐和长时间的调情。因付钱不多，嫖客对妓女也不可能要求过多，进了房很快就同妓女上床性交，完事即走。



住局 即嫖客住在妓院同妓女过夜。就收费而言，住局收费最高，拉铺次之，开盘、打茶围花费最少。若是初次接客的“黄花闺女”，嫖客得付出高于平时数倍或数十倍的价钱，才能“住局”“开苞”。

愈是高级的妓院，嫖妓的次第、过程也就愈显复杂。从到门、进院、升阶、登堂、进轩、坐久、定情等等都有一套程式、定规。来客有贵厚贵薄之别，妓院接客孰轻孰重也因人而异。嫖客的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客人肯花什么钱，妓院就会有相应的什么样的过程。

在比较高级的妓院，嫖客有两种方式和妓女接触：其一是“进院”，即嫖客到妓院去嫖；其二是“出局”，又称出堂差，即妓女应召赴外陪客。以嫖客“进院”为例，仪注场面的规矩就很多，即有简单的“装干湿”、“打茶围”，还有较复杂的“酒局”（嫖客在妓院内摆酒席，宴请宾客）。“酒局”也有较简单的，如广东人说的“饮花酒”，上海人说的“摆花酒”、“做花头”，北京人说的“摆饭局”等等。还有程式复杂、场面较大的筵席。如





在广东的“大寨”，嫖客进妓院与妓女发生性关系以前，就要经过一套繁缛的过程，如“出毛巾”、“探房”、“摆房”等等。

出毛巾 即由嫖客在酒舫大摆筵席宴请宾客，豪华奢侈，炫耀自己的阔绰。席上嫖客所喜欢的妓女，以毛巾分赠各位来宾，另外用一条特别华丽的毛巾赠给他的嫖客，表示对这位嫖客的钟情。继“出毛巾”后，还须“探房”。

探房 即嫖客再宴请一次宾客，排场和“出毛巾”一样，所不同的是“探房”的宴席不是在一般的酒舫，而是在妓女的“闺房”。“探房”后嫖客还须为妓女“摆房”。

摆房 即将妓女“闺房”内的家具、被褥、帐幔等全部撤换，重新购置、摆设一新，所花费用全由这个嫖客支付。

只有经过“饮花酒”、“开厅”、“设局”、“出毛巾”、“探房”、“摆房”这一系列程式，嫖客才算和这个妓女“定情”，才可以单独和这个妓女鬼混。

又如，在上海的长三妓院，嫖客和妓女的最初相识，一般是由朋友在酒席间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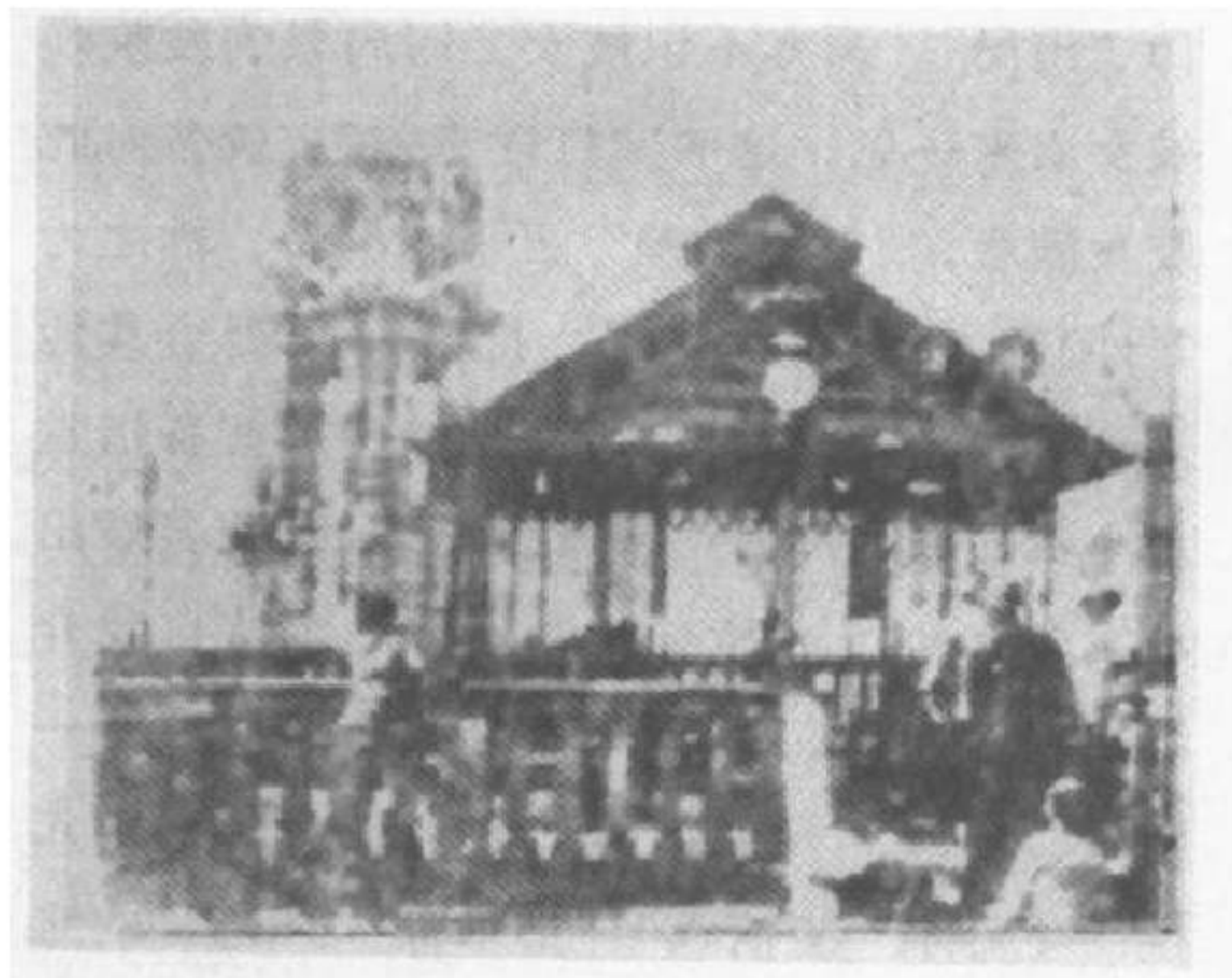
民国妓女与嫖客

(这叫“转堂差”)；或是由嫖客见了妓院门口的花标后，写局票去叫该妓女出来一见（这叫“打样堂差”)。倘若满意，第二次叫她时就是相识了。以后嫖客就可直接去她的妓院茶叙小谈（这叫“打茶围”)。自此之后，老鸨便会叫妓女怂恿嫖客“做花头”摆酒席请客。客人如果点头同意，就会让其把妓院的请客





票拿回家里，写上自己的朋友的姓名、地址，交妓院相帮按地址分送。届时，嫖客先到妓院招待来宾，陪着打牌。酒席或由妓院代办，或由嫖客在菜馆定好了差人送来。酒席所花费用及麻将抽头、买票费用等均由嫖客支付。嫖客请过酒席，做过了花头，就是“熟客”，此后就可常去叫“堂差”或“打茶围”了。



永安公司星顶花园天韵楼特设的花界姊妹休息处

“出局”是嫖客与妓女接触的另一种方式。晚清时又称“出票”，民国后又称“出堂差”、“叫条子”、“出条子”、“出外盘子”等



等，指嫖客花大价钱把妓女接出妓院到自己的家里或戏园、酒楼狎昵。当时，有钱有势有身份的嫖客大多不喜欢进妓院，而乐于花钱召妓。当时许多酒楼都备有叫妓的片子，称“局票”。嫖客只要在局票上写上某个妓女的名字，即可由店内供奉送到妓院。叫妓出外陪伴嫖客称为“叫局”，而妓女应召赴局称为“出局”。嫖客不识妓女，写局票到妓院唤妓女出来一见，这叫“打样堂差”；倘若对此妓女满意，“打样堂差”再来叫局者，称之为“丹阳客人”；席次转局，把妓女介绍给其他人，这叫“转堂差”；妓院把接待那些吝惜堂差小费的嫖客称为“接胥堂差”。一些名妓出局大多有轿子或马车接送。她们手持自我介绍的大字名片，乘坐在蓝呢软轿里，俨然一副大官出外巡视的派头；而未破身的“小先生”（又称“清倌人”，指未被“开苞”的雏妓），出局则坐在龟奴肩上，民国后这种风气才逐渐消失。

妓院礼仪如此繁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妓院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嫖妓程式的铺陈转合、花样百出，无非都是老鸨将其作为赚



钱的工具和方式，企望从嫖客身上获取更多的钱财。为此，各种收费没有固定的标准。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妓院各有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物价水平，老鸨当时的胃口，妓女的身价，嫖客的财力状况以及嫖客当时的情绪状态等等。



民初妓女

四、民国妓女的生活境遇

娼妓作为以实现特定功能——出售或租让性交权利或性服务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群体，总是依附于鸨母和受制于妓院的，无论



是哪一个等级妓院的妓女，也无论是自由身还是质押身或讨人，她们的命运通常都是操纵在其他人手中的，如妓院的老板或鸨母、嫖客、黑社会恶势力等等。

各地妓院对妓女都加以严格的控制和约束。这表现为限制妓女的人身自由，控制妓女的作息起居，约束妓女与嫖客的关系，搜刮妓女所得钱财。无论是哪种身份的妓女，妓院对其人身自由都有严格的约束和限制。“自由身子”的妓女虽然比较自由，可平时一般也不得随便外出，倘若有事要出去，有的妓院还规定须交给妓院数个“夜厢”（嫖客住夜的钱）。“质押身子”和买来的“讨人”则根本无人身自由可言，妓院老板或老鸨时时防范她们偷偷跑掉。非经鸨母同意不得私自外出，除了“出局”以外，平时不得出大门一步。无论在院中见客或出局陪客，均有人紧随左右监视，不得私自与外人接触。为了从嫖客身上索取更多的钱财，妓院对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也严加约束，既不让那些未出够钱、未应酬完所有仪注的嫖客轻易地就和妓女发生关系，也不让妓女与嫖客厮混得太熟，





对其太热乎了。妓院对妓女卖淫所得钱财也严加看管。质押身子和讨人卖淫所得全部归妓院，如有嫖客赠予金银首饰或衣物等也必须上交，妓女不得私自截留，就是“拆帐”的妓女得了“小帐”也得交妓院“代管”。街头游荡的“野鸡”也不可能脱离娼妓业系统而独立存在，大多数人仍是在老鸨的监视下。“野鸡”绝大多数是讨人，是被人拐骗来卖给老鸨或流氓的，隶属于某一“野鸡堂子”。就是那些无定踪的游妓，如上海的“淌牌”，也有老鸨在一旁监视。她们拉到客人开了房间，老鸨一定要等在旅馆里，拿了夜度资才肯回去。

妓院的经济效益，主要是以妓女出租或转让性交权利或性服务来实现的。在妓院里，老板或老鸨是妓女这种特殊商品的占有者，他们想尽办法通过对妓女敲骨吸髓的剥削来谋求最大的效益和利润。

其一，依据不同的身份，采用不同的剥削方式。对于“自由身子”的妓女，妓院采用“分成”的方法，按三七开或四六开收取其卖淫所得，或是收入全归鸨母所得而妓女





按季获得包银。而对于大多数卖身妓女和向娼寮典狎的妓女，身体全由妓院支配，妓院获取全部卖淫所得。这正如麦倩曾在《北平娼妓调查》所说：

“若是妓女是班主或领家买来的人，则以肉体由人蹂躏所换来的钱，一文也不能到自己享用，按妓院的常例，妓女营业所得，是班主与妓女平分。但有领家或班主的，则每5日算帐时，所有入息多少，妓女所应得之分，都由领家或班主直接拿走，曾有一妓女为妓10年，绝不知道自己每月所入多少，可想见她们剥削妓女的利害。”

其二，增加妓女接客频率和延长其卖淫年限。对于像“清倌人”、“琵琶仔”这类雏妓，妓院大多尽可能早地将其转为接客妓女，以求卖得高价，借此延长其卖淫年限。对于成年妓女，则千方百计增加接客频率，或增加每天（每月）的接客次数和人数；或在月经期间或怀孕、产后（堕胎后）这些特殊生理时期内仍逼迫妓女接客，或者不光除了夜间接客，还另增加“清早”、“下午”这两个白昼时间；或对患有性病的妓女疏于治疗，





要求照样接客等等。

其三，使用其他方法，开辟财源。为了套牢妓女为其赚钱，妓院还使出种种毒辣手段。如向妓女放高利贷、罚款、引诱妓女吸毒和赌博等，使其负债累累，债台高筑，从而俯首贴耳，任其剥削。据1935年6月12日《大晚报》载，广州高等妓女，每月只有10余元收入，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她们出卖肉体所必需的脂粉亦没有钱买。因而只有赊借一途。于是佣工亦赊，生果香烟亦赊，卫生棉花亦赊；借得到时一二百元亦借，借不到时一二毛小洋亦要。汉口妓女亦是债台高筑，常因无法偿还，而在每次借花头时抽1/10以作利息。除了在妓院内的种种剥削方法外，有的妓院还要给妓女加上若干例外的工作。如据1935年3月18日北平《晨报》载，天津各部妓院鸨母迫令妓女到该部落子馆去无代价地唱戏，借登台的机会，以招揽顾主（嫖客）。这样她们夜间接客，早晚两场又得登台，差不多整天整夜都没有休息时间。

其四，漫天要价，索要赎身价款。妓女从小被卖到妓院为其赚钱而接客数载，耗尽





美国大兵所到之处，几乎必然跟随着色情文化。

了青春，榨干了血汗，妓女大多想赎身从良。妓院利用妓女这一心理索要赎身价款，往往漫无定准地随意开价，企图在妓女离开妓院时最后再敲诈一笔钱财。临到“下桥从良”时，妓女往日接客得来的金钱、首饰和衣物，则悉数被鸨母占为己有，连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准带走。而对那些年龄稍大、容颜渐衰，既无款赎还卖身价，又叫价不高或接不到客的妓女，鸨母则将她们卖出，谁开价高就卖给谁，妓女本身无权决定。

酷刑也常出现在许多妓院里。麦倩曾在1930年发表的《北平娼妓调查》中揭露：

“妓女之操此卖笑生涯，并不是尽人都是自愿的，其中因被压迫而做妓女的，所受的刑罚，非常人所能想到，在妓院妓女受班主或领家不堪入耳的咒骂，因为还不至到肉体受痛苦，司空见惯，已不算回事了，打则更是花样不同。”



艺人与妓女

妓院常用以下这些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办法来摧残、惩治那些不服管教、企图逃跑、不愿接客或犯有过失的妓女：

其一，强奸。对于那些刚被买来不愿接



游园中的妓女与嫖客

客的女子或企图择婿从良脱离妓院的妓女，妓院老板或亲自动手或纵容、唆使龟爪（妓院内的跟班、打手）对她们施以强暴，践踏她们的贞操，打消她们反抗的意念，摧毁她们的羞辱道德观念，借此逼迫她们接客。不



少女子在此情势下，眼见贞洁已破，迫于无奈，也只好破罐子破摔，不再拒绝接客；而有的却因受不了如此侮辱，则愤然自尽，以示反抗。在旧中国的妓院，妓女被逼跳楼、自缢或服毒的时有发生。

其二，鞭笞毒打。据陈雨门在“古汴娼妓血泪录”一文中揭露：对一个新买来的或经抚养长大即将成人的妓女，必须“祭鞭”。妓院里的这种鞭系用皮条编织而成，比马鞭稍粗，内插钢针百余枚，针芒露约2分左右长。祭时陈设于五大仙牌位之前（五大仙系妓院所敬的神，即刺猬、老鳖、黄鼠狼、老鼠、蛇）。夜深人静时，令妓女焚香跪于桌旁，由老板（鳖头）说明妓院的本色（称为“亮底”），晓以“大义”，再继之以恐吓，如敢违抗或想逃跑，必“试鞭”，即将妓女脱去下衣，背绑悬之梁间，用鞭抽打，抽至百鞭，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后可。翌日还得含笑接客，不得露出半分痕迹，若与嫖客稍露口风，即再鞭打，有时在鞭打时还叫所有的妓女在窗外旁听，意在杀一儆百。

令人发指的酷刑还有：用烧红的通条来





打，或用烧红的铁条烙妓女的下身；或施用“笋敲肉”的酷刑。据民国8年重印的《上海黑幕汇编》中的“野鸡之黑幕”揭露，酷刑“笋敲肉”，即用既阔且长的竹板打被剥光衣裤捆绑在床榻上的妓女，毒打“数十下而红，百下而肿，二百下而紫且黑，三百下而血流，四百下而皮卷，五百下而肉随杖飞。”打得左右两股刑伤相等，才松绑准予站起来。青岛市“升平里”妓院的乐户多数都设有暗室，时常关押妓女，有的被关多达8天之久。该院一乐户的妓女岳楼，因一天没接着客，即被班主江宝玉用剪刀刺伤大腿。“宝兴里”妓院一名14岁的雏妓因为不愿接客，被班主李氏用开水和熨斗烫伤，伤痕达120多处。

其三，转押。即将不愿接客的妓女转送到低等级的妓院作低押。是妓院逼迫不愿接客的妓女就范的另一种方法。大凡妓院遇到这种不愿接客，但又不便施用毒刑或转让出去的妓女就以借了某低等妓院的钱为名，将其转押出去抵债，一旦妓院筹到款项即将其赎回。该妓女到了低等级妓院，才知这里的鸭母龟爪似乎比原来妓院更凶恶、更不近人





情，稍不遂意即遭毒打；嫖客也很刁怪、粗暴，动不动就要动手打人、骂人。经过一段时间，妓女似觉得还不如回到原来的妓院日子好过些。此时原妓院假心假意来人将其接回，该妓女两相比较，回心转意，屈从于鸨母意志，愿意听从安排。

其四，“打猫不打人”的毒刑。民国以后，各地妓院对那些不畏威逼利诱的妓女往往采用这种毒刑，以图治服。具体方法是：将不愿接客的妇女捆绑在床上，然后将一只活蹦乱跳的猫放到她的裤裆里，迅速将裤腰裤脚口扎紧使猫不能逃出，龟爪或打手随即鞭打那只在裤裆里的猫。猫被打得疼后便在裤子内挣扎、乱窜、乱蹦、乱抓，妓女阴部往往被猫的利爪抓得血肉模糊，鲜血淋漓，惨痛欲绝。越是打猫，猫越乱抓，妓女就越痛。反复抽打猫，直至妓女屈服表示愿意接客为止。

五、嫖客对妓女的摧残蹂躏

在嫖客心目中，妓女只是解闷消遣的玩物，发泄性欲的工具。那些“卖嘴不卖身”





的书寓、长三艺妓，以出局卖笑为主要业务，嫖客的局票如同圣旨，决不可回绝，若稍有怠慢，便会飞来横祸。清末和小四金刚同期的欧波小榭，“性贞志洁，雅好吟咏”，在上海颇负盛名。有一个姓潘的白相人，一天慕名招欧波侑酒。欧波见是生客局票，照长三规矩理可不赴局，于是没有应召。第二天潘便约了四五个同伙直闯欧波香闺，正巧欧波出局未归。潘便命令婢仆发牌碰和。欧波回来，见是生客想不予理睬，但看来势不对，便曲意逢迎。从那以后，潘便每天在欧波寓所，设筵请客吃酒打牌，平日欧波熟客都怕事回避，至使欧波生意大受影响。潘分文不付酒资达一个月。欧波入不敷出，一天便向潘要800元急用，潘爽快答应。第二天果然带来300元一张汇票，200元钞票、300元现金，交欧波收受。欧波房中一大姐发现票款上都有特别标记，便急忙示意欧波。欧波细看大惊失色，便立即请人来居间调解。结果，800金全部还潘，潘所欠局账、酒资一笔勾销，还专门备一桌丰盛的酒席谢欧波有眼无珠之罪，欧波还保证以后凡潘局票来召，无





论何时何地一定赶到。潘这才点头同意不再到欧波妆阁纠缠，影响营业。在谢罪酒席上，潘从怀中拿出失款报案稿，对欧波说，幸亏大姐及时发现，否则恐怕你现在没有如此安闲，说完才将稿纸投火烧毁。欧波寒心余悸，其他妓女也都引以为鉴。

有的富家贵妇及女白相人也学男嫖客戏弄污辱妓女，妓女也必须逆来顺受。1920年3月2日《申报》登载一则“打房间”消息说：

“某富绅之妇，邀小姐妹在‘久华楼’设宴，酒至半酣，学男子招名妓小双珠侑酒。双珠因不知客为谁，所以不往。妇又赏1元于侍者往招，双珠至，见都为女流即返。事后，群女往双珠所在妓院打房间，把房中陈设打得稀烂”。

小双珠也毫无办法。

号称不夜城的旧上海，酒馆、舞厅、妓院等通宵达旦，商行厂家之间的一笔笔生意，官僚政客之间的一桩桩交易，都是在酒席和牌桌上进行的。于是，吃酒、碰和都少不了妓女到场周旋，醇酒妇人，歌声琴声，在这样的气氛中，各种协议的成功率显然要高得





民初嫖客与妓女行乐图

多。因此，上海高等妓女出局极忙，每到傍晚，妓女出局的轿子、车辆往来如梭。每个妓女每夜少则 20 局，多则三四十局不等，局局都要歌唱、饮酒或辖拳拇战。即使你疲惫不堪、声嘶力竭，或不胜酒量，也只能强颜



欢笑、苦苦支撑。每夜总要闹到第二天东方发白，雄鸡三遍时才能上床。然而她们比起三四等妓女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三四等的野鸡院、烟花间的妓女，每夜留一个客是肯定的，其他任何时候，只要有客人上门都来者不拒。少者三四人，多者几十人，一刻不停地供人蹂躏，完全成为一副麻木不仁的泄欲工具，从来没有正常男女之间那种男欢女爱的体验，有的只是厌恶和疲倦。即使得了病也不能休息。绿荷著《中国妇女生活写真》一书，提到一个名叫梅娟的农村破落人家的少妇，被一个名叫阿青的流氓诱骗到上海，逼迫她接客卖淫。

“梅娟接触着各式各样的男子，年老的、年轻的、强壮的、瘦弱的，都拥抱过她，她没有一点快感与刺激，给她的只是疲倦与苦痛。虽然一张张的钞票从游客皮夹里摸出来，都在她眼前一现，就被阿青收藏去了。疲倦积堆在她的身上，夜生活比煮饭洗衣的操作更加辛苦，使她那衰弱的身子陷入病态里。但她在阿青的监视管束下，继续地接待着使她感到厌恶的男子。她真的病了，染上了恶





疾，阿青还是强迫她。”

正如梅娟一样，这些卖淫妇女在妓院主的监视驱使下，身不由己地供人蹂躏摆布。

妇女在月经期间是身体抵抗力最弱的时候，普通男女绝对回避。然而对于毫无人身主权的妓女来说就例外。碰到稍有点人道的鸨母和嫖客，还能在高潮中休息一两天，至于那些钱迷心窍，毫无人道的恶鸨、妓霸则照样要妓女留客，致使弄到血崩的程度。怀孕五六个月的妓女，也照常不间断地接客，导致流产。产后不及满月，又要强迫接客。至于那些不满 14 岁，还未发育成熟的幼女，则往往被摧残得步履难行，以至卧床几月还不能举动，有的因此而得了血癆，轻者也终身不育。凡幼年卖入娼门的妓女都免不了这种厄运。这样的酷行在妓院中不胜枚举，屡见不鲜。

妓女在恶鸨的虐待和压迫下，不得不供嫖客日夜蹂躏，频繁的交接，使一个个清白身体的健康女子，不要半年、一年都染上种种花柳恶疾。淋病、白浊、梅毒、下疳等当今青年闻所未闻的性病，都是妓女中的常见





病。世人都指责娼妓是花柳病的发源地，殊不知娼妓原都是良家好女子，天生并无疾病，多数是被嫖客传染上的。她们一旦染上病后，还被逼去做生意，于是妓女便作为媒介者传染给男子，由于接客多，传染的速度也快。而那些热衷于嫖妓的男子，在患有花柳病后决不会就此而中止冶游，于是又去传染给无病的妓女。

我国最早发现花柳病是在明中叶。据俞辨《续医说》记载：“弘治（1488—1505）末年，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状，谓之杨梅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近世弘治、正德（1506—1521）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至四方。”据以上记载，可知我国花柳病始见于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由南方传至北方。《欧美淫业史》说花柳病是从海地传到西班牙、葡萄牙的。葡萄牙人在明朝弘治年间已出现于我国沿海，正德年间，即1514年到达珠江口，1517年到广州，我国正式允许葡萄牙人通商。由此是否可以推断，





梅毒可能是由葡萄牙商人传给广州娼妓，然后由娼妓传染给广州冶游的男子，其中流动性较大的商人、文人，又把病毒传染给四方妓女，因此吴人称杨梅疮为“广疮”。梅毒就通过妓女和嫖客间交互传染，致使花柳病在中国蔓延。嫖客得了这种恶疾，还有资力医治，但这种病有一定的潜伏期，并且不容易彻底治愈，往往传染给妻，遗传给子女。娼妓染了这种病，既无钱医治，还必须照常接客，致使病人膏肓、坐以待毙。在旧上海的妓院里，尤其是以卖淫为主的下等妓院里，妓女营业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五载，就被这种恶疾夺去年轻生命的比比皆是。

六、社会恶势力对妓女的欺压

妓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人人都可欺侮，尤其是一般流氓骗子，视妓院为利藪，千方百计欺骗敲榨妓女，吸吮妓女的血汗。

高等妓院的歌妓，其中色艺俱全出类拔萃者，往往出局侑酒，生意兴隆，接触的都是些中上流人物，私赠较多。一些老鸨匿于社会舆论，同时也为了生意，对这类妓女也





稍微放松。因此，一些红妓女为赎身起见，数年以后都稍有积蓄，于是流氓骗子这类上海滩上的白相人便想方设法骗取妓女的私蓄。民国初年，上海英租界有一个名叫金黛云的长三妓女，碰到一个自称商界中人的客人，每天都吃酒、碰和出手阔绰，赠金衣饰甚多。端午节为妓院收账时节，这个嫖客爽快地付清酒资局账 300 元。金黛云被其假象所迷惑，对其深信不疑。一天此人对金说，接到汉口电报，想另外创建一个产业，需筹资本万元，现已筹得 8000 元，还差 2000 元，准备以 4000 元的股票暂抵 2000 元现金，一月后归还，还取出股票给金看。金粗通文墨，细看确实是某公司股票。金便以 2000 元现金换取 4000 元股票。一个月过去后，此客杳无踪影，金因股票在手并不介意。到年度公司发红利时，金黛云便拿了股票去领股息。办事员告诉她：“此单已于一年前挂失，补给失主新单。”金才知受骗上当，几年血汗钱付诸东流。

有的流氓骗子借名妓信誉，到处骗取财物，席卷而逃。西安坊有一个妓女，色艺俱全，善于应酬，所以收入十分可观，金银、





珠宝、绸缎、洋货各店都是老主顾。后来结识一个自称北地显宦之后的嫖客，此人出手极阔气，没几天就赠妓千金，从此两人日夜不离。又时时到金银、珠宝绸缎各店选购贵重物品，叫送妓院，有时付款，有时记账，日复一日习以为常，各商店因平时与此妓女素有交易无误，所以都一一照办。到旧历8月初，该嫖客便失去踪迹。中秋前夜，各店均拿了发票到妓院向妓女索账，总计2万多，而妓女到手的东西仅十之二三，其余财物都被骗子席卷而去。妓女为了顾全名声，只得东拼西凑一一照付，数年积蓄为之一空。妓女忧急成病，卧床不起。这样的骗局，在名妓中时有所闻，这二个例子虽系当时传闻，也可略见妓女所受到的欺榨于一斑。

还有些流氓无赖，平时衣食挥霍均靠妓女供给，如前所述，在妓院中自由身体的妓女。来去自由，所有收入都和老鸨拆账，有四六拆，有三七拆。但这类妓女大多欠用老鸨债款，数字不过几十元，一般流氓便看中这类妓女。先与妓女姘识，然后用花言巧语笼络妓女，再到其他妓院借钱替妓女清理债





务，流氓便占有妓女，过一段时间之后，再逼迫妓女到借款的妓院去接客，每月所拆得的钱都供流氓挥霍，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这类妓女除了受老鸨剥削，嫖客蹂躏外，又加上了一层流氓的控制虐待。

野鸡在马路上、游艺场拉客，如不巴结地痞流氓、地头蛇，就休想做一天的生意。



民国初年的上海名妓王莲英。



更有甚者，无赖嫖客借叫局之名谋害妓女，掠取财物。1920年6月轰动上海的王莲英谋杀案就是突出的一例，当年报刊对此案都连篇累牍加以报导。此案凶手主犯阎瑞生，为震旦大学肄业生，曾先后任翻译及文书等职，后失业沦为无赖。阎“性嗜冶游，品行不良”，终日出入妓院。端午节为妓院收账时节，阎为了还嫖账和赌账而起谋害王莲英的歹念。

妓女王莲英，是1917年第一届花国总理，是闻名上海的红妓女，收入相当可观，阎瑞生曾在朋友金某酒席中见过王。王平时爱戴首饰，大小钻戒、金手表、珠项圈等是常戴之物。阎便冒莲英平时熟客朋友之名叫莲英局，叫过几次局后，阎便约了两个同伙谋划杀莲英。1920年6月9日，阎准备了迷药、绳索，向朋友借了汽车，叫了两个同伙到妓院，以吃酒尚早，先去兜风为借口，把王莲英骗上汽车。车开到行人稀少的荒僻田野时，两个同伙便从王身后用浇满迷药的棉花扣在她的口鼻，同时将绳索套在她颈上勒死，拖进麦地深处，把她身上所戴首饰全部拿掉。





三人分赃后便逃之夭夭。一星期后，农民在麦地里发现女尸，报告地方检察厅，经认明是失踪名妓王莲英，阎瑞生立即受到控告。结果阎在徐州车站被捕，另一凶手在市内被捕，另一名在逃。2名归案犯以谋财害命被判死罪枪毙。

阎端生等凶手之所以能得手杀人，就是由于妓女的职业不得轻易得罪人，只能任人摆布的特点所致，流氓无赖便乘机欺诈，乃至伤害妓女。这都是因为妓女地位低下的缘故。

至于那些私娼、暗娼，虽然没有老鸨的逼迫、剥削，但残酷的社会现实把她们逼上卖身的路。老舍中篇小说《月牙儿》中的那个喜欢月牙儿的纯洁少女，自从继父去世后，母女只有靠典当、洗衣度日，后来母亲不得不卖身养活女儿。姑娘却为母亲感到耻辱，她不能原谅母亲，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只要有人给饭吃，干什么都行。可是，一个多月姑娘找不到事做，饥饿终于把她逼上卖身之路。开始她只想赔上一两个吻，但人家不干，人家要她痛痛快快、





彻彻底底地卖。于是，她只得开始卖身，各种男人纷纷找上门来，有“文明”人，有粗野人，有穷学生，有有钱人，还有老头子。有钱人玩暗娼也想包下她，老头子子孙成群，想在死前买些快乐，姑娘只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使姑娘认识了钱和人的关系，“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而钱是兽的胆子”。姑娘终于得了病，妈妈心疼她，安慰她，给她买药，但看着女儿被人蹂躏，却始终不说叫女儿别干这行了。因为妈妈清楚，除此找不到第二个职业。母亲养女儿得那样，现在轮到女儿养母亲了，女儿也得这般。姑娘干了二三年，皮肤粗糙了，嘴唇老是焦的，眼睛里老灰不溜的带着血丝，整天打不起精神，月牙儿就这样被摧残了。

可是，为了不饿肚皮，还得继续出卖自己。她看到了死，妈妈是她的影子，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发和抽皱的黑皮。实际生活使她觉得世界是个真正的地狱。她曾是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健康的姑娘，然而生活逼使她成了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暗娼。





“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潘溶皋的这两句诗道出了娼妓制度存在的根源，也道出了明知妓女生涯是人间地狱里的煎熬，但不得不往地狱里跳的原因。“死假如可怕，那只是因为活着是可爱的，我决不是怕死的痛苦，我的痛苦久已胜过了死。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这是“月牙儿”姑娘的心声也是旧中国所有娼妓的心声。

七、近现代中国娼妓业的特点

近、现代中国娼妓业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职业和一种由政府控制、管理的制度而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的瓦解和重构及社会结构的崩溃，娼妓业明显地呈现出有异于中国古代娼妓业的一系列特点。

（一）近、现代中国娼妓业的规模远较古代时扩大，突出表现为妓女及妓院数量的大大增加，娼妓门类的明显增多。

1. 妓女和妓院数量大大增加。随着西方





殖民主义的侵入和近代城市的迅速扩展，近、现代中国的妓女及妓院的数量比 1840 年以前的古代娼妓业有了很大的增加。上海的例子最为典型，上海娼妓业是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租界的扩展与繁荣而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开埠前，上海仅是一个普通的海滨小县城，县城内还没有挂牌的妓女和妓院。道光初年上海县城内才开始出现妓院。其后随着租界的扩展，上海的妓院也随之在租界内发展起来。道光末年上海租界面积已占县城和南市面积之和相近，上海城也由原来的南市（即县城及城外东南一带）向北面的租界扩展，上海娼妓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同治末年据 1871 年统计，英租界接待洋人的妓院有 27 家，妓女 92 人；华洋兼接的妓院 35 家，妓女 131 人；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妓院 382 家，妓女 1352 人；法租界妓院 250 家，妓女 2600 人。经过晚清几十年的发展，到本世纪初 1900 年时，租界所在的北市的面积已是原县城所在地的 2 倍，上海的商业中心也由南市转移到北市的租界，北市租界的商号数目几近南市商号的 2 倍。据工部局和公董局的





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的比例高达12.5%。本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乐灵生牧师曾通过中华博医会的会员在中国的41个人口从1200人至150万人不等的城市的调查，发现妓女人数与人口的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烟台、北京、济南、上海6个拥有6万至150万人口的城市里，妓女与人口的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为1:300。这表明了这种商业化罪恶的非常突出的情况。1919年，英国人甘博尔调查发现，京、沪两地的妓女与人口的比率是1:258和1:137，其中以上海最高，为1:137，即当时上海每137人中就有1人是娼妓。这远比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东京等四方6城市高。1920年上海工部局调查，上海各类娼妓总数已有6万余人。

1934年《申报》估计，妓女在上海总人口中的比例要比东京、芝加哥、巴黎、柏林、伦敦等世界著名大城市分别高出1至7倍。1935年有人调查“上海一地的公娼私娼为6万人至10万人。另有材料说，1935年“上海





一埠已有公私娼妓 10 万左右”，当时的上海人口约 360 万至 400 万左右，“按人口计算，上海不愧为世界妓女数字最高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份材料把职业妓女数估计为 5 万，如果把那些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算在内，那么其数目应增加一倍。上海解放时，上海市公安局正俗股公布妓女登记数字，1949 年 1 月上海有公娼、私娼和变相妓女近 4 万人。无论妓女数字随着社会形势出现怎样的波动，近、现代上海娼妓业均比开埠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推广到全国范围，也存在完全相似的情况，妓女和妓院数均比古时多。妓女人数的增加源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和破坏，农村凋敝，大批农民破产、失业，成为游离在城乡的流氓无产者和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这些人又成为各地妓女源源不断的来源。

2. 近现代娼妓门类，远较古时为多。妓女和妓院数量的增加是与近、现代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联系在一起的；而娼妓门类的增加，则是与嫖客成份的复杂化以及不同嫖客的不同需求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代娼妓的服务对象相对比较单一，教坊妓主要服务于





皇族、官吏；营妓服务于军士；官妓主要服务于各级官吏及文人学士；家妓则服务于家主，私妓的服务对象稍复杂一点，但也局限在文人学士、达官显贵之中。因而中国古代娼妓门类相对比较简单。而到了近代，由于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娼妓门类也产生了很大变化，教坊妓、营妓、家妓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私妓在“众多的城市单身汉增加了对商业卖淫的需求”的情势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由此衍化出众多的门类来。如在上海既有高等级的“书寓”、“长三”，也有较低等级或下等的“么二堂子”、“花烟间”、“钉棚”、“跳老虫”、“老虫窠”、“台基”、“咸肉庄”等等；既有本地的还有外地或外国的，如广东妓院、东洋妓院、外国妓女、白俄妓女等等；既有固定的，还有踪迹无定的，如淌排、野鸡等等。京师北京除了公娼、私娼之分外，还有南帮、北帮之分，还有“清吟小班”、“茶室”、“下处”、“老妈堂”等级序列分类。各地娼妓门类多样，称谓各异，不尽相同。

（二）中国娼妓业在近、现代社会已发生





了质的变化，已由古代娼妓业崇尚歌舞技艺、诗词曲赋转化为赤裸裸出卖肉体的卖淫。

随着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的逐渐加深，传统的中国社会及其道德观念在“西风东渐”的强烈冲击下遭到了瓦解和破坏，淳朴的民风逐渐为奢侈挥霍的风气替代，讲求时髦、追求刺激已成为城市里新的社会时尚。官吏狎娼“有玷官箴”的说法已不再具有多大的约束力。半殖民地商品经济将人的各种私欲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耽于声色犬马之事，肆意纵欲享乐。这就造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卖淫嫖娼现象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这时的狎妓之乐已不再是清歌妙舞、红妆侑觞、富有浪漫情调的社交酬酢，而是妓女“送旧迎新，人尽可夫”，“人皆可作胯下之臣”的肉欲之交了。中国古代娼妓擅长歌舞曲艺、精通诗词曲赋的习尚，已逐渐消褪终至荡然无存。清末的上海“书寓”及北京的“清吟小唱”之所以在民国以后不为人所欣赏而最终遭致淘汰，原因就在于这些妓女自恃清高，“视自己是有技能的艺女而不是提供性服务的妓女”，自傲“卖艺不卖





身”，不愿与客人发生性关系。相反的类似象“咸肉庄”这样的赤裸裸的奉献肉体以满足嫖客性欲为唯一目的妓女却迅速增多起来。

这一变化也是适应嫖客构成改变的需要。近、现代娼妓伺候的对象已不再仅仅是文人学士、达官显贵，而是包括士、农、工、商各色人等俱有。过去那种奢侈豪华，带有明显文学情调的娱乐服务再已不能满足嫖客追求刺激、追求肉欲的需要；这时的妓院已成为“为城市中不断增加的商业和工业阶层的单身男子提供性服务的地方”；这时的娼妓也不再具有琴棋书画之技能，只能是“卖淫不卖艺”，单纯以出卖肉体谋取嫖客的金钱了。

（三）卖淫已在近、现代逐渐改变为公开的、普遍的现象。

中国古代娼妓主要是提供歌舞、曲艺等娱乐服务，这是主要的、公开的，而性的服务是次要的、隐蔽的。那时不少文人学士、风流士卿虽然都有狎斜冶游，狎妓纳妾的嗜好，但在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下，偷香窃玉毕竟仍是秘而不宣、见不得人的事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即使是到了晚清，





“书寓”也依旧保持了这种遗风，“如果一个书寓女子和一个情人有私交，那么，她的床上用品统统都会被烧掉，这女子也将被赶出书寓”。书寓的女子在她们的住所确实实也在“出卖她们的美色”。“但对类似的举止保密，这样使她们仍以歌女受到尊重。”

然而到了近、现代，娼妓卖淫日益公开化、普及化，及至民国年间娼妓业已完全抛弃“艺妓”韵味，赤裸裸地出卖肉身，公开卖淫全国皆是如此。

公开化，表现为公开卖淫和公开狎妓。这种变化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尤为明显。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妓院陆陆续续迁入租界。由于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租界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司法制度以外的殖民地，妓院在租界内所受约束较少，只要向工部局申领执照，照章按时纳税，即可公开挂牌营业。即使中国政府在华界有“禁”，但对附生在租界上的妓院也是无能为力，而且往往是在华界查禁风声较紧的情势下，租界成为妓女、嫖客以及赌棍、烟毒贩、罪犯的逋逃之藪。正如同治年间有人所说：“一人夷场官不





禁”。兼之，租界经济增长较快，市场繁荣人口流动频繁，这些都为妓女半公开、公开卖淫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妓院在租界外国殖民势力的庇护下逐渐公开繁衍起来。么二堂子、花烟间、钉棚、老虫窠、咸肉庄、广东堂子、台基、碰和台子无不成为半公开或公开的嫖妓之所，他们和咸水妹、野鸡、淌排、广东妓女、外国妓女、白俄妓女这些公开卖淫的娼妓构成了近代上海社会的一大景观。上海马路上的“野鸡”，因拉客不易，竟用劫掠方式诈取行人。1934年8月24日《中华日报》沿引当地爱多亚路商人的话说：“路人经过不分皂白，即行强拉主义。遇有单身乡民客商，即群起粥粥而拖之，甚至劫掠囊有，形同强盗。”由此可见“野鸡”公开拉客卖淫之状况。

公开狎妓冶游在近代社会也是司空见惯。公开的方式主要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等。据当时报载：“所谓侯伯将相、督抚司道、维新志士、游学少年、富商大贾、良工巧匠者，乃于此宴嘉宾焉，商要事焉、论政治焉、定货价焉。以谑浪笑傲之地为广





通声气之地，以淫秽猥琐之处为办理正事之处，非特不知羞耻，抑且不成事体。”十里洋场“四面周遭马路开，轮蹄飞处满尘埃，五陵挟妓并肩坐，十里肩花转瞬回”。1817年8月12日清末政论家王韬（1828—1897）自称好色，视访艳为寻常事，常与好友同事邀伴前往。他在《王韬日记》中记述了在沪16个月的行踪，其中明确访艳的就有30多处，如“二十五日（3月10日）梁闾斋来，同遛勾栏访艳”；“四日己亥（2月25日）……午后，孝拱、子俊来访，同至褚多觅艳”；“二十七辛酉（5月17日）……饭罢无事偕闾斋，松期同往勾栏访艳”。这样的风流才子在近代社会大有人在，据包天笑回忆，清末有的报界文人与妓女过从甚密，每晚必去妓院，借妓院做会客之处，有的甚至连写稿也搬到妓院中进行。包天笑自己也常去吃花酒。清末上海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6）、吴研人（1866—1910）等更是艳迹昭著，或是每晚必去妓院与名妓啜茗酬酢，各大名妓无不相识；或创办小报，专做风流游戏文字“记注娼优起居”，甚至将《论语》改写成嫖经，被当局





以“侮圣”名目将报馆查封；或是朋友之间在妓院饮酒作爱，毫无羞涩之感等等。近代社会公开狎妓的这种状况正如戏剧艺术家陶菊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

“前清时期，官吏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花街柳巷’官吏不敢问津。官吏宿娼被认为‘有玷官箴’。可以被参奏革职，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轿来揍他一顿。革命后，这种假道学的风气不存在了，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因此，娼妓的人数和营业也大大发展了。”

普及化。包括地点的普及化和对象的普及化。在近代，卖淫嫖娼不仅仅是在京、沪、穗这些大城市才有，它已随着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的畸型发展而遍及中国各地城乡。妓女卖淫的对象再不仅仅是社会上层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和文人学士，而是普遍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例如，近代出现的“野鸡”在街头纠缠过往的游客和路人；“咸肉庄”的常客也是一些体力劳动阶层；“钉棚”则主要针对人力车夫和其他体力劳动者。近代妓院不仅出





卖色相和肉体，而且还兼营赌博、吸毒、贩私，成为各色人等俱聚下流糜烂的场所。娼妓业普及化的原因在于：其一，针对不同嫖客的不同需求出现了中、下档次的妓女和妓院，逛妓院再也不是古时那种奢侈的、程式铺张的娱乐享受，而是直呈胴体玩弄和性交。据 1932 年调查统计，在上海的“钉棚里”，短暂的性交价格为 0.20 元，陪宿过夜则为 1 元钱。“野鸡”也是 1 至 7 元不等，1 元的，是短暂的性交，戏称“一炮主义”；而 7 元则可以陪宿过夜。其二，逛妓院的程式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过去那种繁缛的程式和过场，这为那些寻求短暂的直接的性交的嫖客提供了方便，因而也就大大促进了公开卖淫的普及。

（四）妓女境遇恶化，她们已成为纯粹的泄欲工具和被剥削对象。

由于近、现代娼妓的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她们已沦落为纯粹依赖色相谋取金钱的境地。各等妓女均不再具有诗、书、文、艺等技艺的优势和长处，因而，就总体而言，近、现代娼妓再也不象古代娼妓那样具有优裕及卑贱的二重性，一是进入妓院就





毫无地位，尊严可言，或是被拐骗、或是被引诱、或是被逼迫、或是为卖身还债，大多是由于贫困的驱使才被迫选择了卖淫这个职业。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近、现代娼妓社会地位绝对低下的状况。她们丝毫不能获得法律和道德的保护，只能被人任意宰割。表面上她们“珠香玉笑”，“朝欢暮乐”，但实际上她们遭受着老板、老鸨、龟奴、流氓、警察（巡捕）等的多重剥削和压迫。一方面她们是嫖客泄欲的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是鸨母的摇钱树和旧政府花捐的主要来源。高利贷盘剥是套在妓女身上沉重的经济枷锁，往往使妓女债台高筑，甚至到死也还不清，活期典押往往也变为遥遥无期。经济的重负使得妓女们几无翻身的可能。在 1948 年上海的一次调查中，500 多名妓女中的大多数每月接客 10 至 30 次，有的则多达 60 次。有的老鸨强迫妓女一个晚上接待 4 至 20 个男客，“咸水妹”则有时一晚上接客 20 至 30 次。另有材料说，“在一个中等以上的妓院里平均一个妓女，就有 3 个以上的人直接靠妓女从嫖客身上用肉体换取来的钱财吃饭。” 1935 年 6 月 12 日





《大晚报》载：在广州妓女每台酒局，客人支出5元，但要缴纳花捐1.1元和其他费用1.8元，合计缴纳2.9元，政府捐税几近60%。广州市花捐最多的时候，每年竟达90万元以上。1935年5月13日北平《晨报》载，在汉口妓女每月纳捐分为20元、15元、10元、4元、3元、2.5元七个等级。1929年（民国18年）政府花捐收入13.7万余元；1930年（民国19年）增至14.6万余元。为增加收入，鸨母常常逼迫妓女在月经或怀孕期间也要继续接客，以致不少人患血崩或流产或患其他妇科疾病。在近代妓女中性病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大多数妓女经过1年或2年的卖淫都染上了性病。据上海一个妇女组织1938年对3000名“野鸡”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梅毒”，许多人还患有淋病。1946年上海市政府卫生部门对1420名妓女的检查发现，66%患有性病。1947年对3550名妓女的检查也发现，62%的人患有性病，大多数是第三期梅毒。该检查报告还称，倘若检查包括可靠的淋病化验，那么患病比例还会更高。由于妓女没有人身自由权利，妓院





内的暴虐现象时有发生。民国时期各地报纸常有老板、老鸨或嫖客使用暴力殴打妓女致残或致死的消息。妓院暴力殴打妓女或是因为拒绝接客；或是未能拉回客人；或是怠慢客人、惹客人生气影响妓院的收银；或是妓女自己偷了妓院的东西；或是妓女看管不严，粗心大意让客人偷走妓院的东西；或是妓女不堪虐待，出逃藏匿被抓回。嫖客殴打妓女，或是嫌弃妓女伺候不周；或是对妓女施以性虐待；或是逼迫妓女服从嫖客苛刻的要求。其中尤以性虐待最为残酷，他们或毒打妓女，或攻击妓女性器官，或逼迫妓女做各种淫荡的性动作，稍不遂意即拳脚相加。妓院内的这些暴虐行为给妓女造成极大的伤害。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双重压迫往往使妓女痛不欲生，自寻短见的事在报刊上时有所闻。据青岛市公安局在 1951 年 8 月调查统计，自日伪统治时期以来，妓女中由于不堪忍受班主虐待自杀而死和接客中被凌辱致死的各有 8 人，被虐待致死的妓女有 6 人，其他原因致死的有 1 人。妓女生活境遇的恶化随着旧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益惨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旧中国娼妓业的各种妓院自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变化，逐渐由奢侈的娱乐服务演变到各种色情服务以至赤裸裸的卖淫。卖淫日渐公开化，普及化。中国娼妓业终于彻底抛弃了旧时官妓崇尚风雅，精于曲艺的遗风，衍化为赤裸裸的提供色情服务和满足肉欲的现代娼妓制度。

八、娼妓制度的消亡与旧上海的禁娼 废娼

从上海开埠到 1920 年，英、法租界当局一直把妓院列为娱乐场所，采取只征税，不发执照，不加限制，放任泛滥的态度。不加控制的娼妓业变成危害社会的毒瘤。到二十世纪 20 年代，上海各类娼妓的总数达 6 万多人，社会风气极坏，性病广泛蔓延，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禁娼的呼声日高。

同时，自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出国留学和在国内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途径，逐步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原来的社会观念渐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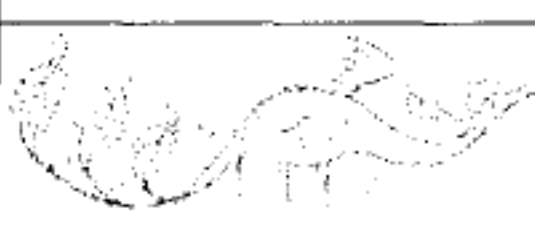




发生变化。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民权观念，人格独立等新思想渐渐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第5号《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提出了女子“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口号。自此以后，历来被看作风流的“嫖”渐渐被视作侮辱妇女人格的五毒之一。1919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4月27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运动》一文，指出娼妓制度“侮辱人权，违反人道，破坏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是妇女界最大的耻辱”。李大钊还在文章中提出废娼的口号。这一口号立即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上海的一部分美国人也强烈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局禁闭妓院，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加速了禁娼的步伐。

迫于舆论，工部局成立临时纠风委员会，决定自1920年起逐步缩减公共租界内公开营业的妓院。首先命令各妓院捐领执照，不分中西，不分等级，一律凭执照营业。然后于同年12月21日在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摇珠





禁娼，珠子上分别注明妓院执照号码、门牌号，凡摇到执照号码的妓院，限令停止营业。第一次摇去 173 家，妓女 500 人。凡摇去的执照号码、路名、门牌、里弄名、妓女姓名都登载在报纸上，使得人人知道。1921 年又第二次摇珠，两次共摇去 2/5 的妓院。但是，摇去的妓院照常营业者大有其人，只是较为隐蔽而已，大多数在公共租界摇去的妓女都迁到法租界去营业。所谓摇珠禁娼不过是遮人耳目，欺骗舆论。至于两次摇珠后剩下的妓院，照常营业，之后再也没有作第三次摇珠。至于私妓、暗娼有增无减。禁娼只在表面上作假象，并没能真正达到禁止的效果。

1933 年，国际联盟妇孺保护谘询委员会派遣妇女调查团到远东考察一周，调查报告指出“贩卖妇女最多的国家推中国为第一，这种贩卖的妇女主要是作为娼妓的”，尤其“港沪二埠”。事后国际联盟拟定了《关于禁贩成年妇女》的议定书，各国代表以全权资格在议定书上签字，中国代表接到行政院颁发的全权证书后也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在国际舆论的影响下，上海舆论界展开





禁娼弛娼讨论，各种报刊杂志登载文章，坚决要求采取禁娼措施。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公共租界警务处采取了拘捕私娼、暗娼的措施，公娼则照常营业，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并且数字逐年增加。据 1940 年工部局年报，上海公共租界签发执照的妓院“1936 年为 697 张，1937 年为 558 张，1938 年为 585 张，1939 年为 1, 155 张，1940 年为 1, 325 张”。1940 年和 1936 年相比增加了近一倍。其原因是工部局把妓院作为主要财源之一，“妓楼，每 3 个月纳税 48 元，歌女，每 3 个月纳税 24 元”。“1939 年和 1940 年妓院税收竟达 68, 865 元和 77, 092 元，仅次于旅馆和饮食店”。直到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公开营业的妓院还有 800 余家，公娼 9, 000 人，变相妓女和私娼 30, 000 多人。可见，制度和娼妓业的微妙关系是禁不能止的症结所在。

李大钊在 1919 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娼妓，“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要想不改变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那么，“任何道德上的谴责





(99%的情况下都是伪善) 丝毫不能制止这种买卖妇女肉体的行为, 只要雇佣奴隶制度存在, 就必然有卖淫制度存在。”

九、民国以后“禁”与“弛”的特点

1905年清王朝设立了巡警厅, 开始抽收妓捐。这是官府公开的弛禁, 即公开承认公娼的合法性。这应算作近代公娼制度之始。民国以后抽收妓捐、允许公娼存在的办法依然保留下来。但是由于清末以来, 民主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辛亥革命以后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运动更是风起云涌, 妇女解放的呼声也日甚一日,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政府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些“禁”的措施。因而, 民国以后“禁”与“弛”呈现出如下特点:

1. 有识之士呼吁彻底禁娼, 并主张采取“改造社会”的“治本”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古老的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制度的成功践履无疑为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北





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连年混战使老百姓深受其害，所有的这些因素均促使民主、爱国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同时也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提出“男女平等”、“反对包办买卖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等口号的同时，各界有识之士也不断呼吁社会重视娼妓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蹂躏，提出废娼的种种主张。

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9号上，署名“常”发表“废娼问题”一文，认为“废娼问题，是现代运动的一种。”在文中他列出了废娼的五条理由：

“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象这样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事，若不绝对禁止，还讲什么人道自由，不是自欺欺人吗？”。“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公娼制度与人身卖买制度全是一样。”





“如今国家反来认许公娼，须知认许公娼即是认许人身卖买，也就是认许破坏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实行民治的国家，绝不许有这种恶制存在”。“第五，为保护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

为此，他提出禁娼的四条办法：

“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

最后他着重指出：

“其实这都还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1920年8月5日李三无在《妇女杂志》第6卷第8号上发表《废娼运动管见》一文，将中国的娼妓制度分为4类，坊里制、堂院制、夜合制、秘密制，并比较了中外娼妓制





度的异同。他认为那些“完全抛弃历史上的原因不讲，仅仅注意现在的结果，做废除娼妓的根本理由”，“勉强硬行的废除”，“非徒无益”；不研究它所以成为这样的根本发生原因，对他的病根下药，只就它结果的利害来讲废除的方策，这正合了孟子所说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他认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娼妓乃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造成。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谋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诉诸个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压力来做绝灭娼妓阶级的唯一手段，这才是其愚不可及呢。”他在论述了“为什么不改造现在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不能望娼妓的绝灭呢”的道理后，强调指出：

“我对于废除娼妓的意见，是极端否认形式上标榜废除娼妓的名目，竭力主张想个方法完全从事于社会的改造，却把娼妓的绝灭，看做社会改造当然的结果。如能完全达到社





会改造的目的，用不着我们费吹灰之力，娼妓这种东西，自自然然的就会绝迹。……所谓根本既拔，枝叶自然干枯。……娼妓的废除，也是一理。”

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鼓舞下，妇女解放运动随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不断高涨，各种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纷纷成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组织宗旨中都以废娼、禁娼为重要的工作目标。

1921年8月1日，天津学生同志会成立，1922年4月29日学生同志会召开评议会，决定增设“女权股”。

1922年8月23日，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提出包括“禁止公娼”在内的七条纲领。

1922年11月5日，天津女权请愿团在天津河北师范学校召开大会成立，由黄勛志任主席。

1922年11月26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在天津女师学校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发表宣言书，内列7条纲领作为女权运动的





目标，其中第6条为“禁止公娼，禁买卖婢女，禁妇女缠足”，推举王贞儒任主席。

1923年1月13日，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召开第三届第一次股会，将“废娼运动”列为会议首要议程，并决定废娼运动先用文字鼓吹，发行废娼运动特刊。

1923年1月20日，天津学生同志会及女权请愿团主要领导人黄勛志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第一册上发表《我津急应举行废娼运动》一文，他认为“娼妓的害更盛于盗贼”，呼吁天津应继上海、广州后倡行废娼运动，并提出废娼的五点主张。

1923年1月22日，天津女权请愿团召开会议，讨论赴京请愿的准备工作，提出请愿时应提出废娼议案。

1923年3月19、20、21日三天，天津《大公报》连载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废娼运动宣言。

1923年春，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在四川成立，提出8项要求的请愿书，其中第8项为：“提高人格，废娼禁，不准收花捐”。

1923年6月17日，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





股邀请各团体开会讨论废娼问题。时子周在会上强调：女子知识、女子生计和济良所改良是废娼最主要的三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则提出舆论反对和法律禁止的解决办法。会议一致同意组织废娼运动合作团体，推举出委办 16 人。

1923 年 6 月 23 日，天津《益世报》载，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发起废娼运动一事已开始筹备；现又有朱兆邦等人准备筹建废娼同志会，并建议二者得联合筹备。当日该报还以《废娼》为题发表时评，主张废娼应从整理家庭开始，可以使游娼者日少，同时主张先行废妾，以保护人权。

1923 年 8 月 9 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同时刊出学生同志会女权股的废娼运动议案，议案提出拟发一废娼问题专号，专载废娼文论及调查方法等。

1923 年 8 月 10 日、11 日连续二天，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出天津废娼运动期成会拟定之会章，并报道准备召开成立大会消息。

1923 年 10 月 13 日、21 日，废娼运动筹委会两次开会，讨论修改会章草案。决定将





废娼运动定名为“废娼运动期成会”，并决定“以宣传废娼主张，研究废娼方法，实行废娼运动，以期废除为宗旨”。

1924年3月6日，天津《妇女日报》公布了天津社会服务团从2月中旬起对天津娼妓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天津市共有娼妓27部，110处，1333家，共4880人（未包括私娼）。这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废娼运动提供了事实依据。

1924年3月8日，中国妇女首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何香凝主持，会议明确提出了“废除娼妓制度”的口号。

1928年秋北平特别市妇女协会成立，该会的《工作计划大纲》将“堕落妇女之宣传”明列于二：其一，堕落妇女宜求解放；其二，堕落妇女解放生活的问题。该会还要求北平市调查部“调查全市妇女的确数”。

1928年9月11日，天津特别市妇女协会成立，其章程中也有“切实废除娼妓制度”一项。

1931年全国妇女代表向国民会议提交了





“严厉禁娼案”。

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及各地妇女组织、妇女团体的纷纷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和封建礼教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迫使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松紧程度不一的废除娼妓制度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中国近代娼妓制度的发展。

2. 近代中国各地实行的均是“公娼制”。“公娼制”又称“娼妓检验制度”。这是一种“官督商办”的娼妓制度，即在官府或警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妓院由私人开办，妓女按期接受有关性病的体格检查，妓院和妓女按月或按年缴纳妓捐，并依照官府条例公开营业。

近代国际社会法国首先实行“公娼制”的。它在1798年开始实行妓女注册登记并接受体检，有性病的不准接客而由警察强制送往医院接受性病治疗直至痊愈。这种管理娼妓的检验制度给被娼妓问题弄得束手无策的各国政府似乎带来一种启示：对这种社会痼疾，与其任其自由发展，或禁也无法禁，消灭也无法消灭，还不如采取这种办法将娼妓





业管理起来，既有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又可以防止性病的传播。因而这种检验制度从19世纪起就逐渐在世界各国流行开来。

尽管“公娼制”流行于19世纪并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随着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广为传播，以及社会公众对娼妓及性病危害的进一步认识和整个国际舆论对贩卖妇女、儿童为娼的罪恶活动的深恶痛绝，“坚决废止”娼妓业的舆论也逐渐呼声日高：坚决反对公娼体检，认为这种只检查公娼，不检查私娼的办法根本无助于防治性病，只能导致公娼合法化、私娼依旧暗中营业，娼妓业更加泛滥，因而主张对娼妓制度持“坚决废止”的态度。所以自19世纪下半叶起，国际社会对待娼妓问题逐渐显现出两种观点和方法：一种主张是管理、限制，另一种主张是废止、革除。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持这种“废止、革除”的观点。他们认为娼妓检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应该无条件的将它废除。彻底禁娼比维持“娼妓检验制度”更符合人道和理性，也能更有效地杜绝妇女贩卖。





至于将废娼的办法付诸实施，可以作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案，例如，第一步可以禁止职业妓女到各大商埠流动；第二步可以颁布一种禁止以公娼馆来营利的法令；第三步颁布一项命令，通知各公娼馆的业主和在馆的妓女从某月某日起所有公娼馆须一律关闭、停业。类似的办法已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的一些英属殖民地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另一些国家则持“管理、限制”的观点。他们认为娼妓制度以及废除公娼问题不能单靠决断的命令式的办法来处理，他们也承认废除公娼自然是理想的境界和最终的目的，但是实行废娼是要以具备几种社会变迁为先决条件的。法国以它的殖民地“越南”为例，认为“实行废娼要在社会环境改变以后”。“要使废娼运动成功，不单是妇女的一般的教育和法律地位要改善，同时还必须使一切卫生的社会的种种救济办法能够事前实行出来”。上述两种观点各执己理互不相让，以致 1924 年至 1926 年“国联”在调查各国娼妓制度后发现 48 个国家采取了上述两





种不同的办法；其一是以法律“禁止、革除”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德国、芬兰、挪威、瑞士、荷兰等 28 个国家；其二是维持“公娼检验”制度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希腊、奥地利、中国、日本、印度、越南、泰国等 19 个国家。两相比较，参与“国联”的大多数成员国是属于主张“禁止、革除”的禁娼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些国家为禁贩妇女为娼签订了两个国际公约，这就是 1904 年的《救济贩卖白种女子的国际协定》和 1910 年的《禁止贩卖白种女子协定》。在 1904 年的国际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彼此约定“根据该协定在各自的领土内设立一个中央机关司理禁贩妇孺的事务”，“担任集中一切关于贩卖妇女到外国当娼的消息……，实行各口岸监视贩卖妇女的情形，设法找寻拐带人口的莠民……互相交换关于此类非法贩卖的嫌疑人犯”。1910 年的国际公约为惩罚贩卖妇女规定：“凡为满足他人性欲而引诱、欺骗、威吓或逼迫妇女为娼，即使经当事人同意亦构成犯罪行为”该公约还规定：“凡诱惑不满 20





岁的少女为娼，虽经本人同意亦在严禁之列。”1920年1月，“国际联盟”成立后，要求各会员国政府批准以上两个国际协定。1921年“国联”又主持召开了“禁贩妇女会议”，并缔结《取缔贩妇孺公约》。该公约条文中有两个明显的扩展：其一，将女子成年年龄推迟至21岁，以扩大未成年女性的保护范围；其二，将过去条文中“未成年人”仅指女性而扩展为还包括未成年的男性儿童或少年。1933年“国联”又召开会议缔结了《禁止贩卖成年妇女公约》。根据此公约，“一切诱惑、欺骗、拐带成年妇女至外国为娼，无论本人同意与否，皆在禁止之列。”1937年2月“国联”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东方各国中央机关禁贩妇孺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是：（1）各国警察机关和其他负责禁贩妇孺的机关更普遍地交换情报与更密切的合作问题；（2）从禁贩妇孺方面研究移民保护问题；（3）在东方各国取消公娼馆的可能性；（4）东方各国警察机关与其他机关暨私人团体进一步合作的问题；（5）任用大批妇女为保护妇孺机关公务员的可能性；（6）已被牺





牲或濒于沦落为娼的远东旧俄籍难民妇女问题。会议通过的取消公娼馆的决议提请各会员国特别注意：（1）宣布以取消公娼馆及公娼制度为最终的目的；（2）劝告现尚保存公娼馆制度的国家赶快采用教育的方法，造成废娼的舆论；（3）劝告各国于实行废除公娼制度时，必须事前或同时实施行政的、医药的、社会的各种救济办法，以保证废娼运动的成功，达于久远。”

中国是以上四个国际公约的签字国。根据 1904 年的国际公约，南京“民国政府”确认“内政部”及各省、县、市警察局为负责禁贩妇女事务的机关。1937 年还派出由熊希龄（1867—1937）、毛彦文夫妇等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童保护协会、北平香山慈幼院三机构的成员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万隆的禁贩妇孺国际会议，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对于禁贩妇女的献议”的报告书。该报告称：“按照中国的法律，卖淫是要禁止的，公娼馆的妓女应该遣散，并且在新法令实行以前，一切妓女要逐渐离开公娼馆”。但是据“国联”东方禁贩妇孺调查团的报告书称：





“中国在原则上虽禁止公娼馆，但‘禁止公娼’的原则，未经中国各省政府全部执行。”调查团的报告书还指出：“中国警厅与租界当局对于禁贩妇孺的工作缺乏合作”“确属事实”。“中国当局与租界行政机关并不协调一致，在上海此例最为显著。因为上海市政府，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关于禁贩妇女并无一种合作的规定”。

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末的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各地实行的均是“管理、节制”的“公娼制”，即“娼妓检验制度”。历届政府只禁私娼，不禁公娼；把向公娼馆征收花捐作为各级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妓女只要注册登记，按时接受性病检查，妓院只要领取营业执照便可公开营业。有的省、市或地区虽有短暂的“废止、革除”的禁娼措施，但就大多数省、市、地区的大多数时期而言，主要的仍是实行“管理、节制”的“公娼制”。

“公娼制”首先是在全国各大商埠的租界里兴起。由于租界不为中国政府管辖，因而租界内的妓院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只要按





时向租界当局缴纳营业税，就可以公开营业。租界的外国占领者对妓院也持纵容、姑息的态度，或划定一些地段作为“风化区”，或辟出一些街巷作为妓院的聚集地。对娼妓实行定期的性病检查，也最早始于租界。如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妓院主要集中在租界的宝善街一带。1877 年租界工部局设立性病医院，对娼妓实行体验。1920 年租界工部局依照《妓院领照章程》，向妓院颁发营业执照，租界里的“公娼制”从此就进一步完善起来。1941 年日寇侵占上海租界，又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拉客，日伪军警不得干涉。1860 年天津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后，随即在天津城南紫竹林一带圈地 960 亩建立英、法、美三国租界，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妓院也逐渐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侯家合一带纷纷迁移到租界地及附近地区。南市、中华后、富贵胡同、谦德庄等地很快成为妓院聚集地，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七·七”事变后，驻津日寇侵略军公开以繁荣市面加强税收为借口，提出可以随意设立“乐户”，因





此，天津妓院骤增。1943年以后，日寇不允许游妓以特等妓女的名义在旅馆、饭店公开营业，致使大批游妓纷纷转入旅馆、饭店，一时妓女更显增多。天津娼妓的体检制度也早在20世纪初建立。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1900年天津为八国联军侵占时，“联军驻天津，恐妓女之患梅毒，也设局验之”。又如，福州1842年后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外国洋行竞相在福州投资经商，当时台江汛、上下杭、潭尾街富贾聚集，苍霞洲、义洲、邦洲等地商旅客帮众多，商业日益繁荣，外国资本在这些地段开设了许多“洋牌馆”，表面上看是经营洋货的商行，实际却是集卖春、吸毒、赌博于一体的黑店。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190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巡警厅开始抽收妓捐，实行“公娼制”后，各地也逐渐仿效这种允许一部分娼妓公开营业，同时抽收妓捐的办法。因而，详细地考察了民初的中国娼妓业的乐灵生牧师认为，“当西方国家正开始走向相反方向的时候，中国似乎正在走向准许商业化罪恶和正式承认妓女的这么一种制





度”。“公娼制”在“民国”以后，特别是在1928年“定都”南京后逐渐趋于完善，并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当规模。国民政府管理娼妓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颁布管理娼妓或乐户的规则、条例或章程。民国以后，特别是国民政府1928年“定都”南京以后，各地陆续颁布了管理娼妓或乐户的各种规则或条例。清王朝，卖淫处于地下状态，原因就在于大清刑律对“狎妓”作了比较严厉的刑事惩治规定，而“民国”以后颁布的法律“似乎比旧刑律较为确定地承认和许可娼妓的存在”。民初北洋政府也颁布了妓院和妓女监督条例，期望在全国实施。但是，由于连年战乱、社会动荡，人们对这些条例似乎一般都不知道，最少这些条例并没有一般地被实施。各地警察机关和政府面对也无力有效控制娼妓业的泛滥，不得不实行“明禁暗放，化暗为明，寓禁于管”的消极禁娼政策，历届政府只禁私娼，不禁公娼。例如，云南在民国4年（1915年）4月，省会警察厅颁布《取缔私娼办法》，规定所有私娼必须从良嫁人，逾期不嫁，即由





警方送入济良所。民国6年（1917年）6月，省会警察厅又制订《监视户取缔规则》共14条，将被查获不止一次的妓女列入警方监控范围。进入30年代以后，各地颁布的有关条例或规则更多。如广西省在1933年（民国22年）6月制定《取缔私娼暂行办法》取缔私娼。民国25年（1936年）5月广西省政府规定（民国31年9月又修正通过）的《广西省管理娼妓及乐户规则》。青岛市在1922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胶澳商埠警察厅制订了《中俄娼妓管理规则》，对华籍、俄籍妓院进行了整顿和管理。1934年除由青岛市警察局继续对中俄妓院、娼妓施行管理和收税办法外，还重新颁布了《青岛市管理乐户规则》、《青岛市管理娼妓规则》和《青岛市管理俄籍乐户、娼妓规则》。北京市在1938年（民国27年）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颁布了《收发娼妓执照事务所组织章程》及《收发娼妓执照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警察局特设此事务所办理给娼妓发放执照及收费等事宜。同年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又颁布了《取缔娼妓规则》、《管理乐户规则》及《发给娼妓执照征





费章程》等。各地“公娼制”在抗战胜利后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公开征税。如民国 35 年（1946 年）国民党福州市政府要求所有妓女向市警察局登记。当时前往登记的妓女有 600 多人，福州市警察局指定营业地点，发给营业执照，按甲、乙、丙三等，每月向市政府缴纳捐税，还规定娼妓必须按时去诊疗所体检，妓女必须在胸前挂桃花胸章，以便识别等等。

第二，向妓院和妓女征收花捐。除了上述“寓禁于管”的一些规则或条例外，“民国”以后的历届政府沿袭清末的例规并执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在禁娼的名义下，勒令娼妓登记缴纳花捐。表面上讲是以此“禁娼”，实则是以此扩充财政收入之来源。征收花捐一般是将妓院和妓女分为两类：妓院分若干等级，按年缴纳一次或二次花捐；妓女也分为若干等级，妓女个人每月纳捐一次或二次。据民国 4 年（1915 年）《汉口警察捐一览表》记载，警察局征收乐户捐、旅馆寄居花捐、乐户妓女执照费合计银洋 5.55 万元，占该表所列 24 项捐费的第二位。花捐随着物





价的上涨也呈上升趋势。据 1935 年 5 月 13 日北平《晨报》载，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汉口妓女每月纳捐分 20 元、15 元、10 元、4 元、3 元、2.5 元七个级别。在民国 18 年（1929 年）汉口花捐收入达 13.7 万元，民国 19 年（1930 年）增加到 14.6 万元。另据 1935 年 6 月 12 日广州《大晚报》载，广州妓女每台酒局客人付给妓女 5 元，而妓女却要缴纳如下捐费：花捐 1.1 元，教育费 0.2 元，贫民教养费 0.2 元，洁净费 0.1 元，工艺费 0.6 元，车费 0.65 元，手续费 0.05 元，合计 2.9 元，也就是说政府捐税占了妓女收入的 60%。广州一市花捐最多的时候，一年竟达 90 万元以上。当然，经济的不景气会直接影响到娼妓业的繁荣。由 1929 年至 1933 年资本主义爆发了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殃及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商业萧条，娼妓业生意也显清淡，花捐锐减。据 1935 年 5 月 11 日北平《晨报》载，汉口花捐在民国 19 年（1930 年）有 14 万元，而到了民国 23 年（1934 年）跌至 6.8 万元，减少了一半以上。广州花捐更比汉口跌得厉害。据 1935 年 6 月 12 日广州《大晚报》





记载：过去每年达 90 万元，而在现在只有 11 万至 15 万元，差不多只有以前的 1/10 或 2/10。

“民国”后有的省份征收花捐还采取了招商投标承包的办法，以便谋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如广西省在“民国”后成立了花捐公司，省财政厅采用投标承包的办法，发包任人承包，并向妓女征收：牌照费（妓女每人领牌照一张，每年更换一次）、局徽（出局陪客的标记）、宿徽（陪客住宿的标记）、销号手续费（妓女从良或停业须销号）等费用，还向嫖客征收筵席捐。民国 16 年（1927 年）广西废娼前，全年花捐收入达 20 余万元。桂林的花捐公司，多年来是由桂系白崇禧的胞兄白崇勋向市政府承包。民国 26 年（1937 年）广西省会警察局全年征收花筵捐 5208 元，花捐附加 1617 元，特区内收入 19913 元，稽征弹压费 1589 元，合计 28327 元，占警局当年征收总数 59737 元的 47.4%。

第三，妓女性病检查，各省管理娼妓及乐户的规则或条例都规定娼妓要接受健康检查。凡查有花柳病或其他传染病，非经治愈





不准接客。如民国 27 年（1938 年）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取缔娼妓规则》第 5 条第 5 款规定：“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第 9 条规定：“凡为娼妓者应按照妓女验治所之规定受身体之验治”，“娼妓患病者非经治愈复验后不得接客”。同年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颁布的《管理乐户规则》的第 13 条第 9 款规定：“妓女患传染病或花柳病时应速送医院诊治并报明本管区署”。民国 24 年（1935 年）广西省政府批准桂林县政府呈送的《娼妓健康检验所组织大纲及检验细则》，规定检验所由桂林公安局协同省立桂林医院组织办理，医生、护士由医院派人兼任，警士、事务员等由公安局派人兼任，所长由公安局派任。该细则还规定娼妓每月进行两次健康检查。民国 35 年（1946 年）5 月在桂林九良上街恢复成立娼妓健康检查所，规定娼妓每月检查一次。1945 年抗战胜利后，武汉市政府指令汉口市医院皮肤花柳科担任武汉市的妓女健康检查。公娼分为三等：一等妓女每 3 个月检查一次，二等每 2 个月检查一次，三等妓女每月检查一次。对有性病的妓





女除要求治疗外，还要扣下妓女营业执照，待痊愈后再发还。

尽管各地都有类似上述的各种“管理”、“禁娼”措施，但是各地均未收到“有效管理”或“禁娼”的效果，相反却使一部分娼妓的卖淫“合法化”，使一些暗中卖淫的场所“公开化”，性病或其他传染病也未有效地控制住，大多数妓女都患有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性病。乐户业主为了赚钱常向检查所的警察行贿，以致蒙混过关，性病更加蔓延，各种管理措施也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已逐渐取消“公娼制”，而我国各地仍旧实行对妓女检验的“公娼制”直到50年代初，公娼制及暗中的私娼才为人民政府禁绝。

禁娼仅在短时期局部地区存在过，却从未在全国展开。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其后的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各地都制订了一些条例或规则，对娼妓业实施管理，但在1911年以后的近40年时间里，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从未有过哪一届政府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全国统一的行政管





理和统治，因而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过有效的禁娼措施。近代史料上可以枚举出的也仅是一些为时甚短的地方性的“禁娼”措施：

如民国3年（1914年）6月，云南都督兼巡按使唐继尧（1883—1927年）在云南省会昆明下令废止“集园”公娼；同年7月，省会警察厅还颁布了禁娼的3条措施；民国4年（1915年）4月，省会警察重新颁布《取缔私娼办法》；民国6年（1917年）6月，省会警察制订《监视户取缔规则》共14条，“化非法为合法”；民国7年（1918年）1月省会警察厅决定恢复公娼，招商承办，交商人艾济川承包；同年4月5日万庆街（四川街）“集园”公娼正式开张。3、4年里，几“禁”几“弛”，最终仍以“弛禁”告终。

民国9年（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开始为期5年的“摇珠禁娼”，获得了社会舆论的赞许。民国11年（1922年），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1878—1933）下令关闭广州市的所有妓院，一时陈塘和东堤的大小妓寨纷纷关门停业。但是同年6月，





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背叛孙中山。1923年1月，驻粤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联合驱逐陈炯明，陈溃败退守东江，滇桂军阀入粤后，陈炯明的禁娼令也告失败，妓院很快又重新发展起来。

民国16年（1927年），冯玉祥将军（1882—1948）主政河南，力主禁娼，下令警察厅长阎树人督同开封南区署长徐秉衡将开封妓女送往济良所从良，并将妓院集中的第四巷改为和平巷。三年之后，民国19年（1930年）秋刘峙上台后，旋即取消禁娼令，又恢复了第四巷。并且变本加厉，将原来的中第四巷的书寓扩展到前第四巷，妓女增加2倍以上。

民国16年（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通令全省禁娼，成效十分有限。民国20年（1931年）公娼又逐渐恢复。民国21年（1932年），广西省政府将公娼特别区改称“特察里”，公娼进而更加盛行。

民国17年（1928年）9月，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在“首善之区”宣布禁娼，停征妓捐，迫令妓女改业，逾期不从驱逐出境。不久，





当遇上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萧条，南京市工商团体又建议政府解除禁娼令，呼吁“恢复繁荣都市媒介物”的公娼制。1936年4月，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天津等处又开始试行公娼。

民国18年（1929年）方振武将军（1885—1941年）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下令取消花捐，命令蚌埠所有妓院在1个月内停业，并拘禁了一些恶霸龟头；宣布一切明娼暗妓皆为非法；设立济良所，专事妓女从良。一时蚌埠禁娼颇有成效。但好景不长，仅隔数月方将军因反蒋被蒋撤职、扣押，军队也随之被改编，取缔娼妓的法令迅即被取消。蚌埠娼妓业就此又重新恢复。

抗战胜利后，民国35年（1946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5年内禁绝上海娼妓的指令，上海市警察局据此制订了《整理上海市娼妓计划及管理娼妓暂行办法》，警察局长宣铁吾在向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禁娼步骤。所谓的“化私为公”，就是以妓院1000户、妓女1万人为限对全市公私娼进行





登记；即使是私娼，但凡申领了执照的也可以成为合法的公娼。“化繁为简”就是将五花八门的、公开或变相的卖淫场所统统变为妓院，从今以后类似象向导社、按摩院之类的各种变相卖淫场所一律禁止。“化零为整”就是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划定娼妓特区，将各地零散的妓院集中于此。这样的禁娼步骤实施起来，非但没有禁绝上海娼妓，反而使私娼变为合法的公娼，娼妓更多；使各种变相卖淫场所“浮出水面”成为公开合法的妓院；使零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特定的“风化区”。全市娼妓登记期限也一再拖延，直至1949年1月4日警察局还在以“沪地环境特殊，人口众多，社会经济情形未见好转，谋生艰难，若一旦予以停止，势必私娼日增，取缔困难”为由要求延展1年登记时间。上海1946年的“禁娼”，最终流于表面而不了了之。

4. 娼妓“禁”“弛”的消长。近代以来，由于外敌入侵战乱连年，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从未有哪一届政府对全国实施过统一、有效的行政管理。政令不通，行政效率低下，中央的法律、政令各地置若罔闻，不当一回事。





兼之各地法规、法令互不统一、协调，因而反映在近代社会对待娼妓问题的“禁”与“弛”上，就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状况。最明显的就是南京与上海两地娼妓业的禁弛消长。如 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取缔妓院，查禁娼妓，实行严厉的废奴禁娼政策。一时南京及苏南一带的娼妓业萧条，秦淮河两岸的妓院及妓女纷纷东逃进入上海租界。租界人口骤增，上海娼妓业也因此而勃兴，呈畸形繁荣。但是，随着 1864 年 6 月天京为清军攻破，原本逃往上海栖居租界的南京富商又返回故里，上海租界人口顿时锐减。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大开娼禁，兴商业，效管仲设女闾，秦淮河两岸娼妓业又重现繁荣，而这时上海娼妓业却呈现萎缩，“阗阗遽为减色，掷缠头者，非复如前之慷慨矣”。又如，1928 年何民魂任南京市市长，提议用“缴械办法”扫地出门，立即将南京城内 3000 余名妓女驱逐出去。可是随着何的去职而流产。刘纪文继任市长后，在同年 9 月宣布“禁娼”，具体办法是：（1）立即停止向各妓院征收花捐；（2）迫令各等妓女从速自行改业；（3）





对那些不服从政府命令、拒不改业者，逾期一律驱逐出境；（4）扩大救济院及平民工厂，以安置妓女就业。南京市政府严厉禁娼的这一举措在周边各省引起强烈反响，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大小城市纷纷效法，南京娼妓业严重受挫呈现萎缩。不少娼妓除远走东北、华北等省市外，大多就近逃往上海租界，或进各妓院当娼，或流落街头拉客。兼之当时还有不少因“十月革命”而跑到中国来的白俄妓女，上海娼妓人数骤增，街头野鸡比以前还多，上海娼妓业反较1920年禁娼前发达。1919年10月，“审查淫业会”曾经调查得出：上海娼妓甲、乙、丙等及私娼、广东妓女，共计7000余人（未包括外国妇女、台基及其他半公开的娼妓）。禁娼后，鲍祖宣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中讲及：“据最近的调查，上海一地的公娼私娼为6万人至10万人。”罗琼也证实，1935年“上海一埠已有公私娼妓10万左右”。

类似的禁弛消长差异，还反映在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开始禁娼，清除的办法是每年撤销20%的妓院执





照，连续进行 5 年。而法租界并不执行该政策，不予理会，原因在于法国是个奉行娼妓检验制度的国家，法国本土尚无禁止公娼的法律规定，法租界当局力图使殖民地与国内本土保持政策的一致性。所以，当公共租界在所辖区域内采取禁娼行动时，法租界非但不采取相应的清除办法，反而放任自流。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七章

妓女文学



风

化

图

史

7



一、20 世纪 20 年代的妓女文学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中国的文坛上以妓女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

生产这类文学作品的原因是在妓女问题上集中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性的虚伪、丑恶和不合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性压迫，而妇女就在这被压迫的最底层；贫困能使人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美好的性爱变成野蛮的兽欲；一些人白天大讲“礼义廉耻”，晚上却天天爬上妓女的床……

当时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集中体现了妓女文学。比较著名的有老舍的《月牙儿》和《微神》、丁玲的《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郁达夫的《雪夜》、沈从文的《丈夫》



和《柏子》、蒋光慈的《徐州旅馆之夜》和《丽莎的哀怨》、孟超的《茶女》、许地山的《人非人》、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等等。

对妓女生涯的描写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被扭曲得不像样子的时代面貌。例如沈从文的《丈夫》，描写一个船妓接客，她的丈夫只能可怜兮兮地躲到后舱去：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仍然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一肚子烧酒，摇摇荡荡的上了船。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觉。那洪大而含糊的声音，那势派，都使这作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支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火。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





转去了。

周天籁在《亭子间嫂嫂》中则描写了住在上海四马路附近的一个暗娼：

从前我住在云南路扬子饭店对过老会乐里时候，有个年方花信容貌美丽的女邻居，她是单身匹马一人住在我们隔壁房那个斗方的亭子间里的。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也不会仔细地盘问她。我们都叫她亭子间嫂嫂。虽然和她相处好一个时期了，平日也非常热络的，不知如何从来也不问及她的出身，故乡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干什么工作的。我们只见她一到晚上，便浓妆艳抹地出去了。最奇怪的是她有时从外面回来，后面跟上一个男子。这个男子陌生面孔，并且都是初次上门，以前没有来过。亭子间嫂嫂走到自己房门口，便掏出一把小钥匙，一面轻轻地道：

“先生，站一站，让我开门。”

于是便听见“扑托扑托”开锁声音，一会门开了进去，男子便也跟进亭子间，又听见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起初我看见这情形，毫不为意，以为是





她丈夫的朋友，或者同乡人来坐坐谈谈。后来夜夜看见她把陌生面孔的人带进来，才渐渐明白她所干的什么事情了。当然这是环境所逼，生活压迫她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我们自然表示同情，可怜她，从来没有鄙视过她，平日也照常当她一个邻居看待，只不过不愿去盘问她如何出身和为什么要沦入这条路。一方面她似乎也知道我们洞悉她的一切，所以有许多地方并不讳莫如深，很直爽地告诉我们，意思里有说不尽的许多痛苦。我觉得她的谈话有许多地方颇有趣味，说每一个客人各有各种不同的脾气，常常使我们好笑。这时期好奇心怂恿着，三隔二天把指尖弹弹板壁，叫她过来白相。过来一次，我便盯紧她问昨夜那个男子怎么样，前夜那个老头怎么样。她蜜蜜笑道：

“朱先生，你倒听出滋味来了，说来说去也不过是这一套呢。”

“亭子间嫂嫂，谢谢你，你就说一个让我们听听。”

这时候她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笑着绘声绘影地和盘说了出来，她满口清脆流利





的苏白，说得句句悦耳，我听得嘻开了嘴。亭子间嫂嫂往往讲到要紧关头地方，便也一阵格格笑出声来道：

“好了，好了，再说下来，又是老套头，我不高兴说了。”

许多作品对贫穷、压迫和欺骗如何把女性逼进火坑作了生动的描述。例如老舍的《月牙儿》。月牙儿是一个姑娘的美好理想和对生活的憧憬，但是，最终她失去了自己的月牙儿：

我长大了一些，觉得自己美，可我不放心自己，妈妈也是不难看的。我曾意外地看到妈妈在一家卖馒头的门口吃力地拉风箱，多想妈妈呀。学校要换校长了，我离开了学校。我想妈妈，可我不能连累她，要自己担着苦处。但是世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不如条狗。连洗臭袜子的事也找不到。我佩服妈妈了，不去死，只要有人给我饭吃，我什么都干。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我又看到月牙儿，这是希望的开始。

我去找校长，遇到了她的侄子，是个青年，那青年利用我的无知，让我搬进两间小





屋，我失去了月牙儿，也失去了我自己。我后悔，我喜欢。他每夜来，供我吃喝。不久他的妻子来找我。我可怜她，偷偷搬走了，想找个事做。好不容易我被一家小饭馆选中，可我不愿意去讨好、奉迎、巴结客人，试了几天工，就被赶出来了。从和那青年发生那件事以后，我懂得了男女关系，男人需要的是肉，女人卖了肉就可以有吃穿。实在挣不上饭吃我就得卖肉。那青年的妻子告诉我，她丈夫又弄了女人跑了。她有公婆父母，没有自由，甚至羡慕我。我笑了，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所以我不想把自己卖给一个人，要浪漫地挣饭吃。我上了市，可往往人家给你一杯冰激凌换你一个吻。要卖得痛快，拿钱来，陪你睡。我想妈妈了。

我回到妈妈和新爸住的两间屋，买卖很不错。对有钱而又想包了我的人，我不大招待，带钱不够的，我让他回去拿；装了些铜板的中学生模样的人，我可怜他们，也卖；对那些想在死前寻些欢乐的老头子，我也满足他们的需要，有些油子，不但不给我，反





占我的便宜，得罪了他们就找巡警来找我麻烦，我认识了警官以后，才一个个收拾他们。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谁坏谁占便宜。我认识了钱与人：人是兽，钱是兽的胆。

我有了病，想是快死了。可我没死，找我的又来了。我接待，要把病传染给他，这不是我的错。一天早晨，妈妈来了，原来馒头铺的掌柜撤下妈妈，偷回了老家。我哭了又笑，妈妈找到的女儿是个暗娼。现在该我养活妈妈了，女子的职业是世袭的。妈知道我有病，疼我，可她得任凭人家蹂躏我。她拼命向客人要钱，谁少给了就骂。妈说的对，我们是拿着十年当一年活的。是的，干了两年我老了，有时看见了 my 死。钱是延长生命的，可我接进一块钱就死了一点。我不怜惜生命，我受的苦早已胜过死。我想象一种理想生活，而现实是地狱。妈妈劝我嫁人，我已不知什么是爱。尽管拼命地说爱，可没人要我。是呀，要是我不要钱，管保人人都爱我。

正在这时，巡警抓我了，说是要扫清暗娼。正式妓女都还做生意，因为他们纳捐。





我被放在感化院，说将来可以嫁人、做工。我不受这个感化。吐了一个来检阅的大官儿一脸唾沫，便被送进监狱。监狱是个好地方，我不想出去，世界比这儿好不了多少。“我又看到我的朋友月牙儿。多久没见它了！妈妈干什么？我想起一切。”

老舍的另一部作品《微神》则描写一对情人离别了，许多年后重逢时女方已不复旧时的她而被生活逼成了妓女，于是向初恋的对象作了血泪的控诉。这篇作品令人想起了古人那篇《章台柳》词：“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我把爱藏在心中，”她说，“拿肉体挣来的茶饭营养着它。我深恐肉体死了，爱便不存在，其实我是错了；先不用说这个吧。他非常的妒忌，永远跟着我，无论我是干什么。上哪儿去，他老随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绽来，可是觉得出我是不爱他。慢慢的，他由讨厌变为公开地辱骂我，甚至于打我，他逼得我没法不承认我的心是另有所寄。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及饭碗问题了。他把我赶出来，





连一件长衫也没给我留。我呢，父亲照样和我要钱，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凡给我钱的便买去我点筋肉的笑。我很会笑：我照着镜子练习那迷人的笑。环境的不同使人作退一步想，这样零卖，倒是比终日叫那一个阔公子管着强一些。在街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后影叹气，可是我到底是自由的，有时候我与些打扮得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过四次胎，但是创痛过去便又笑了。

她休息了一会儿，我的泪已滴湿她的衣襟。

“你回来了！”她继续说着：“你也三十多了；我记得你是十七岁的小学生。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双绿拖鞋的眼。可是，你，多少还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继续作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作。我始终一点也不怀疑，我知道你要是回来，必定要我。及至见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么给你呢？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永远不拒绝，不论是对谁说，我





是爱你；你回来了，我只好狂笑。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假如你永远不回来，我老有个南洋作我的梦景，你老有个我在你的心中，岂不很美？你偏偏回来了，而且回来这样迟——”

“可是来迟了并不就是来不及了，”我插了一句。

“晚了就是来不及了。我杀了自己。”

“什么？”

“我杀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区别？在打胎的时候我自己下了手。有你在我左右，我没法子再笑。不笑，我怎么挣钱？只有一条路，名字叫死。你回来迟了，我别再死迟了：我再晚死一会儿，我便连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住在这里，这里便是你的心。这里没有阳光，没有声响，只有一些颜色。颜色是更持久的，颜色画成咱们的记忆。看那双小鞋，绿的，是点颜色，你我永远认识它们。”

“但是我也记得那双脚。许我看看吗？”

她笑了，摇摇头。





我很坚决，我握住她的脚，扯下她的袜，露出没有肉的一支白脚骨。

“去吧！”她推了我一把。“从此你我无缘再见了！我愿住在你的心中，现在不行了；我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

堕入风尘原因有许多，于是在作家们的笔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妓女，情况不同，心态不同，但都是那不合理的社会牺牲品。在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中，甚至描写了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往上海的俄国贵族夫人沦为娼妓的情景，这也反映出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某种面貌：

我记得那一夜在我此生中是最羞辱的一夜。固然，这几年来像这一夜的经过不知有多少次，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中国人、黑人，只要有钱任你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你过夜，但是那夜是我生命中最羞辱的初夜啊。从那夜起我做了人们兽欲的发泄器，这是伯爵夫人教导我这样做的。那夜十点多钟，我在黄浦滩的公园里像做生意一样领回一个美国人，白根向客人点了点头就走出去了，我只得向那美国人说这是我的朋友。于是，从





这天起白根成了我的朋友。我在羞辱和恐惧中任凭美国人的摆弄，因为我这一夜是属于他的；后来，他丢下一张十块钱的纸票走了。白根回来了，我痛哭，我骂他，但是转而一想这不是他的过错啊。这时，隔壁伯爵夫人的房间里也有嘘笑的声浪。

近两年来，上海的跳舞场如雨后春笋地发生了，这些俗恶迂腐的中国人也欧化起来。自从有了很多的跳舞场后，我和伯爵夫人一面充当了舞女，同时也做着我们的生意，在舞场中更容易找到客人。白根成了家里的奴仆，当我把客人领进家时他就静悄悄地走出去。如果那一夜我独自一个回到家来，这反要使他失望和不愉快。我的天啊，这是我的丈夫吗！

作家们也描绘了那个时代某些劳动人民的嫖妓，他们好不容易地挣到了几个钱，就迫不及待地去酗酒、嫖女人，这些人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阿Q”，灵魂早已扭曲和麻木了。例如沈从文笔下的《柏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船夫中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





梳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不知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了岸上。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在。

灯光多无数，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在那里谈天取乐。灯光还不及塞满此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居然是欢喜在胸中涌，一定得打嗝，所以沙喉咙的歌声笑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的水手耳中眼中，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他们尽管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依然摇摇荡荡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习的吊脚楼上去了。

通过对嫖妓这一侧面的描绘，反映出当时一些劳动人民畸形发展了的生活需求：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三样事，这些喽罗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酩酊之酒，烟是平常的





烟，人则更是……然而各个心是同样的跳，头脑是同样的发迷，——我们全明白，这些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下流话的口，可是于这时也必然粘粘滋滋，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谄谀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粗卤卤的把脚放到妇人的身上去，脚上去，以及……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女人帮助这些无家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取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痴。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这样那样作着那顶切实的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铜钱和精力，全部倾倒到这妇人身上，他们却从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若说这生活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回味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的心，可说永远是健康的，在平常生活中，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

对此，作者是倾注了“哀之”、“怒之”的复杂情感的。





沈从文在《柏子》里也具体地描绘了一些性行为，但是雅而不俗，富有生活气息，这似乎可以反映出当时文学作品的一些特点。

《柏子》的最后一段写得很有意境。这一段描绘了人的原始本能，描绘了人的最原始的需求被满足了以后所获得的最原始的快乐：

柏子冒了大雨在河岸泥滩上慢慢地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头的废缆子，光旺旺的照到周围三尺远近，光照前面的雨成无数返光的线。柏子全无所遮蔽的从这些线林穿过，一双脚浸在泥水里面，——他回船上去。

雨虽大，也不忙，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说忘雨的东西罢。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了无须置意的事了。

这时妇人是睡，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即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口。妇人的





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蟥一样钉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作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天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

他的板带钱是完了，这种花费是很好的一种花费。并且他也并不是全无计算，他预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钱，作为在船上玩牌用的。花了钱，得到些什么，他是不去追究的。钱是在什么情形下得来，又在什么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这个来比较，总之比较有时像也比较过了，但结果不消说还是“合算”。

轻轻的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边时，柏子小心小心的走过去，所以预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为老板娘还在喂小船老板的奶。

在这些作品里，常常流露出作者同情卖淫女，对逼迫她们卖淫的这个黑暗社会的愤





恨。例如蒋先慈的《徐州旅馆之夜》描写了一个名叫陈杰生的青年，在徐州转车时没赶上火车，不得不在旅馆过了一夜，旅馆茶房硬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卖淫女子，陈杰生和她作了交谈。

唉！可怜的、命苦的、不幸的姑娘！杰生听了她的一段简单的，然而充满着悲哀的、痛苦的历史，心灵上说不出起了多少层颤动的波浪。难道说这种惨酷的命运是应当的？这样朴实的、心灵纯洁的、毫无罪恶的姑娘，居然有这种遭遇，请问向什么地方说理呢？唉！这就叫做没有理！……杰生又想起山东人民受苦的状况，那种军队野蛮的情形，“十八九岁姑娘论斤卖”，喂！好一个可怕的世界！可怕！可怕的很！杰生不由得全身战栗了。这位姑娘又悲哀地重复了一遍：

“俺的命真苦！……”

唉！命苦！命苦岂止你一个人么？……

时候已经快到夜半了。杰生看看手表，知道是应当睡觉的时候了，而且杰生因旅行，因受刺激，精神弄得太疲倦了，应当好好地休息休息。但是这位“陪陪伴”的姑娘呢？





请她出去？已经半夜了，请她到什么地方去呢？不请她出去？……到底怎么办呢？杰生想来想去，只得请她在床那头睡下，而且她说了这些话，也应当休息一下了。好，请她在床那头睡！这位姑娘很奇怪：这位客人真是有点两样！他叫我来干什么呢？……但是她想道，这位“客人”真是一位好人！

两个人两头睡，一觉睡到大天光，杰生醒来时已经八点钟了。当杰生醒来时，姑娘还在梦乡里呢。杰生将她推醒；茶房倒水洗了脸之后，杰生从皮包里拿出七块大洋与她，说道：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怎好拿你老的钱呢？”

“不拿钱？不拿钱，你回去又要挨打了！”

姑娘将钱接在手里，两眼放出很怀疑的、但又是感激的光，呆呆地向杰生看了一忽儿，于是慢慢地走出门去了。

在郁达夫的《雪夜》里则以第一人称描写了嫖宿日本妓女的情况，这很可能是他在留学日本时对生活真实的写照：

受了龟儿鴛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





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知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反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行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披上了妓馆里的缙袍，斜靠起了上半身的身体，这样的悔着呆着，一边也不断的暗泣着，我真不知坐尽了多少的时间；直到那位女郎醒来，陪我去洗了澡回来，又喝了几杯热酒之后，方才回复了平时的心状。

当然，除了怜悯与自我谴责外，也有对这丑恶的社会的批判与鞭挞，例如孟超的





《茶女》：

他同情于那可怜的她，他更替那由茶女生活而堕入卖淫生活的翠姑娘悲凄。因此他更想到在这资本主义社会底下，所谓职业，在男的——工人，农民们——也不过是替有钱的当牛马；女的，女的更不过给他们做了寻乐开心的玩具而已。

他觉出在他的身边，好似咆哮着一个大腹便便的恶魔，一方面向着穷苦的人们鞭笞；一方面又拿着许多白光光裸露的女子，在凶暴的奸淫。她们那凄淋淋的哭声，也隐隐的像在他的耳边哀哀呼救。

二、吴虞“艳体诗”的风波及文学家的性感受

1924年4月《晨报》副刊抄录发表引起了舆论大哗。

这些诗句的确太露骨了。这些诗，本来是风流的吴虞写赠与他相好的妓女的，这个妓女炫耀给其他客人看了，于是流出的“艳体诗”竟被《晨报》副刊曝光了。

吴虞非等闲人物。当《新青年》举起





“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时，他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檄文，又以夫人曾祖香的名义刊《女权平议》等，是一个挺有影响的人。因此，胡适为他的《文录》作序时称他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现在，“老英雄”竟出这样的事了。

“艳体诗”一公布，骂声四起。“再看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又一花样！”“狎妓就是打倒孔家店！”“吴虞先生休矣！”……这股责难波涛汹涌，《晨报》副刊也有了“发表有伤风化的淫诗”的海淫之罪，编辑孙伏园急忙打吴虞一棒以解救自己，发表了《浅陋的读者》作解释：吴诗，“本刊不以为然，放在必攻之列”，是“攻击而非提倡，暗刺而非明攻”，“浅陋的读者”你是“误解”了本刊呢！

“艳体诗”的风波随后变得更加复杂了。从攻击吴虞的“艳体诗”连带攻击《吴虞文集》，又发展到攻击“五四”新思想，又波及批评张竞生的“爱情定则”、汪静之的《蕙的风》、章衣萍的《情书一束》以及陈独秀的冶游等等。其中，有对吴虞的误解，有对他言





行不一的谴责，也有一股对“五四”新文学趁机进行反扑之风。

对此，吴虞作了一些辩解，当时文坛上和学术界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周作人、马叙伦、沈士远、郁达夫等都曾站出来为吴虞讲话，其意不仅是保护吴虞，尤其在于保卫“五四”以来的改革成果。

其实，即使在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文坛内部对此事也持不同的看法。诗人聂绀弩对此说过：“我却都私自反感着，以为那是一般年轻人不理解中年人的理智与感情、意志与习性的不统一的苦痛的苛论。”吴虞有诗：“乱世人才偏有数，中年哀乐渐无端”，多少“呐喊”、“叫战”过的人们在世事的消磨下，躬省自己不过是“乱世之饭桶”，及至锐气已挫，早已是“天凉好个秋”的“中年哀乐”。吴虞慨叹“人生数个年，除去风雨雷电蚁蚤以及儿女婢仆之劳精费神，油盐柴米之购买计划，亲戚朋友之来往酬酢，为人生必不能免之外，尚多意外之纷扰，再有仕宦得失、孝悌仁义之事，束缚其间，更有何自由之生趣？”那“艳体诗”，恐亦是“逃禅”的一法，





或者说是“封建”加“小资”根性和习气使然，不过“中年人理智与感情、意志与习性不统一的苦痛”这一人生况味，大概并不限于吴虞等三二人所身受感同，达夫“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平伯“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乃至董桥先生滑稽中见醞醞深味的“中年最是尴尬”的绘色绘声，想来皆为“过来人”而且是定位于“历史的中间物”品格的中国知识分子辈所亲证的吧。于是，聂诗人“反感”于人们对吴虞的“苛论”，很可能是他窥领了吴虞“艳体诗”背后的沉痛和萧瑟。

可是，当时保持着青春激情和锐气的巴金却有不同的看法。在有些人雌黄“五四”的“全盘反传统”时，他却敏锐地说：“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如“当时胡适吹捧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一个喜欢玩女人，闹小旦，写艳体诗的文人”。

应该看到，“五四”文坛的一些风云人物，“处新旧转型递嬗之际，不说头脑中新旧杂糅纠结不免，即私生活亦因新道德尚未普





遍建立和旧道德盘根错节牢而不拔而不能自洁”。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都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人情的弱点；另一方面，如果在性、在个人的私德方面走得太远，就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非但自己声名狼藉，而且对所孜孜以求的事业也造成损害。

在 20 世纪前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些作家、学者大都是“性情中人”。像吴虞这样“邪狎太甚”的人固然不多，可是风流、多情、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性的开明却是一些较为普遍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又和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等许多人最初的婚姻都是由家庭包办的，他们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就渴望自由，渴望个性的解放，也包括性的解放。其中有些人还出洋留学，经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这方面的思想就更为明确，奋斗的精神就更为彻底。不少作家对性抱了十分真诚坦率的态度，把自己的经历、感受都写在作品里，以昭示后人。

郭沫若无论在他的诗歌、小说或散文中，都曾大胆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意识。如他在自





传中就曾写到自己早期性意识的萌生，他说：“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接着他叙述了自己大约在七八岁光景，有天上午在家塾读书累了，借小便为名溜出课堂，跑到三伯父后院的花园门口，遇到了他的一位堂嫂：

“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她在那儿瞭望。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带着乳糜色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断地在那儿动摇。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扪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

后来，郭沫若始终觉得这是他“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到了11岁时，郭沫若认为自己性意识的发展已“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这就是喜欢爬竹竿，常用双脚将竹竿夹紧。“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的感觉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个苹果一样滑落下来。”郭沫若自己承认，他已把“竹竿当成了自己的爱人”，以后又把枇杷树当成了自己的“爱宠”。

以后，他在日记、自传、小说、随笔中，





又十分坦率地谈了他和几位女性的结识和恋爱经过。

与郭沫若、林语堂等作家一样，老舍在自己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中，也曾坦率地叙述过自己幼年时性欲初现的状况，如他在《小人物自述》中就曾写到这方面的内容——

在夏天……关二大妈在屋中老是光着脊背，露着两个极大而会颤动的乳。她的身上，与母亲的大不相同，简直找不到筋骨，而处处都是肉，我最喜爱用手摸她的脊背，那么柔软，那么凉滑，因而我常劝告母亲也学着点关二大妈，把肉多往外长一长……

关二大妈是他的邻居，一位中年妇女，当她搬走时，幼年的老舍还十分想念她。

有些作家在作品中还十分坦诚地谈了自己对性的认识。例如朱自清在《女人》一文中说：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而女人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





呆呆地想了一两点钟，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不知肉味的光景——这种事是屡屡有的。

朱湘则更为明确地说：

朋友、性、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其中文章一项又要了另两项。只看我诗文作得最起劲的时候，正是头次尝到性与朋友甜头的时候。

作家们对性的态度，更多地流露在他们的信件与日记中，而这些信件与日记正是和他们丰富炽烈的情感、曲折动人的性爱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徐志摩 1925 年 3 月 3 日在追求陆小曼的信中说：

阿呸！狗屁的礼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会，去你们的。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这群两脚，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珍重你的爱，永保你的爱。我如其凭爱的恩惠，还能从有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这光亮全是你的。你尽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的滋养与温暖；这也全是你的，你尽量使吧！





又如郁达夫在给王映霞的信中说：

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讲来，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对你感到的，的确是很纯正，很热烈的爱情。这一种爱情的保持，是要日日见面，日日谈心，才可以使它长成，使它洁化，使它长存于天地之间。

这些书信、日记，以后也成为中国近代





和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 20 世纪前期的作家对性抱了这么一种坦城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坚信性是自然的，性爱是正当的，自己在这方面也毋庸讳言；而且，文学来自生活，自己正是从现实生活的挖掘中寻求生命的真谛。

三、同光时代上海首屈一指的胡宝玉

同光时代上海首屈一指的名妓便是胡宝玉，传说她的父亲就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领袖之一、飞虎将军潘起亮，外号小镜子。母亲原是一个桶匠的妻子，后来成为潘的外室。1853 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宝玉就生于这一年，属牛。

上海县城被起义军占领以后，上海道台吴健彰勾结租界各国侵略者封锁起义军。1855 年，小刀会起义军突围出城，潘起亮率领一支军队参加太平军，被封为衡天安，转战在浙江、福建一带。1865 年在广东大埔县战死。宝玉母女留在上海。清军进入上海县城后，大肆屠杀起义军家属，宝玉母亲因是外室，得以幸免。宝玉从小机灵无比，面目





娟秀，宝玉稍稍长大，为生活所迫而开始卖笑生涯。

胡宝玉开始是上海妓院世家宝树胡同谢家名妓，光绪初叶胡宝玉和李巧玲、李三三辈几于妇孺皆知。胡宝玉初次为妓时，名林黛玉，因姿色妖冶，善于修饰，接待嫖客热情周到，思想又自由开放，不多久便压倒群芳。自1865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来自金陵、姑苏的妓女纷纷离沪返回原籍，上海有名的妓女寥寥无几。宝玉挂牌后，便名满花界，豪商巨贾争相光顾。浙江巨商杨翰斋，十分眷恋宝玉。杨原来在上海开设典当，典当关闭后，又以余资做生丝生意。宝玉一度成为杨的小妾，但宝玉性喜自由，过不惯那种深居简出，低三下四，循规蹈矩的作妾生活。不久，改名胡宝玉，重入青楼，但和杨旧情不断，凡杨摆酒叫局，仍旧叫宝玉局。

胡宝玉所处的时代，正是上海日渐成为洋务工业基地，租界日益扩张繁荣时期。胡宝玉重张艳帜后，名气更响，身价越高，这批人都成为宝玉寓所的座上客。其中富豪如“蔡蓁卿、梅道钦、杨子京、宋子蕴、李桂





泉、孙葵石、李颂芬等”都是宝玉的常客，其他过沪的达官也都慕名登宝玉门，宝玉享盛名几十年不衰，直到1906年，年过50岁后才第二次嫁人。

胡宝玉的名字和当时上海巨商胡雪岩、画家胡公寿相提并论，人称三胡。

胡宝玉居然能和如此有名的实业家、名画家齐名，可见她必有与常人不同之处。尤其是她思想活跃，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敢于闯新的精神，是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但由于她所处的妓女地位，她的思想、才能也只能运用在她的卖笑事业上。

近代上海的第一批富商巨贾买办，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福建，胡宝玉为了摸透这些客人的生活习惯，以迎合他们的心理，便南走广东，畅游羊城，一瞻珠江风月，熟悉南国风俗习惯。回上海时购买广东红木家具，布置出富丽堂皇的红木房间，创上海红木房间之始，以此招揽南方来客。为了周旋口说洋泾浜英语，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买办嫖客，结识咸水妹，和咸水妹一同游玩，一起兜风，利用各种机会学习英语。咸水妹的穿





著打扮和上海苏帮、扬帮不同，胡宝玉却学咸水妹剪前刘海，又在寓所布置了一间西式房间，一切家具都用西式、以银光纸裱壁，地铺五彩绒毯，夏天西洋风扇悬挂空中，凉生一室。冬天置备外国火炉，满室温暖。床也用西式，创上海西式房间之始。

胡宝玉对权术非常擅长。她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装满私囊，腰缠万贯的嫖客从不手软。各种记载都说她“日夕伺客，以如日如电之眼环视座中，择其最能挥霍者，独与之厚，一旦取盈，即舍之，别择一客亦如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路过上海，慕胡宝玉之名，到宝玉寓所张筵摆酒，邀客痛饮，宝玉主觞。酒宴结束，丁汝昌拿出 100 两银子放在桌上，作为一席酒的酒资。上海高等妓院规矩，酒宴结束先付下脚 4 元，以赏仆佣。娘姨大姐相帮撤席时，见到这么多银子，便看着宝玉不敢动手取银。宝玉心中知是丁汝昌现付酒资费。但却对娘姨等说，你们总不脱小家气，这是大人赏你们的，眼睛都盯着我干什么。丁一听，大吃一惊，第二天只得又送 300 两以偿酒资。





遇到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胡宝玉便想方设法破其钱袋。有一个叫朱子清的嫖客，是宝玉的常客，但除了例费之外不名一钱，对此宝玉十分不快。便向一个珠宝商借了二朵珠花，然后以珠花为质向朱借 500 金。朱子清因有珠花为质，便爽快地给了宝玉 500 金。过了几天珠宝商去向朱讨珠花说，前几天胡宝玉代你夫人借我珠花二朵，希望你马上归还。朱一听便说，“珠花是宝玉以 500 金质与我的。”珠宝商不信说，“凡游北里者，千金买笑且不吝，区区 500 金何用为质。”朱只得去问宝玉，宝玉却说，“你我两人间的事，怎么能在外人面前宣扬，人家会鄙视你吝啬。珠花是我向他借来的，他所讲的是我借物时的托词，你把珠花还他就是了。”朱只得把珠花还给珠宝商，宝玉便得到了 500 金。

有一年将近过年时，宝玉预算缠头所入不够过年，便想起平日听说宁波有个富翁，极为好色，在风月场中不惜挥霍，只是从不离开家乡。宝玉灵机一动，便带了一个娘姨乘海轮到宁波，投名片求见富翁。富翁见到名片，见是上海大名鼎鼎的红妓女胡宝玉来





访，不胜惊奇，便请宝玉进门，问来意。宝玉便说，因慕翁名，故来一见。富翁听后十分高兴，便请宝玉住在他家，盛情招待。过了几天，宝玉告辞，富翁赠三千金，宝玉回上海度过年关还有余。

对于到她寓所冶游的贫苦青年，她的态度则完全相反。有一个青年慕胡宝玉之名，到他家邀客吃花酒。宝玉看他不象平常挥霍者流，询问座客，才知这个青年是某店号的学徒，一年所入不满数十千文。席终，这个学徒照妓院规矩放下脚4元于桌上，宝玉见了，一把抓起钱，全数还给他。并且对他说，此物赚来不易，君留以自用。北里非善地，君不宜至也。青年大感惭愧，从此再不涉足妓院。

年过4旬后，胡宝玉便退为房老，自当老鸨，买雏妓胡玉梅、胡玉莲、胡秀林、左芸台等，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开设妓院“庆余堂”，规模楚楚。几个妓女都经胡亲手严格训练，得其真传。对待嫖客无不殷勤熨贴，应酬谈吐婉妙绝伦，又都得宝玉房中之术，能使嫖客乐而忘死。院中所备小厨房能





京、苏、扬、锡各帮肴馔，又以苏、锡两帮菜为特色，还能承办西餐。嫖客都乐于歇业后直奔庆余堂用餐，以尝美味佳肴。各妓房中水烟、鸦片、干点、水果，各色齐备。因此，巨商贵客、买办都麇集庆余堂，以此处为世外桃源，人间乐土。胡宝玉本人难得见客，但如遇旧时熟客叫局仍出局。《海上花列传》中的老妓屠明珠，就是暗指胡宝玉。

退居房老后的胡宝玉常穿男装，见客时“轻裘缓带，冠缀明珠，手金质菸管，从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遂作茗话，偶及灾赈事，议论风发，动中肯綮，精神四属，不令座客一人向隅，仿佛堂属相见于公署。”宝玉有一个姨甥女、为优伶，艺名王月仙，在上海小有名气。汉口怡园剧场来沪聘请王，宝玉和甥同赴汉口。一时汉口轻薄子弟奔走相告“胡宝玉来，胡宝玉来”。一般市侩以及到上海游过庆余堂者，都殷殷问讯。王月仙登台演出时，观众争掷洋钱，以讨好胡宝玉。剧场主人设宴招待宝玉，宝玉著男装出席。众人纷纷“执手道慕”，那些不能近身的人便远远地站着鞠躬致敬，其威风 and 达官显贵相比





毫不逊色。

1906年（光绪丙午三十二年）春，胡宝玉让几个妓女先后嫁人，自己嫁一姓陈的杭州人。嫁时锣鼓喧天，职事先导，宝玉坐花轿中，带去积蓄10万，字画古玩无数。后宝玉为陈捐了一个尹嵯需，住在两淮。辛亥革命后，夫妇一起到上海，此时宝玉所有积蓄都已花光，靠典卖首饰字画度日。陈勾搭上一个流寓上海的女子后，把宝玉所有字画、古玩偷渡一空，宝玉迫不得已，与陈脱离关系，又成孤身一人。为了生活又重操旧业。1919年时，胡宝玉在西门内孔家弄关帝庙前有一座住房。家中有一仆一婢，有一个经营船业者按月供给费用，过平淡的生活。

四、清末民初四大金刚之一：林黛玉

林黛玉，是清末民初上海花界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之一。真姓陆，名金宝，小字颦卿，松江章练塘人。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个普通农妇，有几分姿色。因家境困苦，金宝8岁便到李皮匠家当童养媳。10岁时李家迁居枫泾，由于皮匠生意并不好，金宝婆





媳俩便到上海谋生。

开始在姓杨的巨商家做女佣。杨家有一个姓朱的宁波籍女仆，专门做贩卖人口，勾引良家女子的勾当。朱仆见金宝眉清目秀，做事十分机灵，便起歹心。先以甜言蜜语离间金宝和婆母的关系，进而怂恿金宝离开婆母，另找出路，并且设计引诱金宝逃离杨家。然后为金宝延师习艺，一年艺成，“悬标福州路一支香，年 13 即为富绅张岭梅破瓜”，朱得巨款。朱仆怕金宝名成后，被她婆母娘知道，便带领金宝到天津开妓院的要好姐妹张三娘处，让金宝在张三娘处挂牌，花名小金铃。初出茅庐，又是人生异地，小金铃无法与其他妓女匹敌，只能以卖淫取宠客人。没有多少时候，便染上了杨梅疮，不能再接客，只好回上海治疗。金宝因此断决与朱仆关系，不再受其操纵。病好后，又重操卖笑生涯，因敬仰老名妓胡宝玉，便以林黛玉张榜接客。

大病初愈的林黛玉，面颊留有疤痕，眉毛尽脱，只能靠浓妆艳抹，柳炭画眉生姿，这样的容貌，要想以色相招揽生意，吸引嫖客，显然不可能，必须另辟蹊径。





林黛玉有一个章练塘同乡名叫宋二，是上海妓院的老嫖客，他见林色相虽破，但风韵犹存，便为她出谋划策，建议她顺应上海繁华、日趋奢侈的风气，以豪奢阔气吸引嫖客。林既经天津之行，又经大病不死之磨难，便决计冒险一试。

先从服饰入手，黛玉不拘于苏帮传统的淡装雅服而“转变青楼风气，提倡新装”，对嫖客中善于挥霍者，“非但不作丁娘之索，并且代为缝制衣服，代购所需之物”。这样一来，林黛玉之名便不径而走，传遍洋场，上海稍有地位的冶游者，无不登门造访。

其次，林在应酬技巧上用心思，功夫不负有心人。林黛玉果然得到了“善谈论，妙语诙谐，举应为之神怡”，“风流放诞，雄才大略，颇有历史上名妓风概”的赞语。不仅一般富商巨贾对林推崇备至，就是“才名倾一世”的名流对林也十分倾倒。当时“盛流郑叔问、沈砚传、张子苾、易实甫等”人，曾经集合在林的香闺“竟一月欢”。林招待极其周到：“酒肴衾枕，皆极小品，室中琴书、笔砚，位置楚楚，皆极精物”，林有空便与他





们“纵谈、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林出，则诸人假以自娱。”事后郑叔问曾回忆说：“诗酒之乐，盖无过于此时也。”1888年夏季花榜共16人，林黛玉列名第8，填词为“绛跗仙馆主林黛玉，蓄意缠绵，含情绵邈，嫣然一笑，神在个中，以韵胜。”

此外林黛玉曾学艺一年，歌唱较有功底，昆曲、梆子、髦儿戏样样都行。加上她喜欢和当时上海有名伶人交往，所以在戏曲方面更有长进。何荫柟的《钥月馆日记》记叙光绪24年（1898年）11月“初4日，赴巨仙之约于范彩霞寓，……听林黛玉、金小桃、洪漱芳各度昆曲两折，彼此角胜，其妙无穷。”宣统2年（1910年）11月初5日，“晚饭后，同到群仙看妙（即髦）儿戏，尚属楚楚，观者亦众。吴新宝、林黛玉皆在演串，亦此中之巨擘焉。”由此便可见她在戏曲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

1904年，林黛玉曾赴汉口恰园唱梆子花衫，还发生了林黛玉投刺访张彪的趣闻。

武汉在张之洞署两江总督任内编练了自强军，张彪为自强军的一个统制。一日张到





怡园看林黛玉演出，对林频施青睐。几天后，林便渡江到武昌军营访问张，林将名片投进门房。门房起初以为新翰林拜谒的抽丰，一旦看清是林黛玉芳名，便马上进去通报张。张不明林来意，不禁大惊失色，便派人告诉林，这里是军营，不是你来的地方，请马上返回寓所候命。事后，张彪派人赠送林数百金，以酬林渡江拜访之劳。

林由汉返沪后，先后在群仙茶园、丹桂园唱戏，越唱越好，林黛玉在伶界活动的时间也最长。

林黛玉用奢华放诞，交际手腕及其唱戏特长弥补了她的色相不足，一跃而成为上海粉黛的领袖。1897年李伯元《游戏报》称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为花界四大金刚，林居首位。自此，林黛玉之名更是众所周知。“名人墨士、洋行买办、达官富商，莫不以一仰颜色为荣。”1899年间上海花界发起募捐，建造“群花义冢”也推林黛玉为首的四金刚为号召。胡宝玉、林黛玉、赛金花被称为上海“花丛三杰。”

但是，豪华阔气的排场，无度的挥霍，





使林往往入不敷出，因而债台高筑。每当走投无路之际，林便使出她独创的招数，选择富豪者而嫁。她嫁人并非是回头是岸，想过正常人的家庭生活，而是借以替她偿清债务。她把嫁人称之为“湔浴”，即用清水洗净一身污垢。因此，她一生反复嫁人，反复张榜达数10次。所嫁者不是富商、暴发户，就是官吏，她所看中的只是他们的腰包而已。而真正引为知己，满足情欲的则是那些和娼妓处于同等地位的男性优伶。

林第一次嫁的是一个姓黄的棉纱商，不久便离开黄家。继黄之后，是南汇县令汪蘅舫。汪到林妆阁喝酒，欣赏林的风度，忘乎所以的喝酒，醉倒在林寓。于是，出巨款代林还清债款，纳林为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租屋藏娇。汪因县令职守不常住上海。林便与丹桂戏园的著名演员李春来姘居，李出入汪寓如同主人。有一天，汪蘅舫到上海，恰逢李春来在林闺房中，汪盛怒之下，拍案大骂李道：“今日不治伶人，何以为人。”林却冷笑一声，对李说：“彼为现任官吏，一邑之民命系焉。而挟妓酗酒，风化自败，苟至





当堂先坐其罪，然后论他。”李听林这样一说，便持刀逐汪，一副喧宾夺主的架势。汪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张扬，只得自认晦气，悻悻回南汇去了。自此以后，林李似夫妇般姘居一年之久。等到积资用光，林便到南汇租了一幢房子，门上标“南汇县正堂汪公馆”。林乘坐前面挂有“汪”字灯笼的轿子，在县内招摇过市。汪衢舫甚为恼火，只得请人从中劝阻林，并且答应付给重金脱离关系。林拿到钱后才返回上海。

1899年冬，林又以8,000金身价嫁南浔邱某为妾。邱家是南浔巨富，林在邱家一年内极不安分，既勾引缝工又勾引邱家亲戚。邱便让林吸鸦片烟，企图用鸦片收住林。但林烟瘾虽进，淫心不改。邱只得把林关在屋里，林又买通看守，席卷所有首饰、私蓄逃归上海。到上海后和丹桂戏园唱旦角的路三宝姘居，至使路弃家不顾，父亲死了也不奔丧。没有多久，林所有首饰私蓄被人盗窃一空，不得已又操妓女生涯。听说赛金花在津、京生意兴隆，她便北上天津，正碰上排山倒海的义和团运动，林又返回上海，转为伶人，





登台唱戏。

1905年，清政府搞假维新，派5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上海。其中端方久闻林黛玉大名，特地召林来到行轅，一见极为赏识林。林也主动表示愿作端方侍妾，后被左右劝阻而未应承。对失去这一良机，林极为惋惜。有人问到这件事时，林说：“彼御命之人，乃可挟妓。依诱之来，将挟之以遂余欲也。”联系她对付汪衡舫的一番话，林虽已身为妓，但对官吏挟妓相当不满。

1911年辛亥革命后，林继续登台唱戏，因与比她小十几岁的龙小云相好，便从群仙茶园转到丹桂园。林对龙的感情似同母爱，为龙请教师学英文，负担龙的衣、食、学费，还走前清江苏督帅张勋的门路，为龙谋得长江巡阅使衙门的差使。龙小云到南京后，嫌弃林年老，另寻新欢，并时时向林索款献媚于新欢。林知道此事后，打击极大，便离沪北上。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文人政客麇集北京。林到北京后，汤化龙见到她，甚为倾倒，但是林对汤却不屑一顾。结果“汤出资三千，仅得握手一次”。





1914年冬，林返回上海继续入群仙茶园唱戏。这时的她已年近50，年老色衰，卖座率极低。只得又调脂抹粉，故技重施。

1920年2月，林又嫁颜料大王薛宝润为妾。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暴发户，老早就倾慕金剛大名，既成富翁便想娶林为妾。薛当时已60有余，林向来注重内媚术，虽自己已老大年华，但不愿嫁一白发老翁为妾。所以用素不相识，不知性情，婉言谢绝薛。但是薛穷追不舍，并声言拨30万金作为林将来的赡养费，林仍不为所动。而林身边的一帮娘姨、大姐、龟奴等人为了从中得好处，极力怂恿林答应嫁薛，不要坐失良机。在众人的鼓动下，林才决心撒榜嫁薛。薛租屋法租界迎林进门。但是，薛家的财权掌握在夫人之手，对林夸下的30万海口难以兑现。薛每月仅供给林200—300金，自2月到9月，林只拿到一千几百元。林黛玉知上当，便决计提出诉讼。薛闻言后，便和夫人商量，夫人答应给林5,500金，听林自便。1920年冬天，林离开薛家，重堕风尘，和碧霞楼合资经营妓院。





1921年除夕，林因烧香劳累，又日夜连续出局、碰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瘫痪病床达半年之久。经中西医、内外科综合治疗，才勉强能起床，但仍不能出房门一步，病中医药费、鸦片烟费都由一个姓王的姘夫支付。王是个做地产生意的中流人物，林病中开支甚大，仅雇一个服侍林吸鸦片的枪手，一个月就达几百元。因此，当林的病稍有起色后，王便与林脱离关系。林生病后，合资经营的妓院也生意不佳。王一走，林只能靠典卖钻石、珠宝度日。坐吃山空，其可悲下场可想而知。

五、清末民初四大金刚之二：陆兰芬

陆兰芬，与林黛玉同时代的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中居二。真姓赵，苏州人。初为妓时，榜名胡月娥。与一个外号“要紧完”的上海本地人朱渭夫相好，同时和伶人赵小廉关系密切。有一天，朱在安垞第看到胡赵窃私语，并肩而行，朱醋心顿发。朱、赵双方各纠集人员准备对仗，直闹到会审公廨出面干涉的地步。为此胡月娥名声大受影响，便





改名陆兰芬，并和朱渭夫、赵小廉断绝来往。

陆兰芬性情静穆，喜欢淡雅，容貌十分秀美。尤其是一双花梢眼，含情脉脉，左顾右盼，勾人魂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都使人畅心悦目。外国人曾摄取她的倩影寄回国，称为支那美人。其应酬功夫可与金刚林黛玉匹乱，“语言诙谐，席上生风”。和客人情话娓娓不倦，纵是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心动。陆还擅长唱青衫，所谓“余音袅袅，可三日绕梁”。一帮风雅之士，洋行、轮船买办都喜欢光顾陆兰芬寓所。

陆偏喜结交买办嫖客，曾经嫁轮船买办郑某为妾。与郑脱离关系后，又和电局总办庄某相好。陆还让自己的弟弟学英文，电局招考时，由庄某具保应考，她弟弟因此而分派到天津、珲春、海兰泡等地的电局系统做事。后来又经她的活动，将其弟调回上海，并谋得军装买办的职位。

陆兰芬由于接触买办客人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西化，上海妓女中，她是第一个住进洋房的。陆是自行开业的住家妓女，属书寓之列。1898年夏天住在北海路僻静处，门首





标“吴中陆”。就在这年的下半年，搬迁到福州路西首的一座洋房，门首标“陆寓”。开张第一天，雇佣巡捕守门，前往祝贺的客人都穿礼服，乘马车，陆春风满面周旋其间。她的儿子仅五六岁，也随母来往送客。后来陆嫁一姓王的嫖客，迁居德邻里，从此闭门谢客。

1900年秋，生一女孩，不久病死。陆死后，王为她发丧，讣文、丧牌，都署“先室陆宜人”。在四大金刚中，陆称得上是生荣死哀了。

六、名噪吴中身巧俊秀的金小宝

金小宝名粟，号阅经馆主，姑苏人。原本是良家妇女性情聪慧，通晓翰墨，后因家道中落，而作声妓。最早在苏州下塘为妓，名噪吴中。1896年夏和母亲同到上海，挂牌惠秀里，为词史。一时门庭若市，车马盈门，青衫名士，争相顾往，负一时盛名。1897年夏，李伯元《游戏报》开花榜，金小宝名列第二，不久又名列四大金刚之一。这时小宝年方19岁。





金小宝身材矮小，容貌瘦削清秀，“风韵体态，雅近上流”，在四大金刚中，应酬以林、陆胜，金则在才艺上高出一酬。

小宝平时志高气傲，遇到中意的客人，娓娓私语，久话不倦。见生客及居心不良之客，则不作一声。如有出言不逊者，决不容忍，必反唇相讥。有一次，小宝在东尚仁里、清和坊两处转局时，失落一只价值 400 元的耳环。二处叫小宝局的客人都说“我赔”。小宝说：“是自己不当心才失落，决无两大少赔偿之理。如见爱我，或各自助我一百元，其余我自己负责。”甲说：“我情愿全部赔偿，只是必须有所说法，方可如数交付”，小宝听后，冷笑说：“并不敢要大少尽赔，如大少愿赔，自应感激。有何说法，我辈交接阔少，不知几许人，一一皆须说法，我只一身，恐分不开也。”说完，拂袖而去。

小宝为人豪爽慷慨，乐于助人任事。戊戌以后，由林黛玉为首的四大金刚为沦落青楼的姐妹发起捐资，建造“群芳义冢”，小宝自始至终出力最多。几次踏勘买地，议价成交，直到 1899 年建成，均由小宝一手主办。





戊戌维新后，上海兴起办女学之风，县令经莲珊于1900年之际，创办南市城东女学。小宝听说后，表示“愿拼挡钗环，追附骥尾”，于是，入女学读书。每天白天上学，下午放学后回寓应征出局，坚持数年。

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国策，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出外留学，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0年间，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自古以来，青楼女子是最敏感于社会风气变化的，思想又是最自由的。金小宝也不例外，她极力怂恿女校教员陆达权出国留学。陆因家境贫寒，无力留学而犹豫不决。小宝便表示“愿意借巨资为先生壮行色”。陆以为小宝只是戏言，并未在意。没多久，陆应湖南一学校聘，离沪。小宝又接踵而到湖南，奉劝陆出国留学。陆看到小宝极其诚恳认真，并非戏言，便决定留学。陆留学的一切费用，都由小宝资助。陆达权到日本后学习法政，毕业回国时，小宝仍在北





里。不久陆与原妻离婚，娶小宝为妻。婚后伉俪和谐，传为佳话。辛亥革命后，陆达权任上海地方审厅厅长，1920年调任军署秘书，1921年又调任电料处长。

金小宝工于绘画，尤其喜欢画兰。“凡含露舒葩，临风布叶，各态仿摹尽致”。有一年小宝听说外省发生灾荒，便展笔作画，卖画助赈。上海人争相购买，“人获其尺缣，珍如拱璧”。卖画所得款项全部充作赈款，一时间成为一桩美谈。

七、貌属中姿但善修饰的张书玉

张书玉，江北人。父亲在上海充当沙船舵工，合家移居上海。父亲死后，家庭失去依靠，母亲又嗜鸦片烟，于是，将书玉典押进宝善街百花里妓院，榜名王月仙。不久，由一个阔老梳拢，书玉得到巨款赎身。后来嫁百花里对门绸庄姓程的老板。但是，程老板既不善于经营，又挥霍无度，没有几年，绸庄倒闭，坐吃山空，夫妇对泣。结果又改名张书玉，再次为妓。

张书玉容貌属中姿，但善于修饰，喜欢





画眉毛，长而黑，衣服时时翻新，极为豪奢讲究。1897 年和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并列为四大金刚。张的色艺和应酬功夫都不及林、陆、金三人，但是善于床第操纵，仅此一招，便名扬四方。有一个名叫李眉孙的嫖客十分赏识张。而张对李并无好感。一次张假称生日，李便设百席为张祝福。从上午 8 点起设筵招待客人，第一批为流氓、车夫，第二批为商贾，第三批为绅宦，第四批为一班著名嫖客，一直闹到晚上 3 点多钟才散席。自此以后张书玉平时熟客都裹足不来，李得以独占张书玉。李眉孙离沪北上时，还向友朋广泛传播，回来将为张书玉脱籍，使得张书玉将为李妾的消息无人不知。

但是，李眉孙北去后却杳无音讯，张在沪因李的缘故生意清淡，张书玉便赴北京寻访。张到北京后虽打听到李的下落，然而无法近其身。张便于 1908 年在北京嫁李三，1910 年随夫游美国，回国后定居北京。

八、清末民初的传奇名妓：赛金花

赛金花（约 1872—1936 年），原籍安徽休





宁，自幼生长在苏州。小名彩云，真姓赵。祖父曾与人合伙开典当铺，祖父死后家道中落。彩云出生时祖父已故，祖母健在，父亲乳名八哥，母亲潘氏，苏州本地人。

彩云长到十三四岁时，眉目清秀，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爱。苏州妓阀金家，引诱她到画舫出局，和一些青年男子谈谈笑笑，猜拳饮酒，开始清倌人出堂差的青楼生涯，榜名富彩云。1886年，在出局中结识状元洪钧。

洪钧，字文卿。1868年状元，曾任陕西、山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北、江西学政。结识彩云时正丁忧在家为母亲守孝。彩云“风度甚好，眼睛灵活，纵不说话，而眼中传出象是一种说话的神气。譬如同席吃饭，一桌有10人，她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极愉快而满意。”风流状元洪钧见了彩云后，立即被她的音容和风度迷住。1888年便正式纳彩云为妾。同年5月，洪钧受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彩云作为公使夫人随行。洪钧出使4年，其中住德国柏林时间最长，生了女儿德官。洪钧任满回国后，





赛金花

升任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带了彩云母女住在北京。1893年8月洪钧病死，彩云随灵柩回到苏州后，便离开洪家，才4岁的女儿德官被强留在洪家。



此时的彩云才 20 出头，娘家父亲已死，弟弟尚未成家。在那个时代苏州女子到上海作妓女的很多，彩云离开洪家之后，一家人衣食无着，便带了母亲和弟弟到上海。上海这时正在繁荣，妓院林立。1894 年 2 月，彩云结识天仙戏园伶人孙少棠。孙是天津人，排行第三，人称孙三。孙三满脸麻子，但体格魁梧，性格柔和，两人同居后感情甚好。结识孙三后，彩云在九江路彦丰里租了一所 5 楼 5 底的房子，包了月娟、素娟两个妓女，挂牌应客，自己作老鸨。平时轻易不露面，遇到知交才见人。后来知道她的人多了，都想一瞻状元夫人风采。在这种情况下，彩云以曹梦兰花名挂牌，每逢星期六、星期日二天见客。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声名鹊起，收入颇丰。

洪家知道后，认为这是耻辱，便“诉诸上海道，即札飭公堂谳员，勒使从良”，彩云只得改名傅钰莲营业。经过这件事后，生意大受影响，同时一般士大夫嫖客不满彩云与孙三过于亲热。孙三便怂恿彩云去天津组班，两人商量后决定度过 1898 年元宵后离沪。新





春之际，孙三穿了洪钧留下的大毛缺襟袍、貂马褂、忠孝带，在四马路一带和彩云一起兜喜神。一个伶人竟穿了官服招摇过市，立即遭到舆论指责。于是，彩云于1898年春，带了母亲和孙三一同北上。到天津后，彩云改名赛金花，组织金花班，班里妓女都是南方人。

这时的天津、北京，大小官吏生活糜烂，狎妓成风，在赛金花班子到天津之前还没有南班，因此金花班在天津开张后生意兴隆。赛金花还两次到北京看行情，住在杨梅竹斜街宏兴旅店，广为交际，其间结识了许多官僚、名士。当时北京还没有南班，赛认为到北京组班是条财路，便合家搬到北京，创南班入京之先例。清末巡城御史陈恒庆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说：“赛辗转至京，寓西安门外砖塔胡同，地为乐部群妓渊藪。于是声名藉甚，车马盈门矣。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予因得而识面焉。初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这段笔记既反映了赛在北京的生意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赛在北京频繁出入官僚府第，活跃于上层





社会巴结各种官僚的行踪。还活脱脱勾划出了陈恒庆之流“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那种伪君子的心理。就在这段时间里赛金花和杨立山的一个好友“卢玉舫”结拜兄弟，互换盟单，卢为大、赛为二，赛因此获“赛二爷”称号。不久，因“官厅禁止口袋底的曲班，内城不许立乐户”，金花班又回天津。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的中心是天津，赛金花又带着班子在兵荒马乱中跋涉到北京，想寻求权贵的庇护。但是，北京一片混乱，那拉氏和光绪皇帝仓皇逃离京城，满朝群臣也四散逃跑一空。没有几天，八国联军开进北京，烧杀淫掠无所不为。赛金花因懂一点德语，以及她职业的缘故，不时和德国军官往还周旋，她以一个中国女子的善良之心，在敌人面前为自己的同胞说了些好话，以此从侵略者的淫威中救了一些北京人的生命，保护了一些文物。“赛二爷”之名变成北京人的护符。

《辛丑条约》签订后，出逃的一批权贵又回到北京，赛金花的营业逐步扩大。就在生意兴旺的1903年，发生了金花班一个妓女服





毒自杀案，引起官场的大哄动。赛金花被捕入狱，经过多方运动，才得到罚款释放，出境回籍的判决。经过这场官司，赛金花几乎倾家荡产，和母亲一起回到苏州。这时弟弟已死，只有孀居的弟媳。在苏州住了些日子，她又带着母亲到上海。在小花园租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挂起“京都赛寓”的牌子，第二次在上海为妓。孙三到上海不久“患急痧，死于郑家木桥长发栈”。在上海营业期间，赛因“虐待婢女”受到济良所控告。被遣送回原籍徽州黟县。后经黟县四聚京货店老板程梦余向县衙疏通，才放她回上海。此时赛金花已厌倦了从前的生活，只想有一个归宿之处。

1908年（宣统三年），赛金花撤榜，与沪宁铁路上做事的曹瑞忠同居。这一年发生原会审公廨谳员孙耳山控告“曹赵氏借去值洋2,000元之珠花不还案”。曹赵氏是赛金花嫁曹后的代称。会审公廨提审赛金花，供称“丈夫曹凤岐与原告同事交好，所借珠花系质洋抵归某铁路亏款，请求宽限料理”。据程梦余说赛为曹“捐了个同知，曹被分派在徐州





一带铁路上任提调”。显然赛以珠花抵归铁路亏款就是捐款。会审公廨审判结果为“人洋并保，限半月清理。”赛金花与曹感情很好，“过了几年做人家生活”，但好梦难圆，曹又于1911年死去。

曹死后不久，赛金花第三次在上海立寓见客，1913年还包了一个妓女赛媛媛。这时出入妓院嫖客的成分有所改变，革命新贵政客替代了原来的官僚士绅，赛第三次立寓营业后交接的就是这批人。其中有一个金溪人魏斯灵，曾当过江西民政厅长，参议院议员，和赛交往密切，发生情爱。1918年两人在上海新旅社举行新式结婚，魏穿西装，赛穿洁白的结婚礼服，手捧鲜花。和魏结婚后，赛金花恢复真姓赵，名灵飞，和母亲随魏居住在北京。

1921年是赛金花一生的又一转折时期。这年正月，她的母亲病逝，终年78岁。自赛金花离开洪家后，母亲一直和她一起生活。她的母亲和蔼端庄，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对赛的影响较大。20多年中，赛金花走南闯北，波波折折，母亲始终没有离开过她。因





此，母亲的死是对她的一个重大打击。祸不单行的是，母亲死后半年，平时身体健壮的丈夫魏斯灵又死去。遭此两大打击，赛金花惊呆了几日，竟无一滴眼泪。

魏斯灵死，赛金花便遭到魏家族人的辱骂。魏的家族对赛向来瞧不起，“原因无非是和人人鄙视妓女一样”，赛不仅是个妓女，而且是个无人不知的妓女。因此魏的尸骨未寒，赛金花已受到无形的驱撵。人情淡薄到如此地步，魏的灵柩一入土，赛便毅然离开魏家。这时，赛金花已亲人全无，毫无牵挂，她不愿再睹冷酷的人生，便带了女仆顾妈搬到北京天桥附近下层劳动人民集中的居仁里，过起烧香拜佛的隐居生活，直到1936年12月3日在贫病交困中死去。

赛金花是一度名满京、津、沪的名妓，综观她的一生，少女时代便流落青楼，青春时代贵为公使夫人；少妇时代重堕青楼，中年时代在上海两次张榜立寓，二度择人而嫁；晚年时代隐居北京，直到在贫病潦倒中死去。她跌宕坎坷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国千千万万流落风尘的女子苦苦挣扎一生的缩影，只不





过她有一段荣耀的时间，而其他青楼女子则没有。

九、一个永远不会圆满的女人月牙儿

在老舍先生的艺术世界里，中篇小说《月牙儿》无疑是一件艺术精品。这是一曲凄婉的人生咏叹调，又是一篇哀怨优美的抒情散文。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散文诗般的语言，如泣如诉地叙说了—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旧北平贫苦市民阶层中的少女的坎坷命运。

这是由我们的女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妓女在监狱里，透过冰冷的铁窗，面对恒恒高悬于黑漆漆夜空中的月牙儿，向我们娓娓诉说的悲惨故事。小说中的她没有名字，我们就称她作月牙儿吧，用她的话来说，“我的心像———还是像那个月牙儿，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月牙儿既是她悲惨生活的见证，又是她苦难人生的象征。

7岁的月牙儿，父亲死了。唯一的依靠就是母亲了，“只要有妈妈这只热手拉着我就好。”可是等到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当尽；等到





靠妈妈日夜给人洗衣服也不能糊口的时候，她们的生路就绝断了。母亲无可奈何的办法便是改嫁。新爸爸果然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她不仅用不着去当当，而且还上了小学；妈妈也用不着再洗那熏人的旧衣臭袜了。可是新爸没几年又不知去向，妈妈再也没有办法维持她们的生计，只得沦为暗娼。“念书！念书！”不识书的妈妈有时极庄重地对她说。妈妈的苦心是牺牲自己而希望救出女儿。

当月牙儿长大后，她开始恨妈妈。而日渐人老珠黄的妈妈也不能伺候许多男人了，她要再走一步，去专门伺候一个男人，乘着还有人要的时候。要么由月牙儿来代替妈妈挣钱，这样她们母女继续生活在一起；要么就各自谋生。这就是曾含辛茹苦地喂养过她的妈妈给她的残酷选择。月牙儿选择了后者，她不愿意步入妈妈的路。在小学校长的热心帮助下，她成了学校里既不是学生（已毕业），也不是先生，像是仆人又不是仆人的角色，苟且维持着生计。但即使是这样的生计也随着校长的更换而断绝了。这时候，校长的侄子，一个有妇之夫欺骗并占有了她。伴





随短暂而虚幻的幸福出现的，是梦的破灭。望着那少妇可怜的样子，她离开了他。她不觉后悔，只觉空虚，像一片云那样无倚无靠，但她仍挣扎着不愿走妈妈的路。她应聘在一家小饭馆当女招待，但因不愿和不屑于同顾客调笑而终于丢掉了这好不容易才挣来的饭碗。这样，她越是挣扎，心里越是害怕。妈妈的归宿像一个黑影。月牙儿为了躲避它，却又更走近了它。

在又遇着那个小妇人之后，月牙儿最终决定象她妈妈一样步入青楼。小妇人告诉月牙儿，她丈夫又找了别人，而且一去不回头了。她从小妇人身上再一次看到了作为女人的可怜可悲，也看到了她唯一的资本，那就是比小妇人自由！小妇人尽管有饭吃，但却有公婆和父母的管束，她得从一而终，哪怕这个“一”早已不知去向。她还不能像月牙儿那样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肉体。对黑暗的恐惧往往随着黑暗的真正降临而消失，月牙儿失去了刚刚下水时的那种羞辱感，关闭了这根道德神经。相反凭借她的姿色与活力，一度得意地周旋在各色男人们中间。性病染





身的痛苦并不能成为她改变生活方式的契机，反而滋生了她对男人们的报复心理。她想到了死。在想到死的时候，又想起了她唯一的亲人。

妈妈终于在有一天找到了女儿。月牙儿从妈妈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归宿，“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几年来月牙儿苦苦挣扎的结果，竟宿命般地回到妈妈曾为她设计的生活里：由女儿卖身来维持母女们的生命！然而更不幸的是，社会就连这种可怜的生活方式也不予允许。因为当局者讲道德，要扫清暗门子，她们不比纳捐的名正言顺的妓女，她们是不道德的。于是月牙儿被抓到了感化院，她看透了这种说教的虚伪与不切实际，唾了一个来检阅的大官儿的一脸，于是又被投入监狱。

我们的善良、自尊、倔强的女主人公，终于敌不过那个黑暗社会，敌不过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经过一系列的挣扎、抵抗、奋斗和梦想，最后还是被迫走上了不幸的道路。





应该说最终导致月牙儿母女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是饥饿和寒冷。七岁的她就已体会饥寒孤单和泪水的酸苦了。“我晓得屋里的惨凄，因为大家说爸爸的病……可是我更感觉自己的悲惨，我冷，饿，没有卜理我。”当她为了挣脱可怖的命运而离别母亲时，“事后一想，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青春与肉体，人格与尊严，道德与伦理全都出卖了，为了求得生命的延续。”但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里，月牙儿的手段与目的已构成了必然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如此尖锐，以致于在她看来已成为自己的宿命。“我有时候似乎已看见我的死，接进一块钱，我仿佛死了一点。钱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扎适得其反。我看着自己死，等着自己死。”这种对命运的宿命感，直至最后月牙儿才有所醒悟，那是在不服“感化”，身陷囹圄之后。“狱中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丑恶的玩艺。自从我一进





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强不了许多。”这是月牙儿从她的半生经历中得到的一个认识，也是老舍先生所要暗示予读者的。这个大“监狱”不打碎、不改变，月牙儿们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脱。

对一个少女来说，为娼的确是一个悲剧。它也许是但不一定是一种堕落的表现。饥寒交迫是导致月牙儿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尽管在老舍先生的笔下，月牙儿（和她的母亲）都是为了生计，为了孝道和天职而被迫为娼，但青春的骚动，尤其是当青春期的觉醒不幸地发生在饥寒交迫、失却亲人抚爱的时候，为娼对于月牙儿来说便是那个社会中唯一的命运了。

女孩子的早熟使月牙儿过早地懂得了暗娼的含义，从而萌生了怨恨和羞辱之情。但尽管如此，尽管一直生活在困境之中，也并不妨害她作为一个女性的成长发育。“我知道得保护我自己，我觉出我身上好像有什么可贵的地方，我闻得出我已有一种什么味道，使我自己害羞，多感。我身上有了些力量，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毁了自己。我有时很





硬气，有时候很软……我身上有一点变化都使我害怕，使我欢喜，使我莫名其妙。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

初开的花朵总是美丽的，哪怕是娇弱的花朵。她至少可以给人一种美好希望的期待，期待着茁壮和结果，就像期待着上弦的月牙儿日趋圆满一样，尽管时代社会的昏暗，月牙儿的青春还是美丽的，甚至正是周际的混暗而更显其美丽纯洁。青春少女哪个不做绚丽的梦，即便是虚幻缥缈的梦，也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月牙儿在那个少年男子的怀抱里看到的月牙儿也一改凄切清冽而带着微笑了。春风沉醉、云开星月、柳拂蛙鸣、嫩蒲香飘，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世界的美好感受。然而，可悲的是连这唯一一次的感受也是虚幻的。那个有妇之夫的少年男子的和蔼温柔全是虚假，全是为了利用她的无知而畅快他自己。他的甜言蜜语使她走入梦里；醒过来，不过是一个梦，一丝空虚；得到的只是两顿饭，几件衣服。

月牙儿在和男人们的对垒周旋中，深切地认识了道德的虚伪、金钱的残酷、人性的





丑恶和社会的黑暗，时时有愤恨的揭露：

“学校里教给我的本事与道德都是笑话，都是吃饱了没事的玩艺。……我要活着。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些，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

“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在这个社会里，虚伪的伦理道德已腐朽为一个空架子，当初母亲为了扶养月牙儿而不得不卖身，而后月牙儿又为了赡养母亲而卖身，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不公平的极大嘲讽。爱情在这个社会里则还是一个迷人的神话，只是吃饱吃好了人的饭余茶后，而现实情状则是男女彼此织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地选择一个。没钱的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

“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





月牙儿的上市卖娼，既是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之余的报复，也是绝望之余的自暴自弃，又是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方式。

月牙儿终于被茫茫黑夜轻轻地吞没了。老舍先生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悉心体察，用他那娴熟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黑暗年代里一个美丽而年轻生命的挣扎、抗拒而终归毁灭的悲剧。不过，她对于生命的渴求，对于旧时代的控诉和揭露，又在我们的心目中升起了一勾永远的月牙儿，尽管孤单残损，尽管凄清惨切，却是那样的美丽圣洁，那样的撩人心绪，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十、在黎明前逝去的女人：陈白露

我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于1935年创作了《日出》，这是现代中国戏剧中最有力的一部，作品反映了反动统治下的中国某大都市三十年代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陈白露是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

陈白露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爱生活，因为生活中





有她所向往的欢乐和美好的东西；她厌恶生活，是因为她所向往的欢乐和美好却必须通过她厌恶的方式，即忍受最大的屈辱，把色相出卖给自己所鄙视的人，才可获取。作为一个当过红舞女的交际花，我们可以看到腐朽的生活方式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把夜生活作为她的全部生活内容。从这方面看，她是一个“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是，她确又厌倦和憎恨了那“发疯了的生活”，在她那美丽的嘴角上总挂着嘲讽和鄙视。她时而活泼可爱，举止果毅，时而忧郁伤感，高傲自负；既慷慨而富有同情心，又糊涂而厌世。她虽然陷入了“习惯的桎梏”，但仍然眷恋着青春，心中仍有不熄的诗情……她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表现真是搅得人眼花缭乱，但复杂的性格自有它的复杂的现实成因和形成过程。

陈白露过去的名字叫竹均，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从小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有一个少女的纯洁无瑕的心灵，她的洁癖就很能说明她当时纯真而清高的性





格。她聪明、爱美、骄傲、任性。她曾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在校时就显示了她的才能，当做过社交明星，还做过几个慈善机关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她的美貌、聪颖、才能都给了她以自信。不幸的是，她的父亲突然去逝了，家庭断绝了经济来源，这个挫折无疑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她于是“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的帮忙，走了就走了，走不了就死。”当了电影明星，还当了红舞女。正因为她单枪匹马闯荡人生的第一步获得了成功，因而更使她自负，也使她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因此在她的自负自傲的背后，有着她对自己的年青美丽的自我陶醉，有着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青、我喜欢我自己。”她太相信自己美貌和聪颖的力量了，这里正潜伏悲剧的危机。

尽管她在影坛和舞场曾风流一时，但并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幻想，她在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和意中的情人。诗人曾是陈白露的生活伴侣，他们的结合和分手是陈白露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事件。她的





确曾经热烈地爱过诗人，婚后也度过一段“新鲜”的生活。这位诗人“永远是那么乐观”，“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而这种对希望有热烈追求也曾一度感染过她，所以即使在几年以后，她还是把诗人的“日出”诗记在心里。但是他们终于分手了，诗人“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孩子死了，使维系他们婚姻的绳子断了是一个原因；但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爱情观念的分歧。

在陈白露看来，诗人是个最忠心的朋友，但又是一个最不体贴的情人。于是，她对婚后的生活觉得“渐渐不新鲜了”，“结婚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自然，平淡无聊和厌烦不是爱情破裂的原因而是结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对爱的过高奢望。是爱情幻想的破灭造成了他们的分离。陈白露追求爱情生活的行为本身是值得称道的，正像她当初只身离家一样，都是她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现。但是，爱情并不是抽象的，它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爱必须有所





附着”。在那个金钱统治一切的社会里，生活的道路是严峻的。她既没有同诗人去追求希望的道路，她自然以为凭她的聪明美丽还能“闯”出来。但摆在她前面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的确，等待着陈白露的正是一条堕落的道路。当我们看到她时，她已是“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了。以她的教育和性格来说，她本来是不愿走这条道路，但现实又逼迫她走上这条路。这就是造成她的复杂性格的现实基础。

方达生的到来给陈白露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方达生的指责：“这几年，你原来这么个地方！”使她有所震动，她开始感觉到自己生活方式的不对头，她的精神矛盾突出了，加剧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所以，面对过去的情人，陈白露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她的娇柔之态，她对霜、对春天的赞美，体现着竹均时代的稚气和纯真。但这种情态是一时的流露，是对往事回忆的短暂的沉醉。陈白露毕竟在这个生活环境里被缠上了“习惯的桎





桔”，方达生的一席单纯真挚而不乏空想的话语是远远不能说服她的。“哪儿有自由？”这句话饱含着她几年屈辱生活的感悟，却也传达出她对自己已被那腐朽生活紧紧拴住的自知和无奈。她因为要生活，因为“他们口袋里有几个钱”，不得不和自己厌恶的张乔治、潘月亭等厮混一处，事实上她早已摆脱不了对有钱生活方式的依赖。所以，当方达生执拗地要陈白露嫁给她，跟她离开这个鬼地方时，她回答说：“我问你养得活我吗？”“我要人养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你难道听不明白？”面对方达生的指责她又激烈地抗辩着，这段辩护，既饱含着她的辛酸和痛苦，也说明她对现有生活方式的依赖程度之深：

“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可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脑子骗过人，我没有变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





享的权利！”

这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女子对社会的痛切的控诉，但这种控诉同时包含了陈白露已被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所扭曲了的矛盾心态。明明是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人格，却说成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明明是遭受屈辱和蹂躏却被说成是“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看来倔强的言语实掩盖着痛苦的泪水，貌似自负实质软弱。所以她应该“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因为她有过沉重代价的付出。从而为她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合乎逻辑的辩护词。

和剧中的翠喜和小东西不同，陈白露并不单纯靠肉体的出卖来维持生活，她是影舞明星，是高级妓女，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她对这个社会、特别是对罪恶势力的反抗就没有小东西和翠喜来得坚决。翠喜的几段痛切的诉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而小东西的行为更是刚烈可敬。她敢于打最有钱有势的金八爷的耳光，为了不愿忍受屈辱蹂躏，她宁愿果断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陈白露尽管并没有勇气做到这一步，对于小东西的行为和遭遇还是寄予很大的同情，正因为小东西一记耳光给她也出了气，正因为小东西面临和自己同样的乃至更悲惨的遭遇，因而小东西才会得到陈白露的保护。这一举动对于陈白露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行为。为了救小东西，她第一次去求潘月亭——一个颇有财势的银行经理——帮忙，并第一次谢谢他。她还担着风险同金八的打手黑三展开了当面交锋。她为自己第一次做了这么一件痛快的事而兴奋，尽管其中也不排斥有寻找刺激（她事后连说“好玩”）的成分，但她毕竟更加意识到这是凭自己的努力伸张了正义。为此，愉快的心情又把她带到了对日出、对春天和青春的赞叹中，再一次显露了她的竹均心态。可惜她这一次的听者不是为之欣喜的方达生，而是她实质厌恶而又不得不利用的潘月亭！潘月亭的漠然和打搅，又把她带回到现实中来，






她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喊他“老爸爸”，这种看似娇纵亲昵而实质隐含嘲讽与谴责的方式，是即便对该剧大加赏识的外国朋友所不能领会的。

现实的屈辱境遇更加剧了精神矛盾。她失去了以往嘲讽的笑声，也消失了玩世不恭的态度，用酒浇着心头的苦痛，她内心充满忧伤，独自静坐落泪。她绝望了。那些“鬼”们在她这里吃喝玩乐使她苦闷到了极点。救小东西的行动的最终失败使她对那个社会彻底绝望了。尽管她和方达生都竭力奔走寻找，也终于没有找到小东西的影子。潘月亭更不可能有助于事，她深感到处都是金八的势力。“不是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允许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这件事的失败，也使她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群“鬼物”中的地位，他们原先恭维她，追求她，讨她的欢心完全是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根本没有把她当人看待，他们曾作的慷慨举动完全是同商品交换一般的盯着获取的付出。她的美貌曾使她自负，但现在连一点也





没有了，她深感自己不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她与宝和下处的女人们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同时，作为她生活上的经济依靠的潘月亭，在金融投机中被更大势力的金八所吞并，破产了；累累的债务也成了她一个不小的精神负担。她也没有料到平时向她大献殷勤，以自己的富有向她求婚的张乔治竟不肯借给她三千块钱；而且他要准备和门当户对的刘小姐结婚了；正像顾八奶奶也要和面首胡四结婚一样，这里都没有陈白露的位置。他们都要各自回家了，只有她还得住旅馆，她是这里的客人；他们留给她的只有伴娘的角色，她只不过是他们这些人的陪衬和点缀而已！她感到从来不曾有过的孤独和绝望，对社会的绝望和对自己的绝望。于是，她吟诵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诗句，怜惜着自己的青春和美丽，而在黎明到来之前离开了这个黑暗的世界。

这是一个悲剧的告别，它是陈白露不屈于物质享受的诱惑，决计离开这个腐朽荒唐的世界的勇气体现；又是她不能继续面对昏



暗的现实，没有再一次像以前那样冲出桎梏，奋力改变生活的缺乏勇气的表现。前者是值得称颂的，它表明一个曾经追求过自由的新女性的再一次觉醒。和潘月亭的破产，即大丰银行的被吞并而带来的食利阶层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等人的破产一起，预示了一个黑暗社会的灭亡。而后者则体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凭自己的青春、美丽和才干，脱离社会的解放去追求个性自由，脱离群体的斗争单枪匹马地闯荡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对于陈白露来说，黑暗势力毕竟太强大了。她虽然是一个弱者，但她毕竟有所奋斗，有所反抗，尽管奋斗的方式是局限的，反抗的最大行为——死——又是消极的。

陈白露的精神悲剧的意义，体现了那黑暗的金钱统治的社会是怎样在精神上逼迫她陷入极度的矛盾和痛苦，怎样毒蚀她那纯洁的心灵，最终导致她的自杀。根植于那个黑暗的社会制度的对精神的“吞噬之力”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杀人之力，总而言之，她的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的缩影。





十一、被物欲吞噬了灵魂的女人：阿英

《在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其主人公便是阿英。

在以妓女阿英为主人公的这篇不足五千字的短篇小说中，丁玲以她擅长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的剖析，为我们描摹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都市文明的物欲之流中堕落的心理流程。

20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大都市开始了现代文明。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这一资本社会自身的特征也给封闭的社会一系列猛烈的冲击。以前的道德天平倾斜了，大都市以它光怪陆离、令人眩目的奢华欲望和感官享乐引诱着无数年轻躁动着的心灵，这是一种与传统的小农经济、与面朝黄土背朝天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尽管新的世界充满着可怕的阴影，发散着金钱的铜臭，但它毕竟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

阿英便是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无知无识





的年轻姑娘，她已在庆云里的这间小房里做了三年妓女，虽然对自由美好的爱情生活仍然充满着梦想，但终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要了解阿英这个人物，首先应该读一读丁玲的另一部作品。《阿毛姑娘》，这是《在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的姊妹篇，小说中的阿毛可说是阿英的另一化身。丁玲怀着真挚的同情为我们展示了都市文明诱惑下的另一种悲剧。纯朴、天真的山区少女阿毛，十六岁远嫁到省城杭州城郊，开了许多眼界。有幸逛了一次城后，她更被城里太太们那妖娆的打扮、娉婷的步态搅的心烦意乱。阿毛长的并不差，她一心幻想着也过起城里人那样的享乐生活。她忍下性子，拚命做活，想让丈夫有一天发迹也把她打扮起来，摆脱捡柴、锄地的农妇命运。急迫时，她甚至想让一个男人把她抢走，去过她以为的那种幸福生活。当一切都成为渺茫时，当阿毛看到她所认为的最美貌最幸福的城里女郎也终于死去后，也没有信心活下去，最终自尽了。

一面是破产的农村，辛劳终生仍难以温饱；一面是当姨太太，侍奉男人便能标致尊





贵、锦衣玉食。对于那些盲目追求所谓幸福的年轻姑娘来说，等待她们的命运都不会太好，或者像阿毛那样追求不成而绝望，或者像阿英那样难以自拔而终于堕落。

娼妓制度做为都市文明中一种畸形的点缀，是体现金钱这个魔鬼最充分的场所，金钱可以使人出卖一切，也可以使人买到一切。寡廉鲜耻、低贱放荡都因有了金钱的交换而变得理直气壮、名正言顺。

阿英在肮脏、丑恶、不堪的环境中度过了三年。然而阿英内心并没有完全泯灭对于清新、健康的新生活的向往，也没有忘记她乡下的初恋的情人。

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阿英清早所做的梦。在梦中，她回到了乡下的家，她的情人陈老三待她比一切男人都好。阿英给了他许多钞票，有一部分是客人给的，有一部分是打花会赢的。两个人都极快乐，阿英让陈老三拿这钱赎她回去，“她要同他俩人安安静静地在家乡过一生”。

这梦是何其美好、何其动人呵！阿英甚至已在盘算自己暗暗积下的钱，并决定第二





天一早去请对门的老拆字人写个信去乡下问问，假使陈老三真的不嫌弃她，真的肯来娶她，她还会在钱上再帮他些忙。

在我们看来，妓女从良嫁人的条件在阿英都已具备了：一个相爱的人、一些够赎身的钱。但是且慢，阿英的梦想毕竟是幻想，是善良的天性在潜意识中的显现。先不必说“陈老三就不是个可以拿得出钱赎她的人”，就是七拼八凑的拿得出钱来，阿英此时也并不甘做种田人的老婆了，“纵是，他愿意拚了夜晚当白天的”拚命做活，“而那寂寞的长天和黑夜，她一人如何过？”

三年前那个在质朴封闭的农户中勤勉劳作着的农村姑娘了早已不是现在的阿英了，她掉进了一个热闹、虚荣的环境里，调笑、卖俏、打牌、赌博等灯红酒绿的熏陶下，要让她的心再回复往日的那种纯朴与宁静，真是太难了。作者就是这样，让阿英的心灵在体味了美好的梦想后又马上落入现实的泥潭，“她现在是怕过她从前曾有过，又曾渴望过的一个安分妇人的生活了。”

“老鸨虐妓”几乎是所有妓院里共有的现





象，但对于那些年轻貌美，能够吸引住男人的妓女，老鸨们自会采取笼络的手段。

“庆云里”的老鸨也是这样，她刁钻恶毒，极会算计，每天只给阿英们一顿饱饭，而且借口怕她们发胖从不给一口肉吃。在冰凉的街头，这些小妓女哪怕站到天亮，她也绝不给她们宵夜。但对于“做生意很贴力”的阿英，她却表现出“宽容”、“温和”和“怜惜”。阿英起床时，她爽爽快快地为她递上花旗袍，又亲亲热热地为阿英梳理长长的头发。缺乏真正的温暖与爱怜的阿英愚蠢地感动了，她认为“阿姆（鸨母）的爱她，超过了一个母亲爱她的女儿”。心下越发觉得想嫁陈老三的不该了。她被这贪婪却笑面的老鸨迷惑了，她一心想着为“阿姆”多多施展手段多骗嫖客一些钱，甚至极体恤地为“阿姆”着想：再拉客时，不要娘姨陪，还可为“阿姆”省下一个人的开销。

这便是丑恶的娼妓制度给人的毒害，身受着嫖客的凌辱，老鸨的欺诈和盘剥，却不知可耻和悲惨。尚存在阿英心中的那一点最后的梦想也彻底粉碎了：“为什么定要嫁人





呢？说吃饭穿衣，她并不愁什么，一定都由阿姆负担，说缺少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有趣……”

阿英的全部生活欲求不外是吃饭、穿衣、睡觉，要幻想干什么，那只能使人痛苦！沉醉在及时行乐中，在逢场作戏，打情骂俏、迎来关往、人尽可夫中寻找刺激，肉体早已堕落，而一直睁着一只眼伺机高扬的灵魂这时也疲倦了，既然幻想不成，那就让灵魂和肉体一起在这“消魂”的声色场中沉沦，在这无底的泥潭中打滚吧！

夜来了，阿英急于出去拉客。她懂得，一个妓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色相，施展自己的风姿去迷惑男人，来养活自己。她急于出卖自己了，“纵然已找不到能出五元一夜的，就三元或二元也成，免得白过一夜。”而且一想到每夜隔壁房中嫖客的响动时，内心更加烦躁：“总不能白听别人一整夜的戏。”

此时，赤裸裸的欲望霸占了阿英心灵的全部。站在深夜的街角处，她心里变得“很紧张很热烈的兴奋”，一边喝着一碗热稀饭，“一边不忘用两颗活泼的眸子盯打过路的行





人。”

从清早的梦想到夜晚的街头拉客，阿英的心在这一天中也走过了从追求到破灭的全过程。

作家就是这样出色地深入人物内心，把人物的感情和思绪的变化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通过内心独白表达出来，让我们也好像看到了阿英那一颗挣扎过的心。

贫穷逼良为娼，虚荣诱人为娼，身陷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们一面被当做嫖客的泄欲机器，鸨母的摇钱树，忍受着屈辱和压榨；一面又在这放浪的声色场中，身不由己越陷越深。阿英便是这样，她既没有花魁娘子的明智，也没有玛格丽特的坚贞，更不具备她们对自身命运的抗争。她像一片随波逐流的落花听凭命运的摆布，她的灵魂与肉体一起堕落，她将无法摆脱她悲剧的命运。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八章

民国时期
青楼女子的觉醒



风

化

图

史



8



一、辛亥革命后的青楼进化团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由此成立，为几千年来“伏于人者”的妇女获得男女平权扫除了第一道障碍。妇女运动的先驱林宗素、杨锡纶、秋瑾等人提出女子“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等6种权利，喊出了广大妇女几千年来压抑在心底的呼声。

1912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女子参政同盟会、中华女子竞进会、女子国民会、女子共和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妇女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为了解决历史造成的妇女文化水





平低、能力差的问题，各妇女组织还兴办了参政研究所、女子法政讲习所。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办起了女子法政学校，神州女学还发行《女子共和报》。这一切给予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以极大鼓舞，尤其是那些沉沦在苦海中的妓女们，她们迫切要求改变那种“千人骑、万人压、乱人欺”的非人生活，希望有朝一日能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民国政府的成立，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给青楼女子改变自己的地位带来了希望和勇气。

青楼进化团于 1912 年 5 月在上海成立。这一组织由 1897 年《游戏报》花榜状元祝如椿发起成立，共同发起人还有名妓柳如是、张曼君、翁梅倩、林黛玉、谢莺莺、林宝玉、万里红、花丽娟等人。进化团的宗旨可以从为办学校而演剧等款的小启中看出。演剧募金小启云：“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之窟，三生孽障，花残月缺之悲，薄幸青楼，沉沦黑海。共和国体，阶级蠲除，同人发起青楼进花团，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顾填海有心，补天无术，爰效现身之说法，冀得援手之多金，务乞文人学士，





闺阁名媛，惠然肯来，乐为赞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由此可见，“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的预备，为艺妓之模型”，这既是创立进化团的目的，也反映了妓女们要求跳出苦海，以艺谋生的迫切心情。

5月30日，进化团借五马路（今广东路）丹桂戏院包夜戏一天，由色艺双全的柳如是串演《梅龙镇》，然后由祝如椿、张曼君等9人登台歌唱。歌词是：姐姐妹妹大家来献技，为今日兮提倡青楼进化计，愿我姐妹努力进行休自弃，他日达到完美地，大家多欢喜。”

努力进行休自弃和演戏募捐筹款，充分表现了青楼女子的自强精神。这次演戏共筹得1,000余元，她们用这笔款租赁了校舍，聘定了教师，柳如是、张曼君为正副理事长，祝如椿为评议部长，决定招收学生50余人。各院妓女、雏妓、娘姨大姐争相报名，她们在自己办的学校里学文化，学礼仪。在提倡国货、抵制外国货的运动中，柳如是、张曼君亲自演说，青楼进化团中的成员和学校学生都不用舶来品，充分反映了她们的爱国心，遗憾的是，学校只办了半年多便解散了。原





因是当了学生的妓女为了生计，晚上还必须出局接客，每天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早上起来梳洗修饰，上学往往迟到。放学在下午4点左右，而妓院中此时已到接客时间，如果客人上门无人招待，便会影响营业，而遭鸨母责难。加上学校经费有限，教师薪金、教学用品、房租、水电等，开支既大，又无固定基金，创办人祝如椿迫于自身生计无着，而不得不远走津门，更无暇顾及学校了。进化团因而就此消亡了。

青楼进化团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然而反映了青楼女子对新的共和制度所寄予的极大希望。希望能在提倡民权、男女平权的新形势下，自己也能站起来做人。在民国政府当局不能拯救她们的情况下，企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筹经费，自办学校，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人格，以改变世俗对她们的偏见，争取早日跳出火坑，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她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青楼进化团的无形消亡，虽然有种种具体原因，但这是必然的。妇女的解放是和全





体民众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篡夺后，民国政府只剩下了一块空牌子，妇女运动失去了依附，随之失败。火坑里的妓女，要想自拔也是不可能的。

二、风尘弱女的爱国行动

袁世凯篡权，辛亥革命失败。但是，“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观念却深入人心。人们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卖国行径敢于起来反抗抵制。青楼女子也积极投入各项斗争。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竟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愤怒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袁抗日爱国运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各界人民组织了“反日同志会”、“排斥日货同盟”、“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等，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制日货，不忘国耻，抗日救国。





漂泊风尘的青楼女子积极响应，并纷纷以微薄的卖笑收入作救国储金，还寄函报社表明心迹。在几则寄函中说道：

“妾生不辰，侧身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须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闻诸客言，有某国家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志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

另一函说：

“妾不幸身为女子，且不坠入青楼，自叹身世之不遇，若国亡家破，再落强暴之手，此身之遭遇更不知伊于何底。”

还有一函说：

“氏等漂泊风尘，感伤身世，春花秋月，自怜神女之生涯。覆雨翻云，共愤强邻之见侮，安得蛾眉结阵，齐挥鲁阳之戈，倘真娘子成军，定试楼兰之剑。慨中原之多故，犹惭欢技而当筵，痛女子之无为，辄欲以歌而代哭。幸自沪上发起救国储金以来，时未3





旬，数逾30万。……今氏等认定救国储金洋300元。”

这些寄函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却是那些飘泊风尘、受尽人间欸压的青楼女子所特有的感情。她们捧出的是一颗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反侵略之心。

三、侠女助志士的佳话

袁世凯称帝时，社会上兴起流行奇闻佳话的潮流。妓女小凤仙挟走风流名将蔡松坡的故事，就是其中流传甚广的一则趣闻。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被搬上舞台银幕的《知音》，曾作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渲染。

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190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回国后相继在湖南、广西士官学堂和新军中任教任职，后来在国民党中煊赫一时的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等都是蔡教过的学生。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率军起义，被推选为云南军政府都督。袁世凯对享有声誉，又有军事实力的蔡锷极不





放心。便以明升暗降的伎俩，把蔡调到北京，委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昭威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等头衔，用“结之以恩”的办法把蔡锷拉进自己的圈子，试图把蔡困在京城。袁世凯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认清了袁的反动面目，虽有反袁意志，然而苦于无计离京。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和同僚涉足云吉班，结识了妓女小凤仙。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小凤仙传》说：“民国二年冬，蔡锷卸云南都督任，留居京邸，偶与友人狎游，过云吉班，独赏识小凤仙，凤仙亦伟视蔡，知非寻常浮薄子也。也是蔡每三日必一至，至辄以夜半。”

小凤仙是从上海北上的南妓。上海妓女自赛金花开南班北移之风后，北上京津的妓女增多。一些稍有名的住家妓女都往返京、津、沪、宁之间，流动做生意。到民国时期，伟人政客云集京、津，于是北上妓女就更多了。小凤仙原是杭州一个旗人姨太太生的女儿，那旗人死后，姨太太不容于大妇，竟被赶出家门。姨太太带着一个老妈子抚养孤女





过日子，过了几年她也死了，就把这个孤女托给老妈子。这个老妈子姓张，是小凤仙的奶妈。张妈在浙江巡抚曾子固家帮佣度日，浙江光复时，张妈带着小凤仙逃到上海，迫于生活把 12 岁的小凤仙押给姓胡的妓院老板，当时上海租界禁止 14 岁以下的幼妓，老板便带着她到南京去卖唱。1913 年张勋攻打南京，小凤仙跟胡老板逃回上海，后来流寓北京陕西巷云吉班。

小凤仙相貌也不算十分漂亮，但由于粗通文墨，喜缀歌词，又有一双辨别狎客才华的慧眼，因此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

蔡锷在和小凤仙相好期间，蔡唐（继尧）密使往还不绝，唐促蔡入滇，宣布独立。蔡苦于袁世凯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难以脱身。蔡锷到云吉班，袁世凯的儿子以及侦缉队员也借打茶围之名监视蔡。张妈害怕受连累，要小凤仙冷淡蔡。小凤仙深知蔡锷隐私，便“时为赞助筹画”，和蔡共设脱身之计。一天乘妓院班主生日，云吉班来往人多，蔡锷也到小凤仙房中摆酒捧场，不请外客。吃酒时，蔡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可以看到外边动静。






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怀表放在桌面上。窗上撤去纱帘，换上纸卷帘，并故意卷上去，好让外边人看得更加清楚。蔡锷在开往天津的列车将开行时，站起身往外跑，假装小解，趁院中乱轰轰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候着。蔡上车后，曹福才把一张票塞到他手里。离开北京，到天津，经日本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任总司令，反对洪宪帝制。

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喉病死于日本，遗体运回国内，举行国葬。在北京举行追悼会时，小凤仙曾亲临祭奠，并送挽联。小凤仙后来辗转到东北，解放后，改名张洗非，嫁给一工人。

此外，南社1919年刻印的南社社员傅熊湘写的《红薇感旧记题咏集》，记述二次革命时，风尘弱女黄玉娇在白色恐怖中毅然收容、掩护傅熊湘的一段佳话，也不亚于小凤仙侠义助蔡锷的情怀。

傅熊湘字钝安，号屯艮，又号红薇馆主，湖南醴陵人。辛亥革命前，傅在上海办《竞业日报》，和秋瑾的《中国女报》同为宣传革





命的喉舌。傅还是湖南革命人士荟萃的长沙明德家堂的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傅在湖南主办《长沙日报》，不遗余力地攻击袁世凯的反动行径，因此而成为袁党的眼中钉。191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后，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湖南也宣告独立，但很快的失败而告终。袁世凯派刽子手汤芑铭做了湖南都督，在全省推行血腥屠杀政策。傅熊湘也成为搜捕的重要对象之一。在屠杀恐怖笼罩长沙的情况下，傅微服逃归醴陵，同行者还有南社成员黄钧、龚尔位。醴陵城内也侦骑密布，空气十分紧张。傅虽因到故乡，却无人敢收留，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只好通过旧友刘镜心的关系，冒昧去访刘熟识的妓女黄玉娇。

黄玉娇，字少君，所寓称玲珑馆。这时，黄已脱籍家居，闭门谢客。但见到傅等不速之客狼狈来投，不但不报以白眼，反而独具侠胆，毅然收留，使傅等逃脱了侦骑的耳目，免遭杀身之祸。傅事后记道：

“于时，秦焰尤张，楚氛甚恶。清湘百里，动成赤流；芳兰九畹，并伤黄落。生人



骨肉，痛枕藉于砧斧；大好头颅，对欹歔于明镜。飞章朝播，志士魂惊；警电夕传，壮夫胆碎。望门乃投张俭，临流谁期子胥。静言思之，慨其吧矣！则有倾城艳质，施弱腕以挟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薰沐。斫断枇杷之树，门闭车迷；歌残杨柳之枝，混沾絮定。春风鬓影，茂陵何恤无家；细雨檐花，杜老于焉有咏。”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傅重新主持《长沙日报》，和黄玉娇时有往还。1917年玉娇嫁人，傅整理两人往还中所作诗篇集成《红薇感旧记》。

南社负责人柳亚子看到《红薇感旧记》后，甚钦佩，赋《玉娇曲》长诗一首，并代傅广为征集题词，知名人士都为之题咏。1919年柳亚子为《红薇感旧记题咏集》作序刊印，使风尘弱女黄玉娇敢冒砍头风险，掩护革命志士的故事广为流传，闻其事者，均感动于玉娇的侠义之举。

无论是小凤仙帮助蔡锷离京，还是黄玉娇掩护傅熊湘，都不是一般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风流韵事，而是反映了在辛亥革命天





折，北洋军阀横行，时局动荡，中国历史出现曲折时期人心的向背，那些青楼弱女的侠义举动，正是代表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民的反抗情绪。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九章

近代的狭邪小说



风

化

图

史



9



一、狭邪小说的产生

狭邪小说，在近代初期是言情小说的变异。狭邪，原指狭窄弯曲的小巷，因旧时妓女多住在这种地方，后来遂以狭邪借指妓院或妓女。狭邪小说，特指清咸丰以来专以优伶妓女为描写题材的长篇小说。

以妓女作为小说的描写对象，由来已久。鲁迅说：“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伙。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



书类中。”^① 鲁迅所举，还只是杂记琐闻之类。以妓女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也始于唐代。唐代有《李娃传》《霍小玉传》；宋代有《李师师外传》；明代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至清咸丰年间，出现了大量描写妓女生活的长篇小说，如《青楼梦》《花月痕》等。被鲁迅名为狭邪小说。

狭邪小说中另有一类，是描写文人士夫狎优的作品，如《品花宝鉴》。这类小说之所以也称狭邪小说，是因为古代狎优与狎妓是同一性质之事。今天的人看来，和演员搞同性恋，比起狎妓来还要丑恶；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狎优较之狎妓更风雅一些。清光绪年间的何德刚《春明梦录》（下）载：“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麀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主，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

^①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5页。



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则从违不必一致也。”^①

狭邪小说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士人生活的放诞不羁。清初的统治者，大都比较注重发展生产。至乾隆、嘉庆年间，城市经济繁荣，士人的生活也开始奢靡腐化。曾经被禁止的狎优嫖妓之风重又兴盛起来。尤其是都市里，歌楼妓馆林立，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娼，都公然挂牌招客。据《清稗类钞》记载：“沪自嘉、道间名流踵至，提倡风雅，领袖章台者，如王月仙、褚云孙，固一时之秀也。其时朱其、陈某以财雄；丁某、王某以侠著；闽粤大贾固皆拥有巨资，不惜千金为此中生色也。道咸之交，妓院皆在城中。虹桥左侧，鳞次以居；妍媸毕具，门户各分。以产于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淮扬、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饰貌，争妍取怜，所著衣

^①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



服，竞尚新裁……”^①应该说，这是狭邪小说产生的现实基础。


近代狭邪小说的产生，和《红楼梦》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吴趼人曾说：“世人每每看了《红楼梦》，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那么多蘅芜君和潇湘妃子，他却把秦楼楚馆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宝钗。拿着宝玉的情，对她们施展起来。”^②（《恨海》第八回）鲁迅也认为，狭邪小说围绕着《红楼梦》做文章的，“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娼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③

狭邪小说的产生，还和当时社会上理学盛行有关。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过，近代社会理对情的压制，不仅没有松弛，反而更为严酷。最让人愤慨的是，男女之间的正当爱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对于文人士夫的放荡淫邪，却颇为宽容。文人士夫宠爱名妓，

① 《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61页。

② 《吴趼人小说四种》（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③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34页。



被视为名士风流，此类故事，不胜枚举。总之，按照封建礼教，男子可以到妓院宣泄情欲，但不能和良家女子恋爱；而为了满足男人们的这种要求，妓女们也就不可能遵循“授受不亲”、“从一而终”之类的礼俗。妓院既是淫乱的地方，同时又是封建礼教至为淡薄的地方。近代，理学的压制使得言情小说不能畅所欲言地描写男女之情，小说家们便将这种情转入妓院。

近代的狭邪小说自身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早期的狭邪小说，属于言情小说的范畴，对妓女的描写多所溢美。后来，狭邪小说渐渐由言情小说向社会小说演变，《海上花列传》对妓女的描写渐趋于写实，是狭邪小说中最好的作品。到了民国初年的《海上繁华梦》《九尾龟》之类，对妓女的描写多所溢恶。《九尾龟》更是成为嫖妓的“教科书”。

二、狭邪小说向社会小说的演变

近代的狭邪小说自身，有一个演变过程。即鲁迅所说：“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



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①

妓院，是一种丑恶的、畸形的存在物。我国一贯自诩为“礼仪之邦”。一方面，封建禁欲主义残酷地摧残着人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放荡、最淫邪，毫无理性束缚的场所——妓院。礼义之邦的这个最无礼义的地方，自然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但文人士夫出入这种场所，又不失为风流韵事，连有的风流皇帝也有嫖妓的嗜好。在妓女的身上，也有双重的人格。一方面，她们的身份规定了她们必需以色相换取金钱，这使她们极易染上虚伪、欺诈，唯利是图，口蜜腹剑的恶习。尽管妓女的地位至为可怜，也尽管她们的沦落是社会造成的，不能归罪于她们自身；但从主体上看，她们性格的主色调是恶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礼教加不到这些妓女身上，“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都不适用于她们；相反，她们要充分展示其女性美，展示自己的才华，并用柔情蜜意取悦于男子，否则便无法生存。因此，她

^①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8页。





们的才情、个性都能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独立人格，女性特征，也都比当时的良家女子鲜明得多。妓院里没有封建礼教所要求的那种泥塑木雕的美人，反倒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人物，如关盼盼，薛涛，梁红玉，李师师，马湘兰等。她们有的才貌双绝，有的识见惊人。总之，妓女中的那些佼佼者，远比当时的良家妇女更具魅力。

近代早期的狭邪小说，属于言情小说的范畴。《花月痕》、《青楼梦》等作品，把妓女视为佳人，主要写妓女和才子的恋情。后来，狭邪小说渐渐向社会小说演变，《梅兰佳话》和《绘芳录》，尽管对妓女的描写仍是溢美的，但已将狭邪故事纳入世情的描写中，显示了狭邪小说向社会小说演变的端倪。《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则比较真实地展示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的侧面——妓女的生涯。民国初年的《九尾龟》《留东外史》，则又对妓女多所溢恶，大都写“嫖界英雄”降伏妓女的故事，成为嫖妓的“教科书”。

狭邪小说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在于描写客体的变化，即





妓女们越来越坏。实际上，这主要是时代的变迁和描写主体的变化。唐代描写妓女的小说，多出于文人之手，嫖妓的又多是那些登科士子。作为他们的陪衬，妓女也就不能是俗恶之人。故唐传奇中的妓女多是美丽深情，处污泥而不染的佳人。宋元的话本小说，取材又大都着眼于奇。一般的妓女，普通的青楼遭际，很难进入小说的创作领域。所以，宋元话本所写的是妓女中的特殊人物。近代初期的狭邪小说，反映的是落拓文人的人生理想，是他们对功名与爱情的追求；加上要发挥《红楼梦》的余意，所以也把妓女想象成佳人。而《风月梦》《海上花列传》是文人写自己久处秦楼楚馆的真正的生活体验，所以这两部作品对妓院生活的描写比较真实。而《九尾龟》等作品属于广义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者描写狭邪故事，完全是从那些情趣鄙俗的市民的视角写的：秦楼楚馆不再是情场，完全是金钱与肉体交易的场所；小说中也没有了才子佳人的绵绵情义，只有妓女、嫖客的互相欺诈。

另外，都市文化的熏陶，唯物主义、实





证主义思想的传入，也使近代小说从总体上有一种朝着写实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也是狭邪小说从理想走向现实的重要原因。

三、真实地再现妓院生活的《风月梦》

据现在所知，最早打破对妓女的溢美，比较真实地反映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是《风月梦》。

《风月梦》，三十二回，清邗上蒙人作。作者的姓名、身世不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后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中。

《风月梦》是以过来人作现身说法的方式，写嫖妓的害处的。在这部小说里，妓院不再是情场，而是引诱年青子弟堕落的罪恶场所。邗上蒙人在这部小说的自序中说：“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限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





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第一回，又一次讲嫖妓的危害：“青年子弟若能结交良朋佳友，可以彼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结，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业的朋友，勾嫖骗赌，……必致成为下流。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非轻。”小说的主旨，就是通过一个姓过名来仁（过来人）的老汉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专讲嫖妓的坏处。

小说的正文，写了一帮不肯务正的子弟袁猷、贾铭、陆书、魏壁、吴珍在扬州与妓女的恋爱瓜葛。陆书是带了大笔钱财来扬州买妾的，被朋友引到妓院。迷上了妓女月香。陆书有钱的时候，月香与他百般恩爱；当他把钱全都化在了月香身上后，月香把他逐出门外。陆书回到家中，既受父母斥责；又染上恶疾，不知存亡。吴珍与妓女桂林相恋，得罪了常在妓院鬼混的无赖，无赖告发他吸食鸦片，被捕流放他乡。贾铭与妓女凤林情深意长，在凤林危难之时多次帮助她。贾铭





有病时，凤林也曾衣不解带的侍奉。但当她被一个有钱有势的人看上后，尽管她也知道这个有钱的人靠不住，还是高高兴兴地随阔人而去，对贾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留恋。巧云对魏壁恩爱缠绵，骗了他的钱以后卷逃而去。只有双林对袁猷是真情相待，作了袁猷的妾。袁猷死时，双林殉情。但由于双林的介入，使得袁猷与发妻绝情。总之，小说描写的内容与以前的狭邪小说截然不同：男主角已不再是风流才子，他们或原本就是寻欢作乐，不肯上进的人；或是少不更事，被一些朋友引诱坏的人。妓女绝大多数是靠色相和虚情假意骗人钱财的，妓院是个陷阱，一旦陷入，便难以自拔。应该说，《风月梦》对妓院生活的描写已经比较接近于写实了。

在艺术风格上，《风月梦》开始把描写才子佳人的绮思丽想引向市井风尘。作品的内容不再那样高雅，那样理想化，比较贴近现实。比如：小说中的妓女不像《花月痕》中写的那样一个个美如仙子，她们大都是一些寻常的人。“捆帐伙计”秀红，“人品不疤不麻，不足四寸一双小脚。”妓女凤林是“圆圆





的脸，两道弯弯的眉，一对双箍子眼睛，脸上有几个浅白细麻子，讨喜不生厌。”巧云则是“鹅蛋脸，细眉，圆眼，焦牙齿。”他们也不像以前小说里写的妓女那样能诗会画，博学多才；大都只会唱几只淫词艳曲，以讨得那些文化品位不高的嫖客的欢心。小说对于她们的描写，既无溢美，亦无溢恶，只是客观地描写她们所处的地位，和她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第二十五回写贾铭劝凤林戒掉大烟：“贾铭道：‘你坐在家里，不晓得外面的事。现在扬城鸦片烟，被各衙门差人以及委员不知捉了多少人去，打的打，枷的枷，收禁问罪的问罪，四处搜拿。我是亏了一个朋友送了我戒烟方子，我赶着就合了一料膏子，吃了下去，就如同吃了烟一样，并不觉得哪里难过，如今可以不吃烟了。我代你焦愁，设若被人捉了去，如何最好？我为此事放心不下。我若叫你戒烟，我看你以烟为命友，是断不肯戒的。’凤林道：‘你既能戒，怎么我就不能戒的？’贾铭道：‘我看你这个瘾难戒。’凤林道：‘凡事只要狠气。我同你拍个手掌，看我能戒不能戒。’贾铭道：‘你若将





烟戒了，我杀只鸡把你吃。’凤林道：‘你不必说顽话，你合了膏子来，我吃就是了。’贾铭……也不知用了多少炭，费了多少功夫，方才煎熬成膏，用盖钵盛好，凡是贾铭在这里的时候，凤林总是吃的膏子，贾铭若不在这里，凤林偷偷藏藏仍是吃烟。”这一段话尽管写凤林欺骗恩客，却没有以夸张的手法把她写得毒如蛇蝎，她是个沾染了一些恶习的人。她嗜烟如命，戒起来自然十分艰难；但为了讨得贾铭的欢心，也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做出戒烟的样子，以欺骗贾铭。她的一番假话竟然说得那样认真，圆熟、自然。假如我们不看最后那句话，很难看出这是一种欺骗。

此外，和以前的狭邪小说相比，《风月梦》的文化意识明显增强。作者不再满足于讲述故事，开始比较注重反映世风时尚、风土人情。作品以生动的笔触，比较真实地展示了封建社会里城市生活的一侧面——烟馆妓院的生活情景。单是妓流就有清、浑堂子、捆帐（即花钱包占暗妓）、放鹰（以妻女为诱饵诈骗）等名目。作品还写了鸨儿压迫妓女，





妓女坑害嫖客，地痞流氓勾结衙门里的差役到妓院寻衅闹事——打茶围、传签、打知单。还有当时州府官吏流于形式的禁烟、禁娼。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小说对人的服饰的描写过于详细、冗长，对于人物刻画来说，有喧宾夺主的感觉。但假如研究近代人的服饰，也可提供一定的借鉴。

四、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是狭邪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小说，也是整个近代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1856～1894），原名三庆，又改名奇，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著《海上花列传》时曾署名江陵渔隐，云间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韩宗文，是咸丰年间的举人，官刑部主事，韩邦庆自幼随父亲居住北京，他自幼非常聪慧，读书别有神悟，文笔微妙清灵，然善为游戏之文。据说他考秀才时，就写了一篇游





戏文：《不可以作巫医》，试官欣赏其才，又觉得文章不中程式，犹豫再三，还是取为一等。不过，此后则屡试不第。后来，韩邦庆旅居上海，与《申报》编辑钱忻伯、何桂笙友善，常为《申报》撰稿，并一度主编由《申报》代售的刊物——《海上奇书》。后应父执之招，到河南的官府做过几年幕僚。1891年秋再次入都应举，仍落第而归。后仍寓居上海。

韩邦庆的性格、经历也比较特别。他风流倜傥，不仅能诗，能游戏文，在琴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上海期间，常和那些名士诗酒唱和，且年纪轻轻就染上了阿芙蓉癖。他又爱出入于青楼，“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①也许正是因为他生活的不检点影响了他的健康。1894年《海上花列传》出版不久，他即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韩邦庆的性格、经历都不足为训。和近代那些有志救亡图存的作家相比，高下更相

^① 《谭瀛室随笔》，孔另镜《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235页。





悬殊。然而，这种生活经历却使他对洋场、妓院的生活都有深切的了解：“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① 这为他创作《海上花列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在创作狭邪小说时，既能跳出“别辟情场于北里”，“改求佳人于娼优”的套数；又不堕《九尾龟》等作品赤裸裸地描写金钱肉体交易的恶趣。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近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海上花列传》，一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海上百花趣乐演义》等。全书共六十四回。最初连续刊载于光绪壬辰（1892年）二月创刊的《海上奇书》上。后来集结成书，共有二十多种版本。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光绪甲午（1894）石印本，而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开始出版这本书，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海上花列传》共出版十二种之多。著名现代小说家张爱玲对这部小说非常欣赏，把这部小说译成英文本；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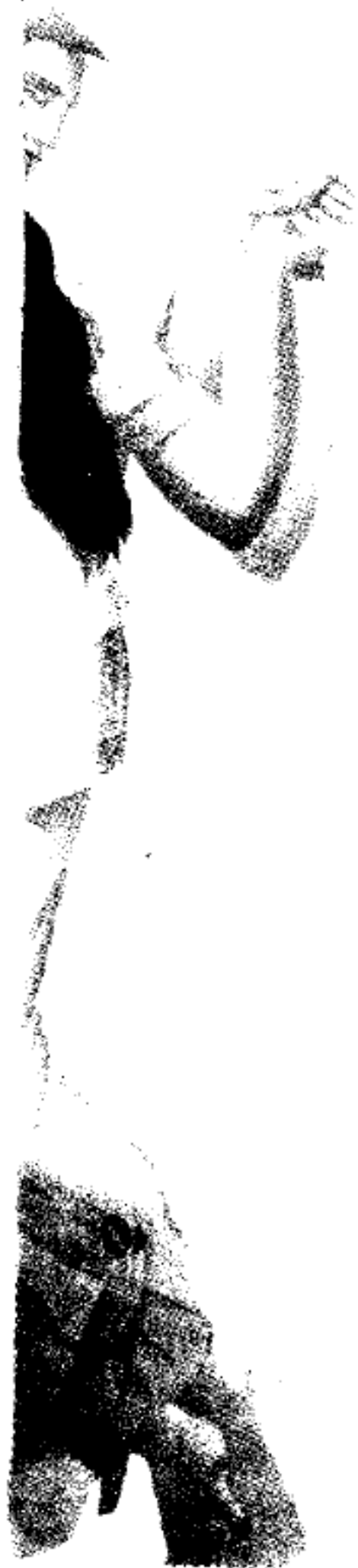
^① 《谭瀛室随笔》，孔另镜《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235页。



用普通白话改写了这部小说，以便那些不懂吴语的人阅读。即此，也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海上花列传》的创作主旨是什么？表面上看，这部小说为劝诫而作。作者自称是“以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专讲嫖妓的坏处。他把妓院比作漂浮在海面的花丛，“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倘若人们只见花，不见水，一脚踏了进去，便会葬身于无底深渊。（第一回）小说写乡下青年赵朴斋，到上海谋生，为人引诱，出入于歌楼妓院不能自拔。后来，资财耗尽，流落街头。他的母亲、妹妹来上海找他，没有把他劝醒，妹妹二宝也经不住上海繁华生活的引诱，甘愿沦为娼妓。二宝先为苏州的贵公子史天然所骗，债台高筑；又因疏于应酬，被上海的恶棍癞头鼋连人带物打得落花流水。作品正是以赵朴斋一家为例，告诫人们不要出入歌楼妓馆的。

然而，细读此书，又会发现，赵朴斋并不是书中的主角，他甚至也算不上真正的嫖客，是个只叫了一两次局就去拉洋车的小角





色。小说主要写的是沈小红、张惠贞与王莲生；黄翠凤与罗子富、钱子刚、李淑芳、李浣芳与陶玉甫；周双玉与朱淑人；赵二宝与史天然之间的种种纠葛。而且，书中的嫖客大都来历不明；而妓女的身世、经历、结局却“无一丝挂漏”。显然，这部小说“专叙妓家，不及他事”。（《例言》）书名《海上花列传》，也说明作者要为上海的青楼女子作传。

作者对这些青楼女子到底持什么态度？我们再看看第一回中对漂浮在海面上的花丛的具体描写：

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蟋蟀、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天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这显然是说，漂浮在海面的花丛固然是陷阱，但花自身却是无辜的。它只不过是





“没有根蒂”，“随波逐流”，而且自身还要受到种种蹂躏和摧残。桃、李、牡丹这些俗艳，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还可以适应；而高洁的兰、梅、菊、莲，则经不起这种折辱，难免要香消玉陨。由此可知，小说的主旨，在于表现社会对下层妇女的摧残，对妓女的同情多于谴责。尽管小说中的妓女有善，有恶；有英敏，有凡庸；有泼悍，有柔顺；作者对待她们的态度也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小说是在描写一种特殊的人生，表现了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悲悯之情。

《海上花列传》既然是为青楼女子立传，作者的审美观照主要就集中在妓女的身上。比较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妓女的生涯，夸张地写她们美如仙女或恶如夜叉；而是把她们放到上海妓院这个特定环境中，真实地表现她们的身世、命运，被扭曲的性格、感情，及她们的生活追求。

《海上花列传》真实地展示了 19 世纪末上海的繁华景象：令人眼花缭乱、眩目惊心的洋行；林立的酒楼、烟馆；游人如织的明圆；喧闹的抛球场、剧院；屡禁不绝的赌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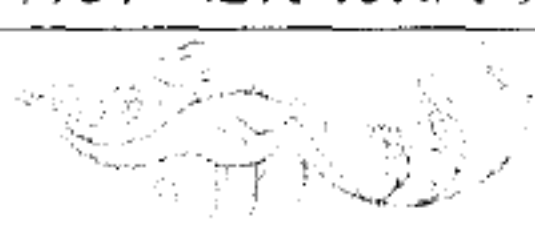




能使全城夜如白昼的自来火；乃至英租界、法租界。而众多的妓院，也是这个繁华场地的一个景观。这里，一方面是那些官僚、买办、商贾、赌棍们的乐园；另一方面，又是妓女、娘姨、杂佣们的地狱。

十里洋场的嫖客，大都不是以往的狭邪小说中所写的志诚多情的才子，而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精神空虚，品格低下，嫖妓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罗子富是江苏候补知县，久居上海，无所事事，终日泡在妓院里厮混。在妓女面前打情骂俏，撒娇佯哭，出尽了洋相。王莲生是某局的职员，上海的阔佬。终日只干两件事：嫖妓和吃大烟。他花钱阔绰，又没主见。负担了名妓沈小红的全部开销，又嫖上了次等的妓女张蕙贞，终日在两个妓女争风吃醋的风波中度日。令众妓女闻之皆丧魂失魄、花容惨淡的，是外号“癞头鼋”的赖八公子。他性格异常怪戾、粗暴，进妓院必定带一大群打手。稍不如意，不仅对妓女本人拳打脚踢，还要将房间里的一切物件尽行毁坏，“如有一物不破损者，就要将手下人笞责不贷。”（六十四回）妓女们





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他，一但被他碰上，乖觉的对她虚与应酬，稳住他以后再伺机逃走；死板一点的则连人带物，被他打个落花流水。他的来头很大，“勦说啥县里、道里，连搭仔外国人见仔个癞头鼋也怕个末”。（同上）号称“风流大教主”的齐韵叟，是以护花使者的面目出现的。他的势力可与癞头鼋抗衡，所以妓女姚文君、孙素兰遇到癞头鼋的纠缠时，都设法逃进了他的“一笠园”中。苏冠香原是宁波大户人家的妾，因大妻不容，沦落为妓，夫家又因她败坏门风而将她关进衙门，也是他把她救了出来。然而，他这样做也不是出于怜玉惜香，而是为满足自己的性欲。苏冠香被救出后就长期供他玩弄；姚文君、孙素兰也成为他一“笠园”中的小摆设。他还召集了一群妓女清客，在“一笠园”搞“群芳谱”，撰写“秽史”，淫乐无忌。其他如背盟弃信、负义辜恩的史天然、朱淑人；喜新厌旧的施端生；胆小自私的华铁眉等，都是对妓女“披猖折辱，狼藉蹂躏”的人。这些社会渣滓是娼妓制度存在的基础。这样的环境中，妓女们即使真的是情真意切的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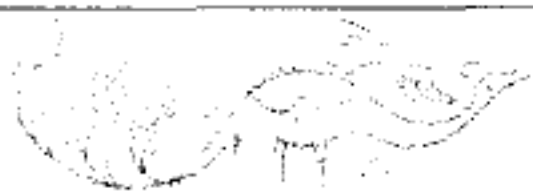
人，也无处用其情。

秦楼楚馆，也不像才子们所描绘的那样富有诗意，而是人间地狱。妓女们无论是好是坏，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进入妓院，并不是她们自身的过错，而是社会将她们推入火坑。黄翠凤八岁上死了爹娘，无依无靠，落入老鸨黄二姐之手。沈小红父母兄弟好几口人，生活全无着落，靠她出卖色相维持生计。孙素兰父母死后，先是阿伯要将她以一百洋钱的身价卖给人做丫头，她知道后向舅舅求救。舅舅倒是从阿伯手中救出了她，却又以五百洋钱的身价将她卖入妓院。齐韵叟府上的两个艺伎琪馆和瑶官，都从小没有爹娘，分别被兄嫂、后娘卖到齐府。赵二宝是个例外，她涉世不深而不虚荣，留恋繁华的都市，这是她沦落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她沦为妓女的另一原因是贫穷，家中所有积蓄都被哥哥挥霍尽，到上海后，连回家的盘费也无着落。总之，女子沦落为妓大都是为生活所迫，妓院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等级制度、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别。





小说还清楚地揭示出，妓院是一个特殊的天地。对于外界来说，妓女们的身份都是低贱的。但是在这个天地里，同样也是等级分明。书寓和长三是上等妓女；么二的地位等而下之；再往下依次是野鸡、花烟间。书中写黄翠凤、沈小红等长三，住的是豪华的公寓，有大姐、娘姨侍奉，所接的客人也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体面人物。沈小红一年下来要耗费王莲生二三千洋钱，王莲生一次高兴，给她买了一副齐全的翡翠首饰，就花了一千洋钱。花烟间的王阿二，只能接小村、赵朴斋这样的小角色，自然进项不丰。而女佣阿巧，白天黑夜地干活，挨打受气不说，一个月只有一块洋钱，可见悬殊之大。妓女身份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吃穿用度上，还表现在他们在妓院的地位上。上等妓女不仅不受鸨儿的气，还可以随意打骂下等妓女，下等的妓女只能逆来顺受。这样一来，就迫使妓女们不择手段巴结有钱有势的嫖客，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张蕙贞原来是“么二住家”，住的是“黑魃魃的弄堂”，家中“空落落的没有一些东西”。笼络住了阔佬王莲生后，马上“调



头”，由幺二升为长三。住上了豪华的公寓，雇用了外场、大姐、娘姨。相反，沈小红嫖戏子的事情败露后，门庭冷落，只得搬进小房子，大姐、姨娘也另谋生路。总之，妓女们想要生活得好一点，就要有笼络引诱嫖客的手段，就要当长三。黄翠凤就说过：“做个馆人，总归自家有点算计，故末好挣口气。”（四十八回）把倚门卖俏，利己损人称为“挣气”，在平常人看来颇为荒谬，对妓女来说，却又合乎情理。

至于鸨儿对妓女非人的摧残，《海上花列传》也揭示得非常深刻。鸨儿是妓院里的统治者，靠逼着妓女出卖肉体谋得钱财，这就注定她们性格的贪婪残酷。确如黄翠凤所说：“上海把势里陆里个老鸨是好人，俚要是好人，陆里会吃把势饭。”（四十九回）对于那些挣大钱的名妓，她们百依百顺，“还要三不时去拍拍俚马屁末好。”而对于那些挣不来钱或挣钱不多的妓女，她们就肆虐百端。周兰的讨人双玉与双宝俩人不合，周兰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生意不好的双宝，以讨红馆人双玉的喜欢。诸三姐的讨人诸金花，不会





巴结客人，被她打得“两只腿膀，一条青，一条紫，尽是皮鞭痕迹。并有一点一点鲜红血印，参差错落，似满天星斗一般，此系用烟签烧红戳伤的。”（三十七回）然而，黄翠凤说，诸三姐还算是好的，她的无姆黄二姐还要厉害。诸十全是诸三姐的亲生女儿，因被逼卖淫而患上了梅毒。做母亲的不仅没有悔恨怜惜之意，还要隐瞒病情，逼着她继续卖淫。总之，鸨儿的摧残威逼，嫖客的蹂躏玩弄，构成了妓女的特殊的生活环境，也扭曲了妓女们的感情与性格，《海上花列传》对妓院生活的描写，真实地揭示了近代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认识价值。

如果说，《红楼梦》是为闺阁女子立传，描写大观园里的女孩子的人生悲剧的话；那末，《海上花列传》则是为青楼女子立传，描写妓女的人生悲剧。《海上花列传》的一个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大量个性鲜明的妓女形象。作品以平淡自然的笔调，结合她们所处的特定环境，描写了她们悲惨的身世，被扭曲的感情、性格，以及她们的人生追求。为





了不破坏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我们不分门别类地分析其人物塑造所用的具体方法，只围绕着这些妓女的人生历程、理想追求，来剖析人物形象的个性特色。

《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形象，主要是围绕着她们在妓院中拉拢嫖客、谋求生存而写的。黄翠凤是作者着力最多的一个 人物形象。她精明、干练，心狠手辣。她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和她所处的环境有关。黄翠凤比一般的妓女更为不幸：当时上海的老鸨中，“七姊妹”的凶狠残忍是出了名的，而黄二姐又是其中最狠毒的一个。翠凤八岁死了爹娘，偏偏落入黄二姐的手中，所受的打骂折辱是可想而知的。但她生性刚烈，有一次老鸨打骂她，她先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响；等老鸨被劝开后，她却趁机吞了鸦片。老鸨吓得请医抓药，连哄带劝，她硬是不肯吃药。直到老鸨对她下跪磕头，百般央告，她才吃了药。从此，老鸨不敢再打骂她。这在当时被当作奇迹传扬：“翠凤个老鸨，从娘姨出身，做到老鸨，该过七八个讨人，也算得是夷场浪一挡角色呢。就碰着仔翠凤末，俚也碰转弯






哉。”（第六回）从此，黄翠凤也养成了冷酷刚硬的性格，是有名的“有仔脾气”的馆人。然而，她又明白，身为馆人，单靠寻死觅活来改变自己的境遇是不行的，只有多接客、多挣钱，才能摆脱鸨儿的凌辱。黄翠凤富有心机，她不像沈小红那样哭闹撒泼；也不像张蕙贞那样曲意逢迎；更不像陆秀宝那样轻浮淫荡。她是以深沉的心机，狡诈的手段，和良家女子的风范笼络嫖客。她从不浓妆艳抹，“只淡淡施了些脂粉，越觉天然风致，顾盼非凡。”她不像别的妓女，等着嫖客选择，而是主动选择嫖客。她这样做，即使她能基本满足老鸨的索求，又无形中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当然，黄翠凤的选择，不是出于感情，更不是看中对方的人品；而是像猎人选择猎物那样，看谁能给她带来更多的好处，谁更值得她去做。罗子富就是慕她的名而来的；他同时又是她看上的“猎物”。因为子富不仅有钱，而且还是个草包。作品主要通过黄翠凤对待罗子富的态度，将黄翠凤的性格揭示得十分鲜明。罗子富初识黄翠凤时，并没觉得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随后，黄翠凤





就对他施展了一系列的手腕。先是在罗子富叫局的时候，故意当众给他一个下马威，使他不敢看轻自己；继而又让黄二姐对他诉说黄翠凤择人之严，让他对自己有一种不敢企望之感。但当他真的到了她家，她不仅对他“嫣然展笑”，还唱自己最拿手的“荡湖船”全套，使罗子富大喜过望。她还口口声声表示自己不稀罕金钱，罗子富送她一对金钏臂做见面礼，她竟推辞不受，又使罗子富大为钦佩。然而，她没有要子富的金钏臂，却扣留了他办理公事的拜匣。表面看来，她这样做是出于清高；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她的机诈。她知道，拜匣远比金钱重要；因为如果是一次性地给钱，再多也是有限的；更何况他们还是初交。抓住了拜匣，就等于整个儿地掌握住了罗子富，抓住了他的财产。因为罗即便是倾家荡产，也不敢使公文有差池。在此后的日子里，黄翠凤看上去对罗子富一片至诚，处处替他省俭。为了不让黄二姐随便诈他的钱财，她经常顶撞黄二姐。但等她赎身的时候，对子富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要五六千洋钱。在这个事件中，子富花费多少，





书中没有明言；我们只知道翠凤调头后，他“早晚双台，张其场面”。赎身后不久，困苦于黄二姐不时向她借钱。暗中指使黄将罗子富的拜匣偷走，自己又口口声声要和黄二姐拼命，结果诈去了罗子富五千洋钱，她自己一点形迹也没有显露。尽管罗子富这个形象一点也不可爱，但他那样地为翠凤效力，翠凤却那样毫无良心地欺骗他、敲诈他，也还是让人觉得过于阴险狠毒。黄翠凤的身世是令人同情的。以她的才干，如果有机遇，她也许能干一番大事业。但她不幸沦为妓女，把她的机智才能都用到妓院里的欠虞我诈之中，成为一个狡诈狠毒的人。黄翠凤最后没有从良，以她的见识，她的心机，她完全能看到：社会习俗、嫖客的品质都决定着从良的妓女不会有好结果。她赎身之后，仍居青楼，将来多半成为上海凶狠更赛过黄二姐的老鸨。

张蕙贞和沈小红争夺王莲生的故事，则又把这两个妓女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王莲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用情不专，又并非全然无情，包了沈小红以后，又对张蕙贞



产生了兴趣；包占了张蕙贞，又觉得对不起沈小红，一直在两个妓女之间徘徊。沈小红和张蕙贞则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争夺王莲生。沈小红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红馆人，自然长相、手段都非同一般。她最大的特点是凶。她出场前，小说就通过他人之口一再铺垫她的这种特点。当小红得知王莲生包占了张蕙贞，并和她坐马车去游明园时，她竟然带了大姐、娘姨赶到明园，“拳翻张蕙贞”：

沈小红早上楼来，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姨娘阿珠，大姐阿金大，径往前轩扑来。劈面撞见王莲生，也不说什么，只伸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莲生吃这一戳，侧身闪过一傍。小红得空，迈步上前，一手抓住张蕙贞胸脯，一手抡起拳头便打。……蕙贞本不是小红对手，更兼小红拼着命，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早打得蕙贞桃花水泛，群玉山颓，素面朝天，金莲堕地。（第九回）


不仅对张蕙贞大打出手，还口口声声骂王莲生辜负了她。使得王莲生过意不去，大





把地在她身上花钱。张蕙贞的性格和沈小红截然相反，给人的印象是“满面和气，蔼然可亲”。她被沈小红痛打却不敢反抗、报复，许多人便以为她是平庸的人。其实她比沈小红更有心计，起初，她是不便同沈小红争风的，一则因为沈小红当时是“上海挨一挨二个红馆人”，她则是个刚刚调头的么二人家，不是小红的对手。二则王莲生和小红相处三、四年，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王莲生到她这里来时，对小红总有一种负疚感。因此，她只能以柔克刚，作出一副温厚贤淑的样子。在明园吃了亏，黄翠凤原以为她会带一帮人到沈小红那里报复。但她没有那样做，只是发狠说：“只要王老爷一径搭沈小红要好落去，故末算是耐沈小红本事大哉！”（十二回）她以和小红全然不同的方式争夺王莲生：王莲生托洪善卿给小红买两样翡翠头面，张蕙贞反倒劝洪善卿买全副的；沈小红不许王莲生到她那里，她反倒劝他到沈小红那里去。正因为沈小红以为她怕自己，对她不防备，她才访知沈小红和小柳儿的关系，并故作漫不经心地透露给莲生。结果使莲生产生了疑心，





亲自捉了奸，她也由此彻底挫败了沈小红。就在他成为王莲生的妾，操办喜事那天，她偏偏叫了小红的局：“小红左右为难，不得不随众进见。张蕙贞笑嘻嘻地起身相迎，请坐讲话。沈小红又羞又气，绝不开口。”这实在是比“拳翻”厉害得多的招数。总之，作品结合妓院的背景，描写了妓女特殊的人生，塑造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颇为少见的人物形象。

《海上花列传》中描写的妓女，年龄、遭遇、环境甚至是生活追求都大体相近，本来是不容易写出人物特色的。韩邦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例言》）小说用对比的方法，结合人物的经历、遭遇，通过对人物言谈举止、心路历程的描写，将人物的个性揭示得非常鲜明。例如，妓女从良是一个老话题，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话本小说《玉堂春》《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是写妓女从良的故事。但这都是作为爱情故事来写的。妓女从良的结局，和妓女本身的性格关系不大，主要取决





于所跟从的男子对爱情忠贞与否。《海上花列传》也写了几个妓女从良的故事。周双玉、赵二宝、李瀚芳都想要嫁给自己的意中人，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小说通过写这几个妓女的婚姻悲剧，将不同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

三人之中，周双玉的身世最为可怜。她是个冷酷、刚烈而又工于心计的少女形象。刚被周兰用五百洋钱买来的时候，她还是个娇羞纯真的少女。因为她生得标致，周兰尚能善待她，却时时软硬兼施地教诲她当个“红馆人”。她原本就聪明，内向，罕言寡语，到了这个险恶的环境中，渐渐地变得冷酷、骄横，工于心计。对于和她一样命苦的双宝，她毫无恻隐之心，时时挑唆周兰打骂她；对于周兰的亲生女儿、又是红馆人的双珠，便“十二分要好”。表面看来，双玉对周兰教她巴结客人之类的话句句听从。但实际上，她并没有染上一般妓女的轻浮贪婪的习气，出局时表现得相当羞怯、甚至可以说是端庄。小说中正面写她的出局只有一次，那是王莲生被沈小红、张蕙贞纠缠得不耐烦时，叫了





她的局：“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脱换衣裳，远远地端坐相陪，嘿然无语，莲生自然不去兜搭。……莲生吸了两口烟，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热闹得不耐烦。倒是双玉还静静地坐在那里低头敛足，弄手帕子。莲生心有所感，不觉暗暗赞叹了一番。”（第十回）当“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的朱淑人出现在她面前时，两人一见钟情。在初次涉足妓院，羞涩不安的淑人面前，她是比较主动的：眉来眼去地引诱他，淑人豁拳输了，要罚酒时，她又主动代饮。然而，双玉毕竟年轻，当杭州的老嫖客，有钱有势的黎篆鸿看出双玉对淑人的情愫，开玩笑说要替他们做媒时，她竟信以为真。后来就费尽心机地筹划着嫁给朱淑人。她拐弯抹角通过双珠去求洪善卿为媒，让朱淑人梳拢她。淑人真的梳拢她之后，便和淑人立下誓言：淑人娶她为正妻，否则宁可同死。她原以为自己是好人家的女儿，到妓院后也并未失身于他人，有资格做淑人的妻子；没有想到，女孩子一入妓院，就已经不再是良家女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有身份的人娶为正妻的，况且朱淑人的幼稚懦





弱也不足以成事。就在他们发誓不久，朱淑人的哥哥便为弟弟定了亲，所定的恰恰就是当初扬言要为他俩做媒的黎篆鸿的女儿。朱淑人知道这事后，并无非双玉不娶的意思，只是害怕双玉知道后和他寻闹，尽量对她隐瞒他定亲的事。然而，双玉终于知道了淑人定亲的消息，而且是从她最看不起的双宝的嘲笑中得知的，这对于她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她竟能一点也不露声色，出完了局，到周兰房中说：“我做仔无姆个讨人，单替无姆做生意。除仔无姆也无拨第二个亲人，除仔做生意也无拨第二样念头。故歇朱五少爷定仔亲，故未就是无姆个生意到哉。无姆应该去请仔朱五少爷来，等我当面问俚，阿怕俚勿拿出洋钱拨来无姆。”（六十三回）好像她同淑人的往来不是为着从良，而是为了故设圈套替周兰挣钱。实际上，她这样说是想让周兰把朱淑人找来，和他以死相拼。这一切她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先是伺机报复，激怒周兰卖掉双宝；继而又放掉了淑人为她捕捉的、她自己一直精心饲养的促织儿。最后，派人请来了朱淑人，将大半杯生鸦片硬灌进



他的口；自己吞下另一杯。被救过来后，洪善卿从中调解，要她嫁给淑人为妾，她断然拒绝，要朱淑人拿出一万两银子了结此事。从作者后来写的《跋》看，周双玉最后做了“贵媵”，命运反不如双宝。

赵二宝则是个虚荣、浅薄而又不失为厚道的乡下女子。她有母亲，有哥哥，她的家原本是个小康之家。只因哥哥来上海谋生，挥霍光了原本就不多的本钱，又不肯回乡，她才同母亲到上海来找哥哥。如果他们听了舅舅洪善卿的劝告，找到哥哥便回到乡下，她将来能过上正常农妇的生活。但她同样迷恋上了都市繁华的生活，乐而忘返。在纨绔子弟史端生的引诱下，又是去听说书，又坐马车去白相，还到大观园看戏、吃大菜。不仅对上海妓女的面目衣饰细细品评，自己也有意效仿。二宝一直是家里的当家人，原本是有些主见的，但是来到大上海后，这个乡下的少女的那点见识就远不够用了。她只看到上海生活的繁华，却没有想自己有没有久居上海的经济基础；只看到妓女光彩照人的衣饰，没有看到她们肉体、精神上所受的摧





残、凌辱。因此，妓女们都在想方设法谋划从良，她却不顾舅舅的极力反对，自愿地当起妓女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这是自投罗网，她来到一笠园时，高亚白就曾问她：“俚自家身体末，为啥做馆人？”齐韵叟也说：“上海个场花，赛过是陷阱，跌下去个人勿少碗。”正因为她没有阴险老辣的鸨儿的管教，自己的生活经历又太简单，所以，她绝没有别的妓女的那种心机，对嫖客不知防范。史端生玩弄她之后又抛弃了她，她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又轻而易举地上了史天然的当。史天然为“漂局钱”（即赖掉嫖妓的钱），抑或更是出于玩弄少女感情的需要，假称要娶她；她便真的幻想着要当这个“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公子的夫人，而且还处处以夫人自居起来。史天然要走的时候，她不仅不收他的局钱，还借钱置办嫁妆，准备史天然来迎娶。就在他债台高筑之后，才知道史天然从上海回去之后就成了亲，根本就没有娶她的意思。偏偏在这个时候，癞头鼋又闯进了她的家。她不像别的妓女那样灵活，善于言词，结果被癞头鼋连人带物打得落花流水。





小说正是在她走头无路中结束的。胡适评论说：“他们一家都太老实了，太忠厚了，简直不配吃堂子饭。”^①但二宝的虚荣、浅薄、没有志气，仍令人反感。我们同情她的遭遇；又觉得她有点儿咎由自取。反不如冷酷无情的周双玉能拼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三人当中，李漱芳应该是最幸运的了。她的幸运，在于她是鸨儿李秀姐的亲生女儿，而李秀姐又是上海鸨儿中少有的平和的人，因此，她不像别的妓女那样受鸨儿的欺凌。更为难得的，是她刚入青楼，就遇上了与她真心相爱的人——陶玉甫。李漱芳是个自尊自爱、感情专一的人，她和陶玉甫相识后，两人情投意合，矢志不二。玉甫丧妻后，要娶漱芳作填房，李秀姐同意，但玉甫族人不同意，只允许她当个侍妾。漱芳自忖自己虽是馆人，除玉甫外并未和别的客人来往，于大节无亏。陶家定要将她视为烟花，心里难免气愤，并因此得病。漱芳病后，玉甫对她

^①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1 页。





更是爱怜，衣不解带的侍奉她，以致自己也累出病来。这种真挚的爱情，在妓院里实为罕见。诚如姚文君所云：“上海把势里，客人骗馆人，馆人骗客人，大家勦面孔。刚刚有两个要好仔点，偏偏勿争气，生病哉。”（三十六回）后来，漱芳竟一病而亡，玉甫痛不欲生，厚葬漱芳，誓不再娶。正因为漱芳得到了玉甫的真情，所以其身虽死，就其际遇来看，在青楼女子中要算是好的。

总之，《海上花列传》写的这三个妓女从良的故事，无论是老成干练的还是浅薄幼稚的；无论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最后都是悲剧结局。这说明，北里绝非情场，而且“越是要好，越是受累”。然而，由于双玉、二宝、漱芳三人的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导致她们争取从良的手段、结局都不相同。而这种毫无雷同之感的妓女从良的故事，把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又刻画得十分鲜明。

除了上述人物以外，孙素兰、姚文君、周双珠、马桂生、陆秀宝等人的形象，也无不鲜明生动。单就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海上花列传》是可以和《红楼梦》媲美的。当





然，韩邦庆笔下的人物，不像《红楼梦》中的大家闺秀、纯情少女那样可爱；但却一样生动鲜活。一部小说中，能把如此多的妓女形象刻画得如此鲜明、真实、生动，是难能可贵的。

《海上花列传》另一重要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它那种不见人工痕迹的反映生活的本领上。作品天然无饰，平淡自然。传统小说大都以故事情节的奇引人入胜，有的插入神仙鬼怪的超现实的描写，有的专门描写生活中的偶然、巧合。《金瓶梅》在写实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但也有宿命论的内容，小说的最后还写了“普静师荐拔冤魂”的故事。就连《红楼梦》这样的现实主义名著，也有“太虚幻境”及“还泪说”之类的描写。《海上花列传》则不然，作品中所写的均为普通之人，平凡之事。全然没有超现实的内容，甚至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奇迹”。作者在描述故事时，绝不加以评论，也不把自己的思想情趣直接投注到主人公身上，构筑自己的理想人格；而以平淡自然的笔触客观叙说，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内中的含义。现实生活在这部作





品中的再现，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但这并没有削弱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血肉饱满的人物，纷繁多姿的生活事件，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同样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海上花列传》的结构也很有特色。我国传统小说，受史传影响较大，也比较注重故事性。有的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如《水浒传》），更多的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写。《海上花列传》则把人物、事件分解开来，按时间顺序穿插到各个章节中；又改变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只写生活本身显示出来的意蕴，不多加说明。如果孤立地读某一章、某一节，人物、故事都缺乏完整性；通观全书，则“并无一丝挂漏”，这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穿插藏闪之法”。例如，李实夫贪图便宜做诸十全染上梅毒的事，是分成若干章节完成的。这个故事旨在说明老鸨的狠毒，所以引嫖客上钩是故事的重点，十六回整篇都是写诸三姐如何引实夫上钩的。在这一回中，读者只知道诸十全是“亮晶晶的一张脸，水汪汪的两只眼”，而并不知道她患有性病。作品侧重描写的是李实夫的士气、无知，贪图





小便宜；诸三姐的强拉硬扯，遮遮掩掩；诸十全的局促不安，暗中饮泣。到了第二十一回，又写诸十全请实夫讲解她求的签：“媒到婚姻遂，医到疾病除。”十全先是脱口而问：到哪里请医生？当李实夫说他有一个当医生的朋友，“随便耐稀奇古怪个病，俚一把脉，就有数哉”时，她又赶紧说自己无病。细心人才开始怀疑她有难以说出口的病。第五十八回，李实夫已经“腮边额角尚有好几个疮疤”，人们才知道十全原来患有梅毒，且已经传染给了实夫。情节的发展极为自然。有时候，一些小事开始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读到后来才知道这些情节绝非虚设。如第三回写洪善卿到沈小红处找王莲生，娘姨说小红去坐马车，人们并不会在意。第九回沈小红拳翻张蕙贞前，有个俊俏伶俐的后生——小柳儿出现过，同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四回写王莲生从张蕙贞处出来，到沈小红那里去，“只见一个小孩子往南飞跑，仿佛是阿珠的儿子，想欲声唤，已是不及。”阿珠的儿子何以会在张蕙贞的门口，又何以会见了莲生便飞跑，读者也不得而知。直到小红和





小柳儿作爱被王莲生发现时，读者回想起前面的情节，才恍然大悟：小红声言坐马车，其实是去会小柳儿；小红拳翻张蕙贞，又是小柳儿给做的眼线；阿珠的儿子是在监视王莲生，为小红、小柳儿放哨。这样的结构使情节真实、自然，仿佛作者不是在写小说，而是漫不经心地把每天发生的事记载下来。其实，这正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

《海上花列传》是用吴语写成的。作者有意识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①并据吴语的口音，自造了一些字。对此，人们褒贬不一。鲁迅说：《海上花列传》“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 = 我，耐 = 你，阿是 = 使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②而胡适则称《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他认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的最能表现人

①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 1987 年版，第 508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4 页。





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① 其实，韩邦庆这样做也的确是得失参半：对于不懂吴语的北方人来说，这种吴语小说的确令他们读起来很吃力，影响了这部书在这一部分读者中的流传；然而，方言的运用又的确使这部小说的人物描写格外生动传神。尤其是对于南方读者来说，这种吴依软语有一种用普通官话传达不出的韵味。笔者认为，能为一部分读者格外激赏的作品，远胜让所有读者感到平平的作品。

就语言风格来看，《海上花列传》综合了《红楼梦》的委婉细腻和《儒林外史》的幽默辛辣。请看第三十五回写李漱芳和陶玉甫照顾生病的浣芳：

浣芳……尚不即睡，望着玉甫，若有所思。玉甫猜着意思，笑道：“我来陪耐。”随

^①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8 ~ 509 页。





向大床前来亲替浣芳解钮脱衣。浣芳乘间在玉甫耳边唧唧求告，玉甫笑而不许。漱芳问：“说啥？”玉甫道：“俚说教耐一淘床浪来。”漱芳道：“再要起花头，快点困！”浣芳上床，钻进被里，响说道：“姐夫，讲点闲话拨阿姐听听。”玉甫道：“讲啥？”浣芳道：“随便啥讲讲末哉呀。”玉甫未及答话，漱芳笑道：“耐不过要我床浪来，啥个几花花头，阿要淘气。”说着，真的与玉甫并坐床沿。浣芳把被蒙头，亦自格格失笑，连玉甫都笑了。浣芳因阿姐、姐夫同在相陪，心中大快，不觉早入黑甜梦乡。

浣芳的活泼娇憨，漱芳、玉甫对浣芳情同手足的关爱，表现得至为真切。赵景深先生对这一段描写特别激赏，说完：“用吴语写作，尤能逼肖说者的神态。”^①最能表现小说语言风格幽默辛辣的是第十回写沈小红的撒泼。王莲生赌气下楼时，“忽听得当中间板壁蓬咚蓬咚震天价响起来。阿金大在内极声喊

^① 赵景深：《读海上花列传》，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道：“勿好哉！先生撞煞哉呀！”紧接着又看见小红“把头狠命往板壁上磕”。读者不禁暗暗为小红担心，以为小红一定要磕得头破血流了。妙在阿珠察看她的头时，竟然“没甚损伤”；又妙在阿金大还要说“险”。看似纯客观的描写，却把小红和娘姨大姐们虚张声势、放刁撒泼的情态描绘得穷神尽相，大有《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之妙。

《海上花列传》不仅是我国近代小说中的佳作，也是可以和明清一流小说媲美的作品。

五、揭露流氓妓寮害人的《海上繁华梦》

清末民初，狭邪小说开始堕落。由近代初期的描写男女爱情，变为描写狎优嫖妓的教科书。《九尾龟》《海上繁华梦》《留东外史》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海上繁华梦》，署海上漱石生著。漱石生真名孙家振（1859～1936），字玉声，因喜爱日本名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故署名漱石生，亦署警梦痴仙。上海人，曾任《申报》《新闻报》《舆论时事报》的编撰；办过《笑林报》等小报。他广闻博见，尤熟悉掌故、





民俗。所著小说，有《如此官场》《海上燃犀录》《还魂茶》《孤鸾恨》《指迷针》《海上十姊妹》等，《海上繁华梦》是其代表作。

《海上繁华梦》共一百回，分初集、二集、后集。原刊于《采风报》和《笑林报》《图画日报》。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

《海上繁华梦》的书名，已经没有了青楼文化的标志。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专写狭邪，而是写近代上海社会的五花八门。诚如郑逸梅所云：“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为其代表巨著，记录民初时代种种社会学家，多为其人其事，对研究此时历史背景甚有价值。……当时社会出现之洋龙会、张国之‘四大金刚’、广肇山庄之建醮、西人之赛马、双清别墅仙霓社所演之昆曲（仙霓社之名，即孙玉声所题），均属民初之掌故。其实，许多乃孙亲身经历，作为小说内容。”^①

^① 郑逸梅：《民初小说家孙玉声》，《艺海一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海上繁华梦》一、二两集主要写杜少牧、谢幼安的故事。杜少牧是苏州人，因向往上海的繁华，和朋友谢幼安一同到上海观光。上海的繁华里面隐藏着种种陷阱，少牧在上海，先是被流氓恶棍计十全、刘梦潘等拆梢，硬是要讹诈他二百块钱，多亏朋友凤鸣岐把他解救了出来。后又在赌场被“翻戏”的暗算，一夜之间输掉了一千多两银子，又是鸣岐拆穿了赌棍们的伎俩，把钱找了回来。最难过的还是秦楼楚馆这一关。少牧先是迷上了名妓巫楚云，在她身上大把花钱。当他得知巫把他那里得的钱倒贴在了小白脸潘少安身上时，便转而去嫖颜如玉。谁知，颜如玉也和潘少安暗中勾搭，只是花言巧语地骗他的钱。少牧得知此事时仍不悔悟，又去嫖巫楚云。直到后来，他的兄长少甫亲自到上海劝他回家，而他也亲眼看到了诸多嫖客的悲惨下场，终于醒悟，回到了家乡。小说中也写了一个好的妓女，这就是桂天香。她原本是好人家的女儿，被逼为娼后，非常厌恶追欢买笑的生活，后来嫁给了谢幼安为妾，贤达安分，妻妾和睦。





小说的一、二集中，故事情节已叙述得比较圆满，主要人物也都有了归结。一、二集问世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在读者的要求下，小说的作者又写了续集。因此，续集中让正集原有的人物再次露面，有的甚至起死回生，继续敷衍他们的故事。续集详细描写了颜如玉染上梅毒，发疯而死；巫楚云穷途末路，冻死马路。也写了桂天香从良后端庄贤惠，后因服侍病重的幼安，受传染而死。还写了下一代人，如温玉如、戚祖诒等人的青楼风波，流氓、恶棍的骗人伎俩，与正集中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贾维新招摇撞骗，花小龙假称开矿骗钱，金子富斗蟋蟀赌钱等名目。

在所有的狭邪小说中，《海上繁华梦》是文化氛围最浓重的一种。小说展示了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如：热闹非凡的夜市；林立的歌楼酒馆；名伶荟萃的剧院；每年两次的赛马；城隍庙会上的龙灯、台阁、花十景牌。此外还有拆梢、翻戏、仙人跳等。写戏剧写到了京剧演员谭鑫培、孙菊仙、汪笑侬、汪桂芬、夏月润、何家声；昆曲写了周凤林、





邱凤翔；梆子调写了“七盏灯”、“一千元”，以及烟台的“天娥旦”，此外还有髦儿戏、苏滩、杂技和话剧前身的文明戏等。写拆梢、仙人跳，戳穿了作案者们假扮的身份和贯常用的伎俩。写翻戏时详细介绍了作弊的种种手段，和拆穿这种伎俩的方法。写妓女写到长三、书寓，么二人家；嫖客有中有“瘟生”，有无人敢惹的洋嫖客，还有风流漂亮的少年专门骗妓女钱的，上海称“倒贴小白脸”等等。对于我们了解 20 世纪初期大上海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由于《海上繁华梦》把嫖妓和赌博、拆梢等相提并论，当作洋场中害人的罪恶行径，所以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对于妓女溢恶的倾向。小说描写妓女时，不再像《海上花列传》那样以同情的笔调描写她们的悲惨身世，而是直接描写她们害人的伎俩，对她们的谴责多于同情。巫楚云、颜如玉、阿珍、媚香、艳香、杜素娟、许行云等，一个个都是毒如蛇蝎的人物。巫楚云和颜如玉，硬是把初来上海观光的杜少牧拉进了陷阱，表面对他柔情似水，实则只为掏他的腰包。媚香、艳香分





别嫁给了郑志和、游冶之，却又乘他们不备卷逃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使他们有家难归，一个流落街头唱莲花落乞讨；一个气恼得病，差点送命。阿珍嫁给屠少霞后，挥霍完他的家产后便“屡屡寻事，吵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听任她改嫁。杜素娟、许行云淫荡成性，嫁人之后，仍姘戏子，马夫。……即使是作为正面形象的桂天香，之所以嫁给谢幼安，也并非因为情之所鍾，而是急于脱离妓院这个污浊之地。作者所同情的只有被恶鸨虐待致死的花小桃和屡遭毒打的花好好俩人。总之，《海上繁华梦》已基本表现了狭邪小说对妓女由溢美到溢恶的转变。

从艺术风格上看，《海上繁华梦》长于叙事。由于许多事件乃作者亲身纪历，写来曲折生动，娓娓动听。尤其是戳穿恶棍们行骗的种种伎俩时，很能激发人们的好奇。然而，也正是因为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旧上海生活的五花八门，而不是为妓女立传，所以小说以较注重叙事，却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书中的人物，多有叙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的类型化的倾向，小说的结局，也难





突破善恶报应的观念。

《海上繁华梦》用普通白话写成。尽管描写的内容涉及赌场、妓院，但语言醇正雅洁，生动传神。请看二集二十五回对乡下婆子严氏初进上海桂天香住的公馆时的一段描写：

严氏同着上楼，见这房间铺设得甚是整齐，中间一只外国铁床，楼板上铺着地席，二梁上挂着保险洋灯，妆台上摆着台花、自鸣钟等物，壁上一边挂着一面大衣镜，一边是天香拍的放大小照。严氏多是见所未见，先问天香地席上怎样走法，天香说：“尽管穿着鞋子进去，不过，吃水烟留心烟灰、纸煤罢了。”严氏方才移步入内，却像是怕踏脏了要他洗刷一般，十分留意。后来见衣镜内映着对面的那个小照影子，认作天香站在壁边，连说：“二奶奶不要客气，大家请坐。”那知天香早已坐在靠窗口一只外国椅上，听他这样说话，怎得不暗暗好笑！说了声“有坐”，倒把严氏吓了一跳，认作窗口边一个天香，镜子里又是一个。直至定了定神，方才晓得镜子里的乃是照片，自己也觉好笑起来。天香命佣妇递过了茶。严氏在房中东也张张，





西也望望。因见那张外国铁床褥子铺得甚高，走到床沿上去一坐，恰恰坐在弹簧上面，往下一软，往上一攻，心里着慌，几乎翻下床来。天香见了，忍住了笑，叫他大胆坐下，断没要紧。严氏摇摇头道：“这种床，亏你怎样睡法。”连忙扒起身来，跑至靠窗口的一张外国摇椅上坐下。岂知那摇椅也甚欺生，没有坐过的人坐上去好像要跌将下来。严氏又吃了一惊，暗说怎的绝好一间房间，那家生都甚蹊模巧样。

这段描写，颇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由于近代西风东渐更胜过曹雪芹著《红楼梦》时，洋场的时髦和乡下妇女见识的反差更大，所以贾氏进洋公馆的描写更具时代特色和喜剧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作者孙家振和《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是有分歧的。据孙家振《退醒庐笔记》记载：“云间韩子云明经，别篆太仙，……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





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① 孙玉声此说，不无道理。《海上繁华梦》以其语言的适用范围广而争取了相当数量的读者。然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在人物个性化语言方面，《海上繁华梦》终较《海上花列传》大为逊色，艺术成就远不如彼。

六、作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和《留东外史》

《九尾龟》二十四集三百八十四回，署漱六山房著。漱六山房，真名张春帆（1872

^① 见《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6页。





~ 1935), 原名炎, 字春帆, 笔名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早年在南京的海关任职, 后为上海的报人。作有小说《黑狱》《宦海》《未来世界》《烟花女侠》《九尾龟》等, 其中以《九尾龟》最为有名。《九尾龟》前十二集出版于 1906 ~ 1910 年; 后十二集出版于 1924 年。齐鲁书社 1993 年重版。

书名《九尾龟》, 是从书中的一个嫖客康中丞一家的作派概括出来的。“大凡妇女不端, 其夫便有乌龟之号”, 康中丞的五房姨太太, 两个姑太太, 两个少奶奶一共九人, 行为都不端。康中丞“虽然有些知道, 却也无何, 只得缩着个头, 凭着她们去怎生闹法。”故人称其为“九尾龟”。其实, 康中丞并不是此书的主角, 书中写康中丞故事的, 只用了十二回的篇幅。全书是围绕着“嫖界英雄”章秋谷作文章的, 主要写章秋谷在嫖场如何主持公道、抱打不平。

小说的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 第七回就通过“以新党自居”的方幼恽之口说: “你道现在上海的新党、日本的留学生, 一个个都是有志之士么? 这是认得大错了!”





他们那班人开口‘奴隶’，闭口‘革命’，实在他的本意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又没有夤缘钻刺的本钱，所以就把这一班奴隶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今日骂，明日骂，指望要骂得他回心转意，去招致他们新党入幕当差，慢慢的得法起来，借此好脱去这一层穷骨。那知朝中这班大老，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心思是面糊蒙着的，面孔是牛皮做成的，就是拍着他的脸痛骂他一场，他也只是不见不闻，我行我素。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奴隶我自为之。凭你怎样的大声疾呼，那里叫他得醒！也有万一碰着运气，逢时得济，遇着了贤明的督抚大臣，聘请他做个问官，居然的当差入幕起来。无奈这班新党中人，却又是一得到优差优馆，便把从前革命、自由的宗旨，强种流血的心肠，一齐丢入东洋大海。一个个仍旧改成奴隶性质，天天去奴颜卑膝起来。”显然，作者既不满于朝中的官僚，也不满于新党，看不到前途，悲观颓废，玩世不恭，就把心思花到了秦楼楚馆之中。

《九尾龟》描写妓院生活，也不同于《海上花列传》。作者认为妓女们全是坏的。第九





回就慨叹嫖界的人心不古：“古来教坊之盛，起于唐时。多有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貂裘夜走，桃叶朝迎，亦有一见倾心，终身互订，却又是红颜薄命，到后来，免不了月缺花残。如那霍小玉、杜十娘之类，都是女子痴情，男儿薄幸。文人才子，千古伤心。至现在上海的馆人，情性却又不然，从没有一个妓女从良，得个好好的收梢结果。不是不安于室，就是席卷私逃。只听见妓女负心，不听见客人薄幸。那杜十娘、霍小玉一般的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见，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因此，这部小说极写妓女之恶：许宝琴、花云香、金黛玉、林黛玉、周凤林、张书玉、陆兰芬、陈云仙等，都把嫖客当“瘟生”宰。林黛玉得了邱八的两万多银子后嫁给他作妾，尽管邱八对她宠爱有加，但她耐不住寂寞，对着邱八打滚撒泼，寻死觅活。无奈，邱八只得听任她回到上海去当妓女。陆兰芬抢走嫖客方幼恽两千银子的汇票，和一只从美国带回来的价值一千块洋钱的戒指后，便不再理睬他。嫖客刘厚卿嫌名妓张书玉冷淡了他，赌气“跳槽”去嫖别的妓女，想让张书玉知





悔，不料张书玉敲诈他五千两银子后又一脚踢开了她。范彩霞偷偷地把安眠药放到嫖客饮的杏仁露里，使她误以为生病，然后衣不解带地侍奉他，骗取他的感情，继而骗取他的钱财……。能够对付这些妓女的，只有“嫖界英雄”章秋谷。

男主角章秋谷是江南应天府人，他“聪明绝世，意气如云，陈、王八斗之才，李泌九仙之骨”，总之，是个文武全才。他又有一副济世的心肠：“我生平为人最爱管人闲事，时常骂那坐观成败的鄙夫，都是凉血动物。自家岂肯遇事退避，畏缩不前。”（第八回）然而，他的才华没有用到经邦治国上，而是纵横于嫖场，在妓院里主持公道，抱打不平。他具有花柳英雄的种种优势：花钱阔绰，生的漂亮，风流倜傥，又有一种“功架”，能使所有的妓女倾倒。无论怎样剽悍狠毒的妓女见了他总是服服帖帖，惟命是从。因此，嫖客们被妓女歪缠时，总是求他想办法解决，他也总能从妓女那里为嫖客讨回公道。此外，什么“扎火囤”、“仙人跳”、戏子勾引宫妾，流氓聚众拆梢之类的伎俩，也都能被他一一





识破、戳穿。他俨然是妓院赌场里的“道德法官”，除强扶弱，仗义执言。然而，章秋谷本人亦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宿花眠柳，姘了一大群妓女。只是他完全把妓女视为玩物，把她们的交往视为金钱与肉体的交易，对她们绝不动情。正如二十六回他对贡春树所说：“倌人看待客人，纯用一个‘假’字，客人看待倌人，也纯用一个假字去应她，切不可当作真心，自寻烦恼。……大抵上海的倌人，只好把她当作名花娇鸟一般，博个片时的欢乐。”因此，妓女们在他的手中丝毫占不到便宜，他倒是占她们的便宜。不仅如此，章秋谷还费尽心机地勾引良家妇女。他看上了伍小姐后，先是勾引比较容易上手的卖花女子，然后通过卖花女子勾引伍小姐的监护人——舅太太，最后串通舅太太把伍小姐弄到手。显然，《九尾龟》已和言情小说无缘，它既没有反映封建礼教对情的压制；又没有对饱受凌辱的妓女表示同情，甚至也没有为那些宿花眠柳的浪子提供什么警戒，而只是从市民的低级趣味出发，描写狎优嫖妓的风流。诚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现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①

在艺术手法上，《九尾龟》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首先，小说没有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极力赞美的章秋谷，实际上是个概念化的人物。作者从想象出发，把狎优嫖妓所需要具备的条件都加给了他：漂亮、风流、有钱有势，甚至还有高超的武艺；但却没有鲜明的性格。他制伏妓女的种种手段，也令人觉得不可信。因此，这个形象即不能和张生、柳梦梅、贾宝玉相比；也比不

^①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上西门庆、贾珍、贾链。而妓女的形象又大都是清一色的恶，林黛玉、张书玉、陆兰芬、许宝琴等，都是利用色相诈骗钱财的美女蛇、母夜叉，她们自身的性格特点却又没有什么分别。此外，小说的结构也比较松散，情节多有雷同之处：基本上是以章秋谷为贯串人物，把一个又一个上海嫖界的骗局展示出来，然后由章秋谷一一揭穿，惩处。

《九尾龟》的语言有一定的特色。书中用了苏白，但和《海上花列传》有所不同。此书只有妓女用苏白；叙述语言和除妓女以外的人都用普通白话。而且，妓女从良之后，说话也马上改用普通白话。这样一来，苏白就成了妓女特有的语言。这样写尽管有的地方不合情理，但也有一定的好处：既能减少不懂吴语的读者的阅读障碍，又能把妓女向嫖客撒娇、灌迷魂汤时的嗲劲儿表现得比较形象。

《九尾龟》在当时是颇为畅销的，原先这部书只有十二集，后来作者应《上海画报》主持人之邀，一直续到二十五集（未完）。这样一部思想艺术方面都不出色的小说何以会





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呢？原因之一是书中所写的嫖妓故事迎合了一部分市民读者的不健康的情趣。而更重要的，还因为小说有一定纪实性。书中所写的多是当时上海滩上有名的妓女，如林黛玉、张书玉、陆兰芬、金小宝四人，在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上就有“四大金刚”的名目。吴趼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海上四大金刚传奇》，把这几个妓女的故事炒得沸沸扬扬的。而此书后半所写的赛金花，在当时几乎更是无人不晓的人物，曾朴的《孽海花》中，她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更是将她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人们争相传抄，时有纸贵之誉。《九尾龟》写这些妓女们的奇闻佚事，极大地满足了市民们那种猎奇揭密的喜好。更何况，据说小说中具有“九尾龟”之名的康中丞，是影射红极一时的大官僚盛宣怀的，也就更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好奇心理。

《留东外史》是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作品。其作者向恺然的生平事迹，我们已在第七章《民国的武侠小说》中作过介绍，此不赘述。如果说，向恺然是民国武侠小说的





奠基人的话，他的成名之作，却是《留东外史》。《留东外史》是一部洋洋巨著，正集五集，续集五集，共120章。正集于1916年由民权出版社出版，续集1922年出版。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

《留东外史》写的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作者在第一章中说：“原来我国的人，现在日本的虽有一万多，然除了公使馆各职员，及各省经理员外，大约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在这里实心求学的；第二种是将着资本在这里经商的；第三种是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读食谱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来的。……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留东外史》写的，正是后两种人的生活。





《留东外史》的男主角们，是鲁迅所说的“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和《九尾龟》中的章秋谷相似。只是在他们身上，才子的成分更少，流氓的成分更多。书中最早出场的，是湖南的周撰，这是个典型的流氓。他原有妻子，在国内因为乱搞女人坏了差使，无法存身，靠朋友的帮助混进官费生里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更是不务正业，终日叉麻雀、搞女人。他先搞的一个“日货”，是个伪装成学生的妓女。后来，他对那个日本妓女厌倦了，又勾引一个中国的陈姓女留学生，并和她结成夫妻。结果引得群情激愤，表面上，他们纷纷指责周撰的道德败坏，实际上是嫌他独占了那个“有名的尤物”。《留东外史》最主要的人物是来自湖北的留日学生黄文汉，此人与周撰并称“南周北黄”。刚出场的时候，黄文汉似乎比起周撰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于嫖字上讲功夫，能独树一帜”。据他自己说：“我平生经过的女人，或嫖或偷，总数在二百以上。”然而他嫖日本妓女圆子的时候动了真情，成为难舍难分的一对情人，最后结为夫妻。小说写得最多的，就是





这类男女苟且的丑事。

小说对二次革命前后的时局也有所反映。如写袁世凯称帝前在日本造舆论和在留日学生中引起的风波；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化、堕落；和袁世凯时期中国驻日公使的贪污腐败等。作品还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信仰危机。例如第四十七回写胡女士与苏仲武讨论“忠孝大节”的问题：

胡女士道：“你出洋这多年，怎的脑筋还这般腐败？忠孝的话，是老学究当口头禅，说得好听的。二十世纪的新人物，说出来还怕人笑话，莫说存这人心。你可知道，中国弄到这们样弱，国民这们没生计，就是几千[年]来家庭关系太重的原故。父母有能为的，儿子便靠着父母，一些儿也不肯立志向上；儿子有能为的，父母便靠着儿子，一点事也不做，只在家中吃喝，谓之养老。这样的家庭，人家偏恭维他，说是父慈子孝。甚至老兄做了官，或是干了好差事，弄得钱家来，老弟便不自谋生活，当弟大人；若老弟做了官，老兄也是一样。人家偏又恭维他，说是兄友弟恭。社会之中，因有这种积，硬





多添出一大半吃闲饭、穿闲衣的人。几千年如此，中国安得不弱？国民安得不没有生计？西洋各国，哪里有这种笑话？……就是你，大约也不能说西洋人的文明不及中国人，西洋人的道德不如中国人。”

这段话，的确也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问题，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不孝，同样是荒谬可笑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新党人物提倡“非忠非孝”的主张，也是这样的幼稚和含混不清。这反映了当时旧的伦理观念渐次解体，新的道德观念尚未确立时的思想混乱，也是本书所写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思想根源。

和《九尾龟》一样，《留东外史》在艺术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小说的人物形象既不鲜明，情节结构也没有什么巧妙之处，满篇累牍，尽是嫖经、食谱。然而，嫖妓之类故事，本身就受情趣低下的市民们的喜爱；而在日本嫖妓，又多了一种异国的情调，引起人们的好奇。所以，《留东外史》在当时大受市民读者的欢迎。正集问世后，流传颇广。向恺然随后又写了《留东外史续集》《留东外






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等，这些作品也和《留东外史》一样，是艺术格调较低的小说。

人的思想状况是颇为复杂的，其政治态度和道德水准，有时也不一定协调。《留东外史》作者向恺然就属于这类人。从政治态度上看，他因参加公葬刘天华的风潮被开除学籍，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有一定的正义感。但在日本留学时的行为却并不检点。据包天笑回忆：“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多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①作者创作《留东外史》，一则是媚俗，二是自己不健康情趣的流露。

这一时期的狭邪小说，还有《海天鸿雪记》。《海天鸿雪记》，题二春居士著，南亭亭长评。一说二春居士亦即南亭亭长李伯元。小说只有二十回，是一部未完成稿。原由

^① 转引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一），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游戏报》分期刊印，光绪三十年（1904）世界繁华报馆出单行本。《海天鸿雪记》用吴语写狭邪故事。作品的开端写道：“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说不尽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小说主要写颜华生同江秋燕、谢宝玉，朱顺全与阿四等人的情爱瓜葛。作者之意，似要把颜华生和谢宝玉作为正面形象刻画，惜小说只完成二十回，而此书又头绪繁杂，所以难以了解完整的情节。仅就这二十回看，《海天鸿雪记》远比《海上花列传》逊色。主要在于：《海上花列传》有“传”的性质，比较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发掘；也注意情节的生动与完整，穿插的巧妙。而《海天鸿雪记》是谴责小说的写法，只截取人物的生活片段，描写狭邪琐事，且“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头绪既繁，角色复伙”，很难引起人们的兴味。此外，涉及狭邪故事的还有《歇浦潮》、《人间地狱》、《人海潮》等，都是20年代以后的作品，此不赘述。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章

主张婚姻自主的
“鸳鸯蝴蝶派”小说



风

化

图

史



10



一、“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产生与特点

20世纪初，在新小说（此指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崛起的同时，“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创作也悄然而起，并日趋繁荣，形成了说部雅俗对峙互补的格局。

“鸳蝴派”小说萌生于1906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的代表作——《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这类小说一问世，就表现了与新小说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不谈政治，不涉毁誉”，^①强调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这种主张在《〈礼拜六〉出版赘言》中表现得非常清

^① 王钝根：《游戏杂志·序》，《游戏杂志》第1期，1913年出版。



楚：

……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座，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①

这些小说总是描写市民群众感兴趣的内容：写“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②的情侣；写扑朔迷离的侦探故事，写揭密猎奇的社会新闻，也写市民生活中的苦乐与酸辛。形式上，又力求花样翻新，甚而趋奉时尚，以适应市民们的欣赏口味。在当时的市民群众中，拥有大量的读者。

“鸳鸯派”小说，拥有一支庞大复杂的作

^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②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家队伍。早期有影响的作家中，有许多人是南社成员，如包天笑、叶小凤、姚鹓雏、周瘦鹃等。他们反对封建制度，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在清末民初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基本站到了进步力量一方。其中，叶小凤又是同盟会会员，历任国民堂宣传部长、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而姚鹓雏则因为思想进步，解放后由陈毅推荐，当选为松江县第一任县长。也有一些作家，如李涵秋、陆士谔、李定夷、杨尘因等，是普通的下层文人。当时科举已停，断绝了文人的仕进之路，这些人便到上海等城市谋生。他们或是业余时间创作小说，或是靠写小说维持生计。他们的创作态度大都是认真的，作品中也不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同情人民疾苦的进步倾向。

当然，如此庞大的作家队伍，且又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其成员也就难免鱼龙混杂、良莠参差。“鸳鸯派”小说的作家中，也确有不少是郑振铎、沈雁冰等人所批判的“文娼”、“文丐”。他们思想守旧，情趣低下，专门写令人肉麻的色情故





事，或揭人隐私，以迎合某些市民的低级趣味。其作品精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完全把文学创作当作赚钱的手段。

“鸳鸯派”小说最早萌生于上海，后来渐及北京、天津等其它城市。当时，刊载这类小说的报纸、杂志有数百种。早期较有影响的刊物有：1909年创办的《小说时报》，1910年创办的《小说月报》，1912年的《妇女时报》，1913年的《自由杂志》《游戏杂志》《香艳小品》，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民权素》《礼拜六》《眉语》《小说丛报》《女子世界》，1915年的《小说大观》《小说海》，1916年的《春声》等。此外，还有集中刊载南社成员作品的《七襄》《江东杂志》。于是，大量“鸳鸯派”小说藉以问世。“鸳鸯派”小说无论在数量种类方面，还是在拥有读者的人数方面，都远远压倒了新小说。

正当社会上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文学为其摇旗呐喊、大造舆论的时候，这种强调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小说的大量涌现，的确显得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而且，这类消闲小说又大有压倒新文学的趋势。因





此，“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为了争夺文化阵地，对这类小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据现有的资料看，第一个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点名批评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1919年1月，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再一次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此后，“鸳鸯蝴蝶派”几乎成了封建文艺、反动文艺的代名词，受到郑振铎、沈雁冰、鲁迅、瞿秋白、胡适等人的严厉批判。显然，“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并不如有些人所说，是约定俗成的。它其实是文学论战中的批判性用语，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贬斥的成分。正因为此，通俗小说家都不愿承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至于这一派的具体所指，在当时就相当模糊。有人说“鸳蝴派”小说是指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①也有人认为是

^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指那种常用四六句的文言小说，“看文字，真像一对一对的鸳鸯，一双一双的蝴蝶。”^①但是，从郑振铎等点名批判的作家、作品看，“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所指，远不止于此，它实际上指的是当时所在注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来自新文学阵营的批判，通俗小说家从未展开过争论。但他们的作品却屡禁不止，甚至还有一片讨伐声中高潮迭起。直到解放以后，才从文坛上消失。形成了与新小说相互对立又长期共存的局面。

“鸳鸯派”与新派作家之间的确存在着严重分歧。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宗旨、创作态度的分歧；而不是封建与反封建两大阵营的对垒。“鸳鸯派”小说，就其主流来看，属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文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类文学不应该受到排斥，更不能把它和封建文学并列，从而进行讨伐。应该看到，它与新小说之间，既有对立的一

^① 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面，又有互补的一面。

首先，小说的基本功能是艺术地反映生活，它应该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艺术形象，广泛而又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时也应该具有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而我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改变了近代小说这两种功能紧密结合的特点。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不完全是自身的政治经济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也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当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的门户，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出于救亡图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入手，径直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建理学钳制之中的国民的思想意识，则不可能产生如此之大的飞跃。当辛亥革命动摇和推翻了封建制度以后，尚未完全摆脱封建意识束缚的民众，却刚刚开始人性的复苏，产生了类似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人本主义思想。他们的兴奋中心，还不能集中在政





治体制的革命上，而是要摆脱残余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两种不同的观念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小说。新小说注重开启民智，向人们灌输政治革命的道理，具有较强的启迪作用和教育意义；但却脱离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实际。作为市民文学的“鸳鸯派”小说，又直接认同一般市民的思想趣味，如实地描写新旧过渡时期的市井生活，而不具任何启迪作用和超前意识。表面上看，这两类小说像两股道上跑的车；而实际上，却分别担负了文学启迪思想，反映生活的使命。

其次，文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的需要。小说原本就是俗文学，是以其艺术趣味的世俗和形式的通俗赢得民众喜爱的。然而，资产阶级的先驱人物，只看到了小说拥有大量读者这一事实，主张用小说新民；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探讨小说何以会拥有如此之多的读者，“小说界革命”在提高小说地位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的审美趣味。提





倡利用小说“发表政见，商榷国计”，^① 这势必使小说变浅为深，变谐为庄，变俗为雅。因此，尽管新小说不断在表现形式上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努力，其内容却干巴枯燥，深奥高雅。以至于“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警察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生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音律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政治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伦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② 新小说满足了“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③ 的新式知识阶层的需要，而粗识之无的市民阶层和下层民众却看不懂，也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选择“浅显易解，乐而多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此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俗小说与新小说也是一种互补关系。人们读文学作品，固然希望开阔视野，获得知识；但有时也希

①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②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178页。

③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望获得情绪上的轻松愉快。新小说寓意深刻，思辩性强，能使人得到教益；却不能愉悦性情。即使得比较注重趣味的谴责小说，读来也仍有一种压抑感和沉重感。“鸳鸯派”小说则轻便有趣，怡性悦情。况且，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转化，读者不会长久地对一种风格的作品感兴趣。在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兴盛之后，“鸳鸯派”小说的崛起，有其合理性。实际上，即使是新小说的推崇者，闲暇时也未必不读一些“鸳鸯派”小说以进行调剂。用骈散相间的文言写成的《玉梨魂》，之所以销量很大，恐怕其间也不乏知识阶层的读者。

我们还应该看到，新小说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忽略了小说艺术自身和特点，在艺术技巧上没有什么建树。“鸳鸯派”小说则为了赢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注重艺术技巧的创新。这些小说的创作，有对我国传统小说的继承、发展；也有对西方小说的参考与借鉴。如：推理小说的引进；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产生；叙事时序和叙事角度的变化；心理描写的加强；语言进一步通俗化，口语





化，并出现了方言小说等，在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演变中，“鸳鸯派”小说的贡献最大。

“鸳鸯派”小说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创作宗旨，大大降低了对小说家的要求。作家不是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生活，努力发掘生活中最有价值、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并进行认真严肃的艺术创造；而是一味迎合文化层次原本就不高的市民读者的口味，抓住生活中的一些表层现象进行创作。这就使他们的作品俚俗、浅薄，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却缺少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力量。其次，“快餐式”的文学样式，便于迅速地反映生活，却不利于作家进行精心的审美创造。“鸳鸯派”许多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刚刚发生过的事；且往往是边写边在报刊杂志上连载，前后照应已属不易，更谈不上对作品进行总体构思，精雕细刻了，作品大都显得浅陋粗糙。加上一部分小说家把写小说看作牟利的手段，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严重影响了这一派小说的审美价值。正因为此，“鸳鸯派”小





说尽管数量很多，但其作品的审美意蕴，却无法和明清的小说名著相比。

总之，“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清末民初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它与新小说在创作宗旨、审美趣味上大相径庭，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风云突变的社会现实；以不同的艺术风格，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审美趣味的读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在研究新小说的同时，也有必要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小说，力图对这一派的小说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鸳鸯蝴蝶派”小说包括言情小说、社会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等。这一章中，我们只介绍言情小说，着重分析《碎琴楼》《孽冤镜》《霞玉怨》和《玉梨魂》。

二、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碎琴楼》

《碎琴楼》，三十四回。作者何漱，身世不详，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中说“或云著者尝宦粤西，故所言皆两粤事”，“一说书中云郎，即作者自况也”。然则这只是推测之词，难以作为实据。据该书的自序，此书完稿于宣统庚戌（1910年）。1913年由商务印书





馆初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重版。

《碎琴楼》描写了一个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琼花，是钱商李绅的独生女儿。父母聘请进化先生教她读书，亲戚之子韩云郎、陈银生皆来附读。银生是李家近亲，家亦豪富；云郎家贫，是远亲。琼花对云郎由怜生爱，一往情深。李绅欲将女儿许配银生，每议及婚事，琼花必病，遂拖延下来。云郎向琼花父母求亲，反遭奚落，愤而离开李家。琼花之母病故，家境败落。李绅为了寻找靠山，终将琼花许配银生；琼花体谅老父的困境，答应了亲事。云郎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几成狂病，离家去广州。后来，李家遭兵乱，一贫如洗；陈家不仅不肯接济，反而提出退婚。李绅气死，琼花自杀遇救。云郎闻知，从广州来接琼花。琼花亦赴广州寻云郎，不幸病死途中，琼花刚死，云郎至，痛不欲生，葬琼花后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碎琴楼》的成功之处，首先是因为塑造了一个善良深情的少女——琼花的形象。琼花是一个美丽、纯真、娇弱的少女。富商家庭的影响，父母对他的娇纵，并未改变她的





天性。她“亭亭如浊水之莲”，志趣高洁，颇有林下风致。她不喜奢华，“衣毕淡色，绣履不饰”，闺房也“幽然意远，雅无尘华”。更为可贵的是，她不以贫富论人。她家的老女奴秋雨，知书达理，还精通音律，她待之如长辈，不仅不让她服侍自己，反而关心她的饮食起居。丫环九环聪明伶俐，她也视之如友。她的爱情也比较特别，云郎与银生贫富悬殊，并且银生先是进学，后因科举将停，又出国留学，出尽风头；云郎则处处屈居银生之后。在一般女孩儿，自然会把银生视为白马王子；她的父亲与先生也都褒奖银生，贬斥云郎。她却对云郎由怜生爱，一往情深。在父亲和银生欺负云郎时，她不顾女孩儿的羞涩，多次挺身袒护他。她还多次暗地里接济云郎，父亲要为她买手镯她不要，却向父亲要用来买手镯的钱。云郎鞋子坏了，她给他钱买新的；云郎父亲病危，李绅只借给很少的钱，她把自己所攒的钱都送给了云郎。云郎对她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她的父母疼爱她，却不理解她。在他们的眼里，家境富有的银生，才能给女儿带来幸福；嫁





给云郎，只会终生受苦。此外，他们为女儿择偶，也考虑家世的利益。所以不顾她的反对，将她许配银生。为此，琼花深感痛苦，正如她弹琴时所唱的：“哀哀命之徂兮，吾不自由，不自由兮，吾将奚求？”后来，就在她遭遇战乱，陷入困境的时候，富有的银生投井下石，抛弃了她；而穷苦的云郎却不改初衷，千里迢迢赶来帮助她。然而，她没有等到云郎的到来，备受磨难而死。以往小说中的佳人爱才子，大都是因为才子的风流俊雅，才华惊人；琼花爱的却是一个处处受压抑却和她心心相印的人，突出的是精神的默契和感情的和谐，是一种深层次的爱。所以这个形象格外感人。

《碎琴楼》所写的爱情悲剧，是由家长嫌贫爱富造成的，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书中封建家长李绅的形象也刻画得颇为鲜明。李绅是一个新型商人的形象，他精明干练，既开钱庄，又广置良田，还因地制宜地搞养殖业，家中巨富。一方面，他极力张扬其富有，“年必张宴，宴必征其邻，邻之人乃必秦贻以贺。所可异者，则李绅张宴一次，





冠服必易一次，盖李绅至是，殆已官矣。”另一方面，对于穷人，他又至为吝啬：沈媪来他家为琼花作媒，他误以为来借钱，不等她开口，先告以“窘于谷”。云郎之父病重向他借钱，他至为不悦，“良久始授小包……为数殊寡”。他的这种品格，决定了他在为女儿择婿时只会注重家境的贫富，而不注重当事人的感情。只是由于独生女儿的拼死反对，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后来，他养殖的肥猪遇到瘟病，钱庄又被经理人搞得亏空。他悲愤交集。他想状告经理人，又怕消息一出导致钱庄倒闭，后果更加不堪。于是与经理人相约保守秘密，表现上仍是赫赫扬扬的样子，暗中徐图恢复。他把希望寄托在富有的亲友乡邻身上，结交了富绅王成卿。而王在兵乱时收容了他的女儿，却将他拒之门外，目的是要蹂躏琼花。他将女儿许配陈家，危难之时，陈家不仅不帮助他们，反而提出退亲。最后，他悔恨而亡。作品没有把李绅脸谱化，简单地把他描绘成那种不通人性的人，他在老妻爱女面前有专横跋扈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第十回写他因银生得到先生的奖励而云





郎没有得到，就当众褒奖银生而羞辱云郎。琼花为云郎鸣不平，当众顶撞了他，他“惧威严渐陨，将见易于家人，且当贵客之前，尤不可露其家难”，怒斥琼花。然当琼花羞愤成疾时，他虽不肯认错，却想方设法为女儿挽回面子：他见云郎与银生比试筋斗得胜，当着女儿的面逼着银生将先生的奖品转赠云郎，使银生受窘，云郎扬眉吐气。他把女儿许配银生，固然有自己事业上的打算，但也确实有为女儿着想的一面。他认为银生有钱，有前途，女儿只有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才会幸福。所以在困境中陈家不肯帮助他时，他还以女儿终身有靠而自慰。后来陈家竟提出退婚，他才后悔不及，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小说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向人们表明：婚姻大事应重人品、重性情，而不应重财富。

《碎琴楼》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进化先生对学校换汤不换药的改良，科举将停时读书人将留学视为涉入仕途的捷径，以及近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这个爱情故事，与“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式的才子佳人小说





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认识意义。

与传统的小说相比，《碎琴楼》在艺术上有较多的创新。首先，在描写琼花与云郎的爱情生活时，小说打破了才子佳人传书递简的俗套，着重描写一些生活细节。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展示二人相爱的经过，同时也揭示了人物性格。细节描写本身又极有风致，请看第四章写琼花及三个小学友的童趣：

明日，琼花疾稍愈，依窗坐……忽众声哗然，出于西圃。圃畦野雀惊飞，翔回空际。琼花异而瞰之，则银生荷长竿先行，世昌继之，云郎捧书在后。彼三童盖自塾中归，道遇试翼之雏，低回于地，亟逐之。雏亦慧黠，自审体力且竭，再飞必无幸，则竭力翔入檐间，匿不复出。三童遂入圃中，无所得，则跃畦而戏。时圃中菜花正盛，微风荡之，状如丽锦扬空，荡荡展舞。银生手敏，亟摘一丛，左右自插其鬓，荷竿而舞。世昌效之。云郎顾之而笑，摘一支，引而自嗅。琼花至嗜花者也。睹而大悦，亟纵声娇鸣。三童仰望得之，狂喜，奔集楼下。云郎仰首曰：“妹





妹愈耶？”语未终，银生大呼曰：“琼花妹妹，胡久不至塾？先生谓汝情，已褫汝积分矣！且谓我勤，谓我逾一月，且获优赏。”语已，回顾睹世昌，骤拔其头上花，力掷于地，乃向楼大笑。……琼花默然，既而张口曰：“试以花掷我，插我瓶，我瓶旷矣。”银生闻言，亟拔其鬓上者，力抛之。花及于窗。缘琼花腕侧而堕，落于沟。银生噪曰：“汝胡不接？”琼花笑曰：“吾且欲接而花堕矣，复之！”银生遂反奔菜畦，世昌亦去……

四个儿童天真烂漫的情态跃然纸上。虽然其间也表现了银生之骄，云郎之怯，但都写得极有分寸，没有把以往小说通常所写的好人恶人的分界用到天真的儿童身上。这样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次，小说的人物描写有较大的突破。首先，作品能结合生活环境刻画人物性格。例如，作为反面形象的银生，并非以往小说中所写的大奸大恶。他愿是个健康、聪明、好强的孩子，但由于李绅的偏爱，进化先生的逢迎，他自以为是，处处争强好胜，抓尖





卖快。他不懂得关心别人，却时时关心自己的“积分”如何；甚至为了得到李绅和进化先生廉价的表扬，不惜搬弄是非，损害别人。最后成长为一个自私、虚荣、浅薄的花花公子。而自幻遭人歧视的云郎则显得深沉、稳重、怯懦，尽管这个形象不够完美、高大，但却显得十分真实。其次，肖像描写能通过人物的外貌特征，揭示人物性格。如第二章写进化先生：“先生长颈而足短，目小而口阔。惟其阔也，故善笑。未至堂数武，已展展有笑容，登堂一揖，笑声作矣。先生体长而衣短，袖巨而长，逾其指。故不必抠衣，第力摇其袖，已觉斯文可观。先生不冠，乃捧之于手。其冠平首而檐前，盖今日之军服。”表面时髦，内里守旧，又附炎趋势，善于奉迎的学究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真切。如此生动形象的肖像描写，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小说的结构也很具有特色。全书运用倒叙手法，先由假托作者的朋友在深山中拾得一琴曲，并寻访到作曲人的侍婢；再通过侍婢对往事的回忆展开全书的情节，新颖别致，





作品也打破了以往章回体小说的套数，不用外仗工整的回目，而用浅显醒目的标题来概括每一回的内容。也不再用说话人讲述故事的口吻，而多呈现式的描写。如正文的开头，不像以往的小说那样先介绍主要人物的出身、家世，而作了这样描写：

斜阳挂于林杪，距西岭五尺四尺之间，光烈缓矣，物情亦慵慵弗振。林鸟外食既饫，则依巢外之枝，从容修剔其羽；牧童叱犊声咻然相应，乡野之间，转觉寥然凄寂。力作者皆荷锄缓归，就妇子食矣。当此之时，李家村之外有小塾，塾师方踞案西向，挥笔如椽，批评群童课字。……学童三四人，就案背书，以声哄不能辨其章句，第见其小唇颤动，音调如狭檐注雨，顷刻已尽数人。

犹如电影镜头，由远处推近；由模糊到清晰，渐渐地将主要人物实现在读者面前。其章与章之间，也不再用“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话连接，采用了跳跃转换的方法。如小说十三章的末尾写琼花病后，其母及丫环九环说笑话逗琼花开心。第十四章的开篇却一下跳到云郎之家：“当此之时，有斗室如船





者，其高不及十尺，室中一塌一几外，无隙地矣。……枕上僵卧一人，寂弗少动。圆桌之旁，坐童子，面有戚容。”李、韩两家，相隔甚远，这里用“当此之时”把它们连接起来。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一方是绣阁朱楼；一方是敝室破帐。琼花生病有慈母呵护，丫环、仆妇侍奉；云郎却孤身一人侍奉病重的老父。同一时间的两种景象，使得两者的对比更加鲜明。以往小说所采用的说话人讲故事的写法，是不易取得这样的效果的。

《碎琴楼》用文言写成，其文字清丽流畅，富有抒情色彩。如第二十六章，写琼花知婚事难谐时写给云郎的信：“脱吾溘逝，云哥弗在者，归时何以酬我？吾尝登梅花而颠，云哥扶我。吾颠枝，第三枝也。吾苟死者，吾必附魂此枝。云哥来时，倘见彼梅枝，娇叶展展动颔，则是琼花向云哥展笑矣。”这样的至情文字，感人肺腑，时人称之为“善于捣碎读者的心肝”。人物对话，也很能毕肖说话人的口吻。

总之，《碎琴楼》所写的爱情故事哀怨感人，小说的艺术形式也多所创新，在近代小





说中属上乘之作。

三、主张婚姻自主的《孽冤镜》和《贾玉怨》

《孽冤镜》，吴双热作。吴双热（1884～1934），名光熊，一名恤，字渭渔，别署双热、一寒。江苏常熟人。曾任《民权报》《民权画报》主编，《小说丛报》《大同日报》编辑。著有小说《兰娘哀史》《断肠花》《快活夫妻》等。《孽冤镜》是其代表作。

《孽冤镜》共二十四章，最初发表在1912年《民权报》副刊上，与徐枕亚《玉梨魂》隔日连载，1914年2月，由民权出版部出版单行本。后来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

《孽冤镜》以王可青两次婚姻悲剧，向人们揭示了包办婚姻的野蛮、残忍。王可青是姑苏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贪图财富，为他娶了盐商的女儿高曼云为妻。曼云貌丑，又倚仗财势欺压丈夫，连公公也不放在眼里。幸亏她死得早，才使可青从劫难中解脱出来。到常熟游玩时，可青与一温婉美丽的贫家女子薛环娘相遇，他便如痴如迷地爱上了她；





环娘也慕可青才华，两人相爱并订了婚约。可青原以为他的父亲会接受上次的教训，不再包办他的婚事。不料，当父亲知道他缔婚于贫家女子时，仍坚决反对。并强行为他娶了某大官的侄女素云为妻。可青虽然痛苦异常，出于孝道，依从了父亲。素云貌美，但凶悍逾于曼云。她仗着娘家的权势，根本不把夫家放在眼里，“盛气如虹，哮声如虎”，还经常酗酒骂座，恶语侵人，弄得家中沸反盈天。可青经过两度刺激，精神一度失常。而环娘得知可青别娶，撞墙而死，其母也痛女身亡。后来，可青的父亲因儿子与媳妇失和，被亲家革去了官职，忧郁而死。此时，可青已无牵挂，到环娘的坟前自经殉情。

《孽冤镜》是一部创作态度严肃、思想性强的小说。作者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大声疾呼地提倡婚姻自由：“古往今来，佳人爱才子，才子爱佳人，如张琪之于双文，文君之于相如，闲情一束，佳话千秋。况晚近世欧风东渐，结婚竞尚自由。此风苟盛行，则爱情之交涉史上，当消灭几多罪案，亦当捐弃几多恨事。行见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自由





之美果，不甚圆满乎？”（第三章）小说还指出，在当时的社会上，婚姻自由却遇到重重阻力。而阻碍婚姻自由，制造爱情悲剧的不是大奸大恶，也不是冤家仇敌，而恰恰是自称爱子女的家长。这就使得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格外复杂，格外艰难。作品塑造了王可青之父这样一个专横跋扈的封建家长的形象。他不懂感情，只知攀附权贵。对于儿子的婚姻，他也只关心对方的门第、势力、财产。他第一次为儿子缔结的婚姻，就是一场权钱交易：他当时是两淮盐运使的幕宾，对方是善于钻营的盐商，盐商常常通过对他行贿以逃税。他贪慕盐商的钱；盐商要利用他的权。由此两家联姻，毫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心愿。诚如可青所云：“予喜，予父母不知也；予不喜，父母亦不顾也。以为婚姻之权，操诸父母，为人子者，不必与闻。”（第四章）儿子第一次婚姻以悲剧结束后，他一点也不接受教训，听说儿子与环娘订婚，关心的仍是：“其门第何如耶？其身家何如耶？富逾于予家耶？贵逾于方伯之犹之女（他为儿子选择的第二任妻子）耶？”听说环





娘家境贫寒时，竟勃然大怒，说：“不肖儿，荒谬甚，有父母在，乃敢自由结婚。甚且盲于目，忘身世，下偶贫贱，笑煞人矣，羞煞人矣。”“予为尔父，主权在我，主婚在我，自由耶，……休想。”（以上第十三章）强迫儿子解除了同环娘的婚约，娶了其上司的侄女素云。素云不仅欺压丈夫，也无视公婆，迫于上司的权势，他总是纵容媳妇，压制儿子。但是，尽管他在儿媳面前一再退让，还是不能取悦于儿媳，并因而被革了职，不仅给儿子造成终生的痛苦，自己也被活活气死。小说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劝告那些家长不要再干涉儿女的婚事。诚如作者在此书的《自序》中所说：“《孽冤镜》胡为乎作哉？予无他，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种种之痛苦，消释男女间种种之罪恶耳。”有人认为，“鸳蝴派”的小说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统治者，因而否定其作品的反封建倾向，这是没有道理的。诚然，包办婚姻的根本在于封建的思想观念，而观






念是要通过具体的人来体现的。如果说，封建专制政治是通过封建统治当局来体现的话；那么，封建婚姻制度则主要是由男女双方的家长来贯彻的。消灭包办婚姻的前提，就是改变家长们的观念。因此，《孽冤镜》的反封建倾向是相当鲜明的。

《孽冤镜》的构思颇为新颖。作品打破了以往小说全知全能的事方法，以作者吴双热自己的口吻叙其友人可青之事，显得真实、亲切。作者的主体精神明显增强。它不再是客观地向人们讲述故事，而明显地表现了干预现实的倾向。如：书中多处加了议论；而且讲述这个爱情悲剧时带有鲜明的爱憎感情，使得小说既有可读性，又富有思辨性。

《孽冤镜》也富有抒情色彩，徐枕亚谓其作者：“长于言情，必极其哀”。小说常在情节表述和环境描绘上着意烘托、渲染，以便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例如二十章写环娘接到可青的退婚书后撞墙而死的场景：

书既达，予可行矣。然欲暂缓须臾，留以覘其母女得书后之情状。堂与室仅隔一堵，





堵败矣，石粉削落，蜗篆纵横，墙根作苍黄色。予试属耳于垣，不闻人语。忽有声腾腾然，发于墙以内，败堵微震撼，疏泥朴簌附予肩，杂以一片惊呼声，曰：“环儿，环儿，”其声嘶且颤。予大惊，渠家无男子，予何可久留！遽疾趋出，归予舟。惊定，予伪为过客也者，再临薛氏之门，一侦发声后之现状。则见其门如市，人如堵，群围一泪面蓬头之小女子。予知有异，则亦立人后而观望焉。小女子面惨白，殆非含悲，受剧惊也。渠语于众曰：“予出门买药去，及归入室，忽见予表姊环娘，毙于墙下，面目浴血，一席地亦为之红。惊呼予卧病之阿姑不应，即之，头垂于床沿，以为呕吐也，嘻，一身冷却，盖亦死矣。”

作品没有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方法，正面描写环娘母女之死，而是通过捎书人所见所闻，间接地写这件事。断壁残垣，蜗篆纵横，极写环娘家的清苦，也创造了一种萧条冷落的气氛。墙内的撞击声及声嘶力竭的呼喊声令人心惊肉跳，且有一种不祥之感。如堵的人群，和惊魂未定的小女子的陈述，又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也更给这个故事蒙上了一种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呈现式的表现方法，不仅在传统的小说创作中不曾出现过，在同时代的小说作品中，也不多见。

《霞玉怨》的作者是李定夷。李定夷(1890~1963)，字健卿，一作健青，别署墨隐庐主。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后任《民权报》编辑。还创办《小说新报》《消闲钟》等。李定夷在反对封建思想方面不及吴双热那样坚决，他反对包办婚姻，提倡自由；但又惧怕自由损害社会风气，因而又提倡贞节观念。所著小说有宣传恋爱自由的《茜窗泪影》《千金骨》《鸳鸯潮》等，也有宣传贞节观念的《廿年苦节记》《玉洁冰清》等。《霞玉怨》是他的代表作。

《霞玉怨》共三十回，最初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1914年出单行本。后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

《霞玉怨》写的也是一桩婚姻悲剧。小说写上海学生刘绮斋和女校学生史霞卿自由恋爱，并未经家长认可缔结了婚约。后来，霞



卿之父调任江苏，霞卿也随父离开了上海。不幸生母病故，庶母钱氏与霞卿素不相得，对其百般迫害。先是伙同盗匪将霞卿劫去，幸而一盗匪良心发现，将霞卿救出。其后又将她许配市侩无赖杨某，霞卿坚不许，写信与绮斋诀别后悬梁自尽，遇救。绮斋向史家求婚，因家贫遭拒绝。不久，钱氏因与人通奸而遭横死，霞卿之父也有所觉悟，不仅答应了绮斋的求婚，还把小女儿碧箫许配绮斋在日本读书的弟弟绚斋。不料，绮斋收到弟弟病危的电报，火速赴日。途中覆舟，遇救回国。霞卿误以为绮斋遇难，一病身亡。绚斋也在日本病故。绮斋与碧箫，各自出家。这个爱情故事，有其时代特色。民国初年，社会上已认可了人权自由，但封建思想的残余仍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在学校里大谈自由学生，实际上仍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制约。《霞玉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小说所描写的因父母包办所造成的婚姻悲剧，也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

《霞玉怨》在提倡婚姻自由的同时又主张听从父母之命。认为：“人生婚姻，为毕生幸





福所寄，在理应父母之言是听，然亦可参以己意也。”（第四回）也就是说，对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本人只能参与意见。第二回还通过女主角霞卿之口说：“谓‘自由为天赋人权，无论何苦，父母尊长概勿得干涉之。若有干涉者，即为侵犯我之自由，我可仇视之也。’吁，是何言欤？自由真理，必本法律。自由在法律之中，固不容人之干涉；自由在法律之外，必戕害他人之自由，人人咸得而干涉之，何况父母尊长乎！不然，彼奸淫邪盗之徒，岂不曰吾亦行吾自由，则国家何必绳之以法律哉？”诚然，自由不等于放任，应当受到法律制约。然而此书在民国初年人们正在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时，就大谈对自由的限制；在人们尚未冲破包办婚姻的藩篱时，主张惟父母之言是听，显然不利于当时的反封建观念的斗争。作品把这个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个别人的恶德和偶然事件，也削弱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

《霞玉怨》沿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有对仗工整的回目。然章与章之间分界自然，没有“且听下回分解”的俗套。小说的语言





清丽，心理描写生动细腻。如第四回写绮斋与霞卿在愉园幽会：

荷浮水面，花开枝头，嫩葩含芳，娇艳欲滴。当此夏五时节，俯视仰瞰，咸足乐也，两人因就池旁凉亭而坐焉。霞卿睇视绮斋有顷，喟然曰：“吾曹萍水订交，距今两阅月矣，而前后相会仅三次。三次固不为疏，然自妹处之，疏灯夜寒，清簟昼永，不啻三秋一面矣。”绮斋曰：“相念之殷，仆宁不然？晨钟报晓，则心系女士之饮食；暮鼓告寝，则心系女士之安否？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无时或忘女士。蒲柳之质，行为女士憔悴尽矣。”霞卿曰：“妹亦殊不自解，一不晤君，即患岑寂耳。但愿并日并月，并日并时，使吾曹时相晤叙。”

这一段话，委婉细腻地刻划了两个初恋青年的心绪。奇妙的是，霞卿此时尚未意识到自己已坠入爱河，对于这种“萍水订交”不久便思永不分离的心态感到“不解”，并坦然地告诉了绮斋。待绮斋正式向她求爱，她才羞怯无比，“缄口不言”。这一方面表现了霞卿的天真无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品的





时代色彩；这不同于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两人都是学生，他们是在社交活动中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爱情。

《霞玉怨》的故事情节比较曲折，作者在描写这个爱情悲剧的同时插入了革命党人的斗争，写了惊险曲折的“射熊逢剑侠”，使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但个别情节给人一种过分的巧合之感。

四、“鸳鸯派”小说的代表作《玉梨魂》

徐枕亚的《玉梨魂》，是公认的“鸳鸯派”小说的代表作。以前，这部小说是众矢之的，今天应该重新加以审视。

徐枕亚（1889～1937），名觉，字枕亚，别署东海三郎、泣珠生、眉子等。江苏常熟人。南社社员。徐枕亚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祖父、父亲都是本乡饱学的名儒。在父亲的指点下，他10岁即能写诗词，16岁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于无锡西仓镇小学。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古典小说，并写了很多诗词，为他后来创作骈散相间的文言小说打下了基础。1912年，由其兄徐天啸





推荐，出任《民权报》编辑，并开始撰写《玉梨魂》。1912年，《玉梨魂》在《民权报》副刊连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后来，《民权报》因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被迫停刊，徐枕亚又出任中华书局的编辑、《小说丛报》的主编。1918年《小说丛报》停刊，他又创办清华书局，并发行《小说季报》《小说报》。后来，由于家庭屡遭变故，他心情郁闷，49岁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玉梨魂》是根据徐枕亚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一部小说。在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执教时，他曾和学生蔡如松之寡母陈佩芬相爱。蔡家是当地的名门大族，陈佩芬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枕亚特别喜欢蔡如松，对他进行悉心指导，陈佩芬对徐由感激变为爱慕。她和徐枕亚相爱后，自知婚事不能如愿，就把侄女蔡蕊珠许配徐枕亚，蔡蕊珠成为枕亚的原配夫人。事情的结局虽然不像小说写得那悲惨，但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悲剧，徐枕亚得到一个妻子，却失去了恋人。他一直不能忘情于佩芬，直到20年代，还把她的放大照片放在自己的卧室。1924年，《玉梨魂》被改编为电





影、戏剧上演的时候，陈佩芬已去世四年。徐枕亚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笔写了一首《情天劫后诗》：

……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
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我生常
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毕竟殉情浑说
谎，只今无以慰重泉。今朝都到眼前来，不
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
早成灰……^①

徐枕亚的一生，还有两次婚姻悲剧。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封建家长，专制暴戾，逼得他嫂嫂刘吟秋自经而死，又逼徐枕亚与蕊珠离婚。徐枕亚不忍遗弃蕊珠，离婚后又将蕊珠接到上海秘密同居，并于1923年生一子。蕊珠因心情抑郁，加上产后疏于调养而死。徐枕亚又一次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作《悼亡词》一百首。^②而清末的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刘沅颖，读了《悼亡词》后，慕枕亚的

^① 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四），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2页。

^② 郑逸梅：《艺海一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才华和深情，便和他书信来往，并非他不嫁。后来，她终于冲出了状元府邸，作了这位靠卖文为生的小说家的续弦夫人。然而不久之后便分居，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徐母的暴虐，也可能是徐枕亚受两次爱情悲剧的打击，开始颓废。总之，徐枕亚是性情中人，也是对封建礼教有切肤之痛的人。他的小说，大都是言情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抨击了封建家长的专横暴虐。

1. 《玉梨魂》对寡妇恋情的描写

《玉梨魂》是徐枕亚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

《玉梨魂》共三十章，故事情节相当简单：小学教师何梦霞，与年青寡妇白梨影倾心相爱。梨影自知婚事难谐，将小姑崔筠倩许配梦霞。梦霞不得已答应了亲事，但却不能移情于筠倩，梨影遂以死断其情根。筠倩亦因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痛苦郁闷而死。梦霞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以后，远离情场。他先往日本留学，后壮烈牺牲于武昌起义。





《玉梨魂》与一般言情小说的不同之处，是它触及到了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寡妇的爱情。我国自宋明理学盛行以后，女子“从一而终”观念的顽固性，远远超过婚姻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红楼梦》、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都表现了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爱情自由的进步倾向，但却无一能够突破“从一而终”的观念。不能克制七情六欲的寡妇，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淫妇荡娃的形象。《玉梨魂》第一次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未能遵从礼教的束缚而堕入爱河的寡妇，写她在爱情与礼教的矛盾冲突中苦苦挣扎，最后终于被礼教夺去了年青的生命。

《玉梨魂》的作者在描写这个爱情故事时，没有脱离具体的生活环境，也没有违背传统思想熏陶下人物性格的真实。他把主人公何梦霞、白梨影处理成带有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他们有丰富的天赋感情，强烈地追求爱情和幸福；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封建礼教的信奉者，对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不敢有丝毫的怀疑。这种追求爱情和恪守礼教





所导致的悲剧，深化了《玉梨魂》的社会意义。

小说中人物的双重性格，在白梨影的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白梨影是个美丽、聪慧、温婉善良的少妇的形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即使她温文尔雅，敏感多情；也在她的头脑中深深地印下了封建道德的烙印。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当小姑崔筠倩对她讲婚姻自主的道理时，她“顿触起身世之感，念曩者若得婚姻自由，今日或未必有此恶果，十年旧恨，蓦上心来，颜色忽然惨变。”（二十二章）显然，前夫并不是她自己选中的意中人。丈夫死后，她理所当然地走上那个时代为她规定的唯一的道路——守节抚孤。她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心如已枯之井”，而是：“独守空帏，自悲自吊，对镜而眉不开峰，抚枕而梦无来路。”深感“画眉窗下，鹦鹉无言，照影池边，鸳鸯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难堪。”（第五章）所以，当何梦霞闯进她的心中时，她明知这种爱情不仅毫无希望，而且还极有可能使她身败名裂，但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一开始，她是相当主动的：





她潜入梦霞的书房，拿走了他的诗稿，还故意把头上所簪之花遗落地上，好让梦霞知道是她所为。鹏郎捎来了梦霞向她表明心迹的信，她读后感到“且惊且喜，情语融心”。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一方面拒绝梦霞对她的爱，但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一片深情表达得至为真切。此后，她对梦霞关怀备至：梦霞寂寞时她赠兰花相慰；梦霞对她思念成疾，她竟偷偷送去了自己的西装小照。她甚至约梦霞夜深人静时到她的卧室幽会，两人对坐而泣；天将亮时，她又低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名：“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将梦霞送走。这些，都表明了你对爱情的强烈追求；自然，也是对礼教的大胆叛逆。作品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了白梨影的爱情：寡妇也是人，同样有青春的活力，同样有七情六欲，她们的生活中需要爱情。然而，作者也看到，这种爱情违背了女子“从一而终”的古训，在当时普遍被认为是道德的。因此，这种爱情一产生，连当事人自己也有了一种堕入魔障的罪孽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若有鬼魅现于前，虎





狼蹶其后，觉一起一坐，一举一动，皆有非常之危险。”梨影拿走梦霞的诗稿，梦霞初不察，追问僮仆，她吓得“寸肠辗转，如悬线然”，“脱泄之于阿翁，将奈之何？”梦霞的同事李某不怀好意地探查她与梦霞的关系时，她竟觉得“无法再腆颜人世”，差点自杀。即使自己将死，不得不把实情告诉筠倩时，也还是担心“妹将阅之而色变眦裂，尽泯其怜我爱我之心，而鄙我恨我。”可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对寡妇追求爱情的压力之大。而这种压力，又不仅仅是外在的，连当事人自己也认为是道德败坏。梨影就认为她和梦霞的这种爱“事太秽琐”，并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之污点”。她渴望爱情，情不自禁地发展和梦霞的爱情，又生怕自己堕落为“淫妇荡娃”，强迫自己用礼教来制止爱情。但是礼教在爱情面前却是那样无力，它越是禁止，爱情反倒越强烈，后来竟使得梨影“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颠倒而已。”直到最后，礼也没有能够止住情，被终止的反倒是梨影年青的生命。

小说的男主角何梦霞，是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多情才子的形象。他关心时局，忧心国





事，多愁善感而又怀才沦落。在愁苦孤寂之中，结识了同样愁苦孤寂的梨影。慕其才华，怜其遭遇，由怜生爱，一往情深。在礼教的重压下，他不顾惜自己的声誉、前程，大胆地和这个年青寡妇相爱，这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而且，这种爱绝无戏弄之意，也不是对美貌女子的占有欲，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知己之爱，富有现代色彩。当然，梦霞也未能超出时代的局限，他从未想过要与梨影结婚；甚至也同意梨影“发乎情、止乎礼”的主张。然而在他看来，“止乎礼”不是终止爱情，而是制止两个人的结合。只要他和梨影不结婚、不苟合，就是遵从了礼教。至于他们的爱情，是可以而且应该长期存在下去的。他爱的那样深，那样专注，又那样固执。无论梨影想用什么样的方法终止爱情，他都“抵死相缠，丝毫不容退让。”为了这种精神上的爱，他打算终身不娶。然而，封建礼教扼杀了梨影年青的生命，从而也扼杀了他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爱情。此后，他斩断情缘，投身革命后牺牲。小说让梦霞为革命献身的结局是牵强的，无论从人物性格看还是





从情节的发展看，梦霞都应该殉情。在梨影生前，他就一再表示：“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我愿殉卿而死。”殉国，只是作者为梦霞结束生命选择的一种较有光采的方式。

《玉梨魂》中还有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就是崔筠倩。她似乎比梨影幸福，走出家门，进了鹅湖女校，接受新式教育。她提倡婚姻自主，认为：“新学界中人，无不以婚姻自由，为人生第一吃紧事。此求彼允，出于两方面之单独行为，而父母不得掣其肘，媒妁不能鼓其舌。”（十三回）她还对梨影说：“家庭专制之黑狱中，不知埋歿煞几多巾幗。妹自入学以来，即发宏愿，欲提倡婚姻自由，革除家庭专制。以救此黑狱中无数可怜之女同胞。原非仅仅为一身计也。”（二十二章）可见，筠倩不仅提出了婚姻自主的主张，还准备以身作则，改变落后的社会风气。然而，她没有想到，民初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势力还很强大，她从学校里学来的那点自由思想，还不是封建观念的对手。梨影提起她与梦霞的婚事时，她开始是反对的。但当梨影劝以父老侄幼，需梦霞支撑门户时，她动摇





了。最后，出于对老父的孝，对家庭的责任感，她决定“牺牲一己之自由，而顾全此将危之大局”，与梦霞定了婚。筠倩与梦霞订婚时，虽因失去自由而苦闷，但并未真正认识到这桩婚事的悲剧性。她与梦霞曾有半面之识。觉得他“虽非宋玉、潘安，要亦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她全然不知道梦霞与梨影的一段公案，自己又是“一点芳心，尚无着处”之时，对婚后的爱情与幸福未必不抱希望。而当她知道梦霞爱的是梨影而不是她的时候，她才完全绝望了。而在这时，她的有关婚姻自由的理论，已完全派不上用场。因为在她看来，婚姻自由只能在订婚以前；而她与梦霞已经订婚，也就只得“从一而终”了。她只想一死了之，而且，即使是死，也要以梦霞亡妻自居。崔筠倩是包办婚姻的反抗者，又是妇女贞节观念的殉道者。

《玉梨魂》主要人物的双重性格，源于民初的社会思潮。民初新派人物对于婚姻爱情所持的主张，大都未超过改良旧道德的范畴。一方面，封建政体的垮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唤起了人性的觉醒，也唤起了对美好





爱情的追求；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的残余，又使他们害怕自由，担心婚姻自由会使男女关系混乱而影响世风，故此又主张以理节情，特别强调妇女“从一而终”的观念。《玉梨魂》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的思想。作者既赞扬白梨影、崔筠倩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又赞扬她们对封建礼教的遵从。

《玉梨魂》虽然既赞美“情”，又推崇“礼”，但却没有使两者统一、和谐，出现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那样的大团圆结局。而是真实地展现了情与礼的尖锐对立，展示了礼对情的扼杀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痛苦。由于作者亲自品味过美好爱情被毁灭的痛苦，所以他在描写情与礼的冲突时，把感情倾注到了情的方面。他把产生爱情的寡妇和与寡妇相爱的男子作为正面形象加以赞美；把破坏这种爱情的李某写成邪恶小人。作品又极力渲染这种爱情的温馨甜蜜，相比之下，封建说教显得苍白无力。确如美国学者佩里·林克所说：《玉梨魂》虽然一再对读者进行勿沉溺于爱情的警告，但却“几乎没有在青年读者中唤起任何对浪漫爱情的鉴戒。恰恰相反，





它却引起了读者对‘情’的更加迷恋。”从而“使得徐枕亚及其模仿者们所创作的同类作品源源涌现。”^① 因为，作者虽然没有对封建礼教进行正面批判，却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礼教怎样扭曲人的感情，毒害人的心灵，使本来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的人悲惨地死去。这在客观上控诉了封建礼教杀人的罪行。应该说，《玉梨魂》的主题是反封建的，在封建意识仍然强大的民初，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2. 《玉梨魂》的艺术特色

在艺术风格上，《玉梨魂》类似于现在的抒情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基本上没有构成外在的矛盾冲突，而重在展现情与理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交锋，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都比较出色。

《玉梨魂》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腻、生动，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如第四章写梨影从梦霞房中拿走诗稿，得知梦霞问僮仆谁到

^① 转引自刘扬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5页。





过他房中后的心理描写：“时梨娘方独坐纱窗，灯下出梦霞诗稿，曼声娇哦，骤聆此语，不觉失惊。盖梨娘知梦霞失稿，必将穷诘馆童，故遗花于地，裨知取者为我，必默而息矣；初不料其仍与僮哢哢也。但未知其曾以失稿事语之否？若僮知此事，以告秋儿，尚无妨也；脱泄之于阿翁者，将耐之何？我误矣！我误矣！我固以彼为解人也，今若此。梨娘因爱生恼，因恼生悔，因悔生惧，一刹那那间，脑海思潮，起落不定，寸肠辗转，如悬线然。”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切合梨影的身份和处境。作为一个年青寡妇，潜入梦霞房中取走诗稿，本身就是非礼的。梨影为情所使，顶着巨大的压力这样做了。她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凭她的直觉，认为梦霞是“解人”，见地上所遗之花，不会追问这件事。而一旦梦霞问起此事，她的惊恐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此时是她和梦霞的第一次交往，她对他还不够了解。设若梦霞不是她想象的那种人，这事足可使她身败名裂。这段描写深刻细腻，真切地展示了她欲爱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矛盾的心态，深化了主题，也使作品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

《玉梨魂》的语言也很具特色，全书以清丽典雅、骈散相间的文言写成。这种语言用于叙事不够生动活泼，但用于写景抒情却很富表现力。由于《玉梨魂》重在写人物内在感情的活动，选用这样的语言比较适合其内容的表达。如第五章梨影对梦霞述说身世：“梨影自念，生具几分颜色，略带一点慧根，正合薄命女儿之例。不致堕落风尘，为无主之落花飞絮，亦已幸矣。今也独守空帏，自悲自吊，对镜而眉不开峰，抚枕而梦无来路。画眉窗下，鹦鹉无言；照影池边，鸳鸯欺我。此中滋味，大是难堪。然低首一思，则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谴，免受堕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尚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颦卿，得一古今独一无二之情种贾宝玉，深怜痛惜，难解难分，而情意方酣，奸谋旋中，人归离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冢。泪帐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夙因如彼，结果如斯。梨影何人，敢嗟命薄！”这种语言特色，使作品典雅清新，富有抒情性。也是这部小说在民初得以广泛流传并引起了许多





作家效仿的原因。以四六句为小说，在以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玉梨魂》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作品中夹杂的封建说教，对其反封建主题有一定的损害。其次，小说为了突出何梦霞的多情，过分软化了他的性格，把他写成一个见花流泪、对月伤怀的泪包，甚至还把林黛玉的葬花、焚稿移到他身上。使这个人物显得矫情、造作。对何、白二人的爱情描写也过于缠绵：写诗写信都要流泪。情重之时，更得在痛哭之后继之以病。在“涕不可仰”时，必定还要“口占数绝”宣泄苦闷。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不过，从总体上看，《玉梨魂》仍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强的作品。不仅深受当时广大读者的喜爱，至今也仍有一定的影响。作品出版后，重印数十次，印数达几十万册，并远销香港、新加坡等地。创造了当时书籍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徐枕亚另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是《雪鸿泪史》。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以《何梦霞日记》为题，共十四章。1914年5月起，连载





于《小说丛报》第1~8期上。人物、情节和《玉梨魂》大体相同，说教则明显增多。这部小说，开了日记体小说的先河。

徐枕亚的其他小说，大都描写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余之妻》写父母为儿女择偶时只考虑财产，给儿女造成终生的痛苦。《双鬟记》写家长为儿女联姻不听当事人自己的愿意，而听任丫鬟的播弄，活活拆散一对恋人。《余归也晚》是作者家庭生活片段的记实，写作者的母亲专制残忍，逼死了他的嫂子。这些作品，都抨击了家庭专制给人造成的巨大痛苦。诚如作者在《余之妻》中说：“吾国婚制不良，多数男女宛转屈伏于老人专制权力之下，因心理之反动，演出种种悲剧，而夫妇之道苦。”应该说，这些小说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封建意义。

五、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小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过去，人们大都将曼殊视为“颓废派”，并把他的小说看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现在，人们又把曼殊看成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把





“鸳鸯派”视为反动、下流的一派，因而反对将他的小说和“鸳鸯派”小说联系到一起。客观地说，曼殊的小说和“鸳鸯派”小说在思想倾向上非常相似，但其创作旨意和艺术风格则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说来，“鸳鸯派”小说是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文化娱乐要求而作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是“为人的”，风格世俗；而曼殊的小说则是他深层心理图像的显影，是“为己的”，风格雅洁。这里我们姑且把苏曼殊的小说单列为一章，以示它和“鸳鸯派”小说的区别。

苏曼殊是“文坛奇才”，他的身世奇，性格奇，作品奇。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戡，后更名元瑛，字子谷，曼殊是他出家之后的法号，原籍广东香山（今珠海一带）人。曼殊的身世颇为坎坷。其父苏杰生，长期在日本经商，并娶日本女子河合仙为妾，而曼殊是他和河合仙之妹河合若子的私生子。后来，杰生限于子嗣，采取了留子去母的做法，使曼殊自幼便失去母爱。六岁随嫡母回广东的家中，由于既是混血儿，又是私生子，所以在家族





里备受父妾、婶婶等人的虐待。十五岁时留学日本，二十岁时参加了进步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当年回国，不久即在惠州出家。此后，他曾游览南洋诸佛教圣地，在长沙、南京、芜湖等地从事于教读生活，协助友人办报。1918年病逝于上海。

苏曼殊的身世颇具悲剧色彩，而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个悲剧时代，这扭曲了他的感情，形成了他性格上极为浓郁的悲剧基调，也使他的精神有些变态。他多愁善感，天真的像个孩童，不通人情世故，没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袁世凯称帝时，他以佛教界代表的身份发表讨袁宣言，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和尚”；但他也有很多时候是消沉的，远离政治的。他崇拜拜伦、雪莱，所交朋友也大都是新派人物；但他的思想和儒学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赞扬顽固守旧的辜鸿铭。^① 他是个“三戒俱足”之僧，却又“逐声色于红灯绿酒之间，穷嗜

^①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页。





欲于鸡片黄鱼之味”。总之，他不具有坚定信念的政治家、革命者；而是个有爱国心的、唯美的诗人、文学家。他的中文底子并不是很好，曾经向柳亚子、高天梅学习汉语，章太炎也常常对他的文字进行修改。然而，他的天分，他那“落叶寒蝉”般的身世，和他具有浓郁悲剧意味和浪漫色彩的个性，融汇交织，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思维方式，使他写起作品来往往出语惊人。柳亚子说过：“曼殊的思想，是没有系统，不很健全的。在文学和艺术上，却都有相当的天才，不可磨灭。”^① 苏曼殊的文学著述，有后人辑的《曼殊诗集》《曼殊画谱》《曼殊小说集》等。

1. 哀情小说——苏曼殊深层心理图像的显影

苏曼殊所创作的小说有六部。《断鸿零雁记》（1912年）《天涯红泪记》（1914年未完

^①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稿)《绛纱记》(1915年)《焚剑记》(1915年)《碎簪记》(1916年)《非梦记》(1917年)。另有翻译小说《惨世界》，不在本章的分析范围内。

《断鸿零雁记》是曼殊小说的代表作，它写在中国寄居的日本青年河合三郎和雪梅、静子的爱情悲剧。雪梅是三郎父母自幼为他聘定的未婚妻。三郎父亲去世后，家道衰落。雪梅的继母见利忘义，逼雪梅退婚。而三郎为消除雪梅对他的爱，削发为僧。雪梅对三郎忠贞不二，因继母逼她另嫁富家子，绝粒而死。静子则是三郎的姨表姐，三郎回到日本后，静子和他一见钟情。三郎的母亲、姨母也都赞同这门亲事。但三郎是个“三戒具足”之僧，不愿成亲，悄然离开了静子。其他几部小说也都是哀情小说。

曼殊的言情小说，有一个基本的艺术构架。尽管他五篇小说所写的人和事都不相同，但却常常出现相似的人物、意象和境界。换言之，他的小说有着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比如说，他五篇小说中的主角，都是性格忧郁、富有才华的男青年，这些人和他自己的





身世、性情都很相似。《断鸿零雁记》中的河合三郎，名字、身世都与曼殊相合，只是从了母姓。《绛纱记》中的两个男主角昙鸾和梦珠，也都是作者的化身，柳亚子曾撰文专门对此作过考证。^①《碎簪记》中庄垞的多愁善病，抑郁软弱很像曼殊；就连他生病时的“手心热度颇高”，也与曼殊贪吃引起的胃病症状相合。此外，《焚剑记》中独孤灿的狷介孤僻，《非梦记》中燕海琴的出家，都含有作者的影子。又如，这些小说，大都写一个男子和两个女子的遇合。《断鸿零雁记》中是河合三郎与静子、雪梅；《碎簪记》中是庄垞与灵芳、莲佩；《非梦记》中是燕海琴与薇香、凤娴；《焚剑记》中是独孤灿与阿兰、阿蕙。《绛纱记》写的是两对情侣：昙鸾与五姑；梦珠与秋云。但诚如柳亚子所云：“昙鸾、梦珠是一而二”，是曼殊“自己正反两方面的化身”（出处同上）。所以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再有，小说的结局都

^① 参看柳亚子《苏曼殊〈绛纱记〉之考证》，《苏曼殊研究》，第393页。





是悲剧。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有的是战乱，有的是包办婚姻。而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不是继母，就是婶母，间或也有姨母；却无一例是他们的亲生父母。这形成了曼殊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使读者一读就知道这是他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作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苏曼殊的哀情小说视为自传体小说，把他小说中的雪梅、静子等看作实有的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是：第一，曼殊是个颇具天分的诗人，却不是风流倜傥的佳公子。他的诗可以使一些女孩子为之倾倒；但他思想的不健全，他僧人的身份，使他很难成为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更不至于像他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每到一处，都会有美丽纯真的少女对他产生刻骨铭心的爱。第二，曼殊交友颇多，他又从不因为他僧人的身份在朋友面前隐瞒自己和女性的来往，反而以有情侣为荣。然而，他的朋友们，对他吃花酒时叫过的妓女知之甚详，却没有一个人见他有过情侣。第三，曼殊死后，柳亚子曾花了很大精力向他的家人和亲友调查他的身世；并针对《断鸿零雁





记》中所写的雪梅，询问家中是否自幼为他定过婚。而曼殊家族中的人，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煦亭、妹妹惠珊，表兄林紫垣等，都一口否定给曼殊订婚的事。煦亭还针对《断鸿零雁记》说：“雪梅有名无姓，且不详家世，其为乌有之谈，尤属显然。此实完全为小说家言。殆曼殊工愁多感，故造为哀感顽艳之词，以自抒写其郁抱耳。”^①这是可信的。第四，人们把《断鸿零雁记》视为自传体小说还有一个理由，即根据该书第一章最后的一句话：“此章为吾书发凡，均记实也。”其实，曼殊这里说的很明白：此书的“发凡”是记实；而不是说整部书所写的内容都是记实。该书的发凡，是写身为僧侣的河合中三郎对自己身世的困惑和对母亲的思念，一点也没有涉及爱情故事。曼殊不在全书的结尾，而在第一章的结尾写下这句话，可能正是怕人们产生上述的误解。由此，笔者推测，曼殊小说中的女性（也包括他诗歌中所指的那

^① 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位百助)，均非实有其人，是曼殊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心理期待虚构的。对此，周作人的分析很有道理：“我疑心老和尚始终只是患着单相思（自然，这也难免有点武断），他抱着一个永远的幻梦，见了百助、静子等活人的时候，硬把这个幻梦罩在她们身上，对着她们出神，觉得很愉快。并不想戳破纸窗讨个实在；所以他的恋爱总没有转到结婚问题上去，她们对他的情分到底如何，或是有没有，也都不可知。”^①

曼殊小说中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而他小说中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和他实际的生活领域又是那样的接近。由此，可以看出，曼殊小说中所写的，是他的潜意识，是他深层心理图像的显影。

文学创作中常有这要的现象：一个作家的某种际遇，往往影响着他一生的生活和创作。曼殊自幼被剥夺了母爱，又因私生子和混血儿的身份备受家族中人的虐待和世人的

^①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页。





白眼，一生都有失落、迷茫、被伤害的感觉，一生都渴望得到母爱。这扭曲了他的感情，摧残了他的精神，也形成了他文学艺术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歌，小说大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一种恋母情结。他的天分，他那“落叶哀蝉”般的身世，和他具有浓郁悲剧意味和浪漫色彩的个性，融会交织，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思维方式。使他写起作品来往往出语惊人，也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伤感情绪，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

曼殊的言情小说中，恋母情结表现得最鲜明的是他所作的第一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在曼殊看来，母爱是天下最真挚、最圣洁、最温馨的爱；儿女之情无法与之相比。所以，《断鸿零雁记》故事的主体是三郎和静子、雪梅的爱情悲剧；但作品对三郎母子亲情的描写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首先，作为爱情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发凡”，没有写爱情，却极写三郎对自己身世的困惑，和对母亲的刻骨思念：“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否，否。余自养父见背，虽茕茕一身，然常于风动树梢，零雨连绵，百静之





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顾声从何来，余心且不自明。恒结轡凝想耳。”这就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其次，整部小说的情节，也是以三郎东渡日本寻母为主线渐次展开的。而且，三郎寻到母亲后的欣喜之情又写得至为感人。其中写母子相见的场面，尤为扣人心弦。“甫推屏，即见吾母斑发垂垂，据榻而坐，以面迎余微笑。余心知慈母此笑，较之恸哭尤为酸辛万倍。余即趋前俯伏吾母膝下，口不能言，惟泪如潮涌，遽湿棉墩。此时但闻慈母咽声言曰：‘吾儿无恙，谢上苍垂悯！三郎，尔且拭泪面余。余此病几殆，年迈人固如风前之烛。今得见吾儿，吾病已觉霍然脱体，尔勿悲切。’”把母子悲喜交集的心情刻画得何等细腻，何等真切感人！而小说中对三郎与静子，三郎与雪梅的爱情描写，均未达到这样的境界。三郎虽然觉得静子是个“慧秀孤标”的“好女子”，但并未对她产生刻骨铭心、难分难解的爱情；而是时时以自己“三戒具足之僧”的身份抗拒她的爱。当他的母亲向他表示希望他娶静子为妻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思考自己是否要娶静子，而





是生怕自己的回答伤慈母之心。显然，他“终身不娶”的决心并没有因静子而动摇过。此后，他对亲事时而应允，时而推托，也全是因为怕母亲过于伤心；却一点也不考虑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对当事人静子会是怎样的伤害。小说中对雪梅的描写，则特别简略。书中并没有让她正式出场，没有写她的身世，也没有写她和三郎感情上的交流。读者所能读到的，只是一个由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故事的梗概。她在书中所起的最实际的作用，是资助三郎去日本寻母。总之，《断鸿零雁记》中母子亲情压倒了爱情，与其说是一部爱情小说，还不如说是三郎千里寻母记。

没有直接描写母爱的小说，字里行间也都凝聚着作者浓郁的恋母情结。小说中男女主角的亲生父母，对子女都慈爱有加，包办婚姻绝对与他们无涉。男女青年们之所以遭受不幸，是因为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庇护：这里面有被麦翁收养的五姑；有受奸人陷害，“无父母之庇”的秋云；有“少失覆荫”、“为宗妾所侮”的独孤灿；有身世犹如“落叶哀蝉”的梦珠；还有双方都相继失去了父母的





燕生与薇香……总之，小说中悲剧人物，没有一个是父母双全，享受着母爱和家庭温暖的人。显然，在曼殊的心目中，天下所有的不幸，无不和失去母爱这最大的不幸纽结在一起。有时候，连小说中描述爱情的用语也和母爱有关，如《绛纱记》写五姑和昙鸾失散后，她思念昙鸾“如婴儿念其母”。以母爱比附爱情，是不确当的。但这却是曼殊小说一个鲜明的特点。

母爱确实是一种伟大、圣洁的爱。我国又是最重亲情的国度之一。但还没有那一位小说家能把母爱写得像曼殊的小说那样真切感人。

曼殊的言情小说，也反映了曼殊内心深处对爱情的向往。曼殊是个“三戒具足”之僧，他不可能，也没有想过要娶妻子。但这并不等于他对女子毫不动情。他僧人的身份，和他不够健全的思维，使他对女子产生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感情，这在他的小说中也体现得非常鲜明。

曼殊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首先表现为对女性美的欣赏。作品中的女性，全都有清





秀的仪表和典雅的气质。《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清超拔俗”、“袅娜无伦”，雪梅也“静柔简淡，不同凡艳”。《焚剑记》中的阿兰“端丽修能”，且志趣高雅，“时轻舟容与于丹山碧水之间。”《碎簪记》中的灵芳和莲佩，也都“丰韵娉逸”、“仪态万方”。就连她们的装饰，也大都是“淡装雅服”。生活于新加坡的五姑，偶着男装，便受到作者的非议：“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妇人之服，亦亡其家。此虽西俗，甚不宜也。”（《绛纱记》）反映了曼殊对女性外在美的审视与评判。其次，小说中理想的女子，又富有才华，且与作者有共同的爱好。静子不仅能诗会画，博学多识，而且喜谈佛理，好涉猎梵章，这是和曼殊爱好最接近的一个。《非梦记》中的薇香，是老画师之女，擅长丹青。《碎簪记》中的灵芳与莲佩，一个长期游学于罗马；一个精通英、法文学。总之，她们与所爱的男子不仅仅是情侣，也是良师益友。表面上看来，曼殊对女性美的理解似乎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但是作者对女性美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别。他不是把她们看作供男人把





玩、占有的“天生尤物”；而是用近乎虔诚的态度，讴歌她们的美丽与圣洁。

曼殊的小说也反映了作者对爱情的期待。他笔下的女性，既多情，又贞静。多情，是对她们的意中人，即书中以曼殊自己为原型的男主角一往情深；贞静，是除了这个意中人之外，她们绝不会再爱上第二个人。在这些故事中，男子从不追求女子；总是美丽端庄的“好女子”主动爱上那个男青年，而且之死靡它。静子、五姑、秋云、阿兰，都与意中人一见钟情；雪梅、薇香，是奉尊长之命缔过婚或准备要缔婚的，带有“从一而终”的成分。最不可思议的是灵云和莲佩，两人都是受过文明教育的新女性，也都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爱情问题上应该会比较通达的。但灵云却爱上了从未见过面的庄湜，而且这种爱至死不变；莲佩明知庄湜不爱她，竟然也以自杀殉情。这样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倒更像是周作人说的，是“老和尚”的“单相思”，和“怀抱着一个永远的幻梦”。说明曼殊期望得到许多女孩子的、使他能够从中作出选择的爱情。这些小说在描写爱怀





有的甜蜜、缠绵时，还常常设置男子生病，女子侍病床前、关怀备至的情节。静子之于三郎，五姑之于晏鸾，灵云、莲佩之于庄湜，凤嫔之于燕生，都有过类似的表现。曼殊体弱多病，又大都是孤身独处。在他孤寂地卧病时，大概时常期望得到女性的抚慰和照顾，这种心理期待在小说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曼殊对女子贞静的要求，很容易使人认为是对宋明理学要求妇女“从一而终”观念的认同。他曾说过：“女子之行，唯贞与节。世有妄人，舍华夏贞专之德，而行夷女猜薄之习，向背速于反掌；犹学细腰，终饿死耳。”（《焚剑记》）。“吾国今日女子殆无贞操，犹之吾国殆无国体之可言。此亦由黄鱼学堂之害（苏俗称女子大足者曰‘黄鱼’）。女必贞，而后自由。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牵其臂，遂引斧自断其臂。今之女子何如？”（《绛纱记》）不能否认，曼殊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殊的这些话，也和当时社会上一些守旧人物反对妇女解放运动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但是联





系他的作品看这些话，又会觉得两者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宋明理学要求妇女“从一而终”，旨在取消妇女独立的人格，使她们死心塌地的成为男子的附庸；而曼殊笔下的女子，有专门的学问，有的还受过新式教育；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有“高亢无伦”的人格。她们的“贞专”，是对爱情的忠贞，而不是对封建礼教的恪守。其次，宋明理学只把贞节观念加在女子的身上，男子则可以三妻四妾，朝秦暮楚。而曼殊则要求男女双方都必须“贞专”。而且，从他小说的具体描写看，贞专观念对男子的考验更胜过女子。因为小说中大都是写两个女子爱上一个男子，对女子而言，没有其他人供她选择，无所谓贞专不贞专的问题。而一个男人面对两个女子的爱，两个女子都是男子理想的妇性，他也都爱她们。是坚持“心无二色”，还是见一个爱一个，就有一个贞专与否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曼殊总是让他笔下的男子作出艰难的选择，“一丝既定，万死不更”，坚持爱他先爱上的那个。因此，笼统地说，提倡贞节观念是守旧的；但像曼殊这样，要求男





女双方都对所爱的人忠贞不二，似也无可厚非。

曼殊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主要是他对女性美的欣赏，和对女性温馨爱抚的渴求。僧人的身份，尤其是他孩童般的纯真，使他还不能够理解正常的人的情欲。据马仲殊《曼殊大师轶事》记载：“曼殊得残，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至则对其所招之妓，瞪目凝视，曾无一言。食时，则又合十顶礼，毫不顾其座后尚有十七八妙龄女，人多为其不欢而散。越数日，复得钱，又问人以前之雏妓之名，意盖有恋恋者。人为引之其处，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态，终于不言而回。亚子谓其‘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① 所以，他写起小说来也便本能地规避爱情的归宿，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笔下的情侣结合在一起。诚然，形成曼殊小说爱情悲剧的原因，有的是继母或婶母的包办；有的是战乱；有的是佛教教规。然而，如果读者细心体察，

^① 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四），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第142页。





就不难发一现，最终决定爱情结局的，实际上还是作者的悲剧性格。例如：《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与静子，本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在日本，僧人可以娶妻。三郎完全可以像她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娶静子后在日本定居。然而，作者却让他们凄凄惨惨地分了手。更不可思议的是《焚剑记》中的独孤灿，他既与阿兰相爱；阿兰的祖父临终时又亲口许了亲事，不存在封建礼教阻碍的问题；而他本人非僧非道，也没有宗教教规的禁锢，他完全可以娶阿兰。然而，在战乱之中两人一起逃难，阿兰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她。直到阿兰死后，他才复又出现。作者含糊其辞地说他这样做是要为友人复仇，但是此前书中从未出现过那个友人，更未提及他有何仇隙要报。而他由一个羸弱多病，连走路都需要女孩儿扶持的书生，一变而为仗剑行侠的壮士，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显然是作者为制造爱情悲剧硬塞进去的情节，极不自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可见，他不会让有情人成为眷属，他也无法描写他无从体验的婚姻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作品只有当它把新的感觉带到人类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并认为，对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起着决定作用的，有这样三点：“（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少清晰。（3）艺术家真挚的程度如何。”^① 曼殊的言情小说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清晰地、真挚地传达了一种独特的、美好动人的情感。

2. 苏曼殊小说的艺术特色

曼殊小说，也和他的诗一样，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由于他所写的故事，和现实生活有相当的距离，是长期以来隐藏在他心中的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是经他反复酝酿、咀嚼，并按照自己的审美追求不断提炼、充实、加工改造。这使得他小说中所写的情，滤尽了一切世俗的渣滓，境界是那样地宁静、透明、高雅、圣洁。请看《焚剑记》中对独

^① 转引自张韧《小说世界探索录》，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孤灿和阿兰相遇的描写：

是时南境稍复鸡犬之音。生常行陂泽，忽见断山，叹其奇绝。蹑石傍上，乃红壁十里，青萼百仞，殆非人所至。生仰天而啸。久之，解衣觅虱，闻香郁然，顾之，乃一少女，亭亭似月也。女拜生，微笑而言曰：“公子俊迈不群，所从来无乃远乎？妾所居不遥，今稟祖父之命，请公子一尘游履。使祖父一睹清辉，蒙惠良深矣。”生似不措意，既又异之，覩其衣，固非无缝，且丝袜粉舄，若胡姬焉。女坚请，始从。生固羸疾，女为扶将，不觉行路之远。俄至木桥，过桥入一庐，长萝修竹，水石周流。女引至厅中。……

俄，少女为设食，细语生曰：“家中但有麦饭，阿姊手制，阿姊当来侍坐……”言犹未终，一女子环步从容，与生为礼。盼倩淑丽，生所未见。饭时，生窥视女。少女觉之，微哂曰：“公子莫观阿姊姿，使阿姊不安。”女以鞋尖移其妹之足，令勿妄言，亦误触生足，少女愈笑不止。时老人向生言他事，故老人不觉。

这哪里是凡俗儿女谈情说爱，简直是遇





仙！它对人物举止、心态的描绘，细腻、隽永，又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梦幻似的色彩。所写的情、景、人物、场面，仿佛是一幅优雅而娟秀的淡淡的水墨画，令人感到心旷神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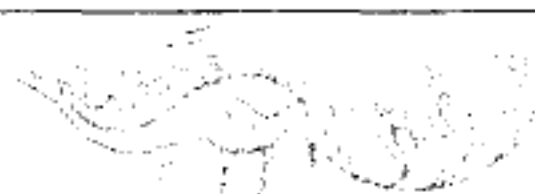
曼殊小说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也使他的小说作品打破了以往才子佳人小说那种传书递简、密约幽会的俗套，令人感到新颖别致。如《断鸿零雁记》写一僧人和两个美貌佳人若即若离的恋情，哀感顽艳，时人称之为“冶社会、哀情为一炉”，“于胭脂队里参禅”。小说问世后，很快被译为英文，并被编为剧本。演出时“观者数百人，颇闻鼓掌声。”^①

曼殊的小说也有明显的不足。王国维把作家分为主观和客观的两种，并认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② 笔者认为，主

^① 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四），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第66页。

^② 《人间词话》，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94页。





观之诗人，是指凭着灵感进行创作的诗人，他的创作，主要是靠其想象的丰富瑰奇，和对艺术客体的体悟能力。客观之诗人，就王国维自己举的例子看，是小说家。他们进行创作，则需要丰富和阅历，和对艺术客体的把握与剖析。曼殊一个人身上，体现了主观、客观两类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差别。爱情，原本就与曼殊无缘，也不是他生活中所关注的东西。他凭着对爱情的朦胧希望，凭着一时的灵感，写抒情诗是绰绰有余的；刻画人物，编排情节，就力不从心了。

客观地说，在表现爱情方面，曼殊的小说，和那些优秀的言情小说相比，有“隔”与“不隔”之分。小说中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悦，都停留在表层：似乎只要才情、仪表相当的人相见，便会生情。《碎簪记》中庄湜的叔叔甚至不敢让侄儿轻易见到女人：“以子天真诚笃，一经女子眼光所摄，万无获免。”他的小说，大都没有展示出双方感情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契合。写男女感情的表达的招数，通常是女子对生病的情侣的关心和抚慰，和爱情受阻之后的悲哀：“盖男女慕恋，憔悴哀





痛而外无可言。”（《碎簪记》）有时候，作者还让男主角说出一些外行话。如，《碎簪记》中的庄湜，面对两个容貌，才学不相上下的女子，说不清他对她们感情上的差异：“吾心爱灵芳，正如爱吾叔也。”而对于莲佩，“吾亦爱之如吾姊也。”《非梦记》写燕生爱情受挫：“心绪凄凉，甚至亡国。”硬是用两类大不相同的情思相比附，显得不伦不类。总之，曼殊的小说始终未能真切地写出正常男女间的自然爱欲。

其次，苏曼殊的小说情节芜杂，有的也经不起推敲。应该承认，曼殊的小说具有一种抒情的色彩，但这是由他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决定的；在他自己，则更注重小说情节的编排，试图以情节的惊险曲折取胜。由于他过分地强调小说的故事性，他的小说中经常故事之中套故事，显得芜杂。例如《焚剑记》写的主要是独孤灿与阿兰的爱情故事。但中间硬是不厌其详地讲述眉娘的故事，由眉娘的故事又引出一个老姬被逼为娼的故事，这些故事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它们的存在，不仅使作品内容杂乱，也冲淡了主要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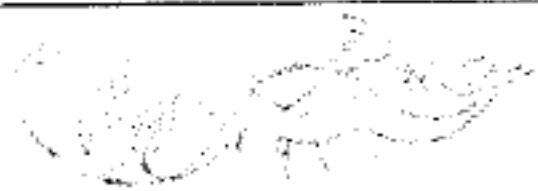




此外，《绛纱记》中插进霏玉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出的昙鸾的被监禁；《断鸿零雁记》第二十一回插进揭露官吏贪酷的《捐官竹枝词》，都属蛇足之笔。

由于作者阅历的不深，曼殊小说中的一部分情节也经不起推敲。如《碎簪记》开头，写庄湜的知心朋友与庄湜结伴游西湖时，遇一淡装女郎打听庄湜的住处。这位朋友竟以“天下女子，皆祸水也”为由，不仅不把庄湜的住所告诉女郎；也向庄隐瞒了女郎寻找他的事，使庄湜与灵芳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作者这样做是为了给故事造成悬念，但这样的情节却不合情理。再如，《焚剑记》写阿兰、眉娘逃难时，遇到军队以人肉为粮。这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但还可以说是曼殊有意揭露军队的凶狠。而村里的樵夫，也竟然从怀里掏出“五香人心”吃。普通百姓何以也会如此残忍？如果说是由于兵荒马乱，百姓们被逼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又怎么会吃得如此考究，要将人心烧成五香的？《绛纱记》写梦珠坐化后的情节更是离奇：“秋云步至其（指梦珠）前，默视无一语。忽见其襟间露绛





纱半角。秋云以手挽出，省览周环。已而，伏梦珠怀中抱之，流泪亲其面。余静立。忽微闻风声，而梦珠肉身忽化为灰，但有绛纱在秋云手中。秋云即以绛纱裹灰少许，藏于衣内。此时风续续而至，将灰吹散，惟余秋云与余二人于寺。秋云曰：‘归’，遂行。”这种描写，很像《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却难以碰到。显然，这都是曼殊小说的败笔。

郁达夫在评论苏曼殊各类作品时说道：“拢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这种评价是颇中肯綮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曼殊的小说，讴歌了人类美好的情感，在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对后来，甚至对今天的小说创作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在近代的言情小说中，苏曼殊的哀情小说仍应占有相当的地位。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一章

西方人体艺术在中国的
传播与中国人体艺术发展



风

化

图

史



11



一、中国裸体艺术的启蒙

在艺术界存在着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西方人体艺术传入中国社会以前，中国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体艺术呢？传统的观点认为：人体艺术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四千年轩辕衣裳而治”，没有创作和欣赏人体艺术的传统。随着研究的深入，借助考古学的新成果，人们发现上述看法是片面的。其实，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之中便有了颇具特色的人体艺术品。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和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发掘到的陶塑女像，都是人体美表现得特别鲜明的作品。进入奴隶社会。在商周墓葬中又出土了裸体的玉人、石



人和陶人。随后，在秦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岩画、甚至印章上，都有不同形式的人体表现。魏晋以后，随佛教艺术的传人，在甘肃敦煌、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等石窟中，出现飘逸的飞天，秀美的菩萨，雄壮的力士，无不闪烁出人体美的异彩。只是到了宋元以后，由于封建专制的强化，程朱理学的禁锢，正常的人体艺术才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禁欲主义高压的结果，只能造成“春宫画”的泛滥和人体艺术的没落。明代之后，人体艺术已被人诟病，世人皆不齿论及于此。

而当中国社会中人性扭曲、人体艺术无人敢问津的时候，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悄然从意大利兴起逐渐席卷整个欧洲。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以世俗的科学精神和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对立，宣传人文主义。这种思想的艺术表现，就是借用古希腊、古罗马优秀的人体艺术形式，在宗教题材的范围内，颂扬人的力量和价值。自古以来，西方便有人体艺术的优秀传统。从法国南部拉塞尔山洞里的女裸浮雕，到古希腊米隆的





《掷铁饼者》，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冲破禁欲主义的封锁，把人体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十五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画家波蒂切利的《春》、威尼斯画家乔尔乔内的《酣睡的维纳斯》，都以轻快、莹莹的色彩描绘人物，把美妙和富有诗意的大自然风景与非凡的人体美结合起来。著名画家提香在《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里，把柔和的风景和质感的肉体揉和在一起以表现出一种人类幸福和纯洁精神的高度融和。在这些艺术家之中，还有一位以表现“裸体人物之美”著称的杰出艺术家，他就是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他在一生中，创作了许多闻名于世的人体艺术作品，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有：《哀悼基督》（1498—1499），《大卫》（1501—1504），《垂死的奴隶》（1516—1519），《最后的审判》（1535—1541）。米开朗基罗赋予裸体人物一种战斗的情绪和夸张的、力士般的“巨人”风格，表现了人的崇高道德、坚强的意志，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精神。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体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体艺





术，逐渐的向古老的中国传播而去。

与西方资本主义变革同行，中国封建社会也达到无可比拟的“成熟期”。明朝是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代。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与封建理学的思想禁锢，窒息着人们的心灵。明末的“闭关政策”更隔绝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举国上下，无一人知晓西方的人体艺术。

明朝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始终处于“若明若暗”的状况。公元前4世纪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在印度的西北方建立了不少的希腊式小国。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佛教艺术中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犍陀罗派艺术逐步兴起。东汉以后，希腊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也间接进入中国社会。在新疆诸处发现的佛像雕刻中，约略可见具有希腊风格的犍陀罗式佛像，它们与希腊的阿波罗像极其相似。唐太宗贞观9年（635），大秦国人阿罗本协数人来华传播景教（即基督教）。为了布道的需要，一些传教士也偶尔把宣传基督教义的宗教画带到中国。唐朝末年，阿拉伯人伊宾瓦哈布在长安曾看见耶稣骑驴和诸门生回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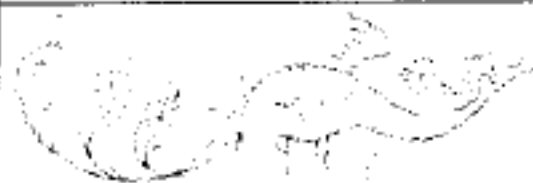




撒冷的宗教画。元朝时，意大利人孟高末诺来华传教。公元 1305 年，他在距皇宫不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教堂，特别绘制了 6 张以新旧约故事为题材的圣像。应该指出的是，宋元以前景教时兴时废，犹如浮萍。尽管教士时有东来，但他们并不被中国统治者所赏识，接受其教义的民众也很少。而且夹杂在蕃芜的宗教画的艺术成分，不是普通人能分清的，因此，也可以说西方艺术受阻于国门之外。

明朝万历九年（159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东来中国传教。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后，非常有趣地发现：对于中国，西方社会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特别提到：“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象是死的，而不象是活的”。在同中国人的交往中，他认识到：“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为此，他除钻研汉学，身着儒服外，还投其所好，给中国统治阶层带来了他们闻所未闻的钟表机械、天文仪器、地图书籍、油画雕像等等。明朝万历 28 年底（1601 年 1 月），利玛窦经过各





种努力，终于获准来到北京。他把自鸣钟、十字架耶稣像、圣母像、八音盒、玻璃三棱镜呈献进宫。这些连皇家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物品立刻引起了轰动。当明神宗朱翊钧看到被绑在十字架上的赤裸耶稣时，曾惊奇地说：“这才是活神仙。”皇太后看到圣母像时则感到不安，她害怕这些雕像的逼真神态，只好下令把它们收藏起来。据当时见过这些画的人记载：“画以铜版为楹，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楹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从利玛窦开始，西方的油画和雕塑被真正介绍到中国，西方的人体艺术也随之被带进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利玛窦出于“布道之需”所带来的宗教宣传品，尽管不是当时西方最好的艺术品，但对于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无疑也称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这些异国情调的艺术品唤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和追求，使中西两大艺术长河得以相交，进而走向融合。

进入清代，西方人体艺术品通过传教士、名国贡使和商人之手，更大量地“舶来”中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內有一架英国使节赠





给乾隆皇帝的座钟，上面便有以希腊神话为题标的人体画。其中有一幅描绘天帝宙斯爱上菲尼斯国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欧罗巴的故事。变为牡牛的宙斯，依偎在欧罗巴身旁。赤裸的欧罗巴正为牛套上花环。另外两幅则表现了爱神维纳斯的诞生，猎人阿克泰翁与狩猎女神狄安娜的故事。1903年5月，梁启超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参观时也曾看见过一块道光皇帝使用过的怀表。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记叙道：“内有文宋所用之表，云是俄罗斯皇帝所赠者，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两槩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不光是在这些钟表之上，来自欧美各国的鼻烟盒上也绘有古典题材的男女人体画，饰有裸体小天使。这些“舶来品”不仅在清宫流传，有些还传到官宦之家。接触这些洋玩意的人从不敢正视赤裸人物的“逼真神态”，到毫无顾忌地观赏玩味，这无疑是对那种视健美人体为“色情荒淫”，传统观念在这种攻势下逐渐崩塌。曹雪芹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曾艺术地再现了





西洋人体画对淑女闺秀的影响。在此书第五十二回有这样一个情节：晴雯害病，宝玉命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闻。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宝玉揭开盒盖，里面是一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长有肉翅，里面盛有真正的上等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却忘了嗅烟……正是借助这种物化的，广泛存在的钟表，鼻烟盒等媒介，附着在西方绘画和雕塑上的人体艺术似涓涓细流，缓缓地渗透进了古老中国的官宦阶层。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醒了闭关自守的国人。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走向世界。当他们远涉重洋，来到欧美时，西方的文明，尤其是西方的艺术无不在他们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些先行者的真切介绍，滤净了环绕在西方人体艺术品上的宗教迷雾、殖民气息和金钱臭味，使一般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人体艺术的精品，领略到人体美的真谛。

中国第一个旅欧游历团中有一位 19 岁的青年，名叫张德彝。1866 年，他随团出访欧洲大陆时，曾客观地记叙了沿途所见的西方





人体艺术品。在英国伦敦的水晶宫，他看到：“前后石人两行，有骑马者，斗兽者，多半赤身，男子露其阳，女子牝凿一花覆之”。在瑞典国都斯得哥尔摩的一处画廊里他看到，“亦有赤身石像，或坐或卧，形容甚异。并男女阴处，伸缩开闭，咸露于外，皆泰西古时故事”。在比利时京城布鲁塞尔“有西国所称天主耶稣之像，见耶稣四肢钉于十字架上，瞑而受死。……又一画轴上有赤身人二，一男一女，或云即盘古第一人，男名曰亚当，女曰夏娃，又曰厄袜”。1871年，张德彝再次随清廷大臣崇厚出使法国。在参观英国伦敦万国博览会后，他曾在当天的日记中专门提到了西方人体艺术。其中写道：“画人若只身之男女，虽赤身裸体，官不之禁，谓足资考究故也。故石人、铁人、铜人各像，亦有裸体卧立蹲伏者。男女并重此艺。妇女欲画赤身之人，则囊笔往摹，详睇拈毫，以期毕肖。至男子描摹妇女之际，辄招一纤腰袅体之妓，令其褰衣横陈，对之着笔，亦期以无微不肖也”。张德彝是最早在国内正面介绍西方人体艺术的中国人。他在游记中客观地介绍了西





方人体艺术的内容、种类，着重介绍了人体模特儿写生的方法，特别强调了西方人“并重此艺”，目的在于“以期毕肖”，“足资考究”。

1876年，湖北江宁人李圭，受荐前往参加庆祝美国成立100周年大典。1877年，他归国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一书，特别提到人体艺术与“不雅”的区别。他指出：“所绘士女，又以着衣冠者易，赤体者难。盖赤体则皮肉筋骨，肥瘦隐显，在在皆须着意，无丝毫藏拙处。雕刻石像，铸造铜像亦然。此为绘画镂刻家精进工夫，非故作裸体以示不雅观也。”李圭与张德彝一样，已经认识到裸体写生在训练造型能力上的重要作用，并开始改变禁锢人们心灵多年的禁欲主义审美观。清朝末年，有位妇女叫单士厘。于1899年曾跟随丈夫钱恂出使欧洲，归来后著有《归潜记》一书。她在这本书中谈到了观赏“裸体雕画”前后的心理变化：“予昔年初出国境，见裸体雕画，心窃怪之。即观劳贡（注：拉奥孔）之像，读辩论劳贡之书，于是知学者著作，非可妄非也。”接着，她深刻研





究了劳贡所成之雕像：“凡所雕刻，筋肉脉落，无纤毫不肖，而主客之位，运动之方，配合调和，允称杰作。”

面对西方精美的人体杰作，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人体艺术缘何衰落的问题。1904年，康有为游历欧洲时参观了意大利罗马博物院。他在游记中写道：“此院陈列皆白石雕像，皆希腊罗马旧物，自天神、名王、贤士、哲女皆备，凡千数。毛发骨肉如生，筋脉摇注。希腊、罗马古以雕刻名大地，今观之，信不虚传也。其像纯为赤体，盖非此则筋脉不见，而精巧不出，亦其时男女之界不严之故也。今男女入观者，扞娑忘形焉。中国刻像不精，以廉耻甚重，难作裸体故也。凡义有所偏重者，即有所短失。无可如何矣”。康有为盛赞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非常肯定地指出：没有人体的赤裸表现，便会“筋脉不见”“精巧不出”。他中肯地谈到：“廉耻”观念是禁锢中国人体表现，导致刻像不精的根本原因。当然，做为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不能，也不可能去对封建理学彻底批判，因而也就不可能逾越“廉耻”防线去呼





唤中国自己的人体艺术。他只能用“凡义有所偏重”，来解释中西艺术的差距，发出“无可如何”的哀叹！

总的说来，清朝末年，西方文明的各种信息被反射回古老的中国。人体艺术品已非昔日的“禁品”和只供皇家赏玩的“洋玩意”，而是成海外见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部份接触了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则更深入地考察了西方的人体艺术，开始思索中国人体艺术不振的原因。尽管他们还无力改变长期以来在人体艺术上形成的固有偏见，但他们客观的审美感受和严肃的思考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本世纪初年，伴随着留学生运动的兴起，一些有志于艺术的青年学生前往欧美和日本，直接研究西方的人体艺术。他们从头开始，写过“临摹名系统的学习并掌握了西画的构图、用彩等手法。

中国第一位专门学习西洋画的留学生是李叔同先生。1906年9月，他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从留学法国的日本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油画。程清在《丙午日本游记》10月13





日记载：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种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即李叔同），一名曾延年。所画以人面模型遥列几上，诸生环绕分画其各面”。据叶圣陶先生回忆：“我国对人体模特儿写生，大概是李叔同先生最早。他在日本的时候画过一幅极大的裸女油画。”1910年，李叔同学成归国，积极投身艺术教育和宣传事业中去。1912年，他到浙江第一师范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时，曾专门布置了两个图画教室，从日本购置了许多石膏模型，让学生进行写生练习。1913年，他还在《白阳》杂志上专门发表了《石膏模型用法》一文，阐明了石膏模型写生的意义和具体的作法。李叔同的行动在当时国内的美术教育界无疑是一个创举。

与此同时，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4年3月，他为西洋画科三年级的学生首次安排了人体模特儿的写生课。当时寻找模特儿十分困难，最后找到了一个15岁的小孩，名叫和尚，才勉强解决了问题。1917年，上海美专在张园





举行习作展览会，陈列人体素描习作，竟引起轩然大波。接着几年，上海美专都因陈列人体素描和油画，雇用女模特儿，引起封建守旧势力的种种非议。1926年，刘海粟又因捍卫人体写生的正当权益，与直系军阀孙传芳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当时，驻防上海的孙传芳曾写信给刘海粟，道貌岸然地说道：“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事，唯中国则重礼教，四千年轩辕衣裳而治，概以裸裎袒裼为鄙野。”要求上海美专停止人体写生。这些行为引来有识之士一片谴责之声，刘海粟和师生们也坚决抵制。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讽刺道：“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说到中国人体艺术的先行者，徐悲鸿大师就不可不提，悲鸿自幼酷爱绘画，1919年赴法留学，曾广泛深入地钻研了国内外的美术技法和理论，为创作具有中国气派的人体艺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很有见地的指出：人体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有机体。随着人体的运动，其造型产生极其微妙的变化。





人体的色彩也最难掌握，对培养辨别力很有好处。为此，他画了大量的素描、油画和国画，展示出东方人体的魅力。其中比较典型的作品有《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当时，徐悲鸿正应邀在印度国际大学讲学。他在这幅6平方米的巨幅国画里，以真实的模特儿为依据，描绘了一排顶天立地、正在“叩石击壤”的赤裸男子。通过他们健壮有力的身躯，展示出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刚毅精神。他在谈到这幅画时曾经说过：“画人体的肌肉、筋骨的活力很有感人的效用。无论是英雄豪杰或舟子农夫，因为靠着那几根骨头和肌肉的活动，方有饭可吃，有酒可饮，有生可用，有国可立。”

正是在李叔同、刘海粟、徐悲鸿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的勇敢开拓下，源于远古的人体艺术长河，绕过宋代以后的重重险关，重新翻腾起新的浪花。中国人体艺术能在近代复兴，无疑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蓬勃兴起的人体艺术浪潮的冲击有关。西方人体艺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利玛窦东来算起，其间经历了舶来中国、宫廷流行、走向民间三个





阶段，大约经历了三个多世纪。西方人体艺术民族化的进程则起于清朝末年，中国人游学欧美之后，距今约一百余年。中西文化艺术的融合为中国人体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才使得黑暗的道路现出一点希望的光亮。

二、民国时期裸体艺术的厄运

在中国古代，女子裸体、性和贞节之间是划上等号的，女子裸体由此意义上讲是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传说中的孟姜女在后花园洗澡被万喜良偶然看到了，就只能嫁给他了，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性观念。史载，五代有个寡妇伴丈夫的灵柩回乡，途中因旅店主人不许住宿而发生争执，被店主牵了一下手臂，就说这手臂被人污了而自斫之。元朝有个妇女乳部长疮，必须延医医治，但因当时的医生均为男子，这女子说：“此疫宁死不可让男子见。”拒绝延医，竟因此而死。历代许多女子因病而延医，都要“隔帐诊治”。可见，古代把女子的肌肤看得是多么神秘。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物画比西方落





后，主要因为中国不使用裸体模特儿，以致画家对人的肌肤很难画得形似神似。还有人认为，明代大画家唐寅的春宫画面得绝妙，是因为他请情人做他的裸体模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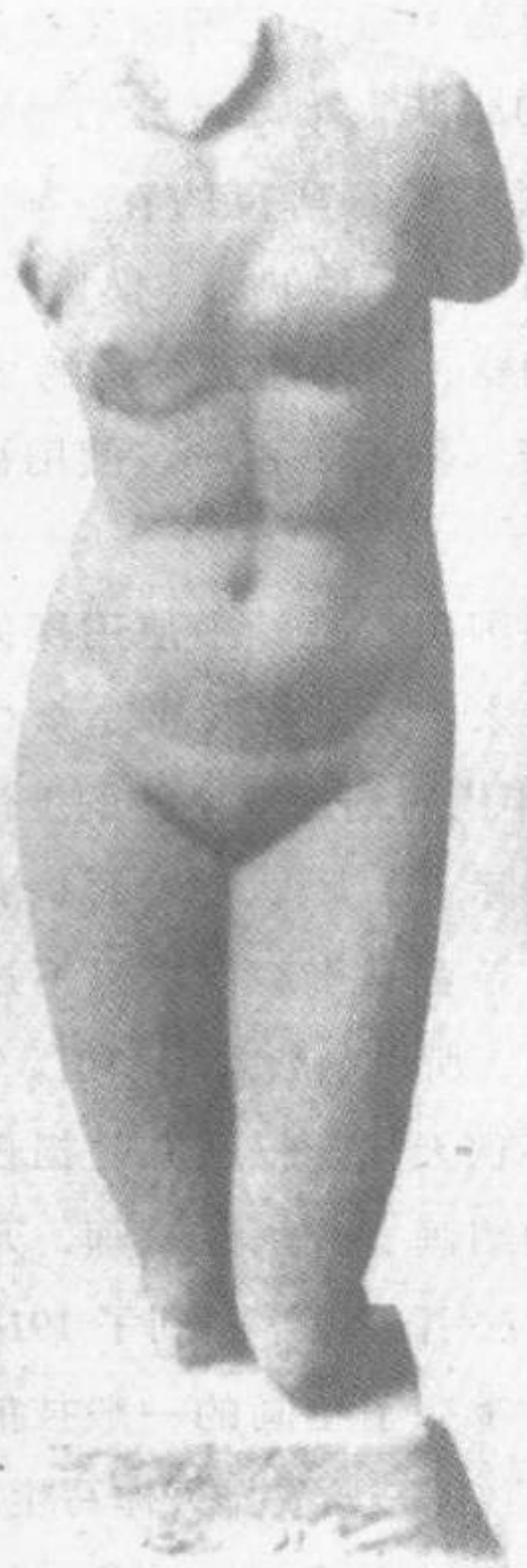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到中国的 20 世纪，具体表现为美术院校是否应该使用裸体模特儿之争。

有关中国美术教学中使用裸体模特儿一事，长期以来，美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是始于 20 年代初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实际上，最早使用的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倡导者是李叔同。只不过当时都是男性模特儿，所以一般人不知道。

1912 年秋天，李叔同应聘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课教师，开始将西洋画法和作曲法引进教学。到了 1914 年秋，学生们已初步掌握了绘画的一般技能，按照教学进度，李叔同开始安排人体写生课。

到了人体写生课这天，学生们早早地进了教室，静静地等候着。李叔同进入教室，点过名后说：“……我现在郑重地告诉诸位，为了正规地科学地学习绘画基本功，更准确地





《人体》（1930）无头与臂，颇似出土的古罗马维纳斯残像。女人体丰满而不臃肿，体态优雅而不失庄重，结构清晰，线条简洁流畅，具浓郁的古典风格，或就是仿古之作。



说，为了掌握人体结构，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室里进行裸体写生！这在我们中国是破天荒第一遭，具有历史意义！现在请大家等一下，我去把模特儿领来。”

不大会儿，李叔同从隔壁房间领来了一位 40 来岁的男子。只见他身上披着一条薄棉被，有些羞涩地站到方桌上。然后，望了望李叔同，犹豫地揭下了棉被。一个肌肉发达的身躯裸露在学生们面前……

在中国，男子即使全裸，和传统观念、习俗和冲突是不大的，许多渔民常常全裸体，长江三峡的民夫拉纤时也是全裸体。可是，女子裸体可就完全不同了，即纵只是裸露上身也是不行的。在中国，最早使用女性裸体模特儿从而和封建卫道士发生尖锐冲突的是刘海粟。

刘海粟是我国 20 世纪的国画大师。早在本世纪初，他在上海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提倡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写实手法，想按照西方美术教学的经验，对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设置人体模特儿的实习课。可是，那时的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很强，不要说女模特儿，连男模特儿也难找。许多人认为这是





《宫女》在画法上显然受西画影响，色彩忧郁，具有装饰味道。

“海淫海盗”之举；还有人认为，光着身子让人画，会失元丢精。刘海粟多次招聘均告失败。直到1920年夏，学校才起用了第一个女性裸体模特儿，是一个流亡上海的白俄女子，这件事开了风气之先，再加上“五四”运动的影响，雇用模特儿就逐步开展了。此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神州女校美术科以及其他美术研究所等，也有了人体模特儿。



《沉思》(石膏, 1943, 高 170 厘米) 表现了一裸体青年男子站立沉思的样子。他非常年轻, 侧低着头; 右肘倚胯, 以手支颐; 左臂自然下垂, 右胯上提, 左腿前右腿后, 呈丁字形站立。身体呈优美的反“S”形曲线。人物造型具有一种理想美的倾向, 面容俊美, 肌肉发达, 体魁健壮, 全身透出青春的活力与阳刚之气。

朱自清在他的游记中赞美了西方人士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身体：

柏林市内市外常看见运动员的男人女人。女人大概都光着脚亮着胳膊，雄赳赳地走着，可是并不和男人一样。她们不像巴黎女人的苗条，也不像伦敦女人的拘谨，却是自然得好。有人说她们太粗，可是有股劲儿。司勃



《裸女》以极为简练、流畅的线条勾画出一裸体女子形象。人物比例准确，色彩柔和，背景光线的效果显然受西画影响。但又具有一种独特的东方之美。线条流畅圆润，设色简淡、清润，刻画出一个温柔、深情、娴静的女子形象。



来河横贯柏林市，河上有不少划船的人。往往一男一女对坐着，男的只穿着游泳衣，也许赤着膊只穿短裤子。看的人绝不奇怪而且有喝彩的。曾亲见一个女大学生指着这样划着船的人说，“美啊！”赞美身体，赞美运动，已成了他们的道德。

他又写道：

再进一步，便是所谓“自然运动”。大家索性不要那劳什子衣服，那才真是自然生活了。这有一定地方，当然不会随处见着。但书籍杂志是容易买到的。也有这种电影。那些人运动的姿势很好看，很柔软，有点儿像太极拳。在长天大海的背景上来这一套，确是美的，和谐的。日前报上说德国当局要取缔他们，看来未免有些多事。

至于林语堂，当别人告诉他裸体主义现在已经很流行时，他坦然地说：

“让它来吧！它不见得会损失什么。我自始也便是一个不自觉的裸体主义者。”

梁实秋则说：

“在某些情形之下裸体运动是有其必要的，洗澡即其一也。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在





一个适当的地方，即使洗濯之余观赏一下原来属于自己的肉体，亦无伤大雅。若说赤身裸体便是邪恶，那么衣冠禽兽又好在哪儿？”

至于徐志摩则说得更坦率了，他说：

你倒有点羡慕，对不对？不怪你，人总是人。不瞒你说，我学画画原来的动机也就是这点子对人体秘密的好奇。……美的分配在人体上是极神秘的一个现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论男女，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体美也是这样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头发，有的手，有的脚踝，那不可理解的骨格、筋肉、肌肤的会合，形成各各不同的线条，色调的变化，皮面的胀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态，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烦细心体会发现去，上帝没有这样便宜你的事情，他决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绝对美，如果有，我们所有艺术的努力就没有了意义；……

他对中国这方面的保守是非常不满的，他十分感慨地说：

“人体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幸生长在中国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





与后部看不出多大分别的世界里，实在是太蒙昧无知，太不开眼。”

他又说：

人体美，这门学问，这门神气，我们不幸生长在东方，谁有机会研究享受过来？”

当时的一些美术大师们都一致同意与支持运用人体模特儿的美术教学。例如徐悲鸿学成回国后就说，复兴中国艺术的重要途径是“以人为本，尽量以人的活动为题材”。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以人体模特作为一种美术教学手段得到了普遍认可，在一些美术展览会上裸体作品也有少量出现。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矛盾与冲突又发生了。1964年兴起了“四清”、“社教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有些人认为人体模特儿的美术教学是“资产阶级教学方法”，提倡这种教学方法的人是“学院派”，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展了对这个问题的大辩论，以后这种学术讨论又变成“政治思想大批判”，人体模特儿教学被列为“罪状”之一。





这件事一直闹到了中央。还好，当时的中央对这件事倒没有是感作新的诠释。

三、刘海粟的人体模特观

二十年代，围绕着裸体模特儿问题的一场斗争，是艺术教育领域代表新思潮的新兴力量，向社会的封建礼教势力的宣战。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它具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新兴力量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刘海粟是前上海美专的创办人，在这场斗争中，他始终站在前列。这里记述的斗争经过，为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为了在美术教学和美术创作中使用人体模特儿问题，在旧社会里，刘海粟受尽辱骂，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的社会，愈是奸淫邪恶，愈是高唱敦风化俗；愈是男盗女娼，愈是满口仁义道德。这种虚伪冥顽的习尚，抗拒一切新思想的传播，束缚学术的进步活动。在二十年代，围绕着模特儿问题的一场斗争，是艺术和礼教的冲突，也是一场尖锐的反封建的斗争。





1914年3月，上海美专（当时叫图画美术学院）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依学程的规定，有人体模特儿的写生实习。那时候，不但女子模特儿没有找处，就是男子也不肯来做。先找到一个小孩子，这孩子名叫和尚，年十五岁，初来时猜疑不定，日子一长，也就安定了。这是中国美术学校充当人体模特儿的第一人。

到了八月，学生们一直练习童体写生，逐渐感到不满足了，因为绘画和雕塑方面，不用男女老少人体模特儿是不行的，于是设法请壮年人来做。但是，当时的习俗和迷信，认为给人画了去，会减少精神，损伤元气，甚至有人说：“把灵魂画去了，会死的”，所以都不肯来尝试。后来有一个校工，愿充模特儿，但只肯裸半身。刘海粟想先裸半身，日子长了，也许一经习惯，全裸或无问题。不料这个人始终不肯全裸，甚至认为全裸，迹近侮辱。学校方面为解决教学迫需，不得不提高待遇，多方招致，来的人倒不少，起初无不勇气百倍，可是一入画室，都咋舌而奔。连续二十余人，都是如此，不管你怎么





么劝说教导，都是一点用没有。因此，刘海粟故意对最后一人讲好条件，如果临阵逃跑，便要受罚。那人满怀信心，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不会逃跑。”刘海粟满以为这下可解决了，岂料他一进画室，就喃喃地说：“我情愿受罚！”“我情愿受罚！”刘海粟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情愿受罚呢？”

他说：“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实在办不到！”

“你身上有毛病吗？”刘海粟又问。

“没有毛病。”

“既然没有毛病，为什么不肯露体呢？”

“实在太难为情了。”

“人人都是身体，衣服是为了保护身体而穿的，并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不可被人看见而穿衣报。你好好地事情不干，为什么情愿受罚呢？你仔细考虑一下看。”

这个人听了刘海粟的这番话，思索了一会，便慢吞吞地把衣服卸去，露出了紧张的肌肉。

1917年，上海美专举行成绩展览会，有几个陈列室陈列人体习作素描，参观的人无





不感到惊讶，并迷惑不解，但又隐忍着没有责难。有一天，某女校校长，同了他的夫人、小姐来参观，听说这位校长也能画几笔中国画的，可是他一看到人体素描，惊骇不能自持，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蠹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太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到了第二天，他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丧心病狂败坏风化之展览会》，投之《时报》，想激动大家的攻讦。又到江苏省教育会告诉沈恩孚先生，请上书省教育厅下令禁止，以敦风化。可是《时报》和省教育会都置之不理。他怒不可遏，以为世道日非，净言不彰。这是有关模特儿斗争的第一回合。

1919年8月，刘海粟同几位画友，在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开展览会，也陈列了人体油画。当时报纸舆论斥为狂妄，菲薄不足道；还有许多人直接写信来谩骂。有一位海关监督来看到了，以有伤风化，请工部局查禁。工部局派了几个洋人来，看了以后，要求刘海粟撤去几张人体画，正好展览会要闭幕了。这是画模特儿第二次被公开认为是反动的。

到了1920年7月，学校设法雇用女模特





儿，最初雇用的是一个俄国人，后来就连续雇用女模特了。此后北京美专、上海神州女校美术科及其他美术研究所等，也有了人体模特儿。社会上对于人体模特儿也似乎稍稍了解，没有人出来反对。不料至1924年，学生饶桂举在江西南昌举行绘画展览会，陈列了几张人体素描，江西警察厅勒令禁闭。其禁令有谓：“裸体画系学校诱雇穷汉苦妇，勒逼赤身裸体（名为人体模特儿），供男女学生写真者。在学校方面，则忍心害理，有乖人道；在模特儿方面，则含苦忍羞，实逼甚此；在社会方面，则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为尤甚。……不谓上海美专画妖刘海粟、江小鹑辈孽徒，新近毕业回赣之饶桂举者，以初出校门，默默无名，急欲献技自炫，……青年学生，兴致勃勃，群以睹裸体画为快。”并指责饶桂举竟“公然提倡淫风，言之痛心。”于是“通令各区署队，一律查禁。”

刘海粟接到了饶桂举这个告急的电报，认为这种盲目的禁令，非饶君个人之被诬，也非南昌一地的艺术遭到摧残，其影响所及，于新艺术之发展，大有阻碍；而且轻薄的人，





将以此为口实。于是分别写了二封信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黄郛及江西督军蔡成勋，请撤消禁令。并援举欧西各国艺术学校实习人体模特儿的例证，与人体研究在美术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加以说明。并力斥江西省教育会韩志贤之狂妄。且于各报发表。

黄郛见了这信，非常同情，即咨江西省当局，撤消原令。谁料到上海有一帮无业流氓，利用这机会，拍摄娼妓裸体照片，叫做“模特儿”，招徕贩卖；无耻画工，描写春画，也叫做“模特儿”，四处兜售。报纸的广告，连篇满幅都是出卖模特儿照片。甚至电影戏院开幕前，映几张裸体画，也叫做模特儿。淆乱黑白，诈骗金钱。于是，封建的卫道士们便有了攻讦的借口：“这是刘海粟倡导的，这是艺术叛徒的功绩。”把这一切罪恶，都放在刘海粟头上。

1925年8月24日，江苏省教育会开会，大会上通过了禁止模特儿的提案。刘海粟当时在北京看到了报道，非常气愤，但又不知个中详情，于是马上写了一封信去问：

“……前见报载贵会本届大会，有禁止模





特儿之提议，通过在案。鄙人未见提案之详细说明，辞义含糊，大惑不解。夫人体模特儿之为物，艺术家在习作时期为必须之辅助，盖欲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此借鉴。以致各国美术学校以及美术研究院中，靡不设置人体模特儿，以为艺术教育上不可或缺者也。凡曾稍读艺术书报者，闻模特儿其名，必联想及与科学上之化验器具，同一作用，事极泛常，当无惊奇之足言。返顾吾国，今日浅见者流，滔滔皆是，借礼教为名，行伪道其实，偶闻裸体等名词，一若洪水猛兽，往往惊讶咋舌，莫可名状；是犹曾闻日月经天，而未闻哥白尼之地动说，可悯孰甚。

“当民国初元，鄙人创开美专，首置模特儿，开宗明义，亦既宣之；而世人不察，目为大逆，讥笑怒骂，百喙众集。鄙人为学术尊严计，不惜唇焦舌烂，再四辩白，有识君子，欣焉有得，可谓世有是非，窃自庆幸。诎于曩年，江西警厅有查禁裸体画之事，官命皇皇不可终日。其禁令中误解艺术，荒谬绝伦，辱骂鄙人，无所不用其极。鄙人本不





愿与此辈作无谓之争辩，第念真理弗扬，以讹传讹，其有害也，伊于何底。辄详述美术之真价，与模特儿之必要，致函教育部与江西省教育会，又见当时各报，有心之士，当能忆之。今不图贵会，亦有是种类同之动议，此鄙人之所以大惑不解者也。虽然，凡事创业艰而流弊易，鄙人首倡模特儿，光明正大，而一般无赖市侩，托其美名，以之裨贩。若今日上海所发现之裸体妓女照片，及恶劣画报等，实为害群之马，自宜严禁，毋得宽宥。然贵会议辞弗谨严，未分黑白，将遣世人以惶惑无措，是非不辨。兹本君子慎思明辨之义，请贵会明白其辞，修正前议，布之天下，曷胜感禱之至。”

这封信，同时在《时事新报》发表出来。

过了几天，便得到了江苏省教育会的复信，大意说因为报上的标题为“本会请禁模特儿”而有所误会，其实他们所请禁的，并不是美术学校用的模特儿，而是严禁无赖市侩，托其美名之裸体画，和刘海粟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将他们当时的议案抄录下来寄给了刘海粟。刘海粟看了非常高兴，辞中所





谓请禁者，系风行的裸体画，不是模特儿。这封信发表以后，得到两种不同的反映。

有不少人对刘海粟表示同情，其中一位叫做王一之的写信给他说：

“今日读报，载我公以模特儿问题，规谏省教育会之鸿文。顽固派浅见陋俗，妨碍艺术之进步，颇觉可怜可叹！我国女界，不思为根本的补救，实行禁娼，或设女警，以挽俗世颓风，专做表面文章，尤觉可怪。以鄙人见闻所及，世界各国女子之扶持风化，培养道德，增进人群幸福者，其道正多，从未闻于美术界必需之模特儿有所警议。试问印度女子之长幔遮头，阿拉伯女子、土耳其女子之白纱障面，为道德乎？抑野蛮乎？西方之学，均重实际，是以从模特儿入手之人物画，不至有头重脚轻，四肢不相配，不合学理之种种缺憾。我国人，向不注重体育，而女子为尤甚。只知面部之美；不顾全体之美！若无从模特儿入手为艺术品，使社会人群得此借鉴，进而为体育之修养，则令多数男女，沉沦于内地黑暗风气之中，永无猛省之一日矣。为道德乎？抑为野蛮乎？天下事，有利





必有弊，权衡轻重，求其利多而弊少者行之，识时之俊杰也。因少数荡妇之行为，归罪于学术之试验之模特儿；因些微之弊，而忘实在之利益者，因噎而废食也。触感及此，拉杂举陈，中国艺术光明之路，尚赖明哲之奋斗焉……”

而另一方面正好相反，封建顽固派气焰嚣张，大肆反对，有位市议员叫姜怀素的，竟砌词呈请当局，严禁模特儿，严惩刘海粟，这篇文章，当时在申、新两报上同时发表。我们从他的妙文，就可以看出这些伪善者的狰狞面目。

“……近年来裸体之画，沿途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要皆神似其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堕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列为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某某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无量。乃见本年九月八日《时事新报》教育栏载上





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为模特儿致省教育会书，巧言惑听，大放厥词，自承为首置模特儿之人。原函辩白理由，大致谓：‘模特儿之为物，盖欲审察人体之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此借鉴也’云云。窃以美术范围至广，何必专重于裸体画，更何必以妙年之少女为模特儿：美专非医专，人体构造与生动历程，与‘美术’二字有何切要关系？精神之体相，又何必假镜于裸体？况男女同体，美专为何不以男子为模特儿？毋论裸体画不过一种物质上影像，即使神似而致生动，亦不过一个裸体之少女耳。究于青年之学有何益？充其极，足以丧失本性之羞耻，引起肉欲之冲动。语云：‘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又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反是，则必为矫情之人。今刘海粟提倡模特儿，则女校亦可以男体为活动范本，忘形若此，尚复成何体统、成何世界、成何人类？言念及兹，不胜慨叹。今为正本清源之计，欲维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





俑祸首之上海美专学校校长刘海粟。今执途人而询以裸体画有益于世乎？则十九必疾首蹙额而答曰：此画败坏风俗。盖人民视神体画为害，甚于洪水猛兽也。素仰执政钧长，关坏风化，体念民情，愿祈查禁，严惩祸首，以维风化，而敦末俗。……”

刘海粟看了这篇文章，感到在这样环境之下，刘海粟不能不负起责任，来和这封建顽固派作正面的斗争，不能任他们胡说八道，淆乱听闻。就针对姜怀素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

“9月26日《新闻报》《申报》载有上海闸北市议员姜怀素者呈段执政、章教长、郑省长文，请禁裸体画。窥其词意，全为上海美专及鄙人而发，谬妄百出，不容缄默。兹先条驳一二，惟明达之士衡察之。姜君之言曰：近来裸体画，沿途兜售，或系摄影，或系摹绘，……云云。敝校科系凡七：曰中国画、曰西洋画、曰工艺画案、曰雕塑、曰音乐、曰图画音乐、曰图画手工。从无模特儿科，亦未有遣人沿途兜售裸体之事。惟西洋画系人体实习，则置模特儿，此系各国国立





私立美术学校皆有之，何独敝校。姜君出言无稽，大类梦呓。

“又曰：‘某某耳闻目见，正深骇怪’者，是未尝读书、未尝行远，坐井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姜君所见之小也。目中有妓，心中无妓，姜君不自检省，妄责无辜，陋矣丑矣。又曰美专非医专，人体构造，生动历程，与美术二字有何切要关系？精神体相，何必假镜于裸体云云。画者生机，寓神于似。不察人体构造，恶言似？不明生动历程，恶言神？裸体，天真也，精神体相，犹言天真烂漫。取资裸体者，此所以求其学理，合乎天则。学术公器，研究人体，岂但许医专而不许美专哉？姜君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显而不知其隐，愚莫甚焉！”

“又曰美术范围至广，何必专重裸体画，更何必以妙年少女为模特儿，何不以男子为模特儿云云。敝校所设科系，列举于上，未尝专重模特儿，亦不以妙年为原则，更不以女子为原则。凡合乎学理上之揣摩者，不问老少男女，并皆善焉。”

“又曰今刘海粟提倡模特儿，即为矫情之





举，倘男生可以女体为模特儿，即女校亦可以男体为模特儿云云。姜君昧于事理，比拟不伦，此所谓不足与朝菌语晦朔，不足与螻蛄语春秋也。又曰今为正本清源计，欲维持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即尤宜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云云。夫沪埠风化之恶，鄙人疾之深，未尝后于姜君也。无赖市儈制作妓女裸体照片及淫画，诲淫以牟利，鄙人疾之深，亦未尝后于姜君也。兹上者，于上海美专何尤？于鄙人何尤？姜君不察，以市儈行为，强纳于艺术尊严之轨而并行，黑白不辨，是非荡然，是乌可不辨者哉。……”

刘海粟将他的原文一一驳斥以后，更加上一段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鄙人提倡艺术上模特儿之志不能夺，姜君指为祸首，欲请治以罪者，鄙人无敢辞。可指曾参为杀人，可治苏格拉底为死罪，何独不可以刘海粟为祸首。一时之是非可泯，万世之公论维何，末世披猖，通人不作，滔





滔末流，纳清泉于浊壑，口仁义而心淫秽。传曰：衷莫大于心死，呜呼！姜君，盍休乎言。”一段，表示他的决心和态度。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姜怀素是不敢作声了。可是接着便收到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刘海粟驳姜怀素的文章发表前寄出的。朱葆三是上海最大的买办、是巨商，是当时所谓上海“缙绅”，他在上海的势力很大，上海租界从前有一条马路就叫朱葆三路，可以想见他的势力以及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他不但勾结国内的封建势力军阀和恶霸，还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实际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今天他好象一片菩萨心肠，写了一封同样荒谬的信来“劝导”刘海粟，而且是近乎流氓威胁口吻的。信的大意谓：

“……上海风俗之淫靡，青年子女，濡耳染目，即无人为之引导，已难遏止其欲念。乃观近日风行美术裸体画片，无不争相购买，血气未定者，尤易堕落，影响之大，何可胜言。推原祸首，实上海美专创行裸体画之作俑也。





“先生为美专校长，美术之范围至广，山水花鸟，仕女风景，均可引起美术之兴会，何必定以模特儿曲线美名词导人于邪。先生纵有柳下惠之操守，不为身色所动，彼青年子女，能有此操守乎！？当此人欲横流时代，提倡礼教，修养廉耻，犹虑不及，再以此种画片，蛊惑青年，势将不可救药矣。

“如谓欧西风俗不以裸体为耻，我中国乃礼教之邦，先生亦中国人士中之佼佼者，必欲以夷狄之恶风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是诚何心哉！

“《时报》载有先生致省教育会书，公然大放厥词，自诩为首创模特儿之功；教育何事，学校何地，先生非艺术叛徒，乃名教叛逆也！马路上雉妓逐客，尚在昏夜，先生顾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人摩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也。人而禽兽之不若矣。”

最后，便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想利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来向刘海粟威胁，加重语气地说：“本社主张正俗，呈部有案，对于社会风化，有维持之责。历请华洋官厅严禁





淫画春册，从违与否，是在足下，但本社发言纠正，并请随时见复，以定进行之步骤，惟先生察之……”

刘海粟读完信后，随即写了一封信复他。那封信的首段，从姜怀素的无知，信口雌黄，但“年少轻举，厥状可怜，今不图德高望重如执事，亦如此幼稚，深堪浩叹”谈起并将驳斥姜怀素的文章，抄了一份给他，请他自己去考虑。接着便抓住他说刘海粟欲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一点，加以抨击。大意如下：

“……至执事谓鄙人欲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诚如执事言，则欧美美术学校之设置模特儿，胥为腐风触俗之器，彼邦宁无明达之士如执事者，展抒崇议，以矫其非乎？呜呼！居今日而尊中国为礼教之邦，鄙欧美为夷狄，闭门造车，坐井自豪，虽三尺童子亦耻之。执事固当世群称为绅士者也，而出言不择，宁不腾笑彼邦，遗国人无穷之羞耶！时流鹦鹉学舌，徒获欧美皮毛，摭国故而不究，舍本逐末，鄙人所深疾；迂儒拾古人糟粕，尊王攘夷，以自欺欺人，亦





鄙人所深疾。稍审历史递变，稍察世界大势者，靡不知欧美学艺，精粹之处，无让中土。吾国深造力追，犹足截长补短，非可以夷狄二字轻之也。

其次刘海粟针对着他的威胁，进一步指同他头上瞧不起西方艺术，行动上却是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

“……艺术上之模特儿，既与中国礼教截然二事，……执事言贵社呈部有案，历清华洋官厅，严禁淫画春册，用意辛勤，良佩良佩。欲请禁敝校艺学上之模特儿，则敝校亦呈部有案，历届办理情形，呈报无遗。不但敝校然也，各国立美专，亦有是项模特儿之设置。执事请禁之道多矣，无谓华洋官厅不足以显其威。欲请洋官厅严申禁令，则英法国立私立美术学校设置模特儿，较中国为先，较中国为盛，执事可请英法当局先禁本国学校，再及于租界之中国学校，如谓中国政府与英法政府，有提倡模特儿之嫌疑，执事更进一步，可请国际法庭惩治之。执事阳鄙欧美为夷狄，阴实效忠于洋官厅，前后矛盾，判若两人，是何存心？是何存心？”





最后刘海粟和姜怀素的信一样，表明自己的态度说：“鄙人提倡艺学之志不能夺。实言之，不因执事以华洋官厅炫众，而易鄙人之初衷。鄙人身许艺学，本良知良能，独行其是，谗言毁谤，无所顾惜。执事名鄙人为艺术叛徒固善，名鄙人为名教叛徒亦善也。真理如经天日月，亘万古而长明，容有晦冥，亦一时之暂耳！鄙人无所畏焉！今之违执事劝告者，执事实自违真理，强鄙人不得不重违执事也，惟执事明察之。执事所定进行步骤，究为何者？此种迹近恫吓之辞，而出诸执事之口，窃为执事惜也。丈夫有为，光明磊落，敢乞明布，愿安承教，虽赴汤蹈火，鄙人无辞，谨拭目以待命。……”

这封信写出之后，朱葆三连屁也不敢放了。可是各小报上，围绕模特儿问题大做文章，对刘海粟极尽污蔑之能事，有的简直是下流的谩骂，这种短文，多不胜数，现在选录一篇，以示一斑。这是一位所谓丹翁写的：《与刘海粟先生论模特儿》的短文：

古今美术家皆美人乎？我不敢知也，然美术家之修容术，必优越于不知美术者，此





断然矣。《小时报》前载海先生《记雇用活人模特儿之经过》，盖几经曲折甘苦而后成；先生之热心教育，诚不可及。司空表圣《诗品》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易》曰：‘近取诸身’。或先生喜画而不喜诗；以占卜为迷信，而不读《易》；故有此纷扰耳。不佞耳闻先生大名久矣！惜于先生未识荆州，于先生之尊夫人，更未尝作一度刘桢之平视，惟信先生之裸体美，其曲线之妙，必甚于情愿罚钱者万倍。凡新画家，画裸体妇女最美者，几与其匹偶之美，成一正比例，相观相摩，出于不觉也。先生既有审美之脑力目力，尊夫人之为天人可知也。先生而不热心教育，不欲振兴中国之艺术，斯亦已矣，如非然者，先生又何妨以身为学人之模范耶？前清肃王初立警厅，巡警皆出自学校，乃颁布警政之日，皆不肯盘辫执棒以立通衢，与情愿罚钱之模特儿不肯脱裤同。肃王乃身着警服，鹤立东西牌楼下三时许，至换班时，而服警者不可胜用矣。剃发之待诏，贱业也，其徒试刀，必先于其师。私坊猥褻之事，是曰请吃鸭者，亦其师也。美术家之学术，固非贱业





者之所敢希，亦岂满清顽固之名王所敢望哉。使海先生舍身而先为模特儿。他日传先生之业以教人者，必皆肯自为模特儿者也，何难之有？夫同此圆颅方趾，含生负性之人，受民政统治，已破除贵贱阶级，即如不佞稍受教育，亦知视同胸为平等，必谓人可以为模特儿，而我不可以为模特儿，是贵我而贱人也；是以人为土芥倡优，而以我为美术家也。海先生绝不出此。且受金钱迫压之村姑而为模特儿，或恐执事诸弟子于艺术外，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若以师母为模特儿，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有不尽心于艺术者乎？模特儿既属学校用品，校长以身兼之，学费之外，自应另取代价，诸弟子所得之标本，已视村姑侗父为优美矣。其有意乎？其有意乎！”

虽然顽固的封建堡垒，现出这样穷凶极恶的样子，真理在人间，随便他们怎样的巧辩与污蔑，不但没有淹没人体模特儿的真义，两三个月后，也就平静下来，刘海粟想应该没有什么新麻烦了，谁知封建堡垒们还有新的更卑鄙更无耻的行为在后面，因而引起更尖锐的斗争呢！





1926年4月15日的清晨，学校许多人在杭州西湖写生，刘海粟正葛岭初阳台写日出。忽而有几个学生奔跑得气喘吁吁来对他说：“刘先生，那军阀们又来禁止模特儿了，而且还要封闭美专哩！你看这张报！”说着就把报纸递给了他。

“上海县长危道丰严禁美专裸体画”，用大号字标题，刊印着危道丰的命令。刘海粟看了十分气愤。原来姜怀素因为去年没有出着气，这次危道丰新任上海县长，他便又想发动，4月5日《申报》上就曾发表过姜怀素呈危道丰请禁裸体画的呈文，其中自然含沙射影，破坏美专，刘海粟当时已写了文章驳斥。谁知现在危道丰竟来发布禁令了。这时许多学生都围拢来了，大家都现出紧张惶惑的样子，刘海粟于是搁了画笔站起来，立在初阳台面对围拢来的二三十位同学说：“你们安心学习，一切自有我负责”，并且简单地告诉他们关于模特儿所引起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处在这样黑暗而落后的时代里，为了提倡学术上的真理，而遭到如许的挫折，真是太让人痛心了。





从葛岭收拾了画具，回到寓所，刘海粟觉身体不大舒服，到了晚上寒热大作，在病榻上将这事告诉了王济远先生，请他在西湖负责指导学生继续作画，自己决定于明早回上海与军阀们展开斗争。

第二天的清早，他就搭了沪杭快车，匆匆忙忙回到了上海。那时他的身体已十分疲乏，因为精神过度的奋激，一点也不想休息，立刻请了美专的李毅士、滕固、俞寄凡等几位先生来商量应付对策。他们见刘海粟身体不适，热度很高，都劝他稍作静养，慢慢说。但是在那样紧张的环境里，实在是不容他有一分钟休息的可能。他们花了大约半点钟时间，商讨了对策，并清他们回校作安定师生情绪工作。等他们都走开了，刘海粟还是不想休息，提起笔就写了一封痛斥危道丰的信，这封信写了好几个钟头，他的头感觉疼痛得非常厉害，眼睛也烧得红透。将近七点半时，文章也写完了，于是将稿子并附了一封信，送给申报馆史量才先生，请他大胆地给我发表出来。那时精疲力竭，实在无法支持，刘海粟终于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了。





一夜之后，刘海粟周身好象在燃烧一般，眼睛红得不能睁开，一切东西都不能看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送进了上海疗养院。只好躺在床上，来等待这一事变的发展。

4月17日，这封信在《申报》上发表出来了，这是引起各界非常注意而互相传说着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标题为：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内容除了针对危道丰的指令布告及对美术学校设人体实习课加以申述外，并引欧西各国有关裸体模特儿的例证，加以补充说明。最后就事实严厉地指出：“该议员（姜怀素）信口雌黄，轻言妄动，已属不堪造就，不可教训！而从该知事之地位言之，忘其身处中外观瞻所系之上海，出言无稽，谬妄不伦，腾笑万邦，莫此为甚！此辈不学之徒，狼狈厕议席，面见颜为邑宰，其贻害地方，遏绝真理，罪不容赦！即乞迅予将该议员姜怀素，该知事危道丰，严加申诉，以儆谬妄，而彰真理。……”

事有凑巧，正当这封信发表的那天下午五点钟，孙传芳从南京到杭州去检阅什么军队，经过上海。当时上海的大小官员以及士





绅巨贾，都拥上花车，上去迎驾。不多时，那位上海县长危道丰拿出这张报纸给他看，孙传芳一面抽着雪茄，一面问道：“什么叫做模特儿？”危道丰回答：“就是赤屁股的姑娘！”孙传芳接着便问：“刘海粟是怎样一个人呢？”危道丰加重语气地说：“是借着模特儿骗钱的人。”这时在旁边的一位沈恩孚老先生却忍不住了，不禁放起胆量说：“刘海粟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著名的学者，至少是很认真研究学术的人。而且模特儿是……”

话还未说完，危道丰就气愤愤地立起来摔纱帽了。

“联师！上海的事，我不能干下去了，请另简贤能罢！刚接任两星期，正在厉行整顿风化，刘海粟竟然大胆站出来辱骂，肆无忌惮地侮辱了长官，这是不能不严惩的！”言下怒气未息，面孔涨得通红。孙传芳就说：“那末你去办理好了！”

这样一来，在座的如丁文江、沈恩孚诸先生都变了色。因为那时孙传芳以武力控制了苏、浙、皖、赣、闽五省，称为五省联军统帅，他是无所顾忌，要怎样干就怎样干。





危道丰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是他的亲信，所以在孙传芳部下是有特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沈两位先生下了车，就急忙地赶到美专，请李毅士、滕固等将刘海粟从郊外上海疗养院移至学校居住，这时候他还是热度很高。

大约五天以后，刘海粟的病才渐渐好了。他要了一份报，翻开一看，发现登着几行《刘海粟启事》，大致说前因一时之愤，开罪了危道丰，含有道歉的意思。刘海粟看了气得大叫：“我的朋友，这样是丧失了我的人格！我抗议……。”

到了第二天——5月12日，刘海粟坚持要回家，家属和朋友商量的结果，仍旧要他在学校里暂住几天，因为白云观的家里不安全，怕这班军阀走狗的非法迫害。全校的学生都为着艺术的前途而发愁。严肃、寂静、悲痛，就是上海美专当天的气氛。针对这样低沉的情绪，他立即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七百多人都聚在狭小的那个会场里，刘海粟万感交集，大声对同学们说：

“我拥护艺术，坚持真理！决不为威武所





屈！我反抗！我反抗！！他们是绝对不了解艺术的伟大意义的，他们是庸人。裸体模特儿，是学美术的基本功，不用不行……。”

全场肃静，默无声，后来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骂声。整个会场都沉浸在悲愤激昂的气氛中了。

那天晚上，刘海粟写了一个声明，送到申报馆去，大意是说他为艺术、为真理而斗争，任何牺牲都不惜。近几天都在病中，某日的启事，绝对不能承认。

刘海粟的声明发表了以后，不久又接到了孙传芳的一封信：

“海粟先生文席：展诵来书，备承雅意，骫骳过情，抚循渐荷。贵校研精美术称颂泰西古艺，原本洞晰，如数家珍，甚佩博达。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道家天地为庐，尚见笑于儒者。礼教赖此仅存，正不得议前贤为拘泥。凡事当以适国性为本，不必徇人舍己，依样葫芦。东西各国达者，亦必不以保存衣冠礼教为非是。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





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能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复顿日祉。孙传芳启。6月3日。”（此信原载于1926年6月10日上海《新闻报》。）

据说这封信是孙传芳从杭州回到南京以后，听了许多人的陈说，才改变了调子，但目的是一样的。依他自己的预测或一般人的推想，在他当日的地位下，用这种方法来婉劝，当然是俯首听命，自动撤消模特儿的应用。当时刘海粟接到这封信时，有许多朋友也劝他，顺水推舟应该给他个面子。但是刘海粟的斗争，并不是和他们争意气，更不是争个人的利益，为的是学术真理而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封建斗争。所以便毅然复了孙传芳一封信。根据民国十一年政府颁布新学制的规定，说明艺术专门学校列人体模特儿





为绘画实习之必需课程，并指出“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并进一步劝导他，因为他一个人而废止学术，变更学制，这种事是不可作的。立言虽然极为婉转，可是态度却是鲜明和坚决的。

孙传芳接到这信，恼羞成怒，变本加厉来对刘海粟进行迫害。至此，与危道丰的冲突进而演变到直接与孙传芳的斗争了。孙传芳在盛怒之下，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同时密电上海交涉员许秋马风及领事团，交涉封闭上海美专和拘拿刘海粟到案。

危道丰得令之下，当然起劲极了，希图雪其私忿，每天向法国领事馆催促。法领事便派了一位探长程子卿同西探长石维也及巡捕等到美专来找刘海粟。因为总司令部天天有电报来叫我们抓人并封闭学校；总领事的意思，以为这种情形决不能随便抓人，对刘先生，应该负责保护。石维也说：“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出去，我们才可以负保护责任”。

从这天起，程子卿每天清晨八时便来，





一直到晚上才回去，七八天以后，他来说总领事请刘海粟去谈话，就在那天下午四时，同他一起乘车上领事馆。总领事那齐孙传芳拍的十几个电报以及各地报上所载的文章（已译法文），都拿了出来，一面对我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总该知道吧？”

刘海粟点点头接着说：“是的！孙传芳和危道丰禁止模特儿，我不答应，我一定要据理反抗。你是知道的，在贵国有许多美术学校，各处陈列的艺术作品裸体雕刻很多，不必说，你一定明白这人道理。”那齐听了刘海粟的话，便笑着说：“是的！我决不来禁止你。你看我的台上，不是也有一个大理石雕像吗？我请你来，有两个条件告诉你：第一，孙传芳、危道丰叫许交涉员每天都来麻烦，使我为难，我要求你呆在学校不要出去，我才可以保护你；第二，你的模特儿尽管继续使用，不必停止，但不能让人家参观，否则他们又要来噜苏；同时还请你不要再同他们辩论就得了。”对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处境下，他只能勉强答应了。

不久以后，忽见报上载有“孙传芳严令





各地禁止模特儿，前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案已自动停止模特儿”之说。这大概是法领事方面去敷衍他们的话，刘海粟也犯不着再同他们辩论了。徒有严禁空令，模特儿之用从未间断，但是报纸上，对这一消息，这是不乏主持正义的短评出现。7月19日《小公报》上载有一段“孙传芳两大禁令——旗袍与模特儿”，这篇短文署名为“摩得乐”写的，对孙传芳极尽讽刺之能事。其中关于模特儿一段有云：

“孙传芳两月再来上海一次，照他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就和模特儿过不去，雷厉风行，非将美专学校封闭不可，以五省总司令赫赫威权，与几个穷苦女子，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来沪的结果如此，总算不负此行了。……我记得他以前禁止妇女穿旗袍，又是他那位贤内助，去杭州降香，穿的却是旗袍，人都看见的了。这次刘先生纵然被其征服，封禁模特儿，恐怕他的尊夫人援旗袍之旧例，给他个反加提倡，或者以身作则，本身先作个模特儿，给他一





人看不算稀奇，还要供大家赏览，喂！那才好玩得很，看孙大司令还维持礼教不？”我们即从这一短评，也可以看出当时封建堡垒们的社会基础，已并不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巩固了。

模特儿的纠纷，应该到此可以算结束了。可见危道丰的气无法发泄，隔不多时，他便向上海法院控诉，理由是刘海粟侮辱长官。但法院认为并无侮辱长官之外，不予受理；叫他另以私人资格起诉。危道丰没法，只好以私人名义再控诉；理由是侮辱个人人格，毁谤名誉，要求赔偿损失。

那一天，刘海粟同几个朋友合作国画非常高兴的时候，由法租界捕房陪同法警，送来了法院的传票。他便委托陈霆锐、吴经熊两位律师为辩护律师，预备准时到庭。

在尚未开庭的前几天，吴经熊约刘海粟去一品香吃饭，在席上，还有承审这件案子的推事郑雯。他告诉刘海粟南京已来了十多个电报。危道丰天天向法院要求严惩。虽说司法独立，其中困难极多，叫他很为难，所以他要找刘海粟面谈一下。他说：“我一定帮





你的忙，因为你没有犯罪，我想表面上罚你五十块钱就了结，但请你不要上诉，不知你以为如何？而且五十块钱，也不用拿出来的；因为上诉，不会碰到象我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吃他们的大亏的。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刘海粟同吴先生商量一下，觉得可以接受。

开庭的一天，法捕房程子卿同探目一人护送他到地方法院，先在候审室坐着等，另外还有十来个象强盗贼样的人也在一起。此时旁听席上，有美专的师生，各校的学生，新闻记者等拥挤不堪。大约隔了半小时，法警来传了，高声喝着“刘海粟”“刘海粟”。

刘海粟随着法警走上法庭，危道丰的证人姜怀素和他们的律师先诉述经过，说他败坏风化，侮辱危道丰的人格，毁谤危道丰的名誉，请庭上严惩，并要求赔偿损失。庭上问了他的姓名籍贯之后，郑推事便问：

“为什么要专门败坏风化？”

“我只是提倡模特儿，并不败坏风化，模特儿是美术学校学程上所必需的东西，不用不行，绝无败坏风化之理。”刘海粟简单地说了这么几句。





郑推事便说：“今天不是辩论模特儿问题，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侮辱危道丰的人格和毁谤他的名誉。”

刘海粟说：“我并不曾毁谤他的名誉。”

“你又强辩了，你的文章里，明明是毁谤名誉。危道丰是政府任命的官吏，你骂他不学无术，招摇撞骗，这是铁证。”郑推事故意这样地说。

我驳道：“这两句话是用得非常适当的，并无任何恶意。我所说的不学无术，是指艺术而说，假使他懂得艺术，决不会禁止模特儿，而以为破坏风化。至于其他的学问，他有没有我不知道。他不懂得艺术却是事实。”

“那么招摇撞骗呢？”郑推事继续问：“他是上海县长，怎么会招摇？”

“因为他是县长，他才想封闭美专，动不动要抓人，这不是招摇是什么？”这时我的语气更加重了一点了。说到这里，原告的律师慌忙站了起来说：

“被告骂危道丰狼狈为奸，狼狈是兽类，是凶恶的东西，而且这两个字都从豸，完全是存心侮辱，无可逃遁的铁证。”郑推事听





了，便说：“这是侮辱、毁谤了？”

刘海粟看对方律师这样强词夺理，便加以分辩起来。“并不！这两个是形容词，兽名对于人，并无侮辱的地方。比如有许多人因为爱他的子女，男的取名‘家驹’，女的取名‘阿凤’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驹是兽，凤是禽，自以禽兽为名，可知并无侮辱之处。谁肯自己侮辱自己的儿女？非但不是侮辱，而且是爱称，又如麒麟童，是自己题的名字，麒麟同样是兽，他自己侮辱自己呢？”这一段有趣的话，竟使法官也想要笑出来，旁听的人，更忍不住轰笑了。

郑推事说：“你这话固然不错，但你总是恶意。”

刘海粟说：“这种新闻是报馆刊载的，并不是我叫他们登的，可见并无侮辱的意思。”

这一场审讯，可以说是一幕非常滑稽的喜剧，在法庭上弄得姜怀素他们毫无办法。在这里也不必再继续细说了。过了五六天后，判决刘海粟，罚五十元。因为事先郑推事的关照，这件事算告了一段落。

在模特儿问题上的斗争，历经了十年。





但这个斗争不是孤立的。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在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潮流的推动和支持下，模特儿才能在美术院校被广为应用。

四、鲁迅与人体美术

关于人体美术，鲁迅并没有写过一篇专门的论文，但是当把鲁迅先生的著作、书信、日记以及兴趣爱好等涉及到人体美术的一丝蛛丝马迹综合起来看，倒是很可以看出个整体来。

1、许广平在回忆鲁迅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素，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

在美术上，鲁迅对于人体作品也是取这样积极态度的，即不必回避裸体画、裸体雕塑，重要的是在于正确的引导。

鲁迅对于人体美术曾作过一番收集、研





究和介绍的工作。从 1931 年 5 月至 1932 年 1 月，他先后十次从内山书店购齐了《日本裸体美术全集》（一至六册）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一至六册）。他在向国内介绍外国美术作品时，总是要介绍一些优秀的人体作品。如由他编辑、出版的中外画集《近代木刻选集》（一）（二）、《比亚兹莱画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集》、《木刻纪程》以及由他举办的多次美术展览，都收有人体作品。他在一幅木刻裸女《罗勒多的艺文女神》上写道：“‘La Musadel Loreto’是一幅具有律动的图像，那印象之自然，就如本来在木上所创生的一般。”很赞赏迪绥尔多黎的表现人体美的木刻技法。当他买到一本日本美术史论家板垣鹰穗著的《近代美术思潮论》时，感到这本书立论公允，叙述详尽，图版选择较精，“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应该介绍”于是就把它翻译过来，并把一百四十幅附图（包括四十余幅人体作品）无一遗漏地登载出来。至于《夏娃日记》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竟是那书上莱勒孚的 55 幅插图首先打动了鲁迅的心。这些插图中几乎





每一幅都描绘着夏娃和亚当那优美健康的裸体。鲁迅感到这“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由此可见，鲁迅介绍人体美术作品，目的是很清楚的：一是扩大读者眼界，增进读者知识；二是打破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三是抗击半殖民地的色情画。

2、不了解与掌握人体的结构、比例、形态，就很难画好穿衣的人物。鲁迅因为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比一般画画的人体会还要深些。所以当他在内山书店刚认识黄新波时，就对他说：定要练好素描的基础功夫，要懂得光、懂得黑白、明暗，也要懂得人体结构。”鲁迅在与青年木刻工作者的通信中也曾一再地强调要画好人体：

“来函并木刻《法国公园》收到，谢谢。这一枚也好的，但我以为一个工人的脚，不大合于现实，这是因为对于人体的表现还未纯熟的缘故。”

“先生的印木刻，的确很进步，就是木刻，也很进步，但我看以风景为最佳，而人





物不及，倘对于人体的美术解剖学，再加一番研究，那就好了。”

“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的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功夫的缘故。”

“现在的青年艺术家，不愿意刻风景，但结果大概还是风景刻得较好。什么缘故呢？我看还是因为和风景熟习的缘故。至于人物，则一者因为基本练习不够（如素描及人体解剖之类），因此往往不象或不生动，二者还是为了和他们的生活离开，不明底细。试看凡有木刻的人物，即使是群像，也都是极简单的，就为此。要救这缺点，我看一是要练习素描，二是要随时观察一切。”

“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错误甚多，好象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之《东方杂志》（三十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

关于这方面，许广平也回忆道，每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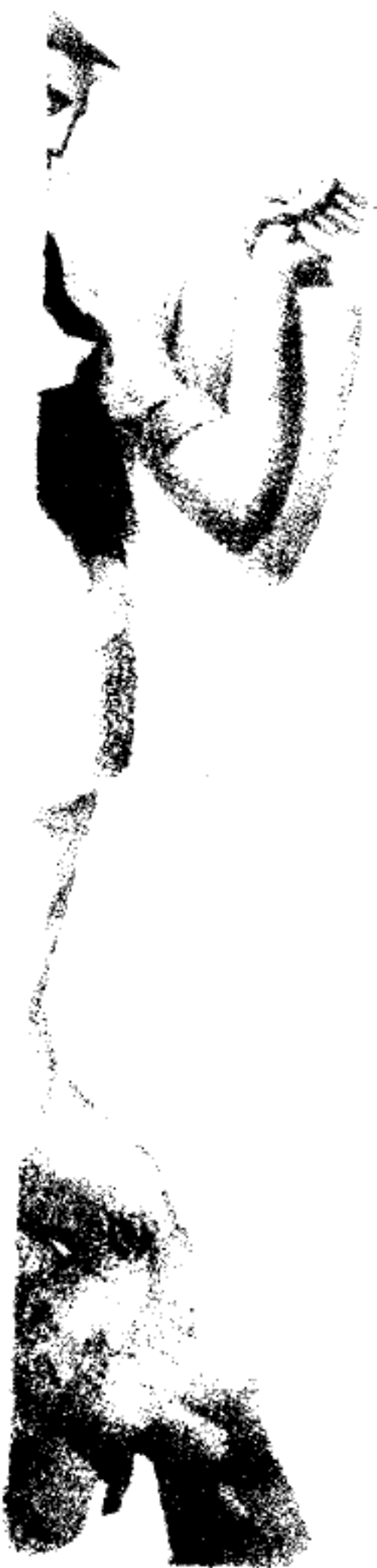


些很有前途的青年把创作的画送给鲁迅先生看时，因为“人体构图，多欠正确，为美中不足。则是先生所时常道及并惋惜的”。

此时同时，鲁迅对那些竭力诽谤画裸体模特儿的伪君子们则予以无情的揭露：“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可见，鲁迅强调人体绘画基本训练，目的是为了要解决青年描绘刻画人物的造型能力，使创作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就这一点来说，鲁迅的主张与当时那些单纯重视画裸体模特儿的人是有根本不同的。

3、在美术作品中表现裸人体，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运用的是人体艺术语言。人体艺术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阶级性，它在作品中起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取决于作者运用时的思想动机和手法。一幅正确运用人体艺术语言的美术作品，不但不会起坏作用，反而能唤醒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性情，给人以美的感受。这可以说是鲁迅重视人体美术的最主要的因素。

1931年9月20日，鲁迅在《北斗》创刊





号上发表了一幅德国的木刻作品《牺牲》。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回忆了发表《牺牲》的原委：

“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鲁迅选取这张作品来纪念柔石，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母亲形象很能够代表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劳苦大众以及他自己，在白色恐怖下又无可奈何地献出了一个新生的生命。对于珂勒惠支的另一幅描绘被摧残的半裸体的农妇的作品《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鲁迅也把它看作是一幅含意深刻的揭露性的作品。他说：

“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颚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





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在鲁迅的热心扶植下，中国的新兴木刻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新芽，其中也产生了一些运用人体艺术语言来表现的作品，比较突出的有李桦的《怒吼吧，中国！》、陈烟桥的《拉》、汪占非的《纪念柔石等》。《怒吼吧，中国！》描绘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贫夫，他被捆绑在一根木柱上，虽然被蒙住了眼睛，但仍在摸索着用以解放自己和跟敌人搏斗的武器——小刀。作者用象征性的手法缩影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受难和觉醒。裸人体的描绘使观众对于贫夫的遭遇更为明了，对于他的行动也就更为理解。这幅作品是李桦开始与鲁迅通信后不久，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影





响后创作的。《拉》表现的是几个工人拉煤的情形，作者采用记录性的写实手法，形象化地刻划了三个一丝不挂的全裸体的男工，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艰辛，他们的愤恨，就是从这些紧绷着的肌肉，运动着的体态上显露出来的。鲁迅在书信中曾多次提起这幅作品，并收入了他编的《木刻纪程》。

鲁迅在扶植健康的人体美术作品同时，也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庸俗下流的裸体画给予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鲁迅对于两种不同的裸体画，一褒一贬，泾渭何等分明！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度过人生最后时刻的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工作室兼卧室内，遗留着三幅





非常优美的外国黑白木刻作品，镜台中央立着的一幅是他很喜爱的《夏娃木刻图》，墙壁上挂着的一幅是前苏联大使送给他的裸女图。那张曾经诞生过多少篇战斗杂文的书桌和富有抒情味的裸体画幅竟是如此协调地统一在一起，鲁迅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正确的审美情操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鲁迅先生关于人体美术的一系列言行，可以了解到鲁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这门“有争议”的艺术的。我们将会从此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二章

民国时期三教九流



风

化

图

史

ABW4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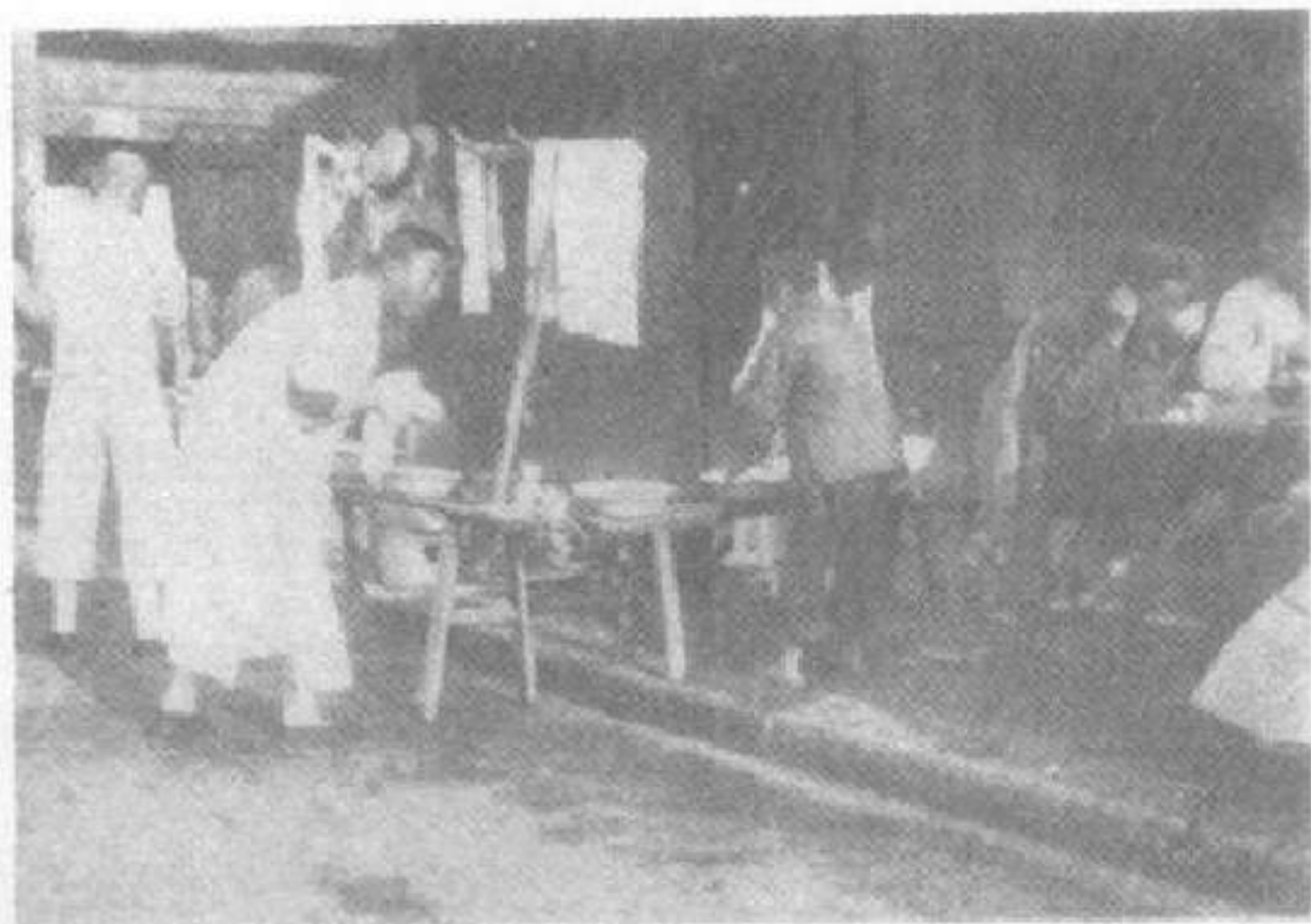
12



一、民国澡堂揭秘

澡堂，又叫浴室、浴堂，其确切的创始时间我们无法知道，但它起自寺院这一点则是有史为证的。据北京清华园浴池的于庆章介绍，澡堂早年叫浴堂，仿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浴堂的风俗习惯也传了过来。起初，浴堂只存在于寺院中，到后来才慢慢推展到社会上。关于寺院设浴堂之事，《洛阳伽蓝记》卷四载云：

“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三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



民国时期夏季的洗脸屋

812

‘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

至于社会上为一般民众提供服务的澡堂的出现，则远比寺院浴堂为晚。据《二百多年前北京第一家澡堂》一文记载：

“从现在起，往回数上二百多年的时候，北京第一次出现一家澡堂子。这是一个修脚匠创始的，后来因为日渐兴旺，便引起今日的盛况。”

澡堂从寺院的附属性设施，一变而为民间的服务性行业，发展过程颇为漫长。但自



其实现了由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后，澡堂行业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30年代中期，在北平一市的澡堂公会，其成员就有120多家。当时北平全市人口仅有100多万，而西长安街左近一带就有5家澡堂，服务网点算是相当密的了。即如江南小城常熟，到1948年，全城人口总共不过6.6万人，而维持营业的澡堂，却有8家，其人均拥有量，在各大中小城市中名列前茅。澡堂业最盛的地方应是在当时的首都南京。

民国时的澡堂，高档和低劣的并存很常见。出入于高档澡堂的，当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出入于澡堂，不光是为了清洁身体，更是为了享受或进行交易。上海闻人黄金荣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总要到日升池孵混堂。通常，他先洗大汤，并在高级单间浴室休息一下，然后在接受擦背、敲腿、扞脚与捶背、按摩等全套服务的同时，接待三教九流人物，与他们谈生意讲斤头。后来，日升池改建为黄金大戏院，黄就改在逍遥池洗澡。黄金荣的这套生活方式固定下来后，上海滩上的黑道人





物竞相模仿。于是，每到午后，地痞流氓充斥在沪上各高级澡堂里。

高级澡堂，毕竟较少。在澡堂业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还是中等的和低级的澡堂。北平天桥的澡堂，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池中光线暗淡，气味难闻，是北平诸多澡堂中最末等的一种。光顾这里的顾客，大多是穷苦的艺人、小贩、车夫、杠夫以及各手工业作坊的工匠和形形色色的游民。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是文盲，且长期泡在天桥这个大染缸里，故而语言粗俗，举止粗犷，尤其是老相识邂逅于澡堂，彼此非高声戏谑或骂骂咧咧就不足以表示“亲热”。这里的情形，与日升池、逍遥池等相比。自是差远了。

不管民国时期澡堂业的发展多么参差不齐，其在种类的多样化方面所出现的新现象，却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清末以前的澡堂，都是为男性提供服务的。这种情形，与当时中国社会上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传统观念是一致的。但是，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社会风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某些生活





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澡堂专为男性提供服务的局面，才有所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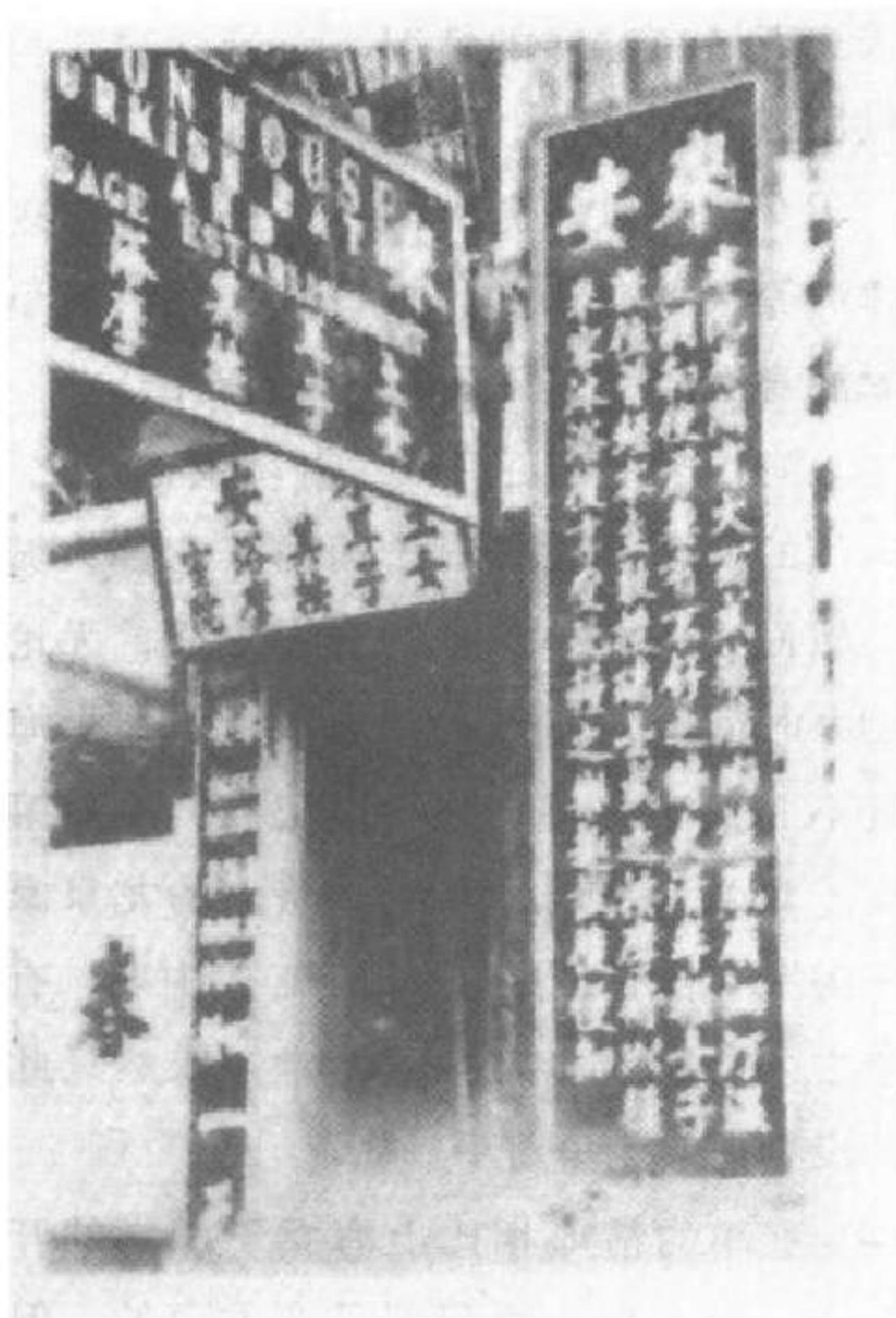
为女性提供服务的澡堂，最早是出现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的。据记载，北京最早的一家润身女浴所，开设在李铁拐斜街。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都市之一，其风气的变化往往是早于国内其它各大城市的。然而，在女子澡堂的开设方面，无论是在创办时间上，还是在创设数量上，上海远远赶不上平津之早之盛。据记载，上海第一家女子澡堂，是创设在浙江路上的龙泉家庭女子浴室。自它创办直到30年代中期，有六七年之久，然上海的女子澡堂，依然只此一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与平津的情形相比上海女子澡堂的开设状况，远远落后，原因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上海女子澡堂的浴客，以“窑姑娘”与“淌小姐”为多。这样，一般妇女，耻与娼妓为伍而绝少投身其中，而有地位的太太小姐们，则更是对此不屑一顾。

一般而言，男子澡堂与女子澡堂是界限分明、绝不相混的，尽管它们在管理上有可





展示土耳其浴室真相的广告牌

能二位一体。例如，龙泉家庭女子浴室与龙园盆汤，是同一老板经营的为不同对象服务的两种业务。它们的浴客，虽然彼此仅只一楼之隔，但其间壁垒森严，直有雷池不可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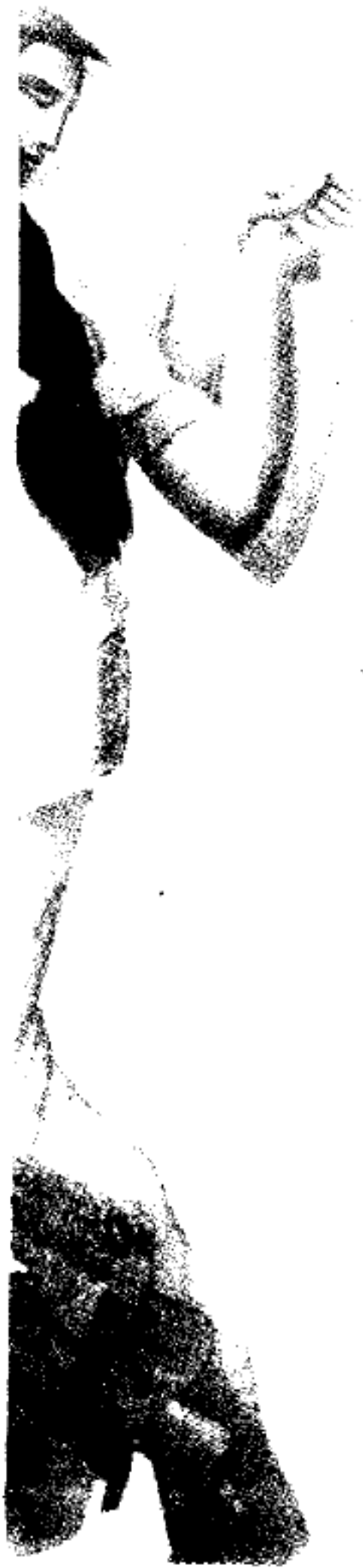
越一步之慨。当然，也有一些不法商人，为牟取暴利，而蓄意打破这种常规。30年代的北平，有些澡堂老板则财迷心窍，特设单间浴室，专供男女一起洗澡用，名曰“洗对盆”。他们的这种不顾人伦的举动，果然投合了“打野鸡”者的需要，从而使他们赚了不少肮脏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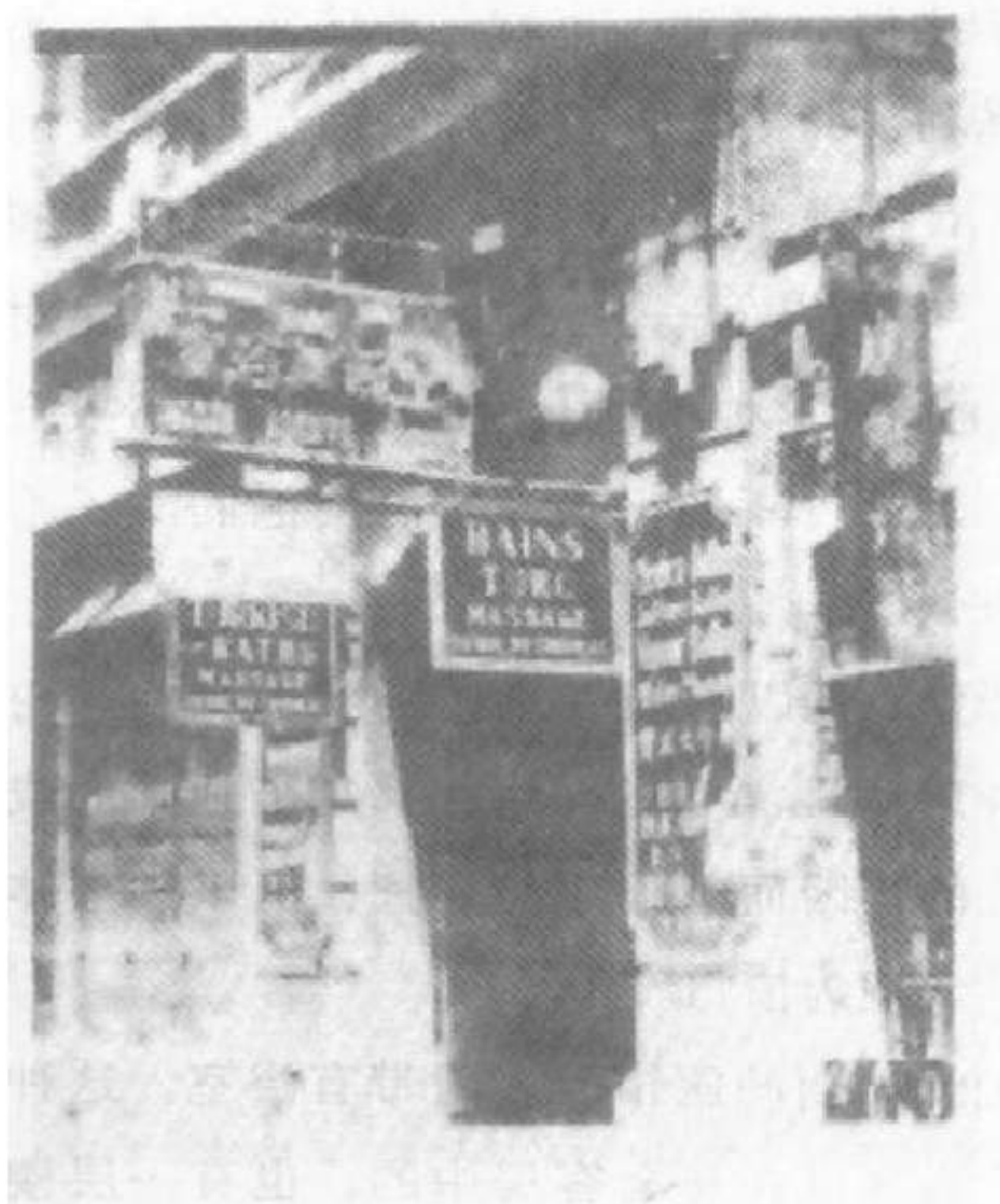
澡堂，还以附属性设施的状况存在。由于这种附属性澡堂的功用，都是半独立的或不独立的，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恒以其主体功能的实现为依归。

民国时期的旅馆大多附带有浴室。这种浴室，既有设在每套客房中的，也有一层楼面上公共的。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它们为留宿旅馆的客商服务的目的是一致的。

作为旅馆附属设施的浴室的设备都比较讲究，因而寻常百姓是没有条件去消受的。但是有钱有势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凭藉自己的经济力量，出入于旅馆饭店中；也可以依着自己的兴趣，去享受旅馆内的所有先进设备带来的乐趣。

如前所述，澡堂最早是寺院的附属设施，





土耳其浴室（按摩院）的减价广告

是一种宗教性建筑。只是到了以后，当人们意识到澡堂除了可以驱除宗教家声称的污秽的观念外，还能够起到洁净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时，澡堂才在社会上取得了生存的根基。澡堂虽然世俗化，但其实教色彩并没有完全摆脱。事实上，作为寺院附属设施的澡堂，与民间一般的澡堂是循着各自的路径在



发展着的。

不仅如此，大概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强调人们从肉体到精神各方面都应该保持纯洁无暇这样的信条的缘故，因而，不仅佛教的寺院保有自己的浴堂，就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也有着自己的沐浴室。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的一个最古老的清真寺。它始创于700多年以前，经过历朝的修葺和扩充，才达到了现在的规模。礼拜寺内，除了基本的宗教设施外，还有一栋坐南朝北的沐浴室。沐浴室扩建于1921年，至今在其砖刻榜额上，还留着“涤虑处”3字。

如果说，附属于宗教建筑的澡堂，是完全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一些老虎灶兼营洗澡业务，就完全是基于世俗的需要的了。在上海，十有八九的老虎灶，一到了夏令季节，总要兼营“清水盆汤”的生意。它们的设备，虽很简单，一般只有二三只木质浴盆和几块供遮隔之用的布幔，但因为其收费低廉，深得下层民众的欢迎。这样，清水盆汤就成了生活贫苦者在夏季进行涤污洗垢的理想场所了。紧邻上海的常熟，也有类似





的情形。不过，常熟地区的老虎灶所经营的盆汤业务，是利用各大浴室“歇夏”的时机展开的。

民国时期，正规的澡堂服务项目较为全面。其中的第一项服务是修脚。因为民间的澡堂，最早是由修脚匠创设的，所以修脚在澡堂业中占着很为突出的地位。当时，差不多各处的澡堂，都雇着专门的修脚师傅，为患有脚疔、茧子、痠子等脚病的人解除病痛。澡堂的第二个服务项目是捏脚。它是为患脚气的人止脚痒而提供的一种服务。至于它的第三个服务项目则是搓澡、擦背。搓澡，是澡堂的工役用拧干的毛巾把浴客的浑身上下都搓一遍，然后擦上肥皂，再用水冲净的一种服务，而擦背，则主要流行于南方。本来，这是一种由工役代客擦洗背部的服务方式，到后来，擦洗的范围遍及到了全身，情形就同搓澡相同了。

澡堂中的修脚、捏脚、搓澡擦背等种种服务项目，实际上它是为有财有势者提供的。北洋政府时期，曹锟手下有个名叫李彦青的人，本来就是天津一澡堂的侍役。由于此君





白皙俊美，宛若女子，加上他有一手捏脚擦背的技术，曹锟索性把他召到了直隶督军署，随侍左右，专为其一个人“服务”。

民国时期，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不论是在高档的澡堂里，还是在低级澡堂中，除了修脚、捏脚等正规的服务项目外，还有着一些不正规的、甚至是肮脏的“服务”。

民国时期的四川，是一个鸦片烟的王国，因而刘湘所属 21 军中主持禁烟事务的科长王锡圭写出了“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这种亦庄亦谐的文字。由于瘾君子多，除正式烟馆外，四川社会上的许多机构都附设了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为“其春”的高级澡堂，其内部就附设了一间专门的烟室，供顾客浴后吞云吐雾。尽管提供这种“服务”的澡堂不多但已经表明澡堂并不干净。

在澡堂里为浴客提供修脚、捏脚、搓澡等项服务的伙计，都是由老板从各地雇佣来的。由于澡堂里的工作又脏又累，为很多人所鄙视，因而其从业人员，大都从贫困落后地区招募而来。





民国时期剃头匠

澡堂工役的收入极其菲薄。他们的工资，有的是由老板按月开给的，有的则是计件的。总之，他们都没有固定的收入。由于其工资



收入往往不敷生活所需，因而便从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以尽可能多的浴客那里得到额外的赏赐。

整体上看民国时的澡堂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的。但这种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当中小城市中也出现了用当时尚称高级建筑材料的瓷砖所砌造的浴池、盆汤间，以及装有抽水马桶、洗脸瓷盆的澡堂时，在广大的农村，甚至连最简陋的澡堂也没有。

二、清末民初彩票风云

早在清朝末年，中国就已出现了彩票。19世纪60年代，一种利用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彩票在广东露面了。由于其以斗彩者能猜中闱场考试中士子登等者的姓氏多寡为输赢，故称为“闱姓”，亦叫“卜榜花”。据说，闱姓是中国最早的彩票。

最初，闱姓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十文铜钱，后来逐渐发展到开局收票。由于这一赌博方式别具特色，虽遭官府严禁而不绝，从乡试推广到会试以及岁考、科考，影响是越来越大。





闾姓的赌法，是在考试以前由票局订出猜买条例，规定周、区、胡、马、麦等百余姓为“小姓”，猜买者必须要在其中选择中式者，才算是有效的。其他陈、李、黄、何、张等姓，应试的人较多，中式者差不多每榜都有，故称“大姓”或“限姓”，不准猜买者购买。不论限姓，小姓，都事先公布，并载明于票簿的前边，供投买者参考。在乡试、岁考、科考之前，投买者随意在小姓中选择20个姓投买为一票。每票的票值各不相同，分半元、1元、数元、10元若干等。票局收到投买者的钱款，即开给收据。中彩领奖的凭证就是编有号码的收据。同时，票局把相同票值的一千票编为一票簿，待科举考试发榜之后，以票簿为单位分彩。在同一票簿中，猜中登第者之姓最多的人获头彩，依次为二彩、三彩，三彩以下为输。通常，票值总收入的60%作为彩金，头彩的5成，二彩得 $\frac{1}{3}$ ，三彩得 $\frac{1}{6}$ 。如果中姓最多者仅有一票，则彩金独得；若几个人中数完全一样，则将彩金平分，是分为得，名为“同中同分”。其余40%的票值收入，一半充饷，另半作为赌商开支。





民国时期集市中买卖冥物的市场

825

会试之闹姓，在方法上与乡试闹姓稍有差异。因为参加会试者人少，取的名额只有 10 余名，每票只要选取 10 姓，在投买时也没有大姓小姓的限制。至于如何投买与分彩，则授乡试闹姓之例。

当时社会各界，各色人等都会去博一把，但往往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闹姓之后，在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名为“铺票”的赌博性彩票。最初的铺票，是广东南海、顺德两县的地方绅耆，为筹款修筑保障两县的堤围而于光绪年间发行的。铺票上



记着为修筑堤围捐借十两钱款的商号的名称，分别以收取票款一两、五钱的方式供人们购买，各满 1000 条为一卷，每月开奖一次。开奖之时，先在神庙前杯卜 12 个字，然后核对投买者所选择的 10 个字，以中字多者为头票，依次为二票、三票。同中同分；如无同中，即为独得。奖金之数，占票款数的 60%。头奖得其中之 60%，二奖、三奖，各得其中之 25%、15%。其余票款，为开办票事处所得，主要用于归还捐借之款和作为修筑基围及办事处的费用。

起初，铺票有为公用事业募捐的性质。到后来，完全蜕变为一种赌博形式。本来以店铺名号为票字的铺票，发展成以似诗非诗的五言韵语为票字的铺票。其时的铺票有 120 个票字，任投买者圈取 10 字，作为一票。票款分 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五种，出售时以九折收取。仍以 1000 条为一卷，以千字文之“天地玄黄”等字为卷别。奖金总数，比以往高了一成，不过各奖所占总奖金的比重，同于过去。给奖是以所中字数之多少为依据的。每届开票给奖之日，众人集中于神





庙前，观看名为杯卜的开字仪式。杯卜由 3 个人负责，一是抛杯，一是执杯，一是唱票。他们是在开票前由观看群众自由争取的。抛杯者得到抛杯的暗码，将木杯当众破开，先放在天平上称量，使两杯重量相等，然后把杯放在盆内，用力向上一抛，以抛过面前预设的绳子为度。执杯人执起地上之杯，报出杯形是“胜杯”、“阳杯”、“阴杯”。在杯卜中，两杯着地后一仆一仰为胜杯，两杯同仰为阳杯，同仆为阴杯。经过多次抛投，开出得胜杯数最多的 12 个字，作为确定给奖级别的“票也母”。

人民国后，广州赌商巧立名目，要求政府允其所请开设“有奖义会”，筹款救济灾民。其实这只是铺票的变相称呼。其开奖情形，一如往日之铺票，只是开彩法由杯卜开字变为搅珠开字而已。搅珠开字，较杯卜开字为简单。搅珠之前，要备好两只特制的圆盆。一圆盆盛写着 120 个票字的圆珠，另一盆盛 108 个有“吉”字，12 个有“得”字的圆珠。开彩时，先搅动票字圆仇，漏出一珠；再搅动另一盆，将漏出之珠与票字盆中漏出





之珠对应起来。如票字盆中之字珠与“得”字对应，则此字为票也母之一；反之，与“吉”字对应，则此字落选了。120字全部搅出后，开彩便宣告结束。投买者把自己所买之票与票也母对照，即可确定自己是否中奖。

自清末以来广州的赌风之盛，一直是冠于全国的。在早期的赌博性彩票中，除闹姓、铺票而外，在广州还盛行山票、白鸽票。山票，也叫“15字有奖义会”。其投买是在《幼学千字文》一书中的120个字中进行的。每个投买者，从中选买15个字为一条，每条出1角5分赌本，便可能得到数目很可观的彩金。白鸽票的赌法，是票厂从《幼学千字文》前段选出80个字，让投买者任圈10字为一条，然后命师爷选定应开的20个字，在厂前当众悬挂。每届辰、申两个时辰，票厂摔碎装有选定20字的“大钱罍”，供投买者核对自己是否中彩。白鸽票的赌本低微，每条仅需银三厘，但是彩金丰厚，中10字得奖十两，中9字得奖五两，中8字得奖二两五钱，中7字得奖五钱，中6字得奖五分，中5字尚可收五厘，除可收回赌本，还有微利，所以





吸引了相当多的人。

尽管闹姓、铺票、山票、白鸽票风行一时，但均不属公开发行的彩票。中国最早正式发行的彩票，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湖北签捐票”。自此以后，各种通过正规途径发行的彩票纷纷出笼。它们或以善后、济灾为名，或以建设、造福于人们为号召，实际上是以动听的借口骗得人们竞相购买，达到彩票发行者们从中取利的目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督军发行的各种“慈善”名目的奖券有：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湘赈慈善救济券、浙江绍萧塘工券、山东兴业票，等等。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发行过全国性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至于地方性的奖券，有1929年浙江省政府主办西湖博览会时发行的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发行的珠宝奖券和房屋奖券等。

在各种彩票中，不同彩票的信用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信用较好的是湖北票及浙江绍萧塘工券。湖北票是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它是各种彩票中发行历史最长的。浙江绍萧塘工券是以修造绍兴、萧山的海塘为名发行





的彩票，共办过近 50 期。这两种彩票，用抽子开奖的办法确定得奖者。所谓抽子开奖，就是在开彩时，把没有售出的彩票号码的“子”抽出来，不参加摇奖，以示公正元弊。其后改用 3 个球开奖。3 球中，一个球摇前三位数，一个球摇后两位数，凑成五位数，即为中奖号码。另外一个小球摇奖励等级。有时，摇出的中奖号码在摇彩前就已公布为尚未售出的，该彩号就被取消，要重新摇奖。正由于其开彩无作弊之嫌，对买彩票者很有影响力。

1933 年 5 月，国民政府发行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主要是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在奖券发行之初，政府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规定政府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四次，每次 50 万张，每张售价计“国币”10 元。还规定，每次发行所收的券款，50%由政府提出，作为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的经费和支付发行、销售奖券的费用。另 50%作为奖金，奖额为一等奖 1 张 50 万元，二等奖 2 张各 10 万元，中奖数为 50645 张，实付奖金 2499910 元。这种奖券，每年发行四





次，扣去奖金，为政府增加了 1000 万元的收入。这个数目，占 1933 年国民政府出口税收入 2200 万元的 45%。从 1935 年 8 月起，奖券由一年四次改为每月发行一次。虽然奖额和发行数各减少一半，但因发行次数比原来增加两倍，政府从中获利比以往多了 500 万元。

彩票经营，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吸引了很多有钱有势者投身其间。民国初年，川边、察哈尔、热河、绥远、湖南、河南等地的军政要员，假借救济之名，争相在上海发行彩票，牟取暴利。

各省政要假借名义发行奖券，获利丰厚，使一些有特殊势力的人起而仿效。上海的青帮大亨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啸林为上海青帮中的第三号人物。因他在复兴公园经营夜花园蚀本，黄金荣、杜月笙便撺掇他去开彩票公司赚钱。由于他手下大多是开么二堂子的老板，对彩票一窍不通，杜月笙索性介绍手下的几个门生给他策划筹办。张啸林所开公司，初期名叫东方彩票公司，票额为 5 万号张，票面每号张一元，每半月开彩一次，奖金为 2 万元、5000 元、





1000元、10元、5元不等。由于此项彩票的开奖过程由公司操纵，头彩、二彩往往中在没有卖出的号码上，所以，公司每月所得的纯收入就在2万元以上。开设不到两年的公司就这样就赚了30多万元。

张啸林见开彩票公司有利可图，又开设了一家有利彩票公司。该公司的票额同样为5万号张，票面却增加到2元，但因彩金也有了提高，因而想从中获奖得彩者依然趋之若鹜。之后，他再开设鸿运彩票公司，不仅在上海竭力推销彩票，还委托苏州、无锡、南京等城市的商店广为推销。

张啸林开设了几家彩票公司，大赚其钱，引起了中外想发财者的眼红，于是就出现了洋人亨利开设的好运道彩票公司，杨信康、曹雨田开设的快发财彩票公司等等。它们一成立，就与张啸林的彩票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不惜纠集打手，相互拆对方的台。到1933年，在黄金荣受蒋介石之命主持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之后，上海的各种彩票公司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发行彩票者当然是彩票经营中得利最多






的，但是包办彩票业务的，获益也是非常可观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发行以后，通过杜月笙的关系，“上海闻人”金廷荪开设的大运公司承揽了包销奖券的美差。金廷荪以几种批发价将彩票批给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大运公司的承包人及各种彩票销售店，发了笔大财。他在敏体尼阴路盖的一幢华丽的房子，在杜美路为答谢杜月笙而盖的更加气派的大洋房，就是他发了大财的“纪念”。

彩票是非常诱人的。它之所以吸引众多的人投身其间，主要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侥幸获得巨额收入的可能性。


亨利在上海南京路香粉弄口开设好运道彩票公司不久，就按公司规定的章程开出了中彩号码。中彩者名叫马三宝子，是一个在杨树浦码头驳船上打工的杂差。他中了5万元大洋后，身价顿时高了起来。过去和他素不相识的人，竟然也口口声声称他为马老板。马三宝子也不含糊。他用这笔钱买了几艘拖驳船，真的做起了驳运公司的老板。

在彩票购买者中，像马三宝子这样能得奖的，只占极少数。但是，不管是富豪，还





是穷光蛋；不管购买彩票后中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许多人还是怀着侥幸发大财的心理去博一下。



上海的跑马厅，也是一大赌窟。它除了通过赛马进行赌博外，还于 1909 年以后发售香槟票聚赌。香槟票每张售价 10 元，这对于贫苦民众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而不少人根本无力单独购买。即便如此，他们就是节衣缩食或同别人一起凑钱也要买一张彩票。更有甚者，浦东的一个贫苦农民，至死不忘香槟票。临终之时，他特地叮嘱他的儿子：饭可少吃，香槟票却不能不买。

中不了奖的人，当然是运气不好。然而侥幸中了奖的，未必交上了好运。某年，虹口曹德大酱园的老板曹芳庭买的香槟票，中了 A 字票槟头彩。因为他的这张彩票，是从美国花旗银行买办间里买来的，故在中奖之后，只得设法委托外国人小马立斯去代领。结果，他被小马立斯生生的敲去了一大笔钱。在“航空公路建设奖券”的开彩中，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当年，安徽一个在上海朱葆三路开设平安旅馆的商人，中了“航空公路建





设奖券”50万元，不敢去领奖，怕这么多钱会引起别人嫉妒而遭绑架。后来，他通过天主教梵神父委托法商某银行代领。结果，奖金款项被该银行硬要去作为储蓄存款，而梵神父借教会捐款之名，趁机敲了10万元的竹杠。

利用人们的侥幸心理彩票经营者大发横财。而在彩票购买者中，除极少数人得到“一本万利”的好处外，绝大多数人都做了“赔本生意”。许多人甚至在妻离子散，家毁人亡的沉痛教训面前，还不自觉，甘心情愿被人欺骗、盘剥。

三、民初江湖骗术

民国时期，诈骗活动，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虽然难以数计的诈骗活动，在骗取钱财的大方向上是基本相同的，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诈骗活动，在行骗方式上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同的。

民国初年，在上海地区，出现了吓诈党这样一种利用威吓手段达到诈骗目的的秘密团体。他们威吓的对象，最初是剧场、游戏






场。其后，推而广之，对于公司、工厂、庙宇、缙绅之家，他们都不放过。他们选择威吓者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钱，能为他们提供钱财。哪一家剧场、游戏场或公司、工厂等被他们选中，不花上钱财，就难得太平了。

一般，吓诈党在侦得目标后，即给威吓对象发恐吓信，内容大多是声称生计困难，要求借贷。如果被吓者怕事，如数奉上吓诈党所要的钱款，他们会暂时得到太平。反之，吓诈党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把炸弹送到游乐场等设施里。他们所送的炸弹，有真的有假的。然而，即使所送炸弹是真的，也未必马上引爆，因为他们诈取钱财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此时，吓诈党往往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给敲诈对象发出与炸弹有关的匿名信，再次要挟他们，以迫使他们就范。要是这一招还不奏效，吓诈党就动真格，把炸弹抛向要敲诈对象所经营的娱乐场所、企业中去。

在钱生可编的《上海黑幕汇编》中，就有许多类似事例。上海有家游戏场，经营者是一个大滑头。他然然也曾收到过一封索款





2000 元的吓诈信，但由于他自己与黑道沾边，稔熟其中的黑幕，深知同这类亡命之徒斗法只能徒增自己的损失，因而亲自携款，按吓诈信所具地址寻去，找到了那帮索款者。一见面，游戏场老板便自陈来意，表示尽管自己的经营不佳，但为免双方都蒙受不利起见，故特地奉上私人钱款千元，以作为各位的茶酒之资。说完，就将钱奉上，而敲诈者收到钱后，也就放他一马了。此后，别的游戏场事故不断，而唯独该游戏场平安无事，生意发达。

在敲诈钱财这一点上，吓诈党是绝对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圭臬的。1917 年 5 月，某游戏场接到了一封吓诈党敲诈 2000 元的索款信。开始，该场老板对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由于吓诈党依序要挟，使该游戏场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为图生存，老板不得不忍痛付款，尽管此时吓诈党的索款之数已由 2000 元增加到了 3 万元。

如果说，吓诈是专以在外经营的男性为骗取钱财的对象的诈骗活动的话，那么，拐骗就大都是以居家的女性为目标的诈骗活动。



在无锡西乡，有一程姓妇人，虽然出身清苦，但颇有姿色，堪称小家碧玉。一次，她在户外洗衣，恰巧被女拐子看见。女拐子思忖，把这样的女人骗到上海，是不愁没有主顾的。于是她想方设法接近了程姓妇女，并施展其拿手的骗术。她对程姓妇说，你们一家4口，仅靠数十文钱生活，是不能自给的。何不到上海去谋一个职业赚钱呢？在女拐子的花言巧语的诱骗下，程妇马上就同意了。她在取得了丈夫的首肯后，便随女拐子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她便被女拐子卖到了一家客栈，成为靠卖身为生的妓女。

在上海虹口西华德路，有一户复姓欧阳的广东人。他们的生活本来很平静，但因为欧阳夫妇生有一个丰姿绰约的女儿，麻烦就由此而来了。起初，附近因欧阳女之美貌而求婚问字者纷至沓来，几有难以招架之势。然而，这些人中，竟然没有符合欧阳夫妇的择婿标准的。

尽管登欧阳家门求婚问字之举不是公开的行动，但消息依然很快地传了出去。一个女骗子得知后，认为可以用自己的骗术，把





小姐拐卖到烟花之地。

在各种各样的诈骗活动中，以色相行骗，可说是成功率较高的一种。以色相行骗，既有女骗男的，也有男骗女的，反正是以美色来达到诈骗目的的。这种骗术，在民国时上海的诈骗活动中占着极大的比重。

上海的色骗，有多种名目。其中，仙人跳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诈骗手段。通常，它以女子的色相诱人。待别人上钩后，原与她串通好的男子遂假托其夫或家人之名出现。这种情形下，被女色诱骗而上钩的人，是没有不破财能脱身的。

在某一女拆白党组织中，有一名成员叫爱姑，年龄虽然刚满 18，但因老于此道，已经是党中健将了。有一天，在里弄口，爱姑发现一位华装艳服的男子不住地打量她，便假装正经躲进屋内，以探虚实。当她在第二天又在弄口看到了那位男子，就断定他是个好“主顾”。于是，爱姑浓妆丽服而出，并以眼风撩拨男子。男子见状，喜不自禁，便与爱姑勾搭起来。不久，两人相约去旅馆作巫山之会。正当他们在旅馆欲行苟且之时，门





外传来一片喧闹，接着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打门声。未等他们开门，门外的人已经破门而入。那些人冲进房间，为首者假意将爱姑痛骂一顿后，把两人拖出门外，并将男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悉数掠去，随之扬长而去。等到这个男子意识到爱姑是拆白党，他已失财挨揍了。

上海有个朱姓的颜料商，资本颇厚，盈利10余万。一日，他在一家戏院看戏，见隔座一妇人仆妇环侍，气象华贵，俨然阔太太，便旧病复发，动起了这妇人的脑筋。却不知道妇人是个骗人钱财的女拆白党。

与仙人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色骗，为放白鸽。所谓放白鸽，就是以女子为诱饵，放出去充当别人的妻妾、姘头，侍捞足了钱财再像鸽子似的飞回的一种骗术。

有一个李姓无锡人，妻死以后已经独居多年了。他屡想续弦，只因无人做媒而作罢。某日，忽有媒婆带着一个少妇来到李家。少妇自称是寡妇，上无公婆，下无子女，只有一个残疾的胞弟。因生活无依靠，想找个人家赖以为生。李某见少妇的打扮及其胞弟的





情状，与她所述不差，便信以为真，决定出身价钱 150 元纳妇为妻。当李某议婚之时，许多亲友来劝他，少妇来路不明，恐怕是放白鸽的。但李某总是不信。成婚后，由于妇能持家，双方感情也好，李某越发感到亲友的顾虑是多余的，遂将所有家财悉数交给少妇经管，同时为她置办了不少金首饰，一天，李某外出归家，发现少妇不知去向，所有贵重的物品、衣服和现款被席卷一空，还未疑及少妇是拆白党。等到隔了数月，李某在镇江城外看到少妇和她所说的“残疾”的胞弟后，才得知他们确是放白鸽的。

1929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上海山东路一家旅馆来了一对少年男女。他们衣着华美，容貌出众，真是天作之合。旅馆老板阅历甚广，一见他们，便知是一对临时苟合的野鸳鸯，就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幽静的房间供他们幽会。他们一到旅馆，便点菜沽酒，促膝共饮。晚餐后，又往某剧场看戏，一直到半夜才回。旅馆对于野鸳鸯一向放任自流，但这对男女直到第二天下午 2 点多钟还未有动静，就不能不使茶役感到有蹊跷了。正在茶役疑





北平天桥的传统杂耍表演

惑之时，房间里传来了女客的娇呼。茶役应命而入，才知男客席卷了女客的东西早已逃之夭夭了。男拆白党以脸相诱骗女人钱财的手法，并不比仙人跳、放白鸽来得逊色。

因为自己的好色付出了大量的钱财。在上海，以小白脸勾引少女或少妇人彀，然后诈取一笔钱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因而，时人在罗列男女拆白党的黑幕时，把拆白党、特别是男拆白党称为上海的一种特产。

在民国时的诈骗活动中，伪装成官员、侦探或星相家而达到其险恶用心的，也占着



相当大的比例。苏南东亭有个全某，长期客居安徽合肥，因而无人知道他做什么职业，以何营生。1913年他突然衣锦还乡，自称一向跟随某大官做事，得到重用，如果有人跟他出去谋事，富贵立即可以到手，引起了乡人很大的兴趣。当地有个农家子弟名叫刁斗，家中相当富裕，而且又是个官迷，听到全某蛊惑人心的话，也不分青红皂白，就跟着全某到合肥去厮混。在合肥，刁斗因有求于全某，不仅所有活动悉听全某的安排，而且出资供全某寻欢作乐，恣意挥霍。一天，全某自外归来，高兴地对刁斗说，跟他熟识的黄某正在谋颖上县知事之职，如果能得到千余元的运动费，就可马上赴任。现在黄某正在筹集资金，假如有人能助他500元或300元，就可以到他处任科长或科员。刁斗一听，马上表示希望成为科长，并把身上仅剩的500大洋全都拿了出来。第二天，黄某匆匆来到全、刁所住旅馆，表示省府的任命就要发表，但因缺300元疏通费，事情有些难办。全某见机，赶紧在旁说项，劝刁斗迅速返家取钱。由于刁斗受骗已深，对放弃官职又心有不甘，





所以听了全某劝说，便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到家后，想方设法凑齐了 300 元钱，就通过邮局先汇去，自己则乘轮船再次来到合肥。待他到原先住过的旅馆，全、黄早已不知去向。刁斗抱着一丝侥幸由合肥赶到颖上。然而颖上的知事根本不是卖官给他的黄某。刁斗花费了大量家财，到头来一官半职都没捞到，只得自认倒楣，懊丧而归。全、黄假扮官员，骗取刁斗钱财之举，比起官场的诈骗活动来，虽然是大巫面前的小巫，但即此可概见民国官场之一斑了。

844



天桥相声



在上海清和坊，有一个妓院的跟局姨娘叫老三，自称老上海，为人聪明伶俐，对于租界里的种种黑幕，没有不清楚明白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乖巧的人，最终还是栽在假侦探手上。

一天晚上，老三独自走在大马路上。将要到跑马厅时，见路旁有个纸包，便想俯身去捡。正在此时，背后有人抢步上前，不问情由，捡起纸包要走。老三紧紧抓住他的衣袖不放，要了解其中究竟。拾包者开始不同意，几经交涉，达成妥协。两人打开一看，见是一叠叠的钞票，便为分钱又起争执。争论的结果是两人照数平分。老三得钱，喜不自胜。正待要走，突然有人拍拍她的肩膀，喊她慢走。老三吃惊不小，回头一看，见一形似侦探的男子，手里正扭着与她平分钞票的人。那男子口口声声说他们偷了别人的钱，要将他们捉到捕房去。两人苦苦哀求，表示愿意交出钞票，并身上的金镯、金项链，才免于被捉。其实，“侦探”与老三分钱的人是一路货，他们是专等贪小利者上当然后敲上一记的。见钱眼红的老三也因为贪图小利而





成为了牺牲品。

在各类诈骗活动中，绝大多数的被诈骗对象总是不愿意将钱财交给诈骗者的，然而，在以占卜算命为骗钱手法的骗子面前，许多人往往自觉自愿地受骗上当。其中缘由，除诈骗者的骗术稍比别的诈骗高明一些外，更主要的是它能迎合社会上各个层次人们的世俗追求。

在北京，有个以给人占卜为生的人，自号赛诸葛。最初他的生意相当清淡，因而衣衫褴褛，潦倒不堪。可几个月以后，情况就大变样了。他不仅租了一间门市房以为营业之所，而且所有求神问卜者，先得挂号才可请他“预测”未来。赛诸葛在短时间内名闻遐迩，其间还有一段故事。民间肇造，某总长因政治争斗闲居在家。一天，他带着仆人外出，见赛诸葛呆坐在西河沿某寺下，便命其占卜，结果得到了四句卦词：君本当年万户侯，干戈扰攘暂时休，轻车熟路逢知己，盖世英豪第一流。一看这卦词，赛诸葛便摇唇鼓舌，大肆吹诩起来：看这个卦词，您当年曾为显宦，不久前因发生战争而去职。眼





下欣逢知己，官星又旺，不久将重为权臣。某总长原任某省巡按使，当袁世凯称帝，西南各地起兵讨袁时，仓猝逃回。由于卦词的前两句已应验，后两句中又嵌着他知己的大名，某总长很高兴，给了赛诸葛2元占卜金，还夸口说，他日果真如赛所说，能重登权位，就奉上200元为赛祝寿。不多久，袁世凯在一片咒骂声中死去，某总长当上了交通部长，即把赛诸葛奉为神仙。从此以后，想升官发财的人都到赛诸葛那去问卜，赛的生意也就兴旺起来了。其实，赛诸葛说得神乎其神，并不是有预测未来的本领，而是利用了总长的仆人。由于总长的仆人向他提供了总长的历史背景，赛就料事如“神”了。

在青岛北门，有个瞎子叫张铁口，占卜的生意十分兴旺，一年的卦金就要达到几千元。他骗人的手法，不外是与人串通，让人先从登门求卜者口中套出些话来，然后通报给他，好让他在起课时说得八九不离十。由于他们配合巧妙，外人根本不知内幕，还夸赞张铁口的占卜为神课，心甘情愿地把金钱奉送给他。要不是因为后来他与搭档闹翻，





其中的黑幕恐难为人知晓。

一般而言，骗子的诈骗活动，大多是两人或多人串通合作完成的。这就使骗术显得更真实合理，受骗者更易上当。在上海至南京列车的二等车厢里，并肩坐着一对夫妻，年龄约在30多岁。他们衣着华丽，举止阔绰，看似富家少爷、太太。车快到苏州，男的忽然大叫不好，显得十分着急。其妻问是什么缘故，男的回答把皮夹遗忘在客栈里了。妻子一边问夹内有多少钞票，一边埋怨丈夫不经意，急得男子直搓手。接着，她取下脖子上的一尺有余的金项链，苦笑着向对面坐着的中年妇女求助，表示愿意以此项链换40~50元现洋。中年妇女感到这样有利可图，就拿出50元现洋换下了项链。车到苏州，那对夫妻托词下了车。等到中年妇女回到家，经丈夫提醒，感到其中有诈，将项链拿去检验，就已经来不及了。这种合伙行骗的事例，在民国时多得数不胜数。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的诈骗活动已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状况了。

民国时期五花八门的诈骗活动，其数量





之多，内幕之复杂，非一篇短文所能包罗。在此罗列其中的一些活动，只是为了描述豹之一斑，使人们对这些行为有所了解。

四、狂赌方城大战

民国时期的赌风极盛，光赌博的方法，就有着中国的牌九、麻将、花会、白鸽票、天九、十三张、诗牌、诗韵、斗鸡、斗蟋蟀、套签子、挖花、番摊、摇摊和西洋的吃南子老虎、轮盘赌、扑克、赛狗、跑马、回力球、彩票、打汽枪等等数十种。在所有赌博方法中，最为普及参加者最多的当数麻将。

麻将，也称麻雀牌、麻将牌、雀牌，系由明代的叶子戏演变而来，清代开始盛行。牌分万、条、筒三门，每门自一至九，各有4张，另加中、发、白、东、南、西、北各4张，及花牌、百搭，共140张。赌时4人同桌，每人轮流摸满18张牌后，各人根据自己手中之牌，一边摸一边进行组合，谁先组合好，谁就赢钱。由于这种赌博方法并不复杂，加之只要凑满4人，即使在家里也可进行，所以很受民众喜爱，其影响也因而及于全社





会。

一些有闲之人，空余无事，便呼朋引类，4人围成一桌，把方城之战作为消遣手段。当包天笑于北洋政府时期赴京住在邵飘萍家里之时，因长日无聊，邵又经常出门，便与邵夫人汤修慧邀约潘公弼、徐凌霄到邵宅，围在一起以叉麻将消磨时日。他们搓麻将的频率，并不算低，但跟“上海地方，大家小户，莫不终日牌声劈拍”的情形相比，就大为逊色了。

家庭中的方城之战，尽管使一般妇女的“毕生光阴在这中间牺牲了其半”，但为害毕竟不是最大。比较之下，在赌局中的雀战，危害性要远过于此。北京的赌局，总是开在那些达官贵人的大宅子里，此外也有开在招待所、俱乐部等公共场所的。这种赌局，门前军警林立，十分森严，里面却是藏污纳垢之场，什么叫条子，什么吸鸦片，凡是社会上有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差不多都存在。

近代上海，有着大大小小多得不知其数的赌博集团。其中，以孙怡生的花会集团、“义利会”、福煦路181号三家集团最为著名。





福煦路 181 号，原为汇丰银行买办洞庭席家的财产，三层英国式洋房，外有花园，面积约为 60 亩。20 年代末，此建筑为三大亨所租，用来作为规模空前的大赌窟。这个大赌窟的一、二层楼为赌场，有着大小赌室数十间，为各种赌客提供麻将等多种赌博方式；三楼为休息所，备有名酒名烟、大菜咖啡、中西糕点、上等鸦片烟，凡参赌者均可受到免费招待，其间还有美靓少女周旋，因此该处有“白吃、白饮、白吸、白坐”的“四白”之称。

851



民初身着时装的青年女子打麻将。



民国时期，不仅麻将赌博的场所充满黑幕，而且麻将桌上也黑幕重重。在雀战黑幕中，以“抬轿”最为普遍。“抬轿”实是两人串通起来在牌桌上做手脚，从而赢另两人的钱。通常，4人同局，有两人连档。他们在开赌之前，假装素不相识，一上赌桌，则通过口令、手令等联络，互送对方所需之牌。由于两人配合默契，不露破绽，很容易得逞。其余两人，输了很多钱，还不知做了冤大头。

两人“抬轿”赢另外两人的钱，在当时雀战中并不算是最高明的。最厉害的要数一人骗三人的“脱靴”。事前，精通赌术的“麻将郎中”与其余三人赌客分别以不同的暗号系统约定：两人合作到某处搓麻将，终局后输赢对半分。开赌后，“麻将郎中”总是满足其余三人的要求，使各人都以为其在与自己合作，于是有吃则吃，有碰即碰，使出浑身解数来和牌。然而，“麻将郎中”是不在乎每一局牌的输赢的，因为按照他与人达成的输赢分摊的约定，他终究是不会输的，而且暂时输得越惨，最后就赢得越多。

除此之外，雀战中的黑幕还有“斗十”、





“捞死尸”、“葬牌”等。各种作弊方法的盛行使麻将的危害性更加强烈。

民国时期甚嚣尘上的雀战之风，影响所及深入到了民众日常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当时，雀战已不仅成为有闲者的消遣和嗜赌者的主要竞赌方式，而且成了一些人借以谋取私利的手段。

有“和事佬”之称的贺国光，曾任重庆行营副主任、成都行辕主任、重庆市市长、重庆防空司令、重庆宪兵司令、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等要职。他事母至孝，为人所称道，同时也常为他人所利用。由于贺身居要津，很多人都想巴结他。然而，贺国光是一个不易见到的人。一些急于想见他、求他办事的人，便通过贺母的“纸条”达到目的。原来，贺母嗜好搓麻将，求见者就摆出“夫人战术”，让自己的女人陪贺母打牌，而且只输不赢，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待贺母又得兴致正浓时，来人便长叹短吁引起贺母注意。一旦贺母追问，来人就吞吞吐吐地把理由说明。贺母听后，唠叨一番，掏出红绸包着的象牙小章，在一张小纸条上盖上自己的印鉴，给





来人去找贺国光。贺每次接到母亲这种只有殷红印鉴而无一字的纸条，从不怠慢，当即为人解决问题。



天桥露天戏台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赌风极炽，麻将牌已是家喻户晓，而作为舶来品的扑克牌，也甚为首都人士所欢迎。至于军阀中的那班老粗，还是以为传统的牌九来得爽快。可是，曾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却酷嗜方城之战，并且劲头十足。这个孙大胡子有一个癖性，凡是摸到了中、发、白三种牌成为一克时，便将其合在台面上。有一次，他起手就得了三



张中风，洋洋有得意之色，照例将其合在台面上。随后他又摸到了一张中风，也不开杠，也不丢出，藏在自己手里。及至人家的牌和了出来，他才拈出那张中风来，说道：“谁有中风？台面不见。可是被我扣留住了。”有人问他合在台上的的是什么牌？翻开来却是三张中风，大家都哈哈大笑。事后，汤修慧与包天笑谈及此事，颇有疑惑，“他是外交总长呀！怎么如此糊涂”。包天笑调侃道：“那便是郑板桥所说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了吧。”

民国雀战中，奇闻趣事颇多，竟然有些人因此平步青云，有些人人为此丢官免职。

民国时的不少军阀，就像他们从事征战一样，擅长武赌。但是张作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喜欢文赌，并学会了搓麻将。他掌握了雀战的基本技巧后，甚为高兴，认为这是上流人物必须具备的一门基本功。在他入关进京后，见北京的部长人人都会搓麻将，听南方来的文官谈起方城之战总是头头是道，不免要小试其技。张作霖的牌技，并不高明，但每次打牌，他都是赢家。这使他很自得，





以为自己技术高超。其实，这不过是官僚政客为使他开心而略施的小技而已。

其时，有一位政客，想在东北谋一个职务，曾经旁人推荐，得到张作霖加以任用的首肯。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正式委任下来，急得那政客十分心焦。

有一天。政客遇到了一位旧友，其时正好担任张作霖的顾问，便把自己的事同他谈了一番，并请他在大帅前美言几句，以便得到任用。顾问摇头表示，你即有人推荐了，我再为你说项，好像是在追问他。他是个多疑的人。他会怀疑你为什么如此热衷，迫不及待的要在他那里谋事。政客一听，身体凉了半截，当下沉默不语。老友笑道，这事并不是无望了，我有一策可以一试。近来，大帅的打牌兴致很高，我们可以借机在某总长住宅请他吃饭打牌。打牌之时，座中就有你。你是搓麻将的超级好手，但只准输，不许赢。即使自己输得精光，也要使大帅赢得满意。到了那个时候，就一定有办法。

政客开始有点犹豫。其老友即开导他说，现在的时代，吝啬钱财，是难以在社会上立





身的。你要谋一个差事，花几千块钱，算得了什么？人家都要花上万块钱呢。经他点拨，政客开了窍。他按顾问提示他的那一套如法炮制，一边去借某总长的宅子，一边请顾问出面邀张吃饭打牌。这几天，张作霖正闲得很，颇想招人消遣，一经邀请，便欣然而往。

4 人人局以后，张作霖一路顺风，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政客不愧为麻将圣手。他可以把张作霖手中的 13 张牌，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张在等和了，便自己拆了搭子，给他和满贯。12 圈牌结算下来。政客输了 2000 多，张作霖赢了 1800。1800 在张作霖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赢钱一则说明他运气佳，另则表示他手段好，因而玩得十分开心得意。政客开了支票，付了赌款，即匆匆离去。

政客走后，顾问陪着张作霖在烟榻上烧烟，也深贺老师运气佳、技术高。即而有意无意地笑着说，今天我的朋友输苦了。他也不是个有钱人，这次来北京是想谋个差事做。张作霖说，他是你的朋友，那就把支票还了他。咱们一两千块钱，不在乎的。顾问赶紧进言道，我的朋友是要面子的，决不肯收回





支票。他在前清是一位京官，也很有些才干。老帅若能调剂他，给他一个职务，他就感激不尽了。张作霖忽然想起，此人曾托别人推荐过他，便有心成全他。不出一星期，这个政客就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官职。

与此相此，山东某县的一个科长因一场赌博赢得了一个县长，其情形就更令人感到意外了。从1930年10月起，韩复榘统治山东长达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韩强化对官吏的控制，要求每个公务员都要严格遵守《官吏服务规程》。他还规定，每周一、三、五的拂晓，要举行朝会，各级主管要轮流训话，并点名核实出席人数。如果有人不参加朝会，一定要受到惩罚。有一次，韩复榘视察至某县，没有惊动地方官就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他按规定时间去参加县政府的朝会。该县衙门甚为破落，韩一进门就心生不快。及至他发现县政府的官吏远没有遵循他制订的规矩行事时，更是怒气冲天。为了体现他赏罚分明的制度，他当即下条子调升先到场的某科长作县长，迟到的县长降为科长。其实，某科长并非很遵守朝会制度，他是因





为彻夜打麻将。在赌散后懒得回家，才径直从赌场到县衙门去的。没想到因为一场麻将，他竟然因祸得福了。

民国时期，因麻将升官者不少，缘麻将遭谪者也不乏其例。许忠五就是其中的一个。1942年秋，在许忠五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于是由戴笠亲自前往捉赌。戴到许家之时，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但因搜到了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就将许扣押了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以维持生活，当时，郭旭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去领款，自然要去找他。每次领款之时，许妻都要向郭哭诉，说许本人并未搓麻将，是她有时同人玩玩，她愿意接受处分，并托郭代向戴笠报告请将许开释。郭旭曾跟戴笠谈起过开释许之事，因戴认为许这人很坏，连他的钱也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并表示要让他磨练磨练，否则将来要闹出大乱子来，此事便不了了之。结果，许忠五被戴笠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戴笠公报私仇，以麻将赌博为由，将许忠五关了半年，让人看到麻将台下的阴谋，比麻将台上的手脚更加可怕、怵目惊心。

民国时普通的麻将赌博，像其他赌博一样，并不足道。但北洋政府时北京的达官显贵的豪赌，就不能不使人咋舌了。他们的方城之战，一局终结，输去10万、20万，不足为奇。他们不用现款，而以自己的资本为赌本。当时，住宅别墅、书画古董、股票证券，都曾被他们用来作为抵押。这些人，不仅出手极为豪爽，而且很讲究“赌品”。他们不像那班武人，赢了就狂呼大吼，表示得意；输了则粗言秽语，肆意骂人。据赌博圈内的人透露，“赌品”以王克敏为最高，无论输多少，都能泰然处之。口中咬的雪茄烟，灰有一寸多长，也可以长时不坠。稍逊于他的，输得多时，总要皱下眉或轻叹一声以示遗憾。

五、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 ——跑马厅

从1843年11月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一百多年中，旧上





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外国殖民者在这里所干的罪恶勾当，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南京西路的万国体育会，也是赛马界的俱乐部。

旧上海有上海、江湾、引翔乡三个跑马厅，其全名：上海跑马厅为“上海跑马总会”；江湾跑马厅先名“江湾赛马会”，后改称“万国体育会”；引翔乡跑马厅，初名“远东公共运动场”，后改为“中国赛马会”为了便于叙述起见，下文依据上海人习惯，概称上海跑马厅、江湾跑马厅、引翔乡跑马厅。其中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海跑马厅，就成了旧中国最大的赌场。因此人们讲到的上

海跑马厅，大抵是指旧址在现人民公园一带的这个跑马厅，而把江湾、引翔乡两个跑马厅忽略了，实质上这三者是一丘之貉，同流合污的。

1. 上海跑马厅

上海跑马厅的开办过程，有三个阶段，开头由第一个跑马场地，逐步向西迁移和扩大。



上海跑马厅外景，在此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香槟赛二次

上海跑马厅，先后迁移过三个场地：第一个跑马场在今河南路丽华公司一带；第二个跑马场在今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第三个



跑马厅即今之上海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

(1) 第一个跑马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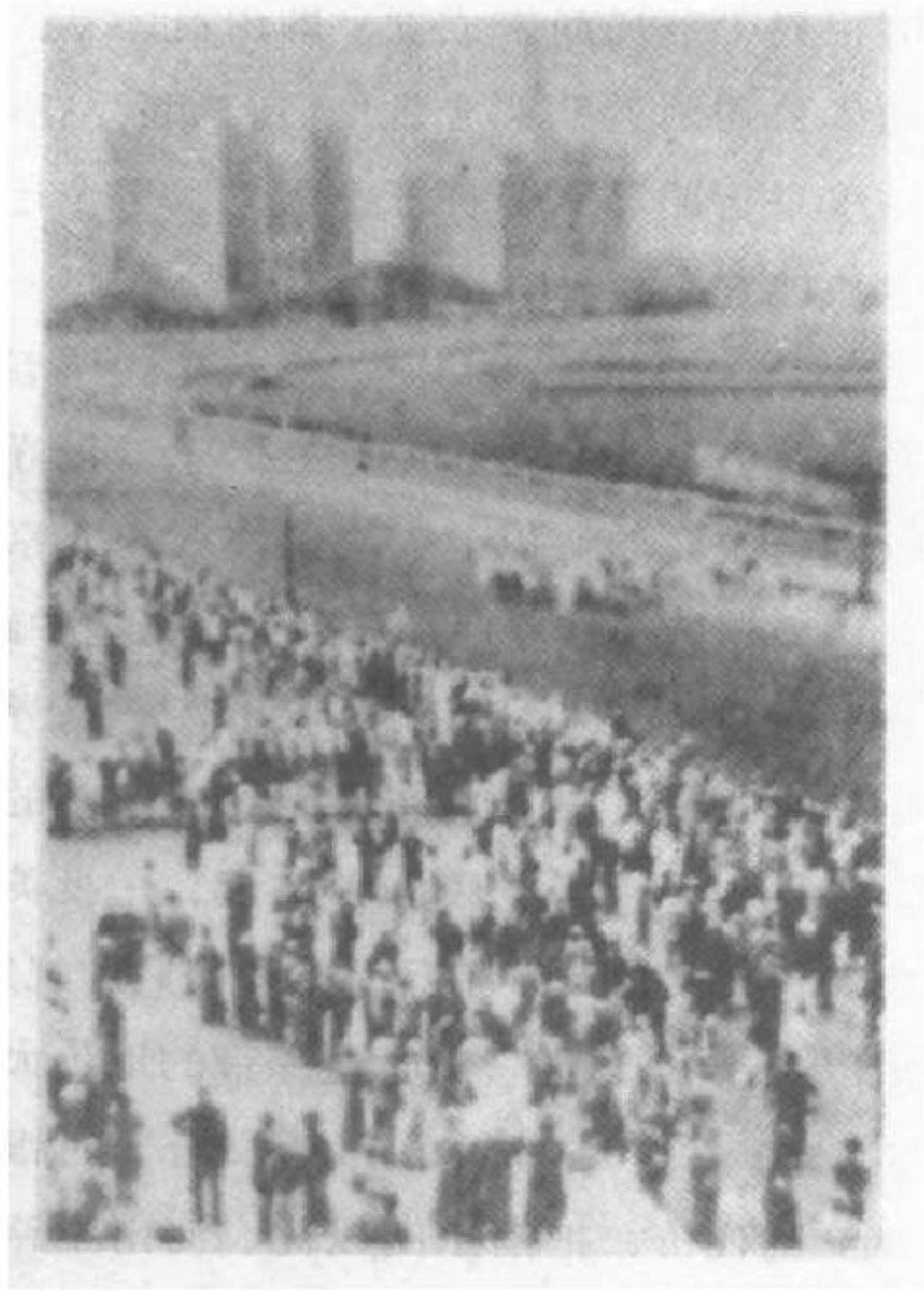
远在 1850 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不久，那时租界工部局尚未成立，即由英国私人在今丽华公司附近购买土地 80 亩，辟为花园，在这里举行跑马和各种球类运动，至今还有叫这块地方为抛球场的。

1845 年 11 月，上海道台在英国侵略者的胁迫下，公布了《洋泾浜地皮章程》。以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现北京东路）以南，黄浦江以西，界路（现河南中路）以东的约 830 亩地，作为“英租界”。从界路这个路名来看，显然现在河南中路以西的地方，不是租界。可是从 1849 年起，一批英国殖民者冒险家借《洋泾浜地皮章程》的规定，每亩以制钱 15 千文（当时这一带的地价大约每亩 15 千文至 35 千文，15 千文合当时银两 10 两）的代价，把南京路以北、河南中路转角一带的地皮强购了去。这块土地究竟有多少面积，已无法查考，仅知其直径为 800 码长。骑马的人，因嫌场地太小，不能驰骋，常将马骑到半泥半石的大道上来。马路的由





来就是因为英国人经常在大道上跑马练习。以后，马路便成了租界道路的代用名词。上面一幅地图，是根据有关资料及《上海简史》



跑马厅赛马即将开始时的场景

上的一张 1855 年上海地图拟绘出来的，借以和第二、第三两跑马场地对比一下。



1850年，上海跑马厅委员会的委员有：霍格、吉勃、蓝格兰、魏勃、派金、等五人。随着来此的殖民者的增加，这里日渐繁荣了起来。这批“淘金者”见有暴利可图，1852年至1854年间就把跑马厅的场地分块出卖造屋，再在现在永安公司到海口路、北海路一带，连骗带抢收买了一大片农田，开辟新的跑马场——第二个跑马厅。

(2) 第二个跑马场地

上海跑马厅的第二个场地，大家仅仅知道在今永安公司一带，究竟多少面积，位于何处，语焉不详。现在根据前图中第二个跑马场地的方园及四周地界，可以看出它的面积占地应在170余亩以上。

当外国殖民者以高价出售第一个跑马场，准备以低价买进第二个跑马场土地的时候，有一个当地兴化会馆的首领李云仙就挺身而出，领导群众进行反抗殖民者圈地的斗争，遭到武装镇压。李云仙等就参加了上海小刀会起义。文莱德在《廿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通商口岸印象记》中承认说：“购地时中国人民很反对，有争执，有风潮。”1862年在六





合路转角乔治大拉斯龙飞马车行老板的马房对面建立一座跑马看台。这时赛圈里面还有一个村庄，障碍观看者的视线，于是由西侨体育会的董事会恩都士、希尔德、摩尔、邓脱等，购进赛圈内 40 亩土地，作为曲棍球场和其他运动之用，把所谓障碍视线的村庄折毁了。

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江南的地主豪绅，纷纷逃到上海租界，托庇帝国主义的恶势力。“租界”原来只住外国人的，这时涌进了大批满载着人民脂膏的地主官僚，租界的地价随之飞涨。殖民主义者看到发财的机会来了，在 1862 年就把永安公司原址一带的跑马场地又分块高价出卖，得款银 49,250 两，获利至多。

(3) 第三个跑马场地

现在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那块地方，是当时上海跑马厅的第三个跑马场地。而它之所以向西移动，与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1853 年（清咸丰三年）当太平军从南京东下，攻克镇江之后，英美总领事组织“义





勇队”，英美侨民一律编入义勇队，企图达到洋人全权管理租界的野心。借口清军行动妨碍租界安全，1853年4月3日，英美领事协议义勇队和美舰“普列茅斯”、英舰“埃姆康泰”上的海军，沿派克弄（今南京路）向上海跑马厅的第二个跑马场地集中，对新闸路方面的清军北营炮轰，激战二小时，清军被迫撤退，此即西人所谓“泥城之战”。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领导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上海城，并逮捕了道台吴健彰，杀死了知县袁祖德，使外国侵略者大为震惊胆寒。9月9日，美国公使马沙利带了传教士晏玛太进入上海城，会见了刘丽川，虚伪地赞扬起义军，并声明：美国在小刀会与清朝之间采取中立政策。接着口口声声说他们从“人道主义”出发，要求把吴健彰交与他们看管。这些殖民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又与清政府勾结，囤兵“租界”，协同清军镇压小刀会起义军。

1855年2月17日阴历春节，小刀会起义军突围退出上海，刘丽川壮烈牺牲以后，英国侵略者便向西藏路以西的土地转念头了。





这时，上海跑马厅的委员会以霍格等为代表，通过英领事麦华陀，向上海道台要求在西藏路以西地段，征用一条 1.25 英里长、60 英尺宽的一圈跑马跑道，约 54 亩，并说明跑道只要一圈，里面的土地，仍可由农民自由耕种。霍格对英领事说，英国人出面购买有困难，最好由中国官厅来强迫圈占。历经了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之后的清朝官吏，对洋大人的话当然是唯命是从。于 1861 年出布告通知，泥城浜（今西藏路）以西农田，由英国跑马总会圈占。于是由一个英国军官、跑马总会的会员，神气活现地骑了一匹战马，从现在的西藏中路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起步，向西由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折入马霍路（今黄陂路），再向东经过跑马厅路（今武胜路）至现在的工人文化宫，折向北沿西藏路回至原地，兜了一个大圈子，凡是马蹄踏过的地方，都钉上木木椿用绳子圈起来；接着，就由上海道台向农民强行征用。据老一辈人说，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圈占的第三个跑马场地没有花钱，可能就是指这一圈跑道而言。从此，这一圈跑道便为跑马总会所占





有了。这就是上海跑马厅的第三个跑马场地。

(4) 上海跑马厅的组织情况

上海跑马厅——上海跑马总会之下有两个部门，跑马场与俱乐部。今之上海图书馆楼上，即是它从前的会所、办公室和俱乐部；楼下是跑马场出售马票的赌博场所。

上海跑马厅原由股东合资开设，股东大多数为英国人，间有少数其他国籍的外人。它的资本由几个洋行大班承认下来，资本多少，对外从来未公开过。有人说是 100 万元。后来，全部移归跑马总会所有，只有英国世袭伯爵、怡和洋行大板约翰逊的一股，由于他的回国，移转与他所经营的怡和洋行，但并不向跑马总会收取股息。

它的最上层是委员会或称董事会，设主席或称董事长一人，委员或称董事若干人，这些人都由外国殖民者淘金巨头担任。第一任主席是约翰逊，他在跑马厅里势力最大。在他回国后，由祥茂洋行大板盘尔哥继任。此外还有一个以海损计算为主要业务兼营进出口的壳件洋行大板克拉克，他又有名的汇票掮客，是个所谓“中国通”的精灵鬼，





后来曾任江湾跑马厅的董事长。担任委员的先后有生长于上海拥有西藏路转角新世界一带大量房地产和开设龙飞马车行的大拉司；汇票大掳客，拥有“马立斯”今威海路重庆路一带大批房地产的马立斯；鸦片大贩子、新沙逊洋行老板、英籍犹太人跷脚沙逊等。此外还有马拉、老歪哀脱及美国人海立司等等。

马厅下设一书记，月薪达 2000 元，还要供应其一切生活费用。此人权力很大，众称之为谓“大板”，表面上系奉委员会之命行使职权，实则遇有真正重大事件，才请示委员会。任职最久的是丹麦人亚尔逊。他以一个小职员起家，媚上压下取得书记之职，并因此大发横财。

书记之下设一副秘书由华人担任，实际上系买办性质，所不同的是一般买办要付一笔巨额保证金，而他则不需付保证金，他的办公室，人们称之为买办间，凡跑马厅中的华籍职工，均由他雇佣，采包干制，向书记（实际上的大板）负责，因之他在华籍职工中权力很大，职工要缴保证金与否，由他来决





定。

在赛马场内也设有各种管理员，系名誉职，执行各种任务。象赛马顾问、马圈执事、等级过磅、裁判员、起步指挥、记时员、竞赛预让制订者、调马场或上马圈监守、彩券分配、瞭望台监守等等。这些名誉管理员会在正式会员中选任之，委员会委员亦得兼任。

在它的会员俱乐部内，设有各种干事亦系义务职位。执掌和管理各部门事务，象滚球室、弹子房、游泳池、网球场、饭厅、厨房、酒吧间、舞会、打牌间、房屋保养等等，均设干事。总之，凡有一种名称的部门，便有一个名誉执掌管理的干事。这些干事也是由上级委员会在正式会员中选任的，委员会委员同样地可兼任的。会员入会后，便可在跑马厅内享受各种活动的权利。

要想成为上海跑马厅的会员，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申请者必须是除华人外的非殖民地国家的年满 21 岁有正当职业的人。其次要填具入会申请书，项目极繁，俟积满五、六张申请书时，即召开由 9 人或 11 人组成的投票委员会（由上级委员会选任，一年一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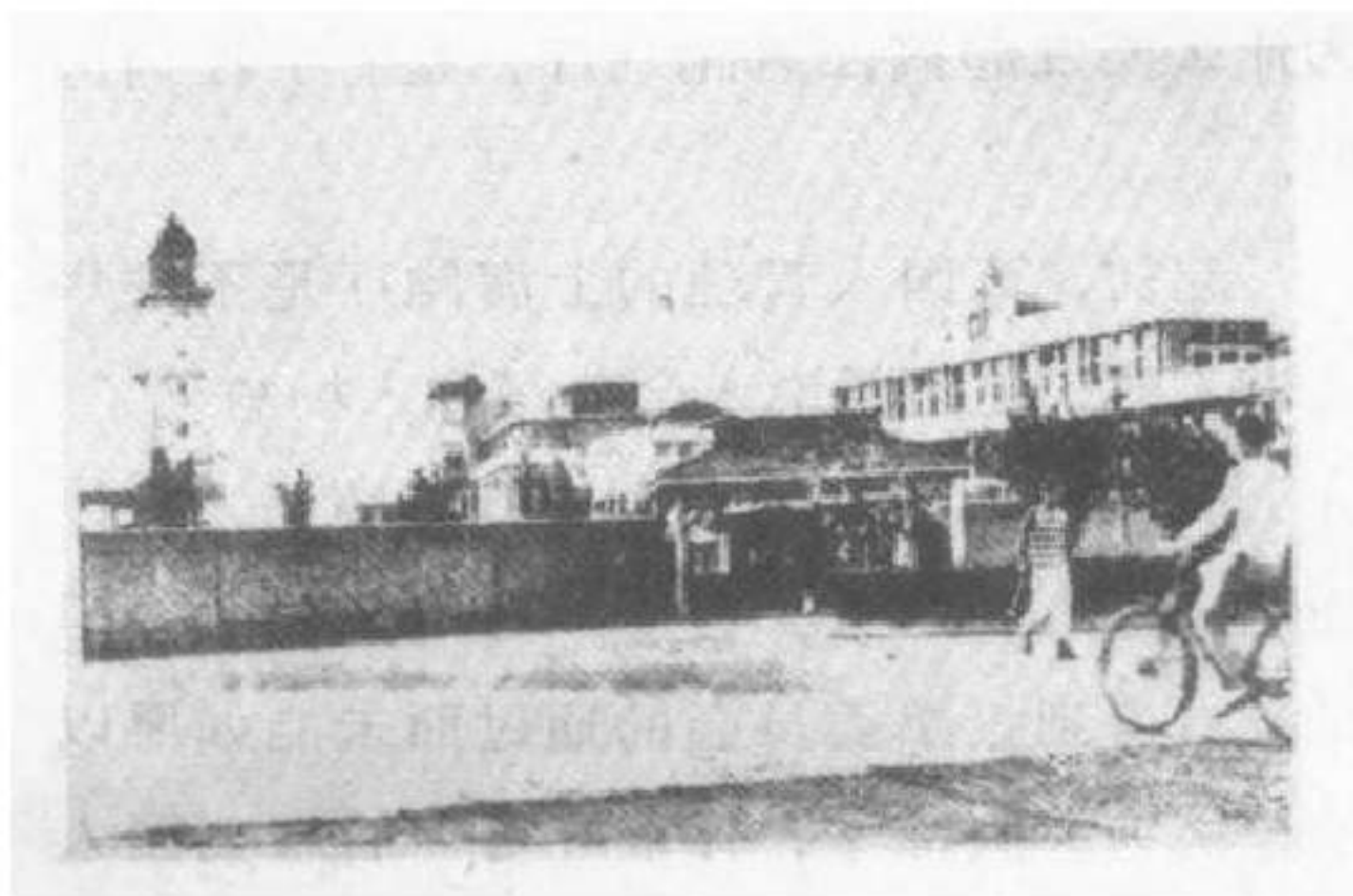




根据申请书之多寡来决定委员会人数) 进行会议投票表决。投票方式, 系设密封的投票箱于桌上, 各个委员根据自己的见解, 分别投黑白子于箱中, 凡同意申请人入会的段白子, 否则投黑子。每一申请者各设一密封箱, 书其姓名于箱上, 投票毕开箱检视, 若全部是白子即作为通过, 准其入会为正式会员; 如果投票结果有一颗黑子者, 保留其申请资格, 等下次投票委员会开会时, 再进行表决; 如果投票结果有二颗黑子者, 则需过一个时期再进行填表申请; 凡发现箱中有三颗或三颗以上黑子时, 则此人永远取消其申请入会资格, 不能再行申请了。1908 年时上海跑马厅有正式会员 320 名, 其他会员约 500 名。到江湾跑马厅成立以后, 由于同业竞争关系, 才吸收一些中国人为名誉会员、聘请会员、社会会员等, 参加上海跑马厅的赛马。这些会员虽也发给证章, 但与正式会员的证章式样不同, 每月缴会费 10 元则是相同, 对于赛马依然加以歧视, 只限于每年元旦上午的新年赛马 (一般正规比赛均在下午举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上海跑马厅由日





江湾体育会路的江湾跑马外景

873

本军管理，它的董事会组织名单：主席是周文瑞、副主席是山口义治（日人）、董事有林振彬、罗忠诏、肖智吉、童振远、吴麟坤、增子大太郎（日人）、大土冢常吉（日人）等。

还有名誉执事、磅称、票务、摇彩、终点评判及扬旗起步若干人。

2. 江湾跑马厅

江湾跑马厅的发起人叶子衡是号称千万富翁叶澄衷的第四个儿子，入日本籍，任性使气。他曾任日商台湾银行买办，仅仅是挂挂名，实际工作是他的干儿子周文瑞去做的，因之有些人便以为周文瑞是买办了。叶子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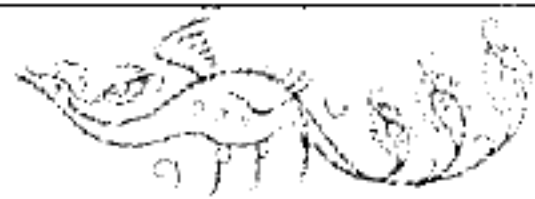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发起搞江湾跑马厅，是有一段内因的。

起初，英国人管理的上海跑厅是不准华人进入的，更不要说入会养马和入场骑马了。叶子衡是入日本籍的，由于爱好骑马，自以为仗日本人的牌头，可以入会参加赛马，但是没有得到投票委员会的通过而未能如愿以偿，认为大失面子，怀恨在心。后来英国人克拉克因做汇票生意与叶混得很熟，知道叶的心事，便偕同他一道去香港，设法参加香港赛马会比赛。返沪后，想援香港例加入上海赛马。结果仍遭外国殖民者的拒绝。他一怒而大发少爷脾气。便以中国人身份、挽回利权为藉口，集资创设江湾跑马厅。据他的儿子叶谋卓说：“当时投资人全系中国人，资本总额为 50 万两，分为 5 万股，每股 10 两”（另据一董事胡筠籟说：“共 8 万股，每股 25 两，发起股每股 5 两，分红时比普通股为多”）。拉拢当时和官场有勾结的虞洽卿为董事长，叶子衡自任副董事长。集资以后便进行圈地。当地农民为了自己的生活，群起反对。他们便利用官厅势力，强加压力。上海





知县奉了上司上海道台袁海观（一说是蔡和甫）的命令，坐上蓝呢大轿，亲临现场监督圈地。据当时经手圈地人之一的张予权说：“初期圈地 700 多亩，后来扩充到 1300 亩。”和江湾跑马厅毗邻的叶家花园（现在是肺结核病疗养院）即是叶子衡当年以办跑马厅期间的利润所得建筑起来的私人园林。

江湾跑马厅系在 1909 年筹备，1910 年建筑，1911 年开赛。1917 年扩建，1924 年更为扩大，陆续兴建看台和办公大楼。所有扩建经费，尽是从历年赛马抽头中除去股东及当权者的酬金、红利以外拨付出来的。

江湾跑马厅的内部组织与上海跑马厅是基本相同的。董事会（等于上海跑马厅的委员会）设正副董事长各一人外，另有董事八人，一年一任，均由红股股东中选任。书记谭亚声的职权、薪工待遇和上海跑马厅书记亚尔逊一模一样，但是自从后来叶子衡送红股给克拉克后，董事会便成中西“合璧”，华籍董事有贺其良、胡筠籟、徐超侯、叶子衡、张经贯等，洋人董事有约翰逊、克拉克、盘尔哥等。至此，江湾跑马厅正式由江湾赛马





会改名为万国体育会。现在的北京西路 722 号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的会址，就是当年江湾跑马厅的万国体育会的会址。这所房屋的建筑费，除由该会剥削得来的头钱（或佣金）外，是由克拉克经手以江湾跑马厅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来的。原拟建造公寓大厦，所以底脚打得很结实，后来因为上海跑马厅以这个新建筑物的高度不能超过上海跑马厅的高度为理由，提出反对（当时上海跑马厅的新屋大钟办公大楼尚未建立）所以只造了二层楼。时任上海市长的张群参加了开幕剪彩。到抗日战争爆发，江湾跑马厅被毁，汇丰银行逼还借款很急，不得已只好将会址出售与犹太总会，以之清偿债务。之后，犹太总会又以美金 40 余万元的代价，售与上海市棉纺织同业公会，拟作为该会会所，又被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强行租去，一直到解放后才收回。

江湾跑马厅董事中有个徐超侯，是叶子衡把他拉进来出面的。徐曾留学英国，与英逊皇爱德华八世同学，两人均好骑马，建立了友谊。叶子衡拉徐超侯出面的目的是拉拢





英国人来参加赛马。叶子衡又把比赛时头、二、三马的趟头银子（奖给马主的彩金）提高，星期日也举行赛马（上海跑马厅的老例，规定礼拜六为赛马日，礼拜天是休息日不赛马）。这样一来，一些一般外国人见有利可图，便跃跃欲试了；可是由于他们上层人物的阻挠干涉，叶子衡依然不能如愿以偿。

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即位后称爱德华八世。在他未接王位时，有一年曾巡视远东，路过上海，乘便邀晤徐超侯。徐与他谊属同窗，为尽东道，约他到江湾跑马厅去骑马，英王子首肯。事被上海的英国领事知道了，认为如有意外，责任太大，在皇家面上无法交待。同时也会让上海跑马厅感到难堪。便一方面竭力阻止，一方面请徐超侯取消前约。江湾跑马厅董事会乘机正式建议，两个跑马厅互相合作，彼此均可参加对方的马赛，否则不允许收回日前的邀请。从此洋人就参加江湾跑马厅，且担任了董事而改名为万国体育会，可是华人仍不得加入上海跑马厅为正式会员。到后来虽然条件慢慢放宽，限制也逐步放松，不过在英国人控制之下，始终没





有一个华人参加为正式会员。

江湾跑马厅之人会手续较上海跑马厅简化得多，不论中外人士，只要有一位董事的介绍，另一董事或会员的赞同，便得申请人会为正式会员。

“一·二八”沪战时，江湾跑马厅毁于炮火，便借上海跑马厅赛马，因为江湾、上海两个跑马厅都是由英国的纽麦盖脱联系总会承认和批准的。纽麦盖脱是世界赛马场的发源地。在传统习惯上，世界各国设立的赛马会或跑马场大都经过该处的联系总会的承认和批准，一经承认和批准，都有相互协助的义务。引翔乡跑马厅同样毁于炮火，由于没有办理是项申请登记手续，便不能和江湾跑马厅一样，借用上海跑马厅赛马。

3. 引翔乡跑马厅

成立于1924年的引翔乡跑马厅历史较短。当时上海的一批“白相人”（帮会、流氓），看到跑马这个玩意儿的油水很足，十分眼红。但是上海跑马厅是外国殖民者独占的禁脔，流氓虽凶，亦插手不进去。江湾跑马厅已有相当基础和具有特殊势力，并且已与外国殖





民主义分子勾结成为华洋合作，也无从轧脚分肥。之后，便在“提倡体育”、“挽回利权”、“举办慈善副业”等等漂亮名词下，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勾结，特别是在吴铁城当了上海市市长以后，这个引翔乡跑马厅，便与上海、江湾两个跑马厅同样成了跑马大赌窟。

该跑马厅最初系远东公共运动场，发起人为范回春，浑号“象牙回春”，是一个从事商业的帮会中人。由于他在强圈农田时，激怒人民，纷纷具状控告于县衙门。1924年下半年，齐燮元战胜卢永祥后，齐的部下张允明“克字军”进驻淞沪，范回春花巨金谋得县长缺，借以销毁对他控诉的许多档案。

范回春办远东公共运动场的目的是赛马，但是由于离市区较远，更因设备简陋，拉不到马主和骑师，无法进行赛马。便改赛马车以吸引赌客，依然门前冷落。于是，由汉口大商人刘子敬出面，成立中国赛马会。集资向远东公共运动场租用场地，进行赛马。第一任董事长是同泰钱庄老板谭竹馨。谭亦是帮会中人。一年以后，由杜月笙担任第二任董事长。这个跑马厅的主持人自始至终，均





是帮会中。董事方面还拉拢一些上海“闻人”，如张啸林、叶子衡、周文瑞、张经贯、贺其良等。虞洽卿是名誉董事。它的内部组织，也是依照上海跑马厅。秘书（书记）一职由颜连庆担任。

引翔乡跑马厅的上海会址，最初在今之南京西路新成游泳池之西、国营旧货商店之东的一幢小洋房里，后来迁至石门二路德义大楼二楼全部。由于会员徐士浩（律师）等在会所内聚众豪赌，被当时“英租界”巡捕房捉赌而再次迁至“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卢湾区产院）的一幢大洋房内办公。

引翔乡跑马厅和江湾跑马厅的人会手续是完全相同的。

自从太平洋战事发生，英美殖民主义分子，被日本侵略军关入集中营以后，跑马厅的赛马，便由日本侵略军接管，拉拢一批汉奸出面组织“上海赛马会”继续跑马，允许引翔乡跑马厅、江湾跑马厅的会员加入一起参加赛马。至此，上海的三个跑马厅合而为一了。





六、上海跑狗场黑幕

1928年上海开始有了跑狗场，先后出现了明园、申园、逸园三个跑狗场。现在，来谈谈三个跑狗场的内幕概况。

第一个跑狗场叫申园，是从1928年1月开始筹备的。倡首者为万国体育会上海跑马总会的会员英商麦边洋行经理麦边。他看到英国伦敦在三年前，曾因各足球场的业务一蹶不振，经改设跑狗场而使业务得以兴旺，以后又盛行于美国，都获厚利，由是想起仿照跑马场的赌赛方法，在上海创办一个跑狗场。因之他草拟了开设跑狗场的计划，向上海跑马总会建议，得到了多数会员的赞许。其中最感兴趣的会员，就是以经营地产致富曾取得华籍资格的马立师。他一贯用欺骗威胁的手段以极低的价格，向我国贫苦农民收购大批土地。当时他正苦于没有出路。所以竭力赞成设立跑狗场。他首先答应把他在华德路（今长阳路）购置的60亩地产出让，作为场址，这样就解决了跑狗场的第一个场地问题。再由赞成这个计划的会员作为发起人，





很快拟订出跑狗场章程，规定基金为 50 万元，一面募集股款，分为发起股和普通股两种，每股票面额一律定为 10 元，在股款募集以前，先由汇丰银行借垫，立即在华德路场所兴工建造；一面打电报到伦敦去定购所谓韦匹脱的赛狗和电兔等设备，到 2 月中即有二百头赛跑狗运到了上海，施以训练。明园办事处设在广东路 2 号，麦边担任这个跑狗场的董事长兼副经理，另以上海跑马总会会员甘璧尔为总经理。由于这些外国人的尽力鼓吹，赌客纷纷认购跑狗场的股票。据那时的《晶报》报道，华股占全部股份的十分之七，都为普通股。后来又加招了一次新股，根据明园同年 6 月 20 日在《申报》所登的一个广告，有所谓“续发资本余额之一部分计八千股，应由已登记的股东优先认购，每五旧股票得认一新股；新股票面数额仍为十元，但缴款时须加收二元五角”等，从这里可以推定，新股数额至少有 10 万元，而每股已涨价四分之一，并且这是在明园已于 5 月 26 日正式开幕之后再来增资的。认新股的，最大多数仍为华股，至此时，中国人在这个跑狗





场的股本，当在股金总额 60 万元中占四分之三左右，约为 45 万元。

继明园而起的是由上海赛狗总会发起的申园跑狗场。主持者为英人伊文思，办事处设在爱多亚路 6 号（今延安路），场址在胶州路，占地 60 多亩，也是由马立师出售的。申园的基金同样定为 50 万元，分作 5 万股，每股 10 元，没有发起股和普通股之分。共原因是：一由于那时的租界的一般舆论，对明园特别优待发起人、歧视普通股东，极表不满；二由于明园事权完全掌握在上海跑马总会少数英籍会员的手中，他们不但歧视普通股东（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为中国人），而且对于与他们有利害关系或比较疏淡的英国人和其他外籍商人也非常漠视，故伊文思等人愤而另起炉灶，组设申园，以与明园对抗，争夺利益。据说申园成立的风声出现，它的全部股份就为不满于明园的中外人们一抢而空，华股占到十分之七以上。申园的一切规划组织和场内布置，大致都与明园相仿。那时以英帝国主义者为首的公共租界中，英国人之间和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他们的利害冲





突程度，完全达到了尖锐化，中国人民则是这种竞争中的真正受害者。

当公共租界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为筹备这两个跑狗场明争暗斗时，不甘示弱的法国人及在法租界称霸的荣、杜月笙等，都异常眼红。他们认为，明园和申园的气魄不够大，资本太少，规模太狭隘，地点也不适中，这样难以达到他们更贪婪的欲望。于是，他们立即成立了一个所谓法商赛跑会——逸园跑狗场的筹备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 22 号。法商赛跑会的基金，据说是 150 万元，也有人说是 200 万元的。总之，他们的第一个企图，就是要拿资金来压倒明园和申园两家跑狗场，以转移上海中外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对这件事情自告奋勇的，除马立师出售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约百多亩地产、折价作为股本而外，还有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司比门，他从储蓄会垫拨现金 100 万元，作为跑狗场的建造费用。在这三个跑狗场中最得利的，则是马立师，他售出了二百几十亩地产，又获得了占股最多的优厚权利。法商赛跑会的股份，每股 100 元，为明园和申园





每股票面额的十倍，由于杜月笙等的特别卖力，股票销售很快，不久就归还了万国储蓄会 100 万的垫款。司比门因此取得了法国赛跑会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位。逸园的建造十分考究，内部都用钢筋水泥，外墙都用红砖砌成，一切装饰尽采法国形式，而且业务不限于跑狗场，还设有足球场、跳舞场、酒吧间、大餐厅，以及为其它体育运动用的拳击和摔跤等表演场所。

以上三个跑狗场的正式营业，最快的是明园，它在 1928 年 5 月 26 日开幕，先期试赛两次，每次都邀请上海中外各界的名流要人，特别是中外各大小报馆的记者前往参观。许多报纸都替它尽力宣扬鼓吹。《申报》在 5 月 25 日的第四版本埠新闻栏内，还特别登载了一段题为“明园第二次试犬记”的新闻，并附有“明园赛狗场之一角——司电兔机之高台”和“明园赛狗场之大看台”三张照片，以及“明园赛狗场说明图”。明园正式开赛以后，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晚上，从九点到十一点半，共举行“平赛”和“跳栏赛”六次或更多。每次先发售狗票，分





“独赢”和“位置”票两种及摇彩票以赌输赢，中彩者分别从各种收进的票款内扣去佣金后，再按票数配给奖金。佣金的抽取标准，狗票抽百分之十五，摇彩票抽百分之二十。《申报》并在明园每届举行赛狗的当天，报上登载“今天明园赛狗之节目及预测”的新闻，次日又郑重其事地登载上一天明园赛狗结果详情。这充分表明，那时的《申报》是在大卖气力地替明园做引诱和招徕顾客的鼓动工作。其他接受明园津贴的小报，拚命为明园宣扬更不必说了。明园为急于推广业务增加利润，在它开幕后的第四天起发行“套头摇彩票”，在广东路2号书记处出售，以使不到场的顾客得到购票的便利。据说这种“套头摇彩票”的固定号码是从第一号到三百号止，得中者可在规定限期内到广东路二号兑取奖金。明园还考虑到，单以“平赛”和“跳栏赛”两个普通节目来号召还不足引起顾客的兴趣，乃于5月31日举行“开幕杯决赛”和“开幕跳栏杯决赛”，开幕杯得胜者，头奖500元及银杯1只，开幕跳栏杯得胜者，头奖300元及银杯1只。以后经常巧立各色各样的决





赛名目以引诱顾客，每换一次新花样，场方就能收到利润激增的效果。据说，明园每晚从门票、看台票和马票、摇彩票抽取的佣金中所获得的收益，至少在七、八千元以上，如遇有举行新花样赛狗的时机，它的收益常超过倍数。还有一些外国赌客，用明园预先发表的每次赛狗的名称和号码，在场外赌“独赢”和“位置”的输赢，以明园宣布的结果为他们胜负的标准。他们既可避免佣金的剥削，又可不受赌注的限制，每晚输赢出进的金额为数甚巨。这是为轮盘赌以外创立的新赌局，也是比跑狗场危害更大的一种赌局。这种赌局影响到了跑狗场的业务，但明园和申园均没有任何办法。直至明园和申园相继被取缔停歇之后，才由逸园同经营这种赌局的人取得利益均沾的协议，允许他们在跑狗场内公开赌博。

7月31日申园正式开幕。《申报》早在7月8日就为申园举行第一次摇会狗抽签的事情，在第四张本埠新闻栏内发表过一段纪事，并附有“申园赛狗场路线图”，它这次抽签所得的摇会狗计75头。申园在7月20日又举行





第二次抽签，计得摇会狗 40 头，均先后在《申报》上登有招引会员承租的广告，规定租期为 12 个月，每年纳租费 125 元。那时申园所有能参加赛跑的摇会狗，只有 115 头，比明园要少 80 多头。申园在业务和经营管理，甚至在应付租界当局和中外大小报馆方面的一切措施，都取法于明园。申园举行赛跑的日期，定在每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上，每晚跑狗和摇彩次数，同明园一样。从申园开幕起，《申报》都把它每届举行赛狗的节目和预测及结果，按日在本埠新闻栏内发表。英租界当局还经常派遣苏格兰军队的袋笛乐队到明园和申园的场所内奏乐，为它们招引更多的顾客。据说，申园每举行赛跑一天所获得的收益，常逊于明园，而它们每月规定应报效租界工部局的分赃定率，都是从除掉正常开支以外的纯收益中同样抽取百分之四十，工部局则在它们举行赛狗时，由捕房派出巡捕十数名到场内外巡逻弹压。

在明园和申园开幕后不久，对本国人民所受这种赌博的苦痛，有正义感的人士非常愤恨当局，但又不敢公开抗议。至 8 月 24 日，





有署名为“天马”者在《晶报》上登有一段“租界当局宜取缔跑狗场”的新闻。“天马”指出：“跑狗场完全以赌博为号召，每场每星期赛两次，星期日不停赛，有一元即可博胜负，受其害者至为普遍。”同时，《申报》记者也在8月28日的本埠新闻栏发表了一段“赛狗声中的悽惨者”的新闻，它指出：一个通州人叫卞荣方的，服务于美商海商洋行，因狂购狗票，始终得不到分毫彩金，亏债累累，犹不悔悟，仍想翻本，以图弥补，结果不到一月，用去洋行四千多元，被大班查悉，最后送上海临时法院审讯。“天马”又于8月30日在《晶报》上，对那时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党部”和“市政府”声言将不许各报馆再登载各跑狗场的新闻和广告一事，发表了一段以“禁登狗广告”为题的新闻，他主张须禁跑狗场，仅禁止登新闻和广告无实效。并且说：“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平日颇明事理的商人，至此亦利令智昏，群思仗狗力，借狗势，以发狗财……。望各报馆主笔勿贪此区区之广告费而遗毒于市民也。”“天马”的这个劝告，对《申报》来说，果然发





生了效力。从9月1日起,《申报》上就不再见有各跑狗场的广告了。但是,蒋介石在那年8—9月之间,来过上海两次,对民怨置之不理。

当明园刚出现的初期,它的票面额仅是10元的股票,而在市场上的涨风,十分猛烈。发起股一度涨至100元,普通股涨至30元。同时,申园的10元额股票涨至25元;逸园的百元额股票也涨至270元。经舆论的反对,票价就日见跌落,到9月中旬,明园的发起股票跌至40余元,普通股跌至15元;申园股票跌至11元;逸园股票跌至140元。实际上,那些原来的股东,绝大多数在涨风最高时期,早已全部脱售,到跌到最低限度时,他们又贱价补进了,从中获取暴利。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上海新闻界有一个被派在日内瓦的记者夏奇峰,他在9月22日曾把上海英租界两个跑狗场危害我国人民的情况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外交副大臣、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代表蓝普森,蓝转给英外交大臣克辛登爵士。英外交部10月回复夏奇峰的信说,跑狗场的事情本系属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现





正交由英国驻华公使加以注意。夏把这事的经过电告上海总商会。英政府虽然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身上，但它也觉得这是一件失体面的事。假如当时蒋介石有要禁止上海开设跑狗场的决心，那也是办得到的事情。

那年的冬季法商赛跑会是在逸园跑狗场开幕的。由于它的地点适中，资本雄厚，规模宏大，构造坚固、布置周到、设备齐全和内容充实，特别是由于法帝国主义者和各方的恶势力的互相勾结，逸园从开幕起就在很长时期内经常保持着顾客满场的局面。虽然它同明园和申园的协议，在赛狗方面，只分派在每星期二、五两晚有正式跑狗的权利（明园分派在每星期三、六两日和星期日的晚上举行，申园分派在每星期一、四两晚举行），但是它还在每星期日的下午二时至五、六时，也照样举行。此后，上海的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的下午，许多梦想发财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沉迷在这三个跑狗场所了。与此同时，1928年，上海大绑票案，凶杀和自杀案等大为增加，这与三个跑狗场不无关系。





尤其是，逸园在每星期二、五晚上和星期日下午照常赛狗之外，还经常举行跳舞会、足球赛、拳击和摔跤表演等种种引人兴趣的活动；就是它在赛狗方面、也创出了一些与明园、申园特别不同的花样。例如“双独赢”、“联位赢”等等，以增长它对购狗票者更多盘剥的机会。据说，逸园单在跑狗场一部分每趟所获得的收益，常达万元以上。它不但榨取了赌客的膏血，也影响了明园和申园的业务。但是，明园和申园都无法抵制，只好敢怒而不敢言。法帝国主义者还经常指派他们军队中的音乐团体，到场奏乐，至于派遣大批巡捕来场维持秩序，更是例行的事情。

在逸园开业之后，正义之士继续抨击这种现象。上海特别市政府为了敷衍那时的舆论，也曾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过所谓禁止跑狗场的建议。租界当局早已了解此中内幕，也就虚与委蛇地答应相机处理。这样的局面维持了好几年。后来，明园和申园的业务逐渐显出不景气的现象来了。明园首先宣布遵从工部局的禁令公告停业（大约在1932年）。申园则借口本金尚有亏损，须特赚足本金以





后才能遵停。实际并不是这样，它想同逸园平分秋色，借此可再捞一笔暴利。于是，申园又干了差不多两年，始宣告停业。逸园在明园和申园相继停歇以后，它收购它们遗留下来的赛跑狗，又吸收了它们拆散出来的大批股东，更取得了垄断上海的寡头地位。

逸园取得独家经营以后，把以前对于狗票，包括独赢、双独赢、位置、联位赢四种抽取 15% 的办法，改为一律抽收 20%。狗票佣金收入是跑狗场收益中数额最大的一项，这一变更，又剥夺了购票中彩者 6.5% 的权利，而它每趟的收益更因之激增。同时因每趟跑狗次数，由 6 次递增至 16 次，它每趟的总收益至少要涨一倍以上。上海在抗战初期和敌伪统治初期，百业凋疲，民生憔悴，而逸园的业务和收益，在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始终保持着它原来的水平。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寇进入法租界，强迫它须从所收狗票和摇彩票的票款中扣去 50% 作为日寇军费，然后再从余款中抽收佣金和配给奖金。照这样做法，不但对场方是无利可图，而且对买票者也将连本不保，场方表示不能接受。





日寇坚持原议。不肯退让。逸园方面就此被迫宣告停业了。这就是上海跑狗场的最后结局。

七、远东的大赌窟——回力球场

上海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体育馆，解放前一度是殖民主义者以所谓“回力球”的方式进行诈取中国人民钱财的赌博场所，又名“中央运动场”。它是当时法国外交部批准，并经当时上海的法国领事签发开业执照而开设的。

这个赌博场，在其定名之前，曾拟名为跑人场，与跑马、跑狗鼎足而为“三跑”，后来才定名为“中央运动场”。自从场方与球队领队订立合同，改为托包抽成办法后，对外往来都用承包人海阿拉球队名义，于是海阿拉就成了回力球场的代称，反而把原来的名称掩盖了。这是美国人蒲甘想出来的。他勾结了法国讼师逖百克、埃及人海格，及法商汇源信托银公司经理步维贤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陆锡侯、朱博泉、沈长庚等共同发起创设，1929年在上海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建筑





场所。当时登报招股发行优先股计规元 22 万 5 千两，另外发起股 20 万两。事实上发起股是干股，根本不曾拿出钱来，是由几个发起人瓜分而坐享其利的。而且发起股依照该公司的规定，在保证优先股获得股息百分之八后，所有红利是两种股票平分的，譬如：22 万 5 千两优先股分得 22 万 5 千元，那么，20 万两发起股，也分得 22 万 5 千元。在该公司财产清算时，也是按此比例，这是剥削出钱最多的中国股东利益的一种毒辣的手段。

这个公司在筹备期间，就发生了你争我夺的事实。


有三个美国人罗杰律师、泰勒（凿井公司技术人员）和赌徒蒲甘均与朱博泉相识。蒲甘是在上海专搞赌博的，他约朱博泉开办一所回力球场，朱鉴于“英租界”当局迫于社会舆论，正在取缔申园、明园等跑狗的赌场，根据当时形势不可能再搞回力球赌场，乃作罢。蒲甘就想去法租界活动，就去看流氓头子杜月笙、张啸林。当时，杜、张正热衷于卖鸦片，获利至钜，对外国式赌场不感兴趣，蒲甘又去找法租界第一块牌子的刀笔





讼师逖百克，逖认为有利可图，就一同计划进行，于是命其翻译方昇平四出拉拢。方素与陆锡侯相熟。陆过去开小世界、神仙世界等游戏场，有一套白相人方法和人手，因此这个买办深受外国冒险家的赏识。当时，陆在四川南路（当时叫天主堂街）约克大楼开设国民饭店，蒲甘就是该饭店的常往旅客。陆曾因房金计算问题发生纠纷，请逖百克办理这个案件。方昇平就秉承逖百克的意图，趁此机会，进行拉拢。方昇平原是国民饭店1/10的大股东，和陆素有往来，所以进行颇顺利。逖百克是个专门捞钱的吸血鬼，决不肯拿出钱来垫本，而想套在别人头上；陆锡侯也不是傻子，便将计就计，乘机图利，达到他的另一目的。他想，回力球场搞成以后，所有球员和其他有关的外国人，就可兜揽寄居于国民饭店，作为常住客人，让全部房间的一半以上长期出租，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商量结果，陆垫款5000两（方昇平暗中垫1000两），这5000两中，以4000两作为购地定银，1000两作登报招股费用。报上广告登出后，有顾克民者对陆锡侯说：“20万两发起





股，5个发起人平分，每人有4万两，这笔生意不错。”陆闻言愕然，因为他只分到2500两。于是找方昇平交涉，未有结果。在凿井公司开发起人会议时，到逖百克、泰勒、步维贤、百部及陆锡侯5人，蒲甘及英商马海洋行合伙人鲁滨逊亦来参加。陆即提出20万两发起股如何分派，权利是否平等等问题。泰勒专横粗暴，态度傲慢，陆极难堪，不欢而散。于是方昇平出来调解，改期在国民饭店开会，继续商谈。结果，给陆锡侯3万两发起股了事。因为这20万两股款中，法国领事馆要攫去8万两，由他们内部分派，余下来只有12万两了。因当时一般人还不明白回力球是怎样一回事，投机家意存观望，因而招股不能满额，需要陆继续垫款。最终这幕丑剧以外国殖民者让步而告终。

22万5千两优先股招不足，而房屋建筑等亟待进行，陆锡侯在发起股分肥上得到满足，就拿出10万两来，以4万两作投资，6万两作垫款，俟股票售出后收回。由于法国法律规定，必须要法籍股东占股权35%以上，始能作为法国公司注册。逖百克、步维贤这



两个法国流氓均未拿出钱来，乃向陆借股票，作为逖、步名义上的股权，进行公司登记手续。在开公司创立会时，有一个股东颜鲁卿提出，该公司资本中中国人占绝大的比重，应增加中国董事名额，逖百克就以遵照法国法律法籍董事必须有过半数为辞加以拒绝。因而法国人操纵了该场的人事权。

1930年2月开始营业，蒲甘任经理，逖百克任董事长、陆锡侯任买办兼包酒吧间，步维贤专司查帐。董事有百部、步维贤、鲍莱德、鲁滨逊、泰勒、陆锡侯、朱博泉等。

后来，蒲甘因其另一经营的明园游艺场（跑狗场被英租界当局禁止后的改名）失败，亏空过钜，兼之回力球场初期的营业清淡，债台高筑，无法弥补，遂一走了之。回力球场经理乃由提奥陀拉与海格两人继任。

当该场筹备期间，即由海格向海外聘请球员，由提奥陀拉，绰号“球大王”者为领队，球员20余人，大多是西班牙、墨西哥和古巴人。在房屋建成、球员到达后，就开始对回力球作了介绍，美其名为运动场，实际是跟赛马、跑狗同样性质的赌博场所。每当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在回力球场里，“天天万马奔腾地充满着一片嘈杂声，清脆的是电铃声，重浊的是击球声，嚣杂的是各人口中吐出来的呼声，而微微的低到听不清楚的是一般赌客的心跳声。从它的两扇玻璃门中，每晚挤进去几千个人，也每晚吐出来几千个人，这几千个人固然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这许多人，大都心存侥幸，满想博取一笔横财，结果却把自己囊中的钱化为乌有，于是移东补西，借债、质押、变卖，有的铤而走险，有的倾家荡产。回力球场真是害人不浅。

名为回力球比赛，实则进行赌博，用出售彩票方式——分单独赢、位置、双独赢、联位、香槟票等等来诈取赌徒的金钱。场方抽取佣金11%（香槟票20%）后，余数按彩票性质分与得彩的人。

由于上海人不熟悉这种赌博方式所以开始时回力球场的生意比较清淡。赛球的所谓“运动员”又是外国人，赌客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虽然开幕头几天卖了满座，但来





者多出于一时好奇之心，所以未能持久下去，以至人不敷出。到这年的年底共亏损 22,730，主要原因是生意清、开支大，外国人的薪水高。这时，该场股票价格下跌，中国股东纷欲脱手，无人购进，公司摇摇欲坠，乃由朱博泉设法借款，甚至将场内的皮椅家俱等抵押给汇众银公司。朱又介绍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沈长庚参加董事会任董事，通过沈长庚与朱博泉的关系，又向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由该行程彭年居中经手，从而拉回力球场一大部分款项存入程自己经营的中华银行从中渔利。“一·二八”沪战爆发后，上海当时的租界成为地主、买办、官僚、政客、资产阶级的避难“福地”，特别是当时法租界因空屋较多，人口激增，这批有闲阶级挟其造孽钱，找寻刺激。于是，逃百克就暗地里勾通法租界当局，一面对回力球场和逸园跑狗场放任庇护，一面对其他赌台予以禁止，因而回力球场生意大有起色。举 1932 年第 3、4 季度中 3 个月回力球场赌赛总额为例，8 月份为 1,676,977 元，9 月份为 1,755,883 元，10 月份为 1,911,070 元，





是月月上升的。从这种显然被缩小了的数字看，已可概见其赌额之大，“生意兴隆”，大有赚头，因而股票行情反跌为涨。据说，当时票面十两的优先股票，抬高至三十两，还没有出售的人。以后，逖百克忽患肺炎去世，步维贤见利源所在，有机可乘，乃通过逖百克的帮办白俄姚国来夫的关系，暗中活动，取得陆锡侯的支持，打倒对方百部洋行攫得董事长的位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逖百克死后，照章应由副董事长鲍兰德继任董事长，步要取而代之，托姚国来夫向陆疏通，要求陆锡侯在董事会上出面提议由步维贤继任。是时董事共有五人，为百部、步维贤、鲍兰德、沈长庚、陆锡侯。原任董事朱博泉已辞职。泰勒与陆锡侯有宿嫌，被排挤辞职。鲁滨逊因代表自来水公司索取欠费与场方涉讼而离职。鲍兰德因自己是由步维贤拉进，碍于情面，自己不便出面争，唯一的敌手是百部，终以陆锡侯的股权较多，所以一经提出，便顺利通过。步维贤继任董事长后，加选倪古禄及法公董局董事有余洋行的沙维为回力球场董事。





步维贤当了董事长后，首先提出董事长车马费用支 3,000 千元；副董事长及董事仍照逖百克时代旧例，每次会议费一百元，后来钱实在赚得太多了，才改为月支 1,000 元；当然，水涨船高，步维贤的车马费亦按比例提高了 10 倍。陆锡侯为表示酬劳方昇平的拉马“功劳”，提议聘方为顾问（理由是方系球场发起“功臣”），月支顾问费 3,000 元。

步维贤还没有做董事长以前，回力球场的业务已日渐好转，他认为租界人口日益增多，法租界的赌场已关闭。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因得法领事馆当局的庇护，当时成了独行生意。而且跑狗场一星期只赛 3 天，回力球场则天天开赛，逢礼拜天还赛日、夜两场；开赛的形式，单打（分甲乙组）从 5 人赛扩大为 6 人赛，号码多了，彩票也多，更加有利可图。步维贤趁机在该球场的股票下跌之时（仅值票面的 20~30%），大量收购，希望在股权方面攫得操纵地位，而与陆锡侯成对抗局面。后来陆锡侯因中国兴业银行倒闭而被逮捕监禁，宣告破产，步维贤就乘机叫姚国来夫向陆表示，以陆的处境妨碍回力





球场为理由，要陆锡侯以他的股权过户与步维贤，愿代他隐匿财产，另外允许以每人月付给车马费 1,000 元的酬劳，迫陆退出董事会，于是陆就被排挤出来。

另一方面，步维贤改变回力球场的经营方针，借口避免亏损风险，采取托包抽成办法，与提奥陀拉订立合同，由姚国来夫出面，做两方面的中证，姚就这样各方拿钱，一面是公司董事会的秘书，一面是提奥陀拉的顾问，同时在承包人抽成之中也享受一份。步维贤和提奥陀拉等在球场内组成小集团，在承包协议中故意留出一部分抽成利润。

自从步、提结合成小集团后，他们两人想出赌博的新花样，单打（分甲乙两组）从 5 人赛改为 6 人赛。在 5 人赛的时候，如买一张“3”号独赢票，一套联位票，但是 3—1、3—2、3—4、3—5 四张；5 个号头共有 20 张联位票。改为 6 人赛后，便有 3—1、3—2、3—4、3—5、3—6 五张；6 个号头，便有 30 张了。票越多，赌注越大，抽成也越多。另外，还延长比赛时间，以引诱在跑狗场散出来的赌输的赌客去翻本，即使偶有赢的，利用赌客





“运气好”而贪得无厌的心理，把他们的彩头仍从口袋里呕出来。从这里，也可见诈骗取财的一斑。

由于回力球场效益越来越好，因而导致其他股东眼红起为来。逖百克的妻子以发起人遗属身份，要求继续担任董事，步维贤当然不会答应，她于是联合另一股东百赉洋行对回力球场查帐，双方曾发生争吵。后来，“法租界福利事业基金会”为了平息外界责难，认为有查帐的必要，派了麦加利等二人进行查帐。步维贤做贼心虚，很感恐慌，因为他在公司帐上支付了许多不应支付的费用，但他又要手段设法弥补了过去。

靠彩票抽成是回力球场收入的来源，初开门时售门票，后来为招徕顾客，便不卖门票了。原来是仿照跑狗场的办法每礼拜赛3、4次，后因营业不振，改为天天比赛，星期天还加日场，等到营业起色以后，就作为常例，不再变更。而职工待遇，由原来按日计算改为按月计算，反不及跑狗场一星期只做三、四次的职工待遇。对彩票抽成，由法租界公董局核定，除摇彩票（香槟票）要抽20%外，





其余各种票抽 11%；这 20% 与 11% 除付给“上海法租界福利事业基金会”捐金 3% 外，余下 8%，即作为回力球场开支，有余或不足，即作为该场的盈亏。步维贤与提奥陀拉订立托包抽成办法后，这 8% 的分配办法是法商中央运动场抽取一半，余下的 4% 以 3% 作为球场的开支，还有 1% 由步、提两个小集团内部分肥。这样，步维贤的收入格外庞大了，第一个月分赃时，步个人就拿到一万多元，该“基金会”名义上是办理租界内福利事业，实际上享受的只限于外国人，其中大多是属于救济白俄。而法国人自办的法文上海日报也要该会每月津贴 5,000 元。在抗战胜利时，该“基金会”尚有存款 100 余万美元，虽经国民党交涉劫收，但未成功。

回力球场怎样进行赌博？根据外国的习惯，球赛大概可有 3 种：单打 12 盘，分前后两段举行，由甲乙两组球员分别担任，中间插入双打 4 盘。逢周末双打改为红蓝大赛。

单打有 5 个球员（后来改为 6 人）出场比赛，其背上标以号码，以先得 5 分者为胜，双打也是这样。红蓝大赛比赛时间较长，出





场比赛的球员，都是体力膂力球艺高强的个中老手，采取2比2或3比2的对打方法，共赛20分。

单双打的博赛票有“独赢”、“位置”两种。红监大赛是采用逐分博注的方法，场前设置一个专柜，由专司赌注的洋人高踞其中，口里念念有词，大声兜揽。

球员人数方面双打比单打多一倍，天天比赛，人力调配颇费周章，对场方不利。红蓝大赛在每分争夺过程中，进行博注，打一分便见胜负，因过于爽快，变化不大，对赌客来说，短时间里要考虑双方的胜负，往往上一分还未考虑完毕，场中又在争夺下一分的胜负，神经紧张，因之赌客兴趣较低。场方有鉴及此，即将红蓝大赛取消，改为单打前后各八盘。双打仅在人力能够调配时偶尔为之。

后来博赛票的名堂，增加了双独赢、赢位票、博赛票的连续号码等。这对赌客来说，增添了博注的线路，下注便越来越多，危险性自然也越来越大，于是所谓“保险台”者便应运而生。凡是独赢票已打成四分，尚未





进行继续比赛之前，为了预防功亏一篑，夺不到最后一分时，可以先向保险台投保一定数额的金额。如果这一局被淘汰而为另外一个号头赢出，就可向保险台领取照投保数额的赔偿金（也要扣 11% 的抽成）。反之，如果赢了，保险台就在应得的彩金中扣除这笔投保金额，而将多余的分给赌客，这是又一种榨取赌客钱财的方式。

博注的形形色色不断增加，和所谓保险台的开设，给回力球场增加了许多抽头收入，真是日进斗金。就是这样，许许多多赌客的金钱都被骗去了。要不是大多数的赌客输钱，回力球场又怎能发财呢？许多赌客想去发些横财、捞些“外快”，结果大都是输得精光。这里倒想起一个故事来了，曾任建国粤军总司令的许崇智也赌过回力球。他常常说，他用的是什么兵家大包围的方法，一定能赢，结果 10 次中总有 8、9 次输得一败涂地。

另一方面，许多外国人因赌客的金钱而发了大财。像回力球员的领队提奥陀拉刚来上海时，只是一个铺盖，其他一无长物。到了回力球场以后，顿时发迹，住起高楼大厦，





以汽车代步，用大司务做西菜，面团团俨如大富翁了。同样，回力球场创办人之一海格来上海时，脚穿一双破皮鞋，手拎一只破皮包，不久就有了汽车洋房。

所谓彩金是赌注中提取 11% 抽头后，进行分配，但在卖出的独赢票中，规定打出独赢的球员，可以分得红票一张，所得彩金，由球员自己去分配。这就是说，卖出 100 张独赢票，分红时要作 101 张的数字来计算，等于在 100 张独赢彩金上再分取 1% 的红金。这种做法，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有了红票可以鼓励球员的“进取心”，实际上是慷他人之慨，在赌客头上加重掠夺，压缩 1% 的红金来笼络球员。说起球员，他们的薪水是很高的，概以外币计算。他们中最起码的脚色，薪水（不包括“外快”）折合中国货币每月高达 800 元左右，合当时 80 担大米；薪水大一些的，都在 1,000 元以上。所以，很多球员都有私家车，起居奢华。由此可见，这个回力球场是个害人坑。

回力球场的赛球，是用人来打的，这里面必然会上下其手的，对作弊情事，外间传





说不一。场方听到了，恐怕影响生意，就放出种种烟幕：说什么球员集合准备出场时，叫子一吹，一颗大骰子滚出来，落地几点，就是几号球员打出来（即得胜），在时间上不可能通风报信和赌客勾结；又说，球员薪水高，而且球场生意越大则抽成的收入也愈多，球员的红票收入也愈高，所以球员不肯作弊；又故意放出空气，提奥陀拉收入很多，大部分被他的妻子在球场内输掉，她经常要向管出纳的叶姓职员借支，意思说球员未曾作弊，等等。这种种说法，都是为了骗人们相信球场的公正性而编造的谎言。

此外，每经过一个时期，回力球场要举行一次拳击，搜罗上海业余的、专业的拳击手，在该场进行比赛，好像是一种正当的体育运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赌博，不过这是专供外国人赌博的，并不对外公开，那天，回力球赛便不举行了。于此，可以看到回力球场进行赌博的形形色色。

八、依靠回力球场进行残酷榨取的花招

回力球场的老板们及从业人员是靠捞取





赌客的所谓提成、抽头等等发财致富的，但也给了当时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一笔经常的可观的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流氓和社会渣滓依靠回力球场这个大赌窟进行残酷剥削，养肥自己。

法国人逃百克暗中勾结法国领事馆，从中分肥。法领事馆当局得到甜头，便通知它的工具法租界巡捕房予回力球场以袒护，狼狽为奸，于是，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回力球场的赌客，口袋里的钱输光以后，很想借债翻本，回力球员领队提奥陀拉等想出一个开办信用贷款的方法，签一张借据，就可向场内借钱，让赌本输光的赌客再赌，从事翻本。借款的对象，至少要与场内工作人员熟稔，而且是经常下注较大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赌客。

回力球场的周围邻近，开设着益源、久丰等等多家大大小小的典当。这些典当的押款利息完全是高利贷，还要加上“存箱”、“另放”的费用，凡是当衣服的叫存箱，当钟表金银首饰的叫另放。受质的押品，以六个月为期，也有八个月的，期满不赎，即予没





收变卖，典当老板又收到一笔不小的“押余”（押款与变卖价的差额）。赌客的质押品，主要是钻戒、手表、挂表以及其它金银首饰，甚至有大衣、长袍、呢帽、皮鞋等。经手送押品的人，大多是由该场的茶房出店去代劳，他们的额外收入，也很可观，赌客偶而翻了本，叫他们去赎当时，找来的零钱往往作为酬劳，或者另给“香烟钱”。另一方面，典当里也给以回佣、酒钱等，以拉拢生意。典当方面的收入，更是不合理，如赌客当天赎当，仅仅几个钟点的时间，也要收一个月的利息。典当的老板，就这样依附着回力球场，混水摸鱼，为虎作伥来诈取赌客的钱财。后来，球场的茶房们，眼看那些典当老板利益太大，要求增加回佣，这些典当，为了业务竞争，周转快，利息收入随之增多，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也是无所谓的。

球场的茶房们，在场内代客买博赛票、领红票时有“赏金”可得，到典当去质押或赎当有回佣可拿，这样，就发生了矛盾，恐怕顾此失彼，于是通过衣帽间的头脑拿摩温，





几个人凑集了一笔钱，即在球场内接受赌客的质押。如果赌客当天无钱可赎，到了明天，他们就到典当去转质押，以资周转贷款本金。

除此以外，在制造回力球场用的球和球篮上面，也不肯放松而进行其剥削。事情是这样的：回力球赛用的球和球篮，是特地从西班牙聘请制篮匠和制球匠来负责制造的。球篮的大小和重量必须根据各个球员的使用的需要，因人而异。制作用的原材料，除藤条一项，因中国出产，市场价格便宜，就地取材外，其余原材料，如橡胶（球的芯子加上橡胶以增强其弹力）、羊皮等等，概自外国进口。由于球员人数众多，出赛的场次也频繁，球和球篮的消耗量较多，单单依靠这两个西班牙籍的制篮匠和制球匠来制造显然是来不及的。为了解决制造上的需要，就雇用了一批年青的中国学徒，给以少得连吃饭都很勉强的一些工资来从事制造。

回力球场还配置了一些附属设施来款待赌客，如：设有酒吧间，供应中西菜肴、冷饮、咖啡及各种酒类。还有糖果间、衣帽间等等，可说应有尽有。看台的过道上，配备





了许多鉴貌辨色，口齿伶俐的跑票员，几乎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他们的职务是专门代赌客购买博赛票和领取红票。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反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押柜，他们的收入全靠“外快”——赌客给他们的小帐（一直要到职工联谊会成立和场方斗争后，才有工资）。据说，最多的人每月有500元左右收入。那些跑票员摸清赌客底细后，甚至还放债给赌客做“垫款老板”，从中取“利”。总之，赌客在球场里掷送的金钱是难于估计的，不少人因之倾家荡产，甚至做出伤风败俗的勾当，从而引起家庭不和，夫妻反目，以至自杀等等人间惨事。

回力球场的宣传费用，是不惜工本的。它的广告是由希腊人沙夫里司主持的。当时旧上海各种中外文报纸及小报等，都有它的广告；在电车、公共汽车的车头上也天天张贴回力球场的“海报”。有些小报每天特辟专栏，记载球场花絮。球场里还设有宣传组，每周出版中英文的回力球周刊，每年还有皮面精制的年刊发行。总而言之，在宣传上无所不用其极。





靠回力球场发财的还有大美印刷所，这家印刷所的经理白罗司，出身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初任跑街，为专门介绍陆战队情况的《哗啦哗啦》杂志，向回力球场等兜揽广告。他拉拢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远东负责人西·维·司带，投资大美印刷所，承印回力球场及跑狗场的博赛票、各种招贴、专刊、年刊和每天的节目单等等，因而“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这两上美国人自然地发了不少的“财”。

回力球场还设置“吃角子老虎”（茄克扑），这是诈骗钱财，到处可设的小赌具。把一枚双角子投入孔内，用手一扳，偶而会获得几倍或十几倍于双角子的彩金，但是得不到彩而白白送掉钱的，占绝大多数，亦就是中彩的百不得一。这种赌具是美国人蒲甘及派拉蒙公司经理勾结当时法租界当局而摆设的，因而在霞飞路各酒吧间及大一些的烟纸店大都摆着这种骗取钱财的把戏。单拿回力球场一处来说，每天骗去的钱就有100余元。如果整个法租界有100架，每天就要骗去10,000元。





当时某些银行的暗记券也在回力球场插过一手，进行渔利。陆锡侯任总经理的中国兴业银行，向当时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领用暗记券，从事谋利。这三家银行和无钞票发行权的中国兴业银行，订立合同，领用这三家银行的钞票代为散发，而在钞票上加一暗记。一般惯例是按领用金额，交4成现金、6成有价证券如公债等，这样，就是用少量头寸，换得较多的现金，从事投机取利。但有一点，领用暗记券的银行、钱庄，必须有办法将钞票分得散，防止集中回笼。陆锡侯就利用回力球场发彩金的机会，将暗记券散发出去。中国兴业银行只有“天主堂街”和“福煦路”二个分行，假定没有回力球场的绝好散发场所，他在暗记券的运用上，会遭遇到困难。

在回力球场的博赛票上也有渔利的方法。如有些投机分子在回力球场上做“亨鼠吧”。所谓“亨鼠吧”是个做场外交易的代名词。因为从前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叫亨鼠一个叫吧，他们两人设一个字号在现在中央商场的那个地方，专做跑马和跑狗的场外交易，以后凡





做场外交易的概叫“亨鼠吧”。在回力球场中也有投机分子和跑票员勾结，将赌客要买的一部分博赛票吃下来，由他来做输赢。例如：赌客要买某号独赢票或位置票时，铃声已响，跑票员从看台上奔向卖票处已来不及了，就由“亨鼠吧”吃下来，如果这些票子赢了，他就照场内分配的数字扣除 11% 赔出去；反之，如果输了，这笔赌注就给他吞下去了。做“亨鼠吧”因是暗中交易，场方无法抽成，而他在赔出去时，却同样要扣去 11% 的抽成，这样风险较小，如果赌客输了，“亨鼠吧”就十足独吞。由于这种行为对场方利益有冲击，往往是在暗中进行，知道的人不多。

另外，在回力球场的对面，开设着一家白锡龙咖啡馆，是球场保险台的负责人麦天基开的，主要是做球员和赌客的生意。赌客赢了钱，便到白锡龙去吃喝一下，如果输了，也到那里去消愁解闷，于是白锡龙的生意利市百倍。

九、步维贤其人

步维贤曾在法国比希埃学校会计科读过





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中国来，初在义品洋行做记帐员，因收支不能平衡，将其妻子送回法国，只身来沪。之后，也到过中国陇海铁路局做过记帐员。离职后，他加入达理会计事务所，在业务接触中，他认识了一些人，即脱离达理会计事务所，做法国大药房、法大汽车行、百部洋行、法国总会、合众储蓄会、宝多洋行等会计事务及“法租界会审公廨”的委任查帐员。从此，步维贤在上海站定了脚。

后来，步维贤与道胜银行职员何斯登合办汇源信托银公司，后称汇源银行，天津设有分行，力谋发展，但其资本薄弱，仅有几千元，他乃竭力拉存款。此时，他还是地位低微，无何成绩，幸而经常得建筑业大包作头潘荣甫的帮助，始得周转。公司取名“汇源”，是希望能办成与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齐名的“三汇”之一。

1927年步维贤又拉拢倪古禄合伙，办理会计业务，因为倪古禄的父亲是个法国将军，因缘时会，步维贤的汇源银行乃包到法租界公董局外籍职员养老金的存款帐目的管理，





从而拉到一批公董局、巡捕房人员的存款，又多了一笔从事活动的资金。

步维贤一心想插进跑狗场（逸园）中去，做会计事务，想获得高薪，终以薛迈罗会计师和万国储蓄会集团间的特殊关系（万国储蓄会以步维贤曾帮过合众储蓄会），跟他有利害冲突，故对步排挤，使他无法如愿。于是步维贤另想别法，拟创办一个同样的东西与之竞争，曾勾结帮会流氓头子黄金荣等联合申请照会，未能达到目的。又想办自行车竞赛，也未能实现。

了解步维贤办事能力和愿望的逖百克在办回力球场时马上想到他。步维贤在谋取插入跑狗场等计划失败后，正在寻找出路，就一拍即合。更因为回力球场设在法租界，必须有几个法国人出面参加，才可挂法商招牌，于是步维贤再去拉拢百部洋行的百部，宝多洋行的鲍兰德，一起参加做发起人。

步维贤的主要目的是包办回力球场的会计业务，既能取得高薪，又能同时吸收该场资金存入汇源银公司，所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投资时，仅认 20% 股，即以招股所得佣





金作投资，并且预备在股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即行脱手。

步维贤在发迹后，曾任法国总会理事会主席。此时，达商律师也是理事之一，因为达商接受一个解雇职工的委托，和法国总会办理法律事宜，遭步维贤之忌，认为他既然是总会理事参加此事讨论，便不应代表这个职工再来对付自己的总会，这种行为与其身份不相称，要其退出理事会，从此达与步便结下了怨仇。在以后总会选举理事中形成敌对派别，而达又每次落选，彼此更如水火。当法国维希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后，步维贤加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达商律师则拥护贝当，于是双方更不相容。所以当逖百克之妻子等对回力球场要求不遂时，达商就接受她的委托向“法国领事公廨”提起诉讼，步维贤对达商更恨之入骨。后来达商在金陵东路法国领事馆对面的约纳大楼办公地点被人暗杀，法国领事怀疑是步维贤派人干的，但几次传讯都没有找到证据，只得作罢。

步维贤的地位一天天高起来，一心想夺取逸园跑狗场的实权，便处心积虑收买万国





储蓄会的附属机构建业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使跑狗场的地产权，落入步维贤的手中，在股东会上可以就股权方面压倒薛迈罗。另一方面，以储蓄为名骗取中国人民钱财的万国储蓄会，鉴于步维贤已经发迹起来了，法国冒险家分子为了缓和自己强盗帮里的矛盾，对步维贤采取拉拢态度，让步担任它的附属机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董事长。逃百克生前，曾兼任逸园跑狗场董事长，逃死后，由外汇经纪人丹士麦继任董事长。丹士麦为了和回力球场互通声气，彼此协作，提议请步维贤担任董事。当丹士麦因心脏病猝死于浴缸里，步就风云际会，继任了跑狗场的董事长。几年宿愿，一旦得偿，可称踌躇满志。他便利用职权，将跑狗场的资金，存进了他的汇源银行，增长了银行方面的资金运用，一家资金不足的“滑头”小银行，居然在天津开分行，可称是步维贤的全盛时期。

自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惨败以后，法国人在上海的地位日趋下降，不再有法租界当作掩护，而要受敌伪政权的统治。同时，汉奸罗君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





政局长) 要增加逸园跑狗场的抽捐率, 也影响到回力球场的业务。步维贤知道大势已去, 抱过一日算一日的态度, 渐谋脱身。另一方面, 承包人提奥陀拉纠合意大利人富马加利, 用上海赚去的钱在天津开办了回力球场; 此外, 又到菲律宾马尼拉开办回力球场, 有了退路, 不肯再低首下心、仰人鼻息, 就乘机要求修改待遇条件。步维贤认为承包人的利益已经不差, 对于球员待遇, 应由承包人自己解决, 如再修改条件, 会影响他的利益, 故不肯接受。另外, 提奥陀拉向西班牙球员总会购得远东方面聘用球员的专利权, 系用公司名义, 步维贤认为有恃无恐, 坚决拒绝提之要求; 他忽视了各国冒险家之间的矛盾, 在球员反抗之下, 结果, 还是步维贤失败, 订立城下之盟。场内职工, 亦因物价高涨, 工资微薄, 纷纷要求改善待遇, 因之, 引起了步维贤撤退的决心。

敌伪时期, 投机之风, 笼罩全沪; 股票买卖, 风起云涌。一直处于闲暇的陆锡侯想有所作头, 将回力球场股票上市, 就去和步维贤商量。步认为靠山已倒, 对他前途不利,





主张将全盘事业解散，陆不同意。步又另出主意，除将代陆隐匿的股票，全部过户归还外，并愿将自己趁价格低落时收购的股票（其中一部分是蒲甘卖给他的），一起出卖与陆锡侯。陆同意以三十万美金的代价购进步的全部股权（据陆说，因无款，先付永安公司股票十万股，以后亦未付清），由陆改组为“中华运动场”。陆又通过唐海安勾结了汉奸陈公博，才将“中华运动场”（即后期的回力球场）的股票推销上市，进行投机倒把。

步维贤认为股票脱手，公司解散，是金蝉脱壳的妙着，自以为非常得计；不料球员方面，不放他过去，要他履行合同，照付回国旅费。步维贤答复说，公司已经解散，公司一切债务，自有承买人继续承认负责交涉，且公司另有清算人西门子大班处理未了事宜。球员方面，不肯与陆锡侯交涉。球员认为既然是步维贤签订的原始合同，那么就不能因为公司解散而推卸责任。步维贤不予承认的另一理由是太平洋战争正在进行，海上封锁，球员无法回国，没有付旅费的必要。双方坚持不决，球员乃向“法国领事公廨”控告。





由于步维贤是戴高乐派，互相争斗涉到政治问题，“法国领事公廨”特指定和步维贤有仇隙的宝多洋行的 P. Dupuy 为陪审员，拒绝了步维贤的解释，对他说“你与球员签订的合同是在法兰西国旗下签订的，不能推卸责任，否则是损法国荣誉”等语，判决步维贤败诉，并对步维贤的财产加以假执行。步维贤曾拟向越南西贡方面上诉，亦因政治关系，未果。于是，只好从自己财产中拿出一笔瑞士法郎来付给球员。吸嗜鸦片烟的步维贤，凭借他的手腕灵活，靠回力球场和跑狗场以及他的汇源银行等等，竟发了大财，拿出一些瑞士法郎，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而已。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便挟着向中国人诈骗的金钱坐飞机溜了。

十、换汤不换药的“中华运动场”

敌伪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球场职工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只能上下其手，进行集体舞弊，和场方对抗。作弊的方法是：按规定，在开赛后，即须将售出博赛的数额帐单公布，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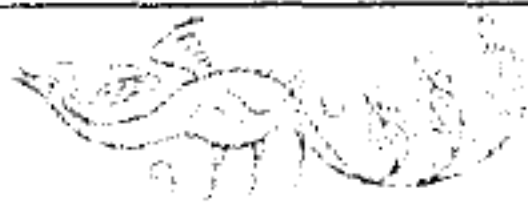




故意把它拖延一下，派人在场内探望，看见某号球员打四分了，就大量购买某号的独赢票加入，另外小量的加入其它号的博赛票，以掩赌客耳目。这笔作弊收入是大小职工一起分派的。老奸巨猾的陆锡侯，作人是何等的奸诈，他了解内情，知道这样做对场方有利无害，便装痴作聋，而且“中华运动场”的改组，尚在洽商中，亦无权过问。步维贤却不以为然，怕被赌客发觉，不肯上钩，影响回力球场的生意，颇想加以禁止。但这件事是集体行动，上下内外畅通声气，对步维贤的行止，节节有情报，他一来，全体职工便各就各位规规矩矩地工作，使这个凶恶毒辣的法国流氓，无所施其伎，而且还有海格的弟弟，绰号叫“小鬍子”的里昂人从中领头，步维贤更感棘手。

这件集体舞弊的事情，给苏北帮的大流氓马连生（马联升）知道了，他要敲竹杠，插一手分肥，球场职工在流氓势力的压迫下，只好送钱给他。后来风声传到日寇耳朵里，日寇也要分一杯羹，并扬言要抓主持舞弊的职工，吓得他们不敢住在家里。在敌伪流氓





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少数人通过马连生的介绍拜日寇报导部当特工的辛杰三做老头子，由辛勾结了日寇，才算无事。这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可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流氓辛杰三又以劝他们投资做米粮生意及领取金业交易所经纪人执照等方法，欺骗他们。因此，他们靠作弊得来的钱远远不能应付流氓的敲诈，往往还要赔上自己的家当。

当时，上海在敌伪统治之下，汉奸陈公博做了伪上海市长，对回力球场这场肥肉怎肯轻易放过。步维贤之金蝉脱壳，已如上述。陆锡侯正准备粉墨登场，但是“中华运动场”的开业照会，因敌伪市政府的种种留难而打不出来，乃通过赵云台的关系，勾结国民党官僚汉奸唐海安，由唐去找陈公博取得执照。赵云台的堂弟牙医生赵子谦和唐海安是中表连襟，陆锡侯做敌伪联保长时，赵云台是陆手下的伪保长，所以他才甘为奔走。

1944年初，执照领到后，法商中央运动场正式改为“中华运动场”。陆锡侯和唐海安便展开一场董事长的争夺战。这个时候的唐海安已穷得只剩空架子了，看到有此机会，





怎肯放过，便以当董事长为条件，向广东帮朋友招徕一笔股票，投入“中华运动场”，但是陆锡侯手里也有不少股票，嘴边肥肉，哪里容许他人染指。唐海安对回力球场，原是外行，而陆锡侯却是地头蛇，不论球员、职员，几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唐海安敌不过陆锡侯，便求助于汉奸潘三省。潘在步、陆交易未成功以前，曾趁沈长春到步维贤写字间去的时候，致电沈长春，愿意受盘回力球场，结果被陆捷足先得，对陆心存芥蒂。现在唐海安找他帮忙，便满口应承，施用手段，各方拉拢，一面与球员暗地里分别签订合同，一面利用球场职工与陆锡侯苛刻待遇的矛盾，派人代组黄色工会，鼓动职工与陆斗争。同时，在外扬言，将以六个月时间，另建一所回力球场，届时将招去全部球员与职工，使陆锡侯只剩一所空屋。陆敌不过潘，迁怒于场内虞姓职员，当时虞某系黄色工会理事长，在阴历小年夜晚上，陆掴虞的耳光，顿时引起了全体职工的愤怒，停下工作，将陆拉到卢家湾敌伪警察局。汉奸潘三省得讯，立即通知敌伪警察局长苏成德将陆扣押起来。这





时已过午夜，不放出来便要留在局里过年。陆因此而害怕起来，将董事长职位拱手送给唐海安。潘三省“策划”有功，也到手不少股票。

唐海安接任董事长后，四面勾结。据陆锡侯说，唐海安曾将回力球场的三楼给军统特务王克夫（同音）作为办公室，并帮助他向永安公司郭顺和新新公司李泽勒捐一至二亿伪币巨款。

在抗战以前，唐海安曾做过旧上海海关监督，跟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有渊源，冒险家沙逊每次来中国时，宋子文常派唐海安去联系。唐虽系国民党的官僚、四大家族的走狗，不知怎样后来穷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自从做了“中华运动场”董事长以后，马上阔绰起来，洋房汽车，颐指气使。可见回力球场确是一块肥肉，倒霉的还是那些在球场里被诈骗得倾家荡产的赌客。

自从法商中央运动场改为“中华运动场”后，伪市政府对这个回力球场的掠取更大了，在法商时期的抽捐率是5%，改为华商后，提高为10%，所谓5%或10%，就是在博赛票





中场方抽去的 20% 内（法租界时代规定抽成率为 11%，敌伪时代改为 20%），伪市政府要分取它的四分之一或一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运动场”由国民党派王复旦、王微君、武逸民接收，不久改称体育协会，再由伪教育局接收，主持人初为王复旦，后由邵汝干继任，直到上海解放为止。

十一、旧上海的打花会

旧上海有一种叫“花会”（又称“打花会”）的赌博，专以中下层居民为其诈骗的主要对象。因此，它的毒害面最广、最烈，成为旧上海滩上的一大害。

什么是花会呢？讲穿了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赌博，即它设出 34 种左右的可能性，让参博者任意押注于其中一种，如果押对了，则设赌者以三十赔一，如若押不对，则赌注便全归设赌者所有了。花会最早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即清道光初年（公元 1820—1830 年），在浙江黄岩一带开始盛行起来的。设赌者公布 36 个古人名，然后在一间屋的横梁上扣勒





好一卷画轴，参赌者便开始自认一名古人并注上钱数，投入一个木柜中。到了规定的时间，参赌者入屋，设赌者当众从梁上将画轴解开、下展，这时大家都能看清轴上画的到底是那一位古人。此时设赌者则又开出木柜，取出各参赌者投入的押注字条，作为向押对了的赢者赔款 30 倍的凭证。由于这 36 幅古人像的名字不易区别与记忆，而开初参加花会赌博的又多为牌九牌的赌客，所以设赌者在每一幅古人像的左下角，都配缀着一只挖花牌的图案，以志区别的标记。如天牌配徐元贵、地牌配陈吉品等等。由于赌徒都以认花牌图案押赌注，所以这项赌博便以“花会”来命名了。又由于赌博押注时，有如猜射，故也叫作“打花会”。

清季广东开了华洋通商风气之先，广州则在鸦片战争以后成了开放都市，“花会”便也在这时从浙江黄岩流入了广东，并在广州形成了它的规模和“规矩”。首先是将花会的古人名增加到 37 名，并为了招徕中下层妇女参赌，去除了她们所不熟悉的牌九牌挖花图案，而改配上较易识别和记忆的 37 样动物：





打花会的赌徒在石像面前烧香求梦，祈祷神灵保佑

观音（鲤鱼精）、陈吉品（绵羊精）、陈人生（白鹅精）、张元吉（鹿精）、张火官（鸡精）、李汉云（牛精）、郑天龙（石精）、周青云



(鹤精)、罗只得(石亥犬精)、田伏桑(花犬精)、宋正顺(猪精)、黄坤山(虎精)、徐元贵(虾精)、林太平(飞龙精)、陈攀桂(螺丝精)、陈日山(鸭精)、张三槐(白猴精)、张万金(蛇精)、李日宝(龟精)、郑必得(鼠精)、吴占魁(白鳖精)、赵天申(金猫精)、双合同(白鸽精)、朱光明(马精)、刘井利(鳖精)、林良玉(蝴蝶精)、陈逢春(喜鹊精)、陈安士(狐狸精)、张九官(犬精)、张合海(虾蟆精)、李明珠(蛤蜊精)、苏青元(鳖鱼精)、马上超(飞燕精)、方茂林(蜂犬精)、龙江祠(蜈蚣精)、王志高(蚯蚓精)、翁有利(象精)。

其次，为了证明这些“古人”的身份不凡，都有来历，始逐一为古人们做了一篇小传式的说明。例如被广东的设赌者添列于首位的“古人”观音，它的小传是这样记的：“观音姓妙，名碧，又名能保。张宏谋考名。陕西紫阳县人。妙庄王三女。疏财仗义，性情清淡。化身南海普陀岩，称为白衣大士，十四岁收诸神为花会首。”这篇传记内容，既没有史实可证，也不见载于稗官野史，当然





即使从佛学经典上说，将观音硬列入女性也属无稽之谈，故满篇为荒诞离奇之语，全是花会中人杜撰了，来糊弄那些参赌者的。再次，便是将花会赌博的一些过程订出“规矩”，使之程式化，并定下了一些花会赌博的术语。例如，观音被定为会首，所以是镇守在那里永远不开的，这叫作“坐筒”；又如，花会每日开两次，所开出的花名两门，第二天一般是不会再开的，这两门便叫作“把筒”或“门将”；待开的其余那一门叫作“号筒”，又称“彩筒”；经常被开到的那一门被叫作“老包”等等。

清道光末年时曾对中国的诸种舶来赌博方法加以查禁，但花会却不在其中。因为当时的清朝那些颟顸官吏们还不太清楚花会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他们曾以为只是百姓的一种迷信或信仰崇拜，就如同礼拜画于纸上的财神、钟馗或灶家老爷像一般。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由广州向北逐城市被打开，一批粤籍居民随着北上，打花会这股赌风也渐渐北移，竟又返回到了它当初的诞生地——浙江宁、绍一带。不过这时的花会赌比





起道光初年的来，赌法更程式化，组织更严密化，毒害面更广泛化了。

清咸、同两朝，官府也开始注意到了花会赌博规模之大，弊端之极，于是不得不渐有禁止打花会的命令颁布出来，并在宁、绍一带有过几次搜抄花会会所的行动。这批赌徒，便在光绪廿八、廿九年间（公元1902—1903年）混到上海来了。初来上海时，花会的总机关会所便设立在南市的猛将堂，公开招赌，拖人入会。后来清官府迫于地方绅民的压力，前去缉捕过几次，于是搬到过北市的华记路等好几处。期间几经搬迁，最后这批赌首看到，上海的外国租界里设立大赌台，公开招赌，而清政府却奈何租界洋人不得，于是便将花会的总机关会所迁移到虹口的庄源大去了，和外国赌台滚到了一堆，成为一对罪恶渊藪。

打花会在上海成了流氓大亨们的把持对象。由于流氓的帮派之争，以及顾忌官府的干涉，花会的总机关会所仍然是秘密的，并非如在浙、粤花会初盛时期那样，任何赌徒都能前往总会所当场看“开筒”，等结果的。





欲知结果要靠“航船”传递，这时的花会雇佣了许多跑街到四处招徕赌客，并通过跑街的作中间人，传递信息于总会和每个赌客之间，沟通联系，共同完成一次赌博。这种跑街中间人，在花会行话中叫作“航船”，是指跑街的作用便是往返传递押注，开筒结果等信息，来回摆渡犹如江河两岸间的“航船”一般。花会的总机关是秘密的，但是这“航船”却是公开的，旧上海的大街小巷中都有见到。且“航船”还有男女之分，“男航船”专门跑那些商号、铺子，拉那些店铺里的伙计、摆小摊做小生意的以及小手艺人参赌。而“女航船”则专门出入一般人家的女宅，花言巧语，引诱宅中女眷、女佣、女厨、老妈子、小丫头出资入赌。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旧上海这样的“航船”竟有50%余人之多，那么经他们联系而参加赌博的人数便可想而知地多了。这要比跑马、跑狗、回力球赛等赌博参加的人数要多得多。“航船”的报酬是每拉一个赌客参赌，便可取该客所下赌注的1/10，这在他们的行话中叫作“九扣入筒”。另外，他拉来的赌客中如有打赢的，





则在 30 倍于赌注的赢资中，“航船”还可拿 1/30。

花会在上海盛行起来以后，为了招徕更多的居民参赌，花会中人又将这古人名及所代表的动物精作了更动和调整，主要是除了动物之外，新换入了“老僧”、“尼姑”和“小和尚”这三样。这是因为当时沪上佛教还是比较盛行的，花会以此一招作为拉拢一班信佛的妇女参赌的手段之一。另外便是不再将观音设为会首，而是将广帮、宁绍帮花会中的“张火官（鸡）”一门改作“林阴街（鸭）”，并尊之为花神，如同观音门那样，虔诚供奉，作为“坐筒”是从来不开的。这样，上海后来盛行的花会便是如下的三十六门：林太平（龙精）、陈逢春（鹤精）、龙江祠（蜈蚣精）、林银玉（蟹精）、林阴街（鸭精）、宋正顺（猪精）、李汉云（牛精）、陈日山（鸡精）、程必得（鼠精）、李月宝（龟精）、陈安士（尼姑）、双合同（燕精）、李明珠（蜘蛛精）、刘井利（鳖精）、郑天龙（老僧）、方茂林（小和尚）、张合海（青蛇精）、张九官（老猴精）、吴占奎（白鱼精）、张万金





(白蛇精)、张三槐(山猴精)、马上招(猫精)、陈吉品(白羊精)、陈荣生(鹅精)、黄志高(蟾精)、张元吉(黑羊精)、翁有利(象精)、罗只得(黑犬精)、徐元贵(虾精)、朱光明(马精)、赵天申(花狗精)、苏青元(黑鱼精)、田福双(田狗精)、陈攀桂(田螺精)、周青云(骆驼精)、王坤山(虎精)。在花会赌的程式上,除保留原来的上一天日夜两次会开出的二门,作为当天的“门将”不再参加开彩,并悬在当天开彩的彩筒边作“号筒”的老规矩外,再添上了“陈日山(鸡)”一门日里不开彩,“王坤山(虎)”一门夜里不开彩的新规定。这样可供下赌注的仅30门而已。

旧上海花会开的时间是白天四点和夜里十点。到规定时间开筒时,但见花会总机关会所大厅上拦了木栅,栅内放一条长台,台前有一人面内而坐。他头顶上的屋梁上,便是缚着用线扎紧的绘有中彩名人图像的当场彩筒,边上则挂着写有当日门将名姓的号筒轴布。这时突听得爆竹大鸣,然后长台前的人站到台上,从梁上放下彩筒开拆,立时便





知这场赌博的结果了。这一结果由“航船”和“快马”（即骑脚踏车的传讯者）们飞快地传到上海滩上的各个角落的赌客那里，一时间捶胸跺足者有之，呼天抢地投河上吊者有之，典卖借贷再赌不休者有之，却很少听说有狂喜发财的。虽则如此，受骗去参赌的人还是很多，这是因为一般赌徒都认为这场开彩很公平没有弊端，殊不知，那布轴筒是很粗的，里面做成夹层，三十二个名人图像都可以扎紧在里面，待到开筒时间到，这木柜中赌客的押赌情况，设赌的花会主早就了然于胸，于是避重就轻，拣那押赌最少的，甚至是那无人押注的一门花名开花，那么这许多赌客的押注钱财便全部被设赌者骗进，这叫作“放空门”。

由于花会总机关会所是秘密的，除少数人能参加当堂开筒的赌博活动外，其他被男女“航船”拉来参赌的中下层百姓，都在各处的“听筒”那里等候开筒结果。花会的总机关会所又唤“大筒”，这“听筒”便是“大筒”的“分筒”的意思，因为它自己不开彩，专听大筒所开的彩以定输赢，故叫作“听





筒”。旧上海这样的“听筒”不下几十处，遍布于各个角落。听筒虽说不开彩，但它也有弊端可作，它根据自己所收到的押注情况，可以买通大筒设法开它的轻门（押注少的一门）或空门。否则，如大筒开出的正好是听筒的重门，则听筒便要赔光了。

旧上海的许多参赌妇女或不便到这种大筒、听筒之类的聚赌场所去，较普遍的便是将钱交给“航船”，对他说明打哪一门，剩下的事便全由“航船”一手包办了。赌注多少都行，即使一、二个铜板，那“航船”也要诈你来参赌的。

参与花会的除了劳苦人民以外也有巨贾豪商。这些阔老为避免被花会主“放空门”，往往是将巨额赌注连同所押花名封在一个包里，亲自挪进总机关会所里去。由于包是被封的，会主当然无法知道他打的是哪一门，自然无法施展放空门的技巧了。待开筒时，如若打中了，那阔老当场拆包，验明押注与花名，当场索取三十倍于押注的赢资，如若不中，则也不必拆包，无言自退了。这在花会行话中叫作“打封包”。顺便说说，后来上





海人对那种在卖货时，不准顾客当场拆去包装验看商品的做法，便唤作“打闷包”，其出典便在于花会的“打封包”上。

旧上海的花会赌博，由于它：一，貌似“公允”没有弊端；二，赌资不论大小多少都可参加；三，如若打中可得三十倍于押资的赢资，颇具诱惑力；四，再加上有那几十处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市、四百五十多名跑街“航船”，跑遍上海滩的家家户户、小店小铺、小商小贩，因此它的覆盖面最广大，诈骗毒害的对象也最多。而妇女也在其中占大多数。

这花会开彩设 36 门，究竟将赌注押在哪一门上，这实在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没有什么数学理论可供计算的，更况且这原来是设赌诈取钱财的一个骗局。可是那些中了毒害的赌客偏要找出个安慰自己的心理寄托来。于是便企求得到神灵的启示，做梦便被他们作为神启灵迪的表现了。据那些热衷于打花会的赌徒们说，在打花会的前一夜，如若做了梦，且梦中见到了 36 个古人中的一位，则第二天将赌注押在这一花名门下定能大中。如若梦中没有见到古人呢，那便开始牵强附





会了，如梦见动物，则该动物所代表的相应古人（如花狗代表了赵天申，黑狗代表了罗只得等），便是第二天应押注的花名。有时是梦见了自己的亲友，则该亲友的生肖所对应的古人名，似乎也是神的启示。还有人求神拜佛以求灵感。曾经有这样一个嗜花会赌的腐儒，他为了求神佛赐梦，竟然还在神佛前上了这样一个条陈：

“具愿词某某某为仰求多赐花财事。某本不敢妄贪横财，缘贫困所迫，借贷不灵，救急之策，舍此未由。现有专设花会之场，其名类繁多，欲出资赌押，难以揣测，又日夜两次开阄，得失颇为便速，是故仅于今夜虔备名香绛烛，叩求神圣座前伏望威灵垂悯庇佑，在梦中指明真字一名，裨开愚昧，伏维神圣夙以慈德为怀，以济贫弱，果有灵验，当答谢神恩谨此上禀太岁某某年某月某日弟子某某某谨叩”

通观全文真是迂腐荒唐之极，其受毒害之深可见一斑。

至于那些缺少知识的旧社会妇女，当然没有这样酸腐，但她们求梦神示的做法却更





出格离奇而不可思议。为了求梦示，开始时，她们是赴荒郊远野中去向那些石翁仲、石兽石马石骆驼礼拜，后来索性演为夜深更穷时，往旷地野土冢、乱葬岗坟堆里去露宿。这种荒土冢露宿的离奇做法，在旧上海滩上还会时行过一阵，并被唤作“祈梦”。其实这也只是希冀以恐怖环境来刺激大脑皮层，以求产生反馈，形成恶梦而已。后来，这种单身妇女深夜在旷野独行，或在荒庙、乱土冢单宿，时常发生被恶徒趁机奸污的事件，于是一时间又盛行将乱葬岗上的骷髅偷窃回家，焚香奠酒对之虔诚祷告，礼拜再三之后，竟将这骷髅置于枕旁共眠的做法，希冀能得梦中神示。后来竟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不知什么时候起，花会赌徒中又传说，若把尸首置于身旁与自己同卧一榻，那尸首定能托梦给自己，告诉你明天开彩的是哪一门，且这是十分灵验的。于是便真有这样中毒极深的蠢笨妇女，为求得一具能同枕而卧的尸体，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掉了而求梦祈财的，这件事在当时上海的报纸上也登过新闻的。

花会赌博自 1902 年来上海立脚以后，在





上海滩流氓的把持下，一下子便盛行起来，且越演越剧。到 1927 年，上海工人运动高涨，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工人、劳动群众的觉悟得一大提高，花会赌失去了它的招徕赌客的市场，使打花会一度消歇。但是，抗战开始，上海陷于日寇的铁蹄统治下，日寇公开倡赌以毒化上海，在虹口他们又将花会总会所扶持起来，公开开彩设赌，既搜刮了中国百姓的钱财，又妄图以此进一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抗战胜利后也依然如故。“航船”、“快马”依旧在大街小巷中窜来窜去拖人入赌，因赌博而弄得家破人亡的事例层出不穷，报纸也不再作为新闻而刊布了。直至解放后，花会才成为一种历史陈迹。

十二、西园赌场记实

开设在上海南市中华路老西门的西园是抗战期间上海最大的赌场之一。这个赌场由当时伪警局密探副总队长李小宝出面，向伪上海市政府申请领获营业执照的。李小宝名义上担任经理，实际工作是由其徒属喽口罗搞





的。李则是西园赌场坐地分赃的后台老板。

赌场的门面装璜富丽，有霓虹灯“西园”两字的招牌。它们把楼上楼下十开间的房屋油漆一新，灯光辉煌，设有十多只各式各样的赌台；还有账房间和作为招待嫖客的中西餐室、茶点室以及解烟室（即吞吸鸦片烟室）；同时另辟一间特别室，是专供一般所谓大老板赌博的房间。此外并备有出差汽车接送。

赌场很大，可以容纳赌客千余人，雇有二百多个男女职员，分任赌场各室招待和担任赌台的做手以及其他一切事务工作，日夜分三班服务。这些职员能够进入赌场工作，都是和老板们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在进场工作之前，必须一律缴纳一笔现金押柜费，至于为数多少，就得看你与老板们的关系如何了，而这笔钱实际就是后来开设赌场的资本。每个职员的工资是很少的，仅能维持个人生活，主要收入靠赌客的小账红钱（又称香烟钱），所以他们招待赌客显得特别殷勤，而赌客们也就感到格外舒服。

赌博的种类形形色色，有广东牌九（俗





称广九台)、转盘台、大小台、花棋摊、铜宝台等十余种不同的赌具和赌台。每一只赌台派有五个职员，分工负责赌台上的工作，其中三人担任做手，即一人负责摇缸、数点，又称为摇手；二人站在摇手左右两旁，专门管理赌客押赌注和吃配筹码；其余二人中的一人为银台，专管赌台上的筹码进出，另一人为监台，专事监督赌台上的做手和银台与赌客有无串通作弊，暗中揩油等事情，同时兼管发给赌客中西餐券，香烟券和大烟券等工作。这五个职员，统称庄主。

由于每只赌台的赌具不同，因而赌博的方式和分输赢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例如：

1. 广东牌九的赌台：用的赌具是 32 只牌九牌和两粒骰子，一只摇缸，赌博时分天、地、银、鹅、三长、四短、五夹。以庄主为一方；赌客押赌注分天门、上门、下门为一方。赌博时由做手（即庄主）把 32 只牌九牌弄乱后，随意取出十六只牌，分成四排，每排四只，然后由赌客们在天门、上门、下门随便押注后，由做手摇动骰子缸，连庄主共分四门，按照骰子点数，依次各取四只牌，





分拆两道，以小点为头道，大点子为后道，按照赌法，分 72 轧，庄主与赌客同宝子的由庄主吃进，长牌吃长牌，长牌吃短牌；短牌吃短牌，短牌吃五点；大点子吃小点子，同点子也由庄主吃进；押赌注以一本赔一分输赢，由做手吃配。这样庄主明占上风，赌客肯定是下风，所以赌博中有句俗话：“久赌必输”。

2. 转盘台上的赌具，是摊上一块印有 32 门圆形的押赌注的赌图台布，用电动的一个车轮相似的圆盘和一粒弹子，圆盘周围刻上与赌图相同的凹形的 32 门的点数。赌博时先由赌客把赌注押在自己所喜欢的赌图这一门上，等到赌客将赌注押齐后，乃由做手揿电钮，转盘旋转，弹子随之跳动，电钮停电，转盘渐渐停转，而弹子的跳动也会停在某一点上，就分输赢，有轻门重门之分，押注中的有一本赔 36 倍，没有押中的各门统由庄主吃进，所以虽然一本赔几十倍，但是由于门数多，还是吃进的筹码多，配出的筹码少，这是吸引赌客的手法。

3. 大小台上的赌具，是用三粒骰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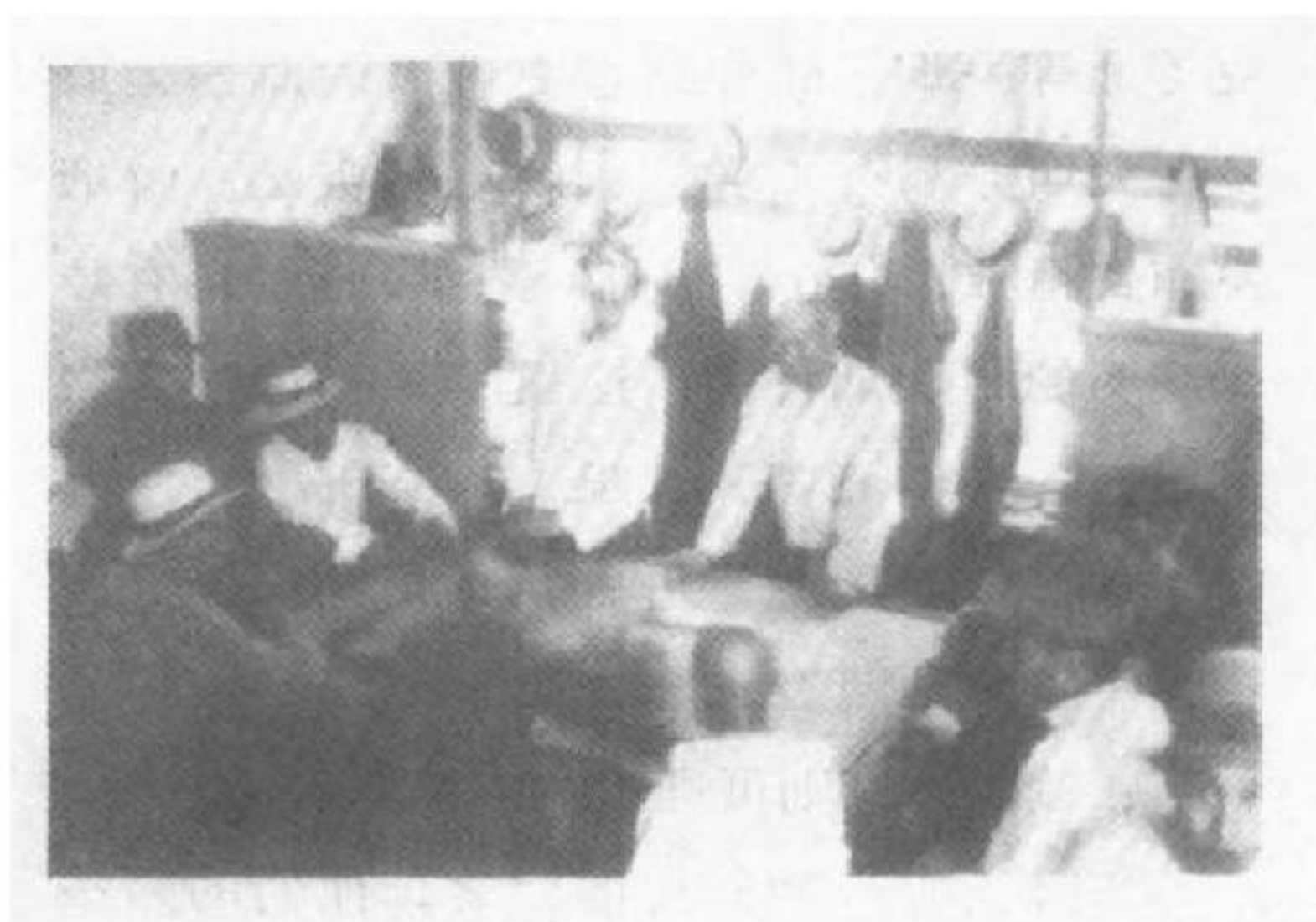




只摇缸，赌台上摊有赌图台布，左右两边各印有相同的点数，11点到17点为大；4点到10点为小；3只骰子点子一样的为宝子（如3粒骰子，每粒都是2点）。赌时先由做手摇骰子，然后由赌客押赌注，押在大或小点子上，以一本赔一为输赢，押在单点上（如押4点或5点）乃是一本赔5到16倍，押在宝子上则一本赔120倍。做手开摇缸分输赢，赌客押大开小，或者押小开大，庄主吃进。再有押单点的除了押住单点，如押在4点上开出也是4点，可配到规定的倍数外，其他都由庄主吃进；押宝子的除了押在这个宝子上（如押在3粒骰子是3点的宝子，与开出来的点子相同的），可配到规定的倍数外，其他因为庄主开的是宝子，不管押大押小押独点都是由庄主吃进。

上述赌场中的10余只赌台上，有各种形式不同的赌具和不同的赌法，同时分输赢的方法也不一，虽规定配赔自1倍至120倍，对赌客很有诱惑力，但实际上还是庄主占极大便宜。一般开赌台的人经常说：“不怕赌客赢得多，也不怕他们买地造屋，只怕他们吃光





赌博是传统的陋习，图为民国时期某赌场

947

用光。”

在刚进入赌场时，赌客要先以现金换取筹码。这种筹码，是以狭长的胶木制成的，一面刻有“西园”两字，另一面刻着不同代价的数值，并漆有红黄绿兰等颜色加以区别。赌客换到筹码，就可以随自己的所好到楼上楼下各个赌台，进行赌博，同时赌客可以向赌台的监台领取免费供应的中西餐券，只要你需要时可以到餐室进中菜或西菜，随时随地都派有职员殷勤招待。如果吸烟的还可以领取香烟券，取得免费供应的白锡包、茄力



克等上等香烟。此外赌客更可以向监台领取免费大烟券和茶点券，去解烟室吸烟。解烟室布置精雅，有6、7只藤榻；吸烟时还有装烟高明的男女烟杆手。这里除了招待吸烟之外，又备有莲心羹、水果、浓茶等，所以许多赌客，又是烟鬼，进去就吞烟吐雾，舒服一番。赢钱的赌客也往往想进去畅快地休息一下；输的赌客则可进去解闷消愁。

当时也有一种调皮的赌客，他们的赌法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叫“跑生意”（又称放鹞子），这是两个赌客串通对押相等的赌注，1人专押大，1人专押小，这样输赢可以相等；另一种是叫“九输一胜”，化的赌本较大，而赢些小钱。他们赌时，先以1元为赌本，如果输了，就押第2次，乃以2元为赌本，又输了；第3次就押4元，再输了，第4次押8元，这样依次类推10次为止，需本金512元，其中只要有一次押到，可以反赢1元。这两种赌客，大多是地痞流氓，他们的目的，不想赢大钱，而是骗取赌场内的各种招待和享乐，这对赌场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因此是被赌场雇用的“抱台脚”所注意的对象。如果





有时为了这批赌徒引起争吵打架，被“抱台脚”发觉而不接受警告时，往往被驱逐出场。至于抱台脚之流，都是由李小宝的后台卢英（卢其时任伪警察局密探正总队长）和黄金荣派来的，他们负有维护赌场“秩序”的责任，所以经常在巡逻各个赌台上有无捣乱分子。如果发现，必要时就请其退出场外。当然，这批“抱台脚”者的生活费用，全由赌场供给。

赌客之中，三教九流，男女老少全都有。这个赌场在1940年至1943年间，赌风最盛。职员的工作，日夜分3班，赢钱的赌客，给职员们相当数目的大烟钱（即红钱），作为对他们殷勤招待的酬报。职员们所得的红钱，按规定应集中在账房间，每隔五天分拆一次，依据职位的高低而决定多寡，这是职员的主要收入。赢得巨额的赌客，则由赌场派员用汽车护送回家。赌客赢了当然很高兴，还要想赢，不肯罢休；而输的赌客呢？总想翻本，何况赌客都抱着想发横财和捞“外快”来的，所以输得精光时，还想翻本，即使典押东西以至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因此西园赌场





附近，自新桥街到老西门，有万昌、亿丰、鸿祥等许多当店，专为赌徒而设。这些当店的利率特别高，期限特别短，从一天起算，一个月为期，如期满不赎，即行没收。假使当进一天就去赎出，而利息也要算一个月。其中还有一种押店，专供赌客将当票押进去，有日押，月押之分，利息各不相同。赌客中当的东西，以金银饰物为多，其次是皮货西服。最有趣的是当店备有大批旧布鞋，专门预备赌客输光当尽时，当皮鞋时用的。当店老板把期满没收的东西，予以变卖，又可收到一笔可观的押余（就是押款与变卖价的差额）。他们就是这样混水摸鱼，跟赌场狼狈为奸，榨取赌客钱财的。由此可见，当时的西园实际上是个害人的魔窟。

十三、吃角子老虎

1927年以后，上海各游乐场所，如跳舞场、酒吧间等，都在走廊或穿堂里设有一只类似铁箱的东西，这就是引诱游客们赌博的“吃角子老虎”。赌法很简单，只要把镍质辅币或用钞票掉换的码子投入钱箱上端的洞眼





中，把扳手一扳，这时下面洞口会吐出2枚、4枚、8枚、16枚，甚至数10枚码子来，有时则不吐码子。这个赌博机器是美国流氓杰克·拉莱从美国带来的。据说1只“吃角子老虎”每天能吃进200元角子，而杰克1人就有120个这样的机器，如果统扯每只吃进100元，他每天就有12,000元进账。他发了财，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静安寺路开了两家规模甚大的“弟弟斯”酒吧间。

十四、赌台

上海流氓地痞勾结外国人摆设赌台，这是半公开的赌博。所谓半公开，因为摆设赌台是“瞒上不瞒下”。“上”指的是巡捕房高级官员，如总巡、刑事科长等。其实他们也并非不知，只是得了贿赂，不闻不问罢了。“下”指的是巡捕房包探（俗称“包打听”）以及某一个地段的巡捕等。赌台是他们捞外快的好地方，只要有钱他们就可包庇一切。

赌台的摆投按地域划界，按帮口分类。按地域划界是指凭借流氓平时的潜势力所在地，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按帮口分类是指






按广（东）帮、绍（兴）帮或本帮（本帮不单指上海，包括苏、常在内）设台。各帮的赌博方式不同，本帮以“摇摊”、“小牌九”为主。广帮赌法范围较广，有“大牌九”、“小牌九”、“抓摊”（亦名番摊）、“轮盘”、“廿一门大小”、“勃洛克”等。绍帮则以“铜宝”为主（与摇摊开青龙、白虎、进门、出门相同，但有人在幕后做宝）。

“摇摊”，沪人称为押宝。最初盛行虹口地区，开台抽头渔利，作庄家的叫郎中。其法开四门，每摇一次出一门。郎中惯于作伪，或用灌铁骰子吸铁石，或以翻戏倒脱靴术骗人，将赌注杀进，赌徒入其圈套，无不输得精光。

流氓摆设赌台是从本帮开始的。早在1915年于四马路（今福州路）开戏院和野鸡妓院的许荣福（绰号乌龟荣福），在山西路昼锦里附近开台子（赌场的别名），只有摇摊一种。1916年蔡鸿生（绰号蔡和尚）在郑家木桥开了一个新“台子”。1917年以后，“台子”便似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在英租界，陆少卿（绰号六眼少卿）在鸡鸭弄（今山东路





打狗桥) 开台子。三丫头 (绰号, 姓名不详) 在五马路 (今广东路) 满庭坊开台子。许锦春 (福宝) 在六马路 (今延安东路) 开台子。在法租界, 陈世昌 (绰号套杆子福生, 杜月笙的老头子) 和袁三宝在自来火街 (今广西南路) 宝兴里开公兴赌台。马祥生 (青帮“大”字辈高士奎徒弟) 与金廷荪 (绰号金牙齿阿三) 等在南阳桥附近生吉里开赌台。范恒德 (绰号阿富郎) 在小东门洋行街开赌台。这些赌台以生吉里的资力最为雄厚, 赌客大都是做生意的老板。这样持续了近十年之久。在这个时期内, 大的赌台, 总是通宵达旦, 输赢甚钜, 抽头及盈余所得, 成千上万, 使许多流氓得以过豪华生活。

1927 年北伐时期, 广东财阀、在澳门以赌起家的著名赌场老板梁培, 嘱使王宝善在上海贿通法租界当局, 租赁公馆马路 (今金陵东路) 房屋百余间, 组成“利生”、“富生”两个大赌场, 雇用职工及“抱台脚” (保镖之类) 达八百余人, 用去资金二百万元。赌场内部陈设华丽, 一切供应免费, 西菜、中菜、点心, 应有尽有, 并有年轻女子招待, 汽车



接送。一切规模，仿照澳门大赌窟，在上海是空前未有的。赌博的种类，亦与本帮不同，“大牌九”、“廿一门大小”、“轮盘”等，一应俱全。于是卜昼卜夜，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功夫，广东老板就发了大财。

1930春，本帮赌棍因广帮独霸赌场，断其财路，便与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商量对策。先与广帮负责人商议交替办法，因无结果，“三大亨”遂联合一批买办、绅士和各界“闻人”具呈要求取缔。法国驻沪领事不得不撤销了利生、富生两公司的营业执照。广帮赌场只好停业。

黄、杜、张三大亨乘广帮停业后，联合本帮流氓，组织更大的赌场，于1931年正式成立。由钱春宝（安清帮，“通”字辈）、江小棣（杜月笙徒弟、苏州人）等出面主持，内部高级干事有顾嘉棠、高鑫宝、马祥生、陈世昌、蔡福棠、万墨林等人，上下共计1300余人。他们租赁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洋房为赌场。此屋坐南朝北，房子在法租界，面向公共租界。赌具以36门的轮盘为主，其他如骰子“廿一门”、大小“牌九”、





“摇宝”、“勃加那”（扑克的一种）等，应有尽有。至于招待供应，则比利生公司更为周到。有中菜、西菜，还供应鸦片烟，女招待奉承侍应，并有汽车接送。赌客的自备汽车，每辆开发车饭费4元，包车2元。晚上赌客赢了钱回去，有保镖护送，保证安全无事，另外还有上等听装香烟奉送。开幕之前，遍邀沪上富绅巨商，达官贵人，男女老少，莅临参观，并大摆筵席，同时发给特别会员证。凡属特别会员，进场赌博，格外优待，持有5天10天期的庄票，亦得通用掉现。每天保接保送，负安全责任。因此当时的官僚买办，如下了台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安福系国会议长王揖堂，盛宣怀的儿子恩颐（老四）、昇颐（老七）和七小姐、王奶奶，以及大赌棍李律阁等均为座上常客。总之，这是上海最大的赌场，提到181号，无人不知。

实际上，王宝善所开的利生公司并不是上海轮盘赌的发源地。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就有一个“A字13号”轮盘赌窟，是无领事管束的葡萄牙人勾结虹口帮赌棍开设的。当时出入这个赌窟





的都是达官富商，输赢动万。但对外称“招商局董事俱乐部”，房屋坚固，门设机关，进出有暗号，不容生客闯入。有日，警察督办萨某前往捉赌，现场捉获的赌客中，竟有邮传部尚书、宫保盛宣怀、仁和相国王文韶，以及孙宝琦的内眷、少爷和小姐等人在内，几乎酿成巨祸。

181号这一上海最大的赌窟，不知使多少人由于沉缅在轮盘赌上而倾家荡产！这个赌窟后因日本侵略我国，沪战爆发才告停歇。

1937年上海沦陷后，随着日军控制上海和占领租界，上海赌场有了更大发展。首先是沪西愚园路一带（帝国主义殖民者越界建筑的马路）警权转移于日伪手中，成为流氓、汉奸、赌客的活动地域，赌场林立，受到日伪的包庇。先是广帮死灰复燃，王宝善在愚园路开设“好莱坞”赌场，同时又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开设“联侨总会”赌场。王茂亭（广东人）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开设“秋园”赌场。本帮不甘示弱，邵莲庚（樊良的徒弟）和钱宗范（荣炳根门徒）合伙在延平路康家桥开设“荣生公司”。潘三省在





戈登路（今江宁路）开设“华人乐园”，朱顺林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开设“兆丰俱乐部”。1938年更有李鸿章的孙子瑞九，向日本军部领得“特别照会”，由殷霍龄出面，租赁海格路（今华山路）626号开设赌场。626号大赌场堪与从前的181号大赌场相媲美。

1940年夏，因日本军部分赃不匀，曾一度勒令626号大赌场停闭。后经广帮和本帮联合向日本军部疏通，才获准合并开赌。于是以“六国饭店”名义，继续开业豪赌，所谓“六国”，就是“好莱坞”、“联侨”、“秋园”、“荣生”、“兆丰”、“华人”六家合称的机构。这个大赌场在1942年秋，因敌酋来上海视察其占领区情况，事前着即停歇。

此后不久，本帮在伪公安局局长卢英、76号特务吴世宝的支持下，高兰生（杜月笙门徒）在南阳桥恒安坊开设“六生公司”。王永康在九亩地（今大境路）开设“绿宝公司”，李筱宝在西门开设“西园”，张椿宝在露香园开设“利生公司”，赌风一时南移。1943年上海伪公安局局长，因勒索巨款未遂，





下令赌场一律停闭。到了当年年底，赌场全部停止营业。

“铜宝”是绍帮和甬帮开设的赌台，设备简陋，赌法简单，仅仅租赁一、二间破旧平房，摆上几只长凳和几块木板，即可进行赌博。最初开设在郊区冷僻处所。赌具是一只铜制的宝，铜宝”四周刻着“天地人和”四个字，罩在木盒内，放在赌台中央，任赌客下注，这与“摇摊”分四门：进门、白虎、出门、青龙的赌法一样。所不同的是由一人躲在帷幕后做宝。先流行于南市十六铺，后传至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盛极一时。蔡鸿生和高兰生曾投资在六马路（今延安东路）开设“铜宝”赌台，但因局限于绍兴土风，赌客一般以小商小贩为多，输赢甚小，旋即停歇。

十五、总会

上海还有一种称为“总会”的，也是变相的赌场（俗称俱乐部）。照例“总会”必须依据租界章程，向工部局或法公董局申请备案，并领取执照，方可设立。总会有华洋两





种。洋人出面的总会，包探与巡捕一概不得入内查察。华人出面的总会，常有包探巡捕进去干涉，只许搓麻将，不准其他赌博。有雇佣葡萄牙人出面领取执照的，得与洋人总会一般待遇。华人总会以甬帮买办组织的居多，平时又麻将兼玩扑克。但每逢新年节日，便轮流推“小牌九”，输赢动万，捕房得了贿赂，亦不加干涉。上海最早的华人总会，是1905年朱葆三、严筱芳等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开设的“长春总会”，会员数十人，多是买办富商巨贾。后来，1916年，虞洽卿、谢天锡、袁履登等在六马路开设“宁商总会”。会员人数甚多，也多是富商巨贾。1930年，由杜月笙幕后支持，在四川路南京路开设“伦社总会”（伦，沿用古代造纸者蔡伦之名），纸老虎如徐大统和刘铭垒弟兄都是总会会员，在上海沦陷以后，会员们的豪赌，可谓史无前例。

十六、“丐帮”闯江湖

乞丐，俗称花子、老花子、讨饭化子、叫化子、要饭的、打闲的、跑腿的、吃生意





的等等，是社会上人们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穷裕悬殊不断扩大的产物。它出现于何时已难以稽考，不过，从不少地方的乞丐供奉东汉末年的高士范冉为祖师的现象看，其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东汉。自那以后，社会上总有乞丐现象出现。到14世纪中叶，曾行过乞的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后，乞丐更是很快地发展起来。民国时期，由于社会上的分化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一些勉强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也因为社会的动荡成为无业游民，致使当时的乞丐数较过去有了不小的增长。

民国时期的乞丐，不仅遍布于落后、偏僻的边远地区，也大量存在于各大都市中。北京是天子脚下的一块宝地，历史上先后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城市状况应该说是优于其他地区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乞丐的人数并不少，而且成份也比其他省市来得复杂。

在毗邻北京的天津，即便是繁盛的街市，乞丐也非常之多。他们大多聚集在各戏园门口及有妓院的弄堂里，非要乞得了钱才肯放





施主离去。

民国时的乞丐大都分有组织的和散兵游勇式两种。散兵游勇式的乞丐，是自谋生路，靠自己乞讨糊口的乞丐。他们的流动性很强，日常出没颇有些“打游击”的意味。不过从其总数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有组织的乞丐，即是职业乞丐，有穷教行、乞丐行、丐行、穷家行、理情行等不同称呼。落拓者或无业游民加入这种组织，称为入行。入行之初，要以自己所乞得的钱财，完全献给丐头。所献越多，面子就越大。之后，便按规矩将每日所得提出几成报效给丐头。丐头对新入行的乞丐，总要指点一二，譬如当乞丐的规则，指导行乞的方法等等。如入行的乞丐遇到了非常变故，不能行乞，丐头负有一定的救济的义务。当然，这是就乞丐组织的一般情形而言的。倘若丐头凶恶残暴，其内部情形就完全两样了。

在明代就很普遍、到民国时期依然存在的穷家行，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一带的职业乞丐。参加这种组织的乞丐，一般称为捻上或捻子。其中，又以其所从事的活动的





不同，被分为死捻子、活捻子和杆上三类。死捻子俗称叫化子或要小钱的，是穷家行的正宗，人数也最多。活捻子即小绺和偷鸡的。他们从一般的讨要发展成为小偷小摸，因而不是正派的穷家行。杆上即炮手，它是死捻子在某一地区混熟后，坐收当地人所给予的好处而生活的一种乞丐。



乞讨的孩子

如果谁要加入乞丐组织，都要先拜师。认师仪式上，要摆刮打板、牛胯骨、小簸箩、



要饭的搭子等乞丐行乞所需的道具，同时还需备一壶酒。认师开始，先由师傅告诉徒弟自己所属门派，是第几座上的人，再由“明辅”讲明行道，“过辅”保证自己所介绍的徒弟将不违犯穷家行的纪律。最后用酒在摆着的乞讨道具上浇一个圈，就算完成了仪式。

参加穷家行之后，遇有同行盘道时，必须说出师傅、明辅和过辅的名字，是第几座上的人。彼此之间，都按照座数来论大小，长辈称为师爷、师叔，同辈则称为弟兄。

乞丐，自然是以乞讨为生的。但是，叫街丐、钉头丐、拉头丐、蛇丐、响丐、吹竹筒丐、诗丐等不同的乞丐，在乞讨方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在北京，一些比较文明的乞丐，常常挎着小洋铁桶，沿街或串饭摊饭馆叫喊“修好吧老爷太太，赏我口剩饭吃吧”，讨得一些残羹剩饭、鱼头鸡爪等杂物，倒入桶内带回去果腹。在河北宁津，一些瘸老病瞎和少臂无腿的残疾人，大多在庙会上坐在庙门内，口里爷爷奶奶地喊叫着向烧香的人们讨要；在市集上，他们则坐在一定的地方或沿街乞讨。





这种讨要大多无功而返，甚至常常不能果腹。与之相类的，是一些整日伸着枯瘦的双手，尾随着穿戴讲究者或其所乘的人力车的乞丐。他们一声声“老爷太太”或一句句“少爷小姐”地喊个不停，也难以碰到大发慈悲、慷慨解囊的财主，赏给他们一些小钱。有时候，他们还会被那些脑满肠肥、衣着时髦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怒斥一顿，甚至饱以一顿拳脚。

在包头，有一种乞丐很会揣测一般人的心理，因而他们所乞得的，不仅足够自己所吃，还可以提供一点给别人。这种人，平时很注意和商店、字号的伙房搞好关系，给他们做些掏炉灰、倒泔水之类的事，故吃饱一般不成问题，有时甚至可以把成桶的剩饭打回去。遇到当地大家庭过生日或满月、乔迁开业或过年过节，这些人就念上几段吉利的喜歌，以博得施主欢心。世人没有人不愿意听别人对自己的赞美的。乞丐也因此常常能得到新鲜的酒食。

掌握了人的心理的乞讨，一般总是行之有效的。这在包头是如此，在湖南长沙也是





如此。在新春时节，长沙的乞丐有一种送财神之举，很得人心。所谓送财神，实际上是将一张印有财神像的红纸送到各家各户。这一方法甚为简单，但因为它迎合了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人们心甘情愿地拿出 10 文钱来“请”一个财神。

除此以外，一些乞丐还以唱数来宝，或手执檀板，高唱梆调挨户求乞。他们哀怨的唱腔，动人的词语，经常能打动一些人的同情心。他们的目的，也就在这种不经意的表演中达到了。

民国时乞丐乞讨的方法是种类繁多的。为了达到他们乞得钱财的目的，他们甚至可以自残。在北京有一种沿街“播砖”的小乞，一年四季行乞时总是敞胸露怀，手握一块砖头猛播胸部，发出咚咚的声响。令人耳闻目睹不禁毛骨悚然。更有甚者，一些濒临饿死的乞丐，为了活命竟然将自己的腮颊用大铁钉钉在同仁堂等老字号的门框上。他们行乞的手法虽稍有差异，但在诈得路人或店主的钱财方面，两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自残毕竟是痛苦的，因而，以这种方式





行乞的，在乞丐中占着极小的比例。倒是蛮横地敲诈、胁迫别人的乞丐，为数不少，而且在当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苏州、松江一带，乞丐对于民众的粮食、蔬菜、鸡鸭等物品，都要攫取。碰到人家婚嫁、举丧，这伙人就呼朋引类，围绕着主人索取酒食。如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是当门横卧，就是咆哮喊叫，弄得满堂宾客，惶恐不安。一直要到主人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方才作罢，结束这种恶作剧。

类似的情形，在北京地区也时有发生。逢年过节之时，北京的乞丐常在各大店铺之前叫唱。唱完，店主必须给以数百文铜钱，他们才肯离去。如若店主吝于金钱，乞丐就啸聚党徒，围绕在店铺门前进行喧嚣，而且闹上十天半月也不罢休。这时，即使给他们十吊八吊，也打发不了他们。

30年代，在北平天桥一带活跃着一批名为“女拨子”或“拍铺的”的女乞丐。她们在夜间栖止于山涧口和西草市等的鸡毛小店里，白天则头包青布，手持竹板，成群结伙到各家各铺嬉笑怒骂并演唱快板书，借此讨





钱。店铺掌柜对她们既恨又怕，只得用钱打发她们，花钱消灾。

除了以上种种，乞丐也有一些奸恶的求乞方式。有些地方，有的乞丐手提一文不值的瓷器或内装搀水酒精的名酒瓶，行走于熙熙攘攘的闹市，故意将手中提的酒瓶、瓷器碰上别人摔碎，然后乘机纠缠，不达赔偿的目的决不罢休。他们的这种求乞方式，简直就是公开的敲诈。

一般而言，乞丐的生活是十分痛苦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也只能委缩屋檐下、墙角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最好写照。然而，也有相当多的乞丐，特别是一些丐头，过着比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好得多的生活。他们从事乞讨，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因为懒惰。这些人，也和其他不劳而获者一样，成了社会的寄生虫。

包头的死人沟，是一个乞丐的世界。这里的乞丐，睡得晚，起得也晚，一直要到日上三竿才起身，因而此处的生活，与当时绝大多数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截然





不同。乞丐们在白天养足了精神，便在夜晚渲泄。入夜，死人沟的每座窑洞都灯火辉煌，像是迎接贵宾临门。乞丐们围着煤火炉子，有歌有唱，甚是惬意。口渴了，他们倒一壶茶润润喉咙；肚子饿了，他们从小桶里打上一点热饭果腹。到了冬天，他们把睡炕烧得热乎乎的，让人不觉得气候已是数九寒天了。他们的生活环境，除了尿桶、臭虫、虱子等不尽人意外，其余都够得上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

死人沟的乞丐，不仅日常生活颇为充实，而且还有鸦片烟享用。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准，恐怕连有一点土地、产业的人也够不上。难怪在当地流传开了“讨吃3年，给官不坐”的民谚。

一般的乞丐尚能如此舒适地生活，丐头就更不用说了。在青浦，一个丐头靠人们的婚丧喜庆付给的谢仪，积累了不少钱财。他不仅娶了一妻纳了一妾，而且每日吸食一两鸦片。同时，对于家人的衣着打扮，也不吝金钱。他的女儿在节日出外游玩，竟然衣着绸缎，珠翠琳琅。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





是为大家淑媛。

死人沟在民国初年很为兴盛，可说是乞丐的乐园。然而世事沧桑，到40年代中期，它已完全成为贫民窟了。此时，这里活人与死人为邻，乞丐与哈叭狗为伍，呈现出一片萧杀的景象。然而，丐头李根罗的生活很是富足。他们一家，住在三大间全是玻璃门窗的大正房里。家里有清一色的紫漆家俱，墙上有八扇屏和自鸣钟，炕上有绒毯和红缎被。要不是他家中供着乞丐祖师的神龛，很难想象这是乞丐的住所。

民国时遍布各地的乞丐对政府和地方而言，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因而，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把乞丐抓起来，以免这些人有碍观瞻。1948年5月下旬，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下令社会局会同警察局联合行动，以最快速度把马路上的乞丐都抓到难民收容所里去，原因就是他们流浪街头要影响“市容”。

把乞丐抓起来，关进收容所，终究是强迫性的，所以很难为他们所接受。倒是一些地方的养济院，笼络了一些乞丐。河北宁津，在清代就有养济院。其给乞丐提供的购粮费





用和购买冬衣钱，尽管杯水车薪，但也救了他们的一点急。进入民国以后，养济院给每人每季发5、6吊钱，提供十几间居室，使他们不致冻死、饿死。

当时，除了地方上出面收容乞丐外，也有民间组织参与其中。1926年冬，鉴于上海的游民众多、成群结队的闲散人员充斥街市的情况，上海各公益团体开会，讨论决定收容教养乞丐。翌年1月，上海乞丐教养院董事会在上海慈善团内成立。该董事会推定李平书为会长，顾馨一、姚慕莲为副会长，并择定漕河泾乡江苏第二监狱后面90余亩土地为院址。1929年6月以后，该院以上海游民习勤所的名义出现，对入所游民施以感化教育及劳动技能训练。

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地方绅商发起的；无论是强制的，还是疏导的，民国时为乞丐建立的机构和对乞丐所采取的措施，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乞丐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的勤惰并不是造成乞丐现象的根本因素，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乞丐，一向以来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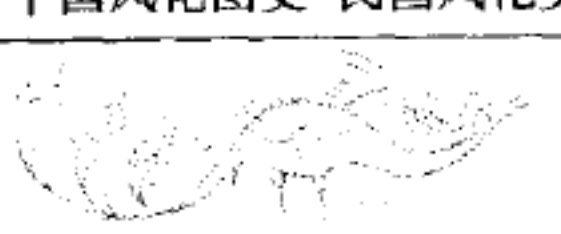


个阶层，民国时期自然也不例外。唯其因为地位低下，为一般人所鄙视，故十分容易被人利用。

在江西，有人生病，一般不求医生医治，而向菩萨祈祷。这已是很荒谬的了。更荒谬的是，小孩生了病，不仅要向菩萨祈祷，而且还要求助于女乞丐。按照迷信说法，小孩生病，不是由于冲动关煞而引起，就是遇着了生前父母所导致，因而必须设法禳解，而禳解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拜女乞丐为干娘。拜干娘之举，甚为简单，只要带着孩子，由亲生父母叫上几句即可。拜过干娘之后，幸而小孩的疾病痊愈了，女乞丐即以自己所乞得的饭，每日给小孩喂食一次，同时从小孩家里取得一二碗饭作为报酬。由于女乞丐被人拜为干娘既有名义，又有实惠，所以乐得坐享其成。


浙江永嘉的马孟容、马公愚昆仲，是驰誉艺坛的书画家。兄长马孟容是个风趣之人。他在寄居上海西门斜桥时，曾异想天开，嘱咐在弄堂里讨要的乞丐，在三天之内看见他出入，高呼万岁三声，即给三个铜元为赏。






乞丐当然乐意为之。为此马孟容很得意，自谓“居然做了统御宇内的皇帝，岂不威风十足吗”？

乞丐被迷信的乡妇农夫利用来作为生病小孩禳解中的主角和被人收买当作取乐的工具，已经够奇特的了，然而它与杨度利用乞丐来劝进相比，则要逊色多了。



民国初年，袁世凯意欲帝制自为。为假造民意，各种御用的拥护帝制的请愿团在各地纷纷出现。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大显身手，组织了各种名目的请愿团积极活动，使杨度的筹安会相形见绌，大有失宠之势。见此情形，杨度心中怏怏，苦苦思索胜过梁士诒的办法。一天，他乘车路过闹市，见两个乞丐在争吵，便不轻意的听了几句。当他听见其中的一个乞丐大声地说“今日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国的害处。假如皇帝还在，不会容你如此横行。我求老天，再生一个皇帝”，十分感慨，心想乞丐也拥护帝制，何愁袁大总统不能成为袁大皇帝。他带着发现了新大陆似的狂喜回到家后，即让家人找来乞丐首领，请他在三日之内召集城中丐众，还许诺愿受





召的乞丐，每人给银元一块，首领则给百块。京城附近的乞丐闻讯赶来了不下万人。由于这么多人在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乞丐请愿书成了当时种种请愿书中署名最多的一种。杨度在给袁世凯递上这份请愿书时说：“皇上恩义，下及乞儿，可知当今非实行帝制不可。”袁世凯听了“龙”颜大悦，问杨总共花了多少钱。杨度谦恭地答道：“他们自愿效力，一钱不花。他们求皇上登基后，多设栖息所，习艺所、广施冬米赈衣，使他们幸免饥寒就行了。”袁世凯十分满意地点点头，用铅笔把此事记在特备的本子上。事后，连其对手梁士诒也十分叹服杨度利用乞丐上书请愿的“壮举”，称之为“异想天开，出人意表”的奇事。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三章

芙蓉君子与鸦片烟毒



风

化

图

史




13




晚清是“棋局已残”的乱世。古语说：“乱世出英雄”，然而，面对洋鬼子的鸦片和枪炮，怎么能够让那些不争气的“烟兵”去和洋人拼命当“英雄”呢？那些凡夫俗子的血肉之躯又岂能抵挡得住洋人的真枪实弹！

从历史上看，晚清之世的中国已经彻底衰落下去。读读末世愤怒的文人用犀利而痛楚的笔墨写出的晚清四大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再看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的起义、甲午马关的耻辱、戊戌变法的流产、西太后的垂帘、袁世凯的告密，西风劲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举国寂寥，说起来，这一切的变故都缘于一种“美丽”的毒药——鸦片。



鸦片，又叫“阿芙蓉”或“芙蓉膏”，俗称“大烟”或“烟土”，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麻醉剂。罂粟花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长期一般为5到8个月。川、云、陕、贵、甘等地是旧中国鸦片的主要产地，这几个地方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frac{3}{4}$ 左右。每到春花3月间，罂花遍地开放，红艳美丽，花大如斗，一片阳春“烟景”。试想种上十亩八亩的罂粟，花朵盛开时该是怎样的情景？可是有谁曾想到，就是这种罂粟“美景”造就了晚清社会的局部“死机”甚至完全“瘫痪”。也正是这个毒物，不知消磨了多少中国人的锐气和精神，从此“东亚病夫”便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假如鸦片“贸易”提前到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也许中国的烟馆早已开到了旧金山新金山也未可知。历史的真实是：英国自1773年开始贩运鸦片到中国起，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用这个东西一下子打开了自以为“无所不有”的天朝的大门，从此洋鬼子便开始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



为所欲为起来。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竟然公开以“洋药”的名义，在各口岸城市象征性交点税钱之后，明目张胆地进口了；与此同时，国内禁种鸦片的法令亦随之形同虚设，一点用都不管了；两年后，大清政府又下令土药抽厘自此烟禁大开，鸦片产量扶摇直上。至此之时，道光朝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已成过眼云烟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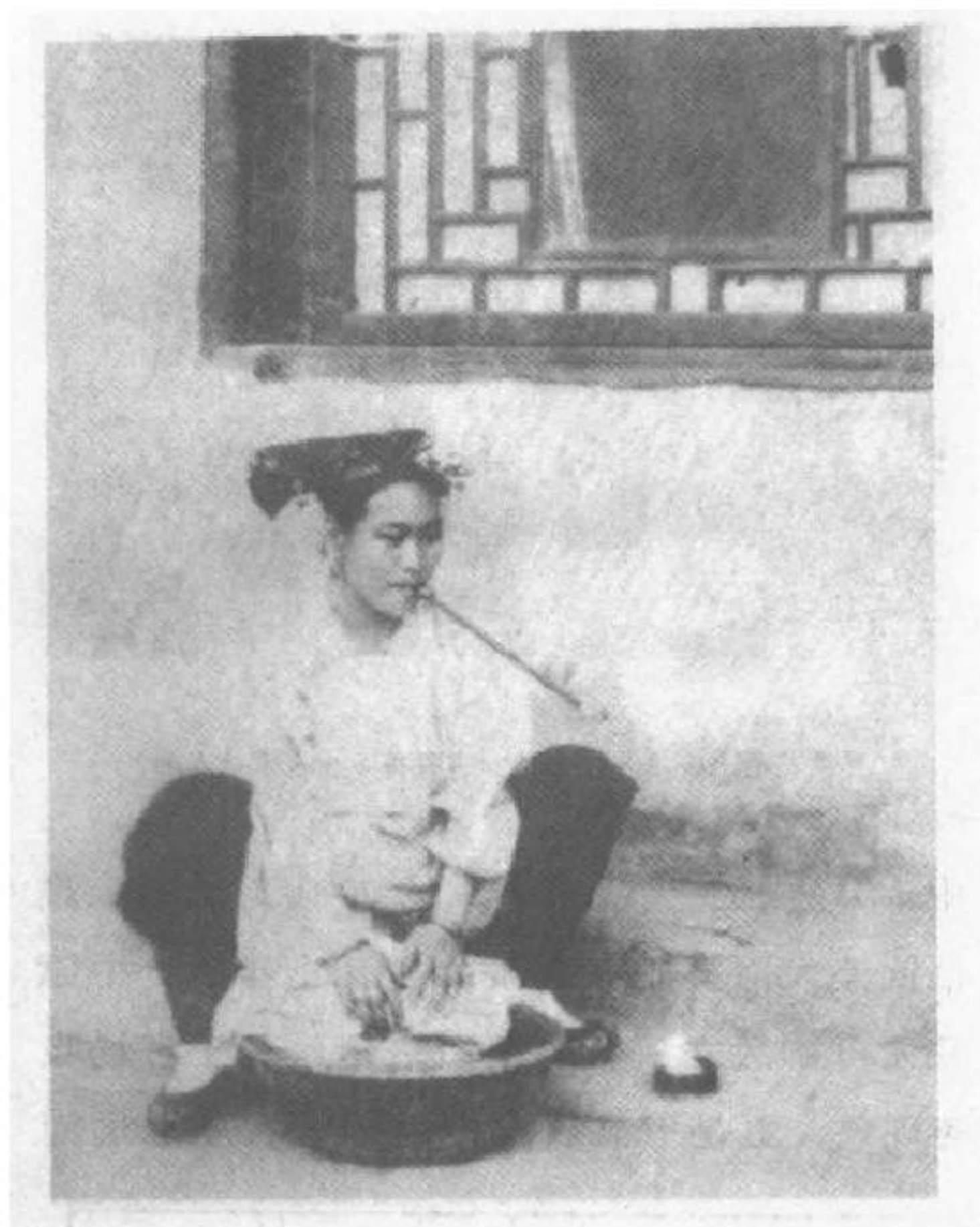
试吸者之写照：偶然高卧学吹箫，一枕游仙破寂寥，不道寂寥初破后，越眠越懒越无聊。



抗战之始，日本人学习借鉴英国人的花招，乃施行“毒化政策”，鼓励民间广种罂粟花，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日本人大搞“发明”，将鸦片提炼后，加入吗啡、可卡因等成为粉块状的“海洛因”。抽时只需锡纸一张或烟管一支，就可以吞云吐雾“打高射炮”。或者干脆放入香烟内，即可大过其瘾。重要的是，吸食鸦片约需20分钟才可见效，而吸“老海”只需短短2分钟，时间上可谓“神速”。而其毒性也比鸦片厉害多了，一般鸦片3月上瘾，而吸海洛因仅3天就成烟鬼了，可谓之“速成”。况且海洛因比鸦片贵多了，当时即为黄金的2倍，而一天抽上3两老海还不算什么高手。于是，继西洋鬼子之后，东洋鬼子的“杰作”也算大功告成了。

及社会各阶层、各省份，尤以十里洋场通商大埠最为流行。而这烟毒的泛滥，首先是从有钱、有闲的阶层开始的。最初的吸烟（毒）者，经皇帝点名批评的即有亲王、辅国公等政府高官，此外宫廷侍卫、内廷太监也得近水楼台之便，继之逐渐蔓延到六部官员及军队士兵中。随中国近代以来烟毒泛滥，





正在洗涤劳作中的妇女，口叼大烟袋吸食的情景。

几达无孔不入的地步。吸食鸦片烟毒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几乎遍着国产鸦片产量的增多，烟毒迅速扩散到了社会底层。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鸦片战争前约有 80 万人，其



罂粟花看上去很美，却不知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十分之二三为吸毒者，约 20 多万人。难怪钦差大臣林则徐要发出“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的愤激之语。至于官场吸毒现象，更是丑态百出，大约呈官职之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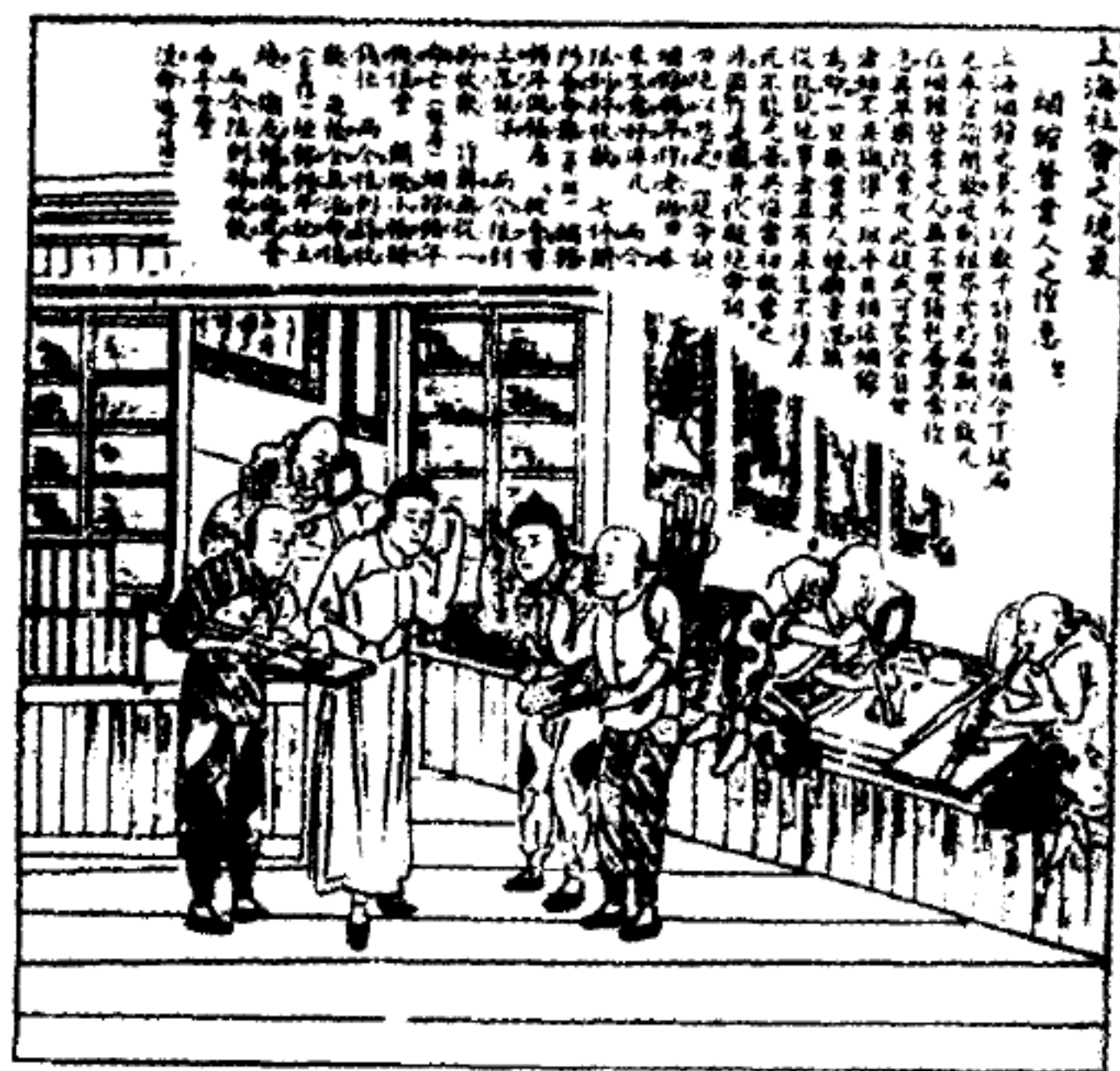


漫画：阿Q戒烟史





递减的趋势：“今之吸鸦片者，京官不过十分之一二，外官不过十分之二三，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至长随吏胥，更不可计数。”某些官吏嗜烟如命，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清末神机营大臣桂祥，随西太后御驾西逃时，因事出仓猝，竟忘了携带随身的“宝贝”，途中烟瘾发作，竟至昏迷瘫痪，差点“为国捐躯”了。



禁烟令下愁眉苦脸的上海烟馆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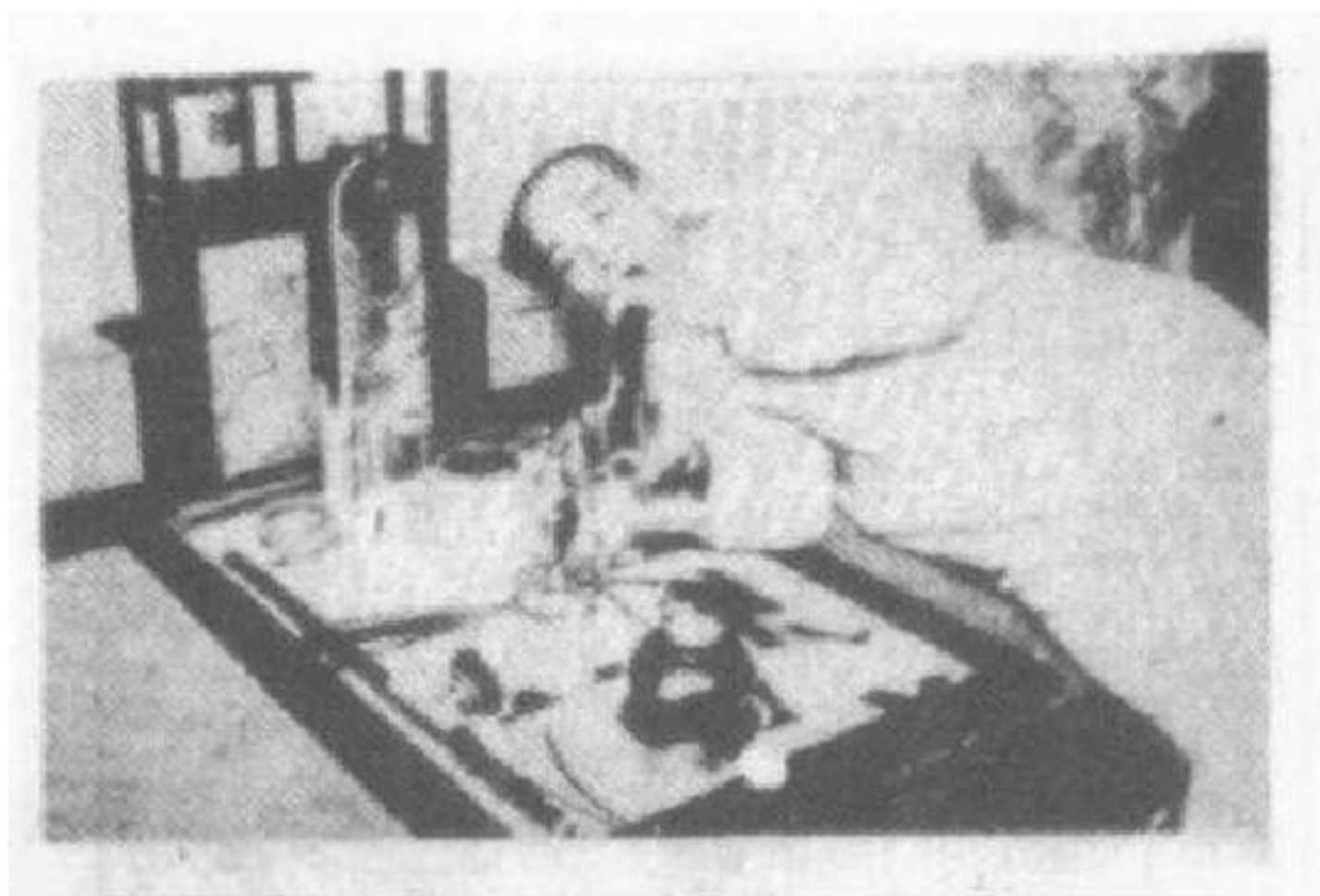




鸦片又堪称是近代各系军阀的“通灵宝”和“摇钱树”。久负盛名的“川军”财力雄厚，而其财政来源，主要就得益于这鸦片的种植与走私。据说当年四川军阀所产所售的鸦片占了总数的十之八九。国民党川军某军甚至公开宣称鸦片为“本军的经济命脉”。而四川省主席刘湘除拥有海、陆、空三军外，还有一支特殊的军旅——“烟军”，堪称“军种齐全”、“军烟合一”。抗战前，四川军阀因国民党之“禁烟令”已不敢从事鸦片生意，而刘身为四川省主席、绥靖主任又兼禁烟督办，只给重庆国民党行营“打个招呼”，动用两艘军舰运了7000担烟土到宜昌、汉口等地出售，获利自然是大大的了。

抽鸦片之始，犹如今人之抽香烟，最初本是休闲的节目，甚至少量的鸦片，不仅可以提神醒脑，还可发挥治病之效。然而，一旦吸食成瘾，到了须臾不可无此君的地步，便不能自拔，轻则眼垂泪、鼻出涕、打呵欠、淌口水，重则瘫软如泥，面黄肌瘦，萎靡不振，一息奄奄，以至骨立形销，破家败业，直至变成“废物”一个，神仙的日子也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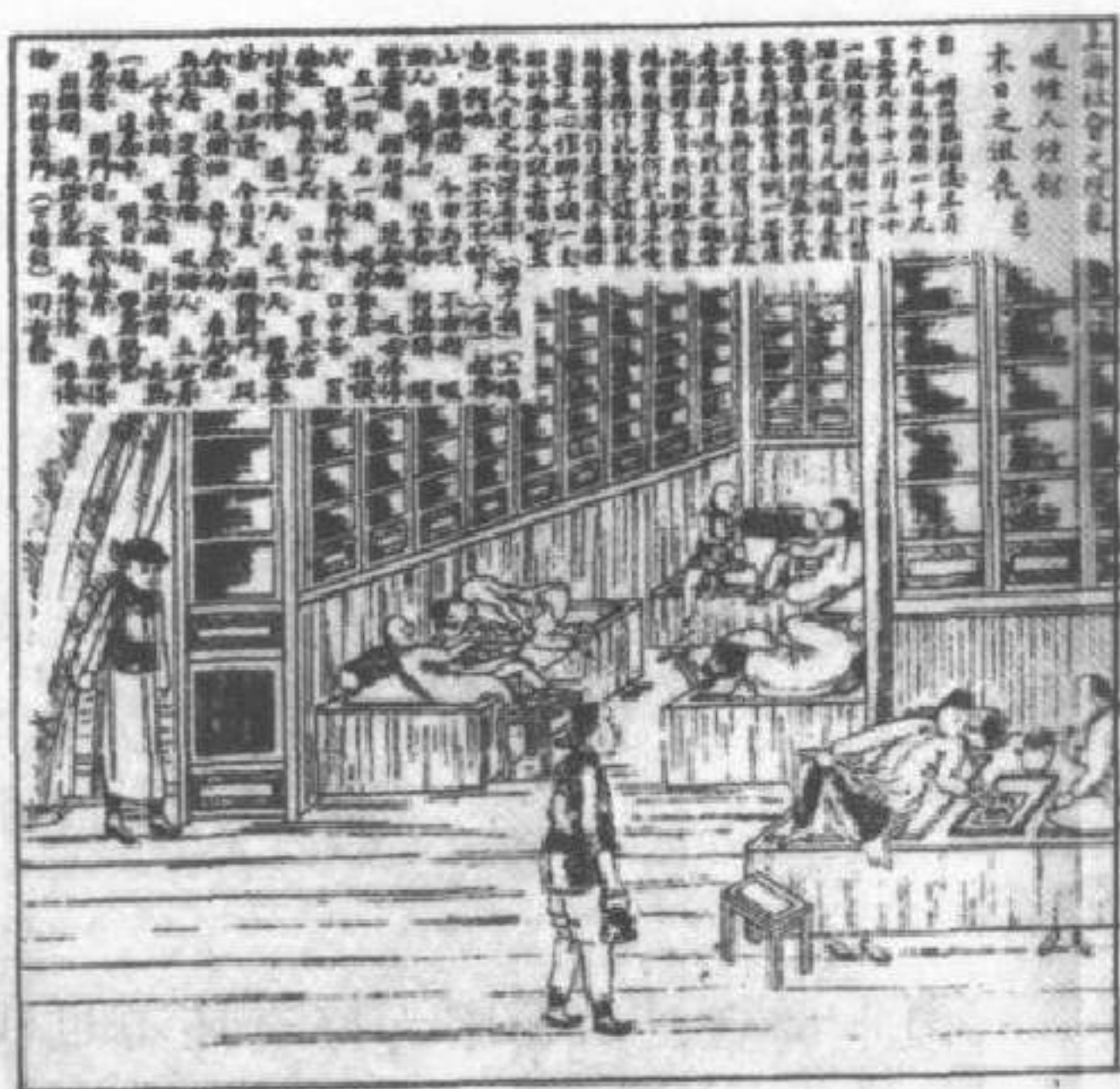


夜半烟枪忽发声，呜呜疑是鬼哀鸣

了头。一般上瘾者，初始因为好奇还不过浅尝辄止，抽两筒解闷，作为一种消遣。但鸦片恶习一经沾染，便欲罢不能，毒瘾成形了。

“十室之中必有烟馆，十人之中必有烟民。”旧时中国各地烟馆林立，且不提北方的大土炕，其他烟馆大都是设施豪华、光怪陆离的“雅舍”。烟土商人和烟贩子为利益所驱，大行贩卖之道，在烟馆的经营及毒品的制售上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又助长了吸食大烟之风的肆虐。

鸦片价重质微，易于隐匿，已具有货币代替品的特征，因此近代社会中以鸦片代银，



大烟客之乐：不愿皇帝招驸马，一口烟子一口茶。

或直接以鸦片易物的原始交换方式大量存在。而且，行旅之途，夹带些鸦片大可以躲避谋财害命者的注意，因而很受大家的欢迎，甚至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些鸦片以支付路途上的“食宿所需”。

在旧中国，吸毒之风，遍及民间。在一些追求时尚和奢华的富家子弟心目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抽大烟最为风行的四川省，吸食大烟乃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没有大



收鴉片烟灰竟也成一行当。

烟癮的门户，家中也要预备些大烟以备待客之用。如果客人来了不摆烟灯，便被认为礼数不周，待客之意不恭也。



磷磷荧火照面青，手瘫脚软态怜仃。

一、鸦片流入中国和上海受害情况

1942年的《五口通商条约》及其附件规定，凡是进口鸦片，均须交税（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后由于对鸦片烟禁令不再，且从未有明确税率，鸦片便以“无税物”之名，大批涌入我国。国内贩卖、吸食的人，更是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其危害之大，遍及全国。当时大户人家子弟论婚，媒人先问：“新郎官能吸几两大土？”因为当时守财奴的想法，不让子弟出外惹事生非，就以鸦片来麻醉，使



天津吸毒者陈尸旷野

其守住家业，所以子孙吸毒越多，就表示其家私越大。

太平军起义后，清政府军事开销剧增，便在东南各省试行厘金制。每箱大土交银 24 两，其中 20 作为军饷，4 两作为办公用费。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清政府派人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在上海议定《通商税则善后条例》，开始订入鸦片税则专条，规定每 100 斤鸦片交纳进口税 30 两，但一经转手，成为中国货物之后，便由中国政府随时随地加抽厘金，外国不得干涉。当时上海进口鸦片除



鸦片烟馆：那高挂的烟枪，与真枪何异？

掉由海关向洋商征收正税 30 两外，另外又由厘局向华商征税 30 两。实行不久，即弊端丛生。总税务司赫德上书，大意为：收税越重，



偷税越多。今年鸦片进口 7 万箱左右，可是被稽交税的只有 6 万箱。又说：“加税太多，就会有走私偷漏的毛病。现在有两个办法。一、进口时每一百斤一次缴税六十两。在各省通行时不得再征收。二、洋商收税三十两，华商收税十五两，准它在本府管辖境内不再另外收税。”赫德的建议其实是包藏祸心，他减税只是为了便利毒物的流通。然而“收税越重，偷税越多”确实是历来办税务人的至理名言。后来清政府自动改订厘金，各省辗转一律收税 86 两。但厘金制度并不一律，有一人承包的，有用打折扣以招揽买主的，政府厘金制度一变而为向商人自由抽税。光绪十一年（公元 1885 年），光绪谕中有“厘捐本应该比洋税更重，可是总计所收的厘金，却远远不及进口税”等语。光绪 30 年（公元 1887 年），依照烟台条约续订专约，改为厘税合征，每 100 斤共缴 110 两，从此海关的税收大大增加，而向华商自由抽税的权利，却随着被剥夺殆尽。

上海被称为南埠之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鸦片进口的大本营。而上海会说英语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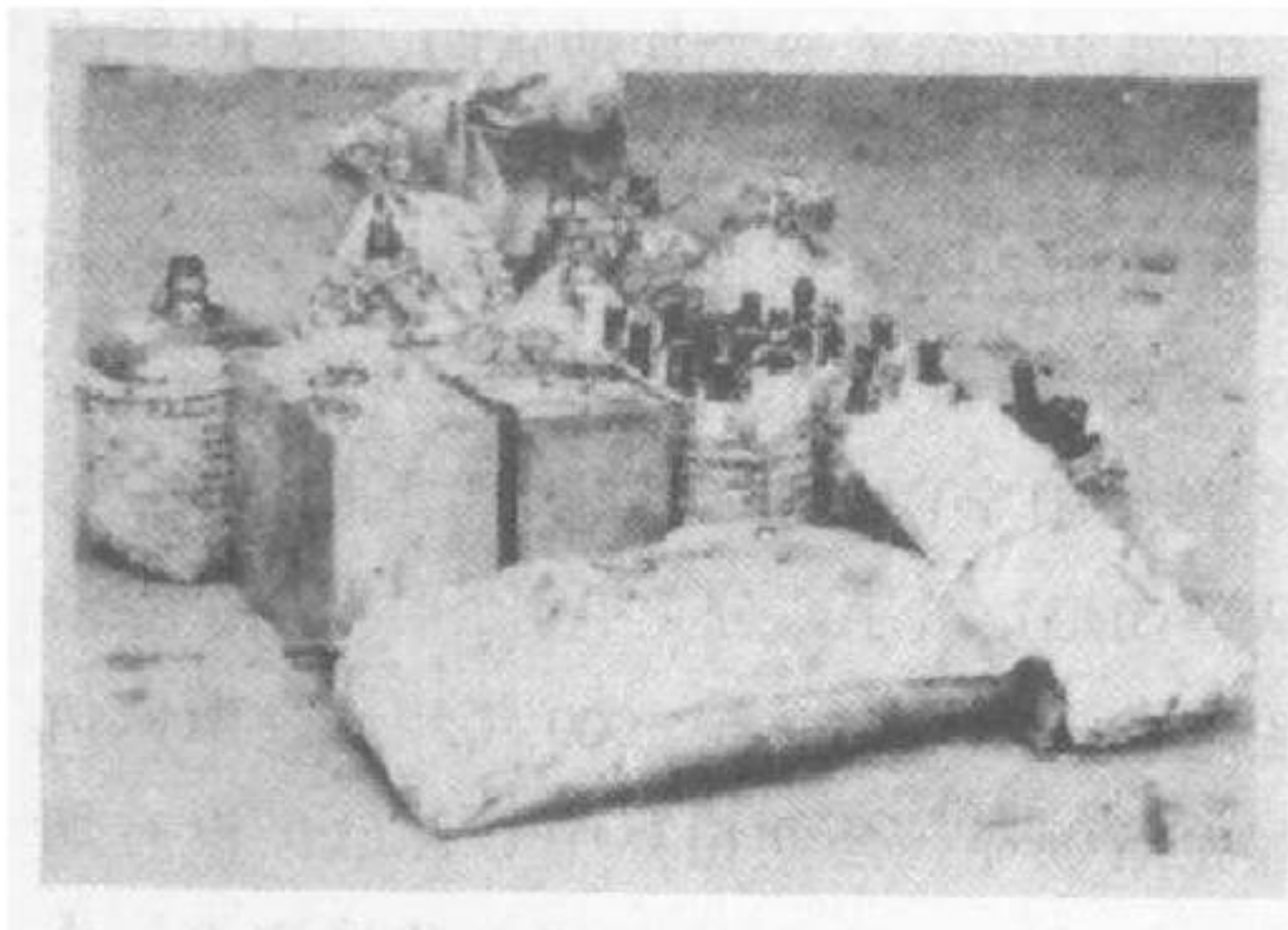
日伪时期的“安东区鸦片专卖署”，专事鸦片交易，毒害中国人民之勾当。

国人极少。虽然有些人能说几句，但说的是语法不通的洋泾浜英语。当时有一潮州人郭某擅长英语，得到了洋人的信任，就专门代洋商出卖鸦片，由于他经手的生意一天天兴旺起来，于是他开设了鸿泰土栈于后马路（今宁波路），这就是上海有土行的开始。郭某的亲戚听到郭某生意兴隆，便都集中到上海来做贩土生意，由是形成了上海土行以潮州帮为权威，数十年如一日。其后郑洽记开设后，更成为这一派中的巨头。但一般上瘾的人，却都认为郭鸿泰为老牌，一定货真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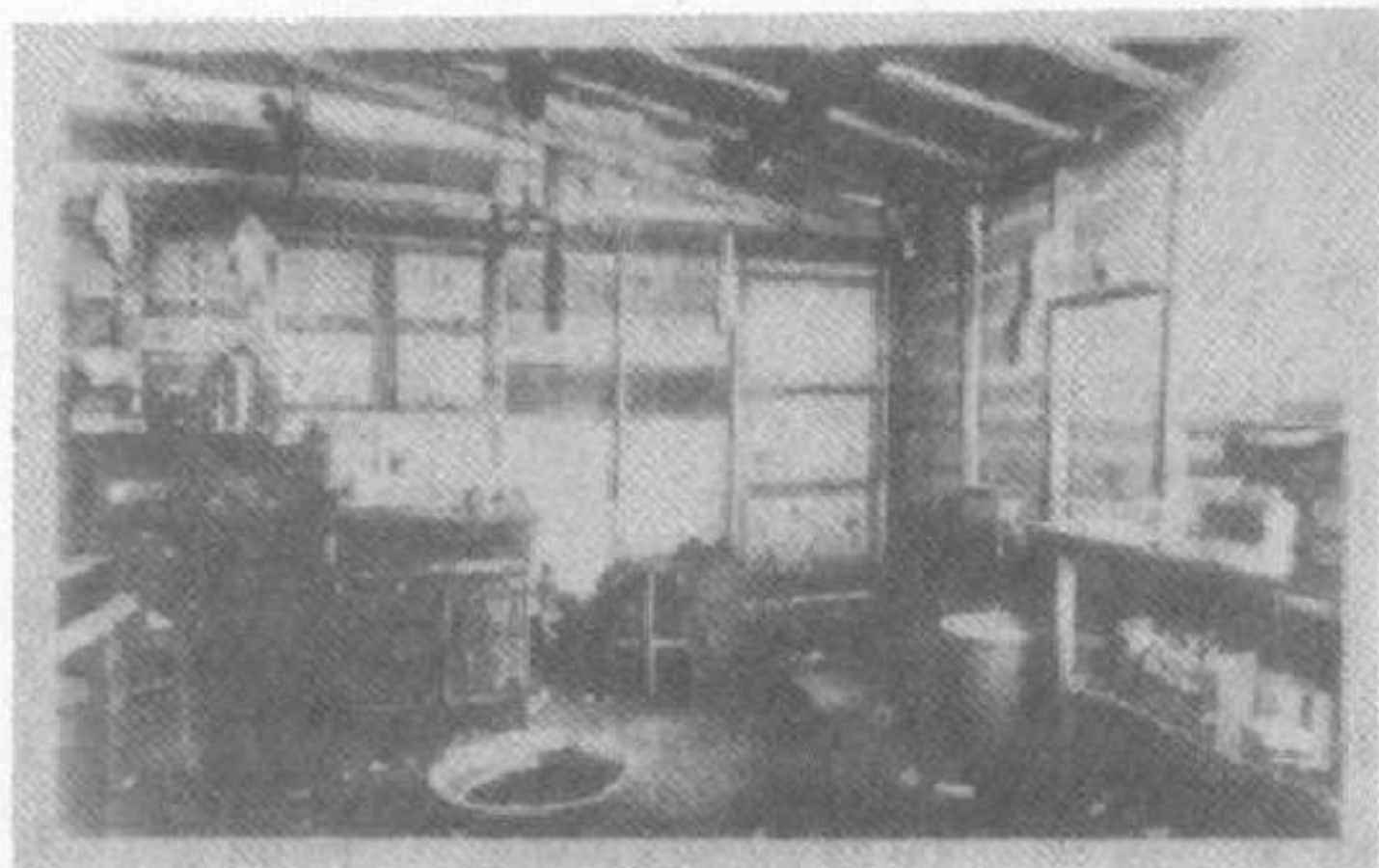
实。

土栈之后继之而起的是烟馆。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南诚信、眠云阁、阆苑第一楼等，无不规模宏大、设备华丽。一到里面，到处可以看到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都是辉煌耀目，精美绝伦；吸鸦片的人横陈榻上，挥袖成云、喷口成雾，流娼、烟妓辗转往来，互相调笑，去的人沉缅其中，流连忘返，精神萎靡，不能自拔。这个毒物，不知消磨了多少人的身体和意志，从此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

993



被破获的制毒原料



被破获的制毒工场

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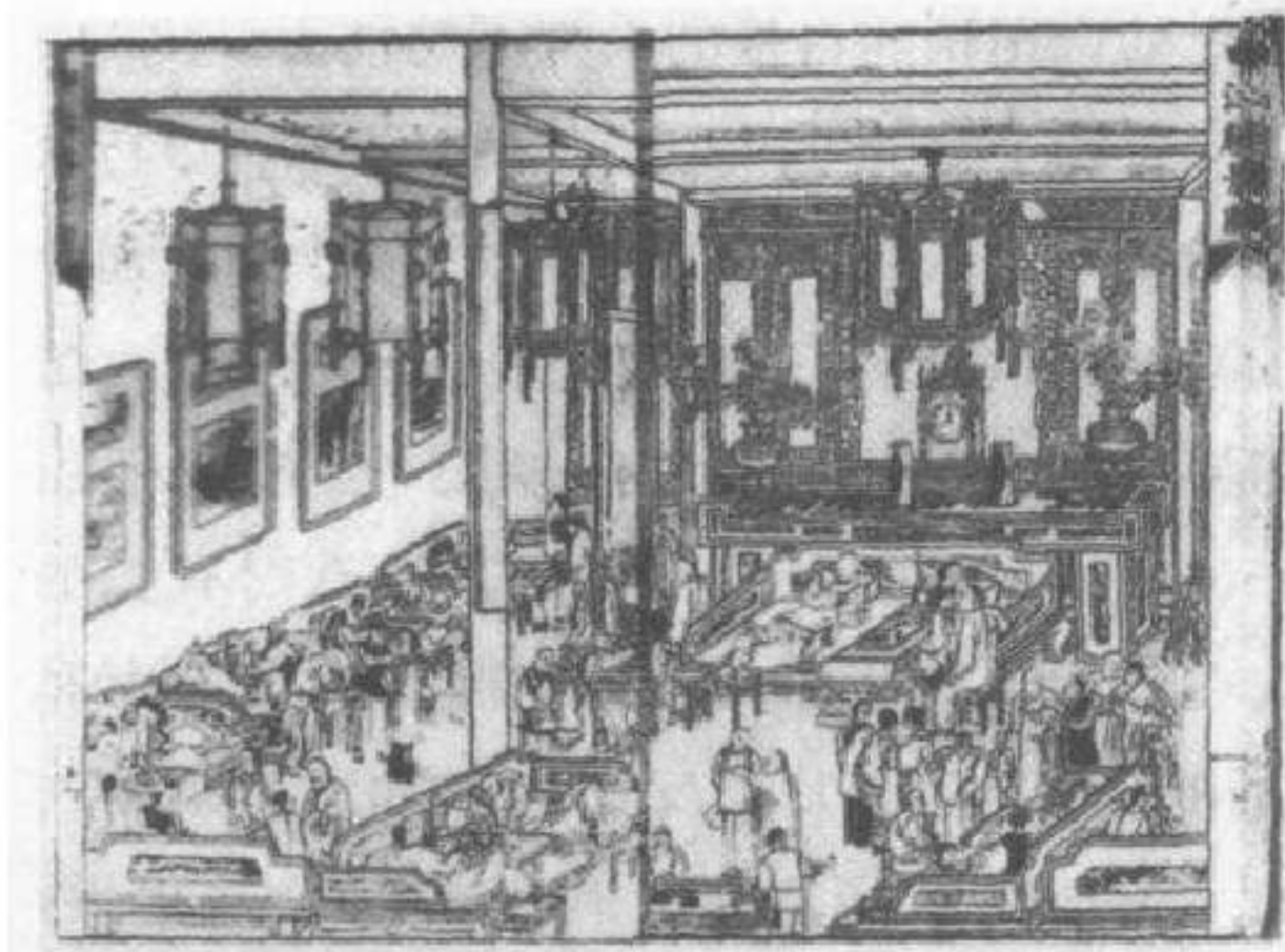
光绪 24 年（公元 1898 年）戊戌政变之后，中英曾缔结了一个禁烟条约，限 10 年内禁绝鸦片。光绪 26 年（公元 1900 年）庚子事变后，禁烟条约成为具文。光绪 33 年（公元 1907 年），重新又订了个 10 年禁绝的条约，租界当局阳奉阴违，仅在表面上敷衍了事，先从停闭烟馆着手，分 2 年 4 个时期用抽签的办法逐期闭歇烟馆。至 1909 年年底，南诚信等都先后歇业，公共租界中号称已经没有烟馆，但四马路上的青莲阁却以茶楼姿态，作变相烟花寨，明目张胆地开灯营业招揽吸客。民国初年，烟馆仍旧存在，它是妓女流氓麋



集之处，稍稍能自爱的人都不愿前去。民国4年（公元1915年），又订出正本清源、厉行禁绝的条约，这类烟馆，也分2年4个月，逼令抽签停闭，同时不许另外再开土行。这时法租界也跟着用抽签法停闭烟馆、土行。但由于江、浙军阀的指使，以及其他有财有势的人在幕后支持，各大旅馆、赌场和燕子窠私自出卖与吸食鸦片，反而变本加厉，猖獗一时。菜市街两旁弄堂，利用前门公共租界，后门法租界的地理条件，开设的烟馆多如蜂巢，附近的宝裕里、宝兴里等成为不夜之“城”。各种喊卖宵夜食品的小贩，多如牛毛，妓女、小偷等则以这里为温柔乡、分赃寨。到那里去的人往往会弄得倾家荡产，这种祸祟一直延续到1937年“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抱着毒化上海的恶毒用心，烟铺便和南市的赌场一起泛滥成灾，弄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八·一三”以前，云、贵、川出产汉口转运来的烟土垄断了整个上海市场。这时以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为首的浙江派军阀控制了整个上海。而潘国纲、周凤岐等军阀都在卖烟土，无一例外。俞叶封为缉私统领，实际





民国上海著名烟馆南诚信正厅

996

上是沪杭间贩运烟土的首要，张啸林是联系浙江方面贩土事宜的主持人，两人互相勾结。“八·一三”炮火弥漫上海时，上海差不多没有烟土可买。得瘾的人急于购求，于是黑市猛涨，张、俞二人在暗中操纵，获取了大宗暴利。到国民党军队西撤后，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与日人松井勾结，全力以赴想抢得这个利益。这时传说张啸林作伪浙江省政府主席，不久又遭到了暗杀；俞叶封也在更新舞台包厢中被人用机关枪袭击，票



友吴老圃伏在俞叶封身上掩护，做了替死之鬼，而俞得以保全生命。当时敌伪内部发生了变化，日本忽然派楠本来代替松井。楠本一到上海即厉行毒化政策，设立了一个“宏济善堂”，推行所谓“善堂卖土”的政策。表面上这是一个慈善机关，声称将用贩卖毒物的盈余来救济灾民，骨子里却是将民脂民膏搜括去，变成军火再用来残杀我国人民罢了。主办此事的人名叫“盛老三”。伪维新政府看到这样一个“油水足”的毒化事业被宏济善堂独占，没法插手进去，便几次向楠本要求分沾利益。楠本答复说：“这是商人机关，军部无权干涉。”1943年左右，盛老三被日本宪兵部逮捕，宏济善堂关门以后，伪政府才将鸦片公卖营业权夺回，由伪内政部长梅思平接收，并组织了一个禁烟局，登记烟民，每一份执照收费150元（后加至600元），一时登记的人甚多，本来不吸烟的也趁此机会去登记领照，作为候补烟民。于是隶属特业公会的土行，霎时增加到大同行52家、小同行200余家。曹家渡、静安寺路、九亩地、南阳桥、闸北、沪南，没一处不是烟馆、赌场林





立。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伪内政部长梅思平等，没一个不自领土行执照，大做其老板的。然而“水镜不常，冰山难靠”，霹雳一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形势突变。此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说严禁烟毒，但采取的是所谓“寓禁于征”的办法，在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下，烟毒继续泛滥，根本谈不上“禁绝”二字。一直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高度觉悟下，才真正把那害人匪浅的鸦片彻底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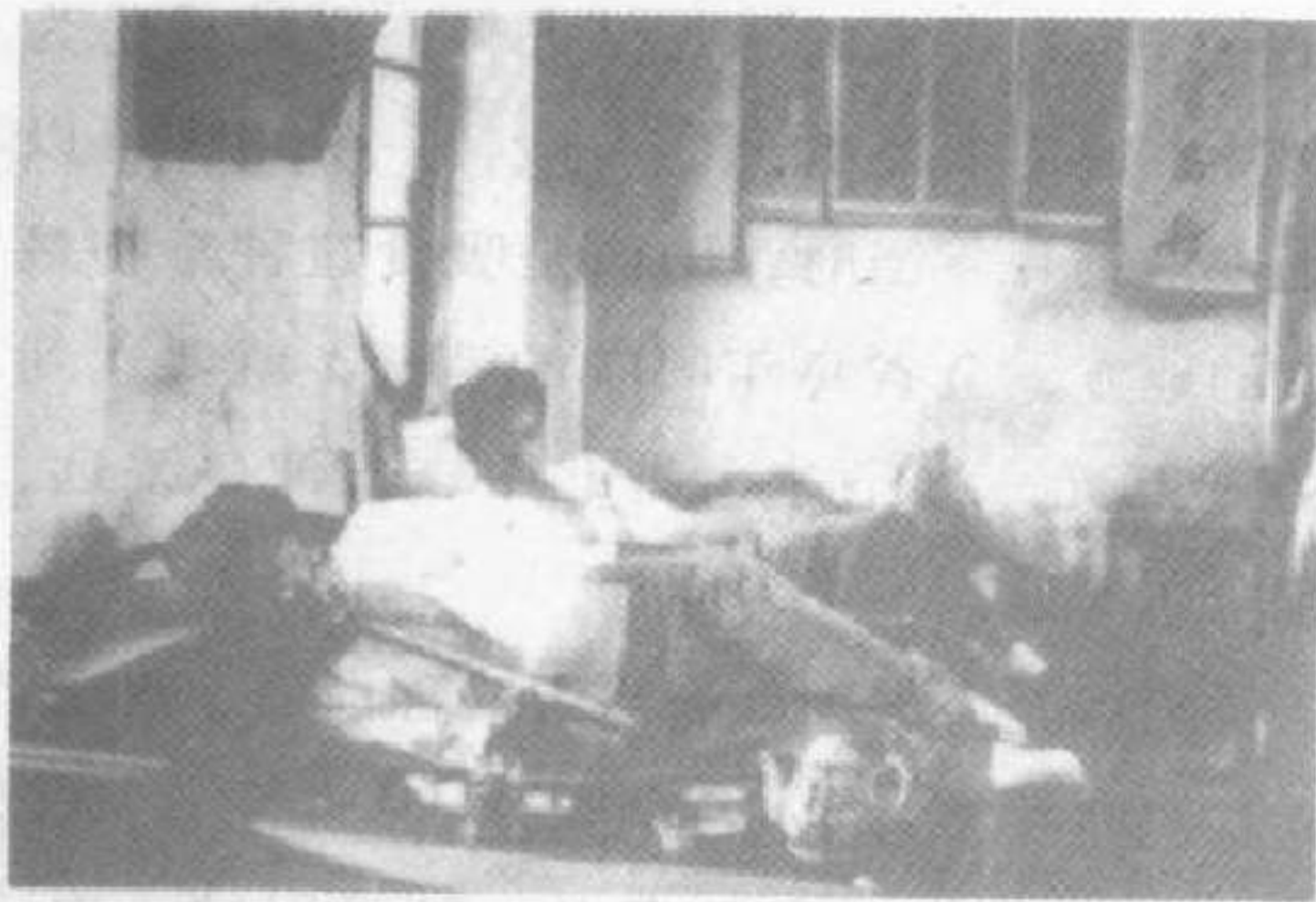
上述情况是由当时的一个贩毒者杨顺铨提供的。杨顺铨贩毒，除了依靠流氓恶势力以外，还有地方军人作后台。有一天我到 he 家里（他住在旧民国路民国里），无意中碰见了当时伪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和杨正在密谈，我就走了出来。后来知道，杨是依靠熊的支持，从事贩卖鸦片的。杨是黄金荣的换帖弟兄，在小东门等处还摆赌台，专做祸害人民的坏事。

二、民国泛滥的吸毒与贩毒

近代中国面临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就



包括毒品的吸食与买卖。尽管当时不乏仁人志士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并作出了一些成绩，然而由于当局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步骤和措施，他们的努力大多流于徒劳了。进入民国以后，由于中央、地方当局对于毒品都采取了更为放任的态度，致使毒品成为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项社会公害。



民国时期的某大烟馆

在民国的流行全国各地的诸多毒品种类中，最主要的是鸦片烟。鸦片烟系由罂粟果实中的白色乳汁焙制而成。按其产地区分，有印度土、波斯土、土耳其土、中国土等几



大类。在中国毒品市场上唱主角的，主要是印度土。印度土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质地较软，质量上乘，每两价格要达到3、4元，是供贵族、官僚吸用的上品。小土质地较大土为硬，质量稍次，价格最高时为每两2元。

接下来是吗啡。吗啡是由生鸦片制成的更纯、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成份为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一般，一份吗啡可以抵十份鸦片。当时，山西是吸食这种毒物最盛的地方，全省每年吗啡的消耗，就要达到6000万元。接下来，是北平、天津、绥远、察哈尔等地。

再就是海洛因。海洛因又称白面、料子，是从吗啡中提取合成的毒品，其毒性尤甚于吗啡。即使是初次吸毒者，只要用过一次，就难以戒掉了。它于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盛行。

除此以外，当时各地的毒品中，尚有红珠子、白珠子、红丸等名目。它们与吗啡、海洛因等，只有名称上的差别，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民国时期，中国有一支数量十分可观的瘾君子队伍。他们的人数之多，成份之复杂，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当时最负盛名的产烟大省和烟民聚居地是四川。据统计，在鸦片生产的全盛时期，四川全省烟土的年产量要达到数亿两之巨。其中，除 1/3 由烟商、军队贩运出川外，2/3 由本省瘾民消费。

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叫吴学礼的律师，不仅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父母，都吸鸦片。与他同住一院的小学校长刘锡安见此情形，诗兴大发，口占两首打油诗以为实录：“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实际上，像吴学礼一家五口人人都抽大烟的，在四川并不罕见，因而当时就有人统计，四川全省的瘾民约占其总人口的 1/19，也就是说，瘾民人数要超过 300 万。

作为全国鸦片贸易的中心的上海，吸毒人数也相当多。尽管当局一而再、再而三表示禁烟，但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到 1948 年，





上海全市平均每 80 户就有 1 户吸毒，吸毒总人数在 10 万人以上。

民国时的烟民，来自于不同的阶层。而最为可笑的是，当时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中，有不少是吸毒成瘾的烟鬼。

曾任四川省理番县县长的徐剑秋就是个典型的烟枪政客。为了省却很多麻烦，他的衙门内就摆着很多灯盘，供自己在衙署内烧烟过瘾。由于他整日一榻横陈，甚至连公文也要送到他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在刘绍绪长县时，县府共有 12 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县府的 15 名职员中，有 11 人是瘾客。

曾任国民政府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事务的杨永泰，家中也是烟灯长燃，烟雾长绕。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烟榻上边吸边对人说：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





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加思想滞涩，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放，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这位方面大员、禁烟主管，不仅在吸食鸦片方面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以烟有害也有利为幌子，着力渲染一榻横陈的乐趣，难怪当时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趋之若鹜了。

有钱有势者是民国的毒品吸食者中的一支主要力量。1931年，杜月笙为庆贺其在高桥所造的杜氏宗祠落成，曾邀请全国各地有身份的人物前去捧场。为了招待好这些贵宾，在举行落成典礼的前几天，杜月笙就关照专门为他装烟的郁咏馥多预备些鸦片烟。郁受命后，预先准备好了5000两烟土，并从各赌场里调去了28人专门帮他熬烟灯泡。到了杜氏宗祠开祠之日，郁调10个人专门去侍候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而派其他18个人侍候各处去的贵宾。尽管郁咏馥他们早就作了准备，但在举行落成典礼的三天时间里，他们还是忙得不可开交，连一顿安宁的饭都没有





吃到。结果，三天下来，参加杜祠落成的所有来宾共用去了 8000 两鸦片烟膏。

黑社会分子在有钱有势者中身份独特，他们在对毒品嗜好和吸毒品讲究程度方面亦要远远超过一般的有钱人。

袁世凯的次子、青帮大字辈袁寒云，烟瘾极重，即使会客也要在烟室进行。当客人入室之时，他从不起身，而在烟榻上一面拍烟，一面点头打招呼。青帮大亨杜月笙，自浪迹十六铺至生命终结的数十年间，一直以阿芙蓉为伍。为了表示他的体面，自 1927 年起，杜月笙专门请烧鸦片、装鸦片很有功夫的郁咏馥为自己装烟。郁咏馥原在十六铺摆水果摊，也是有名的白相人。他满身刺花，广收门徒，曾任新城隍庙总稽查、上海纱布交易所总稽查等。在被杜召到杜公馆后，便很尽心卖力地为杜服务。此人手下，尚有两个仆役，帮他烧鸦片膏。杜月笙请人专为自己装烟烧泡，在当时恐非个别。但像他这样吃烟要有专人服侍的，人数就不多了。

大亨们在吸毒时是有许多讲究的。如同杜月笙在吸烟时需要周到的服侍一样，黄





金荣、范高头则十分讲究烟土、烟具。黄金荣所吸之土必须为陈年老货，而且要配以沉香、珍珠粉。他用的名贵烟枪上镶着珍珠宝石和黄金白银。范高头的烟具，无论烟签、烟匣、烟灯，都以黄金制成，以示其不同寻常。

当时，一些有财势的人，为了不让子女滑入嫖、赌的“邪路”，常怂恿他们继承父业，模仿自己吸毒。在四川，一些地主资本家不怕子弟吸鸦片，而怕他们外出嫖赌。他们认为，嫖会把身体糟蹋，赌会把家财输光，吸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像他们那样的大户人家，不会因吸鸦片而变穷。他们权衡利弊，觉得嫖、赌、吸鸦片，还是后者害处最小，于是便选择后者作为“培养”子弟的方向。

胡敬六是重庆的一个有名的地主。他家住绣壁街 550 号，每年可收入 7000 担租子，他仅有胡静云一个儿子，因而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为了使儿子呆在家里，他不仅怂恿其子吸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他吸鸦片。胡敬六以为，独子染上了烟瘾，就不





会出去嫖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然而，无论别人怎样怂恿，如何引诱，胡静云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很不高兴，责备胡静云是不肖之子。

民国的吸毒者多是富人，但穷人中的瘾君子也为数众多。与富人把吸毒当作消遣解闷的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方式，当作显示身份的途径等完全不同，穷人往往是为生活所迫而吸食鸦片的。

在上海，黄包车夫、小商贩是瘾民中地位最低的一种人。他们整日奔波，终年得不到休息，便只能靠吸一点劣质的毒品暂时缓解一点疲劳，振作一下精神。长此以往，他们便不可一日无毒品了。

除此以外，民国时的毒品吸食者中，还包括有军队的士兵和学校的学生。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下，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打仗用的钢枪，一支是吸食鸦片的烟枪。平时，他们两枪同时使用，尚有些战斗力；若遇阴雨，烟枪点不着火，士兵过不了烟瘾，他们就只有吃败仗的份了。

士兵吸食鸦片影响战斗力的问题，不仅





困扰着阎锡山，也使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蒋虽从兵役署长程泽润身上开刀以儆效尤，然收效甚微。

而学生中吸食毒品的也为数甚众。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便有此疾，一次，湖北省教育厅的一个向姓视学来此地视察。这个县城，烟民甚多，以至于在上午9点过后，依然一片寂静，仿佛一座死城。当视学来到县城里最大的一所中学之时，发现学校里吸毒的情形并不比社会上好。尽管有省里来的人视察，这所学校的学生、教师依然到9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而且呵欠连天，个个面露倦容。学员宿舍里的床铺，虽然为应付检查铺上了白色的新被单，然而原有被单上的焦洞和藏匿在床下的烟盘都显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瘾君子。学校师生变成了烟民，学堂变成了烟馆，这真可说是民国社会的一大怪状了。

近代以降，自由、人权的呼声，使得不少妇女不再甘心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要求自立了。妇女要求解放的热诚，有时也会走火入魔，把她们引向歧途。一些妇女加入吸





毒者的行列中，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在上海菜市街自来火街附近的一个代人戳药水的地方，时常可以见到一位衣着华丽、身披狐裘斗篷的摩登少妇，同别的吸毒者一样坐在长凳上等待打针。一些不明真相的吸毒朋友纳闷：像她这样的太太，尽可在府上吸烟享福，何必要来排队打针呢？就不免要开口探问。少妇也不回避，直截了当地说，戳上了药水，即使吸食大土清膏，也不能过瘾了。所以要远道而来打上一针，以求畅快。

黄金荣养子黄源焘之妻，也是个女瘾民。她时常在南市一家烟馆吸食白面过瘾。尽管她在外的吸烟之举为黄金荣察觉后十分恼火，一怒之下把她逐出了黄宅，但她依然故我，仍以吞云吐雾度日。

烟馆是当时专供瘾君子吸食鸦片的地方。在四川，上自省城，下至乡镇，乃至穷乡僻壤之地，都有烟馆。异乡客地的人到四川，要找饭馆、旅馆有一定的难度，然而找烟馆却相当容易。因而曾在川军 21 军中主持过禁烟事务的王锡圭曾以“十室之邑，必有烟馆”的文字来描写四川烟馆林立、烟灾泛滥的情





况。

天津的烟馆大多集中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人口稠密，烟膏生意十分兴隆。该处的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高，一般烟民只能望馆兴叹。中等烟馆为社会中下层开放，烟价要比上等烟馆便宜一半以上，其质量当然要差些。

烟馆在禁烟时期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往往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给瘾君子们以种种暗示。当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都是烟馆。其招牌中所暗用的标志，个中之人一望可知。其时烟馆所用的招牌主要有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朗林、广福和、三溢公司、长泰、双狮牌记、双鹰牌记等。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暗示瘾君子们，此处正是他们的逍遥之处。

民国时期，各地不仅有专营的烟馆，而且有其他行业兼做烟土生意的。在四川，附设烟馆、出售烟土的不仅有旅馆、浴室、妓





院，还有内河航运的轮船，甚至连峨嵋山上的和尚也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做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的生意。如此的烟土经营，真可说是见缝插针了。

燕子窠是流行于某些地方的除烟馆之外的吸烟场所。燕子窠，实际应称售吸所。它是一种低级烟馆，开始盛行于辛亥革命后。20年代，当烟馆迫于社会上的禁烟舆论而不能公开存在之时，燕子窠这种私设的烟铺更是急剧地发展起来。燕子窠初兴之时，烟铺只备烟枪，烟膏需由吸食者自备。到后来凡私设烟馆均称燕子窠之时，烟铺里，不仅有卧榻灯枪，且准备了各类烟土供人随意吸食了。

笼头水店大概要算民国时最低级的吸烟场所了。所谓笼头水，实是以熬过烟膏而剩余下来的渣屑泡制而成的低劣毒品。这种毒品，售价低廉，花五六块铜元，就可吃到一碗，因而光顾这种店铺的，都是黄包车夫、小商贩等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

一些有条件的人除了去烟馆过瘾之外，还在家里吞云吐雾，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杜





月笙的烟瘾很大，因而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供自己吸食鸦片。他的吸烟间，对外称帐房，一般人不能涉足，只有极熟的朋友和门徒才能进去。每天起床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他的“帐房”里，去享受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烟。在过足烟瘾，打起精神后，他才开始处理其他事务。

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当然是不可能具备杜月笙这样的吸烟条件的。但是，他们吸食鸦片，也并不是非到烟馆去不可。在有些地区，即使自己不吸毒，也要在家里准备些吗啡之类的东西，以便有客人到来时，用此招待客人。

民国时期毒品的泛滥，庞大的烟民队伍的存在及他们对毒品的嗜好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当时的各种贩毒力量在这个问题上的推波助澜。

烟帮是民国时的各种贩毒力量中一支专门以贩毒营生的人马。当时，活跃于广东、广西的烟帮就有以陆炎为首的，以刘宇臣为头子的，唯陆荣廷马首是瞻的。烟帮头子陆荣廷，与军阀陆荣廷同名同姓，而且在绿林





里的辈份要比后者大，因而牌子最硬，什么关节他都打得通。他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为图方便，他索性在每一个站头都讨一个老婆、成一个家。每次贩运毒品，他等于出入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场所稍有不同而已。

烟帮贩运烟土，是一个集体行动，因而人数较多，有时要多达 1000 人以上。同时，其贩毒的数量也很可观。据黄绍竑介绍，据他所知，有一个烟帮，一次贩运烟土就达到 50 多万两。

除活跃在各地的烟帮外，参与民国时期毒品买卖的，还有帮会、军队，乃至地方政府。一般，它们是各自为政，采取单独行动的。当然，也不乏凑合起来，组成暂时的联合体，采取共同行动的。

作为中国沿海的重要城市，上海在 20 年代初，就已经成了中国主要的鸦片集散地和中转站了。因而光是鸦片烟土的收入就相当可观。然而，当时控制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并不满足现状。他除了加重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征收烟税外，还派人直接到印度去





采办烟土，而后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他的贩烟之举，果然为其“赚取”了巨额收入。据说，除去大部分用于购买军械外，其贩烟收入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几十万元进帐。难怪直系军阀齐燮元对此十分眼红，要不惜代价同卢永祥一争高低了。

三鑫公司于是于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鸦片烟土贩运集团。这个公司的主持者和台前人物都是帮会分子，然而给他们撑腰的却是法租界和淞沪护军使。它们在谋求贩卖毒品利益上的一致，使其相互勾结起来，干出比杀人越货更加恶毒的勾当。由于军阀政府、租界当局、黑社会三方面联手进行鸦片贩运，三鑫公司的利润巨大，每年要达到五六百万银元。

民国时不少外国人也参与在中国贩运鸦片的活动。一般而言，中国人贩卖鸦片的动机比较单纯，就是追求高额利润。然而，外国人就不同了。他们通过贩毒牟利还不是主要的，而以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最终实现对中国的统治才是其真正的所求。在这方面，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最能说明问题。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将鸦片供需事宜划为兴亚院（日对华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并专门指定蒙疆地区为一贯的鸦片生产供应地。1939年6月，日本授意伪蒙疆政权集中260名土商设立蒙疆土药公司，从事收购鸦片。之后，又命78名土商在10个地区建立蒙疆土业组合，采用间接方式统一管制鸦片。这样，从1939年至1942年间，共收进鸦片2283万两，售出鸦片1983万两。如果按人均年吸入量25至40两计算，这个销售量，可供50至80万人猛吸一年。这些毒品，由伪蒙疆政权收购进来后，即由日军运送到各地销售。其中最大的销售地是上海，占55.4%；北京次之，占20.2%。

三、专为毒品保险的“三鑫公司”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在横行不法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豢养的流氓恶霸以及相互混战的国内各省军阀的合力作用下，一个专营毒品保险的怪物——“三鑫公司”产生了。这在旧中国是首创。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就是威霸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





亨。但在这之前，上海已有一个“聚丰公司”。这是由当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和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木梁邀集沪地富商集资成立的公司，名义上为经营地产，实际却是从事鸦片的贩运，为了得到法租界的庇护，也给黄金荣算上一股。一年之间，黄就凭空分得巨额红利。这可说是“三鑫公司”的前身。

旧上海在猖獗的鸦片贩卖行为的同时“黑吃黑”的事件也经常出现时有发生。什么叫“黑吃黑”？黑，指的是鸦片烟土的黑色，鸦片烟就叫“黑货”。贩运的商人叫“黑帮”。那时广东、四川、福建、云南、贵州等省的鸦片商人，纷纷来沪开设烟土行，其中最大的有“郑洽记”、“郭沅茂”、“同昌”等，是专靠贩卖“黑货”起家的。但是贩运烟土的大本营却是英帝国主义，保障鸦片公开贩卖和售吸的有法租界巡捕房，其后台当然是法帝国主义。在租界特权统治区，黄、杜、张是称霸一方的大亨，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都能做到，而且手段通天，所以不仅能够对付这批贩毒的黑帮，还能从他们贩卖鸦片的生意上大捞油水，可说是专吃“黑帮”的





“黑帮”，所以叫做“黑吃黑”。在商人贩毒来沪，甚至在英帝国主义者自己运来“官土”时，经常发生大批烟土被盗窃的事件，查无下落，束手无策，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当时的上海，码头上流氓很多，其中有一伙叫范高头为首的叫“水老虫”的流氓，专以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大轮船装运大批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上海黄浦江是浅水滩，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船将轮船上的货物驳运到码头上，在轮船上的—箱箱鸦片装进小船再驳运到码头的这段过程中，常常发生小船翻船事件，使—箱箱鸦片都沉到黄浦江里去。这就使人奇怪，难道黄浦江里有大旋涡把小船卷沉吗？实际上是范高头为首的流氓钻在黄浦江里把一只只小船推翻，把沉在江里的一箱箱鸦片偷装到另外安排好的小船上运走。

除了“水老虫”之外，陆地上也有不少流氓做这种无本生意，他们把停放在码头上准备进仓库的整箱鸦片，也—箱箱偷走。这个有组织的结伙盗窃鸦片的流氓集团中，有“三十六股党”的头头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





生，杜月笙最早贩卖水果时拜陈为师)。当时著名的流氓有：张椿宝、单阿云、李德云、荣啸云（绰号跷脚阿云），虹口帮的浦宰元，江湾的“粢饭和尚”（真名不详），“闹天宫徐福生”（天后宫桥的流氓头）以及“铁臂膀陈掌福”等。其中有个徒弟范高头，绰号“橡皮老虎”，就是他把看守鸦片的印度巡捕在晚上摔到黄浦江里去的。第二天该巡捕的尸体浮在黄浦江上。后来破案，“橡皮老虎”被警察厅厅长徐国木梁下令枪毙在九亩地的（其实徐国木梁本人就是“聚丰公司”的股东，之后又是“三鑫公司”的后台之一）。

负责窝赃、销赃的贼窝是“三十六股党”的另一个头子马德宽负责。他手下养着不少徒弟，专门干收赃、窝赃的勾当，聚集的地点在浦东对岸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娘庙内。范高头等“水老虫”从水上和陆上码头偷来的鸦片，都在这里开箱收赃，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为了确保鸦片贩运的安全，从中获取暴利，黄、杜、张三大亨便筹划创办了“三鑫公司”。

可见大宗鸦片经常失窃事件的作案人究





根到底，上海之大小流氓是大宗鸦片失窃事件的原因。确切地说，“大八股党”和“小八股党”是该案真正的作祟者。这“大八股党”的成员有：黄金荣（老大）、王伯龄（老二）、杨啸天（老三）、张啸林（老四）、杜月笙（老五）、孙祥肤（老六）、陈希曾（老七）、陈群（最小）。这八个人结拜兄弟后，就代表着上海最大的恶势力，集当时军、警、特和帮会流氓的大成。他们收罗了青、洪帮会分子及捕房探目，干着贩卖毒品等罪恶勾当，还开设赌台、妓院、舞厅、茶馆、酒楼、戏院，以及银行、商店、工厂等等。他们表面上似乎在打扮和“繁荣”旧上海，实际上是黑社会的操纵者。

此外还有所有的“小八股党”。这“小八股党”都是“大八股党”的得力徒弟，计有：高鑫宝、马祥生、金廷荪、叶祝珊、顾嘉棠、杨红千、范梁百、范恒德等八人，他们各自收有不少徒弟，加上“大八股党”所收的徒弟，不下几万人之多。此外，黄金荣还有两个亲信，就是范回春和范开泰。范回春是嘉定银行经理，所娶的老婆也是女白相人，绰





号“金刚钻阿春”，其父在上海开设珠宝店，因此范回春也有绰号叫“象牙回春”。范开泰是开设乌木行的，绰号“乌木开泰”，其妻也是女白相人，绰号“强盗锦绣”。她和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结拜姊妹，为人泼辣，连黄金荣见她也会退让三分。所以黄金荣和范回春、范开泰关系密切，有事共同商量，对于怎样解决鸦片案件问题时，当时有黄、杜、张三大亨外，还有范氏兄弟两人共同商量。范回春提出开办一个公司，像保险公司那样，专收鸦片保险费，凡是中外鸦片商人把他们贩运的鸦片向公司上交保险费后，由公司发给保险凭证，加盖公司印戳为记，如发生被窃即由公司赔偿。每箱鸦片抽 10% 的保险费，作为公司收入，开支大小流氓及其他有关人员。这样一来，原来的无业流氓成了拿月规钿的职业流氓。提起公司取名时，杜月笙是摸人心意的老手，他明知黄金荣爱财如命，连名字也叫“金荣”，开的戏院叫“黄金大戏院”，于是就提出名为“三鑫公司”。当时黄、张、范等听了一致说好。黄金荣提出让杜月笙担任公司经理，负责掌握水陆码头、大小





流氓组织；张啸林、范回春担任副经理，张负责对付外地的流氓组织，范回春负责经济收支；法捕房方面均由黄金荣自己去安排应付。黄将筹组“三鑫公司”情况及怎样解决、平息鸦片盗窃问题，向法捕房总巡费沃利等负责人汇报后，得到同意，捕房派出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送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就由黄负责从所收的毒品保险费中提取。开始时，法捕房在名义上派出 500 名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法捕房头头在吃空额，并不足 500 百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水涨船高，法捕房收入也越多，从每月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鸦片保险费是出在贩卖鸦片的“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商人身上。这些鸦片商人付出了保险费、接着就在出售烟土的价格上加码，付出一成保险费，售出鸦片能涨价 15%，同样是水涨船高，倒霉的当然是吸毒者。

“三鑫公司”成立运营之后，鸦片经常失





窃的情况得到了控制。当时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还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为害更烈。但是公司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多。并且以后还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于是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英、法租界的烟馆联成一片，在大多数里弄内设有烟馆（又称“燕子窠”）。“三鑫公司”代替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费几角到一元，后又涨价，当时大烟馆有几十支烟枪，小烟馆也有十几支烟枪，各处烟馆大都是以多报少。“三鑫公司”又用上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鸦片保险费和烟枪捐外，接着又开办起一个上海最大的赌台，地址在旧福煦路 181 号（过去是中德医院旧址）。这个地方原来是“三鑫公司”的俱乐部。

除获得可观的鸦片保险费之外，黄、杜、张三大亨又开设赌场，大发横财。而从中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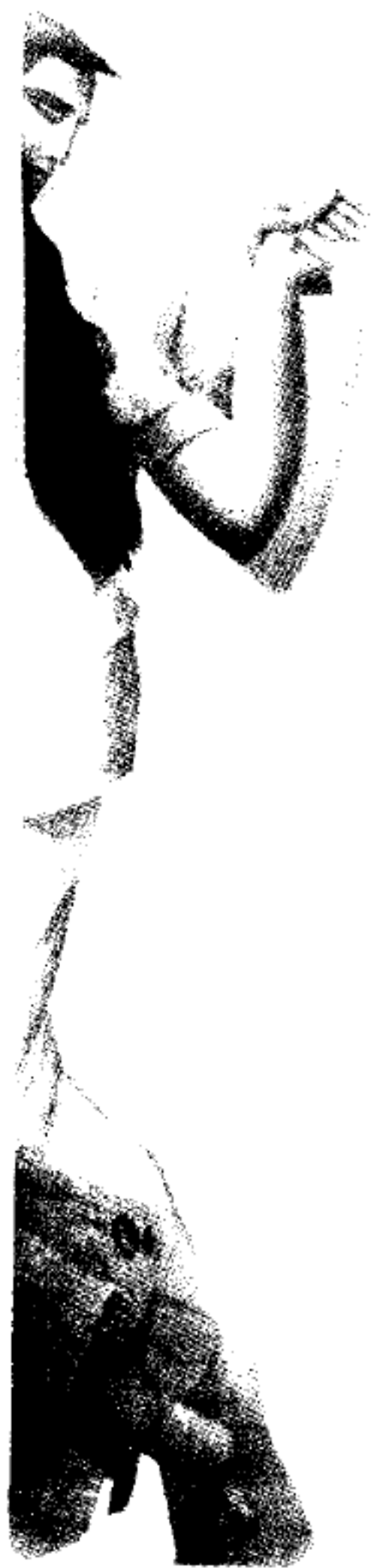
益最多的则是杜月笙。他办起“三鑫公司”当了经理后，就把烟赌两项大权完全控制在手。当时法租界有 10 家大的鸦片商行，自黄金荣那次“跌霸”退居后台后，就由杜来控制。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出一大笔钱“孝敬”他以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他就召集这 10 家老板，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自然照办，不敢讨价还价。法租界的 10 大烟行，大多是潮州帮。除此以外，还有设在法租界以外的 10 家大烟行，总共有 20 家大烟行，均属“三鑫公司”管辖。当时“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几千万元，这些钱的分配，由杜作主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朋分的。大三股即杜、黄、张；中六股是三大亨中最亲信的心腹，如顾嘉棠、金廷荪、范回春、叶焯山、芮丙荣等。除此之外，对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以及捕房的职工、华探、巡捕等等，甚至在帮的新闻记者等也获分润。当时法捕房的总巡费沃利、刑事科长夏才立等收入都是年年递增。甚至法国舰队司令来沪时捕房所出的招待费用，也由“三鑫公司”





负担。杜惯会借花献佛，利用“三鑫公司”的巨大收入，收买人心。如对青洪帮头面人物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丞、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人，每月每人各送大洋300元，作为孝敬费。当然这是在“三鑫公司”的全盛时期三大亨通力合作之时，以后就起了变化。

三大亨的内讧最终导致了“三鑫公司”的解体。“三鑫公司”的负责人，名义上是杜月笙为经理，张啸林等为副经理，黄金荣是后台老板，但真正的后台老板却是法捕房的总巡费沃利。开始是由黄金荣与费沃利联系洽商公司大事的。但杜月笙在掌握经理大权飞黄腾达后，经常和费沃利及费的译员步应生接触，直接商谈，掌握公司财务大权，使黄金荣真正地退居后台。有时还得仰杜的鼻息，才能动用公司的钱财。在这方面，黄对杜十分不满，而张啸林由于杜在公司内独掌大权，同样不满，同时怪黄不给他和杜一样的权力，故而对黄也不称心，而杜对黄、张





的不断要款也感棘手，这样造成了三角矛盾，三方渐渐地由暗斗到明争。杜、黄的斗法，牵涉到他们的徒子徒孙。当时杜月笙办的“恒社”和黄金荣办的“忠信社”两社社员均系杜、黄的心腹门徒，相互之间也常发生摩擦。该时黄金荣大收新闻界门徒。杜门虽收有新闻界门徒，但为数不多，声势不及黄门，特别是当时的小型报，完全站在黄门一边，黄就发动报界联合对杜攻击，有计划地抨击杜所经营的烟赌买卖。杜月笙知道报界的舆论影响，当即表示认输，这样使黄金荣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胜利，黄从杜那里拿钱就比前容易多了。

除此之外，黄金荣的失势也与“三鑫公司”在30年代解体有密切关系。黄在法租界的势力主要依靠法捕房的刑事科长法人夏才立及总巡费沃利。开办“三鑫公司”时，由杜月笙担任公司经理，之后，黄、杜、张三霸逐渐不和，从而势力分散。特别是黄金荣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魏廷荣争夺舞台美女吕美玉，结果吕嫁给了魏。魏不独夺得了美人，而且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金荣的种种劣迹。





当时魏、黄之争，牵涉到法租界上的绅董派与大流氓之间的明争暗斗。论实力，黄的恶势力在法租界超过魏廷荣。不过因黄树敌太多，引起公愤，尤其是上海天主教上层人物都支持魏。同时，留法的朱孔嘉之弟朱孔祥通过法侨谭斯脱出面，办了一张法文日报《真理报》，在报上集中火力抨击法租界内公开经营的烟赌业，矛头指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此报一出，轰动一时，引起法国外交部的重视。这时，魏廷荣乘机多次向法政府控告黄金荣广收徒弟，招摇撞骗，开设烟赌，危害市民等数大罪状，并且特别指控黄金荣拉拢巴结法捕房刑事科长夏才立，为夏庆祝六十寿辰，大摆酒席，向万余商人和市民收寿礼送给夏。在多方控诉下，巴黎当局召回了在上海的驻沪总领事葛格霖，询问法租界上流氓与烟赌业情况。法政府查实后，乃将捕房总巡费沃利撤职，调回法国，改由法泊尔中校继任，并任职业外交官饶伯泽为副总监，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这样，黄金荣的靠山倒了，树倒猢猻散。“三鑫公司”也就无形告终。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四章

留头不留发的
辫子革命



风

化

图

史



14



一个世纪前中国人形体上最刺眼的特征莫过于男人头上的辫子和女人足下的小脚。孔夫子曾经大发感慨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以头发样式作为民族标志的历史在中国是多么源远流长，“被发左衽”（被发：披头散发，不束发）当时已被视为“非我族类”和夷夏之别的重要标记。早在春秋战国时，越人即以“断发文身”为特征；“以椎髻为俗”则是南方吴人、楚人的标准发型。北魏孝文帝改革，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即是变易冠服制度，只不过，他所担心的是把鲜卑的发式、衣冠带入中原会同化了汉人。到了清朝，更是以拖在男人脑后的一条大辫子作为“皇恩浩荡”的符号，至于以“驱除鞑虏”为号召的民国革命，也正是从剪辫子

开始其“革命”历程的。可见发型如何、辫子长短也事关国体，不可一日等闲视之也。



清《北京民间生活彩图·剃头图》。有打油诗云：“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停停歇歇，先光挖挖敲敲。”

男人头上留的辫子，至少在 800 年前的女真金朝，已经开始在北中国区域广泛流行了。当时金朝境内，“削发不如式者死”的禁令迫使汉族男子也不得不赶“时髦”，把自己

打扮成留女真人式辫发的怪模样。这是中国历史上把辫子当做征服异族标志的开始。



从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可见，中国人的长发曾作美观的梳理，而不像后来那般作猪尾巴状。

女真族之后兴起的蒙古也是要求留辫子的。蒙古灭金后，开始在大元帝国统治的辽阔疆域内强制实行辫发之制，近到朝鲜，远至波斯，以至中国境内概无例外地流行四角形的蒙古辫发。“复衣冠”的“革命”直到明朝才算实现。明代汉族男子满头留发，头发挽髻，盘在头顶，称为“束发”。中国南方天气燥热，洗头沐浴之后，振衣焚香，悠悠然地躺在后花园的竹榻之上红袖添香、吟诗抚



洋鬼子对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对女人的小脚一样，感到好奇。

琴，正是当年煞有介事的明代“束发小生”悠闲生活的一种写照。

1645年6月15日，已经是清朝“顺民”的汉族百姓首先意识到“新朝”的开始。因为这一天，福临（即顺治皇帝）颁布了震惊全国的“剃发令”，限定京城10日之内、各省自诏令到达10日之内官军民一律剃发结辫，否则按逆贼论处——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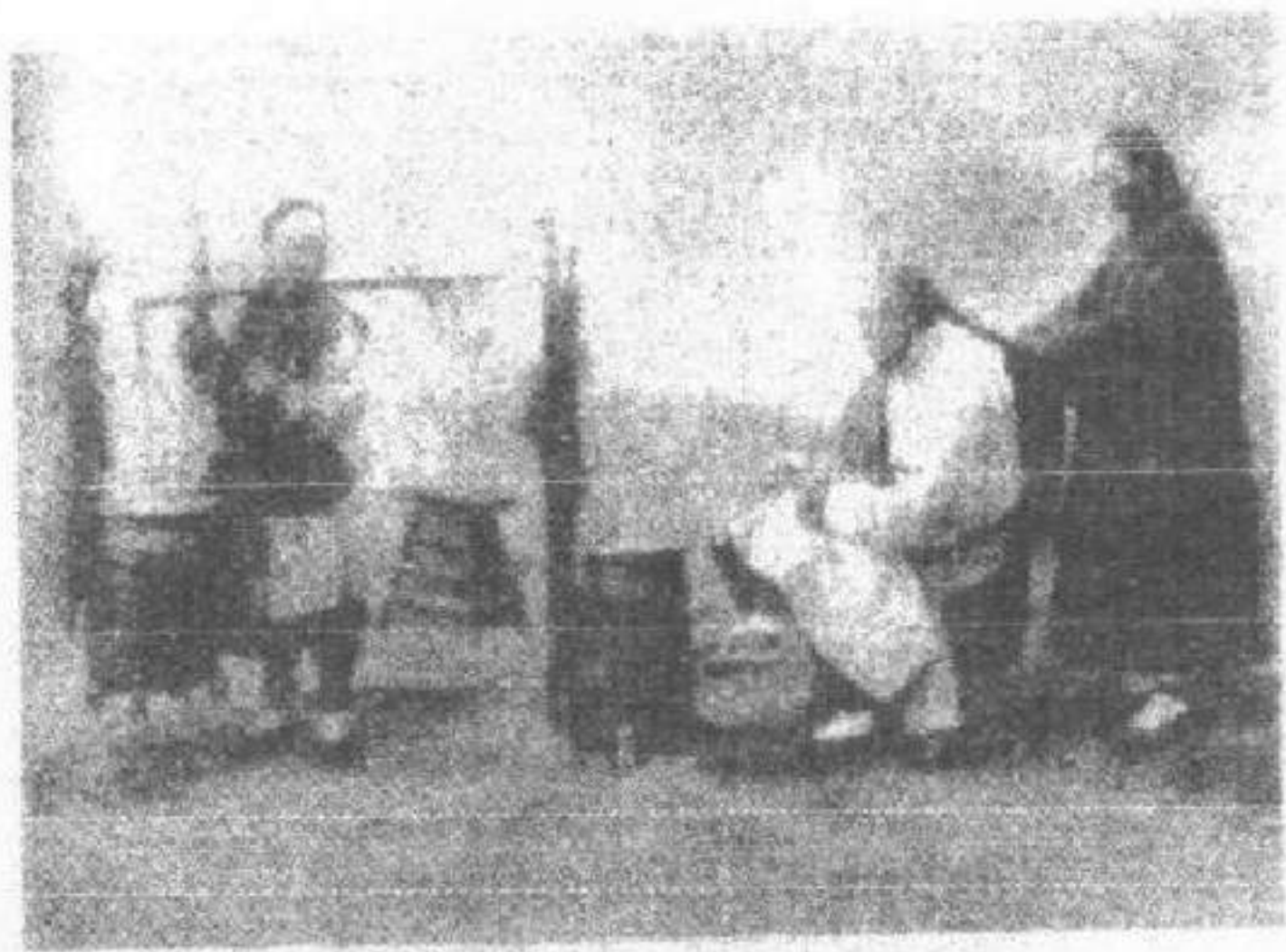
满族人为游猎生活的实际需要诞生的辫



五洲万国人尽来，伊谁辫子背间垂？
惟列情形乃如此，何日方滋豚尾耻？
回念我朝定鼎初，若无发辫诛头颅，
满洲风俗沿于汉，三百年来成习惯。
到此商量欲剪他，人心翻觉不平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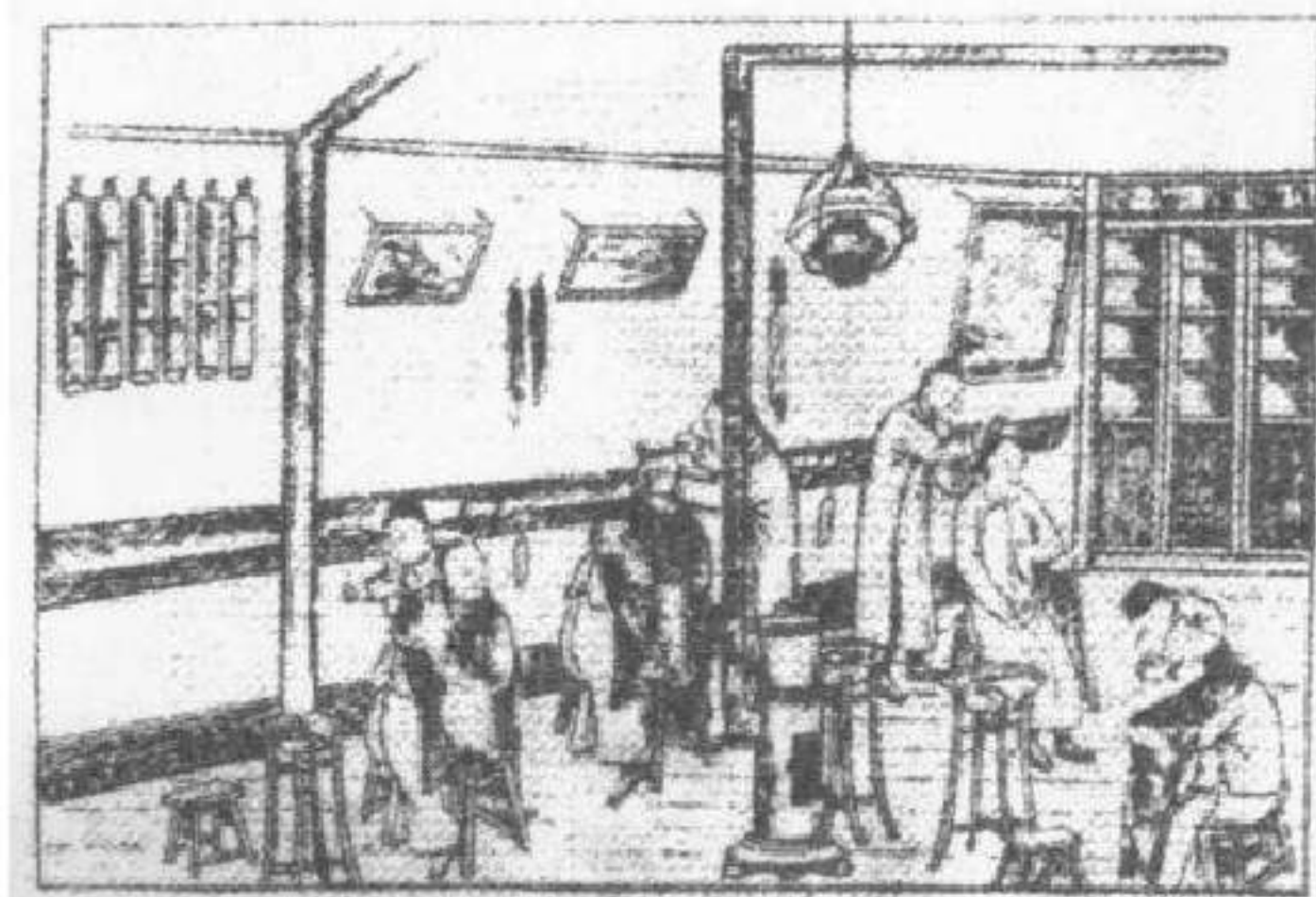
式发型不久演变为一种文化征服的象征。大清皇帝为了推行其“削平四围，留守中原”的治国主张，于是将头发之前部到脑顶剃去，再将四周的发际全部剃光，只留下中间集中的一块，使得满人发辫具有了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在他们看来，头发的样式和长短，绝不只是单纯的个人嗜好问题，而是立场分明、关系到江山万代国统的严重问题。

在 10 天到 1 年的极短时间内，令人疯狂的恐怖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很快传遍全国。出乎意外的是，在历来民风柔



句容剃头篋老四，练就一手好本事。
敲背扒耳真名工，更兼修面修胡子。
只愁世界滑头多，一条辫子难服伺。
又要松来又要光，担上没有许多鲍花水。

弱的江南，新朝的“薙发令”引起了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的誓死反抗。接连发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悲剧，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注脚。江南人为保住自己头上的汉人标志，曾经流了多少血，到底死了多少人，实在无从统计。今天我们翻开清朝初年的历史书籍，虽然几经文字处理，但剃发令的血腥之气仍隐然可闻。



清末上海的剃头店已经有些“西化”迹象了，只是人们的发式尚未进行“革命”。

这一成为归顺与否标志的“剃头令”最终酿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悲剧。当时一些文人士大夫纷纷发出“头可断发不可剃”、“膝可屈发不可批”以及“欲将须发还千古，拼取头颅掷九逵”之救亡之音，也有的人不愿与新朝合作干脆遁入空门，戴发修行，优游山林去了。从此，少数民族的满人与多数民族的汉人之间，仿佛有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此外，清朝统治者在对待台湾郑氏的政策上，明确提出了以剃发、移居大陆为条件的“议和”政策，而郑氏则以“不登



街头剪辮的民国男子

岸，不剃发易衣冠”为条件，拒绝剃发。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剃发归顺”的重视程度恐怕远远超过了是否统一问题本身。

以“杀无赦”的强制命令推广满式大辮子，不仅招来了汉人的强硬对抗，也使入主



中原的大清江山风雨飘摇。有人因此在给新主子的奏折中称：“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而踌躇满志的满人当然不会听信这样的“不吉利话”。这位上书的汉人最后被人参了一本，结果满门抄斩。



民国初年各地剪辫之事多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不过，为当“假洋鬼子”而剪辫的也不乏其人。

汉人在薙发令以后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运动高压之下，一度噤若寒蝉，慑服于大清的强权之下。汉人虽为了保住颈上的人头而被迫剃发，然而反抗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正月不剃头”（原为“思旧”即怀念明朝之意，后讹传成正月剃头死舅舅之风俗）即是这种反抗的遗风之一。不过时间终究具





故宫城墙下的剃头挑子

有软化一切的神奇力量。当初死活不愿剃发的汉人，到了康熙末年，已然渐渐适应了“满与汉，共天下”的统治局面，即使有些不满的情绪也不会拿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又经过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汉人便已完全奉清为“正统”。从此，“五天一打辮，十天一剃头”，不仅成为汉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出现了在国丧期间，还有些爷们耐不住寂寞，偷偷前往剃头铺剃头的违禁事例。





營業寫真

(千七) 俗名三百六十行

剃頭

(頑)

句名剃頭篋老四。
練就一手好本事。
敲背扒耳真名工。
更兼修面修鬚子。
祇愁世界清頭多。
一條辮子難服伺。
又要鬆來又要光。
担上沒有許多鉗。
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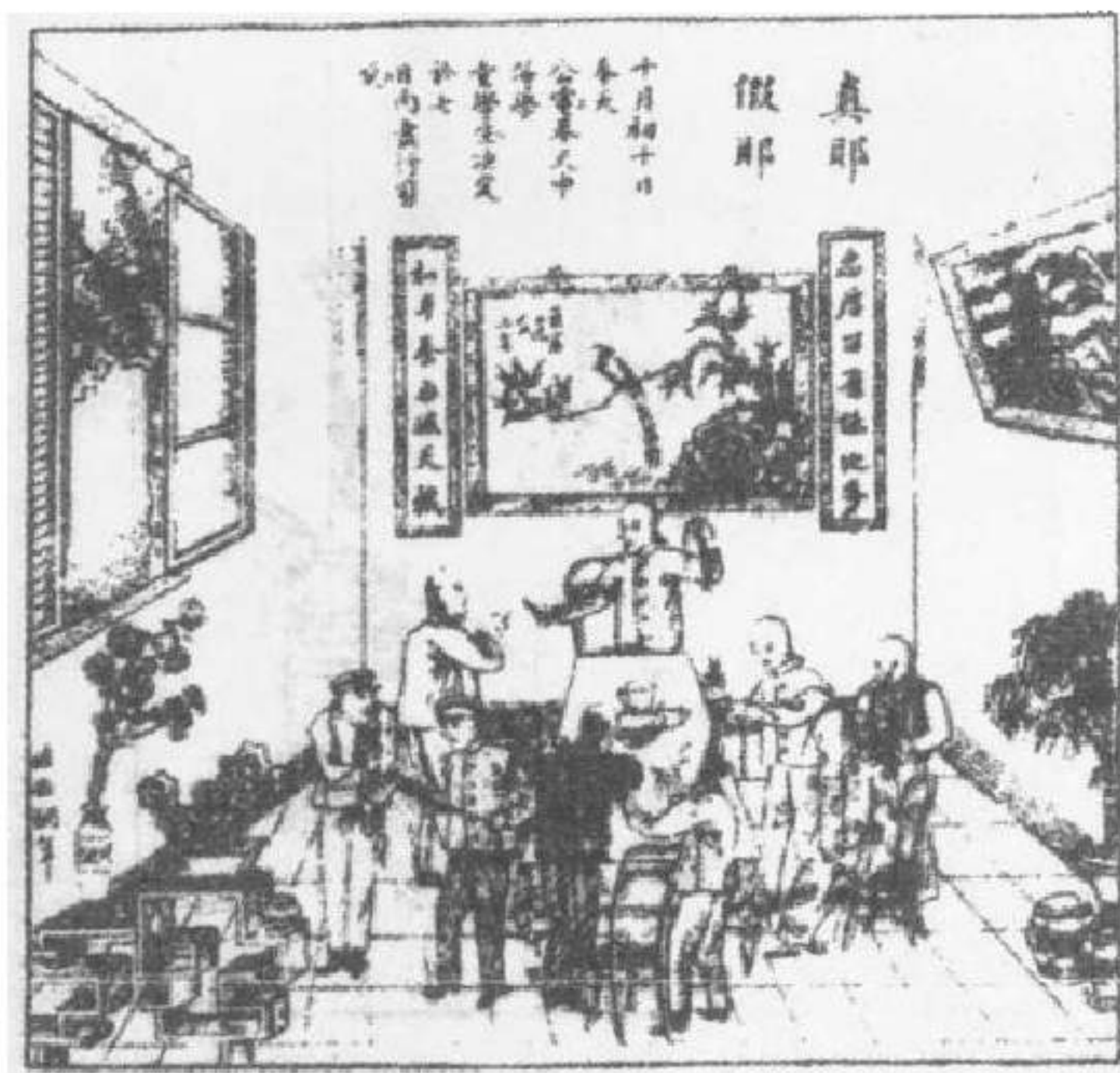
(明日續登南洋華大)

張家祥



剃頭排三百六十行中第十七，位次頗靠前。

剃头挑子的盛行成为剃发令的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副产品。强制剃发的一道圣旨传向全国，清政府不得不将全国的剃头匠召集在一起，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剃发圣旨的“吊头旗杆”。随后这些剃头匠便走街串巷，强制人们在圣旨前下跪，并将人们的头发一个个剃成“留守中原”的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清帝国在随后二百六十多年的发展过



民国初年各地剪辫之事多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不过，为当“假洋鬼子”而剪辫的也不乏其人。



程中割地赔款，国耻丧尽，就连这可怜的中原也未曾真的保留下来。清朝末年，一些拿着赔款去留洋的留学生们，在国外觉得这辫子实在不雅，于是把辫子剪了，做了“假洋鬼子”。回国以后又有一点麻烦，索性弄来一条假辫子应付一下。如果那时也兴打假，不知有多少人头又要落地了。

武昌起义，清朝灭亡，那辫子自然成了最刺眼的“革命”对象。原来早就想剪掉的当然没有什么顾忌，自己剪了；自己没有剪的，也给别人捉去剪了。随着剪辫在全国城乡的流行，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中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奇怪的是，民国初年看一个人革命与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剪不剪辫子。这是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老毛病复发”之症呢？当时很多热血青年（其中也不乏一些好事之徒）三五成群，游逛于街市，见有辫发者，即蜂拥而上实施其“革命”行动，“喀嚓”一声剪了辫子（不再是人头落地了），咸与维新。《阿Q正传》里说了这事：“只有一件可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在街头剪人长辫。

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在七斤嫂看来，原来是铮光乌黑的大辫子，现



在弄成了僧不僧道不道的，简直就是天下最耻辱的事情。这事我们不能怪罪穷乡僻壤中村妇的一般见识，虽然她也算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一个人物，但对于那易服改发的历史想必也不怎么了解。就是那位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娶于东洋的“外国汉学家”辜鸿铭大师，不是也不肯剪掉头上的辫子吗？可是，把辫子视为中国国粹和文化遗产的辜鸿铭大师，难道真的不知道，这辫子只是 200 多年前才从山海关外“入主中原”的吗？把“引进”的辫子看做悠久的传统特色，也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笑话。

中华民国发布的第 29 号公告中，限令 20 天内，官军民一律剪掉辫子，否则以违法论处。这道“剪发令”的颁布距“剃发令”过去了 266 年，距太平天国的“蓄发令”又过去了 60 年。如果算上辫帅张勋“辫子军”的复辟喜剧，闹得北京老百姓“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以至假辫子一度风行北京城，从“薙发令”到张勋“光复”辫子，中国人前后总共被这大辫子折腾了 272 年，才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五章

旧社会的乞丐之家：
花子院



风

化

图

史

15



社会上有大批无家可归的花子，总得有个去处安顿这些人。旧社会的统治者就划出一块地方，让这些花子住，这就有了花子院。

花子院里有些低矮潮湿像鸡笼似的小土屋，这便是花子们的“家”了。这些花子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睡这些小土屋里。

旧社会江湖上称花子这行为“跑腿的”或“吃生意的”。花子有花子头，花子内部称花子头为“内当家的”，对外称“杆上的”或“团头”、“丐头”。

旧社会官府规定，凡是想入花子院的花子，必须由花子头向官府申报口粮户口，每月可领一份极少的钱粮，算是官府的恩赐。生活主要还得依靠乞讨。如死了花子，则注销此人的口粮户口。



河北省正定县过去是府治所在，地人人稠，花子很多，花子院也比较大，经常住有100多人。正定花子院从前座落在青塔寺西边，后来迁到杨和楼附近路东（据传此院原是明朝宦官魏忠贤的祠堂）。这是一座宽敞的大院，有200亩大小，早已没有遗留的建筑物了。在院子四周盖有几十间小屋，便是花子的住处。这些小屋是用土坯、烂砖砌墙，树枝破席为顶，四五尺高宽，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有门无窗，阴暗潮湿，无铺无炕，就地铺草，活像是人间地狱。花子中有一家几口合住一屋的，也有一人一屋的。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花子作为“王臣”之一，也无法逃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也有许多的清规戒律，门户派别。各派门户森严，有所谓四大门，七支八姓等。规定乞讨时各有各的门路：有上街乞讨的，有上门乞讨的，有赶集乞讨的，有上庙会乞讨的，互不干扰，各守各的地盘。就连讨要时的喊叫也有区别，有的喊“爷爷奶奶，可怜可怜吧！”有的喊：“大叔大婶给点吃的吧”，都有一定规矩。现把四大门情况分述如下：





一、“范门家”

据称这一门传自春秋战国时借粮给孔子的范丹。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国断了粮，几乎饿死。范丹借口粮给孔子师徒，救了他们的命。从此，孔夫子及其弟子们就欠下了这笔账，永远感恩。后来范丹也穷了，沦落到乞讨度日的地步，因此留下“范家门”要饭的花子门系。这一门规定：凡是见到街门上贴有对联的户，不论这家是干嘛行的，都能讨要。因为只要街门上贴有对联，就说明这户有识字的人，那就是孔夫子的徒弟，就要得口粮，让他们替祖师爷还账。这一门花子上门讨要时，身背一个长3尺6寸3的布褡子，用来盛放讨化所得之物，喊叫：“大叔大婶子，给点什么吃吧！”对于街门上未贴对联的户，便不上门讨要，认为不是孔夫子徒弟。这门花子也不上街喊叫讨要。

二、“康家门”

相传这一门始自一位姓康的女子。据说她原不姓康，有一次康熙皇帝微服下江南，





被一伙歹徒围困，这个花子用鞭子驱散众歹徒，救了康熙皇帝。当时这个花子并不知道他救的是当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为了报这个花子解围之恩，就恩赐她姓康，并封了她这根鞭子，用这根鞭子打死人不偿命，打死狗更无妨。

“康家门”的花子讨要时身上总挎着皮鞭子，鞭杆长约2尺多，鞭梢1丈多长。上门叫化，如遇狗咬，就用鞭子抽打。这类花子大多是口哑耳聋手脚稍残的人。

三、“李家门”

“李家门”的花子也叫“蹻竿”的。这门的花子大多是失目之人，而且多是女性。她们身上斜挎布兜，手扶竹竿，布兜盛放讨来的东西，竹竿用来探路；沿街高声叫喊：“爷爷奶奶可怜可怜吧！有吃不了的剩饭赏给瞎子一碗半碗吧！”边走边喊，所得无几。这一门的花子，只能沿街叫喊乞讨，不能上门乞讨。据传这一门是宋朝仁宗皇帝的亲生母亲李后娘娘遇难时要饭留下的，身上挎的布兜原是李后娘娘盛宋仁宗所赐信物黄龙丝帕的。





四、“高家门”

据称这一门传自后唐穷秀才高文举。高文举未做官的时候很穷，只能靠卖文度日。在进京赶考时，没有路费盘缠，只得怀抱竹筒（可能就是说道情用的鼓子），手拿竹板，沿途乞讨。从此就留下“高家门”的花子门系。这门花子乞讨时都拿一种工具，充当能发出声响的简单乐器，如竹筒、竹板（称为竹柳）、石片等。上门讨要，嘴里说些吉祥如意奉承赞扬的话，以求得施舍。这类花子多数讨要钱钞，很少要饭食。

五、七支八姓

所谓的“七支八姓”则是上进四大门下的更佃分支。如范家门下有三节杆、背褡子、挎筐子等分支。背褡子者，如前所述。三节杆者，为手持三根长短不一的细柳杆，绑在一起就是一根长两三丈高杆，这根竿子是用来扒树枝用的。这类花子皆身背一个大筐子，一边叫化，一边见到树上枯枝就用长竿扒下，将枯枝装入大筐，背回当柴烧。这类人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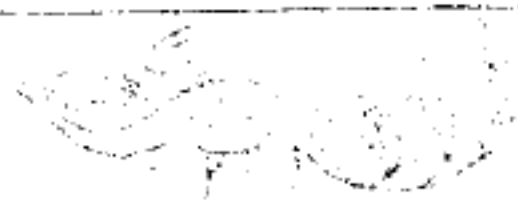


活动在农村，而且多数是农村花子头。这种花子头叫“坐方”，都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平时各守各地，互不扰犯；如超越地界则要拜访当地“坐方”，得到允许后才能在当地活动。

背筐子的花子“康家门”下也有，与高家门下不同的是：这类人大多数会柳编手艺。他们身背大筐，带着镰刀，到河边、树林削细嫩柳枝，脱去绿皮，用雪白的柳条编成笊篱去卖。他们一边上门叫化，一边兜售笊篱，所得钱财用来贴补己用。这类花子的生活稍强于纯靠乞讨的花子。这编笊篱也有“阴阳”之分，用 81 根柳枝编成的笊篱称为“阳”，这是一门留下的；用 73 根柳枝编成的称为“阴”，这又是一门留下的。各编各的，不能两头都占。据说“阴”笊篱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传授下来的。

“高家门”下又分耍“撒拉机”（竹板）、耍石秋子（石片）、跑白龙（扇大股）等分支。这类人大都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见景生情，随口编出，多是说奉承赞扬、吉祥如意之词。他们多向商店铺户讨要。商店铺户





为讨吉利，不等开口即给以施舍。如钱数微薄，则要辅以婉言相慰，打发开去，以利经营。叫化者也多通情达理，得到施舍即转向别家。如遇铺户商店刻薄吝啬，不肯施舍时，这类花子则变着法地用污言秽语诅咒，更甚者就用极下流不堪的词句漫骂不止。这样就会招来许多路人围观，使商店买卖受到影响。这类乞丐社会经验丰富，且有伶俐口齿，讨要或诅骂时常是即兴发挥，合辙押韵，滔滔不绝，博得众人喝彩。

“李家门”下又分挎兜子支（如前所述）、碰头支（跪在一固定地点，用头碰地磕头）、拍叶子支（跪坐地上，赤胸露怀，用手掌或鞋底使劲拍打自己胸脯）、开口支（跪在道口或街旁用刀在自己头上拉口子，俗称拉破头）等。他们用不同的自毁自身的方式办法，以求得人们的怜悯，给以施舍。碰头者、拍胸者使额面、胸前的皮肉血湮肿烂，日久天长成为厚茧。拉破头者则血流满面，声嘶力竭，令路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而这些乞丐就以此为谋生之道。

作为江湖上的一个行当，乞丐相互之间





是很讲究所谓江湖义气的。如有时遇到独霸一方的地头蛇欺侮外乡商贩、小民百姓，丐头会出面干涉，或调停，或劝解，使外乡人 and 小民得以保护，不致受侮。如地头蛇不依不饶，恣意闹事，丐头也不示弱，要打抱不平到底。丐头集合全体花子，轻者与其纠缠，甚者则与之拼命。拼命时花子们都做了死的顺序安排：打死对方，按号顶着偿命。被对方打死一个，后边又紧跟着续上一个，乞丐中先死、先排号的，都是拉破头在最前边，到那时义气当先，死不足惜。他们既不怕死，更不怕打官司。因为一打官司，全体乞丐成群结队地都到县衙前候审，哭喊连天，叫骂震地，官方无奈，只好管饭。打官司时，全体花子在花子头的带领指挥下，齐心协力，不得胜利，不肯离去。在与地头蛇的争斗中被打死的乞丐，其遗属由全体乞丐供养；如被打伤则以此为借口，对对方百般刁难，倒有了养病生活的来源。这样一来，尽管地方上邪恶势力猖獗，但一般的都不去惹花子群，就连单个的乞丐也不敢惹。花子们有头，有组织，无产无业，不怕经济惩罚，无牵无挂，





不怕人身坐牢。要罚，一文钱也没有；要打板子，请，平日乞讨还自己打自己呢；要下狱，更没二话，坐牢就得管饭，比整天讨要还保险。所以官府对乞丐也就另眼看待了。

乞丐头在花子院的大门上挂个筐子就表示有事发生，要召集全体乞丐。在家在外的乞丐看见挂上了筐子就知道出事了，要集合。随即一个传一个，很快就集合起来，听从丐头的吩咐指使。

花子平时各人讨要的食物和钱财都归个人，到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大节日，因人们都改善生活，乞丐们讨要回来的东西也统统归拢在一块，集中起来共同吃用。

外地来的小偷来本地作案，按规矩也要向当地乞丐头（坐方）备案挂号的。挂了号后，若犯了案被拘捕，丐头即出面到官府认罪，退还赃物，把人领回。被偷的如是老百姓或无钱无势的人，就是犯了案，丐头一出面，案情很快就了了。如果失主被偷后，并未获住人赃，而失主又是地面上有影响的人物，失主就会直接找到丐头，说明失时情形，求丐头帮助查找。这样的失主大多为丢失了

较为值钱或心爱之物，盼望归还心切，求丐头帮忙，且许以好处。丐头根据失主所述的丢失当时情况，一般都能判断出是哪位“挂号者”做的案。找到做案者，讲好条件，有时物归原主，得以赏赐。如外来做案之人没有挂号，丐头概不负责，由官府或失主自裁。

乞丐讨要时也有一定的规矩，不守规矩是要受罚的。不许偷盗，不许妄说，不许妄听主人言谈，上门者只能在大门口或靠门框，不许过院中影壁等等。如有的违犯了这些规定，丐头就可给以剁手、挖眼、打折腿、活埋等处分，以示惩处。

丐头在旧社会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府也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如官府在审理偷盗案件中，案犯拒不招供，刑讯逼死人命，没有供词，官府对下结不了案，对上交不了差，只好把丐头暗暗找来，说明原委。丐头根据官府所述情况，出面说死者是他管辖下的乞丐，做案犯罪，是丐头管教不严，打死无论；于是具结画押，认领罪犯尸体，加以掩埋，官府即以此结案上报，了结此案。丐头就是这样解了官府困难，所以丐头在当地衙门中



除有假功名（清朝时官级大小的标志是帽子上的顶珠，丐头也有官帽，顶子却是木制的，不是真官，所以说是假功名）、纱褂子外，在官府也算吃得开的人物。另外，遇有看尸体、看庙宇、守尸棚等活，都找乞丐去干。

乞丐内部规定，每年认一次宗亲，到时老乞丐领着新乞丐到集合点向其他乞丐引见，排辈份，认宗亲，他们的行话叫“续捻”。此后丐群各个区域之间，就可互相往来，而且互有照顾。认亲完了要喝酒庆贺一番。结束后，各领各的弟子回归原地，开始乞讨生活。

乞丐讲究论资排辈，要做丐头必须有一定的辈份。光辈份大但无组织能力也当不上头；有辈份，有资历，有经验，能管理，不负重望的才能熬上乞丐头。清朝规定，乞丐头应穿戴顶带、纱褂，还有迎送官府、见官等仪式。乞丐头就本着这套穿戴打扮去应酬，虽然没有官级，但一个乞丐头在乞丐中是很有威信的。

据传，乞丐供奉的祖师牌位是窦老，这个窦老叫什么名字，无从考证，只传说此人是汉平帝时的宰相，曾抱着太子逃国，靠乞



讨维持生活。以后太子登基后封窦老为天下乞丐头。如果真是这样，汉平帝是公元元年登基的，孺子刘婴于公元6年居摄，推算下来，乞丐有头的历史已近2000年了。

六、民国时代的穷家行

1058
解放前乞丐的组织叫穷家行。一般人称他们为“捻上”或“捻子”。其中包括死捻子、活捻子和杆上。这些人无家可归，极端穷困；但是不生产，不积蓄，有了财物，就吃喝赌光，自称“万年穷”，所以叫“穷家行”。又自称“理情行”，说是讲理讲人情的一行。在旧社会里，他们被统治阶级逼得无法生活，都被划在“下九流”之外，社会地位最为低贱。

死捻子俗称叫花子或要小钱的，是穷家行的正宗，人数也最多。据穷家行的传说，他们的祖师爷是范冉。他们说：范冉独自一人住在两间草房里，用48棵秫秸扎成院落。孔子在陈绝粮，命子路向范冉去借粮。范冉问：“世界上什么多什么少？什么欢喜什么恼？”子路不能回答，快快而返。孔子又派颜




回去借，颜回回答说：“世界上人多君子少，借时欢喜要时恼。”范冉随即借给一鹅翎管米和一鹅翎管面。颜回回到孔子面前，把米面倒出来，立刻化为两座米面山，师徒吃用不绝。事后孔子往谢范冉，说：“借的米面还不了。”范冉说：“等以后叫我的徒弟们零碎讨要吧。”孔子就说：“好吧！等以后叫我的徒弟们还吧。凡是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都可以进去讨要。”

他们还说：有一天，范冉和孔子下棋，天晌午了，范冉问道：“世界上最贵重的宝贝是什么？”孔子说：“当然是钱财。”范冉摇摇头说：“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人，人是活宝。你有钱，不一定准买到吃的，我没钱，可是到时候徒弟们自然给我送吃的。”孔子点头称“是”。

按范冉字史云，是东汉末年的高士，有名的穷困。

孔子是春秋时人，和范冉相去几百年，借粮和下棋的故事为无稽之谈。但借粮故事，说穷家行向地主阶级（孔子徒弟）要粮，是讨还欠债而不是乞求施舍。他们的口号是：





吃的是烧锅、油坊、盐店、当商。即他们斗争的目标是封建社会中的地主、豪商和高利贷者。所谓下棋的故事，一方面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地主有钱，以范冉为代表的穷人，分开了界线；一方面又是说明穷家行的师徒关系。

死捻子分为韩门、齐门和郭门三大支派，这三大支派的历史，现在无法考证，从什么时候起才有穷家行，也无法叙述。他们师徒相传，按次称第几座，解放前传到了第十座，约略说在本县可能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

穷家行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例如：

加入穷家行要磕头认师。认师仪式是：摆上刮打板、牛胯骨、小簸箩、要饭的褡子，还有一壶酒，由师傅告诉徒弟：咱是什么人，是几座上的人。再由“明辅”讲明行道，“过辅”保证所介绍的这个徒弟不违犯穷家行的纪律。最后用酒把摆着的东西浇一个圈。

参加穷家行之后，遇有同行盘道时，必须说出师傅、明辅和过辅的名字，是几座上的人。彼此都是按照几座来论大小，长辈称



呼师爷、师叔，同辈称呼弟兄。

死捻又分为三类：

一、花褡子。仗着唱“数来宝”讨要。有的砸牛胯骨，叫做撒拉棒；有的打竹板，叫做撒棒子；有的用竹片绑扎小架子，上系小钹，叫做撒拉鸡。

二、武褡子。用讹诈的形式讨要。有的手拿菜刀拍打胸脯，叫做撒拉笨；有的用鞋底拍打胸脯，叫做砸瓢子；有的手拿镰刀刺破自己的前额或头顶，弄得鲜血淋漓，叫做刺破头。

三、叫街。瘸老病瞎和少臂无腿的残废人，在庙会上坐在庙门外，面前摆着一个小簸箩，口里爷爷奶奶地喊叫，向烧香的人们讨要。在集上或会上，坐在一定的地方或沿街讨要，这是一些失去生产能力的人，生活最苦，乞讨的方式也最可怜。

大首领叫做“当家”。三、五个人成为一捻，一个捻的头目叫做篓子头。大家讨要来的东西，篓子头十成抽一，但是大家吃盐，由篓子头负担。

篓子头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向县城里的





铺商要钱。要来以后，大家分份子。凡有婆子头的地方，每到年节，婆子头到铺商和豪绅地主家中念喜歌、接财神、送财神、送礼、拜年，总之是讨要财物。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婆子头借送礼、拜节为名，而实行讨要的日期。平日里是大家赶集赶会，向散摊要钱要东西，顺便到富家要锅头做盘费。

而每年麦收和大秋之后，婆子头目领着人赶着独轮车，成群结队地下乡向地主富农家要粮，叫“开趲去”。“开趲去”的时候，人数较多，推举一个能干善说的婆子头掌趲。掌趲的人持有圣人府发给的执照和黄绫地的龙凤旗放在小匣里，用锁锁上。如果地主说：“该（欠）你的？”掌趲就回答说：“你该我的还不起！你念过圣人的书吗？你贴上门对就该我的。”必要时，就拿出执照和龙凤旗来，不满足要求就赖在门上不走，人多势众，总会达到目的。但是，实际上一些大地主的村庄有圩子，有武装守着圩子门，他们根本进不去，无法讨要。还有一些豪绅利用当地的“杆上”去对付，因此不会讨要的太多。只有向小村庄的地主富农，即所谓土财主家才能





讨要得比较多一些。

死捻子中略有一点生产事业，那就是弄点柳条来编鸡笼、编箬篱。这种极为微小的生产对于他们的生活补助，只能说略胜于无。

活捻子即小绺和偷鸡的。据说他们的创始人，一个姓梭，一个姓李，住在通州上村的场园屋里。有一天，两个人在屋里喝酒，烧起一堆火，用的是破酒壶（小半咀），还有一个破碗盛着一点咸菜，嘉靖（或嘉庆，口传材料说不清楚）皇帝私访到了，和他们一起喝了三口酒，吃了几口菜。以后就把他们叫去，要他们当差。他们拒绝了，就送给他们二人三个铁炮竹，都封为军门。以后就形成梭李一派。所谓“梭里不靠”，就是说这一派不是正派的穷家行。死捻子不与活捻子来往，轻视他们。

活捻子和死捻子一样，除人数较少之外，也是师徒相传的。他们和衙门里的马快等人（民国以后，是警察之类）有勾结。偷来的东西要向马快等人行贿，马快等人也对他们给以暗地保护。遇到有势力的失主，丢了东西找马快，马快就找活捻子把失物送回去。因





此，他们偷窃的东西存放一个月（一说十天或三天）才能卖掉。偷鸡是向穷苦的农民窃盗。农民是被压迫者，没有势力，所以随偷可以随卖。另外，他们还偷农民的豆角。总之，这一类人，流氓性很大。

死捻子在某一地区混熟了，成为职业的炮手，即“杆上”。当地人家如有婚丧庆吊等事，就邀他去放炮，一般乞丐和穷家行的讨要，他也出面去对付。外地的死捻子或活捻子来讨要或偷窃，也要给他一些好处，他也要负一些保护的责任。死捻子和活捻子都称游方，杆上叫坐方。如果游方到某地方赶红白事，须先找坐方。坐方领着他们去要钱要吃的，满足其一定的要求。如果坐方不能满足其要求，游方就在他返还的路上等着与之讲理：“你跟谁学的？你师傅没给你透气（讲明）吗？不是一碗饭分到两下吃吗？随将其炮筒、馒头等物没收，说：“叫你师傅来要吧！”总之，游方和坐方彼此都要照顾。杆上实际像死捻子转业，所以有“先有游方后有坐方”的说法。杆上可由其徒弟继承，也可由其靠底的人继承。





光绪 26 年修撰的《宁津县志》说：“养济院在城东门内迤北，官厅 3 间，居众房 20 余间。邑令燕调纬（光绪 22 年到 24 年）重修。额养孤贫 67 名。”又说：“孤贫 67 名，每名岁支月粮银 2 两 1 钱 6 分，共银 144 两 7 钱 2 分。乾隆 2 年加增银 96 两 4 钱 8 分，共支银 241 两 2 钱。遇闰加闰月银 20 两 1 钱。”又说购买冬衣布花银 13 两 4 钱。乾隆 6 年又新增银 5 两 2 钱 4 分余，共实支金 18 两 6 钱 4 分余。但实际上住养济院的人领不到这一些，即便领到，杯水车薪也无济于事。民国以来，养济院只有房十几间，每人每季发钱五六吊（抗日战争前夕约合六七角）。住养济院的人就是穷家行中的死捻子。旧社会把这些人逼迫成为乞丐，又盗用养济的名义，却不做真正的教养和救济，因此这些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团体来生活。他们讲义气，重团结，互相照顾。在乞讨时，领着瞎的，扶着瘸的，用独轮车推着不能走动的，一人有病，除徒弟照护之外，同伙的人有钱出钱，有东西出东西，不在一处住，就想法捎去。他们的格言是“上会来称兄道弟，下会去你东我西，瘸





老病瞎是一家，生死存亡不分离”。

抗战前，全县的死捻子约 100 多人，其中妇女极少，不过一两成，都是残疾人。他们以城内养济院为总聚会处，游动性很大，平时分住在各处破庙里。养济院的院头，先是葫芦灯，后是商玉玺。各处的婆子头有：住在马厂庙里的贺拐子、土瘪刘；住在李满庄庙里的张春堂等等，全县活捻子约有十余人，婆子头有李拐子等，全县杆上约十余人，大柳先是刘麻子，后是雒大个子。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共产党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抗日斗争，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1938 年八路军到达本县，本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成立了，提高了穷家行的政治地位，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死捻子中有张麻子、全义、小小、王俊岭、田大个人等觉悟高的人参加了八路军。活捻子经过教育改造，多数不再偷窃，成为真正的农民。有少数流氓成性屡教不改的人，如李拐子竟甘作敌人的侦探，叛卖祖国，就受到了人民的严厉制裁。

在 1946 年 40 天群众运动中，死捻子丁吉





顺、王宝和、光腚王 3 人成为斗争恶霸的骨干分子。以后多数死捻子都遣返家乡，由村干部负责安排其生活和生产，无家可归的人就留在宁津县城里。土改时他们和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老、病、残废和失去生产能力的人们也都由政府作了妥当的安排。从此自称“万年穷”的人们不再讨要了，不再过寄生生活了，也不再受贫困饥寒的折磨了，穷家行也就结束了。因此，过去穷家行的人们都非常欢喜，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

解放以后，不少过去曾参加过穷家行的人在生产劳动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光腚王病时，农会派人去服侍，死后用柏木棺安葬。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丁吉顺在生产队里当饲养员，以社为家，工作积极，三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出席了县群英会，获得了应得的光荣。





七、拜杆、春典

1. 拜杆

参与拜杆的三个人被称为师傅、明师和引师。摆上一个一尺长的黑红杆（红朝上，黑在下），有一酒壶，喝酒自饮，不用酒盅。双手抱酒壶，在坐的轮流喝，宣布认师傅时，必须给师傅磕头，当时师傅告知：徒弟是多少世，明师、引师、师傅各是哪一门的、姓名。进了“穷家行”，一般还有半年的考验期。

2. 春典

穷家行的“春典”也就是江湖上道行的“黑话”。口传记录，只是记音，文字不一定准，略记如下：

数字从一到十作：柳月望在中神兴张爱居（又作：由中人二大王主井全非）。

南北东西作阳墨道妾

讨饭的褡子叫老灰。

剃头用的镰刀叫轻子。

到路旁偷秋叫打洛栽。





炮叫礮子。引信叫火苗子。

花药叫皮。点火用的火香叫火邱。

切菜刀叫师刀。噪音叫换头。

灯叫亮子。火柴叫迸星子。

钱叫杵。吊钱叫干杵（一千文叫一吊钱）。

阴天不见太阳叫上漫子，又叫打棚。

桌上用的壶、碗叫龙头、凤尾。

袄叫称吉。袜叫汪。鞋叫芦言。

吃饭叫上啃。喝酒叫抱瓶。

狗叫皮子。

同行见面先说“辛苦了。”

见面不相识说“人高腿短。”

八、化相（下街讨要数来宝）

1. 开始进街：

竹板一响进街来，一街两街的好买卖，又有买，又有卖，各样的买卖都发财，都发财……

2. 向卖肉的讨要：

你这肉，是好肉，肉又肥，臊子厚，一





刀两刀的割不透。

卖肉的不开发，就改口唱：

你这肉，是孬肉，膘子薄，肉又瘦，卖
到来年六月六，生了蛆、发了臭，看你难受
不难受。

3. 向卖罐子（指农村提水用的器皿）

的讨要：

罐子大、罐子圆，你老的罐子多卖钱。

如不开发，就改口唱道：

罐子破、罐子小，你这罐子卖不了。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六章

上海大流氓
黄金荣的发家史



风

化

图

史



16



大流氓黄金荣原籍苏州，1873年6岁时随父母移居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就读于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他从小顽皮，不认真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善于随机应付。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的父亲经邻居介绍，也当过捕快。黄金荣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便衣包探，以及营救法国人姚主教而起家发迹，都有一定的影响。

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黄炳泉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姊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代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把黄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



人就叫他“小和尚”。由于他脸上有麻皮，后来又有“麻皮金荣”的绰号。

因为打杂不能满足温饱，黄金荣的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又叫“萃华堂裱画店”，是片老店（有说是在城隍庙九曲桥得意楼旁边的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这是误传）。萃华堂裱画店的老板叫黄全浦，黄金荣拜他为师，做了3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400文（40个铜板）。满师后站了2年柜台，收入也不多，生活仍然清苦，谈不上养母亲和弟妹，母亲仍靠洗衣服维持生活。黄金荣在萃华堂度过了5个年头，除学了些正规的裱画手艺以外，还懂得了一些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

黄金荣是在进法捕房后才发迹的。黄金荣进法租界巡捕房主要是靠了隔壁邻居陶婆婆的帮助。黄金荣的母亲常替陶家洗衣服，日久天长，陶婆婆看到邹氏母子5人生活困苦，深表同情，邹氏就托陶婆婆替黄金荣在巡捕房中找个差使。1900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报





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刚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招呼，因此黄金荣被录取为三等华捕。那时捕房招考录取 20 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金荣做领班，当时人称“二十股党”。

那时法捕房的实权掌握在法国警探手里，华捕没有实权。黄金荣则被外派到十六铺码头管治安。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清洪帮分子。当了法捕房“包打听”（便衣警探）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 and 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他用小恩小惠收买了一批惯窃惯盗作为线索，制造内讧，利用一批盗窃分子去破获另一批盗窃分子，甚至玩弄“贼喊捉贼”、“假戏真做”的手法，一面布置一批小喽罗，约好某月某日在什么地点作案抢劫，一面叫另一些喽罗到法租界巡捕房向他“报密”，他再向法国警探报密，这样使他能掌握带人破案的主动权。到了约定的日期和地点，





原来约好的一批喽罗果然在进行抢劫时，便被黄金荣亲自带领、化装埋伏的侦缉队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盗匪被关进捕房后，黄金荣又在捕房内打点，一一陆续释放出来。法捕房当局看到黄金荣连连破获盗窃案件，对他重视，使他逐渐有了威信。

黄金荣利用同样手法对上海的一些老板富商进行了巧妙隐蔽的敲诈勒索。他常常唆使一些清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而黄金荣带着巡捕和便衣包探，上街巡逻，每到之处，这些闹事的小流氓无不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小流氓来惩办。于是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感到他确有办法，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有的还投贴子拜他做老头子，有的拜他为寄爹，有的拜他为先生。对于那些有名的富翁，黄还采用绑架勒索的办法，大肆敲诈。如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至于指使爪牙向富翁财主写恐吓





信敲诈，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受害人被敲去大笔竹杠，还得请黄金荣出面解决，以免后祸。最使黄金荣得意的，还不是他破的假案，而是破了一件法国姚主教被绑架的真案，从而使他成为上海第一流大流氓，大把头。

姚主教原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亲自由上海乘火车，还带着几箱银洋，准备到天津去开办教堂。当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勒索一笔巨款，赎回“肉票”。

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姚主教下落通风报信的，赏银洋3000元，如能找到姚主教的，赏洋1万元。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





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将来青云直上，一定整修城隍大殿，装塑城隍金身，但还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说来凑巧，这起绑架巨案，却从一个到上海来的山东人被扒去 100 元钱而获得侦破线索。原来在山东临城地方有个人名叫韩荣浦，是吴佩孚部下的副官，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火车到了上海，他从拥挤的人丛中走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发现装在肚兜里 100 块钱不翼而飞。韩荣浦沮丧万分，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捕房当巡捕，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到法捕房去寻找姓隋的巡捕，姓隋的巡捕替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黄金荣一听是从天津附近来的，便不放过机会，向韩荣浦打听上海火车开往天津前被拦车抢劫和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由于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熟悉行伍中的事，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所干的坏事，互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将听到的消息告诉黄金荣。黄金荣一听有了线索，大为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 150 块钱，要他回





到临城去详细打听肉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 500 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由于黄金荣慷慨解囊，打动了韩荣浦的心，果然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几天时间就同绑架姚主教的张宗昌部队取得联系，打听到姚主教被关押的地方。他第二次来上海同黄金荣接头，商量赎票问题，黄金荣的点子多，叫韩荣浦不必去找部队头头开价赎票，而是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姚主教的人员。同时黄金荣与陶翻译商量，先向捕房支领 2000 元，给韩荣浦 500 元，另交 1000 元叫韩荣浦立即去买通看守人员，并答应等黄金荣到达关押姚主教地点时，再付 2000 元，要这些看守人员逃往外地。还叫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张纸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来救他出险。韩荣浦再度回到临城之后，黄金荣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由上海乘火车到达临城，在晚上赶到乡下把姚主教营救出来，安然返回上海。

黄金荣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不去直接同张宗昌部队谈判，而只花了几千元买通少数





看守人员，竟把姚主教营救出险，法捕房对黄金荣破格重用。原来法捕房中重要职务都由法国人担任，这时破天荒地提升黄金荣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他也从此更忠实地为法帝国主义服务。

黄金荣担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 20 多年，直到他 60 岁做寿以后，才辞去职务，名义上退休闲居，实际上幕后操纵。继黄金荣之后担任华探督察长的先后有沈德福、任水扬两人，因不奉承黄金荣的意旨，被黄金荣安置在捕房里的余党所排挤，最后还是由黄金荣的亲信担任这个职务。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黄金荣并不算帮会中人，他未拜过老头子，既不是什么“大”字辈，也不是什么“通”字辈。按照帮会规定，凡是没有人过帮会的，称为“空子”，不能开堂收徒。黄金荣却不管这一套，他同清帮的“大”字辈张镜湖、曹幼珊等称兄道弟，对人自称是“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他收徒弟不举行开香堂仪式，只是要





徒弟写张贴子，上写黄金荣老师，下写某某门生敬拜。黄金荣是见钱眼开讲实利的，只要送钱送礼拜他为老师，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在当了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后，一次就收了 200 多个徒弟，其中重要的和关系密切的有金九龄、程子卿、丁永昌、陆少章、鲁锦臣、曾九如、卢英、尚武、冯志明、韦钟秀、乔松生、汤坚、马德荣、张荣、董明德、周相成、管宝全等。这批徒弟大多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小头目或骨干分子。另有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法租界和粪大王马鸿奎、六国饭店赌台的朱顺林、沧州饭店老板姚松如、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和水果荣生，还有工商界人士如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新华影片公司经理张善琨等，其他还有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医药界人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当时被天蟾舞台老板压迫和威胁，也曾投拜黄金荣为师。

黄金荣的门下势力很大，除了他自己收的徒弟外，他的养子黄源焘收过两三百门徒，





外孙邹政之也收了五六百人，再加上顾竹轩、唐嘉鹏、卢英、黄振世、丁永昌等也都收有不少门徒，所以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不但遍于全上海，甚至江浙一带，也都有他的势力。

黄金荣和杜月笙联手诈骗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故事在上海滩流传甚广。那时袁克文初到上海，人地生疏，他的侍从人员中有个名叫韩荣浦的，正是在营救法国主教事件中给黄金荣通风报信的人，因此介绍袁公子去访问黄金荣。袁克文一见黄金荣，就送了10枚金币作为见面礼。这些金币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由英国给他铸造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颇为珍贵。杜月笙看到连声称好，黄金荣就送给他3枚。于是黄、杜两人摆宴席，隆重招待袁公子，吃的顿顿是丰盛酒菜、中西美点，穿的是高贵的中西服装，住的是精致华丽的高级公寓，出入有多名安南巡捕保护。袁克文受到上海这两个“大亨”的殷勤招待，非常满意。黄、杜两人先伴袁公子踏遍上海的名胜古迹，接着又引他到书寓（高级妓院）和会乐里长三堂子，并亲自选上几名红妓女送到袁克文所住的公寓，与





袁朝夕相伴，说唱玩乐，使袁克文跌入黄、杜安排的迷魂阵，在上海流氓流行的吃、喝、嫖、赌四个字中，一下子就沾了三门，接踵而来就是赌博。开始时，袁克文和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等四人一起搓麻将，总是袁赢钱，黄、杜等输钱，因此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一场赌注由成千元到上万元。不到十天功夫，把他带来的几万银钞输得精光，只得拍拍屁股回北京。临行前，黄金荣、杜月笙还亲自相送，并且拿出 5000 元给袁作途中用费。

黄、杜并非门槛很精的赌棍，但其门下中不乏个中高手，如王茂亭、朱如山等，对赌博都有精明的手法。这次黄、杜两人陪袁克文玩牌，对赌博发生兴趣，又听黄的门徒王茂亭介绍外国流氓开设赌台赚钱多和轮盘赌的黑幕。黄的门徒马雨亭还会做赌具，如在骰子内灌铅等等。于是黄、杜两人在三鑫公司内召集马祥生、顾嘉棠、王茂亭、马雨亭、金廷荪、范回春等人商议，一致认为开赌场是桩好买卖，顾嘉棠建议开个俱乐部，黄金荣、杜月笙表示赞成，选定地点适中、环境幽





静的福煦路 181 号（现延安中路）为场址。

上海最早的大赌窟叫“人和栈”，地址在小东门陆家宅桥口，即现在的一枝春街口。那时该处开设不少鱼行，鱼市集中，开办“人和栈”的是称霸十六铺码头的陈世昌，还有沈嘉福、范恒德等。由于鱼行一早开市，那些卖鱼的贩子卖掉鲜鱼，手中有钱，陈世昌就利用这个机会开设赌场骗取鱼贩的钱财，但比起福煦路 181 号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福煦路 181 号是幢较大的花园洋房，开办之初，只是当作三鑫公司成员俱乐部，后来扩展到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文人财主，最后只要有钱或认识该俱乐部的任何有关人员都可进去赌博。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高级烟酒和上等鸦片烟，还可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但是，进了俱乐部，要想赢钱可不大容易。赌台里惯用灌铅的骰子，轮盘赌的赌具下面放着吸铁石等，做手脚欺骗赌客。即使赢了钱，走出大门，还会被人跟踪，用“抄靶子”、“剥猪猡”等办法，把钱抢走。有时还搞“突然袭击”捉赌。



中

国

Z H O N G G U O F E N G H U A T U S H I

第十七章

青帮大亨杜月笙的
出身与发迹



风

化

图

史



17



民国期间，上海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都市。而始终居于幕后，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沪上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三者之间，无可否认的，实以黄金荣出道最早，当家最久，地位最高，影响力也最大。这就是黄氏被尊为“众家老板”原因之所在。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谚语“出道你早，运道我好”，刚巧印证了黄金荣、杜月笙之间，自初期以至中期、末期的关系演变而言的。概括来说，黄杜之间早期是“大亨与学徒”、“探长与跑腿”、“老板与伙计”、“老大哥和小兄弟”，中期变成了“董事长与总经理”、“老板与智囊”、“第一号与第二号”，末期则渐渐的相提并论，并驾齐驱，然后一变



而为老板归隐，伙计当家。由于黄杜二氏都有极广泛的人事关系，天南地北，中国外国的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徒子徒孙。但是这么多相关人士之中，能够了然杜月笙早期历史的，似乎并不为多。

杜月笙和黄金荣一样，是从做捕快开始发展的。当一名捕快，从帮手爬到捕快再升到头儿，只有三等级，所以很少很少会有捕快做了官的。因此之故，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多多少少的对捕快有点轻视，因为他们一旦做了官，捕快就要供他们奔走效命了。所以社会各阶层只有做官的可以凌驾捕快之上，其余的就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三分尊敬。尊敬的结果则多半是敬而远之，这种心理使得捕快在三百六十行中显得最为寂寞——绝少有人写过他们的事迹，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出。捕快的行业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明知道写得出来都是绝佳的故事，对于读者必有强烈的吸引力。叵耐偏有无从着笔之苦，也是没可奈何的事啊。

在当时的上海各租界中，尤以法租界的捕快声威最盛，权力最大。纵然捕快一行在





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却直到清末民初，他们这一行方始出人头地，惹人注目，由开始发皇而登峰造极。等到国民政府收回租界，方始盛极而衰，化绚烂为平淡，归于幻灭。必须了解这一点，万千读者方可恍然大悟，上海三大亨的崇高地位，惊人权势，全都是时代潮流所造成的，而且不论杜月笙也好，张啸林也罢，他们的成功都基于众家老板黄金荣的一力提拔。另言之，便是黄金荣风云际会，杜、张二位借步登高。像他们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人物，从前不会有，现在不可能产生，将来决不会出现，正是因为捕快风云际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所以，三大亨的事迹为什么如此这般引人注目，浸假成为中国社会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了。

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孑然一身，因为自己不学好，误入歧途，迷恋赌博，而被亲娘舅逐出了外婆家，流落到十六铺一家水果店里做小工，说不上学徒，只能说是童年的苦力。他最早从事的工作是帮忙搬运西瓜。一艘艘堆满西瓜的木船从乡下开来，挨次序停泊在十六铺的小码头边，西瓜从不包装，





仅只由一群苦力组成一个接力队，一只只西瓜从船上抛下来，张三接住，再抛给李四，以次类推，一直抛到水果店里，如同一座小山似的堆好为止。

杜月笙他刚到十六铺的时候，连个住处都没有。三冬腊月，大雪翻飞，席天幕地之际，居然没有冻僵冻死，那真是他的祖上阴功积德，他自己也有那么大的福气。那时节的十六铺，业已成为华洋码头的集中地，人烟稠密的商业区。长江码头，最称复杂。梁山的好汉，江湖的高手，鸡鸣狗盗之徒，穿窬剪绺者流，打手，骗子，绑匪，郎中，源源的自长江各码头，南北两地界开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十六铺各地面打出了江山，分好了地段。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没本钱的买卖。杜月笙无事闲荡，冷眼旁观，见他们呼朋牵侣，吃喝玩乐，坐茶馆上酒楼。自己则饥肠辘辘，冻得发抖，真不知是何等的羡慕，何等的佩服。把那帮在剃刀边缘，胡天胡帝的黑道人物，当作了天上的神仙，人间的福星。内心里面只是在想，倘若有一天，自己也能置身于他们的行列，那





该是多么理想多么幸福，人生又有何求呢？

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当他远远的眺望，三五成群的剪绺客，正在拥挤的人潮中，上下其手大事活动。头一个耸起肩膀把一名乡巴佬，使劲的一推，推到了第二个的身上，第二个佯装盛怒，抓起乡巴佬，挥拳欲揍，于是第三个出面打圆场，代乡巴佬求情。假戏真做，煞有介事。当乡巴佬给解了围，千恩万谢的告辞离去。人一走远，三名剪绺客立刻旁若无人扬声大笑，乡巴佬腰带里的洋钱角子和铜板，全都到他们手里去了。

杜月笙看得清楚明白，不禁大为惊奇。天底下，赚钱的事难于上青天，然而，要是容易起来，偏就有这么容易法。他正在一旁赞叹欢喜，蓦的，第四名剪绺客排开人丛，挤了进来。他满头是汗，气急败坏，一见到他的同行便低声的说：

“巡捕来了！”

就这么轻轻的四个字，居然把四个方庆得手、欢天喜地的剪绺客吓得魂飞魄散，脸色大变。四个人慌慌张张，分向四个方向，拔腿便逃。这时候，又有一名瘦瘦小小，穿





身短打的青年人。貌不出众，衣着平常，可是他所到之处，人人让路，个个向他点头道辛苦。那青年却板紧着脸，置之不理。但见他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拏住一名跑得慢些的剪绺客的后领，那剪绺客身胚结实，长得又粗又壮。杜月笙正为那大胆挑衅的青年捏一把冷汗。怪事，就在这一刻儿发生。

分明一拳可以打倒对方的壮汉，一个转身，见是那名弱不禁风的青年，居然浑身簌簌地抖，眼中落下几滴急泪，然后便当着众人，屈膝下跪。伸出双手，抱住那名青年的腿，却用一个飞快的动作，将一大把钱，塞进青年的衣袋，紧接着便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地说：

“大老爷，好老爷，小人是刚到十六铺来的，请老爷高抬贵手……”

杜月笙明明看见，壮汉偷来的钱，已经塞进青年袋里去了。可是，那青年仍然紧板着脸，一把拎起壮汉的衣领，轻轻的把他拎了起来，叱喝地说：“走，跟我上望江楼去！”

壮汉一听望江楼三个字，竟然会如丧考妣，嚎啕大哭起来了。他死命地求，却是青





年执意不依，纠缠了半晌，最后，壮汉还是乖乖地被青年捉起后领，走出人群，声声哀哭而去。

这一幕，把杜月笙看得呆了。四周正响起嗡嗡地议论之声，他忍不住地，向身旁一位老人家探问：

“爷叔，那位老爷就是巡捕呀？”

老翁耸耸肩膀，不屑地一笑，答道：

“啥个巡捕，伊不过是巡捕的小伙计！”

杜月笙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捕房的小伙计（还不算是捕快），就有这么大的威风 and 这么宽的财路。扒手有如天上的神仙，巡捕小伙计竟是神仙的班首、魔头。那么，巡捕，甚至于巡捕头脑，鼎鼎大名如黄金荣者，又该是何等的了不起呢？

自从杜月笙亲眼目睹这一次街心小风波后，在他的脑海之中，即已牢牢镌刻上“望江楼”三个字，他不知道那一座黑道人物闻之丧胆的著名茶馆，正是他当马路压路机，往返踱踱街头时，几乎每天都会经过一两次的地方。总以为那将是在深山僻谷，天涯海角，一座十殿阎罗并肩坐，牛头马面两边排





的阴风凄凄，鬼哭神嚎的地狱。直到有一天，他又施施然地走过人进人出的望江楼。光天化日之下，摩肩接踵之际，杜陡然听到从他头顶心上，发出一声凄厉尖亢的惨呼：“啊——哟——！”

陡然之间，吓得 14 岁的杜月笙停止脚步，连血液似乎都为之凝结了，他仓皇四顾，街头别人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似的，声色不动，照旧朝前走着。杜勉强定心神，拉住一名要饭的乞丐问：

“这是什么人在叫呀！”

老年乞丐一脸苦笑地道：

“穷人，跟你我一样的穷。”

杜怔住了，想想又问：

“那他是在……”

“吃生活！”老年乞丐一声长叹地回答。
上海话，吃生活便是被修理，挨揍。

杜更弄不懂了，他紧接着再问：

“是啥人在给他吃生活呀？”

老乞丐这一次答话时，面露紧张恐怖之色，声音也压到最低度：

“巡捕，这是望江楼上的巡捕在问案。”





杜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望江楼不是什么地狱，而是一座看来稀松平常，毫不惹眼的茶馆。至于巡捕为什么要在茶馆里面，众目睽睽之下用刑问案呢？这还要等到好几年以后，他自己也登临望江楼了，方始明白。原来，当十六铺成为了罪犯的荟聚所，租界巡捕前来华界办案，未免有点不方便，他们惟有派些小伙计，捉到人犯就便在望江楼茶馆设下公堂，用刑审问，获得罪证，然后再押回租界巡捕房的。

离开高桥家乡以前，杜的外祖母塞给他的一点点钱，省吃俭用的花光了。他决心找个事情做，又一天，他走过一家水果店门口，发现一堆水果皮，旁边还有一把倚在墙上的破扫帚。一念之间，他想起他曾看到一位老太太，踩到了一块桔子皮，仰天摔了一大跤，还受了伤，居然没有人上前相帮。他觉得那些水果皮堆在街上会闯祸，便本能的拿起扫帚来，耐心地把水果皮扫到路旁一堆垃圾里去。完成了这一件小小的义举，杜放下扫帚，拍拍双手，正当他要继续向前走，忽然，听见了身后的一声喊：





“喂！小朋友！”

杜还以为自己闯了祸，惊了一惊，怯怯地回身望时，但见一个年纪比自己略大些的小孩子，圆圆脸，笑咪咪的倚在水果店门口，两只眼睛盯住杜望，好奇地在问他说：

“你天天在街上荡来荡去，做什么？”

杜差一点被他问住了。他轻轻咬着下嘴唇皮，讷讷地答道：

“我……我没有事情做。”

一问一答，是这么继续下去的——

“你家呢？”

“在浦东。”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

“我劝你还是回去的好，”对方好意的在建议着，“一个小孩子天天在马路路上荡，巡捕看到会捉的啊！”

末一句话，把杜吓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跟高高在上的巡捕也会拉上牵扯。骤然一阵心虚发慌，杜不由自己脱口而出的问：

“那……那怎么办呢？”





问与答，又接下去了——

“赶快回家呀。”

“可是，我家只有我一个……”

“哦，”声音里，有着同情的成份，对方再下个断语，“那——你根本就没有家了。”

“嗯。”

“你有钱没有？”

“昨天——昨天就用完了。”

杜答话时深埋着头，声音又很低沉。那时节，杜生活太不正常，又是心事重重，因此他很瘦弱，对方一望即知，他至少饿了一天了。于是，他转身入店，拿出一小筐水果，直接递到杜的手上。

“不不不不，”杜紧张的双手直摇，身子往后一缩。并非他不愿接受旁人的赠与，而是：上海有巡捕，人家的东西不能拿，他坚决地、本能地加以拒绝，“我不能拿人家的东西！”

“拿去吧，”那一小筐还在向杜塞过来，“这里面都是烂了的，师父捡出来，原该拿去丢掉……”

又推让了一阵，杜终于胀红了脸，情不





可却的收下了那一小筐烂水果，喃喃的道了一声谢，抱着水果快步的走了。

杜月笙没有料到的是扫掉一堆果皮，得到一小筐烂水果，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但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话说，杜抱着那一小筐烂水果，心跳突突，相当紧张，他挑了一处最最僻静的地方。把烂梨和烂苹果从筐子里取出来，一行行的摆在地上。准备先数个数，然后再挑些还可以吃的，聊以果腹。也许，是他在无意之间，摆得蛮像个烂水果摊吧。他一抬眼，瞥见有一只大手，拿走了一只烂苹果。那位先生以为杜月笙是摆地摊卖烂水果的了，他在问：

“几钱？”

福至心灵，胆子一壮，杜月笙不敢抬头的在试探着答话，他低低的说：

“两个钱。”

杜月笙所获得的答复，是接连的扑扑两声，有两枚制钱，丢在地上。杜月笙的第一位顾客，拿着那只烂苹果走了。杜欣喜若狂，将两枚制钱紧紧的握在手里。

顺利无阻，卖光了一小筐烂梨烂苹果，





使杜月笙仅赖大饼馒头充饿，维持了整整五天没有挨饿。然而，从第六天起，他又是分文无有，又是饥肠辘辘。

饿得最难忍的时候，杜月笙独自一人，坐在十六铺黄浦江畔的一个冷僻角落。黄昏薄暮，夕阳斜射，映得遍地金黄，在愁惨之中凭添几分凄凉，饥火中烧的杜月笙双手支颐，一动也不动的坐在江滨沉思默想。江水呜咽的在他脚下流过，江水粼粼，但却在夜幕笼罩之下，似乎不起一丝水波。那是杜月笙一生之中最危险的一刻，因为他正在想着，假使他就这么悄悄的滑下水去，是否一切的痛苦俱将获得解脱？

几度犹豫，几度彷徨。杜追忆的说，就在他下定决定的那一刻，他如聆纶音，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背后喊着：

“嗨！”

还是那个水果店的小学徒。

他往他的身旁一坐，语气之中略带几分埋怨，水果店的学徒在说：

“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我寻来寻去都寻你不着？”





“我——”杜月笙仅仅只能逼出一个字。这一个字以下的，都由于生死关头所激起的由衷感激之情，刹那间在他胸头泛涌热辣辣的浪潮，使他无法说出内心里的话了。

“你又在饿肚皮，是不是？”

问话像似一支利箭，贯穿了杜月笙的内心。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流浪儿，有一分关怀便是无限的亲情。杜月笙一时之间不料获此，难于消受。他双手捂面，嚤嚤的啜泣起来。

好汉有泪不轻流，只因未到动心处。友谊的暖流在两者之间互相传递。杜月笙听到对方断断续续的说：“那一天我就跟我们老板讲好了，让你到我们店里去学生意……”

15岁的杜月笙终于在上海十六铺获得了一个立足点，经由热心肠王国生的推介，到鸿元盛水果店去做短工。短工比学徒的地位更次一级，老板不管衣食住，只是在需要人工的时候，将他优先采用。

在这种情形之下，杜月笙必须出卖劳力，换取他的一日三餐。鸿元盛老板让他参加搬运西瓜的行列。搬运一整天的西瓜，累得精





“我——”杜月笙仅仅只能逼出一个字。这一个字以下的，都由于生死关头所激起的由衷感激之情，刹那间在他胸头泛涌热辣辣的浪潮，使他无法说出内心里的话了。

“你又在饿肚皮，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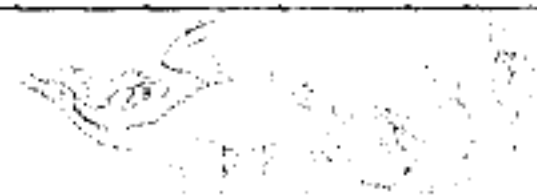
问话像似一支利箭，贯穿了杜月笙的内心。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流浪儿，有一分关怀便是无限的亲情。杜月笙一时之间不料获此，难于消受。他双手捂面，嚤嚤的啜泣起来。

好汉有泪不轻流，只因未到动心处。友谊的暖流在两者之间互相传递。杜月笙听到对方断断续续的说：“那一天我就跟我们老板讲好了，让你到我们店里去学生意……”

15岁的杜月笙终于在上海十六铺获得了一个立足点，经由热心肠王国生的推介，到鸿元盛水果店去做短工。短工比学徒的地位更次一级，老板不管衣食住，只是在需要人工的时候，将他优先采用。

在这种情形之下，杜月笙必须出卖劳力，换取他的一日三餐。鸿元盛老板让他参加搬运西瓜的行列。搬运一整天的西瓜，累得精





疲力竭，所得的代价只是二三十个制钱。当年，二三十个制钱仅够在街边小吃摊吃两碗蛋炒饭。男孩子十五六岁，正在发育的年龄，食量特别的大。何况他做的是苦力工作，两碗蛋炒饭吃不饱，索性不要蛋了，还是顶不住，那就只有将就将就。最难受的是吃得喉干舌躁没有水喝，只得巴望转递西瓜行列中有谁一不小心失了手，西瓜没有接牢，掉在地上碎成几片。——总是热渴难当的杜月笙，觑准目标一马当先，抢在营营的苍蝇前面，捞起一片西瓜在老板喝骂声中大嚼。杜曾经说过，在他记忆之中，从没有比当年跌破西瓜更美味食物。

从衣食无着的流浪儿，到鸿元盛水果店的小学徒，其中还有一段相当艰辛的历程。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杜月笙就已经开始把人家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更着急。充苦力搬西瓜时他的收入还不够自己混饱肚皮，当上了学徒算是吃和住两者有了着落，说收入就只有在店里生意好，老板心里高兴时，才会一个月赏个块儿八毛的剃头洗澡钱。杜从小就在过衣食难周的苦日子，他对那极其难得



的浅浅收入，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但是，他爱结交朋友，而且无论哪一位朋友发生了任何困难，他都热心帮忙，帮忙到底，任何人有事求他，他往往都是一口答应一肩承担，从来不肯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份能力。碰到银钱上面的事情，自己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不算，有时候一急起来，连店里的公款他也不惜拿来挪用。第一次，挨老板的骂，第二次，挨老板的打，第三次，叫他卷起铺盖来走路。杜月笙可是说走就走，他既不留恋，尤且绝口不发一句怨言。

这是杜月笙第一次尝到失业的滋味。

失业以后，又是衣食无着，到处流浪。比以前稍微好些的，是杜月笙总算结交了几个小朋友，显得不如以前那么样孤单寂寞。只不过，这些小朋友也是一日三餐，难以为继，“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杜从不向他们开口，当饥饿来临，他就只有咬紧牙关，束紧裤带。有一顿无一顿的，算是又混过了一段岁月。

第二次拉他一把，让他再度结束流浪儿生涯，重新有了个职业，又得一处啖饭之所





的，居然又是王国生。原来王国生在杜离开鸿元盛水果店后，又过了两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算是出师了。学徒出师，可以在师父店里继续工作，不过得从无给制改为有给制，开始每月拿薪水，名义从学徒升格为伙计。王国生不曾留在鸿元盛，他走学徒出师后的另一条路，因为他能够凑得出一笔本钱，自己开设一家水果店，取个字号叫潘源盛。店不大，本钱也不多，只是因为王国生勤劳节俭，做生意也还巴结，所以才能站得住脚。

有那么一天，王国生到黄浦江边码头上接水果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之中，一眼瞥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三年半的分别，杜月笙长成一个大人了，却是风采依旧，面貌如昔。就只是常年流浪，衣食不周，形容显得有点憔悴。所以当时王国生呆了一呆，方始把他认了出来。

王国生显然很热情，他抛下自己的事情，跑过去，将杜月笙一把拉住。

杜月笙愕然的回过头来，当王国生亲亲热热的在喊“月笙”，他反倒认不出王国生





了。往后杜提及这一幕时，还曾自我调侃的说：

“跟他三年半不见面，两个人都从小囤变成大人了。只不过，三年半的变化实在太太。我是往长里窜，他往横里发！”

杜月笙的意思是说：“王国生当了老板，心宽体胖发了福。”

结果还是由王国生若有憾焉的再度通名报姓，他重重一拍杜月笙肩膀说：

“哎呀，月笙，你连我都不认得了。我是鸿元盛的王国生嘛。”

杜这才讷讷的向他道歉，一双好友久别重逢，立在街边寒暄了几句。王国生便把杜月笙往一家饭馆里拉，他豪爽的说：

“来，月笙，我们去吃几杯老酒，长远弗见，正要好好的谈谈。”

杜月笙往后感慨的说：那一年他 19 岁，就由于在大街上遇见了昔日好友王国生，使他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心情。因为当时他自己衣衫褴褛，肚皮里正在饿得咕咕的叫，上饭馆是当年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豪华享受，为什么他不趁此机会去大吃大喝一顿





呢？——问题在于，他回想起自己在鸿元盛水果店的那些往事，王国生可以说是他第一个恩人，三四年以前，他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鸿元盛的老板，让杜去当一名额外的学徒。然而，杜却竟为了帮助自己的那些小朋友，挪用了老板的钱，连累王国生挨了不少次骂。前尘往事，一经兜上心头，杜立刻便兴起愧对故人的深切疚恨。因此，当王国生一心叙阔，横拖竖拉把他拉进饭馆时，杜便在心底暗暗的立誓：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然而，一双好友在饭馆里吃了个杯盘狼藉，酒醉饭饱。诉过了多年离情，晓得了相互近况。杜月笙无法拒绝王国生恳挚邀请，到他所开设的潘源盛水果店里去，还特别优待的就算他是出了师的伙计。起先，杜尽心尽力，帮王国生，使得潘源盛的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他自己的薪水也在一次次的增加，但是，黄浦滩上纸醉金迷，急管繁弦，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置身于那种处处都是诱惑，处处都是陷阱的花花世界里，实在难于抗拒那些酒色财气的诱惑。在黄浦滩上，





亿万富翁有亿万富翁的消遣，小伙计也有小伙计的玩法，所谓各有所好，各得其所。杜身边有了几文闲钱，就有人用激将法拉他去赌，用花言巧语骗他去嫖。一回生，二回熟，陷于泥淖，几乎无以自拔。杜月笙寄情樗蒲，沉迷花丛，天长日久，浑浑噩噩。其结果是害了一场大病，几次三番死去活来。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好朋友王国生和袁珊宝都已经准备给他办后事了。后来在他的姑母悉心见解之下，杜月笙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最终痊愈了。经过这一次打击，他马上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牢牢靠靠的做生意，诚诚恳恳的交朋友，拜清帮通字辈前人陈世昌先生为师，使他的交游益发扩大了范围。终于，获得另一位通字辈前人，绰号“饭桶阿三”黄振亿的介绍，结识了黄金荣黄老板手下八个生之一的马祥生，满怀虔诚的跑到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同孚里黄公馆，成了众家老板黄金荣手下的伙计之一。

在杜月笙进入黄家时，黄金荣早已是上海法租界的众家大老板，权大势高，炙手可热。他官拜督察，再升一级就是洋人专利的





督察长了。因此黄老板算得上是法捕房数一数二的人物。所有法租界的华籍巡捕，莫不出自他的门下。他在同孚里拥有一式八幢弄堂房子，除了黄公馆一家以外，住的全是黄老板手下的重要干部。同孚里的房子相当的大，每一家的前门和前厅，后门和厨房，一律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老板和老板的亲戚朋友，走前门登前厅，伙计和伙计的亲戚朋友走后门，进厨房，各有门径，泾渭分明。这很有点像现在的机关，首长和一般部属的办公室是分开来的，只不过区分得格外严格。伙计非经传唤或许可，不得进入前厅。杜月笙当年吉星高照，鸿运当头，从十六铺水果店一步登天，一脚踏进了黄公馆，也只是从厨房到客厅。进公馆与见老板，还有一段极长极长的距离。杜月笙纵然有幸成为黄公馆属下的一员，可是，他曾一连好几个月，不曾见到老板一面。

灶披间——黄公馆的厨房，是杜月笙刚进黄家时的置身之所。厨房间里经常放置三五张饭桌。每天从早到晚，来自天南地北的黄门小伙计、小兄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有人来听吩咐，接差使，有人来报消息，缴差复命。但是这许多人却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老板，当面禀报或听令。他们不论有什么事，全都需要通过一道居间者，由居间者代为传话，这些居间者都是黄老板的亲信，黄浦滩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字号打出去也是响叮当的。居间者除了替老板传话之外，更可以代老板做主，同时也负责招待或打发各路英雄与四方人马。通常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概由他们代为解决，事后也无须乎向老板报备。这种上海大亨处理一应事务的办法，就是由众家老板黄金荣，根据事实需要而创始，然后再逐步加以改进，铸成一个定规的。这种办法具有分层负责制的优点，而且减少了汇报核备的麻烦。事情来了随到随办，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尤其还可以保持机动性与确保机密。往往某一件事由某一个人负责，从事件之起，直到完全结束，老板根本就不知道。但却由于居间者的忠心耿耿，绝对可以信赖，很少会出纰漏。人治与法治兼而有之，此所以黄杜张三人亨势最盛时，手下各有成千上万的人手，老板照样天天交际应酬，





留连赌桌，其乱如麻的事务俱能按照常规进行不误。如有突发事件，只要老板一声令下，如臂使手，如手使指，马上就全体总动员了。

进入黄公馆之后，杜月笙机灵的头脑发挥了用场。他事事小心，时时注意，将黄公馆上下各种特殊制度、处理事务的方式、重要人物的职掌和权力以及他们与老板的关系，他们的脾气、性格、一应好恶的摸了个一清二楚。了然胸中以后，还能从旁观察，细加研判其得失利害。他小心翼翼的确守自己的本位，该说话的时候最好怎么说，该做事的时候最好怎么做，比任何人都先有一番盘算。即令说杜那时节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似乎也并不为过。就这样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偶然找到机会，露了一两手自己的才干，果然就博得了众家老板黄金荣的一声称赞“月笙狄个小团满灵格”，就以这一句称赞为起点，杜月笙算是在黄公馆里有了点身价，大家也就此对他另眼看待起来。及至黄老板把杜派到他的夫人桂生阿姐那边去办事。他早已洞知桂生阿姐是黄老板的灵魂，黄老板对她说一不二，百依百顺。于是杜不但尽心尽





力，而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处处使桂生阿姐觉得他与众不同。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在必要时，给阿桂姐出主意，语言不多，但都是一言中的，切中要害的。连阅人多矣的桂生阿姐，都确认他是一位能干的角色，难得的人才。从而决定让他多做一点事情。取得了桂生阿姐——老上海尊之为老正娘娘的青睐，杜就脱颖而出，步步高升了。因此，一般人谓杜月笙入黄公馆后，“运道来了，连成墙都挡不住。”

往后，杜月笙成为黄老板的亲信，知己，智囊，伙伴，进而与黄老板金兰结义，称兄道弟。也正因为黄老板对杜月笙绝对的信任，民国16年后，当沪上三大亨各项事业都到了颠峰状态的时候，黄老板才会把一切的一切全部交给杜。但是杜月笙永远表现得不骄不躁，对黄金荣谦恭如旧，使黄金荣对他极为满意。

